



WUXI GUOZHUAN BIANNIAN SHIJI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

刘桂秋◎著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于1920年冬创建于惠山之麓。1928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唐文治任校长，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其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批准号:08LS013)

4648.29
44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

刘桂秋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GD 015752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刘桂秋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00-8592-8

I. ①无… II. ①刘… III. ①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术编年研究—校史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6374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陈 光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592-8

定 价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怀念母校

——刘桂秋著《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序

冯其庸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考入无锡国专的。当时，迁到广西去的无锡国专本校还未迁回来，为了争取时间，所以唐文治校长决定先在无锡原校址实行春季招生。

这时，距抗战胜利还不到半年，但国内形势已很紧张，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对我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连无锡城里都未去过的人来说，对时局根本一无所知，连“共产党”也是最近才听说的，可见我当时闭塞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回忆起母校来，真正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套一句古话，可以说“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无锡国专，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人生道路。

我是在无锡国专逐步获得革命的知识，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学校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大家对个别年轻教师讲课的不满意，二是学生对伙食的不满意，两件事愈闹愈大，发展到学生自动停课。记得当时临时主持校务的是蒋石渠先生，但教务长是上海的王蘧常先生，蒋先生就请王蘧常先生来无锡处理此事，我被推为学生代表面向王蘧常先生陈述学生的要求。不想王蘧常先生完全理解学生的意见，作了两项

决定：一是改善学生的伙食，学生交的伙食费和消费完全公开，二是更换教师。但王遽常先生对更换教师的事作了解释，说年轻教师都有一个教学实践的过程，不要因此而对这位老师产生误解，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一个锻炼过程。同学们对王老师的处理都很满意，学校也就很快平静下来，而我就是在这一认识王遽常老师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的。

没有想到我们的这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却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学生运动不断发生，国共双方内战一触即发。最先是因“沈崇事件”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反美学生运动，接着是反饥饿、反内战等全国性的反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当时无锡的社会教育学院学生进步势力最强，无锡国专因为有了上述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尽管当时并无政治背景，却也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当“沈崇事件”等全国性的反美政治运动爆发后，社会教育学院的学生会立即就与无锡国专学生会取得联系，以社会教育学院和无锡国专两校为主，联合全市其他学校，掀起了全市性的学生大游行。后来的几次运动更是如此。我当时是无锡国专学生会会长，到一九四七年底，无锡国专的教务会议上，有一位姓王的老师提出来要开除我和高涤云同学，会上竟然引起另一位教授俞钟彦先生的强烈反对（俞钟彦是国民党资深人士，与李济深交厚，在国专开唐诗选的课），他用茶杯掷到王先生的桌面前，会议大乱。结果高涤云同学被开除，我被记两次大过、两次小过（仅免于开除）。之后，我和高涤云很快就接到地下组织的通知，要我们立即离开无锡，说国民党的城防指挥部要抓人。我因此即于一九四八年春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高涤云则由我介绍到我家乡前洲小学去教书。上海无锡国专分校是由王遽常先生负责的，我去上海，首先是得到王遽常先生同意的。由于地下组织的通知，我



才明白我们每次学生运动都是有地下党组织的支持的。当时上海无锡国专也有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于廉。于廉是我的好朋友，但在当时也只是大家思想一致，非常友好，没有向对方公开自己的身份，不过于廉是知道我因学生运动从无锡转来的。

我还记得一九四七年夏天或一九四八年初，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准了，为了呼吁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大批学生，我曾与几位同学到上海拜见过唐校长，地点是在唐校长府上。当时上海不少学生因游行示威被上海市府和警备司令部逮捕，无锡也同样有一部分学生被捕。我们向唐校长陈述了上述情况，唐校长听了我们的陈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唐校长就带头与张菊生、陈叔通等十多位著名人士，致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学生，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被捕学生终于全部得到释放。

到了这学期末，我又得到无锡国专同学们的来信，要我回到无锡，说无锡国专的形势大变，进步势力剧增，所以我于一九四八年下学期又回到无锡国专本校，冯振教务长也认可了我在上海半年的学历（我去上海并未办过任何手续，但冯振先生一向是理解和关心我的），终于我在本年年底在无锡国专本科毕业了。

我在无锡国专时，一直未与地下党组织发生过直接关系，我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却与家乡（无锡前洲镇）的地下组织发生了直接关系，组织上安排我做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江阴的武工队队长王鹏还直接找到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我说明了我的情况后，才没有改变计划（王鹏于建国后任江阴县长）。等到我从无锡国专毕业后，很快就接到前洲镇树德小学校长孙默军的聘请，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到

树德小学教书，孙默军也是地下组织的人，我到树小后他们就向我明确了。我到树小不久，突然，附近堰桥胶南中学的一位地下党员暴露了身份，连夜出走，我又被树小的组织安排到胶南中学去接替这位教师。我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到胶中的，到四月二十二日晚，解放军就突破江阴防线，直接进军无锡。当晚我在锡澄公路上带领学生迎了解放军，四月二十三日一早即步行到无锡苏南行署政治教育处，^①与陶白处长接头后，随即办理入伍手续，正式参加解放军。与我同时参加解放军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沈绍祖、张仁迪、陈志刚、陆振岳等，同时还有来自其他单位的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一批知识青年。之后，我又被派到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入党。这是我从一个农村的普通青年，经过无锡国专地下党的培养，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简略过程。

我参加解放军，当时的目标是进军大西南，组织上是准备让我们随大军南下的，当时的口号也是“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但由于形势的急剧发展，也由于地方的需要，领导又安排我们一批新入伍的知识青年做地方的教育工作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工作。所以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与沈绍祖兄又一起被安排到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当时我们都是属部队的编制，未脱军装。一年以后，苏南行署才批准学校的要求，让我们转业到教学战线上，同时也改变了编制，脱下了军装。到一九五四年八月，我又被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讲授大一国文课，不久又为新创办的新闻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对我来说，讲授这几门课是力不胜任的，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到北京未给备课时间，一个月后

^① “苏南行署”、“政治教育处”是后来的名称，我到无锡找到陶白同志时，无锡刚解放，还没有这些机构名称，连“苏南军管会”也还没有公布。



就要走上大学讲坛，实在太匆促了，但已无法推辞，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克服困难。更困难的是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各种教材都缺少，全要靠自己编著，《历代文选》就是当时由我主编，由教研室的同志共同注释的大一国文教材，不想后来竟会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因此吴玉章校长还特地召见我，给我鼓励并赠我他的著作。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还独立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稿。因为没有适用的教材，唯一的一部是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但十分简略，也没有编完；还有一部是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讲得比较详细，但只写到先秦，以后就没有了。旧有的教材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但都较简，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我只能根据教学的需要自己动手来编写，我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从文学史的开头一直编到明代，当时边写边由誉印社刻印成讲义，基本上完成了当时的教学任务。^①

回想起来，我从一九四六年考入无锡国专，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参加各种进步运动，渐渐走到革命的队伍里。一九五四年八月调到北京，未经准备，就讲受大一国文课，接着又承担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学术论争，现实的工作又把我送上学术工作的道路。我之所以勉强能把这样重的任务担下来，还得到领导的勉励，除了当时个人的勤奋外，我真正要感激在无锡国专三年诸位老师对我的栽培。如果没有无锡国专三年的苦学，我是无论

^① 我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从先秦编到明末，但当时刻印出来的只到宋末元初，以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学生上山下乡等等，基本上停课了。所以元以后的讲稿未能打印，一场“文化大革命”，连原稿都被毁了，现在总算找到的是已刻印的部分，只到元初。

如何承担不了这些课程的。

所以，从读书做学问这方面来说，无锡国专诸位老师领我走上了读书和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唐文治校长外（唐校长当时亲来讲授《诗经》），主要是王遽常、钱仲联、冯振心、朱东润、童书业、吴白匋、周贻白、王佩诤和合众图书馆的顾廷龙诸先生。无锡国专除专业教授外，还有特聘来作专题讲演的老师，如著名的钱穆（宾四）先生，就曾来为全校作过关于如何治学的专题讲演，这次讲演使我终生难忘，他谆谆嘱咐，读书治学一定要“我见其大”。这是我终身不忘的一句名言。此外，王遽常、钱仲联、朱东润、周贻白诸先生，除课堂上讲课外，还经常在课外的谈论中给学生以教导，我与以上诸位先生的交往，可以说直到诸位先生终身都未中断，而且王遽常先生还为我介绍了词学大师龙沐勋（榆生）、夏承焘先生、金文大师唐兰先生等，所以，无锡国专的三年，又是我开始走上读书治学道路的三年。

总括起来，我从一个农村的求学青年，走上革命的和治学的道路，而且终身服膺，虽经种种艰难挫折，终未丝毫改变初衷，应该说都是无锡国专诸位恩师教导的结果。最难忘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凶浪中，王遽常先生还来信鼓励我“独立乱流中”，钱仲联先生在临终时还叫着我的名字！

我虽然是从无锡国专毕业的，但我对母校的历史并未研究过，所幸的是我的老师辈，有好多位都是无锡国专的早期毕业生。我还有幸听过唐文治校长亲自讲《诗经》，听过他最有名的“唐调”的朗诵，他来讲课，每次都由陆修祐先生陪讲（他那时双目已失明，腰间还挂一个尿袋）。唐校长和诸位师长的道德学问，无形中给我心中树立了永不磨灭的榜样。

无锡国专的办学特点，我未经研究，直觉的感受，觉得它

是我国历史上书院制的继承和发展。唐校长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完全可以像古代的书院一样来主持讲学，但是他却延聘全国名师来执教，包括经学在内，把我国传统的学术精华包罗无遗。更难得的是他思想开阔，除各种传统的学问外，学校还设戏曲、小说课。我在上海分校时，赵景深先生主讲戏曲课，我们还常到他家里去玩，听他讲有关戏曲小说的事。刘诗荪先生开《红楼梦》的课，一学期专讲《红楼梦》。我当时兴趣还不在于《红楼梦》，所以只听了两次课，其他时间都花在诗词和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上。唐校长安排的课程设置和广聘名儒讲学，既继承了书院讲学的传统而又大大扩大了书院的学术范围，是适应时代的进步发展。

无锡国专的另一特点，是课本用的都是原典，没有用什么选本、概论之类的教材，也没有文、史、哲等分科。尤其难能的是好多位老师讲课，都不带教材，全凭记忆背诵原著。如王遽常先生讲《庄子·逍遥游》，从未带过书本，每次讲课都是听他背诵，我们手里拿着原书，一字不差，连各家的注疏他都能背出来，每当疏解完各家的注疏，评其得失，然后再讲自己的疏解，整个一学期，一篇《逍遥游》没有讲完，却给学生以最朴实的治学方法。特别是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也不用教材，有两位同学给他作记录，他所引各种典籍，全由他默记板书，而且写得极快，有一次他讲到秦代的物价，多少钱一石米，忽然插入一句“合现在的金圆券（南京国民党政府为应付恶性通货膨胀而发行的一种货币）多少万元”，引得学生轰堂大笑。他后来出版的《秦汉史》，就是在当时讲课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朱东润先生讲《史记》、杜诗，也特别重视背诵，他要求我们《项羽本纪》要背诵，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要背诵，至于《秋兴》、《诸

将》等律诗更要背诵。而且每次上课，他总是低声朗诵，他的声调不高，但情韵特胜，大家都爱听他的朗诵。他的书法也特别好，正草隶篆都精，所以他上课的板书，学生都舍不得擦掉，他曾送给我多幅书法，我至今珍藏着。还有钱仲联先生，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到他九十多岁，我去看望他时，谈论中所引古人诗篇，都是随口吟出，不假思索。冯振心先生教《说文》，有一次我去他书房里请教，他为《说文解字诂林》特做一个书柜，一格放一本，谈论时，要抽哪一本就抽哪一本，不用搬掉压上面的书本，而且他对哪一个字在哪一本，都很清楚，随手就拿。我因为喜欢古文字，所以常到冯先生书房去。王遽常先生也知道我喜欢古文字学，所以一九五四年我调到北京时，他特意为我写信给唐兰先生，我到京第一个拜见的就是唐兰先生。“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家乡出土了多件青铜器，都有铭文，最大的一件铜鉴体积很大，竟被放在猪圈里当猪食槽用，后来我的侄子用铅笔拓了十几个字寄来，我就到故宫拜见唐兰先生，最后辨认出这是一件大型楚器，还有几件器形较小，也有铭文。后来唐先生写信给我，让我想办法把它弄到北京来，但经过努力运来时，不幸唐先生已去世了。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研究，定名为“郢陵君鉴”。虽然这件事已与当年的无锡国专没有关系了，但要不是冯振心先生教我《说文》，培养我对古文字的兴趣，要不是王遽常先生特为我介绍唐兰先生，这几件名器可能就会因农民无知而毁弃。据知，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把完整的宝剑，也有铭文，因为出土时不小心，断成三截，老百姓以为没有用了，就掷在土堆里了，等到我听说，托人去找时，当时是在挖河，河已开通，土堆也完全无法辨认了，终于未能再得。后来这件“郢陵君鉴”和其他几件铜器，我都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

无锡国专的教学，特别重视敦品，对学生的品德的培养。唐文治校长、王遽常先生、冯振心先生等一大批教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历尽艰难，辗转办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支持学生运动，这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令在校的学生无不为之肃然起敬。所以无锡国专对学生敦品的教学，一是老师们的身体力行，二是以所读的古籍以及古今英贤为楷模。我国的传统古籍，很多是把品德的培养寓于书本知识中的，尤其明显的是《论语》、《孟子》、《荀子》等。学生学习这些古籍，也就渐渐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社会、民族所负的历史责任。还有古今英贤的事迹和名言，对学生也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记得校内有一副对联，联语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① 还有一幅字写的是张西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也都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所以在无锡国专所接受的教育，是品学俱重，品学同时进行的。

无锡国专教学的特点之三，是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写作实践的能力。我自身的体会，真正的做学问，是在出学校后的自学，在学校主要是学会自学，打好基础。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大学者，没有是在学校课堂上造成的，都是在长期的自学探索、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完成的。

无锡国专当时很重视学生的作文课，每学期要写好几篇文章，有的比较好的文章，老师还拿到课堂上来表扬。

另外，还鼓励学生自办刊物，我与沈绍祖、梅鹤徵等几位同学还发起成立“国风诗社”，创办《国风》诗词刊，是油印

^① 这副楹联，我的记忆中是挂在进校后第二道门口的，原句是杨继盛的，下句作“辣手著文章”，但这副楹联下句作“妙手”，记得是左宗棠书。因此联书法好，我印象特深，连“左宗棠”三字，我至今尚有印象。

本。“国风”两字是王子畏老师题的，这个刊物，一直办到我毕业，记得毕业时还办过一期专刊，可惜这个出了几十期的油印刊物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已无法找到了。我与同学们还办过一个墙报，刊名《彻札》，这个名字也是王子畏老师题的，这个刊物主要是发表评论文章，也办了很长时间。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给学生以写作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还有一种活动，就是学术性的讲演会或讨论会，有机会时，就请专家来讲演。记得学校有一次请钱穆先生来讲演，影响极大，前面已经提到了。还有一次，是田汉、洪昇带着他们的演剧九队到无锡来排《丽人行》，因为老师向培良、周贻白都与田汉、洪昇熟，所以带着我们不少学生，到他们住处（秦淮海祠堂）去拜访他们，听田汉他们讲排演的情况，之后，田汉还到学校来过，作过座谈。此外，本校的老师也经常有学术讲演，我就听过朱东润先生的一次学术讲演。我在上海分校时，最感兴趣的是童书业先生与唐兰先生关于金文问题的论辩，童先生每次上课，总要先讲一段他们论辩的情况，客观上把学生带进了他们学术论辩的氛围。当然，两位先生的论辩，都是非常说理和实事求是的，记得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大公报》的专刊上，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一本专刊合订本。我在上海分校的另一收获是由王遽常先生介绍我与沈燮元兄一起到顾廷龙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向他请教，当时顾老撰写的《明代版本图录》刚出版，在合众看书时，我也得到顾老关于版本学方面的教导。当时我正在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顾老也给予我很多指点。而在这方面，我的同班同学好友沈燮元兄，更是后来数十年一直与顾老合作，成为顾老后的第一人。



在无锡国专时的以上这些活动，实际上也是培育我们初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实践活动。学术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实践，而不是空谈，无锡国专诸位老师的共同点，都是重视实践，不尚空谈，现在你只要去认真重读这些先生的著作，你就会确信这点。

我现在追忆，自己数十年来的治学，不敢讲半句无凭无据的空话，即使有所推测，也要说明是推测而不是证实。这一点求实的精神和实践的精神，促使我直到二〇〇五年我八十三岁的时候，还去帕米尔高原四千七百米处为玄奘入境的山口古道立碑（与当地政府和中央电视台一起），还进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以证实玄奘回归长安的最后一段路程。我们在大沙漠里整整十七天，终于得到了证实，印证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记录。我的这种实地学术调查的爱好和求证的习惯，追溯往事，也是从无锡国专时就开始的，因为一九四七年，我上无锡国专第二年时，就在《大锡报》上发表习作《澄江八日记》，调查明末江阴抗清斗争的遗迹。这一实地调查的学术原则，从无锡国专到今天，我一直未曾改变。这也是我受母校诸老师之教的一点事实。

无锡国专在唐校长和诸师长的苦心经营下，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但是至今却没有一部较为翔实的历史，现在有了刘桂秋先生撰著的这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总算弥补了这一重大学术缺憾。

但是，无锡国专这样的教育机构，是否可以算是翻过了的一页历史，对今天已没有现实意义了呢？我却以为不然，当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已五周年之际，当今天山西太原姚奠中先生国学教育基金会隆重成立之际，当今天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国学学习机构的时候，我认为像无锡国专这样的以中国传



统思想学术传承和发扬为任务的教学机构，还并没有过时；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自身的民族思想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存亡续绝的历史危机，所以这样的教学，还是现实社会所非常必需的。

我们现在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悠久的历史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对全世界的文明发展起过重大的推进作用。我们的民族复兴，当然是与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复兴伴随而来的，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思想、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强大地独立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句有深刻内涵的话，如果没有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这个结合，就会缺少内涵。当此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刻，对刘桂秋先生的这部著作，我看作是非常及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适时之作。

只可惜我年老多病，眼睛已不大能看书，未能认真地细读全书，失去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对以往许多事件的回忆，也可能有记错和失误的地方。好在还有许多学长在，如有误记，敬请指正，以免贻误读者，是所至盼至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夜一时于海南三亚养痾寓所

凡 例

一．一九二〇年底，唐文治先生等人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自此以后，学校曾经数度更名：一九二七年三月，无锡国学专修馆改名为无锡国文大学；一九二七年七月，又改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一九三〇年一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再次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四九年七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又一次改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在此过程中，除短时期使用过“无锡国文大学”、“无锡中国文学院”这两个校名外，余如无锡国学专修馆、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三个校名，均可简称为无锡国专。故在本书的书名中，径以“无锡国专”称之，书中行文也多采用这个简称。

二．本书纪事，始于一九二〇年，迄于一九五〇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无锡国专迁校广西；后又于一九三九年起在上海设无锡国专的“上海分部”。国专“桂校”、“沪校”之名，即由此而起。为使条理清晰，本书自一九三九年起，至一九四五年止，于每年中各设“国专桂校”和“国专沪校”两部分，依次分别纪事。

三．一九四六年，国专桂校师生复员回无锡，国专沪校仍留在上海办学（其间于一九四七年春，沪校的五年制部分并入无锡本部），直至一九五〇年初奉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令

归并无锡本部。基于以上情况，本书自一九四六年起，至一九四九年止，于每年中各设“国专无锡本部”和“国专沪校”两部分，依次分别纪事。

四．本书系年，采用公历纪年。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公历纪年之后，加括号标明民国年号及干支年号；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则在公历纪年之后，加括号标明干支年号。

五．本书于各年中所纪之事，能确知月份或季节或学期者，则按月份或季节或学期记之；月份、季节、学期之不可确知者，则系于各年之末。

六．本书于各年之中，依照时间之先后，条叙无锡国专的有关事件。每条之后，征引相关之史料，并间有本书著者的说明、辨析、考订性的文字。所征引的史料，如是较常见的，只作简要征引；如是较为重要的或较稀见的史料，则作较详细的征引，亦间有全文引录者。凡为本书著者的说明、辨析、考订性的文字，皆用“按”字领起。

七．正文所引录的文献中所涉及的人物，或称其姓名，或称其字号，读者不易辨识。故书中人物的名字在“条叙”性的文字中第一次出现时，一般都在名字后面加括号，标明其姓名字号及生卒年，以利读者辨识；但如是在“条叙”性的文字中列举无锡国专某届毕业生的名单，则不做这样的标注。

八．本书后附《本书征引文献》，所录征引文献均按其第一个字在汉语拼音字母中的音序排列。每项征引文献，都标明详细出处或文献来源；而在正文中引录文献时，一般只标明作者和书（文）名。读者自可将正文中所引录的文献与“附录”部分对照参看。

九．正文所引录的文献中出现难以辨识之字，以□标识；如系明显的错字，则在此字后加以校正，并以〔 〕标识。

引 言

—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道别样的风景。

唐文治先生执掌该校校政三十余年，在顺从世界潮流、努力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始终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无锡国专所培养学生的绝对数量不多，却保持了极高的成才率，三十余年中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研究、国学教育等领域的优秀人才，既在当时名闻海内，时至今日仍为士林学界所交口称誉。

无锡国专创办于一九二〇年。这一年中，唐文治辞去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到无锡定居，不久又接受施肇曾等人的邀请，担任新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唐文治之所以选择在无锡办这样一所在当时“很不时尚”的学校，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说偶然，是他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在无锡前西溪买下了一块地，以作奉养老父和日后归老之用；而他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回锡的原因，照他在自订年谱中的说法，是因为“自上年学潮后，

目 录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	1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	18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28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34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44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54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60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66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78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87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96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114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139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147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167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187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219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249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278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乙卯)	291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317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330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359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375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391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416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437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462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479
一九四九年(己丑)	490
一九五〇年(庚寅)	512
本书征引文献	520
后 记	544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

十一月十二日（农历十月初三），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一八六五～一九五四）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后回无锡定居。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五十六岁》：“自上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余因吾父老病，目疾日深，已先辞工业专门学校教职次，而交通部长迄不允。至十月初三日，余遂决计解职回锡，盖函电交驰，至此凡十次矣。部中派员来留、本校同人来请留者，络绎于道，均坚拒之。自问精力日衰，私衷歉仄而已。”

在唐文治回无锡定居后不久，由施肇曾（字鹿淞，号省之，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出资捐助，陆起（原名曾业，字芹芷、勤之，一八六七～一九四八）任总干事，准备在无锡创办一所专门研究国学的学校，延请唐文治出任馆长，定开办学费八千元，常经费每年一万元。唐文治乃订立《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共有躬行、孝弟（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和挽救世风十条。在此《学规》中，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特别看重“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专注于“维持人道”与“挽救世风”。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五十六岁》：“十二月，钱唐施君省之名肇曾，托友人陆君勤之介绍，属余在无锡开办国学专修馆，定开办费八千元，常经费每年一万元。余思讲学家居，平生之志，爰订定学规章程……”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见《茹经堂文集》卷二）：

“昔张子讲学有《东西铭》，朱子有《白鹿洞学规》，高忠宪有《东林会约》，汤文正有《志学会约》，皆所以检束身心，砥砺品行。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缅怀往哲，能无奋兴。复圣有言：‘有为者，亦若是。’谨订规章，愿与诸生共勉之。

一．躬行 人生世界之内，以礼义道德为根本，窃尝譬诸人之学问，犹墙屋也；礼义道德，犹基址也。若无礼无义，无道无德，而徒以学问为饰观之具，一旦品行隳坏，名誉扫地，是犹基址不固，墙屋坍塌，其危险何如矣。诸生既经有志来馆专修，务以砥砺品诣、躬行实践为宗旨。平日读书，皆当体之于心，返之于身。倘被服儒素，不过雅步高论，如陆清献所谓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每逢讲说，仅作一席空谈；而于礼义道德，绝无躬行之实，自欺欺人，可鄙孰甚，非吾徒也。

二．孝弟 学者，所以学为孝也，五常之本，万善之原，皆始于门内之行。《大戴礼记》载曾子之言曰：‘人之生也，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父母既歿，虽欲孝，谁为孝乎？年既耆艾，虽欲弟，谁为弟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时，此之谓与！’读此而不猛省者，非人也。中国古来孝行，曾子而上，首推虞舜与周文王。孟子言性善之学曰：‘舜何人也。’‘文王我师也。’盖以舜与文王皆大孝之人也。诸生有能孝其亲者乎？是异日之圣贤豪

杰也。

三．辨义 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曾子言平天下：‘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孟子》七篇，首辨义利。又言：‘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义利之辨，人心生死存亡之界也。末俗浇薄，好利无厌，专图一己之私利，不顾天下之公利，且藉口于天下之公利，以肥一己之私利，驯致灾害并至，生灵荼毒，可痛哉！而究其原由，贫而已矣。愈贫则愈贪，愈贪则愈贫，故贪与贫常相因，而利与害每相共。吾辈欲挽此颓风，惟有矫以清勤刻苦四字，淡而弥旨，俭而愈廉，懔四知之几微，严一介之取与，举卑鄙龌龊之念，扫荡无余，庶几异日能任治平之业。苏东坡云：‘办天下之大事者，立天下之大节者也。’诸生其勉之，勉之。

四．经学 吾国十三经，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万古不磨，所谓国宝是也。然要知吾馆所讲经学，不尚考据琐碎之末，惟在揽其宏纲，抉其大义，以为修己治人之务。先儒说经，首重实事求是四字。实事者，屏绝空虚之论也；求是者，破除门户之见也。经师家法，守兹兢兢。汉末郑康成先生当黄巾扰乱之时，风雨漂摇，讲学不辍，后学所当奉为圭臬者也。顾治经之要，尤在学礼。《管子》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人竞言法治，不知法施于已然之后，礼禁于未然之前，舍本务末，愈趋愈远。故今日发明礼学，维系人心之廉耻，实为莫大之急务。吾苏顾亭林、秦树沅诸先生遗风未坠，继起者倘有人乎？

五．理学 经师之所贵，兼为人师，礼学之所推，是为理学。孔子说《易》曰：‘穷理尽性。’穷理者，人生莫大之学问，即莫大之事业也。孟子传孔子之绪曰‘义理悦我心’，曰

‘明善’，曰‘集义’，皆理学也。宋周子得道统之传，作《太极图说》，发挥阴阳五行之奥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主静者，穷理之根源；人极者，为人之极则也。二程、张子皆理学正宗，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旁搜远绍，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陆象山先生直揭本心，别树一帜。王文成宏畅厥旨，学术功业，震耀当时。嗣后刘蕺山、陆桴亭、张杨园、陆清献、汤文正、张清恪诸先生，莫不行为世表，言为世法。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然而有最宜致慎者，则诚与伪之辨而已。孔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学者所当日三复也。

六. 文学 《尚书》赞尧曰‘文思’，梅《书》赞舜曰‘文明’，赞禹曰‘文命’。文之为用，焕乎、郁乎、广矣、大矣。是以孔子四教，其一曰文。文学之科，传自游夏，其后支与流裔，累世不绝。经学者，文字之根荄；理学者，文章之奥府。此外史与子、集，则皆文苑之精华也。《汉书·艺文志》贯串六艺诸子百家九流，特示蹊径，最宜熟诵。唐韩子作《进学解》，自道所得曰‘上规姚姒’云云，约其所言，共有九家：曰《书》，曰《易》，曰《诗》，曰《春秋左氏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子云，曰相如，是九家者，韩子之师也。唐宋八大家，储同人广之为十家，其文雄奇幽秀，各极其至。朱子瓣香南丰，为文后海先河，曲折奥衍，实为千古巨观。元明以来，作者不逮于古，望溪崛起，海峰、姬传踵之，是为桐城派。吾苏恽子居、张皋文亦自辟町畦，是为阳湖派。曾文正出，师承姚氏，发挥文家阴阳刚柔之旨，摘抉杳微，夔乎不可尚已。余子如梅伯言、吴南屏、张廉卿、吴



摯甫，其书满家，允称雄杰。近今斯道衰落甚矣。《易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惟有人有文，而后能化成。班孟坚曰：‘备哉灿烂，神明之式。’然则发扬吾国固有之文明，非吾馆人士，其谁与归？

七. 政治学 《礼记》言：‘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为政治学精义。凡士人通经学、理学而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有用，谓之通人。不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无用，谓之迂士。吾国政治学权舆于《尚书》，如《虞书》所谓‘安汝止，惟几惟康’，‘慎乃宪’，‘屡省乃成’，实为万古政治不易之经。至箕子陈《洪范》，立无偏无党之箴；周公作《无逸》，示保惠教诲之准，治道纲维，孰能逾此？圣门政事科冉有、子路外，尤推曾子。《大学》言平天下在絜矩，顺事恕施，所以正其本者至矣。《孟子》“梁惠王”、“离娄”二篇，皆政治学根本。厥后如汉之贾、董，蜀之诸葛武侯，唐之魏郑公、陆宣公，及宋代诸大儒，均可师可法。近世若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皆政治家巨擘。曾根于学术，故最为纯粹。胡、左长于天资，故能沈挚感人。此外讲外交学者，如郭筠仙、曾惠敏、薛叔耘、黎莼斋、许文肃诸家，均可采择。尝叹欧美各国，俱有政治学，吾国独无编辑专书。设有外人负笈来学政治，茫然无以应，可耻孰甚。诸生须知吾国之政教号令，风俗掌故，具详于经史之中，宜仿苏东坡读书之法，分类学之，则大纲既举，自得时措之宜矣（或疑奏议旧牘，不适用今世。要知学者贵能采其议论，探其精义，原非泥于程式也）。

八. 主静 今人热心爱国，而卒未得所以疗国之方。《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盖士落其魄，则国失其魂矣。故今日救国之策，莫若主静。《大学》言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此言治心之法，而实即治人治天下之法。孔子之言心学曰：‘洗心，退藏于密。’曰：‘操则存，舍则亡。’又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孟子之言心学曰：‘持其志，毋暴其气。’‘心勿忘，勿助长。’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周子之言心学曰：‘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盖圣贤治心之学神矣微矣，而操持二字，实为入门之要。宋程子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李延平先生常教人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明王文成、高忠宪为一代大儒，其言静坐之法，详明简易，学者亟宜仿而行之。《易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言：‘人者，天地之心也。’惟于静中随时体验，乃能见天地之心。然则主静之功，实为参赞化育之本，夫天下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事者也，亦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国者也。圣门子路政事之才，孔子告之，不过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敬、曰安，其本原尽可知矣。

九. 维持人道 今人竞言维持人道，要知修道立教，方为尽人道之根源。《中庸》言天命之性，推极于致中和、致天下之达道，即维持天下之人道也。人道维何？保其本心而已。人能不失其本心，尽一己人之道，斯克全世界之人道。孟子生战国之季，一则曰‘放其良心’，再则曰‘失其本心’，痛人之沦为禽兽也。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为。’人字皆当重读。既欲成其为人，如何能保其心，则又明示之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人心生生不已之机也。羞恶之良，世界所最重，凡无以对人者，即无以对己者也。辞让，礼也。人而无礼，何以为人？至于是非之界，尤为生死之关。国家之亡，先亡于无是

非；人心之亡，先亡于无是非。春秋大义，不过明是非而已。有是四端，而后谓之人，而后谓之尽人道。是故正人心，乃所以维持人道也。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心官何在，人道何存，而乃茫焉昧焉，营营扰扰以化于物。不亦重可惜哉！

十. 挽救世风 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答之以‘尚志’。立志为学者第一关头，人能立志为圣贤，则为圣贤矣；立志为豪杰，则为豪杰矣。然近世圣贤豪杰不数数觐者，则由英俊之才，大都迷于歧途，而隳坏于习气也。曾子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则谓‘自任以天下之重’，顾亭林先生则谓‘天下存亡，匹夫有责’，何也？盖孟子与顾亭林先生之意，谓学者当自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务，非谓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各勤其职业，斯天下治。人人不安其本分，不勤其职业，法守乖而秩序淆，则天下乱矣。故吾辈务宜独立不挠，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风气，有以觉世而救民。至于无稽之谈，非礼之籍，自然不接于耳、不寓于目矣。《诗》有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今日吾国是何等景象？外人方讥我为无礼义、无教化之国，痛心曷已，剥极而复，当在此时。愿吾学者共雪此耻，更愿吾国民共雪此耻也。”

按：唐文治是江苏太仓人，他十六岁中试秀才，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一岁到江阴南菁书院就读，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以周的门下。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春，唐文治考中进士，此后的十余年中，一直在清廷为官。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中国陆军惨败于日本，唐文治向清廷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的万言封事，要求革新政治，并针贬时弊，抨击权奸，吁请严惩战败将领。第二

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对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等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唐文治为江苏会试举人撰写了《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的奏章，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爱国行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五月，唐文治以参赞衔随载振赴英国伦敦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典礼，在英国逗留一个多月；后又随载振到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四国考察游历，回国后为载振撰写了《英轺日记》十二卷。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秋，清政府设立商部，载振为商部尚书，唐文治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秋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在此期间，他制订了振兴工商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拟定商部章程、商部办事权限和商律一百三十一条，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法规。他采取一系列扶助农、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使濒于破产的工商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和发展。从《英轺日记》里可以看出，当年唐文治出访欧美诸国时，深感这些国家教育的发达，他曾称叹英国伦敦“一隅之地共有学堂四百九十八所”、“英自学堂盛行而囚徒日减，堂中多一儒冠，狱中即少一赭衣”，由此他认为“兴学为救国之要务”，“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萌发了兴学救国的愿望。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九月，唐文治就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一八九六年创办，原名南洋公学，后迭次改称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一九二一年改名为交通大学）监督（即校长），强调“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他上任后即对因前任监督久不到校而颇形废弛的校务力加整顿。当时，国内仅有的少数几所工科学校都是单科或专科性的，唐文治长校后，先后改设和增设了铁路专科、电机专科、航海专科等，使之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

大学，并在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设置、实验实习、考试考查等各方面全面进行了调整和改革。经过十几年的悉心治理，学校水平迅速提升。唐文治执掌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政十数年，在兴办“实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作为一个国学家、理学家而办工科学校，唐文治又极注重对学生的道德人格的培育，注重国文教学和学生人文素养的养成。他为学校制定的章程，首先以“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无论风气若何，决不变更迁就”，为学校制定的校训是“勤俭敬信”，并把这种注重道德人格训练的精神贯穿于学校工作的每一个方面。同时，他在就任不久所写的《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提出，在“造就专门人才”、“振兴全国实业为主”的同时，“并极注重中文，以保国粹”。为此，学校开设了国文课，要求学生在整个四年中都要学习国文课程。唐文治本人亲自为学生讲授国文课，编撰了《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工业学校专门学校国文课本》等国文教材。到一九二〇年中，唐文治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的职务到无锡定居，又接受施肇曾等人的邀请，担任新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馆长。这样的一种选择，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说偶然，是他早在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就在无锡前西溪买下了一块地，以作奉养老父和日后归老之用；而他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回锡的原因，照《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的说法，是因为“自上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吾父老病，目疾日深”。说必然，一方面，是因为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迅猛展开、西学大潮汹涌澎湃之时，唐文治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受到的无情冲刷，并为此而深深忧虑，这就是他在《函交通部送高等国文讲义》一文中所说的：“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于是他萌生了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的

想法；另一方面，无锡地处东南，相对于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新文化潮流来说，东南学术别有渊源，向以严谨刻苦而著称；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无锡，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尤其是士绅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热心赞助教育事业，这些都是在无锡创办一所研究国学的专门学校的必要的外部条件。

又租赁无锡惠山之麓五里街原锡商山货公所为校址，定校名为无锡国学专修馆。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五十六岁》：“……托蔡生虎借租锡商山货公所楼房两幢为教室、宿舍，地在锡山之麓。”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唐先生闲居在家的日子并没有多久，做过南洋大学庶务长的陆勤之特地到无锡来看他。带来了口信说，杭州施省之先生（名肇曾）愿意出资办一所专门研究国学的书馆，请唐先生主持其事。唐先生表示：‘讲授经学，责无旁贷；主持书馆，力不从心。’陆勤之自告奋勇担任总干事，促成其事。于是租赁惠山之麓五里街原山货公所为馆址，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馆……”

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先从国专创办时的校名说起。国专创办初的前三届，不称学校，而称‘国学专修馆’，顾名思义，国学就是旧时代所称的经、史、子、集，不同于今天大学的中文系的教学内容。名称是‘馆’，说明它和一般大专也不尽相同。‘馆’的名称，大概是借用晚清同治以来的‘同文馆’。‘同文馆’是学习外国文化的，为官办；而国专则是学习中国文化的，是私立的。”

筹办期间，唐文治曾谋求时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的襄助，徐世昌允诺解决国学专修馆学生的毕业出路，由政府进行安置。



王遽常《自述》：“……一九一九年秋，闻前交通部工业专校校长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学馆（此其初名，如前时之翰林馆、育才馆，后始加专修二字，后又改为国学专门学院，皆不受当时教育部管辖。嗣以学生出路故，始属之，改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解放后，华东教育部批准，改称无锡中国文学院，不久与他校合并），得其同年当时大总统徐世昌之襄助，馆生毕业出路，由政府规定：甲，部曹；乙，各省县知事；丙，大中学教师。又有资助馆生膳宿书籍及膏火（即奖学金）者，皆于招生广告载之。名额二十四人，不拘年龄……”

王遽常《唐老夫子对我的感染》（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由于当时的所谓总统者，跟唐先生是‘同年’，答应毕业生可以到部里任职，或到外省当一名候补知事，也可以到大中学校教书，因此，考生特别多，甚而至于头发斑白的老先生也去应考。”

王震《凌鸿勋茹经老人记后赘言》（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本《茹经堂文集六编》附录）：“……当民国八年，五四事起，新文化之势，澎湃磅礴。茹师忧斯文之将丧，急拟专修国学，以存国粹，既得吴〔浙〕江省施肇曾肩经济之任、当年总统徐世昌之协助，乃以目疾为名，辞去南大，返归无锡，租屋于锡山之麓之五里街，树无锡国学专修馆之名……”

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创建于一九二一年春，始名国学专修馆。办学起因是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前清翰林徐世昌打算通过该校招收一批旧学根柢较好的学生，为政府培养秘书人才。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和来头，致使这所小型的私立学校在开办招生时，竟然要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地设立考场，报考人数乃以千计。”

李尧春《唐文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见《忆无锡国专和唐文治先生的资料、文章、专刊，修葺恢复“茹经堂”、设立唐文治纪念馆的报告、通知》）：“唐文治离开南洋公学时，已经五十六岁，双目失明，肾脏动过手术，形势上他已到年老退养境地了。刚巧这时徐世昌在北京做大总统……唐文治和徐世昌同属满清官僚，在商部时，徐世昌任左侍郎，唐文治任右侍郎，两人私交很好，意气投合，是谱兄谱弟……一九二〇年冬招生时，曾在无锡、上海、南京各地报纸上大力宣传，说国专毕业后，可派到北京做部官或分发各省当县官。”

按：无锡国学专修馆是一所私立学校，且在开办后的最初几年中，未能在教育部备案。要开办这样的一所学校，就先必须为学生毕业后的“出路”考虑，所以唐文治才会与徐世昌联系，请求其答应“可以到部里任职，或到外省当一名候补知事，也可以到大中学校教书”。但是等到一九二四年初第一届学生毕业时，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事详该年中所记。

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在《新无锡》等报上连续刊登无锡国学专修馆招生考试广告。

《国学专修馆招考师范生》（见《新无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版）：“本馆慨国学之沦胥，伤斯文之失坠，数年而后，恐吾中国人将无复有通中国文字者，世道人心，不堪复问，可痛孰甚。爰于北京设立专修馆，并定先在江苏无锡设立分馆，开办师范班，专以造就国学人才为惟一宗旨。请唐蔚芝先生为馆长，并分请名师教授，所有师范生伙食书籍，由本馆供给，每月膏火视月试成绩以为增减。招生简章列后：名额：二十四名任馆肄业。资格：须经史略有根柢，文理通畅，能作四五百字者为合格。年龄：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毕业年限：三年毕业，专课本国经学、文学、理学，至第三年

习公牘文字。毕业用途：毕业后由本馆派赴各处分馆充当教习。考试日期：阳历十二月十九号上午八点半钟。考试地点：无锡在西水关内无锡中学，南京在暨南学校，上海在南洋公学图书馆；同日考试。报名：即在以上三处报名，须附带相片、详细履历；倘须索阅章程，请向以上三处接洽。开馆日期：民国十年一月四号。馆址：租定无锡惠山五里街山货公所。发起人：姚济苍、施肇曾、王芝祥、李时品、陆起、叶乐民。”

按：《新无锡》上的这则广告，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连续刊载至十二月十日。广告中提到“爰于北京设立专修馆，并定先在江苏无锡设立分馆”，《新无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第三版《国学专修馆成立续闻》中载唐文治致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函，其中也有“兹有京中同志施君肇曾、王君芝祥等发起国学专修馆，设立总馆于北京，先在无锡设立分馆”等语，又前引李尧春《唐文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文中也说：“……起初所拟计划相当大，拟设总馆于北京，逐步在各省设立分馆，后因唐文治已在无锡安家，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不想去北京，于是先在无锡设馆（北京总馆内贮藏不少宋明版书籍，后来有部分运到无锡）。”据此则似当时已曾在北京设立总馆，无锡国学专修馆最初是作为北京总馆的一个分馆，并有“逐步在各省设立分馆”的计划，但后来“逐步在各省设立分馆”的计划未能付诸施行。

约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唐文治分别致函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和无锡县县长赵汝梅，为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开办向江苏省政府和无锡县政府呈报立案。

《国学专修馆成立续闻》（见《新无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第三版）：“北京施省之、姚博施、王铁珊诸君发起国学专修馆，先在无锡设立分馆，已登前报。兹闻施君等为培植

寒峻起见，优给膏火，其考试成绩较优者，每月可得十元，计每年可得百元之谱；其较次者，每年可得数十元，以资贍家，俾诸生无内顾之忧。又闻该馆长唐蔚芝君以额数仅二十四名，拟增设旁听生八名，作为附课，以广造就。惟此项附课生虽偕同月考，而书籍膳宿须自备，且不支膏火。一方面已由唐君函致南京齐省长及吾邑赵县长接洽矣。兹将原函附录于下。致齐省长函：‘（上略）敬启者，迩来文教晦塞，国学沦胥，世道人心，益不堪问。振起维持，实属当务之急。兹有京中同志施君肇曾、王君芝祥、姚君济苍等发起国学专修馆，设立总馆于北京，先在无锡设立分馆，谬推文治为馆长。自惟学识谫陋，深惧勿胜。素仰吾公教泽覃敷，仁施广被，谨奉上章程一册，敬乞教正。敝馆拟定于十二月十九日招考，明年一月四日开馆，假地于惠山五里街山货公所，以资静修。务祈惠锡南针，匡所不逮。并恳赐飭无锡县知事，随时保护，庶莘莘学子，得所依归，何胜纫感。再，此项专修馆，本拟由发起人具呈备案，旋接京友来函，悉总馆前曾具呈教育部，奉批‘该发起人等眷怀国学，创设专修馆，发挥吾国固有文明，以期风俗人心日趋正轨，孤怀宏旨，殊堪嘉尚。惟部定各项学校规程，并无此项规定，尽可自行开办，无庸由部备案等。因是此项专修馆系私塾性质，不在部令范围之内，京外同事一律不再另呈备案，合并声明’云云。致无锡县知事函同上。”

十二月十九日，在无锡、上海、南京三地同时招考新生。三地投考者踊跃，其中上海报考者有二百数十人，南京报考一百数十人，无锡报考者有四百多人。考题有二：一为《于缉熙敬止》，二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论》。

《国学专修馆考生踊跃》（见《新无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三版）：“北京姚博施、施省之诸君在无锡创设国

学专修馆，培养国学人才，已登前报。兹于本月十九日考试，上海报考有二百数十人，南京报考一百数十人，至无锡投考竟达四百名，颇极一时之盛。闻唐馆长因定额仅二十四名，又以课堂地窄，并旁听生亦未能扩充，故对于此次考试各生，不得不谨严甄录。又闻录取各生名单，定于本月廿五日登本报及《锡报》，于廿六日分登上海《新闻报》、南京《大江南报》，谅应试者必争先快睹云。”

王遽常《唐老夫子对我的感染》（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我最初景仰唐先生，那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看到唐先生的一本著作，是交通大学的校训，名叫《人格》，讲应该怎样做一个人。我得到以后，这简直是高兴极了，非常景仰唐先生，心心念念怎样可以见唐先生一面都是好的。但是我的数理成绩不好，没有资格去考交通大学。后来唐先生辞掉了交通大学的职务，回到无锡去住。有一天，我父亲对我说，你所最佩服的唐先生，现在办了一所无锡国学专修馆。那你要努力，你可以拜唐先生为老师，多光荣啊！于是我最关心是怎么能够考取。考的时候，没有年龄限制……我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早操场里考的，上海的考生有六七百人，加上南京、无锡两地的考生，约有一千多人。我和我的同学唐兰（他是文字学家、金石学家）一块儿去上海应考。他跟我同岁，一进考场，我就呆了。应考的都比我们年龄大，我那时只有十九岁。看了题目，我又发呆。第一道题叫《于缉熙敬止》，是《诗经·大雅·文王》篇里的诗句，第二道题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论》。安定下来，总算交卷。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的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他老是看我的文章，看一下，写一下。我心里非常害怕，这不是雷同了吗？于是我就写古体字，老先生看

看，叹了口气：唉！把笔墨一卷出去了。这样一来，旁边没有人监督，就顺利地完场了。那天天气很阴冷，回到旅馆，和唐兰商量，对能否考取都没有把握。但我心里知道，题目的意思我是懂的。回去后并不寄予希望。后来报上登出来，居然都考取了。他是第五名，我是第七名。去无锡报名时，天下大雪，我还摔了一交。要见唐先生时心里战战兢兢，那知见了唐先生他很和蔼近人。他第一句就问：‘你为什么在作文上写了古里古怪的字？’我就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并不是要显露我的什么才华，实在是没有办法。唐先生就哈哈大笑，非常和蔼可亲。”

按：王蘧常《毕君贞甫传》（见《抗兵集》）一文中记无锡国专本次招考新生，“与试者凡千余人，多瞠目腐豪莫能下，君（按：指毕寿颐）独绵绵若不可穷，同坐者皆惊视。君惧为所袭，改作古籀文，尚书得卷，大异之。”这里所记考试时因怕旁边人偷看而改写古体字的是毕寿颐而非王蘧常本人，与上文所记不同。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这是书院式的学馆，应考时不必缴验学历证明，但入学考试极为严格。当时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鼓励自己的高足来投考。如沈子培先生的学生王蘧常，钱名山（名振煌）先生的学生蒋庭曜等。钱名山是清朝进士，辛亥革命后保持他的遗老身份，没有剪掉辫子，在家设馆授徒。自从国专开办，他的学生和‘小门生’读毕《四书》以后，往往考入国专（几乎每届都有）。抗战期间入学的严古津、匡汉拯（参加革命后改名闵仁）都曾经是名山先生的学生。”

十二月二十五日，无锡国学专修馆第一班新生录取名单在《新无锡》等报刊上发表。共有柯树声、陆吕年等正取生二十

四名，杨养吾、俞汉忆等附课生八名。

《无锡国学专修馆录取师范生名单》（见《新无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版）：“正取生二十四名：柯树声、陆吕年、郭其俊、毕寿颐、陈庭实、白虚、唐兰、顾季吉、王遽常、陈绍尧、方和靖、钱国瑞、胡凤台、王鸿斌、吴宝凌、侯堃、唐景升、陆遵羲、蒋庭曜、许师衡、夏云庆、严济宽、政思兴、丁儒侯。附课生八名：杨养吾、俞汉忆、孙景南、陈维泰、陈宝恭、袁鹏骞、王钟恩、丁天兆。以上正取生二十四名，于本月二十七日起，应邀同保证人，或持切实保证函，赴无锡西溪本馆办事处，谒见唐校长，核对笔迹，验明照片，口问无讹，领取到馆证，务于一月三号以前到馆，四日一律行开馆礼。再，本馆定章，正取生中途废学者，应缴还到馆后培植各费，家属并保证人同负责任。至附课生八名，并不住馆，各生应向本馆庶务处报名，按期寄卷试验，并可来馆旁听，惟书籍膳宿等概须自备，并不给膏火，此布。”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

二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二十日），无锡国学专修馆正式开馆上课。唐文治亲自为学生授课，每日二节，讲授《论语》、《孝经》、《孟子》等。此时专修馆的教职人员，除馆长唐文治外，还有教习朱文熊（字叔子，一八六七～一九三四）、助教陆修祐（字笃初，号景周，晚号慕陶，一八七七～一九六四）和职员沈炳焘（字健生，生卒年不详）、王保謨（字慧言，一八九〇～一九三八）等。唐文治除教学外，还兼顾总务之大者；朱文熊讲授子学、文选及小学（文字训诂之学）；陆修祐任唐文治的助教，因唐文治此时双目基本失明，陆修祐始终随班协助其上课，此外还协助其处理校务，并兼司笔札等事。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年一月，行开馆礼。”又：“聘请朱叔子、陆景周两先生为教授，沈健生、王慧言两先生为职员。”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辛酉五十七岁》：“正月，新生陆续来见。二十日开馆，余亲自上课，每日二节，讲《论语》、《孝经》、《孟子》。请朱君叔子为本馆教习，并请门人陆生景周名修祐为助教。景周于前数年处馆余家，授庆诒等



课，兼司笔札，深资得力。”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二一年春，新生上课，唐先生每日到馆讲经学及古文读法两节，由陆景周协助，并请朱叔子（名文熊）为教习，讲授子学、文选及小学（文字训诂之学）……第一届学生只有三十人，天天接触，学生的作文都由陆景周先生朗读，校长亲加评语，当堂发卷指出缺点及努力方向。唐先生对于第一届学生，听到声音就知道是谁，文章听了一小段就能估计到是谁写的，往往十不离六七。”又：“唐先生除教学外，还兼顾总务之大者。学生有事，不论哪一方面都可以找他面谈。他也有意识地约平日不多开口的学生交谈。直到抗战发生，他仍然每星期至少和四名学生作半小时以上的交谈（那时全校学生已有三百余人）。”

王蘧常《唐老夫子对我的感染》（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这时学校设在惠山脚下山货公所里，离开唐先生城里的家是很远很远的。但唐先生从不迟到，风雨下雪都一样。这时，我小小的心灵更加钦佩唐先生，真是了不得。记得开学那一天，唐先生希望我们要为圣为贤。我一听，简直惶恐得很，圣贤还了得！他又说，其次要为豪为杰。他短短的训话，对我来说，很受感染。”

黄汉文《甘当绿叶衬红花——记陆景周先生》：“在民国成立以后见过唐文治先生的人，都知道唐先生有一位诚笃的秘书陆景周先生。一九二一年起，唐先生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年，陆先生始终在校，任校长秘书，凡聆听唐校长亲自讲课的学生，都曾接受过陆先生辅导，唐校长的晚年著述，都由他笔录或校订……唐先生双目完全失明后，主持无锡国专，开办时教师只有唐校长和朱叔子先生二人，陆先生屈居助教。这时陆先生已经四十三岁，而且学有专长，一般地说，到了这样

的年龄是不大愿意当助教的，而陆先生毅然接受下来。后来班级多了，陆向学生讲授《孟子》研究、《春秋三传》研究、孙吴兵法研究等课，但仍旧担任秘书。抗战前，唐校长每周讲课四节，陆始终随班协助，抗战期间，唐校长因年老体衰，在校内的课少了，但校外的讲座和定期登门听课的人士（每次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人左右），有增无减，也离不开这位老秘书协助。从唐先生的学术著作来说，自从有了这位秘书，数量远远超过以往。在工业专门学校时期，可能还有别的学生（如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李颂韩等）协作，但从一九二一年主持无锡国专以后，虽由会计员高涵叔等协助，或由学生搜集资料，但没有一部著作、没有一篇文章不经过陆秘书之手和口（修改过程中，不论第几稿，总是陆氏读给唐校长听的）。”

鼎龄《唐文治和陆氏三兄弟》：“……至一九二〇年，唐先生右目也完全失明，苦于眼疾带来莫大不便，唐先生对这位忠诚的秘书更是不可或缺。凡署名唐文治的著作、信札、公文、题词、祭文、寿序、墓志铭等的起草、修改、誊写、审校、书写等，基本上都经过陆景周的手和口，只要读给唐先生听，没有修改意见，便对外正式发表。”

二月，唐文治与施肇曾商议，开始刻印《十三经读本》，期以三年竣工。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辛酉五十七岁》：“与施君省之议刻《十三经》。近时吾国学生皆畏读经，苦其难也。爰搜罗《十三经》善本及文法评点之书，已十余年矣。自宋谢叠山先生至国朝曾文正止，凡二十余家，颇为详备。施君闻有此书，商请付梓。余因定先刻《十三经》正本，冠以提纲，附刻先儒说经世鲜传本之书，而以评点文法作为札记，谨作叙文，并请陈太傅弼庵名宝琛撰序，命上海刻字铺朱文记经刊。



分校者，太仓陆君蓬士、王君慧言、李君慰农、徐君天劬及陆生景周，期以三年竣工。”

十月一日，无锡国学专修馆由惠山锡商山货公所址迁入学前街学宫左侧新建之尊经阁内。尊经阁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后毁于兵燹。又无锡在清朝分为无锡、金匱两县，辛亥革命后合并为无锡县。学宫左侧原有金匱县学训导署，已很破旧，本年中，无锡士绅孙鹤卿（名鸣圻，字鹤卿，以字行，一八六八~一九二八）、杨翰西（名寿楣，字翰西，以字行，一八七七~一九五四）捐资于训导署旧址重建尊经阁，建新楼五楹；不久陆起又筹款建宿舍楼五楹，延请专修馆迁入。迁入后，本拟举行落成礼，但因该馆自建之新宿舍尚未竣工，训导署房屋亦未修葺完竣，故延期举行。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辛酉五十七岁》：“十月，国学专修馆迁居本邑文庙旁尊经阁。先是，本馆请邑绅孙君鹤卿名鸣圻为馆董。孙君因旧时金匱县训导署废弃可惜，锡邑原有尊经阁，为明成化时所建，毁于兵燹，乃捐资于训导署旧址重建尊经阁，修理余屋，由十七乡公呈县署立案，旋经县署知照，请本馆迁入。邑绅杨君翰西名寿楣，复助成之。旋陆君勤之复筹款，建宿舍楼房五楹，至是迁入，余为立碑，以纪孙、杨二君之德。”

唐文治《无锡重建尊经阁碑记》（见《茹经堂文集》卷六）：“……宋明故事，诸行省、郡、邑于学宫旁皆建置尊经阁，庋藏经籍，所以齐道德、兴庶民，甚盛典也。无锡尊经阁为有明成化间府同知谢庭桂所建，咸丰十年庚申之变，庠序讲堂，废圮殆尽。迨同治改元，稍稍修葺，次第经营，而尊经阁迄未规复。今岁辛酉，钱唐施君肇曾创设国学专修馆于锡邑，延文治讲学于惠山之麓，当是时，邑绅孙君鸣圻、杨君寿楣，

慨焉发卫道之诚，特捐巨贲，就金匱训导旧廨后隙地，重建尊经阁，复改缮廨宇，俾馆生肄业其中……”

吴溉亭《记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蔚老欲觅校舍，无人可托，乃托四乡总董孙鹤卿的房侄孙颀香。其人迂拙，觅得惠山祠堂，招些学生开课。蔚老每日乘二人肩舆至惠山上上课，常常受阻于十里街。因此地是冬季出殡之处，道子很长，颇以为苦。事为鹤卿所闻，大骂颀香。偌大的无锡城觅校舍而远至惠山，未免说不过去，遂自任其事。适无锡县立实业学校登报出售织布机，鹤卿承受下来。实业学校之址，是从前儒学□老师的官廨，东面是教谕的，西面是训导的，实业学校教室设在西面，织布厂设在东面。鹤卿既承其买织布机，连东西的房屋亦收回了……鹤卿遂将东西学老师的官廨拨归国学专修馆为馆舍。随时拨款建图书馆五大间，楼房半洋式，征求及购买古本书籍万余卷，楼下作讲堂，其明年一并建五间楼作教室。孙鹤卿物故后，蔚老取名为怀鹤楼，竖匾额、刻石，永垂纪念。又后一年建前面头一进五开间楼房一座。”

《国学专修馆迁入尊经阁》（见《新无锡》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第三版）：“邑人孙鹤卿等于学宫旁重建尊经阁，并修葺旧时金匱训导署房屋，欢迎国学专修馆生迁入等情，业经迭志前报。兹闻尊经阁业已落成，孙君特具呈赵知事，请转知馆长唐蔚芝君，即于十月一日，将全馆迁入。唐君奉函后，至为欢洽。当即照办。唐君本拟将同孙鹤卿君订期行落成礼，并请各机关莅临演说，以志盛举，惟因该馆自建之新宿舍尚未竣工，而训导署房屋亦未修葺完竣，诸多未便，拟俟一切工程完毕后，再定期举行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无锡在清朝分为无锡、金匱两县，辛亥革命后合并为无锡县。学宫（孔庙）左侧原有金



匱县学训导署，已很破旧。一九一〔二〕一年无锡绅富孙鹤卿（名鸣圻）于尊经阁旧址捐建新楼五楹，陆勤之又筹建宿舍楼五楹。规模初具，无锡国学专修馆遂由惠山之麓迁入学前街新校舍。后来学生多了，又扩建新楼二座。进入校门第一座楼底层最东的一间，抗战胜利后还高悬‘时雨轩’匾额，‘时雨轩’是清末金匱县学训导视事之处，留此旧名，以为纪念。”

王震《凌鸿勋茹经老人记后赘言》（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本《茹经堂文集六编》附录）：“……民国十年一月，开馆始业。是年夏，馆舍落成，得楼五楹，徐世昌题其上曰尊经阁，即由锡山之麓迁入城内，上为馆生宿舍，下为教室，东庑为茹师憩息之所，西庑为馆员宿舍。续建五楹于其后，是年冬落成，迁尊经阁宿舍于后楼……”

十月，聘请陈柱（字柱尊，号守玄，一八九一～一九四四）为无锡国学专修馆教习。自此至一九二七年钱基博、冯振来校任教之前，无锡国学专修馆除馆长唐文治亲自授课，陆修祜任其助教外，教习只有朱文熊、陈柱两人。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年十月，聘请陈柱尊先生为教授。”

按：陈柱《待焚文稿自序》（见《守玄阁文稿选》）一文中记：“……刘君求之益急，柱乃谢曰：‘当今天下滔滔，拥兵割据，孰能有用书生迂阔之谋者哉？’遂应锡山唐蔚芝师之聘，曰：‘为我谢刘将军，吾方有江南之游，未皇军旅之事也。’自是以后，遂不复有用世之志矣。”文中的“刘君”为“桂军第某路司令”刘震寰，本年中邀陈柱入其军幕，陈柱谢绝了邀请，却应其师（陈柱曾在唐文治长校的外南洋大学就读）唐文治的邀请，到无锡国学专修馆任教。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辛酉五十七岁》：“十二月，聘广西陈生柱尊名柱为本馆教习。柱尊本任梧州中学校长，辞之来助余，其文学宏博，可喜也。”

陈柱《忆无锡》：“余自民国十年秋九月旅居无锡，应唐蔚芝先生之召讲学于国学专修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原名国学专修馆，在学前街，孔圣庙之左。圣庙之右，为无锡工艺小学。门前有小溪，可行小船，名束带河，经荷花荡，出西水关，为无锡河，可行轮船矣。圣庙之前，过石桥，为师范学校。圣庙之北，为竞志女学，四旁皆学校，而圣庙宅其中焉，固无锡城中一学区也……予民国十年来无锡，同来者为大儿一百、族侄实夫。予讲学国学专门学校，而儿侄则肄业私立无锡中学。未几，实夫转入国学；又未几，予兼私立无锡中学主任，由是吾桂青年，来两校肄业者日众。迨十四年，同邑冯君振心主持国学学校务，来学者益盛。长女松英、侄女荔英，后亦次第肄业国学……”

按：上文“迨十四年，同邑冯君振心主持国学学校务”，“十四年”应为“（民国）十六年”之误。又文中提到的陈柱族侄陈实夫（名拔彰），为无锡国专第二届毕业生；长女松英，为十五届毕业生；侄女荔英，为十六届毕业生。此外还有第三届毕业生陈起予（字千钧），是陈柱的族孙，五年制一九四四年夏届毕业生陈二百是陈柱的次子。

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专修馆时期，教授只有朱、陈二先生，唐先生自己任课，由陆景周先生助教，共四人，教七十二位学生。教书各有专长，唐先生善于疏通大义；朱先生分析细致，循循善诱，语多启发；陈先生的本事主要显在讲义上，讲课随便。陆先生帮助唐先生教学生读古文，校内书声琅琅，与唐、陆的示范是分不开的。朱先生对学生在课外的请教，以及学生把课外的笔记、诗文请他批改，从不拒绝，

均一一细心批阅。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王蘧常《自述》：“……自此唐先生亲授经学与理学，朱、陈二先生授子史及文学。唐先生督教严，经文必以能背诵为度，常面试，一差误，则续续试不已，必无误乃已。经义不拘汉宋，唯其是。理学重朱子，兼及阳明，谓虽相反，亦相成。考核尤重月试，不限于经、史、子，亦重文学。等第分超、上、中，每发表，唐先生中坐，秘书在左唱名，遂起立致敬听评语。评有眉评与总评，如解牛，无不中肯，听者忘倦。尤喜奖假，我尝作《观浙潮赋》，拾古人江海赋之辞采，以蛟螭鼉鳖喻军阀之内战，翻江倒海，民不聊生。唐先生书其后曰：‘极挥霍离奇之能事，物无遁形，木玄虚、郭景纯应避其出一头地’。又曰：‘写此题，不能再好矣！’一堂皆惊。虽明知溢美过情，然经此鼓舞，令人感奋不能已已。又吴其昌于天中节作《吊屈原均文》，绵绵数百言。唐先生奇赏之，效杜老语曰：‘吴生吴生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吴为呜咽流涕。朱、陈二先生虽亦尝有之，然无此动人也。亦有极风趣者，某同学作《游五里湖记》，有‘载沈载浮’句。唐先生眉批云：‘春游佳事，奈何忽遭灭顶之灾？’某同学愧甚。唐先生招其独谈作文之法数次。自此心窍大开，向晓即于庭院朗诵，不一年而大进。”又：“我在国学馆时，受教于唐先生者至深且大，经学理学外，尤深得于其论文及读文、作文之法，其论文云：‘文学者，经天而纬地者也，吾日求古文之线索，则知古书之经纬与其命意。于是我之精神与古人之精神欣合而无间，乃借古人之精神，发挥我之精神，举并世之一切可惊可骇可喜可悲之事，宇宙间之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一见于文章。于是我之精神，更有以感动后人之精神，不相谋而适相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吾道一以贯

之；无非求之经纬而已。且夫人之居处适其宜，而筑室，始有结构之法。乃左乃右，乃疆乃理，执事之法度也；殖殖其庭，匠氏之秩序也。入其门，堂奥显于前，余屋廡于外，其不知法度可知也；登其堂，非三楹，非五轩，茅茨以为墙，几筵以为户，其不知秩序可知也。惟一区一径一庭一阍一草一木，皆得其所，而后谓之胸有丘壑。若是者何也？经纬而已矣。如是而推之于文，则读《易》可以悟《书》也，如是而读《书》可以悟《诗》也，如是而读《礼》可以悟《春秋》也。孔子五十学《易》，作《十翼》，传注无一同者，经纬之变化也。《论语》二十篇，都凡数百章，篇法章法，无一同者，经纬之变化也。《左传》、《史记》之文，经纬千端，牢笼万有，而每篇体制面貌，亦无一同者，变化多也。韩、柳、欧、苏诸子，则具体而微。下焉者，当以经纬之多寡，辨其所造之等次。晋以下之史书，宋以后之文集，几于千篇一律，览其前面〔而〕即知其末者，变化少也。近世以来，桐城、阳湖号为宗派者，颇能学古人之经纬，稍稍运用于其间，而其气体或茶弱而不能振。天资耶？人事耶？抑时代为之耶？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究万法，又必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能超出乎规矩之外。而又扶之以浩然之气，正大之音。格物致知，所以充其用也，阅世考情，所以广其识也。至于化而裁之，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由是而成经成史，成子成集，成训诂家，成性理家，成政治家，成大文学家，岂非通乎经纬之道而然哉。’其论读文云：‘学者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不差一字为主。其要法，每读一文，先以三十遍为度。前十遍，求其线索之所在，画分段落，最为重要；次十遍，求其命意之所在，有虚意，有实意，有旁意，有正意，有言中之意，有言外之意；再十遍，考其声音，以求其神气，细玩其长短疾



徐、抑扬顿挫之致。三十遍后，自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十二月十八日，在国学专修馆内招考第二班学生。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新无锡》上发表录取新生名单，共录取袁质秀、孙执中等正取生二十四名，赵乃清、陈雪艇等备取生六名。

《无锡国学专修馆添招师范生》（见《新无锡》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版）：“学额：二十四名。年龄：十六岁以上，念五岁以下。程度：读过四书五经，具有根柢，能作各体文字，有高等程度者为合格，倘程度较低，有来函请求录取者，概不答复。毕业：以三年为满。纳费：学费、宿费不收，每学期收书籍费十元（余还缺找），膳费二十五元。以上两项均应于到馆前一律缴清。报名：在无锡学前本馆内，于阳历十一月二十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报名应纳费大洋五角（道远用函报名者以邮票代），最近四寸照片一张，无论取否均不发还。倘通函报名及函索章程者应各附寄邮票一分。考期：阳历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八点钟起，随带投考凭单赴无锡本馆考试。”

《无锡国学专修馆录取师范生》（见《新无锡》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三版）：“学宫内国学专修馆此次招考师范新生，业已评定甲乙，榜示揭晓。计取正取二十四名，备取六。兹将榜示录下：正取：袁质秀、孙执中、陈学裘、邹镜清、李昌翰、钱安定、戴恩溥、冯励青、陈渭犀、李家俊、蒋天枢、萧雪亮、钮方义、黄希真、季思乾、胡集勋、杨仁溥、周天游、高作、秦艾三、刘文灏、陈拔彰、姚继虺、王文成。备取：赵乃清、陈雪艇、杨焱、王道中、朱宗洵、徐世城。以上正取诸生应于阳历本月二十九日起、三十一止，邀同保证人到馆核对笔迹，填写志愿书并保证书，再行缴费入馆，所有备取诸生听候通信传补，缴费一切手续与正取生同。”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一月一日，无锡国学专修馆补行新馆址落成开幕礼，无锡籍文史学者钱基博（字子泉，一八八七～一九五七）撰两联以贺。

《国学专修馆》（见《新无锡》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第二版）：“该馆于去年开办，因馆址设于惠山，不甚便利，本年移入学前尊经阁，由馆长唐文治君与邑绅孙鹤卿君集资修建。现已柬请各界于今日下午补行开幕礼。”又《新无锡》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第二版《国学专修馆开幕记》：“前日为国学专修馆开幕之日，到会来宾为县知事赵汝梅，三科主任许少仙，县视学秦颂石，邑绅孙鹤卿、杨翰西、蒋遇春、蔡兼三、窦叔英诸君，学界顾述之、辛柏森暨外埠来宾姚明晖〔辉〕、李颂韩诸君，共到百余人。由馆长唐蔚芝君殷勤招待，于下午二时开会，由来宾晋颂词，及赵知事、姚明晖〔辉〕、李颂韩诸君相继演说。礼成，已钟鸣五下矣。散会后，唐馆长又款待来宾以茶点，宾主尽欢，颇极踴躍之盛。”

傅宏星《钱基博年谱》卷一：“（一九二〇）年底，在无锡学宫旧址，施肇曾与陆勤之等捐款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先生撰两联以贺，其一云：‘荀卿守正，大论是宏，自顾高讲学以来，此为东林嗣响；朱子诂经，群流所仰，绍周孔

不传之绪，仅见鲁国灵光。’其二云：‘国于天地必有立，尽己之谓忠，博爱之谓仁，慕义向风，还与诸君子以此交勳；学问途辙不一端，知新以温古，通经以致用，抱残守缺，我知唐先生之意不然。’”

按：钱基博的这两则联语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南通报》，发表时题作《国学专修馆开幕、无锡尊经阁落成大典（代陈谷臣）》，当是为国学专修馆新馆址落成开幕礼而作。傅宏星《钱基博年谱》中云作于一九二〇年底无锡国学专修馆开馆之时，不确。

二月，开馆上课。唐文治为学生讲授《左传》、《礼记》、《大学》、《中庸》。上课未及旬日，因积劳而患寒热病甚剧，课务请朱文熊、陈柱、陆修祐三人分别担任。疾病至农历三月底方始痊愈（据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壬戌五十八岁》）。

二月，无锡县县长赵汝梅，嘱无锡县署三科拟具呈稿，详述唐文治在国学专修馆的成绩及孙鹤卿、杨翰西捐资恢复尊经阁事，拟请江苏督军、省长会衔转呈大总统分别颁给勋章。

《侨绅尊经讲学》（见《新无锡》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第二版）：“江苏督军齐抚万上将与现居本邑唐绅蔚芝有师生旧谊，闻赵知事每至督署晋谒，谈次辄殷殷垂询唐绅起居及国学专修馆状况，颇具敬师礼贤之诚。赵知事仰承意旨，返署后即嘱三科拟具呈稿，详叙唐绅在馆讲学成绩，并以孙绅鹤卿、杨绅翰西捐资恢复尊经阁事插叙呈内，拟请督军、省长会衔转呈大总统分别颁给勋章，以崇师儒而扬国粹，其呈即于日内发出云。”

按：齐燮元（一八七九～一九四六），字抚万，时任江苏

督军。

六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获胜，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下台。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办时，徐世昌曾允诺解决学生毕业后的就职问题，故他之去职，影响波及国学馆。明年馆生毕业，出路何在，一时纷纷纭纭，惟馆生王遽常（字璠仲，一九〇〇～一九八九）与唐兰（曾用名唐佩兰、唐景兰，字立厂，又作立庵，一九〇一～一九七九）不为所动（据王运天《王遽常教授学谱》）。

十一月，《十三经读本》刊印完竣。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一年十一月，刊印《十三经》完竣。”

唐文治《施刻十三经序》（见《十三经读本》卷首，又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本《茹经堂文集》卷四）：“……人心之害孰为之？废经为之也。废经而仁义塞，废经而礼法乖，废经而孝弟廉耻亡，人且无异于禽兽。嗟乎！斯道之在天下，其将渐灭矣乎！于是正其本者则曰反经，挽其流者则曰治经。且夫天生人而与以至善之心，孰不有纯粹之良知，莹然藹然，超出于物类之外，而乃有大谬不然，大惑不解，悍然废经而不顾者，非尽人之无良也。或曰：经之过高过晦，阶之厉也。不知非经之咎也，自来说经者之咎也；非经之晦也，说经者凿之使晦也；非经之高也，说经者歧之而高也。当是之时，倡废经之议，人乐其浅陋而便己也，是以靡然从风，而祸遂中于人心。当是之时，虽日告以读经之益，人且昧然莫知其径途也。向壁以行，得其门者盖寡也。文治于是悚然以惧，渊然以思，思所以拯斯道之厄。则孳孳焉、汲汲焉，搜集十三经善本，采其注之简当者，屏其解之破碎而繁芜者，抉其微言，标其大



义，撰为提纲，附于诸经简末。复集昔人评点，自鍾、孙以逮方、刘、姚、曾诸名家，参以五色之笔，阅十数年而成书。由是各经之文法显、文义明，厘然灿然，读者如登康庄，如游五都，如亲聆古人之诏语，无复向者艰涩不通之患矣……友人钱唐施君省之，勇于为善，志在淑人，尝矢竭其心力，以宏大道。既倡建国学专修馆于锡邑，适睹是书，爱而不舍，慨然独捐巨资，用付剞劂。自庚申冬始，期以二年告成。征序于文治。叹曰：‘伟哉，施君之功其盛矣乎！’夫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欲读经，先知经之所以为经。往者秦火之余，典籍荡尽，然而抱残守缺，代有师承。若董江都，若河间献王，若刘子政、马季长，至郑君出，经学家法，于焉大明。下逮有宋，周、程、张、朱，诸子迭兴，而经学义理，益复扩之极大，析之极精。夫以秦政之威、之权、之才、之力，且不能废经；蚍蜉之撼大树，无损枝叶，何况本根。继自今十年百年而后，千里万里而遥，安知无董、刘、马、郑与夫周、程、张、朱其人者，名世挺生，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乎？”

王震《凌鸿勋茹经老人记后赘言》（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本《茹经堂文集六编》附录）：“施刻《十三经读本》者，《周易》朱子本义，《尚书》孙星衍补王应麟集马、郑注，《诗经》毛传郑笺，《三礼》郑注，《春秋左传》乾隆钦定本，《公羊》何休解诂，《谷梁》范宁集解，《孝经》黄道周集传，《尔雅》郭璞注、邢昺疏，《论语》、《孟子》朱子集注。首冠茹师《十三经提纲》十三卷，各经之后，尚有定海黄以周《周易故训订膳》一卷，黄以周《乾坤屯蒙卦注疏》一卷，宜兴任启运《尚书约注》四卷，茹师《洪范大义》三卷，番禺陈澧《读诗目录》，镇洋王祖畬《礼记经注校证》二卷，朱子

章句《大学》、《中庸》各一卷，茹师《大学》、《中庸》大义各一卷，《孝经大义》一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十四卷，王祖畬《读孟随笔》二卷，后乃茹师《评点礼记》四十五卷。茹师尝言汉以前，经传多口授，故重章句，宋以后读经有刊本，重在评点，因取宋元及清诸儒评点经文，亦附茹师之评点而为记，皆茹师读经之法。逊清遗老陈宝琛谓其搜讨之勤，并世不数见也。”

按：《十三经读本》，唐文治辑，吴江施肇曾醒园刊本，全书共二十函，一百二十册。是书前有陈宝琛、僧释印光、唐文治、施肇曾序各一。据书前“编辑校讎”栏中所记，襄校此书的，计有陆吕年、郭其俊、毕寿颐、白虚、唐兰、顾季吉、王遽常、陈绍尧、方和靖、钱国瑞、王鸿斌、吴宝凌、侯瑛、唐景升、陆遵羲、蒋庭曜、许师衡、夏云庆、严济宽、政思兴、陈庭实、胡凤台、丁儒侯、杨养吾、俞汉忆、陈宝恭、袁鹏骞、王锺恩、丁天兆、吴其昌、徐靖澜、孙执中、陈学裘、钱安定、戴恩溥、冯励青、陈渭犀、李家俊、蒋天枢、萧雪亮、钮方义、黄希真、胡集勋、杨仁溥、秦艾三、刘文灏、陈拔彰、姚继旭、王震、陈庆熙、陈雪艇、杨焱、王道中、徐世城、李耀春、童咏南等五十六人，皆为无锡国学专修馆前二届学生。唐文治等组织前二届学生合力襄校此书，固然是为使此书早日刊印完竣；但对参与此事的学生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的机会。

自《十三经读本》印行后，无锡国学专修馆学生学习所用书目，经部即为此书。其余各部，史部的传记类为“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编年类为《资治通鉴》和《续通鉴》，文物典章类为《通典》及其续



编；子部为浙江书局之《二十三子》和唐文治撰《宋五子大义》；集部有唐文治撰《政治学大义》、段注《说文解字》、《昭明文选》、正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唐文治撰《古文四象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和《古人论文大义》等（据王震《凌鸿勋茹经老人记后赘言》）。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二月，开馆上课。唐文治为学生讲授《周易》及《性理学大义》（据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亥五十九岁》）。

三月七日，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内进行招生考试，添招第二班插班生十四人。又聘请邑绅孙鹤卿为馆董，孙鹤卿捐资增建宿舍三间。

《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十二年二月，招收第二班插班生十四人，并聘请孙鹤卿先生为馆董，捐拔经费，增建宿舍三间。”

《无锡国学专修馆添招插班生》（见《新无锡》一九二三年三月四日第一版）：“本馆本不招生，现经本馆董事孙鹤卿先生之协助，可添招二年级插班生十名，惟是程度极高，须根柢较深者方可报名应考。程度：读完四书五经，通晓大义，并理学略有门径，能作各体文字者。毕业期限：二年毕业，倘不及格，降入丙班，须四年毕业，年龄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纳费：每半年膳费二十五元（书费二十元，余还缺找），均于入学时一次缴足。日期：报名定阳历二月二十六日起至考期前止，阳历三月七日下午在本院考试。报名时须带大洋五角、照片一张，未取或不考者不发还，来函请托一概无效，恕不答复，索函章程须附邮票一分。地址：无锡学前。”



按：据上引文字，原计划添招插班生十人，但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后来实际上招了十四人。

六月，编选刊印《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初编》。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二年六月，选印学生成绩初编。”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亥五十九岁》：“选印《国学专修馆文集初编》，由教员选择甲班两年、乙班一年之成绩较优者，余为厘定之，著于篇。”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初编序》（见该书卷首，又见《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题作《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甲编序》）：“……嗟乎！今天之丧斯文也久矣！其孰能振之？吾馆之设创者，为钱唐施君省之，继者为无锡孙君鹤卿暨京外诸同志，殚精竭力，成立于风雨鸡鸣之会。大江南北，学者踵至。日有讲，讲六艺也；月有课，课圣道也；年有核，核先生之学也。犹惧其或出于泥也，通经学、理学以究古今之奥坊；其或出于滞也，明史学、政治学以达外内之情。定期为文以验之，其果能服圣人之教与否也？其果能载先王之道与否也？于今二年矣。爰假教师朱君叔子、陈君柱尊、陆君景周，集其可观者若干文，著于此编，刻而问世，未知其进能以六艺之道，施于行乎否也？未可知也；其能以《诗》、《书》之教，为孝为忠，为专对，为使命，为文，为质也？未可知也；其能以《春秋》之教，兴废继绝，诛乱臣贼子也？未可知也；其能以《论语》、《礼记》探道体之全、理礼之精也？未可知也。然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先王之教不敢道，人心风俗之论，不敢著于编也。则此编也，固将继续往圣而为言，开绝学而为文也。则此数十人之精神，或将有补人心风俗于万一与？未敢知矣……”

按：《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初编》，湘鄂印刷公司印刷，无锡国学专修馆发行，一九二三年出版，全书共四册。书前有唐文治等序，正文按经学类、史学类、理学类、政治学类、杂著类、诗赋类的次序，共收录文章及诗赋一百四十七篇，其中大部分为无锡国专第一班（甲班）学生作品，但也收录了一小部分第二班（乙班）学生的作品，这就是本书“凡例”中说的“本馆乙班生，目下肄业，仅及一年，成绩不无可观，所有课艺，一并选录”。卷首标明“馆长唐蔚芝先生鉴定”，每篇后有简短评语。本书“凡例”中又云：“此编之选，每课以前列三名为率，其有未尽惬意者则阙之。或有佳卷不止此数，则亦割爱，昭慎选也。”按所收作品之多寡，排在前五位的学生是：王遽常，二十五篇；毕寿颐，十六篇；蒋天枢，十三篇；唐兰，十一篇；蒋庭曜，十一篇。其中蒋天枢为第二班学生。

农历七月，唐文治编成《政治学大义》一书，编成后即用作国学馆课本。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亥五十九岁》：“七月，编《政治学大义》成。余因中国政治学始自唐虞，传自洙泗，而向无专书。倘有外人询及，茫然无以对，深可愧也。爰编是书，分《奏疏》、《公牘》、《书函》、《本论》凡四门，而《本论》十三篇，指陈近时利弊，尤为痛切，本学期即用作课本。”

按：据上引《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政治学大义》编成后即用作国学馆学生的课本。但此书后来未正式刊行，惟其中的《本论》十三篇，即《不忍人之政论》三篇、《政本审六气论》一篇、《礼治法治论》二篇、《地方自治论》一篇、《学校论》一篇、《文化论》一篇、《选举论》一篇、《财政论》

一篇、《兵政论》一篇、《表论》一篇，收入《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二中。又，无锡国学第十五届学生崔龙后来采辑唐文治著述中“涉于政治学者”，编成《唐茹经先生政治学》一书，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全书共分《政治学之渊源》、《服官时之政治学》、《致仕后之政治学》、《政治学可以救国论》四部分。

十月，唐文治派遣馆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字子馨，一九〇四～一九四四）、吴宝凌（字云阁，生卒年不详）、戴恩溥（字惠苍，？～一九三〇）等五人赴宝应刘翰臣家分抄清代学者王懋竑（字予中，号白田，一六六八～一七一四）、朱泽沅（字湘陶，号止泉，一六六六～一七三二）的《朱集签注》，七日而成。回无锡后，唐文治又嘱王蘧常，理而董之，厘为四卷，草创凡例，定名为《朱子全集校释》。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二年十月，派遣高材生五人赴宝应钞朱子全集校注。”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亥五十九岁》：“十月，命诸生编辑《朱子全集校释》。余尝闻宝应有王白田先生《朱子文集》注本，爰函属宝应刘生翰臣，代为访觅。旋得刘生复书，谓家藏有王白田、朱止泉两先生《朱集签注》，甲子完备，朱墨烂然；惟编纂不易，只可过临云云。余乃命馆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吴宝凌、戴恩溥五人赴宝应刘家分钞，七日而蒇事。回锡后，复命王生蘧常悉心编纂，得十余万言，定名《朱子全集校释》云。诸生之自宝应归也，吴生宝凌赠余《朱止泉先生文集》四册，余细读之，见止泉先生论朱子于乙丑岁悟道后，专用力于‘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因之精义入神。阳明编晚年定论固非，然谓朱子胶于万物而不事涵养者，亦非也。乃知止泉先生于朱子之学，终身服膺，寢

馈更胜于白田；且编有《朱子圣学考略》及《朱子分类文选》二书，尤为精密无伦。旋王生购得《朱子分类文选》示余，刘生又访得《朱子圣学考略》，为之大快。”

唐文治《朱文公文集校释序》（见《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文治于弱冠后好研经，壬辰服官后，始治朱子学。假镇洋先师王文贞公所临陆清献、吴竹如两公评点本读之，屡作屡辍，未有得也。癸亥秋，为馆生讲授《朱子文集》，如泛大海，茫无指南，深愧无以对先贤而益诸生，未尝不汗浹于背。一日，偶与浙江吴生其昌论及宝应王白田先生之学，实能深入朱子堂奥。吴生复曰：‘闻王先生有《朱子文集注》一书，未刊行，当在其乡，盍求之。’余偶忆《白田存稿》中记《朱子年谱》正讹，后有文集注尚未成书，先抄诸签帖稿之语。爰驰书宝应刘生翰臣，属代采访。旋得刘生报曰：‘文集注未之得，近获过录王先生手批大本数十帙，朱墨圈乙殆遍，网罗散失尤详。而于晚年定论，辨之谆谆，大句细书，往往累数十百言，并间有陆稼书、朱止泉两先生语，复有所谓“龄按”云云者，疑即过录之人，莫详其姓氏爵里，或曰范姓，亦鄙邑中学者也。’闻之大喜，即命宝应吴生宝凌、嘉兴唐生兰、王生蘧常、海宁吴生其昌、太仓戴生恩溥，前往过钞，七日而蒇事。归而读之，精思抉微，如聆白田先生之馨歆，殆即所谓文集注之签稿欤？而朱止泉先生极毕生之精力，钻研朱子之书，至是而益显于世，两美必合，殆可谓人间之至宝已。爰复属王生蘧常，理而董之，厘为四卷，草创凡例，名曰校释。其圈点之不能阑入者，别作札记，附于后……”

按：《朱子全集校释》编成后似未印行，王运天《王蘧常教授学谱·王蘧常教授主要著作目录》中将《朱子全集校释》列为王蘧常“成书未付印”的著作，并云：“据柳诒徵日记，

南京国学图书馆有抄本。”

十二月，无锡国学专修馆筹备第一届学生毕业礼，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下午举行正式的毕业典礼。而在此之前，先期于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上午，分三次举行第一届毕业生论文演讲活动。

《国学专修馆筹备毕业 阳历元旦，（毕业典礼）在明伦堂举行》（见《新无锡》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三版）：“太仓唐蔚芝先生寓锡有年，为教育界泰斗。前因鉴于我国国学日渐陵替，故特发起国学专修馆，于学宫内开办，经费悉由本邑绅商捐资成立。授课三载，成绩殊佳。近甲班生修业期满，今当可以毕业，故已订于十三年阳历元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地点即在学宫内明伦堂云。又，本报特派某君晤本届毕业生唐君景兰，叩以毕业后馆中对于毕业生之出身问题曾否顾及，唐君谓本定由校保送赴京各部办事，现因种种关系，此项希望恐成泡影云。”

按：唐景兰即唐兰。

《国学专修馆演讲记（一）》（见《新无锡》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版）：“学前街国学专修馆第一届毕业生昨在学宫明伦堂举行第一日演讲。下午一时开始演讲，秩序为：陆吕年之《人道教育》、蒋庭曜之《左氏传礼学概论》、吴其昌之《性理学概论》、侯罅之《高忠宪易学》、毕寿颐之《孟子之弭兵学说》等，滔滔不绝，若决江河。学界诸君前往听讲者，颇为众多云。”又《新无锡》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第三版《国学专修馆演讲记（二）》：“昨为学前街国学专修馆第一届毕业生大演讲之第二日。首讲昨日未及演讲之《文学与道德之关系》（俞汉忆），又《婚礼概论》（唐兰）；次续讲《整理我国古代名学之方法》（唐兰）、《朱子一元哲学》（吴

其昌)、《孟子义利之辨》(钱国瑞)、《读文法》(唐景升)、《孝经大义》(蒋庭曜)、《春秋外交概略》(严济宽)、《读史记之研究法》(吴宝凌,此题因时晚,留下)。各种讲题,莫不挈纲提要,广博精深。来宾到者数百人,以本邑耆绅为尤多。成绩室分出版部、成绩部、私人著作部三种,四壁书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参观者颇为满意云。”

按:《新无锡》又记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上午尚有三人演讲,分别是夏云庆《周礼教育行政》、丁儒侯《论语政治学》、毕寿颐《诗经之社会进化观》。

十二月,印行《无锡国学专修馆讲演集初编》。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讲演集初编序》(见该书卷首):“无锡国学专修馆,钱唐施省之先生捐资所创建,且刊刻《十三经》以饷多士,盛德伟业,可垂不朽。本邑孙鹤卿先生又益扩其规模,而图有以继之。本年冬,第一班诸生毕业,既印《文集初编》,质诸当世;余又令诸生习为演讲,以资应用。诸生乃殚精竭思,各尽所长,汇成若干编。余特嘱其于毕业前稍加肄习,复择其言之雅者著于篇……”

按:《无锡国学专修馆讲演集初编》,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无锡美文印刷公司印刷。是书卷首标明“馆长唐蔚芝先生鉴定”,所收文章为:侯罅《高忠宪易学》,王蘧常、毕寿颐《诗经之社会进化观》,夏云庆《周礼教育行政》,唐兰《婚礼概论》,严济宽《春秋外交概略》,蒋庭曜《左氏传礼学概论》,丁儒侯《论语政治学》,蒋庭曜《孝经大义》,钱国瑞《孟子义利之辨》,毕寿颐、王蘧常《孟子之弭兵学说》,吴宝凌《读史记之研究法》,吴其昌《性理学概论》,王蘧常《宝应王白田、朱止泉两先生之朱子学》,吴其昌《朱子一元哲学》,陆吕年《人道教育》,唐兰《整理我国古代名学之方

法》，俞汉忆《文学与道德之关系》，唐景升《读文法》。

本年中，王遽常、唐兰、吴其昌、侯堃（字芸圻，芸一作云，约一九〇三~？）、毕寿颐（字贞甫，？~一九四四）、白虚（字心斋，约一八九八~？）、蒋庭曜（号石渠，一八九八~一九七九）和戴恩溥等人（后又增派了钱仲联）奉唐文治之命到苏州从曹元弼（字谷孙，又字师郑，一字懿斋，号叔彦，一八六七~一九五三）学习《仪礼》。学期毕，王遽常等人共同编成《礼经大义》数卷付刊。

王遽常《自述》：“我入馆之第三年，奉唐先生之命，与同学六人，每来复赴苏州，从曹元弼先生受《仪礼》。曹先生尝著《礼经校释》十余卷，清廷特授翰林院检讨，当时荣之。目短视，不能寸，又不御镜，阅书多，鼻常黑。语必文言，讲授时，旁征博引，尤称郑玄，必曰郑君。一席话，即一篇诂经文也。学期毕，我辈共成《礼经大义》数卷付刊，此为我服膺郑玄之始，尝刻一印曰通德门私淑诸人，于其遗文佚注皆有抄录，此时尚不知有袁钧辑本也。”

按：《礼经大义》，未见，据王运天《王遽常教授学谱·王遽常教授主要著作目录》，此书有无锡印书馆印本。又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一书中载录有曹元弼撰、王欣夫辑《礼经大义》一卷一册，为王欣夫蛾术轩钞稿本，作者记此书的纂辑经过云：“癸亥、甲子间，唐蔚芝先生于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选高才生吴其昌、唐兰、王遽常等七人月至苏城受教。退则各就口授笔录，但多匆促未审。自《丧服》至《特牲》五篇，始先自撰大义，以便讲诵。后乃续将《士冠》至《覲礼》十篇，《少牢》、《有司》二篇，重加论次，合成完书，而自序之。由博返约，言简旨远，诚礼学之钜键也。歿后，检点遗稿，阙《士昏》、《士相见》、《乡饮酒》、《少牢饋

食》、《有司彻》五篇，惧再佚散，亟缮写清本，以资世之考封建制度者。”据此，则似根据曹元弼讲授《礼经》内容纂辑而成的《礼经大义》有两种：一为王遽常等人纂辑，一为曹元弼撰、王欣夫辑。

蒋庭铨、蒋劭《蒋庭曜生平事略》：“……毕业那年，校长唐文治派他（按：指蒋庭曜）和唐兰、王遽常、吴其昌、侯罅、毕寿颐、白虚等七人去苏州曹叔彦处听讲学（每月两次），时称‘复堂七子’。”

黄汉文《唐文治办国专与章太炎讲小学》：“唐先生办学，除注重通常之课堂教学外，还经常邀请校外专家来校讲学，保送优秀学生外出听课。国专初创时，曾保送王遽常、唐兰、吴其昌等六人到苏州从曹元弼学习《仪礼》，后又增派了钱仲联。”

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他（按：指唐文治）对我的学业特别关切，曾选派我和高年级同学王遽常、唐兰、吴其昌、毕寿颐等每周一次去苏州曹元弼先生家学习《仪礼》、《孝经》。”

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另外，唐先生办学，教师队伍固然不求庞大，但这多半也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到中后期，不但教师数量比初期多出三分之二，国专还用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以补充师资之不足。在初期，唐兰、吴其昌、毕寿颐和我等，先后分派到苏州，拜在朴学大师曹元弼门下，每星期去一次，学《仪礼》、《孝经》。”

按：唐文治派去苏州从曹元弼学《仪礼》的国专学生的人数，各家所记，有所不同。黄汉文《唐文治办国专与章太炎讲小学》一文中说是六人；王遽常《自述》中说“我入馆之第三年，奉唐先生之命，与同学六人，每来复赴苏州”，

“我”加上“同学六人”共七人，与《蒋庭曜生平事略》中所记的蒋庭曜、唐兰、王蘧常、吴其昌、侯罅、毕寿颐、白虚七人之数相合；但唐文治《戴惠苍哀辞》一文中记“旋余复为（戴恩溥）介绍受业苏州曹叔彦先生肄业，习士礼”，则七人之外，还有戴恩溥。又，上引《钱仲联学述》中说“……选派我和高年级同学王蘧常、唐兰、吴其昌、毕寿颐等每周一次去苏州曹元弼先生家学习《仪礼》、《孝经》”，又此书后所附的《年表》中，于一九二五年下记“下半年起，奉师命每星期一次赴苏州从汉学家曹元弼学《仪礼》、《孝经》”。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作为第一届毕业生的王蘧常、唐兰、吴其昌、毕寿颐等人早已毕业离校。故此处似应从黄汉文之说，即钱仲联是后来“增派”的。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一月一日，举行第一班第一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丁天兆、丁儒侯、王钟恩、王鸿栻、王蘧常、白虚、吴其昌、政思兴、俞汉忆、侯堉、袁鹏骞、郭其俊、陆吕年、陆遵羲、陈宝恭、陈绍尧、唐兰、唐景升、许师衡、毕寿颐、钱国瑞、蒋庭曜、严济宽、顾季吉、吴宝凌、夏云庆、杨养吾等二十七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

《国学专修馆毕业志盛》（见《新无锡》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第二版）：“学前街国学专修馆馆主施省之，馆长唐蔚芝，馆董孙鹤卿、杨翰西等诸先生决定于十三年元旦举行第一班学生毕业典礼，特假学宫明伦堂为会场。下午一时，振铃开会。来宾到者，外埠有姚文敷、黄伯雨、张一麀、徐俪江、张一鹏、冯晓青、伍渭英、黄翊昌、钮元白、姚明辉、孙少云、刘雄夫、阮元衍、杨翼之、王永礼、邵桐卿等。本埠到者，有陶丹翼、周季梅、窦俊甫、王淇卿、冯蛰斋、王幼农、华艺珊、赵子新、蔡兼三、钱镜生、唐申伯、倪翔青、高映川、周廉生、杨经笙、刘书勋、秦执中、钱孙卿、杨仁山、嵇华庭、孙克明、辛柏森、邹同一、卫质文、冯云初、李逸民、戴晓乎、邓范青、王云轩、陈旧邨、王子柳、蒋遇春、陈谷岑、顾介

生、龚笠如、华掌文、唐星海、施织孙、许少仙、吴干卿、杨石渔、杨砚耘、杨筱荔、史逸欽、顾述之、蔡和卿、邓敷若、蔡虎臣、顾谷绥、顾毓汶等三百余人。馆董孙鹤卿、杨翰西等亦列席，公推施、唐二君为主席。兹将开会秩序记录于下：（一）开会。（二）奏乐。（三）馆长唐蔚芝先生报告三年来之经过情形。（四）馆主施省之先生报告，略谓：慨自圣学既衰，道德日替，近时学者盛倡文化改革之说，而经训大义，益闇而弗彰。迁流所及，伊于胡底。本馆之设，其宗旨专以发明我国数千年以来固有之学粹。自辛酉开办以迄今，兹凡三阅寒暑。诸同学类皆敦品能文，一洗时尚积习。甲班创设于前，乙班踵于后。今春，唐馆长选刊二年课艺，早为都人士啧啧称道。成绩优美，实所忻慰。鄙人虽未能与诸同学时相讨论，而佳士蜚声，远闻心许。他日进而益上，其成就更不可限量，可断言也。（五）馆董孙鹤卿君报告。略谓：本馆初设于惠山，继选于学前。缔造经营者，为施君省之、唐君蔚芝，与邑中杨君翰西等。二三年来，造就国学子弟不少。孔教绵延一线之传，微本馆其谁属，微施、唐二先生其谁与归？（六）馆长唐蔚芝先生给凭，馆主施省之、馆董孙鹤卿、杨翰西先生给奖。穆穆雍雍，秩序至为严肃。（七）音乐唱歌。歌毕，主席起谢无锡中学音乐、唱歌两部诸来宾。（八）来宾颂辞。（甲）财政厅长严孟繁君，由税务所长王幼农君代表致辞。（乙）淞沪护军使何茂如君，由军法科长陆达权君代表致辞。（丙）省长韩紫石君，由苏常道尹公署第一科科长兼机要秘书徐偈江君代表致辞。（丁）江海关监督姚文敷君亲致颂辞。（戊）教育厅长蒋竹庄君，由县知事冯蛰斋君代表颂辞。（己）苏常道尹蔡宝善君，由县知事冯蛰斋君代表致辞。（庚）县知事冯蛰斋君亲致颂辞。（辛）县教育局局长蒋仲还君，由职员王静庵君代表

致辞。(壬)无锡中学代表秦宝林君颂辞。(癸)上海银行行长华艺珊君致辞。(九)同学颂辞。由乙班班长杨焱代表同班致颂辞。(十)毕业生谢辞,由唐兰代表全体致词。(十一)来宾演说。(子)黄伯雨先生致词。(丑)章仲仁先生致词。(寅)冯晓青先生致词。(卯)张云搏先生致词。(辰)杨翼之先生致词。(巳)姚明辉先生致词。(午)孙少云先生致词。(未)王星若先生致词。诸先生之演词,大都为发扬国粹,端赖莘莘学子,将学成者,出以传人等语。就中以张云搏先生最为激切,如暮鼓晨钟,令人警醒;姚明辉先生最为滑稽,如东方曼倩,令人解颐。迨夫讲毕,即行闭会。随由施、唐、孙、杨四先生导各来宾,至尊经阁下参观成绩,然后款以茶点。男宾在尊经阁饭厅,女宾在尊经阁后读经室。茶点既毕,即行散会,时已灯火万家矣。”

本届学生在馆学习期间,唐文治诱导他们各就性之所近,治其专门之学。至毕业时,毕寿颐、唐兰、蒋庭曜、吴其昌、王遽常等多位学生都结撰有专门论著。

王遽常《自述》:“……唐先生又诱使诸同学治学,各就性之所近。于是毕寿颐治《诗》与《文选》,唐兰治《说文解字》,蒋庭曜治前、后《汉书》,吴其昌治宋儒五子外诸家年谱(毕业后,改治钟鼎甲骨文),我则治三代史。及毕业,皆裒然成巨帙。毕有《陈奂毛传疏补》、《度万楼骈文稿》;唐有《说文唐氏注》;吴有宋儒杨时、罗从彦、李侗等年谱及《宋代理学史》;蒋则有《前后汉书引经考》;我则成《商史纪传志表》若干卷、《夏礼可徵》二卷、《清代艺文志权舆》十六卷,时《清史稿》尚未问世也。毕业试分经、史、子、文四门,我于文作《太极赋》一千数百言,唐先生于陈先生评外加评云:融贯中西,包罗古今,前人未有也。”



吴令华《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在国专学习期间，父亲（按：指吴其昌）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不盲从前人权威的结论。如在研究宋明理学方面，他认真考证宋人著作的作者、年代、讹乱变化等等，作为研究的前提。例如程明道的《定性书》，朱熹定为程二十二三岁时在鄞县作，于是千年来无人再深加考辨。父亲作《明道先生定性书年代考证》，考定此书为明道二十七时作。王遽常尝笑他：‘理学而尚考据，自君始。’但父亲终不为所动。他认为：作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将史料作精密的考定，否则捕风捉影，高谈玄虚，必堕入‘瞽说’、‘枵谈’之流；并以此告诫自己的学生。国专三年，他已写出程明道、程伊川年谱及朱子著述考等初稿各若干卷，并重辑张载《崇文集》四卷。一九二三年十月，《学衡》二十二期发表了父亲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约二万字，时年十九岁。”

曾礼《唐兰传略》：“唐兰从小时起学习就十分勤奋，尝闻他年轻时，经常读书至深夜即和衣而卧。他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称：‘民国初年，余方读于商业学校。既毕业，改习医学。既为人诊病，又颇厌之，而学为诗词。稍博览……九年冬，尽弃所业，就学无锡（国学专修馆——作者注）。同学有熟悉段注《说文》者，余由是发愤治小学，渐及群经。居锡三年，成说文注四卷（在东北遭“九·一八”事变，只身逃出，行囊尽失，现仅存残稿不足二卷——作者注）’”。

本届学生中，王遽常、唐兰两人因其沉潜学业而在生活上不拘形迹，馆中同学改用明末清初“归（庄）奇顾（炎武）怪”之说，称其为“王奇唐怪”。

王运天《王遽常教授学谱》：“八十年代初，予曾问老师，

这‘王奇唐怪’究竟是何含意，师笑而答之：此为国学馆同学篡改明末清初归（庄）奇顾（炎武）怪之说，不足道。我检阅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申报》春秋栏内有《王奇唐怪》一文，作者士，不知何许人也。文不长，还是有意思的，录于下：‘我在南国读了本刊木木君《我所知道的王璠仲》一篇，使我想起了十年前王奇唐怪的一句话。唐就是王氏的好友唐景兰，现任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嘉兴人，从小在一起，少年时非常淘气，现在居然大家是大学的名教授了。尤其是唐氏，很有龚定庵的风味，几个月不洗脸，几个年头不洗澡，胡子养得长长的，后来不晓得怎样，头面都蒙住了黑气，一块一块的怪难看，他却依然如故。有人劝他洗刷，他说天生黑于予，洗刷其如予何。平时喜穿马褂，大热天亦是如此，有一天逢着大雨，黑色全褪在白衫上，染成一件天然马褂，他爽性把马褂脱掉，依然长揖公卿，行所无事。他援学问，无所不通，就是医卜星相，奇门遁甲，也能够谈谈，真是怪极了。王氏常常笑他是异端，王氏喜欢着西装，谈阳明学，唐氏又笑他是洋入股。他们同在无锡读书的时候，常常登山临水，有一天雅兴大发，在热闹的街市上，公然大唱杜工部的诗歌，路人多疑心他们是疯子，同行的人多溜走了，但是他们还是旁若无人。他们都喜欢写古字，往来的信札，都写龟甲文或钟鼎文，有人笑他们不通，他们亦满不在乎。王氏白天里，常常合着眼，跟不相干不合意的人谈话，总是呼呼的睡去，只有跟唐氏谈天说地，可以好多夜不睡，他们举动离奇到如此，无怪他们的乡人说他们是王奇唐怪了。我曾经流寓过他们的故乡，而且跟唐氏有半面之缘，作此一篇，读者读君，或者可以当江湖奇人传罢。’”

因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办时徐世昌答应解决学生毕业后工作



出路问题的允诺成空，故王遽常等人毕业后一段时间内工作无着落；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王遽常、唐景升（字尧夫，约一九〇三~？）、蒋庭曜等人被推荐到私立无锡中学任教。

王运天《王遽常教授学谱》：“及毕业，老师工作无下落，返里。据《自传》：‘时徐世昌已下野，段祺瑞执政，顾维钧为内阁总理。唐先生电申徐世昌前议，顾维钧特提阁议，终被否决。当时国内各大报皆载之。同学皆丧气太息，惟我与唐兰以为大好事，否则将受人牵引矣。’”又：“是岁，秋冬之季，老师居家，忽得唐文治校长自无锡来信，云：无锡中学欲急聘一国文老师，命速往。这既惊且喜的消息，反而使他拿不定主意，因为以往去无锡系受学，此番去是教学生，能行吗？事隔一二日，父亲知道此事，厉色说：唐校长之命，还犹豫甚么，快去。就是这封信，便成老师从事教育工作之始。”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第一届学生毕业时……馆友吴其昌、蒋天枢后来考取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继续深造，王遽常、唐景升、蒋庭曜被推荐到私立无锡中学任教。”

按：蒋天枢是无锡国专的第二届学生，而非黄汉文文中说的“第一届学生”。

本届学生中的吴其昌、吴宝凌、侯堦和第二届学生中的蒋天枢后来先后考取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吴令华《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开办，被录取者皆一时国学俊彦。父亲（按：指吴其昌）以第二名之学力考入为第一届研究生。第一名是河南刘盼遂。第二届第一名河南谢国桢（刚主），第二名浙江刘节（子植），一时研究院流传‘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

按：《吴宓日记（第三册）》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记：“复吴其昌函，保荐侯罅，无法特取入校。”由此可知，吴其昌被录取后，曾写信给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保荐同学侯罅，请求特取，吴宓回信拒绝。侯罅后来考取了该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

又按：据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九一一—一九二九）》一书中所记，清华国学研究院于一九二五年九月正式开学，一九二九年秋结束，其间共招收四届、七十四名学生，实际完成学业者六十八人。在这六十八人中，来自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共有四人，即第一届中的吴其昌，第二届中的侯罅，第三届中的吴宝凌（以上三人皆为无锡国专第一届毕业生）和蒋天枢（无锡国专第二届毕业生）。这四人中的吴其昌和蒋天枢，与姜亮夫、姚名达、王力、王静如、徐中舒、周传儒、陆侃如、杨鸿烈、卫聚贤、谢国桢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全部四届学生中之成就最著者。谢泳《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国学研究所——〈国专校友会集刊〉》一文中曾对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国学研究所之间的传承关系及两者在中国现代国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分析，说：“国专从时间上说，比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时间，所以他的学生中的优秀者又到了清华国学研究所，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几十年以后再看，中国文史哲的天下，大体可以说就是由这两班人来支撑的，这只要看看从一九二六年以后清华国学研究所毕业生的名单就可以了。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这也是清华国学研究所和无锡国专特别为人



看重的原因……”

一月，招收第三班学生三十人，钱仲联（名萼孙，字仲联，号梦苕，以字行，一九〇八~二〇〇三）以第一名考取。

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学术年表》：“（一九二四年）年初，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第三届，以第一名考取。校长唐文治，是我舅祖翁同龢的门下士，早年曾在翁家教其子弟。我投考是姑丈俞金门所介绍。入国学专修学校后，开始读经史诸子、《说文》等书。与第一届同学王蕴常、唐兰、吴其昌、毕寿颐和第二届同学蒋天枢等订交。”

本年秋季，发生第一次江浙军阀战争，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战于刘河、黄渡等处。战事发生前，唐文治曾分别致电齐燮元和卢永祥等人，希望能阻止战争的发生，未果。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子六十岁》：“七月，江浙兵事起。齐燮元、卢永祥战于刘河、黄渡等处。此祸酝酿已久，余逆知战事必不能免，先期电达曹锟、吴佩孚并齐、卢两处，痛哭流涕，求其和解。曹、吴未复，齐、卢复电均称：倘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也。至七月下旬，事益亟，江浙绅士惶急，主议缓冲，乃浙卢派员到会，而苏齐杳然。至八月三日，遂开战。兵士骚扰淫掠，百姓流离，惨不忍言……”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二四年，江苏军阀齐燮元（属直系）、浙江军阀卢永祥（原属皖系，后与奉系接近）为了争夺上海地盘发生纠纷。到了七八月中，‘山雨欲来风满楼’，战争即将爆发。唐先生以‘快邮代电’分致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和卢永祥，吁请双方和解，曹、吴未复，齐、卢虽有复电，均称倘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至八月底，形势更紧张，张一麐、黄以霖、史量才、黄炎培等倡议双方派代表到上

海开会和解。卢永祥的代表到了，齐燮元的代表却没有来。好战是军阀的本性，向军阀呼吁和平等于‘与虎谋皮’。老先生们的善良愿望落空了，齐卢之战争终于爆发。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申报》第三版上，载有《唐蔚芝劝阻江浙兵事电》，中有‘……衅端一开，深恐一二十年难期结果，两粤前车，可为殷鉴。又况外交棘手，窥伺频乘，我国多一次兵端，即长外人一分势力。言念及此，尤可痛心’等语。八月二十八日《申报》载有齐燮元的复电，讲得冠冕堂皇，说什么‘鄙人以保境安民为职志，浙不犯苏，苏亦不犯浙。耿耿此志，始终不渝’，纯属一派谎话。唐先生对北洋军阀的口是心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此次江浙军阀战争发生期间，无锡百姓深受戒严、失业、拉夫、封船之苦，备遭加捐、增税、筹款、催饷等额外负担。在此动荡、艰难的处境下，唐文治与诸教习率学生读书不辍；但因其时汇兑不通，几至绝粮。唐文治乃移用溧阳周仁寿（字敬甫，一八六四～一九三四）所捐助的、用于印行《人格》一书的资金二百金，才解决了师生的吃饭问题。

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第四版）：“……迨民国十三年秋，苏齐浙卢战事起，锡邑为沪宁孔道，全境骚然。余与教授督率诸生读书不辍。时汇兑不通，几至绝粮。迨溧阳吴君溉亭持二百金来校，云同乡周君敬甫属余印余所著《人格》千部，因得移用，勉继饔飧。”

本年秋，潘汉年（一九〇六～一九七七）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至下年初即转赴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学习。

尹骥《潘汉年传·潘汉年年表》：“（一九二四年）秋，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继续写作投稿，开始发表散文和儿童文



学作品……（一九二五年）年初，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学习。”又同书第二章《初试锋芒》：“一九二四年初，他应聘到和桥镇的养初小学去教书，仍是一面教学，一面自修，并不断练习写作。半年之后，即一九二四年秋，他因教书两年，已稍有积蓄，遂又萌发了继续升学读书的愿望。他绝不满足于自己已经获得的进步与成绩。他还有更宏大的志愿与理想。两年来的社会实践，包括教学实践和写作实践，固然收获丰硕，但同时也使他感到了知识与学力的不足。因此，他决计再去读书深造。于是他主动放弃教员的席位，到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去学习。在这所学校里，潘汉年一面研读中国的国学古籍经典，一面仍旧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并继续练习创作……宜兴的小学教员生涯，已经不能满足他早就立下了的宏愿，无锡的国学专修馆课程也嫌过于刻板。他的兴趣更趋向于现实的教育工作和文学活动。因此，他决计要到上海去上中华国语学校，以便今后能在教育领域内有更好的发展。”

傅绍昌《潘汉年传略》：“一九二四年春，潘汉年应聘到和桥镇养初小学执教。不久，入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古文。这期间，他在《学灯》上不仅继续发表多篇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而且还发表杂文《武人的枪》，初步显示了在杂文写作方面的才能。”

按：据《潘汉年诗文选·潘汉年著述年表》，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及二十七日，潘汉年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到乡间去——为暑期学校问题，敬和王平陵君讨论》；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杂文《武人的枪》，此二文当皆是潘汉年在无锡国专学习期间所作。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一月一日，举行第二班第二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道中、王震、朱宗洵、李家俊、周天游、胡集勋、姚继昶、孙执中、孙品珩、陆庆熙、陈学裘、陈渭犀、陈雪艇、陈拔彰、徐靖澜、徐世城、黄希真、冯励青、杨焱、秦艾三、杨仁溥、刘文灏、钱安定、蒋天枢、萧雪亮、钮方义、龚天玉等二十七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等）。印行《无锡国学专修馆讲演集二编》。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一月，举行第二班第二届学生毕业礼，共二十七人，并印讲演集二编。”

按：《无锡国学专修馆讲演集二编》，未见。

《国学专修馆二届毕业记》（见《新无锡》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第三版）：“本邑学前街国学专修馆于昨日举行第二届毕业典礼。下午二时开会，因时局关系，远道来宾到者寥寥；本邑到会者为：陶丹翼、杨石渔、侯保三、钱孙卿、秦执中、陈谷岑等三四十人，兹将开会秩序记录于下：（一）振铃开会。（二）主席陈柱尊先生报告，按照秩序为馆长、馆主报告，惟馆长唐蔚芝先生因伺父病缺席，由教员代表朱叔子代表

报告。馆主施省之、馆董孙鹤卿亦因交通阻梗，未能到会，由孙庭香代表报告。（三）给凭。（四）来宾演说，为钱孙卿、侯保三、秦执中、邹同一。（五）同学颂词。（六）毕业生答词。（七）茶点。（八）散会。此次该馆毕业生共计二十七名。最优秀：冯励青、王震、陈学裘、陈渭犀、杨仁溥、孙执中、蒋天枢、钮方义、戴恩溥、刘文灏、徐靖澜、杨焱、黄希真共十三名。优秀：王道中、萧雪亮、陆庆熙、周天游、陈雪艇、姚继虺、陈拔彰、朱宗洵、钱安定共九名。中等：秦艾三、李家俊、徐世城、胡集勋、孙品珩等五名。”

按：此次毕业的第二届毕业生人数，上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和《新无锡》的报道中，都说是“二十七人”，但具体是哪些人，各种文献中的记载，却颇有出入。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中，都没有上引《新无锡》所记名单中的“戴恩溥”的名字；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中，另有龚天玉，和钮方义一起列在“已故毕业生”中，并标明其为“第二届”；而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已故毕业生》中则于“龚天玉”名后标明其为“第三届毕业生”。姑记以备考。

一月，职员王保謙辞职（据《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

一月，招收第四班学生共三十人。其时，正当第二次江浙军阀战争发生，齐（燮元）军以无锡为根据地，断绝交通，投考学生被隔绝于城外，进退两难。当时正值馆长唐文治在家丁父之忧，馆中事务赖馆董孙鹤卿尽力维持，教授陈柱和职员沈炳焘亦坚定不去。直到二月初，各级学生始齐集开学。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一月……招收第四班学生三十人。按：……迨本月苏奉战事又起，齐军以无锡为根据地，交通断绝，城门昼闭，投考诸生隔绝城外，苦不胜言。惟时唐馆长适丁外艰，赖馆董孙鹤卿先生尽力维持，教授陈柱尊（柱）、职员沈健生（炳焘）两先生坚定不去。二月初，诸生始复齐集，开学上课。校长在家读礼，诸生就谒受课。”

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第四版）：“……其冬卢军虽退，则苏奉战事又起，齐军以无锡为根据地，道涂梗塞，城门昼闭，投考诸生隔离城外，进退狼狈。而文治适奉先君讳，赖孙君鹤卿殚力维持，教授陈君柱尊、职员沈君健生坚定不去。十四年二月初，诸生始齐集开学……”

按：据《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唐文治之父于农历甲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弃世，唐在家丁忧，至本年农历六月下旬始“到馆上课”。

一月，施肇曾不再担任无锡国专馆主，由孙鹤卿继任（据《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

四月，邹云翔（一八九七～一九八八）拜唐文治为师，唐文治命其和第四班学生一起上课，和在馆学员一起参加作文与考试，承认学籍。邹云翔在专修馆读至一九二七年，因母病需侍奉而辍学。

邹云翔《尊师颂有序》（见《国学之声》总第十五期）：“国学为立国之本，国学者，人伦之道，践履笃实之学也。乾隆时代，国运昌盛，创设四库，经学为先，立己达人之道，端在于是。二十年代，云自省立三师毕业后执教中小学，并研文史，慕陈同甫之所为，切于功利主义，欲有所树立。时袁世凯



洪宪称帝，军阀割据，分崩离析，国事日非，后段祺瑞执政，云上万言书安国十策，不报。退而思之，遂有所悟。时唐蔚芝讲学无锡学前，于一九二五年夏四月，请求听讲经学，在先后二年又四月之时日中，言教身教，经其熏陶，脱胎换骨，如同再造。后因母病失治，发愤学医。儒道医道融合贯通，获效良多。”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在国专初建时，曾发生过有人拜唐先生为师，唐先生命他随班上课的事。如现任江苏省中医学院副院长、省中医院院长邹云翔老学长，他在六十年前拜唐先生为师。当时他年已二十八岁，曾任中小学教师多年，唐先生命他和第四期学生一同上课。对在校学生，则不主张举行拜师仪式。”

黄汉文《怀念邹云翔教授——一位好学不倦的老学长》：“邹老于民国初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无锡师范的前身），当了十年中小学教员才进入国专的……他由无锡教育界老前辈秦执中老先生推荐，上书唐文治先生，约期谒见。由唐先生命题，当场作文，以古喻今，立论新正，得到唐先生的嘉许。唐先生的评语为：‘气象崇宏，洵是有志之士。杰作也！勉之！勉之！’唐先生当即收他为学生，特许自学与听讲相结合，和在馆学员一起参加作文与考试，承认学籍。唐老先生命在国专第四期上课。他年已三十，较同窗年长，学识丰富，已娶妻生子，不免有些家累，仍好学不倦。当时的国专，不收学费，每月文课，还有奖金，甲等奖为十元，他常获甲等奖。他事母至孝。他在国专就读二年多，一九二七年因母亲多病需要侍奉，只好辍学，就近担任中学教师。”

九月，唐文治编辑《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并于本年内刊行。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乙丑六十一岁》：“九月，编辑《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余初编读文法，次第推广为四十四法，命名《经纬贯通大义》，口授诸生熟读之。盖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论语·阳货》篇详论人心风俗之本，第二章特言性相近，其后即言闻弦歌之声，命小子学诗，伯鱼为《周南》、《召南》；又答宰我问三年之丧，皆性情教育也。厥后子思子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本此意。故居今之世，教授国学，必须选择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发人之性情者，方有益于世道也。”

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见该书卷首）：“往者余询桐城吴挚甫先生：‘公交游遍天下，今世作者共有几人？’先生抚然有间曰：‘凡握管为文者夥矣，以云内家，吾未之见也。’余讶其言之过高，且意所谓内家者，审命意尔，辨性质尔，析理与气尔。厥后课徒二十年，稍有阅历，忽豁然有悟，知吴先生之言启我。乃编读文数十法，名曰《国文经纬贯通大义》，用以开示诸生，指拗奥义云……”

按：《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八卷，无锡国学专修馆一九二五年刊本。上引《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说：“余初编读文法，次第推广为四十四法，命名《经纬贯通大义》。”这四十四法是：局度整齐法、辘轳旋转法、格律谨严法、鹰隼盘空法、奇峰突起法、两扇开阖法、段落变化法、一唱三叹法、逐层驳难法、空中楼阁法、匣剑帷灯法、万马奔腾法、凄入心肺法、说经铿鏗法、逸趣横生法、短兵相接法、光怪离奇法、倒卷珠帘法、布局神化法、响遏行云法、摹绘炎凉法、摹绘英鸷法、摹绘激昂法、摹绘旖旎法、刻画物理法、钟鼓铿鏘法、俯仰进退法、皎洁无尘法、心境两闲法、画龙点睛法、风云变态法、典缀华藻法、层波叠浪法、典重裔皇法、追魂摄魄法、洗洋谈诡法、



高瞻远瞩法、翁纯嘏绎法、叙事精炼法、硬语聱牙法、选韵精纯法、议论错综法、炼气归神法、神光离合法。每法下均简要说明适用何种文类及写作要点，又选文若干篇。全书共选录历代文章二百三十七篇，每文后均有作者的评点文字。

又按：上引《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说“……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所以本书之选文，立足于“选择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发人之性情者”，正是为了贯彻性情教育的宗旨。一九二六年，唐文治在《〈南洋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征文集〉序》一文中，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性情教育的思想：“南洋觥觥乎一大团体，何莫非性情中事耶？故夫有真性情而后有真学问、真事业。余向主道德教育，及今思之，与其为道德高远浑噩之谈，毋宁言性情教育悱恻感人为得也。方今世界横流、人心陷溺，非性非情机括百出，教育之道，当在启迪良知，使之油然蒿然不能已。有子谓：‘君子务本。本立道生。’孟子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仁、义、礼、智之四端，此皆性情教育之原理也。试观古来有真学问、真事业，曷尝不根于真性情？慈祥恺恻之人，长言永叹，播为诗歌，或发为文章，格豚鱼、开金石，千载下读之，有令人感泣不已者，隔形骸不隔精神也。”陆振岳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一文中，认为在唐文治的教育思想中，“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而且具有开创性的，是他的性情教育之说”，“特别应当一表而出之”。

本年中，王遽常被聘为无锡国学专修馆讲师（据王运天《王遽常教授学谱》）。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不久，馆内缺少子学教师，王遽常曾一度讲授子学。第四届的馆友至今称王先生为老师。”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一月，补行第二班插班生毕业礼，共毕业学生何葆恩、施秉璽、黄谟泰、黄谟沁、童咏南、严云鹤等六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

农历三月，《高子别集》刊刻完竣。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丙寅六十二岁》：“三月……刻《高忠宪公别集》成。是书系沈子培师所赠，余为作序已三十年矣，至此，志愿始遂。”

唐文治《高子别集叙上》（见该书卷首）：“《高忠宪未刻稿》八卷，吾师沈子封先生得自河南书肆，文治以几亭先生刻本校之，其中间有出入，大抵几亭本详于论学，而此本则多关朝政。不审当时几亭先生未见此本与？抑为其所芟薙与？原书无序跋，遂不可考。要之为世间可宝之物，则夫人而知之也。文治既命学徒朱生诵韩、孙生昌烜分缮一通，爰复序其简首曰……”又唐文治《高子别集》“谨识”：“《高子别集》原名《高子未刻稿》。余作序后越十余年，迁居无锡，得晤忠宪公裔孙映川君，亦藏有未刻稿。互相校对，颇多出入，因僭拟映川君所藏本为续集，而以是编为别集。甲子岁，太仓陆君勤之创设理学社，捐款先将是编付梓，乙丑岁缮写告竣，丙寅夏

刻成。校字者：太仓李君惠农、王君慧言、无为侯生芸圻也。文治谨识。”

按：《高子别集序》又见《茹经堂文集》卷四，题作《高子外集序》，文字与上引略有不同。

又按：《高子别集》，无版权页。本书原为抄本，名《高子未刻稿》，后经唐文治校勘刻印，改名为《高子别集》（或称《高忠宪公别集》）。全书分八卷，卷一为说、辨、记、赞、题跋杂书，卷二至卷五为书，卷六为传，卷七为状，卷八为祭文。上引唐文治“谨识”中云“甲子岁，太仓陆君勤之创设理学社，捐款先将是编付梓，乙丑岁缮写告竣，丙寅夏刻成”；又《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中记有“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设理学社，刻印无锡《高忠宪公别集》、太仓陈安道《周易传义合阐》二书，甫刻成，齐卢之战起，理学社余款拨归急振刘河灾民费，社事遂中止”，由此可知该书于甲子岁（一九二四年）计划刻印，至丙寅岁（一九二七年）始刻成。

八月，钱伟长（一九一二～二〇一〇）入无锡国专就读。在该校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即随父亲钱挚转入无锡县立初中，在该校一年级就读。

按：钱伟长为无锡县鸿声里七房桥村人，其父亲为钱挚，四叔为钱穆。据钱伟长《毕业七十载 报国六十年》及孔祥瑛、刘晓明协助整理《重要活动纪事》等文中所载，一九二五年，钱挚在无锡城郊荣巷公益中学任教务主任，是年九月，钱伟长随父至该校就读。一九二六年五月，公益中学因学潮停课，钱伟长辍学返无锡县荡口镇，八月入无锡国专就读。一九二七年，无锡县立初中成立，钱挚任教务主任兼授中国历史，钱伟长又随父进县立初中一年级就读。后来，钱伟长在《怀

念钱穆先叔——钱穆宾四先叔逝世十周年忆养育之恩》一文中回忆这段短暂的学习经历说：“在无锡师范和县中停学的时候，桐城派宗师唐文治在县初中的县学东边，利用旧房办了一个国学专修科。唐文治眼睛失明，在那儿讲课，人们说这是‘唐瞎子’上课。父亲说唐文治是有学问的人，我在家里学不了什么东西，让我登记成为国学专修科的一名学生。那时‘唐瞎子’正在讲《醉翁亭记》，讲这篇文章修改的经过，这些讲法使我在七十多年以后，还深记在心。这是我的一个短暂的生活过程中的插曲。但是，我学会了桐城派朗读的精华……”又据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他自幼在家从父亲钱挚和四叔钱穆等学习古代文史，后又在无锡国专学习将近一年；但另一方面，因连年战乱等原因，“十一年的小学、初中，真正上学时间还不到五年”。这样，到了考大学时，“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幸好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钱伟长于一九三一年六月这一个月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因“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竟然全都录取了，最后选择进了清华大学。“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廿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但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决心‘弃文学理’”，最后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下午和二十二日上午，分三次举



行第三届毕业生论文演讲活动。二十二日下午举行第三班第三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丁儒珍、王志熊、王士培、王承堪、印文灿、安鍾祥、李耀春、吴鸿璋、周岐、周渭泉、金凤鸣、易羲、芮良珍、胡述尧、夏敷章、孙学静、张寿贤、张文郁、张述明、陈起予、陈起绍、徐玉成、徐與、倪殿扬、倪可均、庄锡元、黄文中、黄雨璠、赵履坦、刘作邦、钱萼孙（仲联）、谢宗元、庞天爵等三十三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

《国学专修馆毕业预志》（见《新无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三版）：“本邑学前街国学专修馆创办迄今，已历六载。兹届第三届毕业，特订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举行毕业典礼，先两日就学宫明伦堂由学员讲演。讲题有：《清代江浙诗派概说》、《黄元同先生学术概论》、《孔子、墨子、庄子三大家大同学说之两大问题》等十余节，规定二十、二十一两天下午一时起，二十二日上午九时起为演讲时间云。”

唐文治曾将本届学生中的钱萼孙（仲联），与第一届学生王蘧常、第二届学生蒋天枢（一说是唐文治执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政时的学生陈柱）称为“唐门弟子”中的“三鼎甲”。

王运天《王蘧常教授学谱》：“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团结报》潘咏召《王蘧常教授二三事》有：‘先生（按：指王蘧常）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第一届学生，校长唐文治先生非常爱重他，常令他代笔作文，满意者就收在文集里。唐老曾对亲友说：“吾唐门弟子中有三鼎甲：状元是王蘧常，榜眼是陈柱，探花是钱萼孙。”’一时士林传为佳话。”

按：张仲蔚《王蘧常与沈乾熙》一文中亦记：“王蘧常与

沈乾熙是无锡国专先后同学，唐文治校长生前尝言：‘方今科举如尚不废除，则三鼎甲悉在吾门下，状元是王遽常，榜眼陈柱尊，探花钱仲联。’”《钱仲联学述》中则谓：“我……当时与首届学员王遽常、二届学员蒋天枢齐名，号称‘唐门三鼎甲’，而国专同学之中，群推王遽常为首座。”赵杏根《诗学霸才钱仲联》一书中认为：王遽常、陈柱、钱仲联三人都是唐文治的学生，“不过，陈柱是唐文治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后来到无锡国专教书，成了钱仲联的老师，而王遽常、钱仲联，则是无锡国专的学生，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不太协调”；“唐门三鼎甲”为王遽常、蒋天枢、钱仲联的版本“较为顺”。

本届学生中的钱萼孙（仲联）所写的《近代诗评》一文，于本年刊载于《学衡》第五十一期，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我于一九二六年在《学衡》第五十一期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近代诗评》，文中对晚清以来的诗学大势作了如下分析：‘诗学之盛，极于晚清。跨元越明，厥途有四：瓣香北宋，私淑西江，法梅（尧臣）王（安石）以炼思，本苏（东坡）黄（庭坚）以植干，经巢（郑珍）、伏敌（江湜）、蟥叟（何绍基）振之于先，散原（陈三立）、海藏（郑孝胥）、海日（沈曾植）大之于后，此一派也；远规两汉，旁绍六朝，振采蜚英，骚心选理，白香（邓辅纶）、湘绮（王闿运）凤鸣于湖衡，百足（高心夔）、裴村（刘光第）鹰扬于楚蜀，此一派也；无分唐宋，并咀英华，要以数罟为宗，不以苦僻为尚，抱冰（张之洞）一老，领袖群贤，樊（增祥）易（顺鼎）承之，杯为宏丽，此一派也；驱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谈，自辟户牖，公度



（黄遵宪）、南海（康有为），蔚为大国，复生（谭嗣同）、观云（蒋智由），并是附庸，此一派也。”

按：《学衡》五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出版。

十二月，编印《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二编》。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丙寅六十二岁》：“十二月，国学专修馆行第三毕业礼，印专修馆文集二编。”

陈柱《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二编序》（见该书卷首）：“我业师锡山唐蔚芝夫子以韩欧周秦之文章，发挥孔孟程朱之德性，著作等身，欲以中和之言感动天下。自从政中枢，以至于出长南洋公学，数十年来，其旨未尝稍变。其文千变万化，而归本于中和之旨则一。民国九年，退老家园，讲学于邑中之尊经阁，四方学者，响风慕义；数年以来，列门墙者又已数百人矣……诸生既学道为文，夫子不忍其散失，故择其尤者刊而布之，既将以就正于海内贤达，亦以鼓吹天下中和之气也。”

按：《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二编》，无锡国学专修馆发行，无锡五大印务馆印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全书共四册，书前有唐文治题辞及朱文熊、陈柱、孙鸣圻序，正文按经学类、史学类、理学类、政治学类、杂著类、诗赋类的次序，共收录无锡国专前三届学生的文章一百二十八篇，卷首标明“馆长唐蔚芝先生鉴定”，每篇后有简短评语。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一月一日，无锡国学专修馆同学会所编辑之《国学年刊》出版。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同学会国学年刊弁言》（见该刊卷首）：“昔韩子《送孟东野序》云：东野与李翱、张籍‘三子之鸣信善矣。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后世诵其言而悲之。吾谓无足悲也。自古砥行砺名、抱负卓犖之徒，要皆大有为之士，特其所遇有平陂之异耳。苟反乎其自鸣者，皆足以鸣国家之盛者也。君子素其位而行，内重外轻，又何得失之足云。往者吾师黄漱兰先生在江阴创设南菁书院，王益吾先生继之，刊刻《南菁讲舍文集》，又别刊《南菁丛书》，一时彬彬称为极盛。吾馆创设于施君省之，孙君鹤卿继之，自始及今，不过六年。先后刊文集初编、二编，不乏名作。今岁之春，同学会成立，又有年刊之举，盖足以佐文集之不逮，余甚嘉之……然则考诸同学之学术文艺，以探其抱负之本原，益自有致用者也。圣人云：‘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其尚勉之哉！”

按：《国学年刊》，王遽常编辑，无锡五大印务局印刷，无锡国学专修馆同学会发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出版。该刊由“学术”、“文苑”（分“文”、“诗”两部分）、“特载”等

栏目构成，除《墨学十论序》一篇为无锡国专教授陈柱所作外，其余所收皆为国专同学会成员的作品。

一月，招收第五班学生四十二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考入第五班的学生中有周木斋（名朴，字木斋，号树瑜，以字行，一九一〇～一九四一）。但因家里交不起学费等原因，周木斋未及在无锡国专毕业，便离开学校到上海大东书局任编辑。

万叶树《杂文家周木斋》：“……（周木斋）一九二五年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周木斋读书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榜首。北伐革命军进入南京前夕，江苏省议会自行解散，省立一中停办，他父亲回到家乡，周木斋转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周木斋在无锡国学专修馆读了两年，因家里交不起学费等原因离开学校，到上海大东书局任编辑，同时为《涛声》等刊物写稿，当时他只有十八岁……”

唐弢《鲁迅和周木斋——四十多年前文坛上的一桩公案》：“……木斋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曹聚仁对他的旧学很佩服，遇到先秦诸子或者古典小说上的疑问，总要向木斋请教……”

三月，无锡国学专修馆改名为无锡国文大学，并修改章程、重订课程。这是无锡国专第一次改名。

《国学专修馆改组志闻》（见《新无锡》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第三版）：“学前街国学专修馆原由大文学家唐蔚芝先生所创设，常年经费则由邑绅杨翰西、孙鹤卿、蔡兼三、唐水成等诸君捐资补助。设立以来，瞬经六载，办过毕业三次。唐馆长近以四方来学者日众，原有教材不适于用，爰即召集同人

一再会议，当经议决，将该馆改组为无锡国文大学，重订馆章、课程，以宏造就。原有学生改为特班，暂行照旧授课，俟下学期招生另定毕业年限。议定后即由唐馆长函致张知事，请求备案。原函略谓：‘敝馆自设立以来，瞬经六载，仰托悃懃，日益发达。比来肄业者争先恐后，经同人等一再商议，企谓当兹晦明风雨之时，非提高程度，树之风声，不足以厌众望，而宏造就。爰将馆章、课程两项详细改定，即将国学专修馆改组为无锡国文大学。集各方之学者，撷四部之菁华，私淑东林，于成德达材，收效万一。谨抄录章程、课程，送呈左右教正，并祈俯赐备案，至纫公谊。再敝校原有学生两班，现作为特班，暂行照旧，俟下学期招生，另定毕业年限，合并附闻（下略）。’”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六年三月，改名为国文大学。”

按：除上引文献外，《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亦载：“十六年三月，改名无锡国文大学，修改章程。”又《新无锡》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第二版有《国文大学之改组谭 改为最高学府，宣传党化教育》之报道，报道中称“学前街国文大学原由旅锡耆绅唐蔚芝先生所创办……”，可见本年三月，确曾将无锡国学专修馆改名为无锡国文大学。但改名之后不久，新成立的无锡县行政委员会的教育委员徐梦影即下令解散无锡国专；至本年六月，无锡国专才重新复校，七月又改校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所以“无锡国文大学”校名的使用时间极短。此次改校名之事，历来亦不太为外界人士所闻知。

又按：从一九二〇学校开办，到本年学校第一次改名前，这是无锡国专的初创时期。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一书中将这一时期的无锡国专

称作“是一个小型书院式高等学馆”，“说它‘小型’，就其师生队伍规模而言；说它是‘书院式’，就其教学管理方式而言；说它是‘高等学馆’，就其学术专业水平而言。”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一文中曾概括国学专修馆时期的教学特点：一是“教书又教人，但培养人才，却又不拘一格。唐文治先生办国学专修馆，是提倡孔孟儒学的，但那些封建主义的毒素，大体上已经抛弃，而主要强调品德修养”。二是“教学方面重在教古籍原书，教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即使编教本，也选录大量原著，结合理论，不是那种通论式的东西”。三是“重在自学。国学专修馆，设置的课程种类不多，而且一天只上四教时课（上、下午各二教时）。学生在学好课堂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各就自己的爱好，主动自学，有的也得到老师的指授”。四是“重在启发。老师讲原书，首先是逐字逐句地讲解，但不是翻译。学生一般在入学时文言文水平已很好，不必死讲。老师讲解，是讲解每字每句的作用以及布局的变化，当然更注重它的思想意义。并非老师讲解的句句都是精金美玉，但一堂课中，总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在自学时是得不到的。经老师的数语点破，举一反三，自学时大得其力，也能不断增加自己的创获”。五是“重写作。专修馆特别重视写作（文言文），每两星期作文一次，当堂三小时交卷……因为重视写作，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因为有实践的经验，从而对古人是怎样写作的，能深入去领会，写与学相互促进”。六是“将在精而不在多。”

三月二十一日，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驻无锡。此后不久，无锡县行政委员会成立，徐梦影担任该委员会的教育委员。他上任后，随即着手进行教育改革。而作为改革的一项内容，是解散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于三月二十九日

(农历二月二十六)提出辞职。无锡国专因此关闭、停课两个多月。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是年三月……徐梦影用无锡教育局长名义，突将本校勒令解散，驱逐员生，驻扎军队，事起仓猝，损失极巨。诸生临别摄影，为泣别图，星散而去，停课二月余。”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丁卯六十三岁》：“革命军之入苏也，有共产党杂其间；锡邑教育局长徐梦影，共党也。本不以专修馆为然，有朱某者具呈，请封闭专修馆。徐梦影遂令解散。馆生崔履宸、张惟明、路式遵等赴县署力争，不能挽回，余即于二月二十六日辞职。”

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第四版）：“迨民国十六年春……徐梦影用无锡教育局长名义，突将本校勒令解散，驱逐员生，驻扎军队。事起仓猝，诸生临别摄影，为泣别图，星散而去。惟时马腾于舍，粪污于堂，书籍零散，薪木毁伤，停课近三月。”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无锡地方社会秩序渐趋平静，无锡国专同学会代表蒋庭曜、王遽常等人前往南京江苏省教育厅具呈请求恢复，留在无锡的同学崔履宸、路式遵等人亦四处奔走相助；旋由江苏省教育厅飭令无锡县政府出示保护。至六月一日，学生崔履宸、路式遵等人公请唐文治复职，无锡国专师生回校复课。议定本届毕业生延迟半年毕业。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六月一日，学生崔履宸、路式遵等公请校长复职，悲喜交集，爰议定诸生毕业期展缓半年。”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丁卯六十三岁》：“五月二

日，馆生崔履宸、路式遵迎余复职，同人咸回馆；而沈君健生自专修馆解散后，常住余家，照料一切，始终未去，尤为可感。馆中因军队驻扎，房屋墙壁颇有损坏。此次恢复，崔、路二生之功居多。崔，广西人；路，宜兴人也。”

《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十六年五月……同学会代表蒋庭曜、王蕴常等赴南京教育厅，具呈请求恢复。在锡同学崔履宸、路式遵等亦奔走相助。旋奉教育厅令，敕无锡县政府出示保护。爰于六月一日，公请校长等复职，诸同学先后来校上课。”

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第四版）：“六月一日，学生崔履宸、路式遵等，请余及各教授复职，屋无长物，满目苍凉，而孙君犹韬晦不敢出。余假百余金支持至暑假……”

七月，无锡国文大学改校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同时成立学校董事会，并以校董会的名义，呈请江苏省教育厅备案，此为无锡国专第二次改名。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六年七月，董事会成立，改名国学专门学院，呈请教厅备案。”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丁卯六十三岁》：“六月，改国学专修学校为国学专门学院，添招新生三十名，惟经费不敷，拟募捐以济之。”

《国文大学之改组谭 改为最高学府，宣传党化教育》（见《新无锡》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第二版）：“学前街国文大学原由旅锡耆绅唐蔚芝先生所创办。近因时代关系，业由唐先生将该校改组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一切设施，大为刷新。所订课程，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国文化史、历代学术概要、诸子哲学、华化外被史、中华民族考、中外文化比较论以

及文字学、诗词歌赋骈散等文之作文研究，皆为甚有价值之学科，并敦请蔡子民（元培）、郑晓沧（又名宗海）、马君武、陈柱尊等大名家十数人作讲师。锡地有此学府，以为文化中心，湖山均为生色。更拟敦聘薛溱龄、孙新吾、卫质文、孙静庵、施织荪、顾彬生、邹广恒、屠克强、张树声、朱六才等十余人为赞成人，更番担任宣传党化，使新智旧学，冶为一炉，已托其门生蔡虎臣君分头接洽，俟各方允洽，即行备函敦请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第一次国内革命，因国民党的破坏而失败。国民党以‘实行孙中山先生遗教’为幌子，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唐先生对这一复杂的形势是认识不足的，认为国民政府比北洋军阀高明得多。同时，毕业生已有几届，他们在就业时，书院式的专修馆到底算哪一等学历，难以确定，国民政府的教育机构对各级教员的学历又查得很严。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九二七年夏，无锡国学专修馆遂改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

从本年七月无锡国专成立董事会始，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止，先后受聘担任过国专校董的有钱孙卿（名基厚，字孙卿，以字行，一八八七～一九七三）、俞复（字仲还，一八八六～一九三一）、顾述之（名倬，字述之，一八七二～一九三八）、顾宝琛（字彬生，一八八〇～一九六〇）、丁福保（字仲祐，号梅轩，一八七四～一九五二）、邹家麟（字同一，生卒年不详）、蔡其标（字虎臣，生卒年不详）、孙家复（字庭香，生卒年不详）、钱基博（字子泉，一八八七～一九五七）、穆藕初（名湘玥，字藕初，以字行，一八七六～一九四三）、荣德生（名宗铨，字德生，以字行，一八七五～一九五二）、唐保谦（字滋镇，一八六六～一九三六）、华绎之（名士翼，字绎

之，一八九三~一九五六）、程炳若（一八九二~?）、蔡兼三（名文鑫，字兼三，一作緘三，以字行，一八六八~一九三七）、荣宗敬（名宗锦，字宗敬，以字行，一八七三~一九三八）、杨翰西（号寿楣一八七七~一九五四）、刘鸿生（一八八八~一九五六）、丁彦章（字梓仁，一八六六~?）、陆仁寿（一九〇三~一九五六）、陈纶（字谷岑，一八八七~一九七〇）、秦冕钧（字祖同，一八七三~一九四二）、陶达三（名守恒，字达三，以字行，一八七一~一九五一）、杨味云（名寿柝，初名寿棧，字味云，以字行，一八六八~一九四八）、任传榜（字筱珊，一八七七~?）、孙宗海（生卒年不详）、高阳（字践四，一八九二~一九四三）、周毓莘（字伊耕，一八九一~一九五二）、冯振（字振心，一八九七~一九八三）、惠美珊（一八九七~一九六二）、侯鸿鉴（字葆三，一八七二~一九六一）、杨仁溥（生卒年不详）等人。

按：据陆振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一文中述，无锡国专之所以于此时成立校董会，是因为学校由“无锡国学专修馆”改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具文呈请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审批，得批示，私立学校得由校董会报批”。校董会成立后，分经济和教育两股，经济校董每年担任学校经费五百元，教育校董则“负计画指导本校教育之责任”。唐文治在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曾有一节讲到无锡国专前五中的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开办时为施君（按：指施肇曾）所担任，孙君（按：指孙鹤卿）继之。因商业不振，庚癸频呼，岁杪仰屋，屢濒于危。十七年夏，孙君归道山，更形棘手。幸赖同邑蔡君兼三、华君绎之、唐君保谦，倡议除聘请教育校董十人外，更请定经济校董十人，每年集得五千元，又呈请省款

补助，每年得三千元，藉资挹注；又因同学来者每岁加增，近年达二百五六十人，收费较多……”又《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董会章程》第四条：“本会分经济校董及教育校董两股。教育校董任期为两年，经济校董任期为四年。期满后各于开常会时改选半数，但得连举连任。”第六条：“经济校董每年每人担任本校经费五百元……教育校董负计画指导本校教育之责任。”

又按：因为要定期改选，所以历年中校董的人选构成会有不断的变化。苏州大学档案馆所藏《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决事项、聘请教育、经济董事、校董台衔和有关信函》中有一份《本院院董台衔》，中载学校“于民国十六年请定”之校董有钱基厚、俞复、顾倬、顾宝琛、丁福保、邹家麟、蔡其标、孙家复、钱基博等九人，“于民国十七年请定”之校董有穆藕初、荣德生、唐保谦、华绎之、程炳若、蔡兼三、荣宗敬、杨翰西等八人，“于民国十八年请定”之校董有刘鸿生、丁彦章等二人。除上面十九人外，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董名录》所载的“前任校董”中，曾经担任过无锡国专校董的还有陆仁寿、陈纶、秦冕钧、陶守恒等人。又《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董名录》所载的“现任校董”中，“经济股”有唐滋镇、蔡文鑫、华士巽、杨寿栊、任传榜、孙宗海等六人，“教育股”有钱基博、钱孙卿、顾倬、高阳、孙家复、周毓莘、冯振、惠美珊、侯鸿鉴、杨仁溥等十人，“廿四年由经济股改为教育股者”有荣宗敬、荣德生、杨寿栊、丁彦章等四人。以上大致能够反映无锡国专自校董会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校董会的人选构成及变化的情况。

九月，第五班学生因上学期停课两月，改为秋季始业，另



添招九人，共五十一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九月，聘请钱基博为教授。此前，钱基博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教授。是年夏初，因北伐军到达沪宁，锡沪交通受阻，钱基博无法到光华上课，因此应唐文治之请来无锡国专上课。锡沪交通恢复后，已被正式聘请为无锡国专教授的钱基博，照例于每星期五下午回锡，当晚到国专讲课两小时，星期六上午再讲两小时，星期日早车返沪。从此往返沪锡，风雨无阻，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钱基博在无锡国专先后开设过《古文辞类纂》、《文史通义》、目录学、《韩昌黎文》、《孙子十三篇》、《东塾读书记》等多门专业课程。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六年九月，聘请钱子泉先生为教授。”

钱基博《与南通费君书》（见《新无锡》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博本学期，仍在光华，而以唐蔚芝先生坚邀，在国学院授课，不敢违命。以故每星期五必回锡，星期六上午到国学院（原称国学专修馆）授课三小时，星期日早车来沪。道途仆仆，殊以为苦。以此益鲜暇晷，差幸诸生尚知媚学，不堕恶趣，所以教学相长。此外则一切不闻不问。”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丁卯六十三岁》：“八月，行开院礼，添聘锡邑钱君子泉名基博为教授。钱君博闻强识，品诣亦敦洁英爽。”

王绍曾《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我是一九二七年进无锡国专学习的。当时北伐军到达沪宁，锡沪交通暂时受阻，先生无法到光华授课。因此先师唐文治先生特地邀请先生来国专讲学（后来正式聘请为教授兼校务主任），先生慨然应允，为我班授课。锡沪交通恢复后，先生照例于星期五下午回无锡。

当晚来校讲课两小时，星期六上午再讲两小时。从此往返锡沪，风雨无阻。虽然旅途劳顿，而先生讲课声若洪钟，毫无倦容。当时锺书先生弟兄俩和先生从子锺韩、锺汉，都还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星期五晚上的两节课，他们都跟着先生来随堂听课。先生在国专讲课，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前夕。我在国专三年，听先生讲过三门课。一门是正续《古文辞类纂》，一门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另一门是目录学。这三门课程对我来说，终身受惠无穷。”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钱氏博览群书，精汉学及古文，好学不倦，著作等身。曾开过多门专业课，如《韩昌黎文》、《文史通义》、《孙子十三篇》、《东塾读书记》等，钱氏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长编》也是当时的讲义。”

九月，无锡国专教授陈柱辞职，聘请冯振继任。冯振主要为学生讲授文字学和诸子文等课程。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六年九月……陈柱尊先生辞职，聘请冯振心先生继任。”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丁卯六十三岁》：“八月……陈生柱尊辞职，改聘门人冯振心名振继之。”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丁卯（一九二七年）……八月，应无锡国学专门学院之聘，赴锡任教，旋兼教务主任。”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冯氏擅‘小学’及诸子学，学识精微，讲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主，自编讲义，依段注并采各家之说，逐字评鹭，对学生通文字训诂之学，裨益良多。冯氏讲诸子，曾开过《老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课，以读原书为主，条分缕析，纲举目明，不故作艰深，不落入琐碎，学生易于理解，便于记忆。”



十一月，聘请钱基博兼校务主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十二月二十三日，唐文治召开无锡国专董事会议，讨论学校扩充计划等事。

《新无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三版《国学专门学院扩充谭》：“学前国学专门学院，自本年七月改组以来，一切行政，大加整顿，并添设课程多门。唐蔚芝氏仍任院长，又聘邑闻人钱基博氏为院务主任兼教授。兹定该院于二十三日由唐院长召集院董俞仲还、钱子泉、钱孙卿、孙隄香、蔡虎臣、顾彬生、邹同一诸君，开院董会议，讨论一切进行事宜，并议决扩充计划。决定添招新生一班，约五十名，于明年一月十五日在该院考试。校舍方面，亦从事刷新，如开辟运动场，装置电话，设置图书室等，均已逐件进行，可于明年开学时实现云。”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一月十五日 and 二月九日，无锡国专前后两次举行招生考试，招收第六班学生四十人。

《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前名国学专修馆）招收新生》（见《新无锡》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第一版）：“本院定于十七年春季招收新生一班，有志来学者，务即依照左列简章来院投考。招生名额：共五十名。修业年限：三年毕业。缴纳各费：每学期学费三十元，膳费三十元，宿费五元，讲义费二元，杂志费一元，课本费约十元。入学时须一律缴清。投考资格：须中等学校毕业、国学确有根柢，或有同等学力，而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考试日期及地址：十七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在无锡学前本院举行。试验科目：普通论文、国学常识。报名手续及日期：报名时须缴报名费一元、四寸半身相片一张，取录与否，概不发还。通函报名，自本日起至考试前一日止，函索章程须附邮票一分。院长唐文治、讲师钱基博等同启。”

《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续招新生》（见《新无锡》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第一版）：“定二月九日上午九时起在无锡学前本院试考，先期报名、索阅章程者附寄邮票一分。再本院旧设函授班，如有志向学者同时报名，此布。院长唐文治、教师钱基



博同启。”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十七年二月，招收第六班学生四十人。”

二月，聘请钱基博为教务主任，冯振为院务主任，高文海（字涵叔，号子愚，一八九二～一九七一）为训育主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按：郑逸梅《艺林散叶》第二六八六则：“唐文治双目失明，书札均由陆景周、高涵叔二人代笔。陆，太仓人，高则高攀龙之后裔。”雨窗《师门五记》一文中曾记高文海时常陪同唐文治巡视学生宿舍：“……有时在自修课完毕以后，忽见唐校长突然从后门进来。他正襟危坐在校长办公室内，通知校工祥金或顺宝，扶持登楼，由丁儒侯或高涵叔两位先生，陪同到每个学生宿舍，按名册逐一点名。他虽双目失明，但听觉极灵。我们见唐校长在大雪纷飞之夜照常亲临，嘘寒问暖，无不肃然起敬，站立着等待点名。在点名过程中，他对学生中的一些问题，无论是教育上的或生活上的，都能及时提出来询问或解答，并耐心听取学生们的意见要求，当场可以解决的便立刻和丁、高两位先生研究决定，否则便记录下来，提交校务会议讨论。”钱基博《潜庐自传》中则记：“……瞻顾朋侪，独多君子。自以为节性之和，不如太仓唐文治；制行之谨，不如同县顾倬、高文海……”

二月，参照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必修、选修学程，实行学分制，务期毕业学生程度与国立各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程度相当，规定三年毕业时必修、选修科至少读满一百二十学分（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三月，中央大学特派汪东宝（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

初，一八八九～一九六六）、王澐（字伯沆，一八七一～一九四四）等来锡调查无锡国专办学状况。在他们回京覆呈的报告中，称“该校办理七年，颇著成效。虽名义屡经改组，而精神始终如一。尤能于经费竭蹶之中，徐图发展；毅力热忱，深堪嘉尚”，“校风质朴醇谨，学生皆守规矩，勤心学业”，“值今国学衰微之际，该校独以此为揭橥，似当加奖勉，用为倡导。应请准予立案，并飭令随时扩张改缮，以期益臻完全之域”。

《国学院名人演讲》（见《新无锡》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第三版）：“本邑国学专门学院创办以来，声誉素著。今年扩充学额，益臻发达。昨日南京江苏大学，特委文学院教授王晓湘、王伯沆、汪旭初三君，来锡至该院调查，并由该院敦请于三日下午演讲。又前任教授陈柱尊氏亦定于是日由沪来锡，莅院演讲公羊哲学云。”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四月，中央大学特派汪旭初（东宝）、王伯沆（澐）两先生调查本院状况，回京覆呈，极称办理完善。”

《抄录中央大学视察员王、汪二君报告书》（民国十七年四月，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关于中央大学视察员报告书、毕业生状况调查表、毕业生任职情况》）：“综观该校办理七年，颇著成效。虽名义屡经改组，而精神始终如一。尤能于经费竭蹶之中，徐图发展；毅力热忱，深堪嘉尚。院长唐文治为东南耆宿，曾任南洋大学校长。当国学专修馆创办之时，即请其主持一切，递嬗至今，尤资熟手。教务长钱基博及各教授均一时知名之士，其余亦能称职。校风质朴醇谨，学生皆守规矩，勤心学业；校课之余，练习演讲。计先后毕业九十余人，虽所造时有浅深，而大致均能成就。所刻文集暨讲演集，亦斐

然足备观览（附送一份）。值今国学衰微之际，该校独以此为揭橥，似当加奖勉，用为倡导。应请准予立案，并飭令随时扩张改缮，以期益臻完全之域。”

按：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原国立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的其他八所专科以上的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至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再至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江苏大学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由于短时期内的数度易名，所以上引文献中有“江苏大学”和“中央大学”的不同称呼。又一九二七年六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决定由江苏、浙江两省试行，各省区设立一所大学，并统管全省教育，故对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办学状况进行调查的人员，由中央大学派出。

六月，增设国技选科，聘请徐震（字哲东，一八九八～一九六七）教授，并举行全体早操，练习弹腿、八字弓两项（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按：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中，“弹腿、八字弓”作“潭腿、八段锦”。

五月二十七日（农历四月初九），无锡国专院主孙鹤卿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唐文治《孙君鹤卿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而其有功于名教者，尤在办国学院一事。自欧风东渐，士夫糟粕五经，弁髦六艺，以为不足复存，君独慨焉忧之。会钱唐施君省之创设国学专修馆于惠山之麓，延余主讲，然退息无居。君爰度金匱县学旧址，修复明代尊经阁，别建斋舍，俾诸生迁徙其中。越三载，施君以事中辍，君遂主董院事。尝从容为余言：‘迩来正道沦胥，燕朋逆师，燕僻废学，

风纪荡然，伊于胡底？幸赖吾院为一线之绵延，学者尚知孝悌亲师之谊。十年而后，庶几其有豸乎？’越一载，齐卢难作，黄舍飘摇，君在沪，书来谓：吾侪宜茹苦含辛，维持终始。又越二载，余以忧患余生，屡思退老。君蹙然曰：‘公尽心力，我尽财力，患难相依，彼此幸弗渝也。’余感其言，爰请同邑钱君子泉以为辅。由是风雨晦明，弦歌不辍。吾数人者，心相印而道相同也。君体素羸，患咯血症，比岁学静坐法，得专气致柔之旨，体稍稍健矣。今年春，遭仲兄之丧，抱痛鹄原，悒悒时有所感，竟于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婴肺炎病卒，享年六十有一。”

钱基博《孙先生鹤卿纪念碑文》：“无锡国学专门学院院主孙鹤卿先生既歿之一岁，而图之府式，观于厥成，太仓唐文治乃仪厥形，以瞻多士，曰‘院主孙先生纪念之象’，俾芳烈奋于百世，令问显以无穷。而诏辞基博以文于石，曰：先生孙氏，讳鸣圻，鹤卿其字，无锡人……无锡国学之有专院，始基之以属文治者，钱唐施公省之，而实恢宏于先生。相邑文庙之东，是经是营，筑阁五楹，以为院宇焉。颜其额曰‘尊经之阁’，昭其旧也。燕居之室，诵讲之堂，寢宿之馆，至于庖□库廡，各以序为。施公既世患而以谢不敏，先生则悉力自任，世德如毁，弗震弗渝，诏于文治曰：公播其教，吾输其贿，斯文一脉，唯力是视。前后八年，所费累巨万不啻。文治老矣，亦唯先生之董督，罔敢以自惰弃。考览六艺，收朋勤诲，诸生赖焉。用祛其蔽，将拯文武之方坠，延微言于已绝，昭德塞违，以征将来，先生之教也。如何灵祇歼我，哲人末命之日，遗诰所亲曰：吾生裨赞，都关公益，凡所瞻继，宜如余存，而国学院安居其一。於戏！音徽未沫，其人已亡，诵孝标之言，君子所为，薄言永叹者已。享年六十有一，以中华人民造国之



十七年，岁在戊辰夏四月九日卒。凡我同仁，永怀哀悼，靡所置念，乃相与惟。”

六月，中央大学院（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更名而来）特派俞复至无锡国专，监考三民主义，学生全体应试并均及格（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及《国专校友会集刊·本校大事记》）。

六月，举行第四班第四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丁汉英、王树槐、周昶旦、周达泉、徐乃昌、徐友三、柴寿煦、崔履宸、章鹏若、张惟明、许岱云、路式遵等十二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

八月，招收第七班学生五十人。因校舍不敷，租借四郎君庙为校外宿舍，共住三十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九月，大学院特派柳诒徵（字翼谋，一八七九～一九五六）、薛光铸（字颂华，生卒年不详）来无锡国专进行调查，报告“条例符合、成绩优良”，即于九月二十日批准立案。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九月，大学院特派柳翼谋（诒徵）、薛仲华（光铸）两先生来院调查，报告‘条例符合、成绩优良’，即于九月二十日批准立案。”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戊辰六十四岁》：“国学院具文请大学院立案，迄未覆准。至九月间，派丹徒柳君翼谋、无锡薛君颂[仲]华来院调查，二君回京报告，谓本院成绩斐然，办理完善，旋奉大学院批准立案。”

《中华民国大学院训令（第六八七号）》（中华民国九月二十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呈请立案的报表、公函和

上级准予立案的训令、公函》):“……查该学院前经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转呈请准立案,复经本院派员实地调查,认为与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尚属符合,应即准予立案。惟该校经费颇欠充足,应速筹基金,以期学校经济基础之巩固。”

按:《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呈请立案的报表、公函和上级准予立案的训令、公函》中尚有国立中央大学致无锡国专的公函,内容与大学院训令基本相同。

陆振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报批校董会,八月六日,大学院核准。随即申报国学院事。九月初,大学院先后特派王濬、汪东和柳诒徵、薛光琦来院调查,极称办理完善,成绩优良。于九月二十日,大学院批准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立案。既经政府批准立案,当然就得按照法令,将学校的机构和教学的体制作调整和改变。专修馆时只有馆长、教习、助教和事务人员数人。而国学院则设院长和教务、总务等职员。教员又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称谓。”

按:上引陆振岳文中记“九月初,大学院先后特派王濬、汪东和柳诒徵、薛光琦来院调查……”,实际上,王濬、汪东来无锡国专调查是在本年三月,已见前文。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〇年,国民党的大学院特派柳诒徵、薛颂华两位来校调查。他们调查得很细,还提出了改进意见,对在校学生进行了甄别考试。他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学生集中在大礼堂作文,限三小时完成(用毛笔将文卷卷就)。这一方式类似一次作文竞赛,对国专学生来说,准时完卷没有什么困难。柳、薛两位向大学院报告:‘办理完善。’当年九月二十日批准立案,奉教育部令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一校名沿用了十九年,直到苏南、上海解放。”

按：上引黄汉文文中记大学院特派柳诒徵、薛光铨来无锡国专调查事在一九三〇年，并称“当年九月二十日批准立案，奉教育部令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此说有误。柳诒徵、薛光铨来无锡国专调查办学情况及学校被批准立案均在一九二八年；而由“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再度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则是在一九三〇年初，事详一九三〇年中所记。

又按：关于无锡国专更名呈请立案、中央大学及大学院屡次派员来校调查、进行甄别考试的背景，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一书中曾有阐述：“就在国专改名国学专门学院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即决定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及教育行政机关，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的任务是‘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自是而后，开始了国民政府初期的教育变革，尤其是对时人所谓的学校教育事业办理的‘六滥’进行清理和整顿（作者原注：所谓‘六滥’，即：‘一、学校滥；二、办学之人滥；三、师资滥；四、教材滥；五、招生滥；六、升学滥’——参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十六页），同时借机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控制，以此稳定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社会基础。身为私立学校性质的无锡国专，自然被排入接受检查的队列。”于是有本年度中数度派员来校调查、进行甄别考试，而在这几次“业务”和“政治”检查均告顺利通过后，“学校被最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立案，不仅表明无锡国专自是成为国家政府承认的正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为随后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国专再度更改校名埋下了伏笔”。

九月，教授徐震、职员沈炳焘辞职，聘请徐景铨（字管略，约一八九六～一九三四）、孙家复继任。同月，聘请刘觉



民（生卒年不详）任党义教授，侯敬與（名鸿钧，字敬與，以字行，生卒年不详）任国技教授（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按：据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徐景铨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国文学史、历代文评、散文选等。

十二月，无锡国专董事会添聘经济董事十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一月，董事唐保谦等提议在无锡国专宿舍后空地上建造图书馆，请程炳若总理其事；遵照孙鹤卿之遗嘱，将帮助无锡国专三年之经费共六千五百元，移作建造图书馆经费（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一月，专门刊载无锡国专教师论著的刊物《国光》第一册出版。

《国光》第一册发刊词：“姬周以降，诸子瓜离，百家杂出。识大识小，同源而异流。其大至于弥六合、穷天地；其小者一名一物，辨析至于极微。迁流递变，不可究极。而得其真者，虽大小万殊，其要归皆一于道，而以辅世长民。顾物穷则变，积渐然也。海通以来，欧化东征，曲学小生，见异思迁，自轻家丘，以为弗如。昧昧我思，传不云乎：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风徽未沫，典籍犹存。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敝院同人，古训是式。读书以谋救国，斯文薪延一线。并出刊物，用存坠绪；季出一册，颜曰《国光》。虽夏声不振，师法式微，操钟鼓以飡爰居，冠章甫而入被发。或招违俗之讥，岂望移风之效。然披条索贯，董理秘文，亦欲以知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观国之光，普炤大千。虽曰未能，愿从事焉。发聋振聩，析理成论，弥纶群言，推见至隐，辑《通论》第一；治学之

要，观其会通，其次致曲，即异见同，辑《专著》第二；一命文人，便无足观，言之无文，行远亦难，辑《文苑》第三；随记所闻，不名一家，小道可观，岂曰语夸，辑《丛谈》第四。”

按：《国光》第一册，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编辑兼发行，无锡锡成公司印刷，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此刊由“通论”、“专著”、“文苑”（分“文录”、“诗录”两类）、“丛谈”等栏目构成，所收皆为无锡国专教师的作品。据《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载，此刊印行后，“一时风行”。又据上引《发刊词》，原计划“季出一册”，但出了第一册后便告中辍。

二月二十七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钱基博、孙家复、钱孙卿、俞复（钱孙卿代）、程炳若、蔡兼三、荣德生、唐保谦（唐星海代）。会议主要讨论审核本学年全年预算、本学年第一学期决算及起草校董会章程等事（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二月，奉教育部令，核准补助无锡国专经费，每学年洋三千元（据《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

四月十七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顾倬、华绎之、钱基博、顾宝琛、孙家复、俞复（钱基博代）、钱孙卿、邹家麟（钱孙卿代）、蔡兼三（华绎之代）、蔡其标（孙家复代）、唐保谦（唐星海代）、程炳若等人。会议主要讨论教育股董事照章改选等事。在此次会议上，议决停止寒假时招生，以后每年暑假时招生一次（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会议》）。

四月，举行图书馆奠基礼（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四月，遵照教育部通令，增加军事训练，聘请史渭清

（生卒年不详）为军事训练教授（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约在六至七月间之某日，唐文治召集学生训话，教诲学生说：“学问必本之性情，然后可谓真学问；经纶必根之德行，然后可谓大经纶。”“故余望吾学子，学先敦品”。

王淞涛《唐蔚芝先生训话》（见《新无锡》一九二九年七月四日至五日第四版）：“国家兴亡，系乎学术；学术盛衰，系乎教育。时至今日，人心不古，世风愈靡，竞尚浮华，不敦名实。至今学者，亦惟驰骋于名利而已，而知究圣贤之学者，至寥寥也。廉耻之丧亡，四维之不张，争攘杀夺，骚扰不宁，有以也乎。唐校长有鉴于此，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故大声疾呼，提倡道德，唤醒青年，以冀挽回于万一，此天下哀斯下民，愁遗一老也。月之某日，校长莅校训话，其言曰：‘学问必本之性情，然后可谓之真学问；经纶必根之德行，然后可谓之大经纶。言之非艰，行之惟艰。望吾学者，速留意焉。否则，穷则言行不足以为师表，达则经术适足以误苍生。故余望吾学子，学先敦品，在校敬师长，爱同学，为敦品之学生；在家孝父母，敬兄弟，为敦品之子弟。如是方不负人之所以为人耳。吾校之学生，能重廉耻，守礼义，此余之志也，望共同努力，行之不怠。’唐先生之心，可为苦矣。唐先生是与人为善，乐育人才也。呜呼，行道如斯，而知从游者几人乎？虽然，欲救中国，厥惟如是。然民困而不知救，国耻而不知雪，推其原故，人于学业时，不敦品行之所致也。抑唐校长有鉴于此，而谆谆忠告、善导吾辈乎！观夫古之扬雄，以文章名世，不免失身于新莽；蔡邕以旷世逸才，终至屈节于权奸，所谓学有余而品不足也。后人读史至此，有不为之长叹息者耶？故学者之于敦品，可不努力乎？语云：细行不矜，终累大德，信

哉！余故记唐校长之训话，藉行以自警惕也。”

七月二日，曾以十三岁之幼龄在无锡国专就学的王鸿揆（字蔚人，一九〇〇～一九二九）因病去世，唐文治为作《王蔚人哀辞》。王鸿揆是唐文治早年的老师王祖畬之孙、无锡国专职员王保懃之长子。

唐文治《王蔚人哀辞》（见《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蔚人姓王氏，名鸿揆，吾师文贞公孙，世弟慧言君长子。生幼聪颖绝伦，议论踔厉，有昂头天外之概。每问一事一理，必穷之至乎其极，虽博通者，或不能答。余大器之，以为庶几绳武吾师。岁壬戌，余创立国学专修馆于无锡，生以十三龄童子来列旁听席，文理浚哲，特补正课生。后入省立太仓中学，试辄冠其侪……乃生遽于今年五月病，于七月二日卒，得年才二十。”

八月，冯振致函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陈中凡（原名鍾凡，后改名中凡，字觉元，号斟玄，一八八八～一九八二），邀其来无锡国专演讲。

冯振致陈中凡函（见《陈中凡年谱·一九二九年》）：“斟玄先生道鉴：前日至暨南奉访，适值大驾公出，未获领教，至怅至怅。本期承惠允来锡讲演，莘莘学子，得藉裁成，同深纫感。惟演讲时间以星期几某时至某时最为适宜，乞即赐示，俾便排定上课时间表。无任盼祷之至。专此，敬叩道安！晚冯振再拜。八月廿七日。”

按：接此信后陈中凡是否即来无锡国专演讲，不详。

八月，招收第八班学生五十六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考入第八班的学生中有郭影秋（原名玉昆，曾名萃章，一九〇九～一九八五）。但他在无锡国专学习未满一个学期，

便因家中经济困难、无力缴付学费而中途辍学。

郭影秋《往事漫忆》：“……路上坐在敞篷车厢里。乱糟糟的，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的，大多数是逃荒的难民。我蹲在一个角落里，思索着：到江南后，究竟怎么办？突然，在火车上碰见了几个同学，其中有砚山的，有沛县的，也有睢宁的。相互交谈后，知道他们原来是到无锡去报考无锡国专。他们了解到我尚无固定打算时，便一个劲地动员我也去考无锡国专。我说没有毕业文凭，他们说这容易，他们随身带有空白文凭，说着就送给我一张。这些空白文凭是江苏第十中学发的。原来这个学校当时也闹了学潮，学校无法继续上课，因此毕业班未经考试，每人发一张文凭，他们多拿了几张。和这几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不感到孤独。他们再三动员我去考无锡国专，我本来就想读书，又念过六七年私塾，上国专也对路子，现在正没有去处，何不索性去试考一下。不料，到无锡报考之后，竟然被录取了，而且名列前茅……一九二九年暑假后，我进入无锡国专……但是，第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我突然接到父亲来信，大意是说：为了供你上学，家中的耕牛和大车都卖了，现在连地都种不上了，再也没有弄钱的门路。从家里说已无钱供你读书，你自己有办法弄钱就读，没有办法就再找出路……万般无奈，我只好忍痛再离开无锡国专，又一次中途辍学。”

按：据同书记载，郭影秋从无锡国专退学后，因也是地处无锡的江苏教育学院“属师范性质，不仅管伙食费、书籍费，还发寒暑假回家的路费”，便经一个阶段的复习后去投考该校，并于寒假后被录取。

九月初，聘请单镇（字束笙，一八七六～一九六五）为教授。单镇为学生讲授《诗经大义》、《史通》、《东塾读书

记》、《杜工部诗集》和《国文大义》等课程；唐文治并以所编定之《诗经大义》授之，请其采择传笺，别作注释。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己巳六十五岁》：“是秋，请苏州单君束筮名镇为国学院教授。余以《诗经大义》授之，请其采择传笺，别作注释。”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民国十八年己巳》：“五月间，唐蔚芝先生派陆景周兄持函来苏，约余暑假后赴无锡任国学院教授。余以释褐以来簿书期会，奔走驰驱忽忽二十余年，有学殖荒落之感，无锡国学院人才济济，根柢深厚，实在未敢担任，一再力辞。景周兄切囑往锡晤蔚老一谈，以慰廿年阔别之思，爰订于秋凉赴锡。九月初，赴无锡谒见唐蔚老，纵谈竟日，抚今追昔，不胜沧桑之感。余力辞教授一席，蔚老以旧雨重逢极为难得，谆囑相助。余情不可却，允试办三月。爰分得《诗经大义》、《史通》、《东塾读书记》、《杜工部诗集》，兼课丁班《国文大义》。每两星期课以作文，批改课卷一百六十余本。星期六旋苏料理家务，星期一去锡授课。时院中同事钱基博、冯振心、徐管略、朱叔子、陆景周诸君子，课余互相讨论，颇饶兴趣。《诗经大义》，蔚老编定篇目，以孔门之教学《诗》，曰：‘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多识而已。事君事父，伦理学也；可以兴可以怨，性情学也；可以观，政治学、农事学、军事学也；可以群，社会学也；多识，修辞学也；伦理性情之精微，义理学也。’于是分选诗篇伦理十六篇，性情十六篇，政治十六篇，社会十六篇，农事六篇，军事十五篇，义理十篇，修辞八篇，囑余分期演讲。余为之采择传笺，别作注释，每篇后标明诗旨，简要可诵，颇为精核。分列八卷，冠以纲要一卷，计九卷。教授诸生，均能领会，蔚老大加称赏，嗣后由金山高吹万君燮印入《葩庐丛书》。”



九月，军事训练教授史渭清辞职，聘请蔡莘耕（字味畲，生卒年不详）继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九月，无锡国专图书馆落成（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十月，由北平、太仓两处先后运来图书一万五千册，连同原有图书六千册，移藏至新建图书馆。本月十日上午，举行图书馆落成典礼，来宾孟宪承（字伯洪，一八九四～一九六七）、廖世承（字茂如，一八九二～一九七〇）在典礼上演说，下午开游艺会。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己巳六十五岁》：“九月，国学院图书馆告成，行落成礼。是馆为本邑孙君鹤卿遗命捐建，院董蔡君文鑫兼三、宗侄炳源、星海等竭力赞成。共费六千五百元。亲家陆君勤之捐书一万五千余册，元明精本甚多，约共值二万数千元，可感也。”

鼎龄《唐文治和陆氏三兄弟》：“学校建造图书馆，陆勤之个人就捐赠书籍一万五千册，其中大多为明清精本，当时就价值数万元。”又：“后唐先生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按：指陆修瀛）的二兄陆勤之赶赴京师，为学校购买了大量书籍，他又为唐先生悉心整理编纂目录，转运江南，为唐先生在无锡建校出大力。”

《国专校友会集刊·大事记》：“十八年十月，图书馆落成。太仓陆勤之先生设法将前北京国学专修馆总馆历年收藏暨家藏旧籍，前后捐存一万五千册，连同本院原有图书六千册，移度新建图书馆，双十节举行开幕典礼，来宾孟宪承、廖茂如两先生俱演说。下午开游艺会，来宾称盛。”

《国学院图书馆定期开幕》（见《新无锡》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第三版）：“学前街国学专门学院，自经教育部批准立

案以后，气象日新。本学期学生增至一百六七十人。院长唐蔚芝，每日莅院主讲，教务主任钱子泉、院务主任冯振心相助为理，学务更见完善。顷闻该院新建图书馆，系已故院主孙鹤卿先生遗嘱，独立捐造，现已落成。又该院前存北平及太仓书籍多种，亦经前后运到，特定双十节上午举行落成典礼，欢迎各界前往参观。下午表演各种游艺，藉助余兴。惟因礼堂座位无多，概须凭券入场，以示限制，届时当必有一番盛况云。”

十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训令与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称“查该校名称组织与新颁大学及专科学校组织法暨规程，均有未合，应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大学规程关于专修科之规定办理，以符名实”（见《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奉部令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对私立学校调查的公函、报表和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训令、指令、公函、批文·教育部训令》）。

十一月二十九日，无锡国专备文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称本校正在“积极筹备，拟遵照部令，颁发规程，改为独立学院”。

《呈教育部》（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奉部令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对私立学校调查的公函、报表和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训令、指令、公函、批文》）：“为呈复事：窃敝院……于十月二十九日奉钧部第一二四六号训令……自应遵照办理，以副飭令。惟敝院年来力图进展，除添招新生，增加班级数外，本年并新建图书馆，最近又利用文庙扩充校址、建筑校舍，以为分增学科、学系之准备。自奉前令，益积极筹备，拟遵照部令，颁发规程，改为独立学院。而在院及毕业离院之学生，亦迭开全体大会加以敦促，且愿分途募捐，竭诚援助，师生一致，通力合作，目下正



在进行中，未便中途停顿，致阻院务之新机，有负学生之颀愿。一俟组织就绪，当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

十二月五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与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指令称“查大学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该院研究国学，拟改为独立学院，于法殊无根据。仰仍遵照本部一二四六号训令，将该院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符定制”（见《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奉部令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对私立学校调查的公函、报表和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训令、指令、公函、批文·教育部指令》）。

按：十二月三十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下达指令，指令称“兹查本月二十三日该院呈送十八年度教职员及本预科新生又转学生一览表，仍用旧有校名，应即查照本部前令，改正名称，并将参照大学规程关于专修科之规定办理情形呈报备核”。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一月七日，无锡国专备文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称将奉部令，改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切当参照大学规程关于专修科之规定，以符定制。此为无锡国专第三次改名。

《呈》（见《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奉部令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对私立学校调查的公函、报表和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训令、指令、公函、批文》）：“……当即遵照办理，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切当参照大学规程关于专修科之规定，以符定制。惟窃有请者：敝校自开办以来，已近十年，尚为社会所信仰。目前在校各学生及已毕业诸生，均愿改作独立学院，以饜众望。兹事体大，谨拟依照文科教育科规程，悉心筹画，俟定有办法再当呈请指示，以期仰副钧部作人之意……”

按：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到一九三〇年初，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无锡国专为使本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正规体制，为使学校的层次、规格有所提升，以利学校今后有更好的发展，一直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努力。这当中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到一九二八年九月，这是“为使学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正规体制”而努力的阶段。其间无锡国学专修馆先后更名为无锡国文大学和无锡国学专门学院，

成立了学校董事会，参照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必修、选修课程，实行学分制，“务期毕业学生程度与国立各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程度相当”；并先后数次接受了中央大学、中央大学院的派员调查，最终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被批准立案。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一九三〇年初，这是“为使学校的层次、规格有所提升”而努力的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政府暨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接着于八月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和《专科学校规程》，开始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全面调整。根据上述法律文件精神，其时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等三大类。据《大学组织法》第四条和第五条之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又《大学规程》第六条规定：“大学文学院或独立学院文科，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音乐学及其他各学系。”专科学校，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甲类为工业专科学校，乙类为农业专科学校，丙类为商业专科学校，丁类为前三类之外的医学、药学、艺术、音乐、体育、市政、商船及图书馆学等专科学校；每一类均列有‘其他’项，涵括法令规定之外的专科学校。按照这些法令规定，无锡国专应属于私立专科学校之丁类中的“其他”项，所以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训令与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训令称“查该校名称组织与新颁大学及专科学校组织法暨规程，均有未合，应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大学规程关于专修科之规定办理，以符名实”。在接到此训令后不久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无锡国专有一次“抗命”之举，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称本校正在“积极筹备，

拟遵照部令，颁发规程，改为独立学院”，竭力想将学校的层次、规格由“专科学校”提升为“独立学院”。但几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下达指令，严称“该院研究国学，拟改为独立学院，于法殊无根据”，仍命“将该院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符定制”。无奈之下，无锡国专只好上呈表示接受改名的部令。综上所述，无锡国专第一阶段“为使学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正规体制”的努力是成功了，第二阶段“为使学校的层次、规格有所提升”的努力却没有达到目的。学校最终被定位于一所私立的专科学校，这就使学校的发展规模、经费支持等方面都受到不小的限制。

又按：无锡国专被教育部批准立案，并经数度更名后最终定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此过程中，学校在办学宗旨、管理体制、师生队伍和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和专修馆时期相比，也都有了较大变化。在办学宗旨方面，在学校拟定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本校宗旨在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在管理体制方面，一是遵照教育部颁布之私立学校规程，建立了学校董事会，“负经营学校之全责”。据《校董会章程》规定，校董会的职权为：（甲）决定并修正本校组织大纲，（乙）决定本校重大进行计划，（丙）决定校长人选，呈请教育部备案，（丁）筹划本校经常费及基建；（戊）审核本校预算决算，（己）监察本校财产，（庚）议决校长提交之校务会议建议事项；二是建立健全学校行政组织。除了“由校董会推选呈请教育部备案总理全校一切行政”的校长外，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训育处。其中教务主任、总务主任、训育主任分别综理全校教务、总务、训育事宜，并各设教务员、总务员、训育员若干人助理之；三是建立



“教训军合一委员会”、“招生委员会”及“毕业考试委员会”，以加强军事化管理和招生、考试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在师生队伍方面，教职人员由专修馆时期的四五人增加到二十多人，每学年的招收学生人数也比专修馆时期扩大了一倍左右。此外，为了使学校和国家高等教育的正规体制接轨，也为了适应培养现代教育人才的需要，无锡国专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也有了不小变化，如设立学分制，所有课程分成必修和选修两大类，增设了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国学概论、哲学概论、西洋文学史、文艺批评、教育学等许多概论性的课程；作为学校现代国学教育的一贯特色，在整个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中，对国学重要典籍的阅读研修，对文字、训诂、音韵、版本目录等方面的学术训练，仍然占着较大的比重（详见下文所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各学年学科和讲授纲要》）。以上的一系列变化，使得学校从更名、立案后，到抗战爆发前，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各学年学科和讲授纲要》（见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第一学年

学科名称 讲授纲要

必修：

散文选 要求分类选授秦汉以下迄方刘诸家之文，析其体制，明其风格，辨其流派，阐发其谋篇布局安字位句之法，以姚选《古文辞类纂》为主，讲授后以熟诵为要。

国学概论 划分经学、哲学、小学、史学四部。经学述历代经说之异同，哲学论子学、玄学、理学之得失，小学明形声义之纲领，史学辨正史、杂史之义理。

文字学 依据说文五百四十部次第，择要讲授，博采段、

桂、朱、王诸注，及近代钟鼎甲骨之说，以明文字构造及变化之义理，以段注《说文解字》为主。

韵文选 第一学期选授唐人各体诗，别裁伪体，以风雅为归。于李白、杜甫、王维、韦应物、孟郊、韩愈、李贺、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诸家选授较多。讲授时除指出各家不同风格，同时指导学生习作。第二学期选授汉魏以下迄于陈隋五言古诗，使学者由唐人以上溯其源，故于五言初期作品，特详于考证，曹植、阮籍以下诸大家，则明其流变。

文学史 分总论、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近世文学五部，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时代之文学主流，特详加论述，除自编讲义外，以曾毅《中国文学史》作助读本。

选修：

《文史通义》 以章学诚所著为教本。章氏擅长文史，能通其义，于是考鉴流别，辨章学术，以蕲探大道之源。

《论语》 于论学、论政、论仁三大端，剖析源流，以修己为体，治人为用，不尚空谈。

《孟子》 孟子贯串群言，发挥尊民大同之学说，尤注意在剖析义理，警觉良知，兼采眉山苏氏、桐城方氏评语，以为研究文学之助。

按：第一学年课程以教授基础课为主。

第二学年

必修：

散文选 以《经史百家杂钞》为主，去其与姚选重复者。

韵文选 第一学期选授宋诗七百余首，取各家之精粹，足以表明其作风者，对西崑、江西、江湖、四灵各派之正变得失，详为剖示。第二学期讲授七言绝句之方式，凡五十六类，意在使学者神明乎法度之中。



中国文化史 依中国文化变迁之重要关键分三期讲述：
（一）自上古以迄西汉；（二）自东汉以迄明季；（三）自明季以迄现代。明各时期文化概貌，而寻其源委，采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为教材。

（其他如目录学、修辞学讲授纲要从略。）

选修：

要籍解题 四部之学，浩如烟海，毕生精力有所难穷，特精择四百余种加以解题，皆人人必读之书，无泛滥之弊，有事半功倍之效。

性理学 采周、程、张、朱之精蕴，要在崇正学，救人心，明体达用为主。

《昭明文选》 选周秦至齐梁骈俪之文，明其文律，析其体制，通其训诂，观其流变，究其作法，掇其辞藻，以李善注为主，兼修各家之说。

（其他如版本学、音韵学，《毛诗》、《左传》、《史记》、《荀子》、王荆公文等讲授纲要从略。）

按：第二学年课程以治学门径，兼涉各文史领域为主。

第三学年

必修：

哲学概论 分哲学概念之解释、哲学研究之价值，以及方法论、认识论、实在论、人生论等各部分进行探讨。

中国哲学史 分先秦子学、西汉经学、南北朝玄学、隋唐佛学、宋元明清道学、晚清今文经学等六部，明其流变，究其指归。

西洋文学史 分两部分：（一）文学之理论；（二）近代文学思潮。

（其他如伦理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从略。）

选修：本学年选修课程较多，涉及经学的有《礼》、《易》、《书》。涉及诸子有墨、道、法、兵、杂诸家，另有专论史法的《史通》，文论和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诗体批评，溯流别、明源流的《诗品》等课程。

（讲授纲要从略）

按：第三学年课程，以省览我国古代哲学经子为主，兼及其他。

按：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文中所列的上表，源自《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章程》中的《各学年学程学分及纲要表》，并有所缩略。作者在表后又有说明云：“以上是国专三十年代三学年课程和讲授纲要的概况。除此以外，也有因人设课的，如陈衍讲授的《通鉴》，钱基博讲授的《校讎通义》、《东塾读书记》，陈鼎忠讲授的《经学概论》（六艺后论）等，但为数不多。除上述学课之外，第一学年有军事训练，第一、二学年有作文训练，第三学年有毕业论文，都是必修的。”

一月十一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高阳、蔡其标（陆修祐代）、陆仁寿、唐保谦（唐星海代）、钱基博、孙家复、蔡兼三等人。因人数不足，改为谈话会，报告图书馆成立经过及部令学校改名等事（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会议》）。

二月，依据教育部令，利用文庙余屋作为教育产业之用，无锡国专修葺文昌阁及其他余屋扩充校舍，并在无锡县政府教育局备案（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二月，教授单镇辞职，聘请邓揖（字傅若，生卒年不详）继任，又聘请陈兆衡（字湘圃，生卒年不详）为教育学教授



（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民国十八年己巳》：“十一月中旬，余患颈疽请假旋苏，约孙伯南先生往代。余赴博学医院，经美医赵乐文博士用电术疗治，匝月始痊。回家静养，遂函告蔚老，辞去教授一席。”

三月，无锡国专组成篮球队和网球队，参加江苏省运动大会，先后通过第一、第二轮比赛，大会特奖银杯一只、锦旗一面，以资鼓励。

《国专之荣誉 省运动大会得特种奖励》（见《新无锡》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三版）：“学前街国学专门学院，此次参加苏省运动大会，计篮球、网球两组运动员十余人。赴省后，取得先后复赛权。虽在第三次再复赛中，不幸失败，但大会因该校向以研究‘国学’著名，缺乏对于体育之认识。乃此次参加，精神焕发，态度沉毅，一洗‘文弱书生’之旧习，故特奖银杯一只，锦旗一面，以资鼓励；并于训词中训勉该校以后格外将德智体三育，并加注意云。”

六月十四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唐保谦、荣德生、蔡兼三、华绎之、顾倬、高阳（孙家复代）、陆仁寿、蔡其标、孙家复、钱基博、丁彦章（荣德生代）、俞复（蔡兼三代）等人。

《民国十九年六月十四日会议》（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民国十九年六月十四日会议》）：“……议决敦请校长为学校大局计，暂仍继任，以慰全校员生向望之诚，亦请钱子泉先生暂行继任教务主任职务，以佐理校长。一面请校长于组织期中留意好人才，以备将来替人。”

按：据此条记载，当时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和教务主任钱基博都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但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

等书中皆未提及此事，提出辞职的原因不详。

六月，举行第五班第五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丁学贤、王冰川、王正气、王绍曾、王祖荫、方骥龄、孔令焕、朱星元、宋应宏、宋宝书、吴世湛、柳铎、马燮基、倪攀龙、翁以观、许寿平、黄聿祥、张功元、张光昶、张浩镇、冯新异、过瑞炯、邹静九、赵荣长、巢箴、钱锺夏、蒋庭海、蒋庭荣、施闲等二十九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

本届学生中的王绍曾（字介人，一九一〇~二〇〇七）、赵荣长（约一九一〇~?）和钱锺夏（字禹谟，一九〇七~?），毕业后由唐文治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协助张元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至本年八月，钱基博向唐文治建议，将自己的目录学课程由王绍曾代授，并得到唐文治的同意；但王绍曾以自己“学到的一点目录学基本知识非常肤浅”而加以恳辞。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父亲退休后，专心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决定在我家相近的极司非而路中振坊租赁两幢三层楼房屋，设立校史处。校史处有两位负责人：一为汪诒年（号颂阁，一作颂谷，系父亲同年汪康年之胞弟），杭州人。另一位蒋仲第，苏州人。校史处初创时，需要年轻的编校人员，父亲即致函壬辰同年唐文治（蔚芝）。蔚丈介绍本届无锡国学专修馆优秀毕业生王绍曾（二十岁，江阴人）、赵荣长（二十一岁，江阴人）、钱锺夏（二十一岁，无锡人，钱基博之侄）来沪参加工作。校史处于一九三〇年八月正式成立，全处共有十二三人。不料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全部毁灭。当时称为‘一·二八’事变。二月，商务全公司宣



布停业，校史处也不得不撤销。然而父亲不愿让编校全史的工作就此中止。经与商务当局磋商之后，决定将中振坊房屋退租，裁减人员。王、钱、赵三位辞退，每人发给三个月遣散费。”

王绍曾《唐蔚芝师对我一生的影响》（见《国学之声》一九九五年第四期）：“我是一九二七年二月考进国专的，那时还叫无锡国学专修馆，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风暴，当年九月复校，改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继续在校攻读，直到一九三〇年七月毕业。由于唐师的提挈，介绍我和同学钱锺夏、赵荣长一起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协助海盐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一九三〇年八月，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工作时，钱子泉师因为十分欣赏我的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建议唐师把他的‘目录学’课由我代授，唐师完全赞成，而且已征得了张元济先生的同意，让我每周五回无锡授课。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坚决不敢接受。我的理由是：自己年方弱冠，学到的一点目录学基本知识非常肤浅，怎么敢擅登高等学府的讲台。为这件事，我专程回到无锡向唐、钱二师解释。唐师诚恳地对我说，当年他官外务部庶务司主稿时，每八日须进大内一次。见各堂官呈递奏牍要电，每次都拿一大包袱，离开大内时又带回一大包袱，工作极其复杂而辛劳，但他处理得井井有条，加深了阅历，为后来升迁郎中、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奠定了基础。唐师着重谈了他自己的体会，治学处事都得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以此来勸勉我，策励我。尽管最后唐师接受了我恳辞的意见，这种亲切的教导，对我来说，还是一生受用不尽。”

本届学生朱星元（又名朱星，一九一一～一九八二）所撰的《中国近代诗学之过渡时代论略》一书于毕业前夕由无

锡锡成印刷公司印行。

按：《中国近代诗学之过渡时代论略》，无锡锡成印刷公司印刷，一九三〇年一月付印，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全书分三部分：一为“绪论：何谓过渡时代”（一、过渡时代之定义；二、中国文学之过渡时代），二为“本论”（一、中国近代诗学过渡时代之人物；二、及其评论），三为“结论”（一、当时之所谓新学之诗；二、及其特采与流弊）。

七月，陈中凡应邀担任无锡国专特别讲师，于本年下学期中每月到校做讲座两次。

《陈中凡年谱》：“（一九三〇年）七月，应无锡国专唐文治校长函聘，兼任该校特别讲师。”

唐文治致陈中凡信（见《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斟玄仁世兄先生大鉴：敬启者，敝校办理国学，亟赖名硕倡导，发扬光辉。台端为学界泰斗，陶铸群伦，万流共仰。前托陈柱尊君代陈鄙悃，敦请高贤为敝校特别讲师。荷蒙金诺，允于下学期每月莅临讲座二次，曷胜欣慰。讲题请每届先期示知，以便公布。每学期薄奉车费捌拾元，戈戈不腆，仅资膏秣，主臣无任，并希示复是幸。专肃奉订，敬颂 教绥！弟唐文治谨启 七月二十一日”

唐文治致陈中凡信（见《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斟玄仁世兄先生大鉴：日前接奉惠复，承示讲授科目大纲，曷胜感佩。本校系于九月一日开学，三日正式上课。大禘定何日莅锡，敬祈先期示知，以便传知各生等一体周悉，尤深感盼。专此奉布。祇颂 教绥！弟唐文治谨启 九月五日”

按：唐文治写这两封信之前，于七月十日已先有一信致陈中凡，信云：“斟玄仁世 [兄] 先生大鉴：久未通函，敬惟起

居万福，驰念无任。敬有愚者，叶君长卿，品端学博，为吾兄所稔知，现在本校教授，入不敷出。台端太邱道广，可否仰仗鼎力，设法谋一兼职，大约功课任六七点钟，月薪自七八十元至百元，当可敷衍矣。不情之请，务希鉴谅。附寄本校简章八份，乞代宣传。倘有性近国学如张联芬其人者，极所欢迎也。临楮拳拳，敬颂 教绥！弟唐文治谨启 七月十日 章程另邮。石遗先生任贵校特约讲师，欣慰之至。本校亦已敦请，惟将来是否住贵校，便中祈示知为荷，又及。”此信中提及三事，也都和无锡国专有关：一是本校教授叶长青，因入不敷出，想请陈中凡为之设法谋一兼职；二是随信寄出无锡国专简章八份，请陈代为宣传，“倘有性近国学如张联芬其人者，极所欢迎也”（张联芬，字敦品，是无锡国专第七班学生，一九二八年八月入学），据唐文治信推测，张联芬当初投考无锡国专，或亦经过陈中凡的介绍推荐；三是陈衍当时任陈中凡所在的暨南大学的特约讲师，而“本校亦已敦请，惟将来是否住贵校，便中祈示知”。由最后一事可知，无锡国专最迟于本年七八月之前，便已和陈衍有联系，请其来校任教。

八月，教授朱文熊、邓揖、陈兆衡辞职，聘请叶长青（字俊生，又字长卿，一九〇二～一九四八）、陈邦怀（字保之，一八九七～一九八六）继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叶长青主要讲授韵文、《文心雕龙》、《诗品》等课程，陈邦怀与后来到无锡国专任教的杨铁夫也先后讲授过中国韵文选、《诗品》、《文心雕龙》等课程（据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

八月，招收第九班学生八十人，第一学年分甲乙两班教授；并决定以后一年级学生人数如超过五十人，均分班教授（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八月，无锡国专第一届毕业生戴恩溥因病去世，后唐文治为作《戴惠苍哀辞》。

唐文治《戴惠苍哀辞》（见《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戴生恩溥，字惠苍，江苏太仓人也，世居璜泾镇河北街。父国钊，博士弟子员。生幼体羸弱，性聪慧幼学。年十八，来应无锡国学专修馆试，礼貌恂恂，发问中理，崭然见头角，余深器之。既甄录，询其所学，则对曰：好读理学书。余大喜，授以桴亭先生《思辨录》等籍，且告之曰：吾乡陆、陈、江、盛四先生学术衰落久矣，子其勉之。当是时，余访求宝应朱止泉、王白田两先生所评《朱文公集》，遣生偕同学数人同往钞录。生遂购《朱子大全》，别自临钞，丹黄满纸，时值盛暑，流汗霖霖，锲而不舍。旋余复为介绍受业苏州曹叔彦先生肄业，习士礼。逾年，又叩其所学，则对曰：生读理学书，如前曾熟读者，不啻若自其口出；旁涉他籍，则未能也。余笑曰：子殆有夙因耶？甲子冬，生毕业归，音问遂隔。庚午秋，忽同学相告，生以八月死矣，年仅二十有六。余大惊悼……方生之将终业也，会齐燮元与奉军构衅，苏锡二百里之间，蜚雾横空，惊霆不测。生方在苏谒曹先生，徒步百里返锡，行休业礼。又徒步数百里反太，自甲子十二月中旬至乙丑正月之杪，雪虐风饕，流离颠踣，始克抵家。惟时先大夫疾大渐，文治料检医药，惶急万状；既而春晖遽陨，衔恤鲜民，家国桑沧，遂不得与生活别，言念及此，不禁涕泪之浪浪也……”

按：上文云“甲子冬，生毕业归”，甲子年为公历一九二四年，戴恩溥应为无锡国专第一班第一届毕业生。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的第一届毕业生和已故毕业生名单中皆无戴恩溥之名，未详其故。



九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的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应无锡国专之邀请，来校演讲《中国田赋》。

《中国经济学社第七届年会余闻》（见《锡报》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马寅初博士，昨日上午，应事前国学专门学校之邀请，至该校演讲‘中国田赋’，讲词异常精辟。”

按：中国经济学社第七次年会于本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无锡举行，马寅初是在本次年会结束的次日，受邀到无锡国专做演讲的。又据朱彬元、许师慎《中国经济学社第七次年会纪录》，九月二十二日晚七时，无锡国专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无锡中学、无锡县教育局等十二团体，在无锡饭店集体设宴欢迎年会社员。

十一月，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成立。

《国专成立学生自治筹备会》（见《新无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版）：“学前街国学专门学校，近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对于青年男女，今后应竭力作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欲达此目的，则各校学生自治会之组织，实属刻不容缓。但查各地中等以上学校，有学生自治会者，尚未普遍。倘秋季修学期间一过，则又须待明年春季始能组织，蹉跎延误，殊属非是。故最近由县党整会、民训会层转公函并组织大纲等到校，并派邱有珍（该校党义教授）为指导员，昨日下午四时，举行筹备会，起草章程草案，呈请本地党部备案，定下星期五开会成立云。”

《国专学生自治会成立》（见《新无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三版）：“本邑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近依教育部专门以上学校规程，组织学生自治会，业于上月念二日由县党部

派邱有珍到校指导，召集全体大会，讨论会章，当经选举张联芬、李怀青、薛宗元为干事，文书股赵大观，庶务部郭则澍，会计股吴毓麟，卫生股李元楼，研究股魏守谟，出版股陈学东，体育股陈震，游艺股冯拔。并闻该会已呈请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及县政府备案。”

按：上述名单中，“薛宗元”当作“谢宗元”。

吴淞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在国专的整个学生管理环节中，学生自治委员会（以下简称学自会）的建立和运作也颇有特色。校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和组成，均由学生在校训导处的指导下组织进行，每届任期仅为一学期。学自会于每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下旬举行大会，推选出新一届的学自会。其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执行委员会’（曾名‘干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事务部、常务干事、学术部等，其中事务部由卫生股、庶务股、会计股和文书股组成。学术部一般分为游艺股、出版股、研究股、体育股等，由各股招集相关人员，制定工作计划，分头实施。监察委员会下设文书股、常务委员和审查股。由于国专的学生不少在入学前已颇露才华，有的还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在学校或政府部门任职多年。不少人在入学前曾当过中小学校长，甚至教育局长，本来就有相当的办事能力。因此，让他们通过自治会的方式，自己组织、协调和发动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演讲、参观、集会和娱乐等活动，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参与学校事物的积极性，同时也由于学自会更新换届快，内部组织多，参与面广，使相当一部分同学的社会活动能力由此得到相应的锻炼，增强了自强自立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与唐文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社会活动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

十一月二十二日，唐文治应无锡县立初中校长之邀请，前



往该校演讲读文法，无锡国专学生八十人随行旁听。

《县初中敦请唐蔚芝先生讲学》（见《新无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三第三版）：“耆老唐蔚芝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道德文章，世所推重，热心教育，启迪后进，不余遗力。除担任国学专修学校校长日常讲学外，更无余暇应外界请求讲演。近以县立初中秦校长为注重国学起见，再三躬请先生莅校演讲。先生素以提倡国学为心，慨然应允。昨日上午十时，亲莅该校演讲读文法。同时国学专修学校学生随行旁听者八十余人，合计两校师生济济一堂者有五百余人。每人各发讲题一份，题为《诸葛武侯〈前出师表〉》。先就文理文情立论，引入文法，大致谓读法有五：曰急读、缓读、极急读、极缓读、平读；音亦有五：曰长音、曰短音、曰轻音、曰高音、曰平音；气分二：曰急、曰徐。初学读文，首宜体会神、气、神、情四字，以翕如、纯如、噉如、绎如形容文之神情，以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形容文之结构，而归本于浩然之气。然后就武侯身世立论，以先帝为干，以尽忠为骨，阐发尽致，声韵铿锵，听者忘倦，殆诚能体会精神教育者。至十二时始散。”

本年中，无锡国专国术教授侯敬舆写成《国术进化概论》一书，请唐文治作序。唐文治在序中，回顾了他先后执掌南洋大学和无锡国专校政时，一贯注重国术教育的做法，并寄望同学“恪遵师训，以道德为本，奋迈往之气，具贞固不摇之精神，始终勿懈，以达保身、保家、保国、保民族之目的”。

唐文治《国术进化概论序》（见《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曩者长南洋大学，提倡军国民教育，拳术一科，初延少林派某僧充当教练，未几因事他往。爰在精武会聘有善国术者山东刘氏震南父子，同学狂喜，曾辟雨中操场为表演

所。每忆夕阳在山，人影匝地，分组锻炼，达二百余人。当其精神焕发，则熊经鸱顾，虎视鹰瞵，时而踉跄腾跃，辟易千夫，尘埃四起，吼声若雷，草木为之震动。用是造就者实繁有徒。事越十余载，犹历历在心目间也。比年余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仍复提倡国术，聘吾邑侯君敬舆为教师，盖医师而擅国术者也。训练之方，忠实精勤，诸生翕服无间言。近编《国术进化概论》一书，赏稿征序于余。披览数过，源流毕贯，洞明趋势，嘉惠学子，足资圭臬。今年六月，吾校举行第五屈[届]毕业，考核成绩，则有翁生以观、许生寿平、张生浩镇、钱生锤夏、冯生新异、巢生箴、张生光昶、王生祖荫诸人，技艺娴熟，均有可观，皆出自侯君训练之功也。自兹以后，惟望诸同学，恪遵师训，以道德为本，奋迈往之气，具贞固不摇之精神，始终勿懈，以达保身、保家、保国、保民族之目的，余当拭目以俟之。”

按：《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刊载侯敬舆《国术进化概论》一文，全文共分四节，分别为：原始之武术、古代之武术、中古之武术、近代国术之趋势。又上海大东书局一九三五年出版吴志青、侯敬舆等编撰的《国术理论概要》，书中的第一章亦为《国术进化概论》，内容与《国专月刊》所载基本相同。

又按：上引唐文治文中说：“以道德为本，奋迈往之气，具贞固不摇之精神，始终勿懈，以达保身、保家、保国、保民族之目的。”基于这样的观念，唐文治在先后执掌南洋大学和无锡国专校政时，一贯重视和推行国术（武术）教育。他为无锡国专聘请的国术教师侯敬舆，曾从太极拳名家吴鉴泉之甥赵寿村和少林拳名师赵连和练武，尤喜各种器械，凡有武术名家来锡，均从学之，一生所学套路五百余套，且每学一套均以

笔记录；锡地武术家中会拳械套路最多者，当推其为第一。侯敬舆提倡国术不遗余力，先后与王峻崖、杨彦斌等发起组织精武体育会、西神国技社，对无锡地区武术运动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侯敬舆在无锡国专任国术教师凡十余年，造就颇多。据郑学波《回首母校——记六十年前的人和事》（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四、二十五期）一文中回忆：“国专的‘国术’课，在当时许多高校中也是少见的。这是一门比较独特的选修课程，从补习班到三年级都开设。教师侯敬舆先生是一位老中医。那时，他大约五十多岁了，戴一副眼镜，瘦瘦的身材，他教武术，先授一套拳术，名为‘脱战’。这套拳术，有一些腾跃的动作，能很快接近对方。学了拳术后，依次学习棍、枪、单刀、双刀、剑、双剑、大砍刀等。学校在接待宾客时，有时也插入武术表演。”该文又说：“我在校时年龄小，学习认真，曾得到侯先生的称赞。从我二十岁到七十岁，在这五十年间，曾遍涉五岳，登峨眉、黄山、马耳（秦东门），不凌绝顶不快。青年时在国专时学习的技击，不知是否对于我的‘体便登陟’也有所助益。”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一月，唐文治撰成无锡国专校歌，请上海沈庆鸿（字叔逵，笔名心工，一八七〇~一九四七）编谱，并定“作新民”三字为校训，请校董华绎之书匾（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歌》（见《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特载”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五百载，名世生，道统继续在遗经。乾坤开辟，学说何纷纭。惟我中国，教化最文明。上自黄帝迄孔孟，先知先觉觉斯民。大道行，三代英，我辈责任詎敢轻，勉哉！勉哉！俭以养德，静以养心，建功立业，博古通今。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陆振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对办学宗旨初衷的继承与发展，不但坚持贯彻于教学中，而且反映于其他方面。如《校歌》……语词包涵浓郁的儒学色彩，又融贯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观念。每周一集会，都得唱校歌。又如以‘作新民’为校训。语见《尚书·康诰》和《礼记·大学》，据《礼记正义》的训释：‘君子曰，新其德常尽心力不有余也。’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不断地进入新的境界。校训以尺五正楷，制成横匾，悬挂于礼堂讲台的上方正

中，两侧配以长联，镌刻于宽二尺多、长一丈有余的木板上，联语是唐文治集儒经而成：‘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一集联，从艺术性而言，是当之无愧的上乘。内容既讲学，又讲行，其所揭示的智、仁、勇和大丈夫所表现的三个‘不能’，都是儒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应具的品德。小会议室挂有木刻杨继盛手书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食堂里挂着木制横幅，词为‘世界龙战，我惧沦亡。明耻教战，每饭不忘’。还挂有王守仁、顾炎武、陆世仪、高攀龙的四幅画像。王守仁宣扬良知良能，主知行合一。顾炎武具有民族气节，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陆世仪提倡学问要‘切用于世’，还主张‘习武’。高攀龙为东林党领袖，崇尚气节。以他们的学行来激励学生。”

一月，《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刊》的“学生丛刊之一”和“学生丛刊之二”出版。

王绍曾《致刘桂秋信》（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钱基博先生从一九二七年起直到任浙江大学教授，始终是国专的校务主任兼教授。我是他的及门弟子之一。一九三〇年我在无锡国专毕业，在他指导下撰写了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六万言，受到他的激赏，批了一百分。当时他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长，把我的论文带到光华大学请教授们传观，甚至建议校长唐文治，他的目录学由我替代。当时我已确定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协助张元济先生（版本学大师）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唐校长已经征得张元济先生的同意，让我每周五下午回无锡，周六上午上课，星期日回上海，张先生表示同意。对我来说，这是破格提拔，我应该感谢唐校长和钱先生

的知遇之恩，但是我考虑到当时我才二十岁，简直是个毛孩子，而且读过的书很有限，更主要的是第六、七届在校同学，年龄都（比）自己大，我去给他们讲课，实在说不过去。结果唐、钱两先生都同意我的意见，‘目录学’仍旧由钱先生讲。不过钱先生还是建议唐校长，把我的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破例由学校作为《无锡国专丛刊》第一种于一九三一年正式出版。我是看到了书才知道的。钱基博先生如此爱才，如此培植后生，使我终身难忘。”

按：《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刊》的“学生丛刊之一”和“学生丛刊之二”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同时出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辑，无锡华东印刷厂印刷。“学生丛刊之一”收学生论文两篇：王绍曾《目录学分类论》和周昶旦《荀子政治学说》。“学生丛刊之二”收学生论文四篇：邹静九《韩非子法学之研究》、王树槐《李善之注为文选功臣五臣后起思夺其席谓其纰缪百出试言其作注之概略及纯驳所在》、钱锺夏《问骈文极盛于南北朝未晚南北朝文士亦有抉骈文之极弊者欤倘能备稽其说以扬榷得失欤》和施闲《王荆公之政治思想》。

一月三十一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穆藕初、华绎之、蔡其标、唐保谦（唐星海代）、蔡兼三、钱孙卿、杨翰西（钱孙卿代）、顾倬、高阳、钱基博、荣德生（蔡兼三代）、孙家复、陆仁寿等人，讨论新生资格呈部问题及上年度决算、本年度预算等事。

《民国二十年一月卅一日会议》（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议决新生资格教育部备案，俟社会情势自然变迁时再行呈部核办。对于学生，须切实告以本校设立之旨趣，在栽培有能力之学者，并非为学生造就资格，学生须切实求学，不慕虚荣。”



二月一日，举行无锡国专建校十周年纪念会暨第六班第六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毛鹏基、史秩甫、吉向荣、李希白、何德培、沈贯之、林达祖、许明俊、冯书耕、张锺毓、陆继濂、陆宝和、梅仪年、汤客琴、钱一如、卢国钧、薛桐轩等十七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招考插班生。

《国专十周年纪念会预志》（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三版）：“本城学前街私立国学专修学校，自开创以来，成绩卓著。近年来又扩充校舍，广添学额。前岁新建图书馆，藏书数万册，规模宏大。校长唐蔚芝先生，学问渊博，为教育界闻人。长校迄今，竭力维护，始终不怠。该校自开办以至今冬，已十易寒暑。兹定于二月一日，举行十周年纪念大会，同日举行第六届毕业典礼，敦聘党国要人吴稚晖先生等来校演讲，并请昆曲家唐朴成、许豪士诸先生到会显技；更有新剧、电影、歌舞、西乐、国技、双簧、魔术等等。现已具柬广请各界，前往参观。校中师生，合组一筹委会，布置一切，想届时裙屐翩翩，马龙车水，必有一番盛况也。”

按：又据《新无锡》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载，吴稚晖曾致函唐文治，中云：“惟此次廿六日，在宁举行中监全会，倘闭会较早，得在二月一日前完毕，必当趋前聆诲。如赶不及，止好在异日参礼贵校时，再畅侍矣。”后吴稚晖是否莅会，不详。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午六十六岁》：“十二月四日（原注：即阳历二月一日），行本校十周年纪念并第六届毕业礼。毕业者学生陆宝和等十七人。是日，校董穆君藕初名湘明来主席。上午训辞，午后开游艺会，颇极一时之盛。”

按：《穆藕初先生年谱（一八七六一—一九四三）》中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至无锡访唐文治（号蔚芝，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当即是受邀而前来参加无锡国专建校十周年纪念活动的。

二月，聘请甘豫源（字导伯，一九〇三~？）为教育学教授（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三月一日，陈中凡为无锡国专学生作《求学与读书》的学术演讲。

按：此次演讲的记录稿见《读书月刊》二卷一期，文末标明“（民国）二十年三月一日无锡国学院讲稿，张敦品笔记”。陈中凡在演讲中提出：求学不只是读书，读书不过是求学的门径而已。要得到高深的学问，先要具备下列三种求学的要素：一要有适应时代进化的观念，二要能鉴别材料的价值，三要有研究学问的工具。“具备这三种要素的学者方能研究过去的学问，方能贡献给现代社会的需要，那方是二十世纪的学者。”

四月，举行国文全体竞赛，核计平均分数最多之班，给以锦标、奖旗。并定以后每学期举行一次（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按：国文竞赛，又称国文大会考、作文会考。自本次之后，每学期举行一次全校国文竞赛，即成为无锡国专的一项制度。金易占《无锡“国专”与唐文治》一文中说：“‘国专’校历上有两条特别规定：（一）孔子诞辰纪念，休假一天，举行纪念式。（二）每学期要举行一次全校国文竞赛。校长出题，全校学生每人同时写一篇文言文。评阅完毕，名列前茅的还有奖品。”实际上，唐文治在担任南洋大学校长时，就已创设了一年一度的全校“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余子侠《工



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一书中对此曾有介绍说：“在加强课程教学的同时，唐文治还十分注重国文习作。根据古人‘文以载道’的观点，唐文治一向强调‘人之于文’犹如‘形之与影’，‘人格之与文格相须而不离’，是故结合书本知识的传授，他还积极鼓励学生通过作文训练提高国文水平。正如前文所提及，他认为作文以炼气为主，而炼气又必须熟读古人之文，因此习作与国文教学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于是自一九〇八年起，学校成立了国文研究会，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由大、中学生参加的国文大会，这就是当时师生们所说的‘会考’，即作文比赛。赛事定在每年孔子诞辰日（即八月二十七日）之前一个星期日上午举行。每届比赛之时，唐文治不仅亲自参与作文命题，最后审评亦由他本人把关。整个赛事程序安排得十分严格：会考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学生各据一桌，作弊者立即清除离场，迟到者不准入场，时间一到即强行收卷。试卷交上后先由各班国文教师批阅，优者择选到全校评比。经国文科长初评后，再将优者择送唐文治审评。唐文治写出评语后确定名次。再于孔诞日发榜，对名列前十名者分别奖金、银、铜牌及书籍等奖品，以此鼓励学子用心国文学习。同时，他还组织将学生的优秀作品辑录成册，以供后来的学生们学习参考。”而无锡国专的国文竞赛正是由南洋大学的“国文大会”承继变化而来。

又按：此次国文竞赛的优秀文章，后由钱基博以《无锡国专作文会考程文叙目》为题，在本年十一月一日、三日、五日、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的《南通报·文艺附刊》上连续刊载，计有：俞振楫和张逸仙的《审势》，许实的《审敌》，孙伯寅、郭则澍、缪文远、郭则清、吴毓麟的《章学诚于清学之关系论》，向长庚的《记事者必提其要纂

言者必钩其玄近代作家孰能得其枢要论》，每篇文章后面都有钱基博和唐文治的评语。之所以判定这是本年上学期而非是下学期的国文竞赛的优秀文章，是因为上述作者中的郭则澍、郭则清和向长庚等人至本年六月即已毕业。

五月，遵照教育部令，举行本年度录取新生甄别考试，合格者共五十四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按：《新无锡》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第三版《私立学校专科毕业生 俟升学预试时追认其成绩》：“江苏教育厅近训令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私立东吴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文云：‘（上略）案奉教育部训令，开：查公立及私立专科学校以上学校，自十九年度起，如或招收未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升学生，及未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转学生，本部不予承认。前经通飭遵在案，近据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等校，呈请准予变通。而来核阅原呈所呈各节，不无可原，兹规定办法如下：一、各专科以上学校，十九年度录取之一年级生，其毕业于未立案私立高级中学者，暂准随班旁听，俟本年七月间，省市教育行政机关举行未立案私立高级中学毕业生升学预试时，准其就近前往与试。试验及格后，追认其入学资格。二、各专科以上学校，十九年度录取之未立案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转学生，暂准随班习听，由各该校将各该生入学试卷，送部复核，认为合格后追认其入学资格。以上办法，以各级十九年度已经录取之学生为限（下略）。’”此次无锡国专的录取新生甄别考试，即是根据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的训令而进行。

五月，《无锡国专年刊》出版。

按：《无锡国专年刊》，吴毓麟编辑，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无锡协成印刷公司印刷，一九三一年五月出



版。该刊由“论文”、“文录”、“诗词”、“附录”等栏目构成，其中“论文”收文八篇，“文录”收文五篇，“诗词”收十一家三十二首，附录收演讲稿一篇，均为无锡国专学生作品。

六月，《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出版。

唐文治《〈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序》（见该刊卷首）：“曩岁吾校同学会成立，发行《国学年刊》，余既序诸简端矣。去春，同学会改组校友会，规抚益宏，又有集刊之举，复请余序。余以校友会与吾校忧乐与共，息息相关，兹届集刊告成，又乌可以无言。夫天下万事，林林总总，所以能维系于不敝者，其道果何由哉？亦曰性情而已矣，性情之为用大矣哉！吾校创设于钱唐施君省之，无锡孙君鹤卿继之。五六年间，大江南北，学者踵至，一时称盛。厥后，时局变迁，有徐某者出，而与吾校为难，风雨飘摇，几且不免。事定，毕业同学诸君奔走呼号，竟获恢复。惟摧残之后，千疮百孔，补苴綦难。举凡进行规划，幸赖诸校董设法维护，呈部立案，逐渐扩充，于是而成立经济董事会，于是而创设图书馆。自是厥后，四方之士闻风来学者，更较曩昔为盛矣。嗟乎，吾校自创办以来，瞬经十载。此十载中，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而所以能维系迄今者，实由校友之始终爱护，百折不回，而其精神所在，岂非性情之功用使然哉？性情之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揆厥所原，盖非诚不为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吾校友能笃信守道，至诚相感，则其性情之发，宜其有固结而不解者。《易传》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人心之感，性情之发也。又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章之蕴，亦性情之发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今观吾校友会集刊，著述如林，文采斐然。

即其文而知其人，即其人而知其性情。然则道统之赖以不坠，而世运之赖以挽回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民国二十年四月唐文治谨序”

按：《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会编辑，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华东印刷厂印刷，一九三一年六月出版。该刊由“述学”、“文苑”（分“文录”、“诗录”、“词录”三类）、“杂俎”、“特载”等栏目构成，兼收无锡国专师生和校友的作品。此刊物似出第一集后便告中辍。

六月三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暨中央大学教师柳诒徵在无锡国专大礼堂作《治史事之管见》的演讲；第二天继续作《治史学之方法》的演讲。

《柳翼谋先生在国专演讲》（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第三版）：“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兼中大教师柳翼谋先生，应本邑国专唐校长之请，特于前日（三日）由京来锡，下午四时，在该校大礼堂演讲，题为《治史事之管见》。其大旨为：一、历史之不尽可信。二、历史不尽最进化。三、历史不尽有因果。此系柳先生研究史学数十年之心得，与其他史学家所见不同。末言近数十年中国史学界之趋势，对于现代史学家之得失，批评至为允当。取譬谈谐，听者动容。昨日上午，闻尚续讲《治史学之方法》云。”

六月四日，无锡国专第六届毕业生张锺毓（字锡君，一九一三~？）与浙江向女士举行婚礼，唐文治亲为证婚。

《国专高材生张锡君婚礼志盛》（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第三版）：“光复门内圆通路口喉科专家张嘉炳先生之子张锡君，青年好学，十八岁即毕业于国专学校，校长唐蔚芝甚器重之。昨日与浙江向女士在本宅举行婚礼。先期由坤



宅送亲来锡，假寓新世界旅社，唐蔚老因锡君为本校高材生，故特亲临证婚，尤为难得。而商团公会会长杨翰西，亦于昨日致赠张君匾额一方，鼓吹送去。亲朋前往道贺者，备极一时盛况云。”

六月，建筑第一进新校舍八幢，共费洋九千六百元，请无锡陶达三督工，全任义务，不受酬（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六月，举行第七班第七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丁肇轩、白谦九、江鸿涛、李元楼（一作娄）、祝廷枢、姚榜元、俞月秋、陆理诚、耿维贤、陈炳元、陈茂林、陈祖德、陈廷宪、陈学东、陈学斌、郭则融、郭则清、张良淇、张联芬、冯拔、程鹏搏、虞健、蒋立之、刘子厚、郑广华、戴锡昌、魏守谟、赵大观、向长庚等二十九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

七月，教职员会议议决，自下学期起兼收女生。但因宿舍不敷，只限通学（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在三十年代以前，国专只有男学生。从三十年代起，开始招收女生，第一批女学生中即有钱基博教授的侄女钱锺元。这时，当地封建残余还很多，中学多是男女分校。迨国专一招收女生，打破了封建保守的男女界限，男女同校蔚然成风。”

按：无锡国专是从一九三一年下学期起招收女生的，而钱锺元是无锡国专于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才招收进来的第十二班学生之一，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中，曾记一九三三年五月“派三年级男女生赴江南中学男女

部试教”，所以钱锺元不可能是“第一批”中的女学生。

八月，招收第十班学生七十四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考入第十班的学生中有周振甫（一九一一～二〇〇〇），但他未及在无锡国专毕业，便于第二年进入上海开明书店工作。

徐名翠编《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周振甫年谱》：“（一九三一年）……沈传曾是稚川初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就留在稚川学校内工作，积了一些钱，想去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不过他从未离开过平湖，到无锡去，他母亲很不放心。因此劝我（按：指周振甫）一起去，说：写信并不重要，薪水不多，还不如去念书。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来，可以写书拿稿费，比在钱庄写信好多了。我想钱庄上最重要的是跑街，即把钱放给可靠的店家，收取高的利息。写信是不重要的，薪水不会多。我被他说动了，请了假，同沈传曾一起到无锡去考国学专修学校，我们两人都考取了。我就写一封辞职信给了协康钱庄。”又：“……这年（按：指一九三二年）我仍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二年级肄业，忽接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徐调孚先生来信，说开明书店拟招《辞通》校对一人，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年毕业，还有一年，向二伯父二次取学费，再说毕业后到何处去，还难定。因此决定接受开明书店邀约。徐调孚先生寄来宋人笔记一部，为陆游《老学庵笔记》，嘱加断句。断句后即寄去。徐先生说，开明已看过，认为虽有可商处，拟决定招用。我即启行。”

八月，聘请陈衍（字叔伊，号石遗，晚署石遗老人，一八五六～一九三七）为无锡国专特约讲师。陈衍在无锡国专



为学生先后讲授过《资治通鉴》、宋诗、要籍题解等课程。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辛未六十七岁》：“函聘福建陈君石遗名衍为本校讲师。陈君为余壬午乡试同年，出宝竹坡先生门下，佐张文襄公幕十余年，学术贯通，著作诗文极夥。门人叶长青介绍来校，深为可喜。”

陈声暨编、王真续编、叶长卿补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见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一九三一年）九月，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蔚芝先生（名文治，太仓人，后徙贯无锡，有《茹经堂全集》）聘为讲师。先生为公壬午乡试同年，光绪中叶曾相见於沈子培先生许，自是皓首订交，欣合无间。”

陈衍《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前岁余至江南，太仓唐蔚芝尚书（文治），壬午同年也，长无锡国学院，请余讲学，招饮并侑以昆曲，即席赋呈。蔚老不为诗，哲嗣谋伯（庆治）和韵云：‘绝似当年庾子山，江关词赋霸骚坛。欣逢旧雨皆知己，竟逐流霞各尽欢。檀板红牙催玉漏，松云白首挂华冠。秋来风雨虽如晦，尚有豪情赴笔端。’雅切工整，的非易才。余与君尚各有叠韵云。”

《国专发展消息》（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第三版）：“国学专修学校为教育部立案专修国学之特殊学校，素以文行交修，昭示海内。校长唐蔚芝暨主任钱子泉等，努力从事发展。近闻下半年福建耆学陈石遗来锡，该校订为特别讲师。陈君子理、史、子学素称博洽，诗学尤为擅长，洵属特色。又闻该校以原有校舍狭隘，拟于暑期中，起盖楼屋八幢，大加扩充云。”

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早期几届（唐文治）除亲自授教全部经学课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系著

名学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陈石遗（衍）先生长期主讲《通鉴》和诗学等课。他莅校之前，已撰有《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诗话》、《元诗纪事》等，一时远播扶桑，为日本著名文学家神田喜一郎等击节赞赏。莅校后，他讲《通鉴》，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颇有条理；同时以渊博深湛的知识，阐发历代诗歌的真髓，一经启迪点拨，如坐春风化雨之中。那时陈衍住在苏州，每星期五来无锡讲课，星期一返苏州。每课时的代价是大洋二十元（约合白米三百斤），这样高昂的钟点费，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名教授。可是区区的私立无锡国专却是不惜工本的。”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三十年代初，居苏州的陈衍石遗先生，应唐校长邀请来校讲课，每星期四下午来锡，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回苏。时陈年已八十，按时到校上课，从不间断，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回福州病逝。陈先生讲宋诗及《通鉴》，所讲宋诗系根据自己读诗体会。评价诗人作品，随编随讲，编为《续石遗室诗话》。这种从具体作品的分析到写作理论的阐述，使学生易于领会。他讲《通鉴》也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他指导学生先阅读《通鉴》及纪事本末原文，然后评讲，既评人物又阐明史法。”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国专的教职员待遇基本上接近同等学校，但教授们因课时不多，每月的收入较上海、南京等地为低。一九三一年国专聘请‘同光派’诗人陈石遗来校任课，每课报酬为银元二十元，相当于一般教师的十倍，这在全国各大学中也是罕见的。石遗先生的学识和诗文为全校教职员所钦佩，但这样的待遇，似乎高了些。石遗先生一口福建话，学生们最多听懂十分之五、六。当时就有人怀疑有没有这个必要。唐校长就对教职员说：‘我所以要聘陈石老，固然是



为学生，主要还是为了教师。诸君皆很博学，但无锡一隅之地，不能像北平、上海、南京那样多得贤师友之助。陈石老来我校，可以与诸君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大家听了校长的话，不再有什么意见。陈石遗先生家住苏州，每周到无锡讲课六节（每半天讲二节），住两晚。他讲到得意处，往往背坐藤椅，面向黑板，有时边讲边写，板书皆很精辟。后来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总务主任叶长青教授觉得老师讲的有很多新内容，就自愿替老师板书。叶长青对老师很尊敬，发现老师不习惯厨房里做的伙食，就请老师住到自己家里，由他的夫人做乡菜招待老师。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诗精华录》，就是根据在国专讲宋诗时的初稿修订而成……石遗先生虽年已八十左右，但精神矍铄，教学认真，二、三年级在大礼堂合班上课，校内又无扩音设备，他讲授从容。在学期考试时，他总是出综合性的试题，充分发挥学生的自由思想，还可以开卷，甚至可以到图书馆、宿舍去写。据高树学长回忆，他讲宋诗，学期考试时，曾以《论苏诗七绝二首》命题，既要熟悉苏东坡诗，又要予以评论，还要以近体诗的形式来表达，学生的修养和写作水平，都可借以鉴定。他批分极严，八十分就可得冠军，有时七十五分亦能夺魁，六十分者最多，还有因错别字扣分，批五十八、五十九者，甚至只批‘不及格’三字。他的课，不及格的同学较多。石遗先生在国专还讲授过《要籍解题》。后来这门课由叶长青担任，但石遗先生仍继续编写讲义，在《国专月刊》上连载，论断恰当，间有新说。叶长青讲课时依照这份讲义颇多。”

宁友《陈石遗先生与无锡国专》：

“石遗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应叶长青教授（后来曾任国专总务主任）介绍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国专教授中他年事最高，

声名最盛。唐蔚芝校长以每课时大洋二十元的高薪聘他，不但在国专是特例，在其他各大学中亦属罕见。据老校友回忆，当时别的教授的讲课费为每课时二元，而学生每学期的伙食费为二十四元（一日三餐）。石遗先生没有辜负学校对他的厚遇，他家住苏州胭脂桥，每周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来往于苏锡途中。

石遗先生学识丰富，除了文学之外，对于经、史、诸子亦有问必答，剖析详尽。他还和学生个别交谈，答问释疑，沟通思想。因此，学生们尽管以言语隔阂为憾，但对他极为尊重，获益匪浅。一九三三年《第十届毕业纪念刊》中《五朝五言古体之嬗变》、《苏门六子评传》、《清诗之流别》、《〈孔雀东南飞〉韵谱》（作者注：以上诸文依次为萧佩三、俞振楳、王正履、陈士群所作。‘五朝’指晋及宋、齐、梁、陈），都是受石遗先生的影响。其他像关于目录学、校雠学、《史通》的论文，亦直接或间接受他的影响。因为这些课程都是叶长青主讲的。他后来曾撰《要籍解题》，叶长青据以充实讲课内容。杨炳方校友还在该刊中发表《石遗室丛书提要》。徐义校友草就《近代诗学之鸟瞰》，文长五万字，毕业刊上发表了此文的序目，谓当时有一派‘不专一代一家，惟能与称是从，河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让土壤，如陈石遗先生是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外侮日亟，石遗先生讲课时，以古喻今，激发学生爱国思想。他在讲授南宋及金、元诗，明末清初诗，近代诗时都注意及此。他讲过不少陆放翁的爱国诗篇和宋遗民诗，其数量远过《宋诗精华录》上所著录的。他讲《资治通鉴》不但能背诵原著，连胡三省的注也能成段背诵。无锡国专的老师，能背诵《四书》、《五经》不足为奇，像他那样能背诵胡三省注的精警之处，不得不为学生们

叹服。胡三省是南宋宝祐年间进士，宋亡，隐居不出。他在注《资治通鉴》时，抒发爱国思想，对石敬瑭之流，大事鞭挞，而对忠臣义士，或显或微予以表扬。石遗先生常对学生说：‘胡三省是古之有心人，他用《春秋》笔法为《通鉴》作注，诸君要注意及此。’

叶长青是石遗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列为唐校长的弟子。石遗先生初来国专，有随行助教代为板书。叶长青教授担任总务主任后，出于尊师，替老师板书，助教也就不来了。”

九月十八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地区桥梁一段，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当日夜间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向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十九日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辽宁其他地区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此即“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无锡国专学生会请求学校停课三天，并组织宣传队在无锡城厢进行抗日宣传。九月二十四日，无锡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由无锡国专、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私立无锡中学和江南中学等十三校组成（据《无锡市教育志·教育大事记》）。

《学生救国 国学专校停课宣传》（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三版）：“民教育院、省锡中、国专各校，对于日本此次出兵东省一事，异常愤激。特加紧军事训练，并筹组学生军。国专学生会并请求学校当局停课三天，将来年假补足。昨日参加民众大会，特另组宣传队在城厢宣传，并于今日先行停课一天，从事宣传，此外则拟各校取一致行动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我东北。第二天下午，无锡的地方报上就登载了这则消息。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商量罢课，以及怎样表示抗议和对群众进行宣传。下午的课上，已经有老师应学生之请，宣讲近

代日本侵略我国的历史。也有教职员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国家大事应该相信政府会作妥善处理的。学生们写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贴在后者的办公室门口。校长召集主要职员和教授开会，一开头就说：‘鄙人在甲午年，曾替江苏举人代拟呈都察院稿，申述自强御敌之宗旨。今则忝为校长，诸事须凭功令，未便悉凭个人意志办事。今日之事，请诸君公议。’他的态度其实已明朗，但一小部分教职员，或者对国民党政府存有幻想，或者抱定学生不应与闻政治的想法，不同意学生罢课，争论不休。校长最后说：‘学生出于爱国热忱之行动，由其自决。诸位先生亦可各行素志。’”

本年八月，苏皖等地暴雨成灾。据南京赈务委员会许世英报告，此次水灾区域有湘、皖、鄂、豫、苏、赣、浙、闽、粤、川、冀、鲁、辽、吉、黑、热十六省，灾民在五千万人以上（据《中国现代史大事记》）。九月二十五日，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干事会议决，节省出中秋节添菜费十五元，以作赈济灾民之用；并呈请党政机关，附征游艺场及菜馆业赈灾特别捐。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辛未六十七岁》：“六七月间，大雨滂沱，几近一月。楚、赣、皖、苏各处皆成巨浸。始则汉口被灾最重，继则江北高邮、兴化等处。因建设局员茅以新开运河堤，河水与洪泽湖合流，泛滥更甚，江北各县无不糜烂。”

《赈灾近事记·一区公所征衣 国专学生减膳》（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三版）：“……本邑国学专修学校学生，热心救灾，其情曾志前报。昨日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乃议决撙节中秋节添菜费十五元，为赈济灾民之用。并呈请党政机关，附征游艺场及菜馆业赈灾特别捐，提交党政谈话会



妥议办理，呈文如下：‘呈为灾民饥饿，待赈孔殷，请求附征游艺场菜馆业特别捐，以恤灾情，而全人道事：窃江北各邑，运水东注；庐舍漂没，浩浩滔天。死者尸迸怒流，无异兔泛；生者停辛待哺，直等鸿嗷。殿屎呜咽，惨动天日。饥逼枯肠，岂仅一日不食；凉侵缩肤，谁为九月授衣。敝校同学，闻讯叹嗟；摇荡情灵，泣数行下。念己身之温饱，痛饥溺之黎元。爰特减膳醖资，冀以生活群庶。惟国难方殷，人心振愤，地广灾重，仅独力颇苦难援；而念切痼瘵，众擎易举，发皇民族，急须赈被难同胞。查敌筵设席，事属酬酢；游艺会场，咸为娱乐；悦耳畅心，天堂可比；鸠形鹄色，下泽堪怜。渺天道之难知，哀人生之到此，不忍悲欢殊异。拟请附带捐洋，积少成多，送会助赈。譬如游艺场每人附收一分，则十人可得一角；宴会馆每席带捐五分，则十席可获五角。施之者如九牛亡一毛，受之者则九死得一生。为责无多，嘉惠实溥。况出入游艺场，日以万计，延致宾客者日可百起，游观乃尔，必不惜少许之金钱。饮聚若是，将焉有些微之吝嗇。急起输□，当无异义。积善成德，人所欲为，为此缕陈芻见云云。’”

九月三十日，无锡国专遵照无锡学生抗日救国会执委会会议决停课，并派出六个宣传小队，分赴原规定之宣传区域，进行抗日宣传。

《救国运动必须大家协力同心》（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第二版）：“国学专门学校学生对于此次抗日救国工作，异常努力。上月廿三日，自动停课扩大宣传，并加紧军事训练，曾志本报。昨日仍遵照全县学生抗日救国会执委会会议决停课，推派宣传员六小队，每队十余人，自携呢毡、宣传品等，搭至望亭之火车，分赴原规定之宣传区域，大墙门口、后宅、方桥各地。在校同学，即以军事训练及日本研究，代替正

课。该校当局，以学生热忱爱国，殊能谅解云。”

十月一日，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吕思勉（字诚之，一八八四~一九五七）应无锡国专教务主任钱基博之邀请，为国专学生作《中国积弱之原及挽救方策》的演讲。十月二日上午，唐文治之长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唐庆诒（字谋伯，一八九八~一九八六）为国专学生作《中日问题》的演讲；同日下午，复由无锡国专教授叶长青、党义教授邱有珍（字介山，一九〇二~一九七八）相继演讲。

《抗日救国须具决心持之有恒》（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第二版）：“……该校自前日分派大批宣传员，赴大墙门口、后宅、方桥各处从事扩大宣传外，在校学生，对于军事训练、中日研究两科，特别认真。一日午前，该校教务主任钱子泉，特于抗日救国声中，敦请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吕之诚来校演讲《中国积弱之原及挽救方策》。昨日上午，该校唐校长之大公子、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唐谋伯演讲《中日问题》。下午复由该校教授叶长青、党义教授邱有珍相继演讲。关于最近国际之大势、中日问题之推测，以及吾人目前应持之态度，今后应负之责任等，条分缕析，阐发无遗。又今日午后该校开慰劳会，慰劳赴乡宣传员，届时钱教务主任，并有恳切之训话云。”

按：文中“吕之诚”应为“吕诚之”。

十月，聘请普仁医院美籍薛女士教授女子救护队课（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十一月，训练总监部派李启朝教练员来无锡国专，加紧军事训练（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十一月七日，唐文治之第三子唐庆增（字叔高，一九〇二~一九七二）在无锡国专对学生作演讲，讲题为《从经济



方面剖析东北事件》。

按：唐庆增此次演讲的纪录稿，刊《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此次演讲，从经济方面来分析日本何以要侵略东北，是在于其经济要素上的缺陷，一是人口增加，二是粮食缺乏，三是工业原料不足，而“东三省的出产和环境，适足以弥补日本的缺陷”。中国目前适当的抵抗方法，一是抵制日货，二是对日宣战。

十一月十四日，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成员 Carl H. Becker 和 P. Langevin 来无锡国专考察参观并作演讲。两人参观学校后说：“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 Carl H. Becker 在演讲中，强调指出：“在现今生存竞争的时代，凡一国家求生存于世界，固以研究科学为先；然研究科学，必当先使国民自觉。而国民自觉心之发动，惟有藉国学以发扬光大之，而后可以保持各国固有之民族精神，此尤须研究本国历史和固有文化。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

《国联教育考察团不日来锡》（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第二版）：“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培克尔、唐纳等四氏，于上月在平津各地考察教育完毕后，即南下到京，现又赴杭。闻该团除已于上海、南京两市考察外，不日又将来苏，参观镇江、无锡两地教育情形。本邑县党部、县政府、教育学院、省锡中、教育局、商会、教育会等机关团体，得悉该项消息，拟联合招待云。兹将该团团员之履历及其考察范围，想亦留心教育诸君所愿闻焉。又闻培克尔博士，曾任普鲁士教育部长，现任柏林大学教授，系有名之教育行政专家，其考察注重教育行政情况……伦希维氏，为法国理科专家，任法兰西

学院教授，其考察工作，特别注意自然科及教育状况……”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二十年十一月，国联会教育科员唐克尔、培根伦来校参观并请演讲，两君谓中国文化赖本校一线维持，赞叹不置。”

《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昨已离锡》（见《新无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版）：“国联教育考察团培克尔博、伦希维二氏，于本月十二日来锡，考察各学校、各工厂之教育，其情已志各报。昨日上午十时，由无锡教育界高践四、陈礼江、雷宾南、唐谋伯、俞庆棠、陈谷岑、陆仁寿等，陪同前赴国学专修学校参观，并在该校大礼堂演讲，请唐谋伯先生翻译。首由培克尔博演讲，大意谓：此次来华考察，对于东方民族如何保持固有的文化问题，甚感有研究兴趣。凡今之世，国家求生存于世界，固以研究科学为先；然研究科学，必当先使国民之自觉。而国民自觉心之发动，惟有借国学以发扬光大之。贵校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余期贵校同学，能整理中国历史，编成大中小学校适用之历史课本，以发扬中国民族之文化学术，而促进国民之自觉心。次伦希维演讲，大意此次余等代表国联会莅华考察教育，国联会目的，在促进世界和平，各国互相合作。然合作之意义，对于文化非互相抄袭之谓，必求各国能保存并阐扬其文化，贡献于世界。譬如近三十年来，物理学上发明虽多，然就余个人之经验，倘非用从前多数物理学家所发明者为基础，亦不能进步如此。今求中国文化发达，能贡献于世界，固亦必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余颇期望诸位各自努力。演说毕，由该校校长唐蔚芝致答辞，语极精要得体云。又悉培、伦二氏，旋赴小娄巷底县女中等校考察一过，业于昨日下午乘四点十八分快车离锡赴镇考察，并即转赴首都考察教育云。”

健实《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见《无锡国专季刊·杂俎》）：“一九三一年秋，国联教育考察团，培根、伦希维、唐奈、法尔斯基等，来华考察吾国教育文化事业。首先在杭沪各地考察后，由教育部派陈瀚孙、王慎明及中央研究院胡刚复等，陪同培、伦二氏莅锡参观。唐、法二氏则先迳赴首都矣。十一月十二日锡地各机关学校均派代表，赴车站欢迎。抵锡后，参观申新纱厂、民丰丝厂等。十三日参观省立教育学院并作演讲。十四日上午十时复由无锡教育界高践四、雷宾南、俞庆棠、陈礼江等，陪同来吾校参观演讲。兹略志之于下：培、伦二氏来校后，先在吾校图书馆参观一周，曾披阅元版《礼记》、《资治通鉴》，明本《学津全书》，殿本《史记》等珍本。由唐谋伯先生详为指释，允为珍贵云。后在大礼堂演讲，亦由唐谋伯先生任翻译，唐校长先致辞欢迎。在鼓掌声中，首由培氏登坛演讲，大意谓：‘此次来华考察，对于东方民族如何保存其固有之文化的问题，甚感有研究兴趣。在现今生存竞争的时代，凡一国家求生存于世界，固当以研究科学为先；然研究科学，必当先使国民自觉。而国民自觉心之发动，惟有藉国学以发扬光大之，而后可以保持各国固有之民族精神，此尤须研究本国历史和固有文化。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希望贵校同学能整理中国博大之历史，编成大中小各学校适宜的历史课本，遍行世界各学校，以发扬中国民族之文化学术，而促起国民之自觉。’次伦氏演讲，大致谓：‘此次余等代表国联莅华考察教育，目的在促进世界和平，各国互相合作。然合作之意义，对于文化学术并非互相抄袭，盖必求各国能保存并阐发其学术文化，贡献之于世界也。譬如近三十年来，物理学之发明虽多（按：伦氏为物理学专家），然个人之经验而言，倘

非以从前多数物理学家所发明者为基础，则亦不能如此进步也。今蕪中国之文化发达，能贡献于世界，固亦如是，必以其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焉。颇期诸君努力于斯。又孔子为贵国第一大学术家，而贵校又系保存“国学”之惟一学府，两者适在比临（按：校邻孔庙），允为求学之佳地也。再法谚有云：女子乃家庭之保姆，希望贵校女同学将来能为国家之保姆。’演说毕，掌声雷动。培、伦二氏，与吾校校长唐蔚芝均已高年，而精神矍铄，聚三国三老（按：培氏德人，伦氏法人）于一堂，允为难能可贵也矣。”

金易占《无锡“国专”与唐文治》：“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国联会教育科的唐克尔、培根来校参观后说：‘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

按：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达上海，对中国教育进行考察。据《中国教育之改进》一书的《导言》中记载，此次的考察团成员为：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氏教育部长柏刻（Carl H. Becker），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长法尔斯基（M. Falski）教授，法兰西大学教授朗吉梵（P. Langevin），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叨尼（R. H. Tawney），并由国际联盟秘书长窝尔特滋（Frank P. Walters）协助。考察团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无锡、苏州、镇江、广州等地考察教育，共考察公立和私立大、中、小学达百余所，十二月中旬结束考察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该团的考察报告书中文译本《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并出版。在该考察报告中，针对“中国新时代之知识分子，自革命以还，咸努力

于依照某种舶来之思想，以改造中国之教育制度，而中国几千年以来之传统文化，则认为不合时宜”的现象有所批评，认为“中国乃一有悠久传统文化之国家。凡将一国固有历史上之文化全部牺牲者，其结果未有不蒙其害者也”，这一观点与考察团成员 Carl H. Becker 在无锡国专考察时所说的“凡一国家求生存于世界，固以研究科学为先；然研究科学，必当先使国民自觉。而国民自觉心之发动，惟有藉国学以发扬光大之，而后可以保持各国固有之民族精神，此尤须研究本国历史和固有文化”是一致的。

又按：据当时各种文献资料的明确记载，到无锡国专来进行考察的，是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中的两位成员：一为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 Carl H. Becker，一为法兰西大学教授 P. Langevin。据上引各种文献可知，当时对这两人名字的汉译各有不同，差异很大；但到无锡国专来进行考察的有两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上引金易占《无锡“国专”与唐文治》一文中说“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国联会教育科的唐克尔、培根来校参观后说……”，所述仍为两人，但朱鉴岷《唐文治生平事略》一文引用此节，却排作“一九三一年冬，国际联合会教育科的唐克尔·培根到我国考察教育，看了国专后说……”，使人误以为来无锡国专的只有一人，此后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等论著中都沿袭了这一错误。

本年十一、十二月间，唐文治加入由马相伯等发起的国难救济会，又作《新六国论》一篇，冠于其所著的《国鉴》之首，以“痛陈利害”、“警醒人心”。无锡一千三百余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唐文治亲送赴南京请愿的国专

学生至校门口，以示支持。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辛未六十七岁》：“十一月，上海设立国难救济会，由马君相伯名良等发起。推余为会员，余作《新六国论》一篇，痛陈利害。并著《国鉴》一卷，共分十三篇，即以《新六国论》冠于首。印刷分送，藉以警醒人心。”

《无锡市志·大事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无锡县学生举行总罢课，一千三百余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唐先生于唐宋八大家中，推崇韩愈、欧阳修，对苏洵则认为纵横家习气重，很少提到。这时，他仿苏洵《六国论》之意，‘作《新六国论》，痛陈利害’，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后来又写了《国鉴》和《国箴》。爱国老人马相伯等在上海发起国难救济会，他加入该会为会员。十二月中，国专广大学生，冒着寒风，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回失地。唐校长亲自送到校门口。过去对学生，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徐名翬编《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周振甫年谱》：“……这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声称南满铁路之长春柳河铁桥为我军炸断，当即发兵攻占沈阳，同时占领安东、长春各地。地方当局奉蒋介石令不加抵抗。无锡中学学生至我校要求我校同学同时出校参加游行。校长不能阻止。我即随我校同学与无锡中学同学一起出校游行。继而无锡中学同学决定去南京请愿，我亦与我校（同学）同去南京。”

十二月，第一进新校舍落成（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一月二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顾倬、唐保谦（唐星海代）、蔡兼三、钱基博、孙家复、穆藕初（唐星海代）、钱孙卿（钱基博代）、高阳、陆仁寿、蔡其标等人，讨论校长、教职员应如何指导学生从事积极救国工作等事。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日会议》（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议决：当兹国难方殷之时，应请校长、教职员竭尽心力指导学生从事积极救国工作，切实求学，为国储才，万不可随波逐流，消极罢课，趋于自杀。劝告学生文另日发布，请高践四先生会同顾述之先生起草。”

一月，补行第六班学生毕业礼，共二人。招考插班生（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一二月间，上海发生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犯的战事，即“一·二八抗战”，或称“一·二八事变”。因受沪战影响，无锡国专各教授寒假后已齐集，而学生到者不及半数。诸同人互相激励，照常开课，并通知未到学生从速到校（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第四版）：“迨民国二十一年春，中日淞沪战事起，时各教授虽齐集，学生因水陆梗

阻，到者不及半数。教授冯君振心、朱君叔子等互相激励，茹苦含辛，勉尽半义务，照常授课；而钱君子泉以教育校董长来兼教授，并半薪不受，尤为可感。此吾校精神坚定表见之一端，尤可纪念者也。”

“一·二八事变”期间，陈衍曾携妻小避兵无锡，借居于唐文治家中，两人“昕夕谈经史不辍”。

陈声暨编、王真续编、叶长卿补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见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一九三二年）二月，挈妇幼避兵无锡，住唐蔚芝先生寓楼，昕夕谈经史不辍。”

唐文治《陈石遗先生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八）：“……惟余与先生皓首订交，沂[忻]合无间。回忆壬申之春，时局不靖，先生避居余寓，一角危楼，患难与共，谭论经史，往往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一·二八事变”后，无锡国专第五届毕业生王绍曾结束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校史处的工作回到母校，任图书馆主任。

文心摘编《老树花茂——文献学家王绍曾学长记略》（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六、二十七期）：“……‘一·二八’事变，绍曾学长不得不离开校史处，回到了无锡国专。到了母校，他接替蒋天枢先生担任图书馆主任，其间撰写了《无锡国专图书馆善本书志》、《小绿天善本书志》、《缪艺风著述目补》等。”

按：上文中说王绍曾“到了母校，他接替蒋天枢先生担任图书馆主任”，但王绍曾《致刘桂秋信》中说“当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我回到母校图书馆工作，当时图书馆新馆刚落成，我开始用刘国钧的图书分类法把原有的图书重新分类编目，有一个姓丁的同事（当时他是图书馆的负责

人)……同时把丁某调离了图书馆,由我当图书馆主任”,据此则王绍曾担任无锡国专图书馆主任,接替的是“姓丁的同事”的职务。

二月,教授陈邦怀辞职,仍聘请朱文熊继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三月,李朝启教练官由训练总监部召回(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四月,不放春假,补足迟到学生功课(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六月,举行第八班第八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道平、李怀清、吴毓麟、周树慈、周继昌、范兆楨、马厚德、缪文逵、叶润青、姚云照、崔竹生、陈震、陈振东、戚元良、郭则湘、黄荣、黄元亨、曹甘霖、傅鸿渐、盛和鸣、蒋占梅、顾尔钺、张成举、杜荣培、陶存煦等二十五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

本届毕业生中的吴毓麟(即吴天石,原名毓麟,一九一〇~一九六六)在无锡国专读书期间,“人在无锡,心系南通”。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组织的“剧联南通分盟”六个成员之一,利用寒暑假回家乡南通的机会,写剧本,编刊物,参加演出,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许含章、朱瑞兮《献身文化教育事业的吴天石》:“一九二九年,他(按:指吴天石)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读书,积极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是左联组织的‘剧联南通分盟’六个成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吴天石编辑宣传抗日的刊物,参加抗日话剧的公演,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按:夏企贤《吴天石建树在南都》一文中说吴天石“在无锡国专期间,人在无锡,心系南通,寒暑假回南通总参加剧艺

活动”。又据欣文《吴天石年表》中载，一九三〇年夏，吴天石加入南通新民剧社，曾参加演出《居住二楼的人》、《月亮上升》等剧；又曾编过一个倾向革命的话剧《十年归》，由新民剧社演出。一九三一年二月，赵铭彝、郑君里赴南通指导成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通分盟，吴天石为分盟领导人之一。本年中，吴天石还致函欧阳予倩，并附寄所写诗剧《李太白之死》求教，欧阳予倩很快复信，对剧本提出意见。一九三二年春，吴天石与顾民元在南通编辑发行《文艺组合》杂志。五月，梁腾、梁志仁编辑的《枫叶》文艺旬刊在南通创刊，吴天石为之撰稿。

本届毕业生中的郭则湘（字衡九，约一九〇七~？）与上届毕业生中的郭则澍（字晴湖，约一九〇九~？）是一对兄弟。他们先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无锡国专毕业，时有人戏称其为“兄弟状元”。

邹绵绵《孙伯亮先生事略》：“……他（按：指孙伯亮）与当时学人亦多有结交，如福州郭则湘（衡九）、郭则澍（晴湖）兄弟，早年均就读在‘无锡国专’，并先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该校。他与两郭交契至厚，尝戏称郭氏昆仲为‘兄弟状元’。”

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四：“门人郭则湘与弟则澍，皆无锡国学馆最优等毕业生。郭氏本世家，至乃父同甫薄宦清贫，则湘兄弟充学校讲师，以助家计。则湘曾为松江某署书记。则澍有《寄家兄》云：‘岂为莼鲈始薄游，翩翩书记未风流。人生到处应何似，世事如今不自由。浊酒难拚千日醉，新诗每寄百年忧。悬知风雨华亭夜，东屋西头感未休。’清况可想。鄙人常劝其讲求实学，勿多作牢愁语也。”

七月，钱基博受唐文治委托，在上海参加全国高等教育问



题讨论会，并向大会提交“尊崇孔教，以正人心”的提案，被与会者认为提案不成立。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民族卫生的路径》：“在中国提倡人文主义的教育应该还是比较不难的，因为中国文化里早就有一派很成熟的人文思想，而这一派不是别的，就是孔门的……可惜过于短视的中国教育家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一年在上海举行的高等教育讨论会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蔚芝先生提出‘尊崇孔教，以正人心’一案，竟被认为不成立。不知因为提案措辞陈旧呢，还是因为诸位教育家根本不认识孔门思想颠扑不破的价值呢？”

《钱基博先生的意见》（见《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民国二十一年七月，日人一·二八之难方已，上海各大学校长以复兴中国教育为海内号，乃召集高等教育问题讨论会于新青年会。仆以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唐蔚芝先生之委托，代表出席，说明尊孔读经两提案。乃大为到会诸大学校长所揶揄，而某甲某乙两君尤作越世高谈，几谓不成话说，不意今日而尚有此等不成问题之提案，戏笑怒骂。於戏！试问世界东西各国，何国之大学校长而敢于出言鄙俗，唾弃其祖国之圣经贤传，一至于此？甲君目不读中国书，不知周公、孔子为何人，虽以中国人而办中国学校，不过以为一种职业，而不甚了解其意义与责任；乙君颇负清望，而亦一言以为不智……”

八月，招收第十一班学生四十六人。

八月，党义教授刘觉民辞职，聘请邱有珍继任。军事训练教授蔡莘耕辞职，聘请董志尧（一八九三～一九八六）继任。叶长青辞职，聘请周澄（字哲肫，生卒年不详）继任；周澄讲授《史记》、《汉书》、中学国文教学法等课程。又聘秦仁存

(原名汝钦，字亮工，一八八〇~一九五六)为书法教授(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九月十四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新学期开学。鉴于前些年中，投考学生往往程度低浅，故自本学期开始，增设补习班。又本年春间，因时局不靖，校董捐款及学生所缴学费均停滞，教职员曾实行减薪，自本学期始恢复原有薪酬。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因投考新生往往程度低浅，即高中毕业生亦有不能及格者，为应社会需要，并谋补救办法，特添设补习班，补习时间暂定一年，招收学生三十五人。”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壬申六十八岁》：“七月、八月，两次招考新生，来试者尚涌跃，共取八十六名。八月十四日开校，学生先后到者一百六十三人，别设补习一班。春间因时局不靖，校董捐款及学生所缴学费均停滞。不得已，实行减薪：教员减三成，职员减四成，惟月薪三十元以下者不减。诸同人辛苦维持，至是始得复旧。”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唐校长体谅低工资职工的具体困难，‘一·二八’期间，学生减少，学校经费困难，教职员都适当减薪。他在会议时提出工资在三十元以下者不减。参加会议的主任及教授表示赞成，低工资者心感老师们的照顾。由于教职员工同心协力，国专在人数少的情况下办得井井有条。也正由于这个缘故，低工资的员工乐于在国专做事，即使别处以较高的待遇相邀，也不愿离开。”

十二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由无锡国专学生会集资排印。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诸生，索余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稿，而集资以铅字

排印贰百部，索跋于后。余搜讨旧献，旁罗新闻，草创此编，始民国六年，积十余岁，起王闿运以迄胡适，衰然成巨帙，人不求备，而风气变迁，大略可睹……”

按：《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是由无锡国专学生会集资排印，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为非卖品。一九三三年九月，此书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书名改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本书题为“现代”，而书中之所叙，实自晚清以迄民国前期，涵盖了民国纪元前后五十年左右的时期。全书共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古文学”，分文、诗、词、曲四类；下编为“新文学”，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类，均以文体为纲、作者为目，既总叙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也就作家作品作具体的分析和比较。

十二月，无锡国专因整饬校风，令退学者十三人（据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壬申六十八岁》）。

按：胡子远《往事杂忆》一文中说：“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头，国专同学，和其它学校一样，爱国不敢后人！学校中的进步力量是相当强的……校友中如俞铭璜、许务实（符实）等同志，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有《许符实同志谈无锡国专》一文纠正胡文的不确之处说：“我在国专的时间很短，在校也没有什么革命活动。我一九三〇年到国专读书，三一年参加抗日学生运动，三七〔二〕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胡子远《往事杂忆》中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是，我当时的年龄还不够资格入党呢。当时团员也只有三个，我是支部书记，一个是已牺牲的凌云同志，一个是现在北京的马宾同志（当时叫张世泉）。文中把我写作许务实，不错，当时我是叫许实，号务实。我一九三二年十月参加CY，十二月被捕，押到南京，就被国专开除了。后来国专给我开了

一张肄业证书。”又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一文中曾提及许实被逮捕的原因：“无锡国专的学生虽然读的是古籍，专修古典文化，但时代潮流的冲击无法抗拒，青年人对新的事物还是敏感的，学生中有不少人阅读进步书籍。当时左联的机关报《文艺新闻》曾在校中推销（由吴天石同志代办订阅）。在崇安寺专售进步书籍的千钟书店，最大的主顾是国专学生，并由此引起许实（即许符实）等同学被反动派逮捕的政治案件。”而许实遭逮捕后被无锡国专除名，当即是“令退学者十三人”之一。

本年中，陈中凡应邀到无锡国专作《中国近三十年学术史》的学术讲座。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一九三二年，当时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的陈中凡也曾应邀来校讲课，内容是《中国近三十年学术史》，从晚清魏源、梁启超、严复、刘师培、章太炎等学术革新，‘五四’运动所推动的文学革命，到当时的革命思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在无锡国专的讲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唯物史观’、‘普罗文学’等名词，第一次向学生介绍了新文学流派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等。原来是为三年级学生开的学术讲座，却轰动了全校，每次上课，尊经阁楼下大教室内座无虚席。”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一月十八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顾宝琛、陈纶、秦冕钧、华绎之、顾倬、钱基博、孙家复、钱孙卿（钱基博代）、高阳（孙家复代）、陶达三（高涵叔代）、唐保谦等人，讨论有关学生管理问题（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十八日会议》）。

一月，举行第八班第九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玉衡、徐则、高君仁、高申第、孙树恩、周明湘、徐靖坤、窦彬、陈猷等九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招考插班生。

按：上年一二月间，因受“一·二八事变”影响，无锡国专有不少学生未能于寒假后准时到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于“民国二十一年”中记：“四月，不放春假，补足迟到学生功课。其缺课过多者一律延长一学期，改在冬季毕业。”上述毕业生即为第八班之“改在冬季毕业者”，是为“第八班第九届学生”。

三月，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一九〇四～二〇〇七）应唐文治之邀，到无锡国专作《新时代青年的修养》的演讲。

按：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孙元良时任国民党第五军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奉命领兵集结于南翔。日军在吴淞、闸北地区久攻不下，便将突破重点转向庙行镇一带，庙行战况顿时吃紧。孙旅等部于危急关头赶去增援，使日军在庙行遭到空前挫败。之后，孙元良又亲赴所部五一七团团部，指挥该团在葛隆镇顽强抗敌，从而确保中国军队归路不断。《上海停战协议》签订后，孙元良因军功升任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师长。此次孙元良应唐文治之邀，到无锡国专做演讲，讲题为《新时代青年的修养》，《新无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第三版有“潜夫”所记的演讲记录稿，其主要内容是：“要做一个新时代的青年，须要用礼义廉耻，和有冷静的头脑，坚决的意志，强健的身体，去修养。还要认清时代的环境，去求全国的精诚团结。”

三月，应唐文治之邀请，章太炎（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由苏州赴无锡进行讲学活动，随同章太炎一同前来的有陈衍、李根源（字印泉，一八九七～一九六五）、陈柱、蒙文通（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等。十三日下午，章太炎在无锡国专大礼堂作第一次演讲，章太炎演讲时“未有讲题”，当时有章氏弟子和无锡国专学生各自记录，经整理后刊载于不同的刊物，分别取题作《国学之统宗》和《章太炎先生讲“经学”》。章太炎演讲结束后，李根源接着作简短演讲，主要介绍云南兵要地理。

伯亮《章太炎先生讲学琐记》（见《新无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第三版）：“国专延请当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于昨日下午在校讲学，记者亦趋往旁听，兹撮记其琐事如下：上午十一时许，章先生自苏乘车来锡，同来者，有国专教务主

任冯振心，当代大儒陈石遗（衍），前国务总理李印泉（根源），国学家陈柱尊，前中大教员蒙文通等诸先生，暨章之门徒戴君、朱君、许君。太炎先生，穿蓝绸豹皮袍，玄哗叽马褂，眼架托立克金丝镜，发花白，蓄须，惟不甚长，亦不甚多，瘪嘴。陈、李诸先生则均服布衣，异常朴素。下午二时，在该校礼堂开讲。章抵礼堂时，学生咸起立鼓掌欢迎，先由校长唐蔚芝先生致词介绍，学生复鼓掌，于是章即于掌声雷动中，步上讲台，安坐藤椅内。未有讲题，开场客套后，旋谓……至此而止，已历两小时有余。唐蔚芝先生起立致感谢词，请章先生等明日上午在省立师范大礼堂，公开演讲。本校明日停课一天，诸同学于明日上午九时半，整队前往省师听讲。言下，即请李印泉先生演讲。李先生谦逊再三，始起立略致数语，谓此次随章先生来锡，一以久慕国专，前来观光，一以拜谒蔚老。鄙人才识浅薄，实无所言，聆听章太炎高论，佩服之至，希望诸位努力进修，拨乱反正云云。众鼓掌，遂散会。按：章先生为浙江余姚人，乃有清俞曲园先生之门徒，对于经学法律及释氏诸学，尤所擅长。演讲时，语音甚低，又以缺齿关系，开口微有走风，兼之绍兴国语，故坐位稍远者，颇难辨别。章先生讲话，频吸纸烟，又时饮茶，遇有人名之生冷者，辄即起立粉笔书之黑板。一次，误以纸烟当粉笔，遽向黑板上写，听者咸不觉报以一笑。陈石遗先生，年已七十有六，精神殊健，身材瘦长，面色微黑，上唇蓄有短须，其色皓白，望之如一印度学者。谈话乃福建语杂以北音，亦颇不易懂。李印泉先生身材魁梧，面圆，额下蓄有长须，穿灰布袍，黑杠布马褂，戴方顶瓜皮缎帽。曩予尝与先生通信，初未识荆，因见其后颈结有一大疤，而忆及先生昔年曾患痘症，始断定即系李先生，询之果然。李先生演讲时，嗓音洪亮，真有声震屋瓦之

概。唐蔚芝先生须发皓然，而体又壮硕，满面慈容，正襟危坐，如一长者……”

按：上文中“暨章之门徒戴君、朱君……”，“朱君”疑为“诸君”之误，即诸祖耿。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李根源系云南军人，讲了云南兵要地理，阐述了中越边界的地理形势，并向图书馆赠送了一册云南讲武堂测绘的明细地图。”

郑学弢《回首母校——记六十年前的人和事》（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唐校长讲理学，但他没有门户之见……章老先生第一次来，就直率批评国专挂在礼堂里的一块匾。这块匾上面写着‘作新民’三字，他认为这是朱熹改动《大学》的文字。《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阮元《校勘记》无异文）宋代朱熹把《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作注，又认为‘亲民’应作‘新民’。‘在亲民’和‘作新民’这两种提法把民放在不同位置是显而易见的。章老先生对‘作新民’的批评，反映了汉学家和宋学家相互对立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是以汉学家的思想评论宋代理学家，然而唐校长并不因此而心存芥蒂，仍然每年请章太炎来校讲学。”

按：章太炎的此次演讲，由弟子诸祖耿记录，后以《国学之统宗》为题，刊于《制言》第五十四期。此次演讲的中心意旨，是“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接下来便分别申论之：《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就是要读《孝经》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孝经》文字平易，一看便了，而其要在于实行。”《礼记》中的

《大学》篇，讲的平天下的原则。“从仁义起，至平天下止，一切学问，皆包括其中。治国学者，应知其总汇在此。”掌握了《孝经》、《大学》中的要义，人之根本已立；但如果没有勇气，没有气节，则仍不能称为完人，所以要标举《礼记》中的《儒行》：“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也。”至于要讲《仪礼》中的《丧服》，则是要藉此以“辅成礼教”。总而言之，上面所说的四篇，合起来不过一万字，“以之讲诵，以之躬行，修己治人之道，大抵在是矣”。

又按：章太炎这次无锡讲学活动之后，于十月份再度应邀来无锡国专进行学术演讲，详后文所记。但这两次讲学活动都是在1933年一年之中，所以上引郑学弢文中说“仍然每年请章太炎来校讲学”，提法不够准确。

三月十四日上午和下午，章太炎在省立无锡师范学校作此次无锡之行的第二、第三场演讲。第二场演讲后经章氏弟子和无锡国专学生整理刊载，分别取题作《历史之重要》和《章太炎先生讲“史学”》；第三场演讲后经章氏弟子和无锡国专学生整理刊载，分别取题作《〈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和《章太炎先生讲〈春秋〉》。无锡国专为此专门停课一天，学生全体前往听讲。下午章太炎演讲结束之后，复由蒙文通演讲。

伯亮《章太炎先生讲学琐记（二）》（见《新无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第三版）：“昨日上午十时，章先生又在省立师范大礼堂讲四史，省师、国专、县中三校教员学生，均来听讲，来宾甚少，惟有军官数人，亦在旁听席。章先生抵礼堂时，均起立鼓掌欢迎。首由校长陈谷岑致数语介绍，并表感谢后，即请章先生登坛……下午三时，复在该处讲解《春秋》……下午听讲者不及上午拥挤，而中途退席者颇有其人。有一

班女生，约有数十人之多，坐未片刻，即全体转身而去，盖亦感觉无趣味耳。章先生讲毕，陈校长又请蒙文通先生登坛演讲。记者以时已薄暮，故即先行。”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蒙文通讲了佛教哲学唯识论，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新鲜。”

蒙文通《治学杂语》：“昔自沪归金陵，过苏州谒章太炎先生，时陈柱尊等伺先生，无锡国专唐蔚之〔芝〕邀先生游无锡，先生嘱同往。时人多言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涉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躐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行间，先生每喜与余谈论，常命近坐，虽饮食亦时命坐旁。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

按：章太炎三月十四日的二次演讲，也有弟子诸祖耿的记录稿，后分别以《历史之重要》、《〈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刊于《制言》第五十五期和五十六期。在十四日上午的演讲中，章太炎指出：“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论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史书的类目繁多，正史之外，有编年，有别史，有论制度之书，有述地理之书，有载奏议之书。章太炎以自己读史治学的经验，指点听讲者怎样以最集中的时间，阅读掌握其最精要的内容，说“有三年半之工程，史事已可烂熟”。再接下来，章太炎讲到读史的作用：“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又讲到古今之人读史关注目光的不同：“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最后，章氏提出“今日有为学之弊，不可盲从者有二端”：一为“讲哲学、讲史学，而恣为新奇之议论”，二为“今之讲古史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

处，吹毛索瘢”的“疑古史学”。而十四日下午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评述“《春秋》三传”（即《左氏传》、《谷梁传》及《公羊传》）的源流得失。

又按：近年出版的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一书收录了《国学之统宗》、《历史之重要》和《〈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等三篇演讲稿；紧接着在后面又收录了三篇演讲稿，分别题为《关于经学的演讲》、《关于史学的演讲》、《关于〈春秋〉的演讲》，并云后三篇是章太炎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的演讲。按：后三篇演讲稿均采录自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的《无锡国专季刊》，原来分别题作《章太炎先生讲“经学”》、《章太炎先生讲“史学”》、《章太炎先生讲〈春秋〉》。实际上，这三篇也是章太炎三月十三日和三月十四日三场演讲的记录稿。当时章氏弟子和国专学生各有所记，前者发表于《制言》，后者发表于《无锡国专季刊》，记录的文字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却是一致的；又因为章太炎演讲时“未有讲题”，所以章氏弟子和国专学生分别给演讲记录稿取了不同的题目。《章太炎讲演集》的编者对此未加细察，重复收录同样的演讲内容；又因为《无锡国专季刊》的刊出时间为一九三三年五月，便推定章太炎于是月又来无锡作了三场演讲，那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后出的刘琅编《精读章太炎》（鹭江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八月版）等书也承袭了这一错误。

在此期间，陈柱也在无锡国专大礼堂作演讲，题为《孟郊诗》。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敦请章太炎、李印泉、蒙文通、陈柱尊诸先生莅校演讲。”

舜年《陈柱尊先生演讲——“孟郊诗”》（见《新无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第三版）：“前天，我既将章（太炎）

先生与蒙（文通）先生介绍给读者，今天，我还得把陈柱尊先生的演讲来介绍一下。其实，陈先生到无锡来演讲，每学期总有几次的，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发表就是。原来他既是国专唐校长的高弟，而与国专校务主任冯振心又是同乡（广西北流）好友，况且几年前还在国专担任教师的。这次他同章太炎先生一行来锡，在前天（十三日）上午八时又在国专大礼堂演讲，讲题为《孟郊诗》。作者现在把他所讲的用浅近的文言记述于下……”

按：陈柱此次的演讲记录稿，刊《无锡国专季刊》，其中提到“余所以在此提出孟郊诗，有两大原因：一为孟郊雪冤，二为挽救今日之文澜，而后者之目的尤大”。

三月份起，经学生自治会倡议，无锡国专学生减膳聚资，以此作为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

《国专学生减膳救国》（见《新无锡》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第二版）：“慨自前年九·一八，东北三省失陷以来，凡吾国民，莫不热血沸腾，群谋抗日。本邑学前街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来对于救国工作，不稍后人。国难日亟，该校学生每逢假日，分头四出，作抗日之宣传，以冀唤醒民众迷梦。旋复募集款项，援助东北义军。最近又有学生自治会倡议，请得学校当局之同情，实行减膳救国。其法为每日每桌减少菜肴，上月份计全校捐出减膳洋有四十三元一角二分之谱，连同学生会经募，教职员学生捐款洋一百三十二元二角，扫数由交通银行汇交上海东北难民救济协会，虽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然集腋成裘，全凭积累。且历来捐出之款，为数业已不少，以尚在求学之学生而能如此，似觉难能矣。并闻该校学生自治会领导之下，复有东北问题研究会，及抗日同志谈话会之组织，专以讨论东北及抗日诸问题为目标，此种方法殊可为各校取

法云。”

四月，国专学生赴惠山驻锡第八十八师司令部练习实弹射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五月，派男女生赴江南中学男女部试教（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

五月，《无锡国专季刊》出版。

按：《无锡国专季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出版，无锡协成印刷公司印刷，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该刊由“专载”、“论著”、“文苑”（分“文录”、“诗录”、“词录”三类）、“杂俎”、“附录”等栏目构成，其中“专载”刊登了章太炎、陈衍、陈柱、钱基博等四人的演讲记录稿共七篇，其中章太炎、陈柱的演讲上已述及，此外尚有《陈石遗先生讲〈近代诗学论略〉》、《陈石遗先生讲〈国学中应读应看应研究之书目〉》、《钱子泉先生讲〈我国古代教育与今日教育之区别〉》，没有注明演讲时间，当也是陈衍、钱基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前在无锡国专为学生作的演讲。“论著”都是学生作品，共十二篇。

六月，举行第九班第十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丁舜年、王正履、周兑庵、徐义、倪志倜、俞振楣、孙谦六、屠楨、黄兆裳、杨炳方、杨全经、鲍元豫、戴宏复、薛玄鹗、钱绪堂、萧佩三、刘漪、黄奉璋、陈士群等十九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第九班学生入学时有八十人，因受时局、战事等因素影响，中途辍学者甚多，至此毕业生仅十九人，另有十二人延迟至下年一月毕业。

《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级史》：“本级入校，以民国十九年秋，时分□组，共八十余人。苏省占数之半，他若闽、

广、湘、鄂、皖、赣，咸不远千里而至。逮二十年秋季，以事辍学者，夥颐沈沈，凡三十余人。东北变兴，日人时思扰我畿辅；二十一年一月，淞沪战起，江南各邑动摇，春季始业，不惜冒险夷以至校者，仅十余人耳！时锡邑学校，辄有停课者，惟我校师生，教学如昔，未尝一日辍！今岁夏季，本级例得毕业，合以辍学补读同学，都凡十九人云。”

本届学生中的俞振楣（字子石，生卒年不详），与第五届学生中的王绍曾、第八届学生中的陶存煦（字闾孙，号天放，约一九一二～一九三三）等三人，甚得无锡国专教授、教务主任钱基博的赏识。钱基博说“吾自讲学大江南北，得三人焉”，指的就是这三人。

王绍曾《致刘桂秋信》（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隔了二年，（一九三三年六月，钱基博先生）在第十届毕业生俞振楣的毕业论文上批道：‘吾自讲学大江南北，得三人焉。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于韩愈文得俞生振楣。’在国专传为佳话。陶存煦和俞振楣的毕业论文，都在《无锡国专月刊》上发表，并未作为丛刊出版。陶存煦毕业后专攻清代目录学家姚振宗，不幸英年早逝，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中有陶存煦撰《姚振中〔宗〕年谱》。俞振楣毕业后在上海当中学教师……”

按：陶存煦的毕业论文为《章学诚学案》，后刊于《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俞振楣毕业论文为《欧阳修志》，后在《国专月刊》第四卷第四期上刊出《欧阳修文渊源考》。又叶劲秋《唐文治老先生的办学精神》一文中，也曾叙及俞振楣毕业论文的撰作情况：“‘国专’学生撰写的毕业论文，并非到毕业时才动笔。在进校的一年级，或二年级，即发表大批毕业论文的题目（学生亦可自拟送审），由学生选择，去请教师

指导，如何撰写，如何搜集材料，等等。确定了论文题目后，每日课后时间，除了复习当日课文，即坐图书馆，查阅有关材料，分门列类，摘抄成册。如遇不易理解的材料，或不易找到的材料，再去请教指导的教师。如此日积月累，材料准备充分，写起来就不感到太难了。当时，有一位学生俞振楣（金山人），他写的论文，题目为《欧阳修志》，约有十万字左右。他自己叙述或说明的文字很少，绝大部分是集用材料的原句，而连续成文。老先生（按：指唐文治）阅完此论文，微笑地批了‘天衣无缝’四字，给了一百二十分。可见他埋头三年，在课外读的书，不亚于在课内所读的书。这也是一种可贵的教学方法。”

七月十八日，无锡国专第八届学生陶存煦，毕业甫及一年，便因病而辞世。

曼玲《陶存煦殉学记》：“陶君存煦，字闾孙，别号天放，籍山阴，为故绅荫轩公之孙。幼勤学，性慈孝，为族里所称道。初入越中肄业，在校嗜治国故之学。民十八，录取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唐文治、钱基博等游。课余从事制作《章实斋学案》，学大进，去岁毕业，名列榜首。是年秋，入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致力于目录考据之学，获交海上学者胡适之、王云五、姚名达辈。《学案》一书，日夜焚膏，以促其成。今岁春假返绍，偕友赴道墟乡寻觅章实斋墓址，摄影而归。旋赴沪，忽起沉疴，医谓系腹膜炎。五月，告假再返，即延越中名医王铁如诊治，投以附子玉归药，疾转剧，兼染慢性脑膜炎，群医束手，药石罔效，竟于七月十八日夜与世长辞。君年仅二十有一，遗子女三。逝世前四日为联自挽曰：‘死生原本一理，但浙东坠绪茫茫，孰继吾业？寿夭同是有尽，愿重闾春日绵绵，莫报寸心！’下署‘癸酉又五月下浣存煦扶病自

挽’。君有遗著三：一曰《姚海槎先生年谱》，一曰《章实斋先生著述年谱》，一为《章实斋学案》。惜后者未竟全功，引为憾事。八月二十二日为君殡期，灵柩出宅至城南南渡桥下舟，送者塞途，其感人至深，有如是者。呜呼，可以风矣！”

沈达夫《众中形影只成孤》：“越中同学陶存煦是一个白面书生，走起路来像弱不禁风的样子，因为他的相貌很像光绪皇帝，无锡国专同学多叫他光绪皇帝而不名。他父亲是陶泰生布庄的老板，在绍兴可算是手[首]屈一指的富翁。他却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自己将来有一天会穷途没落，而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去搭救他。这时，他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已就学半年，竟节省下自己的零用钱，又向一些老同学张罗，要我陪他一起就读。无锡国专以前也叫国学专修馆，向政府立案时才改今名，是国内专门研究国学最著名也是唯一的学校，校长唐文治先生是一代经师，曾做过前清尚书，后长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听说顾颉刚曾考该校而未被录取。所聘教授亦多名家。如章太炎、陈石遗、钱基博等氏，均先后在该校讲学。我原就读于杭州国专，可说是一家人，既有此机会，自亦乐于一试。经过入学考试，我插班一年级下期，与陶君同班而且同室……后来存煦毕业于无锡国专，转入光华大学。他专研究章宝[实]斋的《文史通义》，不料脊骨患了——也许是癌，遽而一病不起。弥留时还自撰挽联：‘死生原一理，浙东坠绪茫茫，谁继吾业。离合本无常，庭前春日迟迟，莫报寸心。’我写了一篇白话挽文，追述生平，挂在他的灵前。其中有一段提到我们为了学间争吵之后，又同往郊外——坐在草地上，一边吃花生米，一边很愉快地谈笑。此情此景，至今犹如在眼前。”

按：上引文中又记：“在无锡国专过了半年，我就辍学。”



故该文作者沈达夫未能在无锡国专毕业。

七月，招收第十二班及补习班学生共九十四人。建筑第二、第三进新校舍十四幢（一说十二幢），又扩充运动场一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同时，重修了原在孔庙大门东偏的忠义孝悌祠。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酉六十九岁》：“六月，与钱君子泉商议，将国学专修学校校舍改建，两造共十四幢，计费共一万二千八百元，落成后布置膳堂，悬王文成、高忠宪、顾亭林、陆桴亭四先生遗像，并摹刻先师左文襄公所书楹联，并改建忠义孝悌祠，计费三百四十元。祠费钱君与余分任之。”

唐文治《重建无锡忠义孝悌祠记》（见《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六）：“邑故有忠义孝悌祠，在孔子庙大门东偏，以祀邑人之副其行者，式拜式瞻，民俗以敦。徒以官失其守，屋坏弗修。邑人君子既割以畀我国学专修学校，而更新为横舍。余以庸陋，实掌厥校，乃度地鳩工……乃择地名宦祠之迤南，面西而背东，建屋三楹，以为忠义孝悌祠，而执事孔子庙之旧有劳以食于庙者，并以祔焉。其费所出，余与邑彦钱君基博子泉分任之，不足资之国学专修学校，癸酉九月工告造功。董其成者，则陶君守恒达三、孙君家复颀香、高君文海涵叔之力为多，皆邑之良也。”

八月，教授周澄、邱有珍、秦仁存，职员丁儒侯（字素堂，生卒年不详）等人辞职，聘请叶长青、李惕平（原名国栋，字涵苍，一九〇六~一九七七）、曹铨（字次庵，生卒年不详）、吴良澍（字溉亭，一八八四~?）等人继任，又聘陈鼎忠（字星环，又字天倪，一八七九~一九六八）为教授

(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陈鼎忠讲授《经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史记》、《汉书》等课程。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酉六十九岁》：“七月招考新生，投考者极踊跃，录取一百余名。八月开校，实到新生二百六名。请湖南陈君天倪名鼎忠为教授，品行笃诚，学问渊博，著作极夥，真良师也。”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又有益阳陈鼎忠天倪，精经学，崇郑学，著有《六艺后论》，讲经学概论即以此为教本。陈氏又讲《史记》、《汉书》等课。”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陈天倪教授（名鼎忠）一九三四年来校，讲授《经学概论》、《中国文化史》、《汉书·食货志》等课。他完全按照古文学派的说法，深入浅出，师生水乳交融。”

按：叶长青于上年八月辞去无锡国专教职，这次是再度应聘就职。又陈鼎忠来无锡国专任教，是在本年八月，而非黄汉文文中说的“一九三四年”。

十月中旬，唐文治应国学讲习会之邀，赴苏州讲学，演讲《论语大义》、《孟子大义》等。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酉六十九岁》：“八月初，苏州国学会李君印泉名根源、金君松岑名天翮等约余赴苏演讲。爰于是月二十四日到苏，住福州同年陈君石遗家，讲《论语》、《孟子》并《性理大义》。二十五日早，访叔彦一谈，傍晚返锡，讲义印入《国学论衡》中。”

诸祖耿《章氏国学讲习会纪事》：“……八月，国学会也邀请唐文治来苏讲学，二十四日到苏，二十五日傍晚回锡。”

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和诸祖耿文中都是用的农历，是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公历日期是十月十三日和

十四日。

但据下引的《新无锡》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的报道，唐文治作演讲是在“前日”和“昨日”，即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与《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及诸祖耿文中所记，在时间上相差一天。姑录以备考。又按：唐文治这次苏州讲学的演讲稿，后以《苏州国学会演讲录》为题，载录于《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三。《苏州国学会演讲录》分《论语大义》和《孟子大义》两部分，唐文治在演讲开头提到：“……迨乎近世，文化更不及曩时，将何以挽救之？鄙意国有文化，方可救国；苟不用孔子学说以振兴之，虽欲救国，其道无由。故惟尊孔读经，乃能救国。犹忆民国初年，英使朱尔典回国时，尝谓福建严又陵先生曰：‘中国决不至于亡国，盖国有大宝，如四书五经，诚能发扬而光大之，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富强可立而待。’此意与鄙见不谋而合。鄙人之所以主尊孔读经者，在救人心与救人命。”

《新无锡》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第二版《国学大师唐蔚芝昨晚返锡》：“本邑国专校长唐蔚芝先生，于前日上午赴苏讲学等情，曾纪本报。兹悉唐先生于前日抵苏时，到站欢迎者，有李根源、陈石遗、金松岑及张一麀氏代表徐沅秋诸君。唐氏下车后，由本地士绅名流举行公宴于胭脂桥陈宅，出席者，为章太炎、苏炳文、费仲深、李印泉、吴子深、金天翮、张一麀、郭竹书、徐沅秋等四十余人。午后二时半，唐氏至公园图书馆国学会演讲论语学，听者达一百余人。馆长杨咏裳君，殷殷招待，异常忙碌。晚间由苏炳文将军设宴私邸，邀请诸老及国专教授冯振心君，欢叙一堂，畅□学术。儒将风雅，苏将军可当之无愧。昨日上午九时及下午五时，章、唐两大师又均在公园图书馆举行国学演讲，听者甚众。唐先生演讲毕，

即于六时许乘车返锡云。”

十月二十一日，章太炎应唐文治之邀请，再次从苏州至无锡。下午在无锡国专大礼堂演讲，讲题为《适宜今日之理学》。二十二日下午，在无锡国专大礼堂讲《中国人种之由来》。二十三日上午，在省立无锡教育学院讲《农村教育家对于将来中国农政上应有之准备》。

《锡报》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二版《朴学大师章太炎昨日来锡讲学》：“当代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应本邑国专唐蔚芝校长之请，由苏来锡讲学两天，于昨日上午乘十一点快车抵埠，随行弟子有苏州东吴大学教授振华女学副校长王佩诤，及苏州中学高中部教员诸祖耿、徐沅秋、王乘六、王颂平等，由国专教导主任冯振心到站欢迎章氏至校，唐氏即设宴招待。下午二时，章氏在国专，登台演讲，听者数百人，讲题为《现代适用之理学》……”

《锡报》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版《朴学大师章太炎试泉漪澜堂》：“朴学大师章太炎氏，前日抵锡演讲，详情已志本报。兹闻章氏于昨日上午九时，偕及门弟子王謇、王乘六、诸祖耿、徐澄、王颂平等五六人，畅游惠山，徘徊漪澜堂上，酌泉试茗，复至竹庐山房、云起楼、寄畅园等处游览。下午二时半，在国学专修学院讲中国人种之由来……”

《锡报》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二版《朴学大师章太炎教育院演讲》：“朴学大师章太炎氏，昨日上午应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及创办人俞庆棠之请，于八时由高院长亲诣国专唐校长私邸，恭迓章氏至院。遍览一周，对于高、俞两君历年成绩，异常赞美，乃手篆‘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八字为赠。九时许，在该院大礼堂开始演讲。题为《农村教育家对于将来中国农政上应有之准备》，援古证今，经经纬史，听者



大为心折。随从弟子记录讲稿者，仍王蹇、诸祖耿、王颂平、徐运秋等。章氏正午，由高、俞两君设宴款待。席散后，并由高院长等导游梅园、鼋头渚、万顷堂、小箕山等。游筇所到，湖山生色，流连久之。至六时许，由国专及教育学院两校代表送章氏至车站，乘下行□返苏云。”

按：据《新无锡》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三版卢景纯《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讲学记》中记，唐文治赴苏州讲学时，曾“面邀章先生，二次来锡”，于是有章太炎本年中的第二次无锡讲学之行。诸祖耿《雪龕自订年谱》中云：“是年三月十五日、十六日两日，陪同太炎先生赴无锡应国专专修馆唐蔚芝（文治）校长之请，太炎先生讲《适宜今日之理学》，我记录……十六日先生讲《中国人种之由来》。”这里说“三月十五日、十六日两日”，显然是记错了演讲日期。《适宜今日之理学》有章氏弟子诸祖耿的记录稿，刊《制言》第五十七期，其内容主要为两部分，一为“国人同所需要之学”，章氏着重强调“当今之世，讲学救国，但当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当取其谈天论性”；二为“无锡特宜注重之学”，章氏认为今日无锡“工厂如林，商业繁盛，非顾、高二公之时之比，然通商之地，人心趋利，盖习俗之移人也”，故“设教者当取白沙一派，亦使学子知‘吾与点也’之趣，然后可与适道”。《中国人种之起源》有无锡国专学生卢景纯的记录稿，刊《新无锡》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三版。章氏在演讲中说，研究史学，当注重“人种之起源”。外国人尝言中国自巴比仑来，对此章氏反驳说：“中国西北为葱岭，再外为昆仑山，再外为喜马拉雅山。巴比仑人，安能逾此山岭，入我中国乎？”然则号为黄帝后裔之汉族，果自何来？章太炎给出的结论是“来自西羌”，其主要论据有二：一为言语相近，汉族与西羌

言语，皆为单音；二为“古之伟人多出于羌地”。

又按：本年中章太炎两次赴无锡国专讲学，其间唐文治也应邀到苏州讲学，这实际上是无锡国专和苏州国学会之间的双向学术交流活动。此外，作为一种交流学习活动，唐文治不但“请进来”，还让学生“走出去”，曾选派高年级学生前往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课，每周两天，详见一九三五年事中。

又按：章太炎二十三日上午在省立无锡教育学院的演讲《农村教育家对于将来中国农政上应有之准备》，随行弟子诸祖耿在《雪龕自订年谱》和《章氏国学讲习会纪事》中均未提及，在汤志钧所编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和姚奠中、董国炎所著的《章太炎学术年谱》等书中也没有相应的记载。这次演讲的记录整理稿是否在刊物上发表过，尚待进一步的查检。

十一月二十日，陈鼎忠在致家人的信中，讲述了他来无锡国专任教几个月后对学校及唐文治、陈衍、钱基博等人的印象。

陈鼎忠致家人信（见《尊闻室臆稿·家书》）：“……陈石遗老人在本校教《通鉴》，年七十八岁，齿未落，头未白。家住苏州，每星期来此一宿，风雨无间。前年生一幼子，亦异人也。唐校长工夫，全在一敬字。端坐终日，毫不倾倚，貌极温和，言极恳挚。无论何矜才使气之人，一见即嗒然若丧，足见理学之力甚大；人无智愚贤不肖，未见有非议者。以此知诚能动物，非虚语也。或亦江苏人程度较高之故；若在湖南，恐不能免谤耳……此校学生皆诚心听讲，貌多醇厚，足见江苏文化，必可重兴。余稍有积蓄，当效东坡之买田阳美也（阳美即宜兴，田甚美），不欲还湘矣。本校学生，多盛陈其本地胜迹，请余往游。余以本校例不缺课，而游

资，学生必欲代出，深恐累人，力辞不往，其诚恳至可感也。本校原名国学馆，后立案教育部，资格与毕业大学等，章程亦经部修改。寅老于课程颇有疑义，未知此意也（黄光涛君索校章，已寄一份与之，不知到否）。本校钱基博君（兼任上海光华主任，本县人，今秋来任校课）赠余近著二册，甚博而知要，一见订交，情极恳笃；与柱尊兄（大夏大学国文系主任）均以正学导后进……”

按：此信中言钱基博“今秋来任校课”，不确，钱基博自一九二七年起即在无锡国专任教。

本年中，无锡国专学生徐义（字仁甫，生卒年不详）、薛玄鹗（字思明，生卒年不详）、任谷（字授经，生卒年不详）等九人经叶长青介绍，拜陈衍为师。冯振知道此事后，也来行礼，请列为弟子。

无锡国专南京校友会《怀念冯振心先生》（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三三年，徐义、薛思明、任谷等九位同学请总务主任叶长青介绍，拜陈石遗教授为师。正点燃红烛欲行拜师礼，冯先生赶来了，坚请和学生们一同拜师。礼毕，陈石遗教授赋诗一首为赠，并对冯先生说：‘“十乱才难”，你就权充“妇人焉”。’这首诗已不易看到。前几年，许莘农校友的诗友偶然发现，抄寄于许。其诗曰：‘弁山吴会英才集，十乱才难仅九人，我有郁林老都讲，葫芦依样却翻新。’”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三年级学生薛玄鹗（思明）等九人，希望能多接受石遗先生的教导，征得他老人家同意，定期举行拜师礼。仪式很隆重，在图书馆东侧平房内，点了一对红蜡烛，请老师上坐，每人向老师作一长揖。冯振心老师知道了这件事，也来行礼，请列为弟子。陈石老当时曾写七绝一首叙其事。薛思明曾背给我听过，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我听薛

思明说：‘以前冯先生请石老改诗，石老很客气，偶然提一、二点个人的看法，请他自己斟酌。冯先生的诗文本来就很好，自从行过拜师礼，石老稍加改动，益增风采。他还讲为什么要这样改，我们听了得益不浅。’同学们知道这件事后，有几位也想在毕业前向唐校长行拜师礼。唐校长没有同意，他说：‘诸生来校肄业，与鄙人师生名分已定，诸教授皆诸生之师，不必再向鄙人行拜师礼。’此事不知怎么传到了陈石老那里，他对薛思明他们说：‘唐校长所见甚大，我和诸君多此一举了。’薛思明又说：‘石老和冯先生本系同事，所以拜师前很客气。至于对学生，拜师前后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只是我们以前不好意思经常去请教他。’后来陈老也不再接受学生的拜师礼，学生要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热情接待。”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一月一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顾倬、顾宝琛、唐保谦、秦冕钧、钱基博、孙家复、钱孙卿（钱基博代）、蔡兼三（顾倬代）、华绎之、高阳等人，讨论教育股董事照章改选等事（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十八日会议》）。

一月，举行第九班第十一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于耆年、王莘嘉、朱裕昌、任谷、余晓峰、吴德明、余沂、叶荣宾、董道南、臧鯤、顾永悌、苏奎炳等十二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历届毕业生一览》）。

一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一、陈衍著《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出版。

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通鉴纪事本末书后》“解题”：“《通鉴纪事本末书后》作于一九〇九年，作者时任京师分科大学史学教习。一九三四年，此书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袁枢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每事首尾明晰，极省翻检。清代学部列为大学必修。陈衍认为读史‘贵能博观，贯以特识。不博观囿于一家之言，无特识常有受蔽之患’。故教授时选辑历代学者史评，更以自己评论贯于各

题，是为《书后》，以指导学生。袁枢共书二百三十九题，《书后》计一百六十七题。司马光修《通鉴》，重在治乱之迹，对制度因革则语焉不详。袁枢之书更甚，所辑兵事、篡窃十居八九。陈衍认为‘从来治乱兴衰之故，成于兵事者固多，而用人理财各要政，尤为治乱兴衰之源’，故另择《通鉴》中有关要政而首尾略具者，成《表彰六经》、《循良治积》二题。据此可见作者的历史观。”

按：《通鉴纪事本末书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此书版权页未标明出版年月，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载：“二十三年一月，本校丛书第一种《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出版。”

一月，租借左邻空地，开辟运动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二月，招考插班生（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三月，就原有运动场，改辟校园，并建亭棚，栽植花木（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农历三月，唐文治长南洋大学时的学生胡端行（字粹士，一八八八～一九四六）、张廷金（字贡九，一八八六～一九五九）等人为唐之七十岁生日发起集资，由无锡实业家、社会活动家薛明剑（原名萼培，一八九五～一九八〇）等人选择在五里湖滨的琴山山腰，购地十余亩，筹建茹经纪念堂。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三月，门人太仓胡粹士及无锡张贡九，以余七十初度，发起募资，在锡邑建筑茹经纪念堂，辞之不得。由薛君明剑等，相地于五里湖

之琴山腰，购地十亩许。昔俞曲园先生在西湖建筑俞楼，自谓有玷湖山。余不及曲园令望，抱惭益甚矣。”

四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二、唐文治著《礼记大义》出版。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癸酉六十九岁》：“寒假后整理《礼记大义》，助余缮校者，高君涵叔也。共四十六篇，分四卷，而以《类别提要表》等别为首卷。振谨案：治《礼记》者，多重考据名物，而不知修己治人乃其基本。先生此书，扫尽支离，独标真谛，专以反躬实践为主。其中如《曲礼》、《内则》、《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哀公问》、《孔子闲居》、《儒行》诸篇，尤为广大精微，允救时之良药矣。已刊入《茹经堂全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中。”

按：《礼记大义》，无锡锡成印刷公司印刷。此书版权页未标明出版年月，但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大事记》记载，是书于本年四月出版。全书共四卷，四十九篇。另有《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类别提要表》、《小戴礼记源流义例考》、《礼记应读书目表》三篇作为“卷首”。

四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三、陈鼎忠著《孟子概要》出版。

《孟子概要·目录》末尾作者题识：“余曩授经于东北大学，为《总论》及《分论》二书。《总论》通述历代经学之源流变迁，于式为纵，定名《六艺后论》，已印行；《分论》别著各经之纲领条贯，于式为横。未及完而南旋，兹先将《孟子概要》印行，以存其梗概云。”

按：《孟子概要》，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版。全书共分十四篇，依次为：世里略谱、生卒年

月、游事先后、师友传授、通经征实、著记定论、篇次大旨、外篇佚存、汉儒传讲、孙奭音疏、朱子集注、诸注略述、刺疑驳论、本书要义。

四月三十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四、陈衍著《史汉文学研究法》出版。

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史汉文学研究法》“解题”：“《史汉文学研究法》作于一九三四年，同年编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出版，时作者任该校教授。散文盛于《史记》、《汉书》，历代均有文论。陈衍此书有别于历代所论，不涉优劣而着笔于两书线索之安排，描写层次之曲折、提振、抑扬、叠句、倒句、倒叙、连锁以及提纲挈领诸法，剖析精微，与《说文举例》同宗旨，意在使学生领会《史》、《汉》文学之造诣而不涉及史学之讹误异同。”

按：《史汉文学研究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五月十八日，无锡国专教授朱文熊因突患中风病而辞世。二十日，国专师生举行公祭仪式；二十七日上午，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四月间，教员太仓朱君叔子在锡寓病卒。临歿前一夕，在余家小饮，相叙甚乐，不意翌晨猝患中风，口不能言，午后即卒。朱君品端学富，文采斐然，与余自幼相识，五十年交情，不胜惨怛。遗著有《庄子新义》。冯生振心暨诸同学为之校印行世。”

唐文治《朱君叔子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癸亥，余辞大学校长，改就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延君教授，君欣然来。南洋诸生开会送别，皆恋恋不能舍也。丁卯二月，专修馆被匪人解散，五月复兴，君去而复来，患难

相依，彼此悲喜交集。初，君教授史学、理学，继复改教《诗经》、《庄子》、古文辞暨诗词等。循循善诱，诵读吟唔，声琅然出户外。其评改文字，手不停披，一目数行下，虽多至百余卷，越宿即宣示诸生，无有逾两日者。以故感情之厚，非他人所能及。在讲堂授业时，气或促，诸生常预备参苓汤以进，此尤近世之所难。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君盖得其旨矣。甲戌夏，遽以中风证卒。余哭诸寝门之外，友朋弟子往吊，多有泣下者……”

崔龙《先师太仓朱先生诗评手迹跋》（见《潜励斋初稿》）：“……后二月有十七日，先师授昌黎丞壁记，往复朗诵，声琅琅达户外，自未及申，日暝乃休。翌晨，忽使来告，先师病矣，为中风，举校震惊，予急往视，侧卧，目微启，神志湛然，褰帷呼朱先生者三，不应，盖已不能言。掩泪归校，方命膳，噩音至矣。投箸往吊，哭诸庙门之外，并经纪追悼事。”

《国专师生追悼朱叔子》（见《新无锡》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二版）：“本邑国学专门学校教授朱叔子君，平素身体健康，乃于日前（十八日）课后，突患中风，救治无效，逝世寓庐。该校师生，咸切悼念，爰定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在该校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并于昨日组织筹备会，筹备一切云。”

彬彬《公祭朱叔子先生写真》（见《新无锡》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四版）：“记得是昨天（二十日），当那金乌西坠，时针指六字的时候，在学前街国专门首围得水泄不通，摩肩接踵，尽是那垂头丧气而恭敬肃穆的学生。圣域牌坊上高挂着长条白布，书有‘公祭朱叔子先生’字样，原来他们和她们丧失了循循善诱的导师，来追思这悠悠的长逝的春风，所以

举行这盛大悲壮的仪式。在那时也有全体教职员公祭他们的同事，学生们是按着班子的高低依次来公祭他们的先师，祭的秩序如肃立、奏哀乐、参灵、鞠躬、献香、献爵、献花圈等，各班都是一律的规程。各班的祭文，当然班子高的比较好一点，但这是程度的关系，无足轻重。凡参祭的学生个个都是始终的诚恳从事，分不出什么轩轻，其中八九位女生，没有不泪下沾巾，运动场上驰骋的那位排球健将，这时也低垂了头，湮没了她平日的活泼，这种精神实在令旁观者佩服的。并且那种祭文挽联和祭的仪式，恐怕也不是普通学校的学生所能知道和撰的。迫于地位，仅仅录一联在下面：‘两载坐春风，溯启迪宣劳，泮水横经宏作育。一堂怀化雨，恸仪型遽渺，考亭遗泽动追思。’（丙子级甲组撰送）该校校长唐蔚芝先生，在公祭之前，痛哭失声，聆者酸鼻。教务主任冯振心先生恐他老人家触景生情，过于伤悲，所以就代着主祭。唐校长挽有一联道：‘知交五十年，美落落长才，名传吴会。沉疴半寸晷，痛悠悠逝水，泪洒娄江。’可见一斑了。轰轰轰，几声高铙，公祭的仪式就此告成。……”

《凄风惨雨 朱叔子追悼会》（见《新无锡》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三版）：“本邑学前国专，于念七日上午九时，在该校大礼堂举行教授朱叔子先生追悼大会，悲壮情形，有足记者，兹特摘录如后。死者略历：死者朱叔子先生，享年六十有七，讳文熊，江苏太仓县人，系逊清王文贞公（紫翔）得意弟子，学问道德，遐迹咸钦。耿耿之性，不类常人。历任太仓中学、南洋大学及国专教授，不独胸具成竹，口若悬河，而诚心待人，循循善诱，尽得教育方针。受教者，一经熏陶，莫不学行兼优，且师生间感情亦较他人浓。以是先生教易学校，其学生往往有依恋之情，不克分离者。今乃长逝不返，追

悼之悲惨，当一见矣。追悼一斑：该校全体师生于一星期前即兢兢于追悼事务，充分筹备。尽是诔辞祭文，礼堂中高悬遗像，供桌花圈等依次罗列，记者触于眼帘，由然起追□之思。钟鸣九下，大会开始，程序计全体肃立，奏哀乐，唱追悼歌（迎神曲），主祭就位，□祭就位，全体向朱叔子先生遗像行最敬礼，静默三分钟，为朱叔子先生志哀，献花圈，读祭文，就坐，主席报告，演说，家属答辞，奏哀乐，唱追悼歌（迎神曲），摄影，礼成。校长唐蔚芝先生（主席）就位时，失声痛哭，顿时全场空气紧张，随着下泪者大有其人。丙子级甲组之追悼歌，唱来悲壮凄凉，响彻户外，直捣心肺，实已掬其同情。而乙亥、丁丑两级读祭文者，一字一泪，抑郁颤声，遂令聆者酸鼻。洒泪者十之八九，即旁观者亦莫不动容叹息，记者亦不禁挥泪。盖全场之追悼者，于斯已整个沉浸于悲惨中矣。此后唐校长述死者一生之事，以及冯主任演讲中追念死者，暨死者家属答辞，皆和泪成声，相应者呼吸与饮泣声耳。历一旬钟，礼始告成，在追悼会中，亦可谓空前盛举矣。”

彭鹤濂《陈天倪挽朱叔子》：“吾师太仓朱叔子（文熊）先生，为太仓十子之一。著有《庄子新义》等书，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也。在无锡国专教学时，评改作文，手不停披，虽多百余卷，越宿即宣示诸生，无有逾两日者，同学咸尊敬之。遽于戊夏（一九三四）病中风卒，享年六十有七……兹录陈师天倪（忠鼎）〔鼎忠〕挽联云：‘德如羊祐〔祐〕（字叔子），文似魏禧（字叔子），落落古今三叔子；居近桴亭（陆世仪，太仓人），氏承元晦（朱熹），超超浊世一纯儒。’将师之姓氏、籍贯及道德学问于三十字概括无遗，故当时颇为传诵云。”

五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五、唐文治著《十三经

提纲》出版。

按：《十三经提纲》，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此书系将《十三经读本》中唐文治所撰的《十三经提纲》部分单独印成。

六月，举行第十班第十二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桐荪、顾伯榕、吴寿祺、吕蕴华、李步青、周祥龙、俞洛生、姚希曾、张明凯、张尊五、程雅农、程咏沂、乔伯夷、钱锺元、阎桂藩等十五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

六月，改建盥洗室（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校中增建盥洗室，训育吴君溉亭名良澍，布置校景，略种花木，筑一亭，以茹经名。同年陈石老撰联云：‘栽培林木如名节，枕藉诗书此息游’。”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无锡国专教授徐景铨在无锡寓所病卒，身后萧条。唐文治与钱基博设法募捐，为之料理。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教员常熟徐君管略名景铨在锡寓病卒，身后萧条。钱君子泉与余设法募捐，为之料理。”

崔龙《常熟徐先生管略墓志铭》（见《潜励斋初稿》）：“先生姓徐氏，讳景铨，字管略，一字选青，江苏常熟人。曾祖讳某，祖讳某，皆士隐。先生幼颖慧，异常人，读书勤奋，亦非众能及。家贫不能读，入小学资，已[以]先生儿时所积果饵费。然先生不以斯弃学，时读时辍，时辍而时为人师。先生尝曰：日求其所不知，而以所知者教人。所得束修，即为升学用。故终由小学而师范，由师范而大学，由大学而研究



院，得学位。然十数年中，艰难之状，磨折之苦，实非常人所能堪，而先生能忍受之也。初，先生学师范于省立第三学校，时无锡钱子泉先生都讲其间，一见即惊奇之，曰：隽才也。索观其文，更击节曰：不识今之学校中，尚有如此好古士。遂受知钱先生，旦夕与论国学，先生之治国学自此始。其后益精研之，深史学，于古文辞尤质朴有两汉风。其教人也谆谆，每析一题，不厌其烦，阅卷尤笃实。癸酉夏，龙既入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识先生，观其貌，温温可亲，即知其长者也。其后授文史与国概，昕夕得请益，一年来，未尝有疾言厉色。更佩先生诲人不倦，乐育有古君子风。盖先生笃于天性，恶标榜。来我校后，益韬晦，闭门治学，不问人间为何世也。即兴居之间，手一卷，以一寒士，藏书逾万卷。家虽无斗石储，晏如也。比年来，时艰日深，忧患逼人。先生阅卷，每中夜，悲愤辄击桌，然默默无一言也。先生病，龙往视至，频泣下，似有深痛然。先生之元气已衰矣，竟于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六月二十有四日歿于锡寓，年仅三十有八。门弟子闻之，相向哭曰：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冯振《挽徐管略二首》（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之一：“生怀千载志，长逝亦何知。独有无涯恨，能增后死悲。白头伤老父，黄口馁诸儿。不待凭棺哭，为君双泪滋。”之二：“辛勤垂十载，小积但图书。无以贍妻子，惟将易米蔬。一贫今似此，他日更何如？难向苍苍问，朋侪共叹歎。”

钱鍾书《哭管略（并序）》（见《中书君诗初刊》）：“君和光同尘，被褐怀玉，神诣圣解，人无知者。惟予略窥胸中之泾渭，皮里之阳秋而已；生平谈交，君为第一。乃年未四十而歿，未了者百端，待食者八口；风流顿尽，述作无存。裴说搜坟，郑庄掘地，齐心同愿，莫知我哀。

竟难留命忍须臾，谈艺归来愿已虚。待哺诸儿黄口小，丧明一老白头初。复巢所幸能完卵，涸辙犹希可活鱼。见惯存亡无涕泪，殷忧尚为泣沾裾。

胸有千秋只字铿，相知惟我许追攀。回牛笔可穿重札，窥豹文才睹一斑。平日谈笑都益恨，故乡魂魄倘知还。发言莫赏嗟臣质，谁与微词作要删。”

按：据上引崔龙《常熟徐先生管略墓志铭》文中可知，钱基博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时，徐景铨也在该校读书，是钱基博的学生，钱基博在《自我检讨书（一九五二）》一文中，也曾提到“徐景铨……早先却在师范跟我学”。又据王绍曾《致刘桂秋信》（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徐景铨到无锡国专任教，也是由钱基博推荐的。该信中说：“徐管略先生……是钱基博先生推荐的。因为与钱先生有过交谊，对他有所了解，所以才把他介绍进国专任教。一九三四年徐先生去世，当时我任国专图书馆主任，受钱先生嘱咐，到徐先生家中整理他的藏书，大概有一万余册，全部由国专图书馆收购。我自己买下了一本钱先生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世界书局版），因为扉页上有钱先生亲笔题写：‘管略仁贤存之。子泉’字样，值得留念。从钱先生对徐先生的称呼来看，是师弟关系，不是同仁关系……由于徐先生与钱先生有师弟之谊，经常到钱先生家去，当然会与锺书先生交谈，彼此之间成为忘年交，这是可以想象的。《哭管略》一诗，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约六七月间，因徐景铨去世，教授陈鼎忠辞职，先后聘请刘朴（字柏荣，一八九四～？）、钱仲联、杨铁夫（名玉衡，字铁夫，以字行，一八六五～一九四四）担任教职。刘朴讲授《孟子》等课程，钱仲联讲授诗选、古文选等课程，杨铁

夫讲授文学概论、词学等课程。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而教员陈君天倪又辞职赴粤，爰先后聘湖南刘君柏荣名朴、广东杨君铁夫、本校前毕业生钱生仲联名萼孙分任教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五年中山大学请他（按：指陈鼎忠）去担任史学系主任，待遇高于国专一倍，离家又近。但因师生情重，舍不得离开国专。他对其他教师说不能两全，当回家与家属商议。唐先生闻之，对冯振心说：‘陈先生下学期可能不来了，热烈举行假期话别会。’会上，师生情绪很激动。陈先生回湖南后，来信辞职，下学期到中山大学去了。”

按：陈鼎忠辞去无锡国专教职，是在一九三四年，而非黄汉文文中说的“一九三五年”。

吴孟复《忆姚仲实先生》：“我考进无锡国专，刘朴先生讲《孟子》，每引姚仲实、叔节兄弟之说，又授以姚先生所著之《文学研究法》……”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四年，早期校友钱仲联（名萼孙）教授来校任课。钱先生十九岁时就已经用骈体文写成《近代诗评》论文发表于《学衡杂志》。在到母校任教以前，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教席。他能讲的课颇多，对骈散文、诸子、修辞学、楚辞、汉魏至清代诗都有研究，说授生动，说话又快，一堂课能讲很多内容……国专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钱仲联教授在国专时曾写过不少学术性著作，如《人境庐诗笺注》。黄遵宪（字公度）的诗不容易注，除了用典僻奥外，陈石遗还说过：‘公度诗多叙时事，惜自注不详，读者未能尽悉。’钱先生对于典故、时事百分之九十以上注了出来。黄遵宪的从弟遵庚（字由甫）曾到国专来访问过

他，畅谈黄氏生平，并提供他年谱上的材料。钱先生治学严谨，持论不留情面。当时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人境庐诗草校点本》，缺点颇多，钱先生批评此书时还提到：‘而吾家叔父玄同先生尚为之题封面，殆未加细阅耶！’他虽是唐门弟子，所学与老师殊途。这些，学生都能听出来。唐校长深爱其才学，请他在校讲重点课程。”

又：“钱仲联教授没有带家眷。宿舍里一板之隔住着杨铁夫教授。杨先生中过举人（原名杨玉衡，以字行）。当时私立大学及各中学的《教职员名录》上，对于国文教员往往以‘清举人’、‘清贡生’、‘清附生’作为一种学历。唐校长是不主张这样做的，他自己是进士出身，陈石遗、杨铁夫是举人，陆景周是廪生，但国专的《教职员名录》上没有注明这些。杨先生学词于词学名家朱祖谋，又曾留学日本。他在国专教《文学概论》、《词学》等。他的《梦窗词笺释》是在国专定稿的。杨铁夫先生在校任教一年多，离校时捐赠给学校图书四大木箱，其中有全部《说郛》及《彊村丛书》等。”

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学术年表》：“下半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文治校长聘我（按：指钱仲联）为专任教授。遂回母校。在母校任教时，得与陈衍、陈鼎忠、冯振、叶长青、顾实、杨玉衡等缔交。在国专，担任诗选、古文选等专业必修课。”

当时国专学生中已结有持恒、秋水、芙蓉、国风等不同的诗社，各诗社以每星期日为社课。钱仲联来国专任教后，各诗社都邀其担任顾问，请其为社课命题，并审评他们的作品。

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学术年表》：“……学生组织的诗社，如‘持恒诗社’等请我为顾问，审评他们的作品。”

钱仲联《梦茗庵诗话》：“甲戌秋，余应唐蔚师之招，来锡山国学院为诸生讲诗。诸生中嗜诗者至夥，互结为诗社。沈切、陈起昌、韩宝荣、戴传安、崔龙等九人为持恒诗社。陈光汉、郑学韬、张广生、戴双倩、陈显道、周少云等八人为秋水诗社。吴家驹、陈新猷、虞斌麟、郭文衡等八人为芙蓉诗社。又有吴湘君等若干人为国风诗社。皆乞予操修月之斧。其不入诗社者，又有金山彭天龙等。各诗社每一来复日为社课，或由余命题，或否。持恒社中某次社课题为《天上谣和长吉》者，颇得佳构数章，沈切所作最工，诗云：‘霓虹千尺泻长星，橈枪夜扫云无声。玉女翩然翠虬落，凝唇朱露湿染缨。天戈电挥昏复晓，冰河不动银尖小。谪居幸得住蓬莱，海田浪种金光草。九龙低首五晕裙，胭脂满地桃花春。东皇偷走翔麟马，六州烟灭蛮靴下。’神血湛湛，居然酷肖昌谷。章松龄诗云：‘雷公击柝冯夷噪，六龙怒飞天宇倒。一声霹雳走苍虬，五色长虹化旗纛。瑶池群举万寿觞，列宿分野征八方。一点炎精托箕尾，补天炼石当中央。青霄渐隐余霞赤，玉宸新颁金泥册。鲁阳停戈戏娥舞，坐纵羲和下长白。’此首括二十年来国事，颇能谈言微中。崔龙诗云：‘天门辟历坠一星，动地如雷掷金声。人天茫茫入醉梦，无边清泪沾香缨。幡然一觉人间晓，起看河山如此小。蓬莱三山失左股，何处呼龙种瑶草？瑶池月暖醉红裙，投壶一笑天为春。多少散仙奔绣马，一一下拜真妃下。’此首亦有托讽。韩宝荣诗云：‘秋空露滴银蟾寒，三十六宫桂树残。霓裳一曲银管罢，飘飘仙袂翻素纨。腮小唇红称绝代，王母犹夸素娥态。双成绿盖云中来，馥气排风响琼佩。此间只合仙女居，唐皇来自油壁车。长生殿里惊梦起，人间已换旧山水。’一结有言外之意。戴传安作，全首未工，末二句云：‘天吴东指移海水，大浸稽天玉石毁。’引用恰当。陈起

昌一首不似长吉，然亦有作意，并录之：‘昨宵王母宴琼宫，宝盖灵旗相映红。三清翠辇乘丹凤，四帝云车驾玉龙。丁当环佩朝金殿，海岳群仙争覩见。妙舞嫦娥裙带香，散花仙女纤腰现。嵩岳传呼万岁声，共祝瑶池永太平。巍峨圣德高天地，阿谁敢道当年事。’末二句与杜诗‘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同一用意。”

八月二十一日，曾在无锡国专就学的窦海淳（原名襄腾，后易名海淳，？~一九三四）因病去世，唐文治为作《窦生海淳墓志铭》。

唐文治《窦生海淳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生初名襄腾，后易名海淳，江苏邳县人……又越数年，銜乃祖命来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试。余口试时，生正容听恭，言皆有序。余曰：此世家子弟，无浮靡习，特拔之。在校恂恂谨守程子四箴，校师朱叔子先生命赋《井泥诗》，成五言一章，神味骀骀入古，朱师激赏，闾校传诵。岁余，转入沪西光华大学……竟于八月二十一日卒……”

八月，招收第十三班及补习班生共九十六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本班录取的学生中有吴常焘（名常焘，字伯鲁，改字孟复，后以字行，号山萝，一九一九~一九九五），他于一九三三年即曾来投考无锡国专，因校长唐文治对其在口试中的回答不满意而未被录取。校务主任钱基博知道情况后，鼓励他“倘其有志，下次不妨再来”，于是吴常焘于本年中改名再度应试，遂被录取。

纪健生《吴孟复心目中的钱氏夫子》：“吴孟复于一九三三年夏从芜湖赴无锡参加国专招生考试，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笔试作文，题目为《王黎二家续古文辞类纂之比较》，因听段熙仲先生介绍过，写来较为应手。口试是先发一口试单，

上有若干问题，每个问题下皆有一小栏供简单填写，由老师选择提问，再详细作答。校长唐文治先生亲自主持口试。老夫子双目失明，由钱锺书先生协助，唱名、读口试单和记录口授评语。其时，钱锺书先生从清华毕业，来探望在国专任校务主任的钱基博先生，正逢国专招生，便临时帮办考务。他在清华就以博学闻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第一次相见，在来自私塾和中学的少年吴孟复心中，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口试开始，吴孟复见‘曾读何书’一栏甚狭小，便写上‘方寸之纸，何能尽胸中之书’；又于‘立志如何’一栏写上‘愿终身立足于考据之门’。钱锺书读过，唐老夫子便怫然不悦，稍停片刻，才缓缓说道：‘诗文易作，文人皆能之；考据则惠、戴之后，门径已开，亦不难致。人之一生在做人。’遂不问其它。榜发，吴孟复未被录取。吴孟复少年气盛，作《别惠山》诗三首，发了一通牢骚，便去南京游玩。但心中总觉委屈，便致函钱基博先生，痛陈郁愤。他在考试期间看到过钱基博先生，但未与接谈。写信给钱先生，只是想把不便与唐先生说的话写给钱先生，钱先生作为除唐校长之外的负责人，又可能会向钱锺书先生了解情况，也许会主持公道，其实并没有得到答复的奢望。不料从南京回到芜湖，钱基博先生的复信就到了。钱基博先生在复信中说，前日试后，唐先生‘令博搜遗，博得足下卷，以为必少年有才气者，持以请于唐先生。唐先生命查口试单，评分‘下下’，评语‘言大而夸’，以是不取。博甚惜之。以足下之才，闭户潜修，亦可有成。倘其有志，下次不妨再来。’一九三四年夏，吴孟复改名应试，口试由钱基博先生主持，遂被录取。从此，吴孟复与钱基博先生结下了师生之谊。”

按：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一文中亦叙及此事，

情节较上文为简，但后面有一节可以补上文之不足：“……入学后，唐先生发觉，告诫他说，不能停留在考据之学上，要进而治义理之学。并讲了做学问易、做人难的道理。先生在五十年后写的《追怀唐蔚芝夫子》诗之三中表达了对这位先师的无限崇敬之情：‘考据词章身外物，人生第一在为人。回头多少崎岖路，始信先生教诲真。’对钱基博先生的知遇之情，他也是终生感激的：‘犹记梁溪应试来，搜遗竟许少年才。那知白首无成就，一度思公一自哀（文中原注：《幼学杂忆》诗之三）。’”

八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六、唐文治著《周易消息大义》出版。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修改《周易消息大义》，加入《读易反身录》一卷，并应读书目表，一并交冯生振心校正付印。振谨案：《周易消息大义》发明十二辟卦消息，凡政治盛衰，国家存亡，人事吉凶，得失进退之道，靡不兼赅其中。《反身录》箴砭痛切，书目表说明汉宋家法，不堕空虚，允为学者必读之书，已刊入《茹经堂全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中。”

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记：“（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本校丛书第六种《周易消息大义》出版。”此书未见。

九月，因校舍不敷，租借西水关马姓房屋为校外宿舍，共住学生三十余人。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联合各校实弹射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九月，唐文治致信黄侃（字季刚，一八八六～一九三五），邀请其来无锡国专讲学。

《黄侃日记·量守庐日记》：“（一九三四年）中秋日丁酉

（九之廿三，礼拜日）……昨得方天游（楚授）无锡教育学院书，内附太仓唐蔚芝（文治）先生国学馆书，邀往讲学。”

按：此后的《黄侃日记》中未见后续的记载，从现在所看到的文献资料看，黄侃似未曾应邀到无锡国专讲学。

农历十月十六日为唐文治的七十寿诞。本月，陈衍撰《太仓唐茹经先生全书总序》以为贺寿之礼。至明年农历四月八日，为陈衍的八十寿诞，唐文治亦撰《陈石遗先生全书总序》。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十月十六日为余生日……同年陈石老欲为余作寿序，再四辞之，乃集余所著书为总序，洋洋数千言，深可感谢，惟揄扬过当，心殊不安耳。”

陈声暨编、王真续编、叶长卿补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见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一九三四年）蔚芝先生夏历十月十六日七十初度，公明年浴佛日八十初度，相约不为世俗之文，互撰所著书总序为寿。公先成茹经堂全书序万余言，蔚芝先生继成石遗先生所著书总序。”

按：陈衍撰《太仓唐茹经先生全书总序》刊《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唐文治亦撰《陈石遗先生全书总序》刊《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一号至第一卷第二号，又见《陈石遗集》“附录一”。

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孟宪承在无锡国专演讲，讲题为《欧洲之汉学》。

按：此次演讲由虞斌麟记录，演讲记录稿刊于《国学界》创刊号，文前有记录者的题记曰：“民国念三年十二月六日，教育家、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孟宪承讲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整理后搁置未发。今《国学界》编者陈君催稿孔急，无以应命，

乃翻书筐而得此，聊以塞责而已。”演讲中介绍欧洲的汉学研究，主要分成四个方面：一、经籍之翻译；二、文学之著作；三、考古之发现；四、语言音韵之研究。

十二月三十一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华绎之、钱孙卿、孙家复、高阳、唐保谦（唐星海代）、钱基博、冯振、杨翰西、蔡兼三（华绎之代）、陶达三（孙家复代）等人，讨论收支预决算及增建图书馆等事（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会议》）。

十二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七、朱文熊著《庄子新义》出版。

《庄子新义》作者自序：“文熊幼时，喜读《庄子》。朝而习，夕而复，必得口诵心通而后已。然其所得乎《庄子》者，只十之二三而已。惟窃自思念，《庄子》之学，非必仅玄同二字；彼其袭老之迹、映孔之真，有非郭子玄辈所能得其意理者欤？积之十余年而未敢发也。及读韩退之书，谓子夏之徒，流而为庄周，而心为之一喜。继读姚姬传氏《庄子章义序》，谓庄子议论本自圣门游夏，以三代之治为大道既隐之事，以君子为必达于礼乐之原，而心又为之一喜。最后读陆见廷氏《庄子雪》，谓周莲溪由太极顺说到人，庄子则由人收归到太极，而心更为之大喜。曰：古人盖有先我而言之者矣。于是重取《庄子》读之，凡所口诵而心通者，盖十之五六矣。惟韩子于《庄子》无注解，姚氏虽有注解，多及于章句，而鲜发挥其本旨。陆氏发挥尽矣，惟于其言在此而意在于彼者，动曰此斥惠施辈，此斥公孙龙辈，而于文熊所谓袭老之迹，映孔之真者，仍多有未经道及之处。窃尝本此意以与同学相研求，盖二十年于兹矣。于南洋公学，则尝于课余与同学讲习之矣；于今国学专门学院则更列入正课，与同学互相讨论之矣。积之既久，又

复参之诸家，凡所得乎《庄子》者，庶几十之七八，而亦未敢有所论述也。今春三月，辍课多暇，于是思详为注解，加之评论，以与夫同好是书者研求焉。历三月之久，始克毕事。”

按：《庄子新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四年排印本。书前有唐文治序及作者自序，次为《读庄余论》、《凡例》、《庄子与孟子学术同源及著书之大概考》，全书依《庄子》“内篇”、“外篇”、“杂篇”分为三卷，双行夹注，采各家之说，而对旧注每持异见，每篇篇末详加评语。书后有冯振跋。

本年中，在冯振领导下，针对以往学籍管理较为混乱的情况进行了改革，给历年学生每人建立一份学籍表，从入学考试成绩到历年在校德智体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奖惩事项，导师评语等等，一概登录，使教务工作得到了改进。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国专早期不设学籍册，每学期造在校学生成绩册一本，翌年学生补考的成绩又列一本。国专允许学生中途休学，期限不超过二个学期。复学后如有正当理由，得学校同意可再度休学，因此往往有学生休学、复学反复多次，造成学籍十分混乱。早期学生人数少，问题不大，其后历届毕业、肄业和在校学生合计人数近千，问题就很突出。一九三四年起，在冯振心的领导下，进行了整理改革。改革后给历年学生每人建立一份学籍表，从入学考试成绩到历年在校德智体各方面，包括奖惩事项，导师评语等等，一概登录，使教务工作得到改进，跟上了学校发展的要求。”

约在本年中，吴则虞（字满庵，一九一三～一九七七）赴无锡国专从陈衍、杨铁夫学习诗、词学。

吴受璩《吴则虞传略》：“先父吴则虞……二十一岁时，赴无锡，从陈石遗、杨铁夫先生学习诗、词学。后经陈石遗先

生介绍，到苏州章太炎先生家中，叩谒时，对太炎先生提出的问题，奉对如流，颇得章先生欢喜，因此收为入室弟子，并亲自授字号曰‘馮廌’。先父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学习期间，专攻文字、音韵、训诂学，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求学时代的先父，成为他后半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古籍的校勘整理工作的重要因素。”

按：吴则虞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上文中说他“二十一岁时，赴无锡，从陈石遗、杨铁夫先生学习诗、词学”，依时间推算，姑将此事系于本年中。又本年事记载，约六七月间，杨铁夫来无锡国专任教，则吴则虞赴无锡从陈衍、杨铁夫学应在六七月之后。

又按：肖艾《经学家陈天倪先生传略》中记：“……吴君则虞为章太炎最后门弟子，奉章遗命，襆被往无锡从先生（按：指陈鼎忠）学，传为美谈。”陈鼎忠曾写有《赠吴生则虞》一诗（见《尊闻室贻稿》），诗题后有作者自注云：“则虞为太炎最后弟子。章氏主讲之苏州国学院停办后，嘱其转学无锡国专，并函介余，亟称其才之美。则虞博学，于经史诸子无所不窥，无所不精，文思敏捷，万言立就。诗词均佳，奇才也……”据此，则吴则虞后似又奉章太炎之遗命，再赴无锡国专从陈鼎忠学。查无锡国专各届毕业生名录，未见吴则虞的名字，似是其并没有取得无锡国专的正式学籍。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一月，举行第十班第十三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见久、卞玉麟、石岩、汪兆成、李灼华、李稭、徐振亚、曹书坤、张逸仙、华元龙、敬云从、闻骏材、臧荫簏、刘幹、樊恭煊、郑高松、顾增贤等十七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招收补习班插班生。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十二月，放寒假。毕业生郑高崧等十七人。”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又为方便清寒学生，不仅学费较同等学校低些，还可以中途申请休学，工作一阵，积了学费再申请复学。国专由于性质独特，学生不容易转入其他学校。有些思想左倾、被国民党指名‘清除’的学生，过了一阵，如申请复学，校长又把他收下了。《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载：‘（阴历）十二月，放寒假，毕业生郑高崧[松]等十七人。’这个郑高崧[松]就曾被宪兵队抓去过，由学校保释，又被‘清除’过，后来复学的。《年谱》的最后写上这一句，偏偏又特别写出他的名字，其有深意存焉。”

本年二月出版的《江苏教育》第四卷第一、二期，发表柳诒徵《三年来之中国文化教育》一文，文中称“今之专以中国之学术文章教授来学者，只有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及上海

正风文学院”，“在今日一切学校师长中，深知中国文化之重要，且息息以救国救民为念者，殆无过于唐氏”。

柳诒徵《三年来之中国文化教育》：“中国文化之衰落，无可讳言。古来师儒讲学之风，早已不绝如缕。姑就耳目所及言之：今之专以中国之学术文章教授来学者，只有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及上海正风文学院。此二校者，历史悠久。或注重理学及散文，或注重考据及辞章。校誉之盛，自非此三年中始。第自九一八以来，国专院长唐文治氏，痛心于国事日非，不憚大声疾呼，痛哭流涕，提倡吾国之精神，以期挽救今日之颓运之论著甚夥。如所著《国鉴》……其文陈刺古今，穷原竟委，实可见诸施行，非迂儒徒为高论者比。故在今日一切学校师长中，深知中国文化之重要，且息息以救国救民为念者，殆无过于唐氏。然其学校以格于規制，绌于财力，未能充其力之所至。”

三月十五日，《国专月刊》创刊出版。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国专月刊》从一九三五年创刊，每学期一卷（五册），全年两卷（十册，寒暑假休刊），共出版了五卷，抗战时停刊。该刊由学生自治会主办，但一些重大问题还是请示校长和教务主任。叶长青在《国专月刊》上连续发表《汉书艺文志问答》，顾惕生认为是针对他的《汉书艺文志疏证》的，有些情绪。他把自己写的《中庸郑注讲疏》交给学生，其中有些地方和唐校长的讲述不同，他自己事先说明。学生拿文稿送陆景周，陆先生问唐校长是否读几节听一听。校长说：‘不必了，原稿照登。’顾惕生知道后，大为感动，对陆景周说：‘中央大学将我解聘，而唐校长能聘我，我佩服他是伯乐，能用人之才。今天我更佩服唐老有容人之量。国民党连我这个老党员都不能用，不成气候。’他曾对

人说：‘唐老能容鄙人，雅量不可及。’”

按：《国专月刊》由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每月出一期，每学期五期，合称一卷；寒、暑假停出。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创刊，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共发行五卷二十五期。《国专月刊》是无锡国专办刊时间最长、广有学术影响的一份刊物。每期刊物一般由“论著”、“谈丛”、“文苑”（分为文、诗、词等几个部分）和“校闻”等栏目构成，无锡国专这几年中在职的教师大部分都有论著在刊物上发表，同时还刊载了许多国专学生的优秀的学术文章、毕业论文。

三月，教授刘朴辞职，聘请顾实（字惕生，一八七八～一九五六）为无锡国专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课程（据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校闻·本校新聘顾实先生为教授”：“本校本学期因刘柏荣先生辞职回湘，改任国立湖南大学教授，故新聘顾先生来校担任文化史、音韵学、尔雅、史通、管子等学程，兹已到校上课矣。按顾先生武进人，历任国立东南、私立沪江各大学教授，现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南京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特约讲座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老校友们常提到的另一位教授顾惕生（名实，武进人），北洋军阀时期是东南大学教授，著有《汉书艺文志疏证》、《中国文字学》等。他是老国民党员，在东大时，与杨铨（杏佛）、陈佩忍等在师生中发展新党员。想不到国民党来了，他却被解聘，在南京挂牌做律师。他到国专任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步步深入，侵犯我国的主权与领土。顾先生就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须学日文。他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替学生上日文课。后来校友魏建猷由日

本学成归国，在课外开日文补习班，顾先生就在课外讲授《法学通论》。他在讲中国文化史时，痛诋宋学。”

四月一日，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出版。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校闻·唐校长年谱出版”：“本校校长唐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由本会刊印，已于四月一日出版。内容关于先生道德文章、事功及国家大事，莫不详尽。且冯教务长更有按语及著作年表，益臻完备。冯先生之《老子通证》，亦已付印，不日出版云。”

按：该书版权页所注出版时间为三月三十一日。

唐文治《年谱题辞》：“余弱冠时，读陆稼书、汤潜庵、张杨园暨吾乡陆、陈诸先生年谱，心向往之；复读《朱子年谱》，更大好之。遂有必为圣贤之志。中年读罗罗山、胡润芝、曾涤生、左季高诸先生年谱，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立业为事，然后叹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感动兴起，所以立德立功者，必以前贤年谱为先路之导。乃我生不辰，运会机隄。立朝之时，欲匡君德、纾国忧，迄无所成；退而讲学，欲正人心、维世道，亦靡所裨。每诵杜工部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之句，辄为恍然。年谱云乎哉？惟是师友之渊源，学问之次第，事变之阅历，著述之积累，有不能已于怀者，随笔记录，汇为一遍。甲戌岁七十初度，同学索观者甚众，友人侯官陈石遗同年、益阳陈君天倪、门人陈生柱尊等亦屡以为言，爰属北流冯生振心校正付印。振心复增入《著作年表》，可感也。嗟夫，《王风》之诗曰：‘行迈靡靡，中心如醉。’《小雅》之诗曰：‘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追维往哲，内疚孔多矣。年谱云乎哉！蔚芝唐文治自题。”

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是谱自作者出生记至“甲戌（一九三四

年）七十岁”，后附有冯振编《茹经先生著作年表》。

四月，新加坡华侨吴可培致函无锡国专，欲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所列名的三十二位古代圣哲之后，增添关羽、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王阳明、李颀、曾国藩及唐文治等八人，来信索求唐文治照片。唐文治辞谢不果，始允寄一近影，但表示于此事“愧不敢当”。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校闻·新加坡华侨吴可培来函请求唐校长惠赐近影列入圣哲画像记”：“新加坡华侨吴可培君，久已私淑唐校长，对于所著《四书大义》，以为昭同日月，实旷世大师。近又来函云‘曾文正有《圣哲画像记》，中列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今窃欲私增关、岳、文、戚、王（阳明）、李（二曲）、曾（湘乡）、唐（太仓），即乞惠赐玉照’等语，由此可知校长声教之远矣。”

黄汉文《唐蔚芝先生经世淑民，长留教泽》（见《国学之声》一九九五年第四期）：“三十年代初，新加坡华侨吴可培多次致函蔚老，欲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之后，增关壮穆、岳武穆、文天祥、戚继光、王阳明、李二曲、曾国藩及蔚老八人，并索取照片，蔚老复书辞谢。其后吴可培甚至委托无锡国专毕业生在新加坡任教者，于其返华探亲时来恳：‘此事不是我一人的私意，务请成全。’蔚老鉴其诚，始允寄一近影以留纪念。但嘱秘书陆景周在信上写明：‘续我于《圣哲画像记》之后，愧不敢当。’《国专月报》曾载此事。语焉而不详。今将闻之陆景周、沈熙乾先生者补记于此。”

四月，无锡国专增建的教授室、藏书楼落成。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乙亥七十一岁》：“本校图书馆历年购书颇多，馆屋实不能容。爰与主任冯生振商定，在校地东北隅扩建房屋上下四楹，并造过街楼通至图书馆。由本邑建筑公司江生应麟承造。”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校闻·本校教授室、藏书楼落成”：“本校图书馆积极扩充以来，除原有典籍珍本几万卷外，又添购大批国学丛书及应用图籍。原有书楼一座不敷应用，故学校议决添建，由江应麟建筑公司承包，于旧图书馆左侧空地兴筑钢骨水泥楼房一座，上为藏书楼，下为教授室，兹已落成，正在油漆布置中云。”

四月二十日，进行本年上学期国文大会考。二十九日，国文大会考成绩揭晓，共有顾迈修、徐炎文等十九人得奖。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校闻·国文大会考揭晓”：“本校国文大会考，在四月二十日举行，题为《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论》、《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文格异同论》、《周秦诸子非哲学说》、《湘乡曾文正公，私淑姚姬传先生，至列之圣哲画像记。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乃兴化李详论桐城派别，揭曾文正公以为湘乡派，与桐城不同。揆之曾氏初衷，得无大相刺谬欤？抑果有不同于桐城者欤？试申论之》，共四题，任作一艺。兹经各教授分别阅竟，并由唐校长总核后，已于廿九日发表。凡在九十分以上者，给予奖品。计得奖者，三年级有顾迈修、徐炎文、徐景贤、徐林、黄源激，二年级有沈切、陶鍾秀、孙易、崔龙，一甲有李钊，一乙有黄光焘、王先献、黄敦、宋砚樵、徐兴业、郭泰庚、高澍，补习班有蒙頔、吴方圻，共十九人，级际锦标为三年级夺去云。”

四月三十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八、冯振著《老



子通证》出版。

《老子通证》作者自序：“民国十六年秋，余奉锡山唐蔚芝夫子之命，承乏教席于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既而为诸生授《老子》。《老子》，余素所笃好者也。自来解诸子书者，莫众于《老子》，而多先自存成见，强《老子》以自圆其说，鲜能得老氏之本真。余不获已，别撰《老子通证》为教本。既毕业，诸生有就而问者曰：先生之书，每章之后，既系以通论，又多益以参证；‘通证’之名，得非各取一字连缀而成之乎？余曰：有是哉，是固然也，然而未尽也。诸子著书，莫不各有其宗旨，虽枝叶扶疏，而根抵于一本，故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读诸子书者，必融汇贯通，求其宗旨之所在，然后能明其万派生于一源，一源流为万派，此‘通’之事也，然自有主意。强古人以就己，首尾本末，仍相联属，是亦‘通’也；而可以谓为其人之宗旨，不可谓为古人之宗旨也。故‘通’必有事于‘证’焉，‘证’者所以明义非虚构、语有左证也。通论但通一章之义而已，若沿参证而贯通之，虽全书之意可通也。然则疏通证明，期不失老氏之本真，此又‘通证’之名所由取也。虽然，义求有证，已若可信；今又多以本书证本书，殆更足信矣。而所引以为之证者，是否不已失其本旨，此至难言也。苟所引以为之证者，已有谬误，则以误证误，其误滋甚，又安见语有左证而遂能一无所误乎？然则本书之疏通证明者，其果能得老氏之宗旨乎，抑犹不免余一人之宗旨邪？斯则待读者之自定之而已。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流冯振自序于无锡国学专门学院。”

按：《老子通证》，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全书分上、下两篇，按《老子》原书八十一章的顺序，逐章进行“疏通证明”。“凡例”中说：“本书分注文、通论、参证三项，注文主

解释字句之义，即附本句之下；通论主贯通一章之旨，系在章后；参证主比类证明，列其末焉。”书前有《史记·老子列传》及《古代老学评论辑要》。

四五月间，无锡国专教授顾实在课外义务为学生开设日文课程。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校闻·教授顾惕生先生指导日文”：“教授顾惕生先生，留东有年，精研日文。鉴于本校同学毕业后，颇多继续赴日深造者，故在课外为诸同学指导日文，听讲者多至百人云。”

五月四日，无锡国专学生章松龄（字公直，生卒年不详）、沈切（字希乾，希一作熙，生卒年不详）和崔龙（字云潜，生卒年不详）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随班听章太炎讲课。课后，三人又向章太炎问学良久。事后，三人“相与追记”，写成《葑汉亲闻录》，刊于《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三号。

章松龄、沈切、崔龙《葑汉亲闻录》文前之章松龄题识（见《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四日，龄偕同学沈切、崔龙，请业家兄太炎于苏州锦帆路私邸。时适读经会期，随班列坐，日暝乃休。门下尽散，惟龄等三人侍立闲庭，自申及戌，诲迪叠叠，始述新学之猖狃，卒为后波所汨没；继示文辞之涂径，遂及诗道之盛衰。名理精粹，诙谐间出。夜色既沉，惟闻馨歛。退而相与追记，百之一二……”

按：时在无锡国专读书的章松龄是章太炎的族弟。黄汉文《唐文治办国专与章太炎讲小学》一文中曾记：“……唐先生征得太炎先生同意后，还选派高年级学生前往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课，每周两天。太炎先生热心辅导，学生多有所获。”据此，则章松龄、沈切和崔龙三人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课是由校长唐文治选派，当非仅五月四日这一次。



五月十日，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二十五卷第五号出版。此前，《教育杂志》社发起全国学界专家对读经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亦曾致函无锡国专，请求该校学者就此发表意见。《教育杂志》二十五卷第五号即为集中刊载学界专家意见的专辑，其中无锡国专的唐文治、钱基博、顾实及曾在无锡国专任教的陈鼎忠、陈柱等人都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校闻·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来函征求关于读经意见”：“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以读经问题，关系吾国文化学术前途甚大，特以五月号为讨论读经问题之专号，快函本校，要求拨冗表示意见。闻唐校长除自撰论文外，并分函各教授，请亦著文应请，以供全国学术界之研究，及青年读者之参考云。”

按：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创办于一九〇九年一月，一九三二年曾因故停刊，一九三四年复刊。一九三五年，时任该刊主编的历史学家何炳松（字柏丞，一八九〇～一九四六）向全国教育界以及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发信一百余封，征询对“读经”问题的意见，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共收到七十余篇回复文章，后被集中刊载于是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是为“‘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专辑”。其中无锡国专的唐文治、顾实、钱基博及曾在无锡国专任教的陈鼎忠、陈柱等人都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何炳松写有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作为该专辑的序言。此文中谈及发起对读经问题的讨论的背景和缘由：“现代我国所以有提倡读经的运动，当然有相当的原因，就是源于现代我国思想的混乱和国难的严重。”之后作者引用张群的一段话说：“照我的观察，中国人的思想，

几千年来，都是在儒家的势力支配之下……自从海禁大开，和西洋思想接触以来，这个中心思想便渐渐被摇动了。甚至保守色彩极浓的张之洞也不能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调停妥协。直到‘民八’，有一个新文化运动起来……固有的中心思想是被摧毁了，而新的中心思想却未曾建立起来，弄得大家都彷徨歧路”，接着何炳松又说：“同时我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又受了一个重大的打击。民族生命几有朝不保夕之势。悲观的人甚至发出‘中国必亡’的论调。于是有一部分忧国的人以为我们要挽救国运，纠正思想，只有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而读经就成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方法。”七十余人的意见，被何炳松归为三大类：一是绝对的赞成者，二是相对的赞成者，同时亦可称为相对的反对者，三是绝对的反对者。在这三类意见当中，绝对的赞成者和绝对的反对者，双方人数都不过十余人，其余都可归入相对的赞成或反对者的一类。而唐文治、钱基博、顾实、陈鼎忠都被归入到“绝对的赞成者”一类，陈柱则被归为“相对的赞成或反对者”一类。在“唐文治先生的意见”中，唐文治强调：“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今拟自初级小学始，以至大学文科研究院，按照各经浅深缓急，分年支配，规定课本，附以说明，若能切实讲贯，尚不甚难。惟更有进者，读经贵乎致用，而致用之方，必归于躬行实践。故凡讲经者必须令学生一一反诸于身，验诸于心，养成高尚人格，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俾头脑清晰，气质温良，学道爱人，方有实用。”其具体方法步骤为：（一）初级小学三年级应读《孝经》；（二）高级小学三学年应读《大学》及上半部《论语》；（三）初级中学三学年应读下半部《论语》及《诗经》选本；（四）高级中学三

学年应读《孟子》及《左传》选本；（五）专科以上各大学及研究院应治专经之学。“钱基博先生的意见”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立国之道，尤有其大经大法，所谓‘天下变，道亦不变’者，断非剽取他邦文物所能为功，举国数千年积成之风习，与其足以支配国民之心理者，有最深之关系。就中国言中国，而其支配数千年之国民心理以维世教于不敝者，不得不推《四书》、《五经》。”在“顾实先生的意见”中，作者引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五段文字，说以上五条，“皆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煌煌明训，有关于读经问题，不但无害于民主政体，并且有裨益于民国今后之强盛，绝对无可置疑。正是上自政府，下迄民间，人人应当绝对恪遵者”；至于“读经施行之细则”，作者认为“中山先生极推重孔、孟二子，及《大学》、《中庸》、《礼运》三书，皆以适用古本古注为宜”。《十三经》中有关物质组织方面及精神生活方面者，亦宜选择而读之，“惟以普及为难行，仅有中等专门以上之学校为相宜耳。”陈鼎忠与古直、曾运乾、方孝岳合署的意见中说：“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经也者，吾国立国之精魂，民族由此而尊，民权由此而崇……舍经而言教育，吾惟亡国之惧，他何论焉！”“陈柱尊先生的意见”则认为“吾国近二十年余来，学校既不读经，且不注重德育……渐染日久，遂至人欲横流，泛滥而不可救。民怠而奢，国贫而侈，欲内忧外患之不日亟，其可得乎？故自今以后，学校每周选择适于程度之经书讲授一二小时，似有不容缓者矣。”二〇〇八年，有专家对这七十余篇文字重新进行整理校订，以《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为书名，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

五月二十三日，由教育部特派的参事陈泮藻（字梓屏，

一八九七~?)及国立编译馆主任陈可忠(一八九八~一九九二)视察无锡国专。此后在教育部所下的训令中,称无锡国专“校长热心校务,校风亦尚质朴,堪用嘉许”;同时提出了三点改进意见,其中在课程设置方面,认为“该校课程尚欠完整,对于论理学、哲学概论、西洋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科目,应酌予设置”。根据教育部的意见,到本年秋季开学时,三年级就增设了哲学概论、论理学等课程。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校闻·教部派员来校视察”:“教育部特派参事陈泮藻、国立编译馆主任陈可忠视察京沪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二君于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来校,由唐校长、冯主任接见,视察教室宿舍,为时甚久,颇致称许云。”又《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校闻·二十四年度本校教务方面之贡献”:“本校于上学期,由教部遣派参事陈泮藻、国立编译馆主任陈可忠二先生来校视察。对于本校校风之淳朴、管理之认真,深为嘉许。提示改进各点,无不切实遵照。本学期三年级加开哲学概论、论理学为必修科。其他各班,亦参合各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略加增损,以期程度更外提高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根据柳诒徵先生他们的报告,学校是被批准立案了。但教育部的主管官儿却屡加挑剔。他们有的对‘中国文化’本无好感,有的则对国学一窍不通,主要的还是认为不合‘训政时期’的要求,学校的校长、主任和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但派来的视察人员,毕竟还是有些书生气,并没有完全依照蒋梦麟等人的意图,把国专一笔抹杀,而是好心地予以‘知照’,或者善意地提些建议。唐校长是懂得‘择善而从’的。如一九三五年,教育部特派参事陈泮藻、国立编译馆主任陈可忠,于五月二十三日来校



（此行系视察京沪私立专科学校）。这一天，一、二年级在惠山实弹打靶，在校的三年级生和补习班生都穿着制服上课。他们认为即使在国立高等学校也不容易做到。他们视察教室、宿舍，为时甚久，对于校风之淳朴，管理之认真，深为嘉许，建议哲学概论、伦理学应为三年级的必修课。秋季开学时，三年级就开了这两门课。陈可忠对在编译馆任职的早期校友侯罅（云圻）说：‘想不到唐老的动作如此之快！’侯罅和在南京的校友私底下对人说：‘别人有心想找岔子，幸而国专无可挑剔，但请转告两位主任还得多加注意。’国民党想派‘党义’教员来，国专马上请无锡县国民党部常委李惕平兼任该校教员（不久，由胡念倩来兼课），遂不便再派人来。”

《教育部训令（第八一三〇号）》（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见《教育部改进专科以上学校训令汇编（第一辑）》）：“该校前经本部派员视察，兹据报告，经详加审核，该校校长热心校务，校风亦尚质朴，堪用嘉许。惟尚有下列各要点须由该校切实改进。一、该校招考新生，多未能照部定入学资格录取，以致学生程度低浅，殊属不合。嗣后举行入学考试，应严定取录标准，以期提高学生程度。二、该校教员授课，应注意指导学生自动研究。教员中缺课者，每月尚属不少，并应纠正。三、该校课程尚欠完整，对于论理学、哲学概论、西洋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科目，应酌予设置。合行令仰该校切实遵照办理具报。此令。”

同日，一、二年级学生赴惠山进行实弹打靶。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校闻·本校一、二年级在惠山打靶”：“本校一、二年级同学，由罗总教官、王助教率领，在五月二十三日赴惠山实弹打靶，成绩颇佳。得分最多者，为卞长鹏、韩宝荣。由教官陈明校长，

颁给奖品，以资鼓励云。”

六月一日，无锡国专举行复兴纪念。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校闻·本校举行复兴纪念”：“六月一日，为本校复兴纪念，在大礼堂举行典礼。主席唐校长，报告本校复兴经过，及缔造之艰难，勗[勗]勉同学不负本校救民命正人心之大旨。冯主任及王介人先生皆有演说，散会已将十二时云。”

五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九、钱基博著《名家五种校读记》出版。

按：《名家五种校读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五年五月出版。此书为先秦名家五种著作《尹文子》、《邓析子》、《慎子》、《惠子》和《公孙龙子》的校读记。每种分“校读记”、“传”、“后叙”三部分；在“校读记”部分，又于各篇中分“校勘”和“提要”两部分。

六月，举行第十一班十四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渊、王慎庵、任以炳、向景华、李亚崐、何济勋、胡嘉炷、郝立人、徐林、徐炎文、徐景贤、粟孚、秦桂祥、唐建祖、张人骏、张惠藻、童魁、钱永之、钱宝康、万肇康、黄源激、邓怡惠、蔡成璋、踪宁人、戴汉杰、顾迈修、卢景纯、龚权、欧阳革新等二十九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

按：《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五号为本届学生的“毕业专号”，共收入学生论文二十五篇及诗作若干篇。

又按：本届毕业生的黄源激和十六届毕业生中的吴自予，是历届无锡国专学生中之年龄较大者。郑学弢《回首母校——记六十年前的人和事》（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四、二十五期）一文曾记：“学校虽然办在无锡，但负笈来学者区

域甚广。如比我高一班或两班有一位女同学，名叫吴自予，胖胖的体形，戴一副眼镜，喜欢打网球。她是四川人，据说来国专上学前已是四川某中学的校长。她在校时年龄已接近四十，从举止来看，是像一个工作了多年的人，身上已经很少学生气了。还有一位从江西来的黄源激，他比吴自予更年长，头顶已经有点秃了，说话、走路都显得稳重缓慢。据说，他入学前是江西省教育厅的一个中级职员。我同班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说：‘黄源激的年龄大概和你爸爸差不多了！’又雨窗《师门五记》一文亦曾记黄源激之事云：“‘国专’学生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岁，但当时有一个所谓老学生黄源激，年龄已四十左右，他是慕唐校长的道德文章，不远千里来‘国专’求学的，因此引起了同窗瞩目。他长袍马褂，态度严肃，温良恭俭，循规蹈矩，颇有笃实躬行之志。‘国专’同学有各种文社、诗会和同乡联谊会之类的组织。这些文社、诗会也印有专用稿纸诗笺，出期刊或墙报，个别则发表在《国专月刊》上。有次安徽同乡会举行酒会，黄源激同学平日并不饮酒，他听说沽的是‘唐蔚芝酒’，于是欣然衔杯。放假回家时，他还特地买了两瓶带走，对唐校长的崇敬是与众不同的。”

六月三十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钱基博著《文心雕龙校读记》出版。

按：《文心雕龙校读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出版。全书一册，不分卷。此书按《文心雕龙》原书中五十篇顺序排列，每篇分“发指”和“校勘”两部分，“发指”概括本篇旨意，“校勘”指出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

七月，租借西水关裴姓房屋为校外宿舍，约住学生二十余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八月，招收第十四班及补习班学生共八十八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考入十四班的学生中有马茂元（字懋园，一九一八～一九八八），是近代散文家、“桐城派殿军”马其昶的长孙。马茂元来校时，曾携带马其昶《易费氏学》、《屈赋微》等书数部，校长唐文治闻知，曰“是盖有自焉”。又马茂元在无锡国专读书期间，“文名震一校，同学皆慕与之交”。

吴孟复《马茂元传略》：“马茂元，字懋园。清史馆总纂抱润先生名其昶字通伯者之长孙……茂元既毕业于桐城中学，乃赴无锡，报考国学专修学校。唐校长茹经先生文治亲主试事，得其文，激赏之，旋知为抱润孙，则益喜。茂元之来校也，携书数部：《诗》则钱澄之《田间诗学》，《左传》秦氏《九经》，《易》则抱润之《易费氏学》，《骚》亦抱润之《屈赋微》。余以告唐先生。唐先生思之良久，曰：‘是盖有自焉。’使余问茂元。茂元则言仲槩先生所教，且曰：仲槩又云当就唐先生及陈先生（石遗，名衍）而正焉。唐、陈两先生闻之，皆欣喜也。其年，唐先生年七十，茂元献持为祝，唐先生使人诵而听之，首肯者再。茂元在无锡，文名震一校，同学皆慕与之交。而茂元所与之莫逆者，独余与王君先猷，其同班则姚君奠中、今为山西大学教授者也。王君毕业回粤，曾有怀茂元诗，其诗曰：‘风调依稀抱润翁，清词丽句更谁同？桐城诸老传灯录，都在先生著述中。’盖茂元早有志撰述《桐城文学史》，惜其终未成也。”

考入十四班的学生中又有姚奠中（原名姚豫太，太一作泰，一九一三～），但他未及在无锡国专毕业，便中途转入苏州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学会。

姚奠中《“国专”散忆》：“一九三五年夏，我和同乡山西



崑崙县的袁步洪同时考入国专……在国专是愉快的，但我还是离开了国专。原因是我通过朋友引导，旁听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对章先生所讲小学、经学、文学、史学、诸子等略说，感到茅塞顿开，得未曾有；又买到了曹聚仁前些年听章先生讲学笔记整理出版的《国学概论》相参照，于是坚定了我的学术道路。当时，我狂妄地感到一般大学所教教材内容，一看就懂，用不上再听讲。我把我想到苏州的愿望，告诉了钱先生（按：指钱仲联），钱先生同意了。由于要正式参加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须有文教名人介绍，钱先生写信给我，介绍了章太炎先生的朋友金松岑先生，请他作我的介绍人。这样我就放弃了国专学籍而进入章门。”

八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一、叶长青著《文史通义注》出版。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校闻·本校丛书第十一种已出版”：“自二十三年度上学期，本校搜集教授著作，排印丛书。兹第十一种业于暑假中印就，为叶长青教授之《文史通义注》。章氏《通义》，颇多晦涩难通之处，叶先生为之疏通诠释，详加注明，有便于读者不少。刻由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数百册，专供本校同学参考。并闻开明书局已购得版权，积极排印，以应研究国学者之需求云。”

宁友《陈石遗先生与无锡国专》：“……叶长青有《文史通义注》，编入无锡国专丛书。他有一次在课上说：‘我闻诸夫子，“六经皆史”之说并不始于章学诚，章氏以前早有人道及。’他所说的‘夫子’，学生们认为是石遗先生。事为石遗先生所闻，他在某次全校性的大会上，郑重向学生们说：‘叶先生之言是闻之于唐校长，鄙人不能掠美。’石遗先生谦逊，一时传为美谈。”

按：《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全书分两部分：《文史通义注》八卷，《校讎通义注》三卷。书前有作者自叙。

九月，安徽宿县县长致函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该县中小学拟增加读经一科，欲订购唐文治所著之《孝经大义》一千本，分发城乡各学校诵读讲解。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校闻·本校校长泽教远扬”：“本校校长唐蔚芝先生，德高望重，遐迩闻风，上学期曾接新加坡华侨吴可培君来函，请求唐校长惠赐近影，列入《圣哲画像记》。本月又接安徽宿县县政府曲著勋县长来函，以晚近世风日替，拟令宿邑中小学增加读经一科，以《孝经》尤为切要，夙仰唐校长为当代理学大师，以欲订购唐校长所著之《孝经大义》一千本，分发城乡各学校诵读讲解，则裨益宿邑，实非浅鲜等语。闻已复许。足见本校校长泽教远被，海内同钦矣。”

自本年下学期起，无锡国专实行军事管理。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校闻·本校实行军事管理”：“本校军事训练素主严格，本学期间教官幸鹏云先生调任江西省南昌工业专科学校，更由训练总监部改派李雪谷先生专任本校军训事宜。李先生毕业于中央军校，及教官训练班。先后从事军队工作十余年，而诲人不倦，一切恪遵总监部意旨，推行军事管理，实行军事化。学生在校出外，一律夏季着灰色制服，冬季着黄呢制服。作息讯号，改为鸣号。并规定每日上午六时半，下午五时五十分，为升降旗时间，全校齐集致敬。气象一新，各同学无不精神百倍云。”

自本年下学期起，无锡国专扩充阅览室并增添书籍杂志。原图书馆主任王绍曾离任，由十二届毕业生王桐荪（字彤

生，? ~) 继任。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校闻·图书馆扩充阅览室增添书籍”：“本校图书馆主任王介人先生，荣任江阴尚仁职业中学校，遗缺由王桐荪先生递补。并加聘毕业校友顾增贤先生为管理。本学期以所建藏书楼已全部竣工，将前有藏书室全部划为阅览室。增添书籍杂志，足供本校同学之参考云。”

自本年下学期起，无锡国专施行导师制，由各学生就兴趣所近，自行签名，任选教授为课外导师，指导各科研究方法，时间则由各教授支配。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校闻·导师课先后开始讲授”：“本校为学生课外研究，发展个性起见，特施行导师制。由各同学兴趣所近，自行签名，任选教授为课外导师，指导各科研究方法，时间则由各教授支配。本学期业已先后开始。兹探悉，唐校长指导理学，冯振心先生指导子学、小学，杨铁夫先生指导词学，钱萼孙先生指导诗学，叶长青先生指导史学，陆景周先生指导经学云。”

自本年下学期起，无锡国专教授顾实于导师课时间，为学生加授法学课程。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校闻·教授顾惕生先生课外讲授法学”：“教授顾惕生先生，除精邃中国文学外，对于法律学亦有深刻之研究。历年来担任各大学课务之余，仍司大律师之职于首都。兹以基础法学，为国民应具之常识，特于导师课时间，加授法学课程。用商务出版刘子崧、李景禧合编《法学通论》为教本。闻签名听讲者，极形踊跃，现已委托无锡教育局赴申订购，不日开始讲授云。”

自本年下学期起，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研究股工作活跃，组织开展多项活动，如请求校方邀请著名专家莅校演讲、添置社会科学专门书籍、组建意阿问题研究社等。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校闻·研究股工作紧张”：“学生自治会研究股，每学期以研究员之努力，成绩皆有可观。本届自俞学祖君长股以来，工作紧张，加组社会科学社。该社成立后，报名加入者达四十余人。闻第一次常会，已于八日开会，讨论议案多件：如请求校方邀请著名专家俞庆棠先生、唐庆增先生、俞寰澄先生、孟宪承先生、陈一百先生、马寅初先生、杨荫溥先生莅校演讲。贡献图书馆，添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世界知识半月刊、读书生活等社会科学专门书籍，及定期刊物，以供参考，均蒙校方接受照办。又以意阿问题，关系重大，应于其发生之近因、远因，以及今后结果之推测，加以研究。并分六组，分工合作之：（A）华尔事件发生以前之史实。（B）华尔事件发生后，至战争开始。（C）战争开始，至目前情势。（D）意阿纠纷发生，对于国际间的错综复杂之关系及影响。（E）搜求各种专家之批评与意见，而推断其最后之趋势。（F）总裁整理以上五组之研究报告，编纂成篇，为一整个意阿问题的史料。特组织意阿问题研究委员会，负责办理之。当选吴翼清君担任第一组，洪长佳君担任第二组，吴雨苍君担任第三组，袁葆镛君担任第四组，俞学祖君担任第五组，沈切、黄光焘二君担任第六组。闻担任第一、第二两组吴、洪二君，已积极进行，努力工作，拟于本月间，作一详细报告。吴雨苍君并助任绘图事宜，将来成绩之惊人，定可预冀也……”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校闻·意阿问题研究努力”：“研究股自意阿问题研究社成立



以来，各社员极形努力。第二组华尔事件发生以后，至战争开始部分，史料收集已毕。以后仅须粘贴及连贯成篇而已。第三组战争开始至目前情形部分，除每日剪裁报章外，并成十月份战事记一篇。又闻第一、第四、第五三组，亦已积极进行，尤以第四组颇为精采，不日当可完成云。”

十月，赴惠山实弹射击（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十一月，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联合各学团会操（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

十一月，因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无锡国专原有校舍不敷应用，乃由无锡著名实业家唐星海资助，在太湖之滨、宝界桥畔购地二十余亩。先举行奠基仪式，树界石作为校产。准备募集所需资金后，再进行新校舍的建设。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乙亥七十一岁》：“吾校因学生来者日众，校址不敷应用，诸同人提议另行购地建筑。虑无经费，适星海侄来谈，愿为赞助。爰于十月中托区长虞君循真，在宝界桥畔茹经堂对岸，先后购地约二十亩，每亩地价并各项费用约二百七十五元，先树界石作为校产。至建筑校舍，为费需十万之谱，只可俟诸异日矣。”

吴溉亭《记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四方学子既蜂拥而来，但校中地狭房小，容纳不下。蔚老召开校董会，议决尽量设法扩大校址，添筑校舍。乃门前是河，后面是竞志女学，右面是县初中夫子庙，左面是富裕的邻居，借给学校一块空地做操场，也年年要收回，实无法可想。因之又开校董会，议决迁地为良，指定至湖滨觅地。于是至青旗乡请乡长指定地，但几次下乡看地都不合意，最后由我选择。我选定宝界桥右侧之地。乡长说，此地最好，欲得此地的人不知凡几，皆难如愿。

因为此地不准有建筑物，是最好的风景区。国专欲在此地建筑校舍，可以通融。现在的教育局长是唐先生的学生，绝不会反对。于是择定日子由我携会计，携一万数千元下乡购地，户头数十家，尽一日之功而成。校董荣德生、唐新[星]海听说非常高兴，都说：我们欲得此地都难如愿，今国专轻易得之，殊出意外。荣德生愿担任平地筑驳岸、建桥梁、开门向、开沟，唐新[星]海愿担任建筑校舍费。即日动工，不久桥梁等等都完工，校舍图样都绘好，先建筑图书馆。不幸于大雪纷纷中蔚老率全校师生下乡行奠基礼并植树，蔚老口中尚念念有辞，但衣服已湿透了。”

《国学专修馆筹建分院》（见《新无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第三版）：“本邑国学专修学校，创办以来，垂十五载，平时以敦品力学为宗主……校长唐文治氏，因鉴于近年学生愈形发达，本学期统男女学生之籍贯，竟达十五省之多，本省亦占四十余县，原有校舍不敷应用。爰经再三筹划扩充，旋以第三区宝界桥，滨湖面山，交通便利，堪建分院校舍。当经函致汪县长、张建设局长，知照第三区区长虞循真，设法勘定圈购。兹由该校派吴溉亭、张尊五，会同虞区长，在宝界桥下，先后购定三十余亩，给价公平，乡民皆欢欣异常。风闻该校即将着手募捐，俟募有的款，即于明年开始建筑。该处山清水秀，本划定为风景区，他日黉舍落成，蔚为文化之区，湖山当更生色，而地方之繁荣，更可翘足而待矣。”

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一九三五年，拟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五十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四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学生，七个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



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按：据《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三期“校闻·本校新址行植树礼”中的记载，唐文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的颂词，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新校址植树礼上所作，《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中对此也有记载，故上引杨廷福、陈左高文中说在新校址奠基礼上作此颂词，当是误记。详见一九三七年事中。

十一月十六日，举行本年度下学期国文大会考；二十五日，会考成绩揭晓，共有顾时、韩宝荣等十人得奖。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校闻·本校国文大会考成绩揭晓”：“本校每学期必举行国文大会考一次，以提倡各同学作文兴趣。本届已依据校历于十一月十六日举行。文题凡四：一、善国性强国力论。二、晋楚城濮、邲、鄢陵之战，秦晋崤之战，齐晋鞏之战合论。三、拟庄子秋水篇。四、蟹国记。参加者共五级，约二百三十七人。至二十五日揭晓，三年级总平分数最多，得本届锦标。个人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亦得奖以书籍多部，籍资鼓励。计共十人，为顾时、韩宝荣、陶锺秀、沈初、卞长鹏、钱大成、赵家骥、姚豫泰、马茂元、徐缙瑞诸君。是日纪念周时，校长亲自给奖，并将题旨作法，详细阐明云。”

姚奠中《“国专”散忆》：“在一次学校举行的全校作文竞赛中，题目经、史、子、集各一。钱先生（按：指钱仲联）指定我作‘子’题。‘子’题的题目是《拟庄子秋水篇》。当然这是他了解我喜爱《庄子》之故。在两小时内，我写了五六百字交卷。在唐老夫子直接领导下评卷结果，我得九十八分。而茂元作‘集’题，得九十六分。当时即铅印向全校分

发。记得老夫子给我的评语中有‘可以追躐子云’之句。”

十一月二十四日，国专学生会研究股邀请唐庆增来校演讲，讲题为《中国经济思想之特点》。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校闻·唐叔高先生来校演讲”：“本校校长哲嗣唐叔高先生，为海内有数之经济学家，过去每学期例至本校演讲一二次，以增进同学之学识。前月学校当局，因学生会研究股之请，已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敦请来校演讲。题为《中国经济思想之特点》。内容分十大点，以新方法治旧典籍，诸同学聆此，不仅于经济知识有相当之认识，且于治学方法亦多所资助也。”

按：唐庆增此前曾在国立上海商学院经济学会以同样的题目做过一次演讲，演讲记录稿发表在《经济学月刊》一九三三年第一期。在这次演讲中，唐庆增“参证西洋各国之经济思想，以征诸我国经济思想之特点”，共概括为八点：一、范围狭隘，二、自足自安的经济思想，三、埋没个性，四、注重国民经济，五、均富，六、与他种学说混淆，七、阶级上一偏袒（重视农业阶级），八、思想尚未科学化。

十二月一日，无锡国专校务主任钱基博召集全体学生作学术演讲，讲题为《今日国学之趋向与章太炎》。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校闻·本校钱主任召集全体同学〔同学作〕学术演讲”：“本校校务主任钱基博先生，于十二月一日召集全体同学在大礼堂作学术演讲。讲题为《今日国学之趋向与章太炎》。大意谓今日国学，可分为清末考据余流一派；及浙东史学余绪一派。然多不能实事求是，辨今古文而能不读十三经，言史法史例而能不读廿四史，而其以章太炎先生为标榜者，其弊尤多在此，与章太炎先生以学术施之实事者迥异。最后勸各同学，于

此国势日危之时，惟有力本唐校长立身行道之宗旨，力行奋勉，始可以挽此既倒之狂澜，而不为风气所转移。闻者莫不动容云。”

按：本年十一月九日，钱基博应章太炎之邀，赴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演讲，这次演讲“即章氏国学讲习会为题”。后来钱基博追述此次演讲的经过及内容，以《太炎讲学记》为题，刊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子曰丛刊》第二辑。在这次演讲中，钱基博提到“章氏之学，欲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而为章氏之学者，乃褊而小之以囿于休宁、高邮。章氏之学，内圣而外王，务正学以言；而为章氏之学者，则曲学阿世，烦辞称说，不出训诂文字之末”，而半个多月后在国专的演讲中，也提到“以章太炎先生为标榜者，其弊尤多在此”，两次演讲，在内容上当有某种关联承接的关系。《太炎讲学记》，后被收录到近年出版的《追忆章太炎》一书中。

十二月九日，黄宾虹（名质，字朴存，号宾虹，后以号行，一八六五～一九五五）、陈柱应邀由上海同来无锡国专作学术演讲，黄宾虹的讲题为《中国画之认识》，陈柱的讲题为《墨子的尚义教育》。在此期间，黄宾虹由陈柱、冯振陪同，前往即将举行落成礼的无锡宝界桥畔的茹经堂参观游览，黄宾虹为茹经堂绘中堂一幅，陈柱作《茹经堂画记》题其上云。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校闻·黄宾虹、陈柱尊二先生莅校演讲”：“我国名画家、暨南大学教授黄宾虹先生，暨交通大学国学系主任陈柱尊先生，应本校校长、教务长之聘，于上月九日由沪约同来校作学术演讲。黄先生讲题为《中国画之认识》，其意谓中画与西画若造其极诣，其理相同。中国画家与西洋画家至于互相非诋，盖皆未能达其最高峰。并推至世间之理，九流百家之道，纷纭错

杂，然考核其真谛，莫不殊途而回归。论綦透辟。又谓提倡绘事，可以救挽人心，如画中所表出之幽情逸致，更加淡墨画之不施丹采，咸足令人对之志趣淡泊、心理超洁矣。陈柱尊先生讲题为《墨子的尚义教育》，阐发隐奥，解剖精翔，各同学无不记录，以备不忘云。”

《茹经纪念堂落成典礼》（见《学术世界》第一卷第九期）：“锡山唐蔚芝先生，为吾国当今大儒，经师人师，早已驰声中外。今年为先生七十寿辰，于是门弟子张其淦、胡端行、傅焕光等发起集资筑茹经堂于太湖之宝界山。自去年一月二日举行奠基礼后，鸠工建筑，将及一年，现工程完成，庄严华丽，湖山为之生色……现定一月四日举行落成典礼，唐先生故旧及弟子遍海内，想届时车水马龙，益使湖山应接不暇矣。老画家黄宾虹先生与唐先生为老友，前数日应唐先生之请，莅锡演讲，并由陈柱尊、冯振心陪往宝界山游览，黄先生为绘茹经堂中堂一幅，陈柱尊为作《茹经堂画记》题其上云。”

按：陈柱《茹经堂画记》，刊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新无锡》第四版，又钱仲联有《茹经堂碑记》，刊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新无锡》第四版；两文又皆刊于《学术世界》第一卷第九期。又据唐文治《茹经先生年谱续编·戊寅七十四岁》中记，抗战发生后，茹经堂内的“黄宾虹名画”及“瓷器”等，皆为日人窃去。

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此即“一二·九运动”。事件发生后，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于十二月十三日发出通电，要求政府“念神明之胄，请宽乡校之刑；思蓝缕之艰，誓保版图之整”。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校闻·本校学生会悲壮通电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华北局势日恶一日，北平各大学学生热血沸腾，作游行示威运动。爱国诛奸，匹夫有责，救亡图存，人有同情。全国各地莫不闻风附和，从而声援。本校同学，爱国热忱，素不后人，已于上月十三日发出通电，其原文如后：‘上海申报馆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林主席、蒋院长、何部长，河北宋主席，察哈尔张主席暨各报馆钧鉴：披山通道，蓟丘乃黄帝之故居；伏阙陈书，太学表齐民之真意。人心未死，清议尚存。一旅方期乎中兴，九州岂容其再裂。念神明之胄，请宽乡校之刑；思蓝缕之艰，誓保版图之整。临电惶悚，不胜待命之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会叩元。’”

又，“一二·九运动”后，无锡国专学生要求罢课游行，得到了校长唐文治的支持。十二月二十六日，无锡国专与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江苏教育学院、竞志女中、私立无锡中学、县立无锡初中、县立女子初中、辅仁中学、江南中学等大中院校三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其时“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过锡受阻，无锡国专、省锡师等校学生冲破宪兵的阻拦，来到城内中南大戏院，声援、慰问被围困其中的请愿学生。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上海各校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冲破军警及铁路局重重障碍，赴南京请愿。火车于二十六日抵达无锡，被宪兵司令谷正伦从南京开来的兵车截住，并将部分学生带到城内中南大戏院中。无锡各校学生纷纷支援上海的爱国学生。国专学生得到唐校长的支持，行动迅速，总是先一步把茶水、大饼等送到挨饿的爱国同学手里。唐校长的长媳俞庆棠是文化界救国会的会员，当时在江苏省教育学院任教授。她率领了省教育学院的学

生送食物到车站，看到国专的学生已经在那里，便说道：‘我落在你们后面了！’同学们说：‘应该归功于唐校长的支持。’在学生没有回校以前，唐校长一直坐等在校长室。”

陈其昌《往事的回忆》（见《国学之声》一九九五年第四期，又见《三吴风采》，题目为《唐文治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各地学生闻风响应，‘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响彻云霄，当时我正在无锡国专二年级读书。无锡大中学校学生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表示声援；但有些学校当局却借口‘读书救国’，阻止学生参加游行，或采取不合作态度。国专唐校长平时对学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但对学生的爱国活动却是一贯同情和支持的，因此，在国专从未有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事情。不多几天，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北平、天津的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抗日；同时，上海复旦、大夏、交大等学校也组成赴京请愿团，乘火车去南京。途经无锡时，国民党政府派遣大批宪兵前来阻拦。并将请愿学生围困在无锡映山河中南大戏院内，企图阻止他们与无锡学生接触，并设法把他们押送回去。宪兵们头戴钢盔，手执长棍，气势汹汹。这样更激起了无锡学生的愤慨。大家一致要求罢课游行，慰问、声援被围困的学生。当时校内几个领头的学生，跑到校长室向唐老夫子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提出声援要求。唐老夫子虽已双目失明，但消息还是很灵通的，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并没有问什么，就毫不犹豫地说了：‘好，好，反正上不了课，就暂时停课罢！’接着便让秘书陆景周先生出一布告，以无法上课为由，公开宣布暂时停课。校方开了绿灯。学生们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家排着队伍，先到对面无锡师范汇合，谁知一到锡师门口，却吃了个闭

门羹。锡师校方竟把大门紧闭，既不让我们进去，也不让校内学生出来。大家感到非常恼火，我们领头的几个学生便翻墙进去，打开校门。于是我们的队伍便冲进锡师，与锡师学生一起会同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排成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中南大戏院，声援、慰问被围困的学生。中南大戏院外布满了宪兵，个个手提木棍，气势汹汹，但他们自觉理亏，只是用木棍阻拦。这时我们国专学生一马当先，冲破包围，进入大戏院。与院内被围困的学生会合，而包围戏院的宪兵却无可奈何。”

十二月二十一日，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游艺股主办音乐演奏会。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校闻·音乐会盛况志略”：“学生自治会游艺股主办之音乐演奏会，每学期皆有精彩之表演，本届于二十一日在大礼堂举行。时笙管齐奏，丝竹匏革，音调铿锵。校外来宾参观者，颇不乏人，济济一堂，为从来未有之盛。教授叶长青先生经同学敦请，遂表演《人心不同》及唱岳武穆《满江红》词二节目。最末为章松龄同学表演京剧口技，惟妙惟肖，在座者莫不大笑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荣德生、唐保谦（唐星海代）、周莘如、钱基博、孙家复、顾倬、高阳、钱孙卿、杨翰西（钱孙卿代）等人，讨论收支预决算、教育股董事照章改选及购宝界桥地等事（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会议》）。

本年下学期，无锡国专新添购大批书籍。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校闻·图书馆新添大批书籍”：“图书馆本学期，添到大批书籍，如《万有文库》自出版以来，即已预约，兹二集亦已于

两星期前运到，公开陈列，备诸同学借阅。又《四部丛刊》三编，亦去函预约，以便与一二两编，成全帙云。其他如《影印宋版磻砂大藏经》，为利同学研究佛理哲学，亦不惜重资购到，各同学莫不称便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唐校长非常重视图书馆的作用……如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不惜重价购买《影印宋版磻砂大藏经》以利同学研究佛理哲学，又订购《万有文库》、《四部丛刊》三编全部。据王绍曾学长主持图书馆时统计，旧籍二万二千六百余册，新书五千册以上。他辞职后，由王桐荪学长继任，新旧图书在抗战前约五万册左右。新书编目后，公开陈列，供学生选借。学生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得进入书库，选借图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只要学生治学需要，唐先生自己的藏书也不吝出借。”

本年中，经钱基博的介绍，唐文治为裘毓麟（字匡庐，生卒年不详）的《思辨广录》作序（唐文中题作《广思辨录序》）；此后，裘毓麟又曾受邀到无锡国专作学术讲座。

唐文治《广思辨录序》（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六，又见《国专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吾乡陆桴亭先生生于明季，养晦海滨，绍千秋正学之传，负一代名显之望。著《思辨录》一书，括《周易》三才之全、《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之奥。其执友江虞九、陈言夏两先生为之辑要，张清恪公刻之于《正谊堂全书》中。厥后书版散失，先太夫子沈鼎甫先生刻之于江苏书局。迨先大夫辑录《陆子遗书》，复刻之于北京，盖风行海内久矣。昔顾亭林先生读其书，与先生札云：‘当吾世而有真儒，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学者也’（见《亭林文集》）。颜习斋先生读其书，俛首折服，上先生书，愿受业于门（见《颜氏遗书》）。当时大君子

推重如此，三百年后，慈溪裘君匡庐乃有《广思辨录》之作，伟矣哉！吾梓亭先生学派之传，信乎源远流而流长也……余老矣，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救世界之责，属望于裘君与夫后之读是录者。”

陈其昌《钱基博先生传略》：“先生（按：指钱基博）一生尽瘁于教育事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尤其可贵的，是能够识别提拔人才，非但对学生如此，遇到有真才实学的无名学者，亦无不热情地予以汲引、援手。如专攻宋明理学的裘匡庐，于理学功力甚深，但不为时人所知。裘匡庐深知先生的为人，却并不认识先生，于是通过先生的门人，把他的著作转送给先生评定。先生读了裘氏的著作，很欣赏，赞誉不止，特地写文章为他推轂揄扬，并将裘氏介绍给国专校长唐文治，还敦请他到国专作学术讲座，裘氏由此知名。”

按：裘毓麟是浙江慈溪人，旧译学馆毕业，升入京师分科大学，于一九一三年赴美，留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习政治经济，一九一六年回国，二十年来“精究程朱，旁参释老”，于理学功力甚深，著有《思辨广录》稿本三十册。上文中述及“（钱基博）先生读了裘氏的著作，很欣赏，赞誉不止，特地写文章为他推轂揄扬”，此文题为《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上，文首说：“我敬介绍裘匡庐先生之《思辨广录》，以供时贤之论衡而开思辨之境涯。”此文的主要内容后来又被钱基博采入《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上文又说，钱基博“并将裘氏介绍给国专校长唐文治，还敦请他到国专作学术讲座”，唐文治因有《广思辨录序》之作。裘毓麟到无锡国专作学术讲座的具体时间不详。

本年中，陈衍著《石遗室诗话续编》出版。



宁友《陈石遗先生与无锡国专》：“他到国专以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近代诗钞》和《石遗室诗话》，影响很大。到国专后，开始写《石遗室诗话续编》，随讲随撰，所论诗人，多先生所及见者。”

按：《石遗室诗话续编》六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五年铅印本。此前作者的《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有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五年铅印本。

本年中，唐文治为无锡国专在读学生崔龙（字云潜，生卒年不详）所编辑之《胡文忠公语录》作序。

唐文治《胡文忠公语录序》（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六）：“余主讲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武进崔生龙，笃好文忠集，孜孜矻矻，编辑《语录》若干卷，都为八类：曰学问，曰用人，曰民政，曰理财，曰兵政，曰兵法，曰地理，曰团练，择精以详，意沈而挚，可谓专且勤矣。”

按：《胡文忠公语录》一书未见。崔龙、陈荔英著《潜励斋初稿》一书中有《胡文忠公语录自序》。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一月四日，茹经堂举行落成典礼。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乙亥七十一岁》：“十二月初十日，茹经堂行落成开幕典礼，锡邑到者，华艺三、蔡兼三、杨翰西、荣德生诸君并星海侄；太邑到者，吴省三、金侠闻、朱恺侑、钱星揆诸君；金山到者，高君吹万；杭州到者，邵君祖平；其他南京、上海、崇明诸弟子，如张廷金、吴〔胡〕端行、裘维裕、朱诵韩、孙昌煊、傅焕光、江应麟、张福霖及新旧诸同学约二百余人，赠诗文、对联，各品甚夥。余深抱不安。未刻行礼，酉刻回城。余有演说词一篇，登载锡邑各报。”

《国专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校闻·本校校长茹经堂落成典礼”：“本校校长唐茹经先生，道德文章，名重宇内。去岁为先生七十寿辰，门弟子谋所以寿先生。乃相地于五里湖宝界桥畔，构茹经纪念堂，以与湖山共垂不朽。本校教授陈柱尊、冯振心二先生倡其议，由交通大学张贡九、胡粹士二先生主其事，皆校长之高第弟子也。首尾一年，始告厥成。建筑为宫殿式，傍山临水，风景绝佳。营造亦极富丽，乃于本月四日举行落成典礼，到会来宾，有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代表，及各地本校校友会代表、交通大学校友，暨本

邑耆绅多人。本校全体师生整队前往。一时踴踴踴踴，五里湖滨，环湖路上，观礼者络绎不绝。至午后三时，举行典礼。由筹备会张贡九、胡粹士二先生报告经过情形，略谓茹经堂本拟兴建于本校，后以本校已于太湖边购地数十亩，厘定三年计划，即将迁移，当求永远密迹本校为宜云。又延华艺山老先生演说，略谓无锡名园甚夥，而关于风教者则少，茹经堂庶可永垂不朽。最后唐校长答词，以培养本乡道德，淬砺东林气节为言，掌声雷动，极一时之盛矣。”

《茹经堂落成典礼》（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第三版）：“本邑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前南洋大学校长唐蔚芝先生，道德文章，名闻宇内。去岁为先生七十寿辰，门弟子金谋为先生寿，乃相地于五里湖宝界山，前明王仲山先生读书处，谋购茹经纪念堂。先生门下弟子凡四千五百余人，由国专陈柱、冯振二君倡议，由交大张贡九、胡粹士二君主其事，组织筹备会捐款一万五千余元，由傅志章、唐谋伯伉俪购赠地基，李[杨]锡鏐君绘图，江应麟君建筑，首尾一年，乃告厥成。昨日举行为[落]成礼，分志详情于下：

布置一览 茹经堂位宝界桥之侧，离桥百余武。建筑为宫殿式，面临湖山，风景绝佳。门首为牌楼式，颜‘茹经堂’三字，石遗老人所书，内面‘师表人伦’四大字。有一池塘曰芝泉，四环湖石，侧为甬道。拾级而上，正宇数楹在望，有及门弟子碑记。再上为石阶级，有亭形廊庑，悬华士巽所书‘茹经堂’匾额；侧悬左文襄所书联，及私赐中贺联。入左为雅言斋，内悬国专全体学生‘智水仁山’额，及板联一副，及于院长联，汪曾武茹经堂记屏。右为燕居之室。此外轩室甚多，布置各方礼品。

各方贺电 福开森：‘岳明水秀，堂构是营；轮奐一新，

颐养精神。’徐承燠：‘本三达德，祝七秩寿，六合四方，咸仰儒风。’沈庆鸿：‘华堂落成，遥祝茹经万岁。’王伯樵：‘唐蔚芝为当代大师，贵会特建华堂，藉示敬仰，功在百世，敬此电贺。’此外曹丽等辞烦不具录。

楹联摘要 国专学生会联：‘光风霁雨之怀，何止吞三万顷；鹿洞龙场而后，至今又五百年。’于院长联：‘清夷儒者操，广博圣人心。’杨铁夫联：‘位太湖惠山之交，平分鼋渚烟波、蠡园风月；融新安余姚之界，此是人师邹鲁、学子门庭。’沈初、崔龙联：‘著籍三千子，朝宗七二峰。’陶鍾秀、陈起昌联：‘道术承千圣，湖山寿万年。’私立无锡中学联：‘茹古函今，作人寿世；经筵叟席，傍水近山。’此外名作如林，不胜尽录。

到会来宾 外埠有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代表，如高燮、胡粹士、张贡九等数十人，及各地国专校友会同人，各地国专校友，交通大学同学数十人。本邑有陇县长，陈公安局长，县党部代表，耆绅华艺三、杨翰西、荣德生、蔡兼三、唐星海及各机关、各学校代表，国学专修学校全体师生，不下千余人。踴踴踴踴，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典礼情形 行礼如仪，首由筹备会张贡九、胡粹士报告筹备经过。次由华艺三演说，略谓无锡名园极多，怡情适性者多，关于风教者少，茹经堂所有千古不朽云云。最后唐蔚老演说（词另录）。末张贡九答词，摄影散会。

唐蔚芝先生茹经堂落成开幕典礼演说云：

鄙人深谢诸君厚谊。兹堂之成，由同学胡君粹士、张君贡九等十余人发起，同学杨君锡镠精绘图样，同学江君应麟担任建筑，同学张君德载切实照料，又得同学傅君志章布置花木，点缀胜景，合群力以成。在发起之初，鄙人自谓学问事业，愧

无建树，一再坚辞。而胡君等金谓：‘师生感情，凡我及门，最为团结。所以有此建筑者，将树之风声，以资观感，至中国文化复兴，自以京沪路线为起点，无锡地居中心。吾师提倡本国文化，兹堂之建，可谓复兴吾国文化之发轫。’因此关系，谊不能辞。今日师生萃于一堂，并承诸大雅君子贵临，感贡刍言，交相勉勸。鄙人生长太仓，所私淑者陆桴亭先生；迁居无锡，所私淑者高景逸先生。此处地近高子水居，闻景逸先生从前在五里湖滨讲学，樵夫渔子，聚而听者常数百人，一时风气都归淳朴。鄙人景仰流连，亟愿于春秋佳日来此湖滨，讲授《孝经》、《论语》并先儒性理之学，培养本乡道德，淬砺东林气节，以冀窃附先贤之后。但鄙人老矣。所囑望者，惟在诸君。释家有化身亿万之法，实则儒家早有此说，孔子言无行不兴，是以当时圣门有得一体者，有具体而微者，即亿万化身也；孟子言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荀子言涂之人可以为禹，亦即亿万化身也。诸同学散处四方，不下数千人。从前鄙人屡闻诸同学互相传言，不可忘鄙人平日之教，颇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概，至为可嘉。《记》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鄙人平日志愿在救人心、救民命，迨日生民憔悴极矣，皆由于心术日坏、人品日卑，以致风俗日恶。惟望诸君本学道爱人之意，以救人心、救民命学说传遍四方，善国性、严国防，俾正学渐以昌明，科学益以深粹，吾国文化有蒸蒸日上之机。鄙人居今日，享此湖山之福，有如芒刺在背，惟望诸君传继无穷，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俾吾中国之民得享安宁之福，则此堂确可为文化之起点矣。诸君勉之，鄙人更馨香以祝之。”

按：上文中记国专学生会联“光风霁雨之怀，何止吞三万顷；鹿洞龙场而后，至今又五百年”，实应作“光风霁月之

怀，何止吞三万顷；鹿洞鹅湖而后，于今又五百年”。据黄汉文《唐文治办国专与章太炎讲小学》一文中记，此是建造茹经堂时，章太炎所赠唐文治之联。

一月十三日，无锡国专教务主任冯振、学生代表沈初，奉蒋介石之召，赴镇江集合，进京“聆训”。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校闻·本校赴京聆训代表报告经过”：“自平津学生运动以后，行政院长蒋中正，鉴于上下之隔阂，意旨之不能相通，特召集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代表，进京聆训。本校奉令后，由校长派定冯教务主任为学校代表，沈初为学生代表，于一月十三日赴镇集合晋京，已于十八日晨返校。该时正值寒假，未及报告，本学期开学后，教务主任于纪念周时口头报告，沈初同学亦书面陈述经过情形，传达中央意旨，备极周详云。”

一月，《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图书馆目录（旧书之部）》出版。

唐文治《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图书馆目录（旧书之部）序》（见该书卷首）：“本校图书馆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初仅有图书一万余册。厥后广事搜集，迄今达三万余册，其新书及杂志报章亦有一万八千余册，别有善本书百数十种，则辟善本室以贮之。宋本既罕，后者遂珍，虽元明所刊，亦有足观者焉。爰嘱馆员分别整理编目，旧书则略仿前例，概以四部；新书则参照杜威氏分类法，间采各家著述，而以旧书目录先行付印……”

按：《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图书馆目录（旧书之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该目录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每部又分不同的小类，计载图书二千八百零七种、四万二千九百十二卷、一万六千三百五十七

册，另有不分卷者三百七十二种。唐文治序中说“以旧书目录先行付印”，“新书则参照杜威氏分类法，间采各家著述”，但“新书之部”的目录似未及编印。顾实曾在《十五年来之目录学》（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一文中将无锡国专图书馆旧书部与涵芬楼（张元济所创建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旧书部的藏书作过一番比较，说：“……然则十五年来之国专藏书，与旧涵芬楼藏书相伯仲矣。涵芬楼者，张菊生（元济）先生所经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三十余年之积储（约止于民国六年），而国专十五年来所藏，略足相当，不可不谓为长足进步矣。”

自本年上学期始，钱基博辞去无锡国专校务主任之职，由教授叶长青接任。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校闻·叶长卿教授兼任校务主任”：“本校校务主任钱子泉先生，前因操劳过度，精神渐衰，曾于去岁，屡请辞去校务主任职；嗣因继任无人，未能允其所请。本学期开学前，钱先生复以身体多病，光华大学院务繁剧，不能兼顾本校事务，向校长一再坚辞，遗职商请教授叶长青先生兼任，已得同意，于开学日，由校长正式布告周知。叶主任曾任各大学教授，并曾长福建福安等县，学识丰富，办事认真，接任伊始，于校务前途，多所建白与改进，同学咸庆得人云。”

按：钱基博当是在辞去无锡国专校务主任之职之后不久，又辞去了无锡国专并上海光华大学的教职，并转赴浙江大学任教。王绍曾《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一文中曾说：“（钱基博）先生在国专讲课，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前夕。”但没有提到他辞去无锡国专教职的确切时间。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无锡国专举行纪念建校十五周年庆典，《新无锡》在报道“到会来宾”的

名单中，有“邑绅钱基博”，说明他此时已不在无锡国专任教。又傅宏星《钱基博年谱》：“（一九三七年）夏，迫于东南战事吃紧，先生大约在暑期前后由上海光华大学转赴杭州浙江大学国文系任教，并参加了浙大在南京的招生阅卷工作。按：先生转入浙江大学任教的确切时间，以及此事缘由经过，目前一直未见到明确详实的文字记载。惟查《竺可桢日记》，先生的名字，最早出现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文曰：‘八月四日，星期三〔南京〕台风过境……八点半至中央大学图书馆，则阅卷诸人多已先后到，计有苏步青、陈建功、琢如、朱叔麟、周厚复、朱福炘、何增禄、季梁、祝文白、钱子泉（基博）、王驾吾，未几贝时璋及沈鲁珍亦来。’由此可见，先生既然参与了浙大在南京的联合招生阅卷工作，那么他在此之前就已经转入了浙大。”

继去年下学期之后，本年上学期无锡国专继续厉行军事管理。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校闻·厉行军事管理”：“本校自上学期实行军事管理以来，成绩卓著。本学期因奉教育部训练总监部令，命一年级同学于五月初赴南京受集中军训，校方为便利诸同学惯适军事生活起见，更积极厉行军事化，除全校穿着制服、作息讯号改作鸣号外，复将全校各级军事组织为一大队，由校长自兼大队长，教务主任及军事教官兼任大队副，各中队长及各分队长由大队长任命热心军事之同学担任之，余如课室膳堂规则，亦统经大队长重行更定，以期适合军事化为原则，已于上星期公布云。”

二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二、唐文治著《尚书大义》出版。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戊辰六十四岁》：“是年，

余为诸生讲《尚书》，编《尚书大义》内外篇成。外篇考今古文源流，内篇发挥每篇精义，多有先儒未经道者。振谨按：《尚书大义》分内外二篇，外篇叙今古文源流，采择精博，断制谨严，撷江、段、王、孙诸家之菁华。内篇分《尧典》、《皋陶谟》、《洪范》、《康诰》、《召诰》、《立政》六篇为政治学，《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大诰》、《洛诰》、《无逸》、《君奭》、《多方》、《吕刑》、《费誓》、《文侯之命》、《秦誓》十四篇为政鉴，于禅继大义、著作本源，阐发无遗。尤精者如论《洪范》八政、《吕刑》刑法、《费誓》军纪与周秦二代盛衰存亡之故，均足以昭示来兹，振兴世运。附《尚书》应读书目表，则分专门书、专篇书、参考书三类焉……”

按：《尚书大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版。

二月，无锡国专教授叶长青编《国魂集》出版。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乙亥七十一岁》：“闽县叶生长青编《国魂集》，选录古来忠臣义士有关志节诗文，都若干首，激励人心，极有裨于世道。余仿《庄子·秋水》篇，为撰序一首，自问谈诡之文，不作久矣，放笔为之，颇觉光芒四射，较旧作《说龙》、《释气》二篇为胜，深自喜也。”

唐文治《〈国魂集〉序》（见该书篇首，又见《茹经文集五编》卷五）：“造化真宰，际温蠖世，混沌莫名。泽水沸腾，恍见百灵。罔两肆虐，儵为汉魃。石言蛇斗，万怪惶惑。鬼伯当门，攫拏以食。或有叫者，嘻嘻出出，跳踉吸骨。予求予伎，昏垫回遘。黔首其咨，国载营魂，能无浇漓。黄帝告司命曰：‘有国在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司命对曰：‘请以

质大通、抱一二子。’爰摄国魄、追国魂，会于古嘉魂之府、保魄之乡。国魂曰：‘嗟！吾离矣！若之何？’国魄曰：‘噫！吾落矣！若之何？’司命曰：‘合莫神山，有返魂术焉。’乃相与促武缩气，展转翺翺，以访于大通子。大通子曰：‘吾语汝！吾国有国性，仁义礼智信是也。有国情，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也。有国纪，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是也。有国宝，《易象》、《诗》、《书》、《礼》、《乐》、《春秋》是也。有国器，临冲钩援、蒺藜渠答、轮舆飞船是也。之数者，或有形，或无形，谁其尸之？魂实主之。唐虞之时，魂寄于尧舜。三代之时，魂寄于禹、汤、文、武。春秋战国之时，魂寄于孔孟。唐之时，魂寄于张、许、颜、陆、韩。宋之时，魂寄于周、程、张、朱、文、陆。明之时，魂寄于薛、王、左、史。清之时，魂寄于顾、陆、胡、曾、左。乾坤不息，国魂亦一日不息。若夫不仁不智，戕其魂者也。无礼无义，役其魂者也。槌孝糝弟，寡廉鲜耻，慎倒其魂者也……问招国魂者谁？八闾叶长青也。序其书者谁？三吴唐茹经也。其时维何？柔兆困敦孟陬之月。将易其柔而苏其困者，句芒之神也。’

按：《国魂集》，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图书馆总寄售，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版。书前有陈衍、唐文治、刘通和国专学生沈切的序。全书以历史时期为序，共选录“古来忠臣义士有关志节诗文”一百零六篇。

三月二十一日，中央大学教授缪凤林（字赞虞，一八九八~一九五九）至无锡国专演讲，讲题为《日本近世之统治阶级与最近军人暴动》。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校闻·中大教授缪凤林莅校演讲”：“三月二十一日，本校敦请中大教授缪凤林先生莅校演讲，上午九时起十一时止，题为

《日本近世之统治阶级与最近军人暴动》，剖析周详，言简而扼。两小时中，使听者对于此次世界所注目之事，洞悉根源。末更勸同学以学问道德是尚，引曾文正公即无事业，仍有学问道德，归至立言立德较重于立功，尤属切要，讲后参观全校，极称办理完善，临行时学生会赠以本刊，亦蒙赞赏不置云。”

三月二十五日，本届毕业论文选题由各教授拟定，送交教务处汇齐发表。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校闻·毕业论文题发表”：“本届丙子级毕业论文依向例，业于三月廿五日，由各教授拟就，送交教务处汇齐发表，计分：一、《周易八卦象爻及象象传注释并广论大义》。二、《孟子分类学注释并广论大义》。三、《左氏兵略旁通经子要论》。四、《汉学与宋学今后趋势之预测》。五、《唐诗与宋诗对于清诗之影响》。六、《振兴中国策》。七、《非常时期教育之实施》。八、《非常时期国学专科学校课程方案》。九、《宋诗品（仿钟嵘〈诗品〉）》。十、《纪事诗述论》。十一、《韩文评述》。十二、《中国哲学史纲要》。又顾惕生先生为便利毕业同学选择起见，另拟题目二十条，计分：一、《东方德治主义之文化与西方法治主义之文化论》。二、《中国秦汉以后之下层人民教育论》。三、《中国征兵制与募兵制之变迁考》。四、《中国历代民食与其体质强弱之关系论》。五、《管子老子同异论》。六、《管子修太公之教与孔子修周公之篇籍论》。七、《东方西方古今哲学无定论考》。八、《东方消极人生观与西方积极人生观之比较论》。九、《刘知几〈史通〉与近代史法合论》。十、《司马迁〈史记〉上绍〈春秋〉论》。十一、《〈史记〉体例原出〈世本〉考》。十二、《古礼乐亡佚考》。十三、《〈史记〉、〈汉书〉中之文化观》。十四、《〈史记〉、〈汉书〉中之

历法考》。十五、《〈史记〉地理志、沟洫志关系中国疆域水理论》。十六、《〈墨子·辩经〉与西洋论理学之比较论》。十七、《墨子‘兼爱无父’、杨氏‘为我无君’近于大同民主论》。十八、《诗书执礼必通〈尔雅〉一书论》。十九、《〈尔雅〉非字书而以语音通姬汉群书之义论》。二十、《六艺百家同归于治论》。毕业同学咸各就其学者所长，性之所近，择一而作，孜孜矻矻，常处书城，尽量发挥其三年来之见闻云。”

四月七日，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子民，一八六八～一九四〇）复唐文治函，就唐文治来信中请求其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建筑费一事，答应尽力为之。

蔡元培复唐文治函（见《蔡元培全集》第十四卷）：“蔚芝先生大鉴：大函奉悉。国学专修学校添筑新屋，具见校务发达，曷胜欣羨。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求建筑费一节，在开会讨论时，弟自当尽力。先此奉复，诸希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七日。”

按：唐文治致蔡元培信未见。

四月十三日，教育部特派专员陈泮藻、郭有守（号子杰，一九〇一～一九七八）到无锡国专进行视察。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三号（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校闻·教育部专员来校视察”：“教育部本年度特派专员视察京沪各专科以上学校。本月十三日视察专员陈泮藻、郭有守二氏，莅临视察。由本邑教育学院院长高阳、教务长陈澧江、教授俞庆棠陪同来校。与唐校长略谈有顷，随偕本校冯教务主任至各教学室、图书馆陈列室、阅览室、各办公室，巡视一周，详加指示，对于本校校风之淳朴，深为嘉许云。”

四月十八日，举行本年度上学期国文竞赛（国文大考），四月二十七日，竞赛成绩公布，有吴竟成、武宗灿等十

三人成绩在九十分以上。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三号（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校闻·国文竞赛按期举行”：“全校国文竞赛，遵照校历，于四月十八日举行。命题凡三：一、《孔子言我战则克，孟子言君子战必胜论》。二、《国防地理要论》。三、《汉武帝罢黜百家，影响于后代经术论》。任作一题。各同学莫不精心斗角以期争夺荣誉，考卷已分发各教授评阅，不日谅可发表云。”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校闻·全校国文竞赛会考揭晓”：“本届全校国文竞赛会考成绩，已于上月廿七日公布，三年级总分数最多，获得锦标。同学成绩在九十分以上者十三人，计吴竞成、武宗灿、黄敦、王先献、马茂元、黄光焘、陈其郊、俞学祖、虞以道、赵恩寿、徐毓梅、徐缙瑞、虞亘，各由校长授奖书籍数种云。”

四月二十五日，广州学海书院副院长钟介民（原名钝颖，字建闾，一八八三～一九六四），至无锡参观国学专修学校，并拜会校长唐文治，双方商定合作方法。学海书院的创办人陈学棠并为无锡国专筹建新校舍捐资千元。

《广州学海书院与无锡国专文化合作》（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版）：“广州学海书院，原为仪征阮文达公所手创，民国以来，书院制废，去岁始由陈伯南氏倡议复兴。鉴于国内学界素乏联络，最近委该院副院长钟介民氏，北上参观苏州章氏讲学会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资借镜。钟氏在苏参观后，即于本月二十五日，由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陪同来锡，晋见国专校长唐蔚芝氏，考察该校一过，极表赞佩。又以该校与章氏讲学会，乃研究国学最高学府，掌教者咸为一时宏硕。当即商定合作办法，嗣后介绍该院高材生，分赴苏锡两地，藉资观摩。并闻陈伯南氏对于国专筹建新校舍

一事，认为复兴中国文化基础，已慨捐千元云。”

按：学海书院建于一九三五年，是在民国时期粤系军阀领袖陈济棠（字伯南）的支持下创办的。该学院的宗旨，是要恢复传统书院制度下的人格与德性教育，以弥补现代大学教育的缺失。一九三六年夏天，陈与桂系联合，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对蒋介石，即所谓“两广事变”，终遭失败，学海书院亦被封。因为书院被封发生于钟介民访问无锡国专之后不久，故拟议中的合作计划似未及实现。

五月十五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三、唐文治著《性理学大义》出版。

《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校闻·本校丛书新编——《性理大义》——问世”：“校长所著《性理大义》一书，取材于宋五子，剖析精微，一纸风行，销售早罄。复因四方购索者踵至，特重付手民，并刻入本校丛书，以便嘉惠来学云。”

按：《性理学大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全书共二册，分《周子大义》二卷、《二程子大义》二卷、《张子大义》四卷、《洛学传授大义》一卷、《朱子大义》八卷。

约在五六月间某日，唐文治在无锡国专校内接受了《旅行杂志》记者吴德明的采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唐文治再一次强调了其所一贯提倡的“教育除灌输知识而外，尤当注重人格教育”的思想。

吴德明《唐蔚芝先生访问记》：

“晨乘京沪早车出发，十时许抵锡。下车后，探悉先生刻在校授课，乃驱车至学前国学专修学校。贤关圣域，庄严气象，肃穆雍和。该校位于圣庙东偏，辟文昌阁为会客室。

入门投刺，先由庶务张君款入办公室，略询先生近日生活及校中情况。张君谓先生现值无课，半小时后，在三年级授《易经》。遂由张君引导，急趋校长室。室在尊经阁之东偏，方可数丈，四壁遍悬名人手迹、纪念照片等。先生南向坐，态度端庄，望之俨然。旁坐秘书陆景周先生，正处理案件。当记者晋谒时，由陆秘书代为通知。先生宽衣大褂，和蔼谦恭。目虽不复见，而听觉极聪；银髯飘忽，精神矍铄，望之犹如五十许也。

记者晋见后，略致渴仰道候之意，先生备极欢迎，春风满面，时露笑容，答问至为详尽，并略述救国基本原则。兹并志如下：

问：先生近来生活若何？

答：不过如此。清晨起身，即到校办公。下午略作午睡，三时延见宾客，四时处理积件。入晚与家人叙话，或与幼孙讲述孝道，以坚童心。

问：先生是否每日到校办公？

答：除星期日外，每晨七时到校，十一时半离校。除处理一切校务外，间亦讲授经学、理学等重要课程。

问：近将暑假，校务想见倍形忙碌。

答：还好。比平常略忙。一则暑假将举行十五周年纪念，现正积极筹备；二因筹建新校舍问题，亦在次第进行中。

问：十五周年纪念预备何时举行，有无仪式？

答：大概总在半月底，暑假前，但日期尚未确定。想拣一星期日，俾来宾可抽空参加。在此国难时期，亦不过事铺张，届时拟邀请名流学者，莅临演讲。

问：筹建新校舍之计划可得问欤？

答：本校地位狭窄，而学生日增，前后左右，几无法发



展。现择定太湖边宝界桥新校址。风景天然，堪为进修学业处所。预定两年内竣工。

问：闻先生新近落成之茹经堂，亦在该处附近，相距几何？

答：前后相望，相去不过数武耳。

问：茹经堂建筑若何？

答：多承各位同学弟之厚意，集资庆祝七十寿辰，堂为宫殿式，容积不大；背山临水，风景绝佳。

……

谈约二十分钟，忽闻军号声，知为第二课散课，学生鱼贯自教室中出，预料距上课时间不远，因再作教育问题讨论。

问：先生对于教育本位，应以何者先入手？

答：教育是承先启后一件重要任务。教育除灌输知识而外，尤当注重人格教育。盖教育本意，无非是培养天良，消灭恶念。正心诚意，做一个堂堂正正之人。本此善良心术，然后可做轰轰烈烈事业。若人心术不正，虽有经天纬地之才，适足以殃民而祸国。明乎人格教育之旨，始可以语教育矣。

问：举世滔滔，先生将以何术挽救之？

答：挽救风气，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效，尤非在野之人所可转移。顾我当亦尽我能力以挽救之。一则训导学生，语诫亲友，广为传布。一则著书立说，申做当世，并示后昆。故我办学宗旨，即以此为第一义。最近我新刊性理救世书，阐发性理之学，以为救世之准绳。诚能人人循是以行，庶可达到移风易俗之微旨云尔。”

按：此访问记的作者吴德明是无锡国专第十一届毕业生。

六月十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四、陈衍著《石遗室论文》出版，此书与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一的

《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和丛书之四的《史汉文学研究法》，都是陈衍根据自己在无锡国专上课时的讲稿增补而成。

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石遗室论文》“解题”：“《石遗室论文》著于一九三六年，同年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旧时治学讲究经义、词章、考据，从读名篇入手，本书为陈衍教授文论之作。从本书选论各篇可见作者反对姚鼐一派过于重视唐宋八家，认为这是‘以水济水，不觅源头’。他赞同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兼采经、史、子三学，强调学以致用，经世济民，推究名篇源头及其传承变化，提出‘未有不精于经术而能行文者’。本书独到之处在于不仅论述文章结构变化，且对文中所述经世济民之得失多有评论。作者兼述历代文章嬗变，推崇《出师表》上变汉京之朴茂，下开六朝之隽秀。涉史自上古至唐宋，重点在唐，批评桐城派，抑韩扬柳。”

宁友《陈石遗先生与无锡国专》：“国专曾将教授们的著作付印，编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中。其中《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史汉文学研究法》、《石遗室论文》，都是石遗先生根据讲稿增补而成。他每次讲课必有讲义。至于课堂所讲，则为讲义的补充或发挥，并不是宣读讲义。有些不便于书面发表的见解，则于讲课时出之，个别谈话时则更深透。”

按：《石遗室论文》，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全书共五卷，分论“上古至周秦”、“两汉”、“三国六朝”、“唐”、“宋”之文。

六月二十日，《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出版。

唐文治《〈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弁言》（见该书卷首；又见《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五，题作《国学专

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序》):“今兹世界一大战国也。火器日精,千辟万灌,一遇战事,杀人盈野,人命若草芥。悲乎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灭,乾坤几乎息矣。昔子與氏目睹善战之惨,大声疾呼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者,生理也。欲拯民命,先教人心;欲教人心,先明正学。正学明而后人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此古今中外之常经,莫能外焉者也。文治束发读书,受父师训。弱冠潜研经训性理,志闲先圣之道。壮岁服官,游历欧美,自愧无裨于世。强仕后,奉先妣讳回籍,掌上海南洋大学。淬厉工业,日省而月试之,尤兢兢焉以道德礼义为根本。民国十年解职,遂于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嗣易名学校,迄今十有五年矣。此十五年中,拮据卒瘁,一经齐卢之战,再经匪人之侵袭,三经中日沪上之衅。道途梗阻,黉舍飘摇。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度图书则自数百册增至四万余册,修屋宇则自十数幢增至七十余幢,核学额则自三十名增至二百七十名,至于救时之志,更无日不申傲诸生,相与朝乾而夕惕若也……爰于太湖之滨,购地数十亩,将悉力经营,建兹广厦,俾文人学士之来游兹土者,观感兴起,动读经尊孔之思。而吾校生徒,春诵夏弦,更得怡情高旷,祛鄙吝而涤烦襟。圣人所谓智动仁静,《礼记》所谓藏修息游,吾中国文化,或藉此为权舆,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则夫开鹿洞,表鹅湖,绍龙场之心传,与夫正人心,救民命之事业,当吾校三十周年纪念,必有发扬而光大之者。愿吾校诸同人诸同学暨海内同志,视兹弁言,以为息壤。若夫提倡辅助斯校,董其成者,与是编之惠赐南针者,凡我师生,咸感激不去于怀也。”

按:《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该纪念册的主要内容

有：插图、统计图表（有《历年经济状况比较表》、《现在经济支配状况表》、《历年学生人数比较表》、《历届毕业学生人数比较表》、《现在学生籍贯统计表》、《历届毕业生出路统计表》、《图书馆现有图书统计表》）、校歌、校史概略、校历（〔民国〕二十四年度——二十五年度）、论文（计有陈锺凡《十五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钱萼孙《十五年来之诗学》、杨铁夫《十五年来之词学》、顾惕生《十五年来之目录学》、叶长青《十五年来之校讎学》、唐兰《十五年来之文字学》等六篇）、章则（有《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组织大纲》、《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行政组织系统表》、《校董会章程》、《校务会议规程》、《教务会议规程》、《办事规程》、《教训军合一委员会规程》、《招生委员会规程》、《毕业考试委员会规程》、《刊印本校丛书规程》、《各学年学程学分及纲要表》、《学则》、《规则》等）、《校董名录》、《职员名录》、《教员名录》、《毕业生名录》、《在校学生名录》、《本校出版物目录》、《本校历届毕业论文目录》，是研究无锡国专前十五年历史的重要文献。

六月二十一日，举行无锡国专十五周年纪念暨十五届毕业典礼，毕业生计有王宗礼、王国彪、王锡章、卞长鹏、孔昭庚、方恭绥、史惠南、史龙云、左桂华、包槐森、任家梁、吴方钧、吴自予、吴雨苍、吴竟成、宋恩培、何为龙、沈锡九、沈切、武宗灿、金敬泰、邱镜平、洪长佳、宫传瓚、徐恩涛、徐谷、孙易、张可久、张如愈、张叶欣、倪云裳、陈起昌、陈松英、陈玉清、陆昌寅、康视逵、陶锺秀、章松龄、崔龙、莫善述、彭天龙、姚景文、覃克己、乔选、葛昌基、杨同苏、杨家兴、叶炜白、虞寿勋、赵宗湘、赵家骥、蒋家墀、刘斯南、钱大成、钱君白、卢寄沅、谢之勃、谢学裘、潘振元、戴传

安、韩宝荣、顾时、龚永日等六十三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等）。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丙子七十二岁》：“本年为本校十五周年纪念，先期向各处征文，印纪念册简鉴，并印新校舍计划图暨礼堂图。于五月杪，择日行纪念并毕业礼。是日到者，南菁旧同学钮君惕生、专员臧君启芳、县长陇君体要等数十人，颇极一时之盛。毕业生六十三名。”

《学前街国专修学校纪念盛况》（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三版）：“……兹将昨日一切详情撮记如下：

布置一览 该校大门架一彩牌，上悬白布横额，书‘无锡国专十五周年纪念暨十五届毕业典礼’，旁悬一联曰：‘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教，以待后学；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并在校之附近密置警卫，由该校学生担任，背负大刀，勇武异常。入门各处，皆悬红绿灯纱，礼堂三大门各横匾额。正门一联，句曰：‘东林讲学以来，必有名世；中国豪杰之士，于兹为群。’堂内满挂各机关团体所赐联轴，并陈列鲜花银盾礼品。此外长官休息室、校长休息室、来宾休息室，莫不美观辉煌。

到会来宾 到会来宾有考试院副院长钮惕生，中央政校主任孟伯洪，前两路局长苏绅任筱珊，交通大学主任陈柱尊，及臧专员、陇县长、李委员，教育学院高院长，竞志侯校长，纲南钱校长，启明廉校长，邑绅钱基博、荣德生、蒋遇春、蔡其标、唐星海诸氏，不下数百人。

校长报告 上午九时开会，唐校长主席，陆秘书长司仪，由平民习艺所乐队奏乐，雍雍穆穆，行礼如仪。首由唐校长蔚芝先生报告，略谓本校宗旨，素主实事求是，不尚浮光掠影。本届毕业同学六十三人，虽经三年之攻读，已能小有著述，而

尚望砥品砺行，继续努力。至于十五年来经过情形，则艰难困苦，风雨飘摇，惟一念保存中国文化，故一息尚存，此念始终不懈。愿爱护本国文化者，加以保护。本校至百五十年纪念时，庶几中国文化普及于全世界云云。次由教务主任冯振心氏，报告本届人数及成绩，同时授给文凭。

名人训词 嗣由考试院副院长钮惕生致训。略谓兄弟与校长，乃南菁书院先后同学，辛亥革命之际，受教于校长者极多，故得免谬误。既承明命，不敢不略致数言。窃谓当今之世，欲奠定天下，使生民享太平之福者，环顾世界，惟我国人口土地物产种族，为最有资格。英俄亦未尝无此资格，而历代传统思想及国民性，多以侵略为当然之事。独中国则不然，立国之精神纯受孔孟之影响。故惟中国而强，世界和平始保障。此责任皆在研究国学之士，则本校所负责任之重大可知矣。至于创办之初，艰难困苦，乃必然之事。其始愈艰苦，则其后根基愈稳定。国术馆初成立时，众皆轻视之，及一二八之役，发挥其威力，今渐普遍于闾巷之间矣，国学亦犹是也。末复以军训、体育、生计三点勉同学，辞甚恳切。

学生致答 次由臧专员、陇县长致词。大意为精神文明，乃物质文明之根本，必有义理、考据、词章而后一切有所附丽。国专之学，根本之学也；济济多士，必有名世者矣。次由孟伯洪氏致词，略谓立国之要，土地人民主权而外，尚有武力与文化二点；而指挥武力者，必以文化为基础，所谓民族意识、一切教育，皆以为最后之目的。而国专尤独以此为唯一之任务。其发扬光大，可预卜矣。次由钱子泉氏致词。末由毕业学生代表答词而散。

作品展览 各种作品展览，计分艺术及成绩两种。艺术展览室内，分摄影书画，名作如林，美不胜收。其中精品，摄影



如华筱箴之玉羽，任家梁之花枝招展，陶钟秀之怡和园雨霁，张正灵之破浪；书洪[法]如叶炜白之楷联，神似黑衣，崔龙之隶联，孙易草轴，虞玉之篆联，戴传安立轴，板桥结体，潇洒出尘，最为一般人欣赏；此外国画吴雨苍之长卷等，均名贵非凡。钮院长叹赏不止。成绩展览室，内分教授著作、本校丛书，及各种出版物，学生毕业论文共三百五十余种，洋洋大观，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之伟大，允可贡献全世界。钮院长除表示满意外，将请教育部考核奖励。午后三时，学生开始表演国技，刀光剑影，演来节节精采，四座掌声雷动。该校学生允文允武，观者莫不称赏。晚间并放映教育电影云。”

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字惕生，一八七〇～一九六五），应邀参加无锡国专十五周年纪念暨十五届毕业典礼，离锡前向《新无锡》记者发表谈话，云无锡国专“在风雨飘摇中，奋斗已十五年，国家未予注意，深为抱歉。该校学风之淳朴，恐非国内大学所能企及；即牛津剑桥，或亦瞠乎后矣。详阅此次毕业论文，国学造就，殊为可惊”，“本人此次回京，当报告中央，命教部加以扶助，决于最短时期内，使太湖新校舍落成”。

《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昨莅锡》（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二版）：“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氏，昨日清晨三时五十六分由京乘夜特快车抵锡，出席本邑国专十五届毕业典礼。中午十一时五十三分，即搭乘京沪通车离锡赴沪。钮氏对国专校内设施，印象极佳。临行向本报记者发表谈话，略云：文化为立国之大本，国专为唐蔚芝先生，艰难漓[谛]造，在风雨飘摇中，奋斗已十五年。国家未予注意，深为抱歉。该校学风之淳朴，恐非国内大学所能企及；即牛津剑桥，或亦瞠乎后矣。详阅此次毕业论文，国学造就，殊为可惊。最

可注意者，唐蔚老所揭讲学宗旨，曰正人心、救民命，何等伟大。即音乐一层，该校所奏，亦雍雍穆穆，可以代表中国民族性。本人此次回京，当报告中央，命教部加以扶助，决于最短期限内，使太湖新校舍落成云。”

按：在前文引述的文献资料中，有蔡元培致唐文治信，信中提到唐文治曾致函蔡元培，请求其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建筑费一事；有广州学海书院创办人陈济棠为无锡国专筹建新校舍而“慨捐千元”一事；有筹办无锡国专十五周年纪念时“印新校舍计划图暨礼堂图”一事；此处又载钮永建承诺“本人此次回京，当报告中央，命教部加以扶助，决于最短时期内，使太湖新校舍落成”。将以上数事合而观之，可见无锡国专自在太湖之滨、宝界桥畔购置新校基地以来的不长的时间内，一直在为筹措经费、筹建新校舍做着积极的努力和准备。但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无锡国专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迁徙流离，此事遂告中辍。

本届学生中的沈切（熙乾），毕业后与同届同学、无锡国专前教授陈柱之之长女陈松英结为夫妻。

陈松英《陈石遗先生二三事·流风余韵》：“我于一九二三〔一九三二〕年奉吾父柱尊先生命，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校不收寄宿女生，我与堂姊荔英寄居叶长青教授家，叶师母待我们甚厚。叶先生与吾父交谊颇深，吾父及陈中凡先生皆由他介绍为石遗室弟子。作为一个小门生，能亲聆唐校长蔚芝先生及石遗先生二位太老师教诲，喜可知也。我们入国专时，石遗先生来锡讲课，亦暂住叶先生家。先生年八十，甚健谈。有师生来访，我们亦参加旁听。商务印书馆辑《中国文化史丛书》，邀吾父著《中国散文史》。这时，我与沈熙乾皆已毕业，由同学而成眷属。吾父每成章节，唤熙乾与我观之。

书中好多处引《石遗室论文》中语，不忘师训也……”

按：郑逸梅《酒国诗人陈柱尊》一文中记：“他（按：指陈柱）教子女很严，长女松英，栽培她继承家学，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次女梧英，进交通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三女蕙英，读上海美专，并拜黄宾虹为师，画山水饶有逸气。嫁沈熙乾……”这里说陈蕙英“嫁沈熙乾”，当是误记。

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新无锡》分三次在第四版上刊载了唐文治所写的《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此文未见他处著录，文中描述了无锡国专办校十五年来“飘摇风雨，拮据卒瘁”，尤其是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经济上屡陷艰难困窘之境的情状，反映了作者“忧虑无时可释”的悲凉凄怆的心情。在此备极艰辛的情况下，作者意志不改，文中对无锡国专日后的发展作了擘画。

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见《新无锡》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

“故友孙鹤卿曰：‘办学者在往时为美名，在今日则成罪状。’痛哉言乎！夫今之世界，一争夺相挤之世界也，人心譎诈，杀机充盈，民命若草芥。于斯时也，乃以救人心、拯民命与复兴本国文化之说提倡其间，何怪凿枘而不相入乎！余办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有五年矣。此十五年中，飘摇风雨，拮据卒瘁，静焉思之，有怆然而陨涕者。本年六月将开会纪念，爰略述如左。

光绪丁未岁，余初掌南洋大学，淬厉工业，尤兢兢专以道德礼义为本原，他人迂笑之不顾也。民国九年解职，会施省之、陆勤之两君议办国学专修馆，延余主持其事，且假余十三经圈点精本镌刻之。乃于民国十一年一月赁屋于惠山之麓山货公所，湫隘嚣尘，招生三十名，隐居讲贯其中，人鲜知之者，

余亦不求人知也。是年十月，锡绅孙君鹤卿就金匱县训导公署旧址重建尊经阁，营造校宇，召集十七乡会议，公决呈县立案，函请本馆迁入，此孙君之功不可没者。于是施君告退，孙君以一人任校董。

迨民国十三年秋，苏齐浙卢战事起，锡邑为沪宁孔道，全境骚然。余与教授督率诸生读书不辍。时汇兑不通，几至绝粮。迨溧阳吴君溉亭持二百金来校，云同乡周君敬甫属余印余所著《人格》千部，因得移用，勉继饔飧。其冬卢军虽退，则苏奉战事又起，齐军以无锡为根据地，道涂梗塞，城门昼闭，投考诸生隔离城外，进退狼狈。而文治适奉先君讳，赖孙君鹤卿殫力维持，教授陈君柱尊、职员沈君健生坚定不去。十四年二月初，诸生始齐集开学，此可悲而可纪念者一也。

迨民国十六年春……徐梦影用无锡教育局长名义，突将本校勒令解散，驱逐员生，驻扎军队。事起仓猝，诸生临别摄影，为泣别图，星散而去。惟时马腾于舍，粪污于堂，书籍零散，薪木毁伤，停课近三月。五月徐梦影在沪就逮，六月一日，学生崔履宸、路式遵等，请余及各教授复职，屋无长物，满目苍凉，而孙君犹韬晦不敢出。余假百余金支持至暑假，此可悲而可纪念者二也。

迨民国二十一年春，中日淞沪战事起，时各教授虽齐集，学生因水陆梗阻，到者不及半数。教授冯君振心、朱君叔子等互相激励，茹苦含辛，勉尽半义务，照常授课；而钱君子泉以教育校董长来兼教授，并半薪不受，尤为可感。此吾校精神坚定表见之一端，尤可纪念者也。

若夫经济之艰窘，有更难仆数者。开办时为施君所担任，孙君继之。因商业不振，庚癸频呼，岁杪仰屋，屡濒于危。十七年夏，孙君归道山，更形棘手。幸赖同邑蔡君兼三、华君绎

之、唐君保谦，倡议除聘请教育校董十人外，更请定经济校董十人，每年集得五千元，又呈请省款补助，每年得三千元，藉资挹注；又因同学来者每岁加增，近年达二百五六十人，收费较多。撙节谨慎，由是图书自四百册增至四万余册，屋宇自十数幢增至七十余幢。盖自十七年冬天学院批准立案，十九年奉部令改名学校后，渐有向荣之象。惟经济校董，定期三年满任，本校对于蔡、华、唐三君实已竭忠尽欢，勿感靡既，而新聘校董暨孙君鹤卿哲嗣鍾海，虽尽力维持，而缺额几近半数，应聘无人，且学生人数多寡难以预定，未便滥收，加以骈枝意外之款，往往溢出预算。根基未固，来日大难，忧虑无时可释也。

虽然，《论语》有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窃谓吾国人皆宜有此精神，自无不成之事。吾校之既往，纵极艰辛，而余于将来则颇多奢望。今世界各国莫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于他邦。吾国文化，詎可让人，若长此抱残守缺，不为发扬光大之谋，恐吾国学终至沦灭。本校既为国中所仅有，同志之士，更宜尽力襄理，藉以继往开来，爰更述未来计划如左。

训教合一，宜力求进步。吾校以文行文修为本原，即以文武兼资为宗旨。凡一切训练管理，当益加严格。昔有孙夏峰先生之讲学，而后有汤文正；有罗忠节公之讲学，而后有李忠武、王壮武。规范非遥，不宜自薄。下学期拟增设高中国文师资科，添置讲座，厚植国文根柢，希望各处高中国文程度蒸蒸日上。嗣后再续设史地、经济及一切武略应用诸科，扩充世界知识，道在实事求是，不务空谈。若夫恪守道德礼义，以正人心，激励民族精神，矫正社会风气，皆当与诸位同学朝乾而夕惕若也。

至于建筑规划，更急不容缓。历年虽陆续添建房屋，惟同学日众，实不能容。投考遗才，至有徘徊门墙之外仰止懊丧而去者。同人公议，金谓长此踟躇，难期发展。租借校外宿舍，照料难周，且所租邻近操场，转瞬期满。终非久计。爰相地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就校董捐贲及近数年节省之款，购地数十亩，将纠合同志，广为劝募，悉力经营，宏兹广厦。委托本邑建筑公司设计，所有礼堂、办公厅、图书馆、教室、宿舍等，均应一切完备。图书拟自现有之四万册扩充至十万册。运动拟辟田径赛场，及购置各项运动器具。他如健身房、游泳池、养病室等，亦俱应增设。计费自七八万元至十万元为度。其地山水清嘉，春秋佳日，文人学士来兹土者，庶几观感兴发，动读经尊孔之思。而吾校诸生，亦得怡情高旷，消涤烦襟，裨益非浅。或曰：斯举也，非其时而程功远，不亦难乎？余曰然。昔孔子论为山曰：止吾止，进吾往。天下事惟精诚所至而已。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愿与诸同人同学共勉之。”

本年下学期起，聘请陈鼎忠、李源澄（字浚清，一九〇七~一九五八）及无锡国专第七届毕业生魏守谟（又名建猷，一九〇九~一九八八）三人为无锡国专教授。三人中，陈鼎忠为再度受聘来无锡国专任教，讲授《史通》、经学概论、经世文选、文化史等课程，李源澄讲授散文与国学概论等课程，魏守谟讲授史学概论、通史等课程。

《国专月刊》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校闻·本学期新聘教授”：“本学期新聘教授，有陈天倪先生、李浚清先生、魏守谟先生。陈先生经史文章，淹濡博雅。昔曾掌教本校，深得同学之亲敬，于民国廿二年赴粤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职。今岁应校长之敦聘，复来本校，主讲三年级《史通》、经学概论、经世文选，二年级文化史等课，同学无

不以为欣幸云。李先生尝私淑于今文学家廖季平先生之门，又从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游，著作甚夥，本学期教授散文与国学概论等课。魏先生本校第七届毕业，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后东渡，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研究所，于史学有深湛之造就，本学期来校教授史学概论、通史，课外并设日文补习班云。”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丙子七十二岁》：“七月初旬开学，新旧生到者二百三十五名。教师广东杨君铁夫辞职，湖南陈君天倪复来任教，并添聘四川李君俊[浚]清、安徽魏生建猷为教师。”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六年夏，陈先生给学生的信中，表示非常怀念在国专的岁月。唐校长去信敦聘，秋季开学，陈天倪先生再度到国专授课。”

周有民《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一九三九年六月，魏建猷离开日本回国，到无锡拜访了唐文治先生。受唐先生的聘请于八月开始在无锡国专任教……补习班学生共四十四人，魏建猷还是补习班的级任导师。”

自去年下学期实行导师制以后，本年下学期起此制度又有所改进，分设级任导师及学术导师两种。

《国专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校闻·导师制度之改进”：“本学期导师制，改为级任导师及学术导师两种。现由学校当局聘任冯振心先生担任三年级级任导师，叶长卿先生担任二年级级任导师，钱萼孙先生担任一年级甲组级任导师，吴溉亭先生担任一年级乙组级任导师，魏建猷先生担任补习班级任导师。又聘请陈天倪先生于课外主讲历代战争史料，顾惕生先生主讲近代战争史料，李浚清先生主讲中华民族史料。由同学自行选择听讲。各导师对于同学进德修

业各方面，皆有所匡正云。”

十月一日，钱仲联的旧体诗集《梦苕庵诗存》由无锡国专排印出版。

黄汉文《钱仲联先生的诗学、诗作、诗教》（见《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三十年代初期，钱先生出其《梦苕庵诗》，与王遽常先生之《明两庐诗》合刊，称《江南二仲诗》。‘九·一八’以后，钱先生从‘同光体’中跳出来，远宗杜甫，近法黄遵宪，并参用诸家之长（包括他曾下过功夫的王、孟、韦、柳的山水诗），写出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篇，于一九三六年刊印《梦苕庵诗存》。”

按：《梦苕庵诗存》，无锡文新印刷所印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排印出版。全集分三卷，前有金天翻所作序。

十一月五日，日本侵略者和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抵抗，开始了“绥远抗战”。无锡国专学生节食捐资，援助绥远抗敌战士。并由国专教授叶长青起稿，无锡中等以上学校联合发电，慰问前方将士。

《国专月刊》第四卷第三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校闻·本校全体同学节食援助绥远抗敌将士”：“绥远战讯传来，全国震愤，本校在校同学，自行发起素食两星期。积款所得，计一百七十九元二角。女同学通学生亦自动捐助，每人一元半元不等；并设募捐箱，请同学自由捐输，教职员亦提出薪金百分之二，约共二百七十元，准期汇往前方慰劳将士云云。”又同期“校闻·无锡中学以上学校发电慰问前方将士”：“无锡中学以上各学校联合发电慰问前方将士，由本校代表叶

长青先生起稿。兹录原稿转载于下：‘绥远傅作义将军、赵承绶将军，并转前方诸将士勋鉴：蠹还食木，猊亦噬母，式凭鬼物，敢窥华夏。神人共其愤嫉，国宪在所惩治。公等大张挾伐，树之风声；继介子之殊勋，弘食其之伟业。歼兹虏丑，还我河山。卜式无不输之财，皇汉必有兴之理。谨电贺捷，捐款续陈，江苏无锡中学以上学校同叩。马。’”

十一月十四日，举行本年度下学期国文竞赛（国文大会考），有唐志轩、谢逸民等人获奖。

《国专月刊》第四卷第三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校闻·作文竞赛成绩揭晓”：“本校按照校历，于本月十四日举行作文会考，同学一律参加竞赛，文题凡三：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论》。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论》。三、《雪耻论》。所有课卷，经各教授评阅竣事，获得优胜者，计有唐志轩君、谢逸民君、卞敬业君、邓夏鸣君、李光九君、戴双倩君、郭泰庚君、嵇良臣君、徐占魁君、缪杰君等。”

十二月九日，无锡国专经济董事长唐保谦逝世，学校为开追悼会。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丙子七十二岁》：“十一月，宗弟保谦辞世，本校经济董事长也。平生乐善不倦，惠鲜鰥寡，凡遇赈灾，皆躬先倡导，而敛藏韬晦，不使人知。惜未克臻上寿，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本校为开追悼会，余为作传一篇。”

唐文治《宗弟保谦家传》（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校董孙君鹤卿逝世，飘摇风雨。君慨然曰：‘方今圣道陵夷，可使学子读书失所乎！’遂董厥事而校基固。呜呼！凡人有志者无力，有力者未必宏胞与

之怀。若君之见义勇为，且闇然不求人知，岂非厚于仁者耶？”

按：唐保谦逝世后，曾由陆景周起草《无锡八团体追悼唐保谦先生祭文》，刊于《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一号。八团体为：无锡县商会、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红十字会、溥仁慈善会、棉纺织业同业公会、油厂业同业公会、米豆业同业公会、储栈业同业公会。

十二月十日，下年度毕业班毕业论文选题发表。

《国专月刊》第四卷第四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校闻·毕业论文题目发表”：“廿六年度毕业班之论文题目，已经校长及各教授拟定，于本月十日发表，兹转录如下：（一）《周易系辞上下传详注并论大义（凡汉宋诸家说并皆采录）》。（二）《孝经纪孝行章五致历史并详论（凡史书及各家文集一并分类采录）》。（三）《骈散文分合源流论》。（四）《东西文化之比较》。（五）《清代兵制考略》。（六）《经术致用说》。（七）《国防刍议》。（八）《中国固有论理学说考》。（九）《欧洲二千五百年来哲学尚未成立说》。（十）《中国哲学即社会哲学论》。（十一）《秦汉以来史篇最富于三民主义论》。（十二）《孟子学与周易学》。（十三）《左氏兵谋兵法考证》。（十四）《续诗品》。（十五）《古今公文程式变迁考》。（十六）《清史艺文志》。（十七）《章学诚评传》。（十八）《文体论》。（十九）《百年来之国耻诗歌》。（二十）《历代诗学批评家述评》。（二十一）《法家出于道家证》。（二十二）《说文解字通论》。附录办法四条，并志于下：一、任作一题，寒假前须先将题目报告教务处。二、亦可自拟题目，亦须于寒假前送教务处认可，始有效。三、于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前交教务处，过期不阅。四、誊写试卷须用正楷。”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自本年上学期起，无锡国专依照教育部颁布《各级学校免费学额规程》之规定，有一定数额的家境清寒而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享受免除学费的待遇 [据《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校闻·本校实施免费学额”]。

一月一日，无锡国专教授李源澄以个人之力独自创办的学术刊物《论学》创刊号出版。

王川《近代学者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李源澄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学生涯，从一九三六年到次年七月，约一年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时，一九三七年一月李源澄创办了生平的第一种纯学术期刊《论学》。第一期有《发刊辞》和论文五篇，李源澄除撰《发刊辞》外，还撰写了《周秦儒学史论》、《新儒学派发微》论文两篇。其他的文章还有章氏弟子陈兆年所撰《形声释例》等。《论学》在七月出版了第八期后，由于因抗战军兴之故，杂志被迫停办，李源澄辗转返回四川。李源澄以个人之力，独自创办学术刊物《论学》，揭开了李源澄主编报刊活动的序幕，为他以后创办《灵岩学报》、主编《重光》月刊、参编《史学季刊》等报刊积累了经验。”

按：《论学》，李源澄编，创刊号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出版，无锡文新印刷所承印。以后月出一期，至第八期而停办。《吴宓日记（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中记李源澄“编辑《论学》月刊，甚为热心”，又六月十九日中记：“晚，读《论学》各期，深佩李源澄君之学识与志行。”

一月十日，无锡国专安徽同学学术研究社编辑的《皖风》创刊号出版。

魏守谟《发刊词》：“吾皖古多积学之士。举其近者，自江永、戴震而下，无虑数十人，核名实，能断制，非华士所得而假借。彼数君子明于庶物，惧于建奴之淫威，不得发舒其才以辅世，故一志稽古以免于文网，而其情亦稍稍可睹焉。今政治偷窳，国学式微，吾皖人当起而讲求致用之学，以竞乡贤未竟之业，而无以章句之学为矣。即为章句之学，亦不必失前贤矩矱，而后可无愧矣。皖中来学国专诸同学，于是有集刊之作，冀以收切磋之益，余喜得观其成焉！”

按：《皖风》创刊号，无锡国专安徽同学学术研究社《皖风》编辑会编辑，无锡文新印刷所印刷，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出版。该刊由“论说”、“研究”、“乡谭”、“文艺”等栏目构成，专门刊载无锡国专安徽同学学术研究社成员的作品。此刊似出一创刊号后便告中辍。

二月三日，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荣德生、唐星海、周毓莘、孙家复、高阳、冯振（叶长青代）、华绎之（孙家复代）、侯鸿鉴（孙家复代）、钱孙卿等人，讨论收支预决算、购置宝界桥新校基地、校董会成员改选调整以及呈请教育部增加本年度补助费等事。其中在宝界桥购置的新校基地，“计地肆拾三亩零捌厘，实价壹万零壹百拾陆元零伍分”（据《无锡



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纪录·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三日会议》)。

按：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丙子七十二岁》中也记及这次董事会会议，略谓：“（农历）十二月，开校董会，报告本校下学期宿舍内一律改用二层铁床，每间容十六人。另辟自修室，编号人数与宿舍同。又购宝界桥旁新校基地，共费一万一千余元，得地四十三亩有奇。”

二月二十三日，湖南省主席何键（号云泉，后改号芸樵，一八八七～一九五六）至无锡国专参观，并应邀在国专大礼堂演讲，讲题为《我对于研究国学及缔造大同之意见》。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校闻·何芸樵先生莅校演讲”：“湘主席何芸樵先生，年来提倡国学，不遗余力，曾在长沙创办湖南国学专修院，其保存国粹培植人才之殷切可见。因素闻本校办理有年，且慕唐校长经学盛名，乃假出席三中全会闭幕之便，特于二月二十三日由京来校参观，先生对本校设施，赞叹不置，寻复应校长请，在大礼堂演讲，历一时余，讲题为《我对于研究国家〔学〕及缔造大同之意见》。先生研究国学见解既精，而于缔造大同之意尤多阐发，同学聆讲之下，受裨匪鲜云。”

《湖南省主席何芸樵来锡访唐》（见《新无锡》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三版）：“湘主席何芸樵（何键），此次来京出席三中全会，闭幕后，因仰我邑唐蔚芝先生为国学泰斗，顺道来锡拜访，于昨日上午乘京沪特快车抵锡。当即乘汽车进城，到国专与唐氏见面后，晤谈甚欢。稍事休息，即在该校午餐。下午应唐氏之敦请，即在该校演讲，大抵为国学上之问题。至下午二时半，乘自备汽车离锡赴沪。何氏此次来锡，同行者湘民政厅长曹伯闻氏，省府秘书张博言氏。因纯系学术上之拜访，故轻车简从，外界知之甚鲜。”

按：何键《我对于研究国学及缔造大同之意见》的演讲记录稿刊于《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一期。在此次演讲中，何键认为：“时代日益不同，环境日益改变，吾人所须要于学术者，当然不能不随之变通。况研究学术的目的，在于增加解决人生问题的智识……检验四部，感觉到最有益于世道人心，最便利在修身治事，而又易知易行，为人生日用所必不可离者，四部之中，莫如孔子之经典，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重心，而实在又是中国文化之总和，所谓诸子百家，无一不包括在内。”

二月二十四日，无锡国专三年级全体学生举行追悼会，悼念因伤寒兼肺炎而去世的同学宋砚樵（字端书，约一九一〇～一九三七）。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校闻·追悼三年级同学宋君砚樵”：“三年级同学宋君砚樵，字端书，江苏赣榆青口人，笃好文学，敦品力行，夙为师友所契重，乃本学期到校数日后，遽以伤寒兼肺炎病故，年仅二十七。三年级全体同学，特于二月二十四日发起举行追悼会，仪式隆重，参加者皆痛悼不置云。”

二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五、钱仲联著《宋诗选》出版。

钱仲联《宋诗选序》（见该书卷首，又见《梦苕庵诗文集》）：“宋人之诗，导源于唐，而又出一奇。或托体于杜陵，或锻思于韩、孟，或问津于玉溪，或借径于右丞，或为香山之平易，或参玉川之吊诡，固不得限以一体、专以一派也。后人学宋，多乐为玉局、剑南之坦迤。自姚惜抱好言山谷，曾涤笙张大其说，而风尚一变。同光体兴，标举宛陵、后山，学者务为晦涩僻苦，钩章棘句，而风尚又一变。宋诗之门庭，至是而隘。陈丈石遗所谓于五音中少宫商而多角徵是也。甲戌秋，余



来国专，为诸生说诗，既毕授汉魏六朝三唐之作，复继以宋诗。旧有选本，如《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卷帙既繁，不便讲授。《宋诗类选》、《宋诗略》、《宋诗别裁》诸选，则又病其抉择未精。乃辑是编，不拘门户，一以精严粹美为归。宛陵、庐陵、半山、玉局、山谷、后山、简斋、石湖、剑南、诚斋诸家，所录较夥。西昆、九僧、永嘉四灵暨诸小家，略及之而不暇求备。诸家评论，广为采摭，以资启发。学者取径于是，进而泛览各家专集，以博其趣，宋人真面，不难全出。虽不足以瑰玮，而有余于琢磨。彼穷老尽气，窘若囚拘，以嘶吟噍杀为宋诗者，其亦可以幡然易辙矣。”

黄汉文《钱仲联先生的诗学、诗作、诗教》（见《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钱先生亦自选教材，于一九三六年冬由学校排印，即编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宋诗选》……《宋诗选》印就后，没有几个月，抗战爆发，因此流传不广。”

按：《宋诗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本书选收百余位作者的诗数百首，并广采诸家评论附于诗后。

三月八日，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刘通（字伯瀛，一八七九～一九七〇），在无锡国专演讲，讲题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校闻·刘伯寅〔瀛〕先生来校演讲”：“立法院立法委员刘伯寅〔瀛〕先生，于三月八日莅校演讲，讲题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先生于总理遗教，屡发新义，惠益同学颇多。”

《立委刘通昨在国专演讲》（见《新无锡》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立法委员刘通，前日来锡探梅，昨日下午，因慕

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为本国文化之学府，特往参观，并进谒校长唐蔚老。嗣经蔚老之邀请，于午前九时，在该校礼堂演讲，讲题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演讲后，闻即乘特快车返京。”

三月，无锡国专于学校仪门中央，增设巨镜一座，上镌唐文治所撰、陈衍所书镜铭一则：“照尔形，明尔心，必恭敬，必温文，毋不肃不整，不洁不清，致失吾面目之本真。”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校闻·本校仪门增设巨镜”：“本校东西两庑，夙已双悬明镜，以为整肃衣冠之指视，近复推本新生活原旨，于仪门中央，增设巨镜一座，务俾同学出入，咸克威仪秩秩。厥额镌有陈石遗先生书铭一则，其辞为校长唐先生所作。铭云：‘照尔形，明尔心，必恭敬，必温文，毋不肃不整，不洁不清，致失吾面目之本真。’镜考功深，殊有裨教益。”

三月二十三日，无锡国专全体学生赴五里湖滨新校址举行植树礼，校长唐文治为作颂词，词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中国太平。”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三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校闻·本校新址行植树礼”：“本校五里湖滨新址，风景幽雅，地址宽敞，近正在积极规划建筑中。爰于三月二十三日，召集全校同学赴新址行植树礼，是日斜风密雨，继之以霏，且寒气骤增，殊非春衫所能御，而同学迈进之忱，迨未少懈。举行典礼时，仪式隆重，气象雍容，校长且为之辞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中国太平。’礼毕聚餐，尽欢而散。他日春风桃李，黉舍嵯峨，宝界桥边之盛，可预卜也。”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丑七十三岁》：“二月十二日花朝日，宝界桥新校址行植树礼。适值大风雨雪，余先至茹经堂。午初刻，诸同人同学均会集。餐后，



雨略止，即赴对岸植树，约共四百株，半桃半柳，皆傅生焕光所赠。余作颂词，诸君兴致甚高，雨雪更大，不得已雇汽油船归。途中风烈，颇危险。”

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一九三七年花朝（农历二月十二，俗称‘百花生日’），全校学生以行军方式徒步三十里到宝界桥茹经堂及新校址植树。时春寒料峭，雨霰交加，校长亦冲寒而至，众大激励。国专规定每年举行一次作文比赛，这一学期比赛的文题中，有一题为《花朝新校址植树记》，盖即以此鼓舞学生奋发习劳，重视体育锻炼。”

四月十三日，前广西省教育厅长雷宾南（名沛鸿，字宾南，以字行，一八八八～一九六七），在无锡国专演讲，讲题为《欧洲各国青年之思想谈》。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三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校闻·雷宾南先生来校演讲”：“前广西省教育厅长雷宾南先生，于四月十三日来校演讲，讲题为《欧洲各国青年之思想谈》，先生近由欧洲各国考察归来，因遍观欧洲各国青年之行动以察其思想，而联想至总理与地伐列拉（Devalera）马萨里克（Masaryk）之精神，足凭矜式，更联想至我国之青年，尤厚望于本校同学，先生期望之殷与训导之切，深为同学所感谢。”

四月十七日，进行本年上学期国文竞赛（国文大会考），后计有袁葆镕、虞念祖等十六人得奖。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校闻·国文竞赛”：“本校本学期国文竞赛，循例于四月十七日举行。文题共有三：一、《孙子论用兵之道必生可虜愈速可侮试引史事以证之》，二、《哀农民文》，三、《本校花朝植树记》。计得奖同学有袁葆镕、虞念祖、唐志轩、黄惟恭、徐占

魁、袁步祺、王文蔚、李人鉴、李光九、吴方圻、廖华、温渊、杨向时、徐缙瑞、孙叙、欧运恒等十六人。”

四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孟宪承（字伯洪，一八九四～一九六七），在无锡国专演讲，讲题为《教育哲学》。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校闻·孟伯洪先生来校演讲”：“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孟伯洪先生，于四月二十二日来校演讲，讲题为《教育哲学》。先生为研究教育学之先进，多所独到，而能于数小时中，聆其纲要，有裨同学匪浅云。”

五月十九日，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盘珠祁（号斗寅，一八八五～一九八四）和交通大学国文系教授陈柱联袂来无锡国专演讲。盘斗寅的讲题为《考察苏联后对我国之感想》，陈柱的讲题为《读经问题》。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校闻·盘斗寅先生、陈柱尊先生联袂来校演讲”：“立法院立法委员盘斗寅先生于五月十九日偕交通大学国文系主任陈柱尊先生联袂来校演讲。盘先生之讲题为《考察苏联后对我国之感想》。先生新近自苏联考察归来，观感所得，发为宏论，故言多恳切。至陈先生之讲题为《读经问题》，先生提倡读经，词意殷切，溢于言表，盖与本校校长唐先生所见略同。”

五月二十三日，无锡国专组织学生参观无锡申新纺织第三厂等工厂。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校闻·本校同学参观邑中各工厂”：“本邑工厂林立，出产丰富，组织完善。本校同学，久欲参观，爰于五月二十三日起分为二组（第一区队暨第二区队为甲组，第三区队暨第四区队为乙组），先后分别赴本邑各工厂周览。计所参观者有申新纺

织第三厂、庆丰纱厂、无锡工艺厂、永盛缫丝厂等等云。

六月，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发起劝募赈灾。

《国专学生募捐赈灾》（见《新无锡》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第三版）：“此次川黔甘诸省，遭亘古未有之奇灾，募捐劝赈者，日有所闻。本邑国学专修学校，亦于日昨由该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劝募。全体师生，闻皆慷慨解囊，为数颇巨，即日汇齐汇出云。”

《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校闻·发起劝募川灾赈金”：“川黔甘豫四省，今岁罹灾奇重。凡我国人，痍痍在抱。募捐助赈，日有所闻。本校同学关怀灾黎，爰由本会发起，向全体同学募捐。咸慷慨解囊。计募得赈款七十余元。已于六月七日，与本校校长唐先生所捐之十元，一并电汇上海华洋义赈会俾转发灾区矣。”

农历五月底，举行无锡国专十六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刁道宗、王先猷、王璞、余漱石、宋安邦、李士杰、李醉芳、李钊、吴家驹、吴祥豹、吴均之、胡尚志、周嘉志、周孝廉、俞学祖、姜浩生、袁葆镛、徐兴业、徐毓梅、高树、陈荔英、陈其昌、陈光汉、陈其郊、陈慧棠、黄蕴贞、黄光焘、黄敦、陆家睢、梁立楷、郭泰庚、张广生、张光旦、过悟新、冯蕙心、焦德一、覃克成、赵恩寿、邓夏鸣、蒋祖怡、蒋公任、蒋公达、廖华、刘镇坤、刘建农、刘一先、郑学韬、戴双倩、魏恒葆、乐景溪、萧琪、萧江等五十二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丑七十三岁》：“五月杪，本校行毕业礼。毕业生三十余人。”

按：此云“毕业生三十余人”，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中第十六届毕

业生共有五十二人，此据后者照录之。

又按：《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中的《历届毕业生名录》记至第十四届毕业生。该纪念册中尚有《在校学生名录》，其中所载录的三年级学生共六十五人，后大部分于十五届毕业；二年级学生有六十一人，后大部分于十六届毕业；此外，还有一年级学生郑孝纶、徐缙瑞、夏维梓、闵世基、虞念祖、唐志轩、张能涵、刘训维、戴明、温渊、徐章楷、黄天鹤、文平泉、谢逸民、朱毅、周展如、马茂元、杨玉钧、朱为济、林貽楷、袁克栋、刘青蕙、陈纲、虞斌麟、张彬泰、郭文衡、吴方圻、薛有功、周书诒、谢康侯、袁步祺、陈廷钧、钱润琳、沈澄、李森、曹小蕙、钱咏秋、孙珊华、龚留云、夏纬瑜、韦均一、朱茂珍、李凌云、巴怡南、阮治安等四十五人；又有补习班学生金鸿文、胡臻祿、黄卓然、于耀山、喻孝祥、沈学海、濮之琦、居秉瑞、乔光华、张宝铭、刁石隽、张汉球、邢复家、孙叙、谢伯康、曹禹彝、刘炳铝、李芝祥、吴中、吴常熊、孙善同、胡希文、沈令生、赵模、李兆熙、苏明昭、朱存养、葛东元、詹德谷、沈铭寿、冯国梁、杨燕廷、李稠、周隆祥、鲍传简、缪杰、嵇良臣、李家森、王冰岑、苏明煜、潘长素、石志元、陈钟、杨师富、沈俊、马立人、张树梓、金悉经、王懋修、周本瑞、方重恂、徐占魁、徐钧、朱统、朱长乐、柳栖南、唐棣、王淑、华筱箴、郝肃仪、陈文琦、卢亘、奚干城、沈祖荫等六十四人。“一年级”和“补习班”的学生未及毕业，适值抗战爆发，无锡国专迁校桂林，建立了国专桂校；后唐文治由桂林至上海，又建立了国专沪校。在此过程中，此“一年级”和“补习班”的学生只有一部分先后追随至广西和上海，后来分别随“桂校”和“沪校”的下几届学生一起毕业；另一部分



学生则似未能正常毕业。在无锡国专三十余年的历史上，因为时局动荡，叠经辗转流离，学生中途辍学或未能正常毕业者甚多，其中比较集中的有几次：一即是抗战爆发后学校由无锡迁往广西，二是抗战胜利后学校再由广西复员回无锡，三是一九五〇年无锡国专在改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不久即被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王桐荪在《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一文中说：“凡是在国专肄业过的学生，都不同程度受到学校的熏陶。”所以这里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在校学生名录》中“一年级”和“补习班”的名单全录如上。

本届学生中的王先猷、卞敬业、李钊、李光九、吴常焘（孟复）、陈光汉、张广生、黄敦、魏恒葆和戴双倩等十人，毕业时出版了诗文合集《惠麓同声集》。

唐文治《〈惠麓同声集〉序》（见该书卷首，又见《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三期）：“自圣门有为己、为人之辨，后代之讲学者，辄以标榜为嫌。余谓为己、为人，在乎心术，而不在于形迹。《伐木》之诗曰：‘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以《易·兑》象有朋友讲习之箴，岂得谓之标榜乎？曾子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岂得谓之标榜乎？宋代大儒，名山都讲，著述满家，不可胜数；往者闻吾乡娄东陆、陈、江、盛诸先生，考德问业，日有记而月有会；及居无锡，闻东林高、顾诸先生，讲学之风，犹有存者，为之奋然兴起，不能自己。甚矣，取友之必贤，而友声之宜急也。同学陈生光汉等十人，将届毕业，裒平日所为诗文，名曰《惠麓同声集》，来问序于余，且求一言以为终身之诵。余维先圣释《易》飞龙之象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至《系辞传》之释同声，则取中孚九二之象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其释同气，则取同人九五之象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圣人之微旨也。余向以正人心、拯民命之学说倡导同学。夫正人心，必慎言行，以动天地；拯民命，必合同志，以救号咷。然则所谓同声同气者，固在性情心术之微。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岂在区区文字间乎？苟或不然，则标榜而已矣。诚伪之界，不过几希，诸生其谨而勉之哉。”

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一九三七年夏，先生（按：指吴常焘）从国专毕业。毕业时与同学十人出版诗集《惠麓同声集》，自比于‘大历十才子’。”

按：《惠麓同声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七年出版。集中收王先献《咏琴轩诗稿》、卞敬业《勤生诗稿》、李钊《覆瓿诗稿》、李光九《焚余诗稿》、吴常焘《伯鲁近稿》、陈光汉《慈竹平安馆诗稿》、张广生《蟾蜍滴露轩诗稿》、黄敦《鄮廌近稿》、魏恒葆《块然室诗稿》、戴双倩《顽石斋诗稿》等十部诗文稿。

又按：纪健生文中说“一九三七年夏，（吴常焘）先生从国专毕业”，但上引《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中所载录的第十六届毕业生名录中，却没有吴常焘的名字，也没有“同学十人”中的卞敬业和李光九的名字，未详其故。

本届学生中的徐兴业（一九一七～一九九〇）在就学期间，曾由钱仲联教授其散文和韵文。钱仲联在课堂上再三讽诵的晚清时台湾抗日领袖丘逢甲的诗篇，成为徐兴业后来写作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的原动力之一。此外，《金瓯缺》中大量运用宋人笔记，以及将许多古典诗词融化为小说语言，也都

得之于在无锡国专的学习。

《中国作家自述·徐兴业》：“一九三四年夏间我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本科学习……钱仲联先生教我们散文与韵文。他三十多岁年纪，已是当代名诗人，论诗深刻，自称是诗家的申韩，上起课来妙辞联翩，舌底风生云涌，古诗和近代诗（不是白话诗）成诵的不在万首之下，繁引博证，触类旁通，警句都成珠玉。他对学生是诚恳的，温和的，循循善诱，也有点性急，唯恐其不成材，绝非峻峭的一流……‘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相继签订后，滦东被占，华北主权基本丧失，国人愤慨声讨。在那年暑假以后，钱先生主动在课外开讲晚清诗，特别介绍了台湾抗日领袖丘逢甲的诗，再三讽诵‘宰相有权能割地，志士无力可回天；哀鹃唤起东都梦，沉郁风云已五年。’‘谁能只手斩长鲸，不愧英雄传显名，撑起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这两首诗我至今尚能成诵，可能成为我三年后开始写《金瓯缺》的原动力之一……奇怪的是我一生中诗和作诗的时间只限于在国专肄业的三年，可以说是与钱先生的教学相始终。在校最后一篇毕业论文是《清代词学批评家述评》，也是钱先生看的。他对我这个学生始终期望很高，而我学诗不成，学词不成，退而研究词学史、词学批评史也无所成就，愧对老师。记得钱先生对我说过一句，宋人笔记小说最为丰富，研究宋词，不可不读宋人笔记。这话是针对我研究宋词而发的，结果都移植到《金瓯缺》的小说中，大量运用宋人笔记。此外我也将许多诗词溶化为小说语言，成为写作方法的一个特点，朋友王淑均同志为此写了一篇《融得诗情入书来——论〈金瓯缺〉的语言艺术》，对此有所阐述，这两条都出于钱老师之赐。”

按：徐兴业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开始动笔于抗战

期间，前后断断续续“共花去四十多年的时间”，到“粉碎‘四人帮’”后方始完成。全书共四册，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五年陆续出版，后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七月八日，原无锡国专特约讲师陈衍因病去世，唐文治为作《陈石遗先生墓志铭》。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丑七十三岁》：“陈石遗先生忽于本月初旬患疟气病遽卒。闻讣电，哀痛之至。后应其孙光度之请，为撰墓志铭。”

唐文治《陈石遗先生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八）：“陈先生石遗，侯官诗文学大名家，与余乡试同年，长余九岁，尊之曰先生。光绪中叶，相识于嘉兴沈子培先师座中，其气刚以直，其言辨以暂，其品高峻不可方物，余心折之，然踪迹犹疏。迨辛未岁，门人叶长青介先生来无锡佐余，主国学专修学校讲席，欢然道故，聚首七年。丁丑四月去之闽，无离别可怜色，乃七月得耗，先生死矣，惊惶欲哭而无泪……先生生于清限丰丙辰四月八日，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卒，享寿八十有二……”

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发动进攻，八月十三日又在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时无锡接近战区，因战事迫近，常有驻地部队军官到无锡国专、竞志女子中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辅仁中学、无锡中学、职业中学等校来勘察校舍，商量借用。唐文治联合以上各校校长，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要求“先尽学生居住；倘有余屋，当就近告知驻军长官，酌量支配”。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代电一件》（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

件》：“南京教育部王部长勋鉴：窃惟教育为国家根本，人才尤元气所系。案奉令，开：‘《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内载第一条，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暨其他文化机关，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又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等因奉此。仰见政府维持教育、造就人才之根本计画。当此国难严重之秋，可以牺牲人民生命财产，而不可以牺牲人民德慧术智。即如从前欧洲一千九百十四年大战，地亘欧亚，时延五年，其酷烈为亘古所无。然英、法、德、奥诸国，僵仆随属，而学校未尝辍业；而美国派遣大兵援欧，以士兵多大学青年志愿应征，军队所至，学校随之而立，以免失学，播为美谈，是白刃可蹈，而学术不可废也。锡邑为淞沪战争后方。淞沪各大学中学摧毁，仅存不满半数，仓皇补苴，亦未能按时开课。案奉钧部令颁《临时借读办法》，内开：‘公立学校均应尽量收受借读生，私立学校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考核其办理成绩及一切设备，经指定后就可能范围收受之。又公立学校及经指定之私立学校，如各级学额已满，或教室不能容纳时，应酌量租用学校附近房屋，或建盖临时房屋，暂作教室及宿舍。’等因奉此。文治等服务教育，恪遵功令，按期开学，固属当然，尤不敢不仰承钧部颁布借读办法，尽量收容战区借读学生，以宏造就而重学业。如校舍或有不敷，钧部且以租用学校附近房屋或建盖临时房屋相督勉。实以此次东人摧残我文化、毁坏我学校不在少数，而锡邑为畿辅要地，文化又较发达，借读学生势必不少，原有学校万不敷用也。近以战事方殷，时有军官来勘校舍，商量借用。文治等同属国民，苟校舍有余，敢不通融设法。惟原有校舍本仅敷用，如遵令收容借读，势必另行扩充。万一通融借作军用，即不能恪遵部令，维持课务；然不予借

用，又非文治等同仇敌忾之所愿出现。方遵令筹备开办所有校舍，为维持课务，收容借读。似不得不先尽学生居住；倘有余屋，当就近告知驻军长官，酌量支配。是否有当，候示遵办，谨此电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 竞志女子中学校长侯鸿鉴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阳 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校长周毓莘 辅仁中学校长杨四箴 无锡中学校长周朴纲 职业中学校长钱殷之文。”

九月二十日，本年下学期开学。学生陆续报到上课者有七十一人，其余大半学生因道路梗阻、战局危急而暂时请假。开学后，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在学校附近建造防空地屋三处，可容二百余人，并准备防毒急救药品等。

唐文治《呈报本校准九月二十日开学并教职员人数请赐督由》（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行政计划、工作报告和在沪复课员生名册及有关文书》：“……现在本校遵令于九月二十日准期开学，业经通告各生家属在案。所有教员现在留校者计十人，职员留校者七人；其余教员尚有四人，职员尚有二人，当可陆续到校。至学生人数，因籍居之地远近不一，究竟到若干，须俟上课后续行呈报复钧部赐督……”

唐文治《呈报本校维持上课状况请赐督由》（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本校前经遵令于九月二十日开学，业经于九月十七日呈报钧部赐督在案。现值非常时期，所有布置避难，如防空壕建筑及防毒急救药品等，已先后遵奉钧部篠、灰二密代电实施：计造防空地屋三处，可容二百余人，由无锡建筑公司计划，颇为巩固。一面维持课务，一面尽可能范围避免损害，冀副钧部保护学生之至意。查月前本校学生报到上课者

计七十一人，余因道路梗阻，兼涉危险，大半暂时请假……”

自十月六日起，日机连日对无锡进行轰炸，无锡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茹经堂亦遭轰炸，却未被击中；而看守茹经堂的工友夫妇和一个儿子，在避入山谷后被炸死。

钱基厚《孙庵私乘·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六日，而戚墅堰电厂被炸，锡城内外电灯一时均告断火。未几，庆丰、丽新各厂亦屡被炸，光复门外亦炸……自十一月起无锡城内亦屡被炸，余宅在西门内，门前有李氏宅，亦炸，前街、学前一带被炸尤甚，文庙明伦堂及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均被毁。”

许岱云《唐文治先生轶事几则》：“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沪之战我方失利，锡城岌岌可危，日机连日不断滥肆轰炸。如苏锡公路、高子水居、宝界桥等都被炸毁，唐先生的‘茹经堂’亦遭轰炸。因有汉奸向日军报告，说冯玉祥将军在‘茹经堂’开会，所以日军特地派机前来轰炸。当时看守‘茹经堂’的工友夫妇和一个儿子，看到有日机前来轰炸，急忙避入山谷中，结果都被炸死；但‘茹经堂’却未被击中。先生闻知此事十分悲悯，特叫我买三口棺材，为之安葬。后来，前西溪唐宅左右邻舍都被敌机炸毁，而唐宅却安然无恙，亦大幸矣。”

十月八日，唐文治率部分无锡国专师生转移到先期租定的、离无锡城区十余里的王祥巷（周新镇附近）某处上课。教务主任冯振、总务主任叶长青率二、三年级部分学生暂时留居城中学习。

唐文治《呈报本校维持上课状况请赐答复》（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惟经本月六日无锡车站马路一带突被敌机轰炸，加以途来敌机在锡邑近城肆虐，无日无之，在稍有经验

之学生，既得校中防空保障，固属安心上课；而年龄较稚之学生，不无胆怯。窃按查钧部八月三日江代电开，本有遇必要时允准学校迁移之规定。爰酌量情形，先期租定距城十余里之周新镇落乡王祥巷房屋两处，即于八日由文治率同教职员，将一部分学生分移，暂作上课之地。近因城中趋势紧张，又有学生多名陆续来乡上课。至愿留城中之学生，间有参与后援会工作关系，仍照常在校上课。即嘱教务主任冯振、总务主任叶长青主持其事，城乡往来，随时商洽。俟时局稍定，即行迁回……再本校教职员，除教员陈鼎忠因事暂回长沙原籍外，早经于开学后陆续到齐……”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丑七十三岁》：“十月六日午后，日机轰炸无锡北门车站，并及东门。余举家仓卒避地室内，闻爆炸声隆隆然，日机投弹二十余枚，约二小时始去，孙儿女等在校陆续归，幸皆无恙。傍晚，高君涵叔来探望，余竟夜不能睡，决计避乡间。七日早，宣布迁校，略收拾行李并先人手迹等。次日，叩别家祠，偕内子等赴许巷，寓许生岱云家，并见其弟岱青，厚意殷挚。同时，本校教员龙伯纯、江武子、陆景周、王慧言，职员吴溉亭、吴亦庵等，并学生二十人迁居王祥巷（冯振心及学生二十余人留城中）。儿媳庆棠率教育院学生迁方桥，相距约二里许。庆诒住许巷，孙儿女等住方桥。”

唐文治《无锡许氏三畏堂记》（见《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五）：“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之秋，日寇内熨，蜚雾蔽障，飞鸟遗音。余时侨居锡邑国学专修学校，率诸生及眷属避地于城南扬名乡东许道。及门许生岱云，敦行幼学士也；乃弟岱青，亦朴实笃诚。余乃迁眷主其家，仍聚徒讲学不辍……”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九月二十日开学，除陈



天倪教授在长沙原籍未能来校外，教员十三人，职员六人全部到校。学生因道路阻梗，报到上课的仅七十一人（上学期三百余人）。十月六日，无锡车站马路一带突被敌机轰炸，人民所受损失比九月二十八日那次轰炸更重。王家巷的房屋既已准备好，就请唐校长先率部分教职员及学生于十月八日到乡间上课。留城上课的学生由冯振心主持教学，有的学生还参加后援会工作。十月二十四日，学校将开学以来的情况呈报教育部时，还希望‘俟时局稍定，即行迁回’。想不到此番一别，唐校长再也没有回到学前街来了。以后十多年，他念念不忘他在学前街创建的学校。”

在王祥巷上课期间，日寇飞机时来轰炸周边地区，国专师生“心恒惴惴”；时值湖南籍教师陈鼎忠从长沙来函，建议学校转迁湖南长沙。于是校中同人议决迁校至长沙。十一月十四日晚五时，唐文治率部分师生雇小船数艇，自许巷起程，途经常州、丹阳，十七日午后抵镇江。原留校善后的冯振于十一月十四日半夜携全家与国专部分同仁、学生，从无锡乡间乘小舟沿运河避难，也于十七日晚到镇江，于是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十九日乘英轮“德和”号溯江而上。二十一日晚过芜湖，二十二日晚过九江，至二十四日黎明抵汉口。二十九日午后渡江至武昌，随即登车，至三十日傍晚时分抵达长沙。

唐文治《呈报迁校长沙借定校址上课请赐备案由》（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溯自十月六日敌机轰炸锡邑，本校因恐发生危险，先在无锡南乡周新镇之落乡王祥巷租定房屋，为迁移授课地点。旋至十一月初旬，敌机在锡邑肆扰不已，王祥巷地近周径〔泾〕巷车站，教室屋顶每天飞机时作盘旋，掠过者数四，前线又复万分吃

紧，乡间决难驻足。爰召集合校师生开会决议，遵依钧部令颁‘于必要时得迁移安全区域’之规定，以湖南长沙为目的地，当于十四五日由文治率同教职员、学生等，分雇小舟，由无锡乡间出发。沿途风鹤频惊，历四昼夜始达镇江，候乘德和轮船抵汉口，再由粤汉铁路转徙长沙，仰托鸿庇，诸生得告安全……”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丑七十三岁》：“十月杪后，日机时来轰炸附近周泾巷。至十一月十天左右，每日来三四次，在屋顶盘旋。诸生往来上课，心恒惴惴。会教师陈君天倪自长沙来函相招，同人遂议决迁校至长沙。慧言、也庵、静芝等，因道远不能往，相对凄然。余西溪房屋托表甥王露华看守……十四日，雇小船三艇，晚五时自许巷起程，船小人众，几无容足之地，途经常州、丹阳，飞机轧轧之声、难民流离之状，震耳骇目，不胜凄惨。十七日午后，抵镇江，寓大华旅馆。十九日晨，学生陈洵代雇小轮一艘，渡至江心，登德和轮船，舟中拥挤，余与孝纯备极周折困难，幸庆棠觅得房舱间。余及内子、庆棠、孝纯勉强同住，振心、长卿家眷及四儿媳、诸孙女等住统舱中，人声嘈杂，浪激风烈，不堪其苦。廿一日晚过芜湖。二更许舟中人惊相语曰：日机在桅上盘旋。于是灯火尽熄，约二时始去。廿二日晚过九江。廿四日黎明抵汉口，表甥俞仲华为定交通旅馆二间，殷勤招待。逾二日，四儿庆永来汉，详告离苏州及中途遇飞机危险情状，闻之下泪。即命庆永在旅行社购车票。廿九日午后，乘小轮抵武昌。即行登车，伤兵拥挤争先，秩序混乱已极。翌日天微雪，经临湘、岳阳、汨罗，晚六时抵长沙，长卿引导住南方旅馆。诸同人惊相告曰：‘镇江大华旅馆、英公司德和轮船，均遭日机轰炸，死者千余人。’闻之惶骇不置。”

唐文治《王君慧言家传》（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七）：“……自君别后，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蜷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刳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馆。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樯上回旋矣！’于是灯火尽熄，数时始去。抵长沙未旬日，忽同人竞相告曰：京口之大华、英公司之德和俱被炸矣，死者二千余人。闻之惶骇。”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半夜全家与国专部分同仁、同学从无锡乡间乘小舟沿运河避日寇难，十七晚到镇江，乘德和轮赴汉口转长沙。”又冯振《十一月十四日半夜与十弟及妻儿自无锡城南王祥巷乘小舟沿运河避难十七晚达镇江》（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铁鸟盘空瞰不休，相机逃命夜难留。一家八口成孤注，三日兼程局小舟。乘暮车驰如脱兔，夺途军退类奔牛，常州戚墅惊心骨（沿途所见，以常州、戚墅二处被炸最惨），伫待招魂到润州。”

杨燕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校回忆》（见《冯振纪念文集》）：“当时日寇飞机，日夜来无锡骚扰，故师生学习，心恒惴惴！此时有原本校教师陈天倪自长沙来信，建议迁校湖南长沙，唐校长遂决定西撤。十一月二十四日，黎明抵汉口，由冯振师尽心照顾。唐师虽长途跋涉，路途艰辛，但仍精神旺盛。在汉口，幸有亲友代订交通旅馆客房三间，由冯振师陪同照顾。到汉口之后，唐师关心师生安全，请冯振师每天到码头等候南京来船。冯师在码头等候两天才接到随后来的师生，冯师立即陪伴至交通旅馆谒见唐师，唐师甚喜，连呼好极好极。并亲切询问师生沿途生活情况，并予慰问，关切备至！”

当时无锡国专教授冯振、钱仲联等都写有多首诗篇，记叙一路辗转迁徙的艰难困苦之状。

冯振《镇江德和轮舟作》（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孤舟兀立大江潮，人语嘈嘈甚市嚣，插足容身俱未稳，又呼儿女话金焦。”又《长江舟中作》：“几日狂风作势粗，接天波浪欲吞吴，彭郎灵爽应犹在，肯许旁人夺小姑。”

钱仲联《十月十三夜舟发无锡往镇江》（见《梦苕庵诗文集·梦苕庵诗存》）：“压城天似死灰寒，脱命危邦事大难。盲进孤帆兼夜发，计程三日办风餐。簸魂最苦船千兀，温鬓终慳月一九。却怪痴儿徒乱意，照明弹好唤人看。”又《丹阳》：“一帆暝色落云阳，顿觉风光异故乡。野豕声多如入魔，干鱼味恶强充肠。不堪吴鬓增霜白，疑对准流浣月黄。犹是大江南岸地，荒寒便欲抵沙场。”又《德和轮镇江夜发》：“桅烟夜迸一江星，寂寂金焦睡未醒。兵气西来京口白，天痕东束海门青。残年心事随潮落，经乱笳声入梦听。高枕柁楼无限泪，临分挥与老龙腥。”又《舟过金陵不停泊待舟不得登者万人》：“喧舶雷声过下关，难从灯底辨江山。不辞眼向通宵醒，尽有眠求一榻艰。如马吴船偏急去，背人江水更无还。攀舷露立沙头客，援手何从泪暗潜。”又《武昌车驿候车避难西征者以万计》：“暄死吴味楚尾来，武昌城外立风埃。提携诸口同奔命，拮据惊魂入怒雷。此去落英愁捃拾，已无残柳足徘徊。随阳鸿雁知多少，未暇区区为我哀。”

钱仲联《西征八首》（见《梦苕庵诗文集·梦苕庵诗存》）：

“於戏离乱来，饱受一切苦。九旬三转迁，生事搬姜鼠。朱巷暂逃劫，心知非乐土。蛰居未浹月，果尔贼氛聚。满地草木兵，此邦不可处。商量赋西征，结伴指湘楚。何物汝鸡狗，



方寸起滟潏。掉舟去先行，累我失倚伍。风露立中宵，流离几失所。来晨重买棹，口舌费多许。举室委一舟，软语相慰抚。汝曹以天属，谅哉林回语。榜师畏铁鸢，日晡始纵櫓。曛黑入运河，险象集眉宇。悬弹忽照明，篝火应声举。船前雷裂地，船后枪如雨。稚子面色灰，病妻战两股。我生恃学道，心定若无睹。呼船但徐行，系缆傍岸坞。却怜榜师钝，惊魂已无主。竟突火围出，不死良天祐。何来败兵船，尾行十丈距。觑我舟中物，意或相劫取。转赖快櫓飞，夺命脱豺虎。行行重行行，招魂向江浦。

小舟塞廿口，僵蚕茧一窝。伸脚无寸地，尚输眠起蛾。船唇逮船尾，行李较人多。煮饭须停桡，溲溺向江波。幸免鲟鱼楫，吞声泣过河。晨经戚墅堰，颓屋兀嵯峨。苍凉劫烧余，弹痕如蜂巢。进次兰陵郭，无酒难高歌。驼坐万摇兀，碎魂掷涛涡。盖顶苇席漏，大雨沾滂沱。强忍我尚可，其奈儿曹何。此哭又彼号，宁复畏隄河。恨死欲掷去，徐徐复抚摩。此痛儿无忘，血仇东海倭。期汝速长大，歼敌快荷戈。

十三朱巷饭，十四奔牛宿。十五泊丹徒，金焦翠可掬。扬子转洪涛，万马腾一蹴。形胜故未改，霸图雄在目。江山真待我，重来千恨足（余前年游京口诗有‘江山倘待我重来’句）。黄昏投客店，孤灯对歌哭。犹疑在扁舟，黑风夜揭屋。儿女喜无恙，入抱争咻嗅。却披断烂报，苏台地又蹙。咄嗟数日事，师溃抑何速。哀此国防线，平时夸版筑。即难半载支，岂谓如是促。巨鳌戴山来，动摇到地轴。寇深事急矣，祸且及心腹。似闻肉食谋，上策欲都蜀。一隅抗天下，如鼠入牛角。京口兵可用，不应输此局。我归已无家，一死筹之熟。终存复国念，暂置愁万斛。成旅倘兴夏，一胜荡千辱。

逆旅两日夜，闷待上水船。登船聚一哄，争位人竞先。我

为稚子累，前后苦攀牵。入舱眼欲花，乾坤若倒旋。幸据一榻地，团坐难安眠。重叠上下床，鳞次而蝉联。腰股偶屈伸，床板抵顶肩。船厢大几许，强容人五千。耳后疑生风，万器腾雷颠。船外袭寒阵，船中蒸腥膻。人气合众秽，参以芙蓉烟。此境脏欲死，曾不异豕圈。平昔安闲处，炼骨悔未坚。风寒疾痛饿，到此成熬煎。妻孥呕不止，抚慰心转怜。不因海寇恶，兹境亲无缘。闭目念家山，江黑波掀天。险境幸已脱，苦味尝亦全。悲歌来日难，百恨弥垓埏。

同舟遇乡亲，急询乡里事。为言十三日，贼自白茆至。山城斗大耳，一炮足粉碎。况受千余弹，洞烧化赤地。城南爆仗湾，城心慧日寺。繁华所荟集，尽付火龙戏。天心惩浇俗，杀运良自致。奈何赵楼书，亦遭六丁忌。魂魄绛云火，古灵不之庇。覆巢无完卵，此言果定例。独愁我二亲，浩劫曾逃未？随恃虽有兄，消息无一字。我于骨内外，何物难忍置。寒家百年屋，及我已三世。小楼插架藏，聊足敌珠翠。虽无宋元本，苦聚亦不易。就中清人集，朱墨手评识。明知无用物，贼眼不屑覬。雷电倘取将，得失付天意。但祝吾亲安，区区何足计。

飙轮碾铁瓮，西指秣陵树。如此好江山，惨然别之去。降幡出石头，谁说龙虎踞。紫髯自可儿，其才仅割据。钟山青骨神，昂之无足数。夜深过采石，江声犹郁怒。杀贼赖书生，千载一兴慕。前行趋彭蠡，小姑云中遇。飞翠向人扑，严妆睇清曙。时无彭郎辈，空弼血战处。船头千万山，为我竞奔赴。胸孕百叠愁，未暇吟好句。清景如逃鱼，一失不可捕。袖底匡庐云，避世空此路。嗟予中风走，豪怀挫囊素。病骸复奚适，南行一狂顾。且为琴台客，怅望汉皋暮。

我抵润州日，闻贼逼梁溪。及今客汉江，又闻润州危。日蹙国百里，糜烂至于斯。败北亦战略，逃名决不尸。诤曰消耗

战，消耗果属谁？自幸脱身早，稍迟命可知。所以经百判，顺受亦不辞。顾愁八表昏，行迈将安之。有如南飞鹤，三匝依无枝。隔江黄鹤楼，千载白云飞。胜迹罢登临，何心更题诗。抵掌说形势，上游控蛇龟。天堑故依然，事非不可为。独怜此邦人，尚为金粉迷。解珮交甫感，拥被鄂君思。听客话吴祸，秦越视瘠肥。鱼游沸鼎中，未省祸燃眉。哀此亡国病，国手无能医。悲来肠九回，涕下如纆縻。

汉皋不可留，言往长沙去。修轨一超忽，愁心散烟树。憧憧野马尘，飞轮逝脱兔。木叶下洞庭，风色吾能赋。却看车厢内，几人颜色豫？老革正横行，喧骂声可怖。鸡肋几安拳，吞声不敢怒。谅哉时运为，郁伊将谁诉？投书吊汨罗，骚魂益愁慕。默思古迁客，由来此流寓。灵均涉江后，词人多入楚。贾生留古祠，杜老有荒墓。柳谪零陵石，韩开衡岳雾。后来陈简斋，避地值南渡。窃比或非妄，时地两相遇。平生诤诗豪，所欠江山助。仄作吴趋人，吟怀困风絮。艰虞玉成我，异境谢天付。清湘绿恋人，安排十年住。”

十一月二十四日，无锡国专第一届毕业生许师衡（字心鲁，约一八九九～一九三七）与父母兄弟、堂兄弟等共八人被日军侵略者杀害于无锡席祁。九年后，王遽常为作《许心鲁殉难事略》。

王遽常《许心鲁殉难事略》（见《抗兵集》）：“倭寇陷无锡后之三月，始闻心鲁阖门殉难之耗。既哭之，欲记其事而不能详。去岁寇平，予至锡，遇徐君万里。万里言：寇初至，心鲁先期举家避席祁，及邑城破，或请他徙，君考曰：地迂阻，非兵家所必争，宜若无害。寇且迫，我军西次，令人民从行，则又曰：我侪小民，无拳勇，寇必不讎。君苦谏不可，乡人以君考为望，亦多不行。迨寇至，勒合村男女，无少长集广场，

围杀之，无一幸免者。君剑其幼子，与其父母昆弟及从兄弟同殉，凡八人，同村罹难者至八十余人。时民国二十六年夏正十月二十三日日加申也。心鲁年仅三十有七。明日寇焚积尸，扬其灰，呜乎酷已！又一从弟已远行，闻耗归，至三十二年，复为寇所杀。于是心鲁曾大父以下子胤，无一存者矣，为尤酷已！君姓许氏，讳师衡，心鲁其字。与予同学国学馆，时同馆二十四人，能通绝国方言者，三四人而已，君其一焉。肆之尤勤，为人恂恂，与物无忤，予辈五六人者，喜高睨大谭，君旁坐，不屏一言。或问君折然不，每微笑不甚答。既出学，为西文教师于邑西梅园豁然洞读书处，数年，同学皆年少盛意气，多骧首信眉求一试，君顾夷然无所动，日周旋于童稚数十人中，虽哢口瘖音，仍若有至乐者。其谨愿恬淡，无愧乎古之君子，而所遇之酷，至于此极，诚非常理之所可测矣……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记。”

按：无锡席祁（今无锡锡山区东亭镇春雷社区）许巷血案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无数暴行之一。据《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中的《东亭许巷血案》一文记载，许巷当时是一个由六十三户、二百三十多人组成，四面环水、地处偏僻的村庄。当侵华日军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进犯无锡后，许巷村民们认为这里太平天国时期也未进一兵一卒，比较安全，所以未能及时转移，而且附近的一些群众也不约而同来许巷避难。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左右，日本侵略军荷枪实弹地冲进了许巷，进村后，就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残酷屠杀。这场屠杀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全村上自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婴儿，共二百二十三人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去许巷避难的亲友一百二十九人。又该文载录这场大屠杀的幸存者、许师衡的侄子许筱锦的回忆说：“我们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的共有六



人：我的爷爷、亲娘（按：无锡人称祖母为‘亲娘’）和我的父亲许师慎、伯父许师衡、叔父许师文，还有爷爷的唯一孙子许南洋（六岁）。那天，我伯父死时紧紧地抱着自己六岁的儿子，直到收尸，也很难分开，最后就把他们放在同一口棺材里埋葬了。”

十二月八日，觅定长沙城内黄泥街友于里四十八号作为无锡国专的临时校舍，照常上课。

唐文治《呈报迁校长沙借定校址上课请赐备案由》（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兹已借定长沙城内黄泥街友于里四十八号为临时校舍，照常上课。现第一批同来学生有二十余人，其在战区中固属艰苦万分；即不在战区中者，患难相共，依依不舍，而求学之志，磨练愈坚。惟受兹重大影响，诸生学业自应设法补救。谨遵照部令，将寒假、年假假期一律酌量缩短，以重学业，而免旷废，冀仰副钧部作育人才之至意……”

无锡国专在长沙期间，曾向当地招考学生，陈旭麓（初名修祿，一九一八～一九八八）即于此次考入无锡国专，但入学不久后即转至当时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学。

熊月之《陈旭麓先生传略》：“……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年初，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迁到长沙，这所学校主持人是著名教育家唐文治。这时，先生（按：指陈旭麓）在孔道国专已临近毕业，随之而来的有个文凭价值的问题，因为孔道国专当时在国家教育部并未立案，文凭不吃香，而无锡国专则是立案的，于是先生决定报考设在长沙的无锡国专。当时共有近五十人前往报考，先生的考分，列在前四名。考试主要项目是作文，题目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先生引经据典，洋洋洒洒，

写得相当顺手。唐文治老校长对这位湖南考生很是赏识，特地约他去谈了一次话。先生算是被录取了，由孔道国专学生变成无锡国专学生。谁知，他刚刚在无锡国专上了几天课，另一个机会又向他招手了。这个机会，中止了他在长沙的学习生活，影响了他以后一生的命运……大夏大学设在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先迁庐山，再迁贵阳，大夏在由庐山迁往贵阳的途中，经过长沙。陈旭麓先生通过湘乡同学的介绍，得识大夏大学的秘书长王毓祥。王毓祥当时是民国政府立法委员，名气很大，他欢迎这位才气横溢的青年到大夏读书。于是，先生毅然决定离开长沙，前往贵阳。一九三八年春，在王毓祥的支持下，陈旭麓先生成了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

按：除上引文字外，无锡国专在长沙招考学生一事，尚未见其他文献的记载。

因长沙城中情况极不安定，十二月十八日晚开会，议定再迁校至湘乡铜钹湾。十九日傍晚，唐文治先率部分师生登船，二十五日午后二时，至湘乡铜钹湾。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丑七十三岁》：“十二月八日，长卿觅定黄泥街房屋。时余患感冒，饮食不便，暂时迁往。而长沙伤兵极多，情形如散沙。南洋旧同学谭介甫托其表姊颜皖兰女士在湘乡铜钹湾代觅房屋。十八晚开会，议定余先赴湘乡，后再迁校。既雇定小舟三艇：一为余夫妇及四儿妇等用；一为庆棠、诸孙女等用；一为教育院师生用。次日傍晚登船，湘乡码头有峭壁极高，适天雨泥滑，余坐藤榻扶抬，行半里余始上船，危险之至。同学陈治安扶持，送至船上，可感也。廿五日午后二时，至湘乡铜钹湾。起岸，余坐藤轿，轿身狭窄，与江南不同，且透风不稳。内子等均步行。时余疲极，形神几若相离矣。”

黄汉文《甘当绿叶衬红花——记陆景周先生》：“……在长沙二十余日，又雇小舟赴湘乡铜钹湾。天雨路滑，坡度又陡，唐先生以藤榻代步，黄氏师母及陆先生以下皆步行，幸有学生搀扶，始达所租民房。”

本年底，原无锡国专经济校董蔡兼三去世，后唐文治为作《蔡君兼三墓志铭》。

唐文治《蔡君兼三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选四编》卷八）：“……辛酉，余创设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邑绅孙君鹤卿任经济校董。孙君歿，君与保谦力助之。余困于学制，尝谓斫丧道德，即系斫丧土地；限制人才，即系限制国力，心灰意沮。君劝慰之，笑语余曰：‘君不忆科举时代，父兄为子弟负考麓耶？其忍耐肩重非一与？’余谢曰：‘此克己良箴也。’……君子清同治戊辰九月朔日生，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唐文治率无锡国专部分师生迁至湘乡铜铤湾后，叶长青与另一部分师生仍留在长沙。一月八日，叶长青到湘乡请示唐文治，准备将学校解散。唐文治只同意疏散一部分学生，其他学生如愿意者可以到湘乡上课。但叶长青回长沙后仍向学生宣布学校已经解散，结果有一部分学生离开了学校，只有小部分学生后来又找寻到湘乡后归队。学校经数度周折后，暂时在湘乡铜铤湾上课。二月一日，唐文治为学生讲授《格物定论》。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戊寅七十四岁》：“一月八日，叶生长青携其弟来云：时局一时不定，拟将本校暂时解散。余告以只可疏散若干人，其有愿来者，可迁校至湘乡，照常授课。十二日晚，钱生仲联来报告，长青急于回闽，已将本校部分疏散。余等经数度周折，暂在铜铤湾上课。二月一日为旧历元旦后一日，余为诸生讲《格物定论》。”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他（按：指唐文治）常说：‘抗战初期，实乃全校师生护送我西行逃难，说我率师生西迁，愧不敢当。’这话似乎是实情，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从最近听到的一些当事人谈话中，我深感校长的表率作用。师生在长沙暂时安定了一阵，感到长沙也未必能久留，校长就率领部分师生到湘乡。叶长青到湘乡请示校长，准备将学校解



散。校长只同意疏散一部分，愿意到湘乡来的可以到湘乡上课。叶长青回到长沙，突然向学生宣布，学校决定停办，大家各奔前程，学生都被吓呆了。钱仲联先生连忙赶到湘乡去禀校长。唐校长召集师生谈话，说学校没有作过这样的决定，大家还是安下心来上课，如果这里不能再留，我到何地，诸生随我到该处，我有饭吃，诸生也有饭吃。钱先生向长沙的学生传达了校长的指示，学生安定下来了，但已经走掉了几个，据说后来听到学校并未解散，有二三人又寻到湘乡归队……后来在桂校担任过事务主任的王桐荪学长回忆当时在湘桂途中的情况，校长的确实行自己的诺言，邀约与家庭、亲友失去联系的学生，与自己同桌吃饭，给予种种慰藉。在湘乡的时候，由无锡同来的师生已经不多了。武术教练侯敬舆（擅中医，曾任无锡中医讲习班教师，无锡国医馆馆长）在武汉时已告辞，到了长沙又有二名学生离开，后来又被叶长青哄走了几个。”

黄汉文《甘当绿叶衬红花——记陆景周先生》：“休息数日，夏历正月初二，即陪同唐校长上课，讲稿《大学格物定论》系唐、陆二师路途撰成（全文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四）。”

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的黄旭初（一八九二～一九七五）因黄炎培（字任之，一八七八～一九六五）之介绍，诚邀唐文治率全校师生转迁桂林。二月十七日晨，唐文治率无锡国专学生启程，于当天傍晚六时半抵达衡阳。二月十九日晨起程赴桂林，于下午五时许抵达。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戊寅七十四岁》：“八日，顾君惕生来谈，蚌埠失守，徐州颇危急，闻军事消息，敌人或攻沙市，或宜昌，再袭常德，则两湖受其包围，赴川路将断绝，可虑之至。九日夜七时半，雨甚，庆棠自

桂林来言：桂省政府主席王〔黄〕旭初，因黄任之先生介绍，将以大小汽车迎接余等于衡阳，机缘可谓凑泊矣。十七日晨起程，四儿媳庆兰送至县政府，庆棠已携俞钊文表甥女先到等候。余等五人登车赴衡阳，一时半近湘潭，正欲渡河，忽闻惊〔警〕报，即退树林内暂避。约半时许解除，即赴河干候渡，忽有军人自称冯庸部下军官，有紧急公事，争先渡。庆棠云：如此则公安局定章岂不作废耶？军人甚怒，立命驱车至岸旁。余命司机人退让，逾时渡河。陆行过株州、衡山，又渡河一次，六时半抵衡阳，住广东酒店。十八日晨，日机轰炸衡阳，投弹三十余枚，房屋震动。翌晨启程赴桂林，途经祁阳、零陵、全州、兴安等地，五时许抵桂林，住乐群社，省政府招待处也。”

黄汉文《甘当绿叶衬红花——记陆景周先生》：“在铜钵湾月余，唐先生夫妇先行，陆先生与侄女庆兰携孝威兄妹亦坐车抵桂林。遇日机轰炸衡阳，火车、汽车时停时开，路途艰辛较长沙赴湘乡时尤甚。陆先生与湘桂同胞语言隔阂，幸有奚干城同学，能与西南各地同胞交谈，其余同学亦多方照顾，后来他与我们谈起旅途情事，常谈到奚干城善‘六国乡谈’，自己能与诸同学从唐校长于‘陈蔡之间’，稍定后能饱览桂林山水，亦云幸矣。”

奚干城《湘桂行》（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抗日战争初期，无锡不幸沦陷。师生举校西迁，敌机狂轰滥炸，一路备尝艰险，加以交通阻塞，师生渐渐散失。行至湖南株洲，只剩校长唐文治、教师陆景周、工友高福与学生袁步祺、沈令生、虞念祖、奚干城等数人而已。又值隆冬严寒，唐校长仍〔乃〕于旷野命学生席地而坐，朗诵《诗经》“咒虎”一章，夫子声泪俱下，诸生皆为动容。一旬后，始有广



西教育厅长雷沛鸿、江苏教育学院教授俞庆棠，驱专车来迎，始得渡过黄河，抵达广西桂林，在环湖西路复校。这段历史，不能忘怀，故作《湘桂行》以志其事：

烽火漫天天变色，哀鸿遍地地染赤。敌寇无端动干戈，生灵涂炭家国失。中华文化五千载，保存国粹我有责。临危不惧有识见，师生举校往西迁。自古常言蜀道难，今比蜀道难万千。敌机上空滥施虐，难胞接踵道路塞。宁尝颠沛流离苦，岂肯瓦全事夷狄。艰难西行至株州，天寒地冻飞雪积。露天席地犹授学，夫子朗诵“兕虎”篇。情深道高涵意博，声声催泪扣心弦。昔年孔丘因陈蔡，弦歌不绝似眼前。固知中华根底厚，大道不灭如青天。果然吉人遇贵人，广西传驰来车辇。车行渡过黄河，桂林山水多秀妍。环湖路上风景好，复校开门在湖边。四方弟子渐归来，济济一堂开讲筵。风声雨声读书声，读书救国两相连……”

按：上文中说“朗诵《诗经》‘兕虎’一章”，当时指《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一章，《何草不黄》是一首反映征夫之苦的诗。

又按：无锡国专这次是和同样地处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一起迁桂的。唐文治的孙女唐孝纯在她写的《人民教育家俞庆棠》一书中，曾对两校为何选择迁校广西的原因有所分析：“学校迁桂之所以能够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当时广西省地方领导有其独自的主张和做法，他们欢迎贤才进桂工作。有一些知名人士已迁桂林，其中黄炎培、俞寰澄同俞庆棠兄妹三人交往较深，对唐文治十分敬仰，对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有一定了解，由他们介绍，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对两校迁桂很欢迎……除此原因外，曾几度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的雷宾南也欢

迎两校迁桂。因雷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过教授和研究实验部主任，在其任厅长时，每年都保送几名广西学生到院学习；毕业生中也有被派往广西省工作的。在一九三五年中国社会教育社于广州举行的第四届年会上，总干事俞庆棠作的社务报告中，特别提到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和山东的乡村建设成就；雷宾南也作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研究实验报告。广州年会还决定中国社会教育社组织广西教育考察团，由俞庆棠率领去广西考察国民基础教育，以使各地社员进一步具体了解。由于这些历史渊源，迁校广西就较顺利、自然。”

二月下旬至三月间，无锡国专先后租借桂林正阳街十七号及环湖路十八号的民房作为教室，正常上课，从此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的“桂校”时期。四月间，因学生来者渐多，将其分作两组上课。

唐文治《呈报本校由湖南湘乡迁移至广西桂林租屋上课请赐答复》（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本校迁移湖南湘乡铜佃湾章氏大厦为临时校址上课情由，业于本年一月二十二日呈报钧部赐答复在案。因长沙时有警报，衡阳迭被轰炸，人心不免惶惶。而铜佃湾一带常有兵队来同借住，于静修不宜。爰于本月十八日率同员生等迁移广西桂林，租赁正阳街十七号为临时校址，略事修葺，即于本月二十六日上课。惟租金昂贵，或再迁徙，此后呈请钧部答复核备案……”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戊寅七十四岁》：“二十四日，余偕内子迁入正阳街租屋，旋另租竹园街楼屋三间，是晚迁往，不意门口茅厕污秽不堪，楼上亦臭气熏人。余戏作一联云：十年有臭，一夜无眠。二十五日晨，迁回正阳街，接孙毓香君来信，悉无锡家中无恙，甚慰。三月间，

因正阳街房屋西向，潮热不堪，托关生文俊觅得环湖路十八号房屋，共计十二间，南向。三月廿一日迁入，诸生约二十人，仍照常上课……（四月）十四日，因学生来者渐多，与振心等会商，分为二组。奈桂林书籍稀少，印刷又不便，仅购得《三通序》作为课本。”

钱仲联《学术年表》（见《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至二月，诸生与我家同往桂林，时国专已在杉湖滨赁屋开课，我即移家至校中任教。在桂林，得家报，知战时父母兄弟俱避居乡间，今已回城，家中全部房屋俱已被焚为灰烬，弟华孙被日本兵枪杀，父亲病逝。在桂林上课，康有为门人龙泽厚，老矣，日来听我课，听讲爱国诗文，相与握手痛哭。”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师生到达桂林；在环湖路十八号租赁校舍上课。本来在无锡兼教育学课的童润之先生，也在桂林，他是由浙江水路来与江苏省教育学院汇合的，仍到国专来兼课。两校又在广西相会，教授互相兼课，部分学生互相借读。钱仲联先生全家不久也到桂林来了。”

杨燕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校回忆》（见《冯振纪念文集》）：“三月初，冯师为解决校舍问题，托关文俊觅得桂林环湖路十八号楼房十二间。当时唐师表示满意。冯师与陆景周师命我用颜体字写好‘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横幅。我校校牌挂出，过路人争相观看。不久我们即行恢复上课。因学生来校渐多，唐校长指示分为两班上课。当时书籍奇缺，承教育厅长赠与书籍，并处处给予照顾，学校才能顺利开课。”

六月四日，毕业考试结束，第十七届毕业生有袁步祺、温渊、虞念祖、虞斌麟等四人（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

先生年谱续编·戊寅七十四岁》及《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

六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无锡国专召开校务会议，因唐文治年迈体弱且水土不服，决定请假回上海治疗，由冯振任代理校长。唐文治并于六月三十日向教育部具文请假，教育部随即批复准假。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戊寅七十四岁》：“廿六日，开会议定请振心代理校务，余即返沪。是晚庆棠回桂林。翌日开会，交振心钤记、存折，并托教育院职员李君友松雇定船只。”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三八年)六月，校长唐蔚芝师回沪，委我代理校长。我送唐师至梧州，顺道回家一行。”

唐文治《呈请给假就医由》(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职员任免、资格审查等有关人事文件》)：“……窃文治自迁校桂林后，现因溽暑郁蒸，水土不服，体中时感不适。兹值学期结束，拟乘暑假内赴港转沪就医，一俟痊愈，即当回校销假。所有本校行政事宜暂委教务主任冯振代理，钤记一颗即交冯振保管，遇事启用。应否加委代理校长名称，请钧部督察施行……”

按：教育部七月十三日指令云：“准予给假就医，校务由教务主任代理，毋另行加委。”

杨燕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校回忆》(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桂林遭空袭，居民纷纷逃避山洞中。为此，唐校长深感年迈，又加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在敌机来临紧急警报时，颇难躲避。又因在长途迁校过程中，身心交瘁。为此，唐师召集会议，请冯振主任代理校务，

将学校铃印存折移交给冯师，决定请假赴上海治疗。一九三八年六月，唐师夫妇与秘书陆景周师等取道漓江，冯师陪伴送至梧州轮船码头，与唐师亲切握别之后，即转程回原籍广西北流。”

九月，本年下学期开学，学生增至六十多人。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三九年九月学校在桂林环湖北路十八号开学了，招收了一批广西籍新生，加上原有从湖南江西赶来复学的同学合计有六十多人。师生家属生活在一起，仅仅十二间的校舍就显得十分拥挤。”

按：上文中“一九三九年”为“一九三八年”之误。

十月二十七日（农历九月五日），原无锡国专职员王保謙去世，唐文治为作《王君慧言家传》。

唐文治《王君慧言家传》（见《茹经堂文集四编》卷七）：“王君慧言，先师王太史文贞公之子。文治受师恩最厚，顾视君犹弟，君亦待余犹兄……越数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成立。聘君校讎《十三经》。太湖之滨、惠山之麓，君与同乡朱君叔子、陆君景周，晦明与共，风雨观摩，稽古论今，载酒问字，不知人间世有沧桑事也。无何，江浙闽墙，娄城岌岌，余雇小轮迎君全眷来锡，居校中。又逾年，君膺苏州振华女学校之聘，尝为诸生讲明归震川《先妣事略》，多泣下者，积诚如此。顾以近今文体，俚俗不堪，怏怏不合，复来依余，任国专教职，宽严得宜。丁丑秋，沪战起，余迁校锡邑南郊王祥乡，君挈眷偕来，讲贯不辍。未几，事益急，同人会议迁湘。君潸然曰：‘湘省道远费巨，吾不能随君行矣。’余亦泫然执手别。呜呼！岂意遂成永诀耶……君生于清光绪庚寅岁九月十八日，以戊寅岁九月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九。”

十一月，因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桂林吃紧，随之长沙在大火中几成焦墟，从沦陷区迁来的大批机关团体纷纷向黔滇川各省大转移。经反复研究，无锡国专由桂林迁往冯振的家乡——广西北流县山围村。

冯振《呈报本校由桂林迁移北流山围乡继续上课由》（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窃本校迁桂已十阅月，以桂林渐成军事要冲，城市尤易受敌机威胁。急谋另择安全地点迁移，而交通车辆缺乏异常，远迁滇、贵，势难实现。不得已，暂定北流乡间为迁校之所，赶速进行。经于上月养日以航快代电呈报钧部在案，兹已在北流山围乡择定临时校址，加紧布置。教职员、学生亦已次第到达，日内即可继续上课……”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因武汉、广州失守，桂林疏散，国专迁北流山围，部分同仁、同学寄居我家。”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后分兵南下，长沙大火，全市化成一片焦土，桂林震动。从沦区迁来的大批机关团体又纷纷向黔滇川各省大迁移。当时国专师生数十人，何去何从，十分彷徨。出路可供考虑的有三条：一，把学校解散；二，西迁黔滇；三，迁入桂南六万大山。经过反复的研究，认为师生辗转数千里，患难相共，在危急关头，更应团结一致，坚定不移，所以学校解散一途不能考虑。继续西迁的想法，根据一年多迁徙的教训，知道力量不够，又不能寄托政府予以帮助。学校经费支绌，拿不出大笔钱来解决车辆交通问题，即使到了那里也不可能找到有力的帮助。在人地生疏的地



方，一旦经济断绝，进退两难，师生和眷属数十人的生活将不堪设想，所以也难实行。至于迁入六万大山，似乎比较可行。因冯先生的老家山围，就在大山支脉的边缘。再进去是重山叠岭，涧深林密，纵深百数十里，山中是安静的读书环境，即使敌人进扰，也有退避的地方；加以人地熟悉，最低限度，生活不用担心。因此决定把学校迁到山围。

迁移是利用经济便捷的水道，顺漓江南下梧州，在梧州换乘汽车到达北流县境的西山车站，再步行约十里就到达山围。当时凡广西籍的学生都各自回家，等候通知复课。由钱（仲联）、蒋（石渠）两教授率领部分学生和眷属携带校具雇舟南下，由冯先生和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雇小汽车一辆连夜赶到山围，为稍后几天到达的师生眷属安排好一切。这样学校迁移工作顺利完成了。

从公路旁越过几个不大的山头，到达山围岭口，就可以俯视到四山环绕中的一片小平原，南北东西相距各有二三百里，在绿树丛里，掩映着一座座村屋，居住着多户人家，绕着四周山脚的涧水和从村里伸出的一条条渠水，在岭口不远处汇合，再向山外流去，正是‘万绿千苍拥一村，山环水绕绝尘喧’。从警报频传、人心惶惶的桂林来到此地，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受。”

杨燕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校回忆》（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冯师领导下，学校在桂林开始新的学期，在桂林招收了一批新生。上课才三个多月，时局突变，桂林当局通知疏散，当即决定把学校迁到北流山围。原籍广西的同学先行返家，等候通知，我等约二十人随迁山围，不失时机地先在冯师的‘沙梨院’上课，以后物色了十多间平房，作为教室和宿舍。同时通知返家学生速来北流复课。开始约有

三十余人上课……”

钱仲联《避乱北流山围乡冯振心先生家有作》（见《梦苕庵诗文集·梦苕庵诗存》）：“借得西山自倚楼，全家暂为白云留。祓除兵气千峰外，刻画诗城二鸟囚。十扇窗应通水月，一村绿不识冬秋。飘零乱代余能到，翻觉乡关逊此州。”

国专师生到达山围后继续上课，把在桂林仅读了大半学期的课程继续授完。教师有冯振、钱仲联、蒋庭曜和郑师许（原名沛霖，字惠侨，一八九七～一九五三）等人。其中冯振讲授《论语》和文字学，钱仲联讲授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史，蒋庭曜讲授国学常识和书法，郑师许讲授抗战史料和中国文化史。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校借用离居民点约一里多路傍山建筑的一座农庄作为校舍。二十余间房屋，略加修葺，就开学上课。教师有冯振、钱仲联、蒋石渠、郑师许等，学生有四十余人，把在桂林仅读了大半学期的课程继续授完。”

李立德《无锡国专迁桂回忆录》（见《无锡国专在广西》）：“在抗日烽火弥天的日子里，无锡国专几经转折，迁来桂林，后来桂林吃紧，于一九三九〔八〕年冬天，被迫搬迁到北流山围村……一九三九〔八〕年，日寇飞机开始猛烈轰炸桂林，所以国专被迫迁来山围。这个村庄，四面高山围绕，山青水秀，磐石山屹立村前，‘一峰独秀碧无俦，中有千岩万壑幽’。石岩河、滑石河会合于磐石山下，风景实在幽美极了。这一带田畴万顷，粮食、蔬菜产量丰富，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那年春节，冯振代理校长的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好山磐石固，大树我家春。’国专迁来山围容村后，一部分师生住沙梨园，那是冯校长的家，大部分师生住在一间借用的绿竹

居的田舍。屋主是冯校长的族侄。绿竹居是建在柑果园内的田舍，主人将一部分房子腾出来，借给国专用。这里房子不大，正屋一厅两房，旁边有几间小屋子，这些房子是农产品储藏室、农具室、柴房、厨房等。当时，学校设备简陋，居此山村，木材易买，课桌是临时制作的长台，凳子是长板凳。这些桌凳，制作结构简单，上面一块长木板，下面四只脚。屋舍前有一条小溪，饮用水和游泳都很方便。屋子小，当时学生人数虽是不多，但也够挤的。国专迁来山围时，随校搬来的图书不多，老师上课的教材及参考资料，学校都设法帮助解决。一方面是老师自己携带的书籍，另一方面，借用冯振代校长家里的藏书和他叔父冯介、族兄冯赞廷家里的藏书（冯介父系清朝进士，冯赞廷父系清朝举人）。学生的课本，除了学生自己找得一些外，主要是作笔记，必要的教材用油印。因为抗战，蜡纸、油墨很难买到，就是白报纸也很短缺。在学校里学习生活很艰苦，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健康，注重体育运动。当时村里小学有篮球场，但买不到球类，要打篮球、乒乓球是很不容易的事。学校则聘请一位拳师教学生拳术，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自卫防身。”

覃宝峰《深切怀念冯振代校长》（见《无锡国专在广西》）：“我受业于冯老夫子，是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正当无锡国专从桂林迁到北流山围和萝村之际，老夫子既当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又当教授。亲自讲授《论语》、《文字学》……老夫子办学很注意教学质量。他认为培育人才，就要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学生要依靠名师指点，他很注意招聘国内闻名，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学。例如……钱仲联教授应邀讲授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史，前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师许教授应邀讲授抗战史料和中国文化史……蒋庭曜教授讲授国学常识

和书法。”

无锡国专南京校友会《怀念冯振心先生》（见《冯振纪念文集》）：“郑师许教授，抗战前曾和冯先生、蒋石渠先生同在交通大学任教。冯先生担任桂校代理校长后，曾请郑担任训育主任。根据教育部规定，训育主任必须加入国民党。郑先生表示自己曾在勸勤大学参加国民党，教育部不应该再命他加入，愤而辞职。经冯先生挽留，在桂校任专职教授。二年后，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历史系主任，始离校。”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国专桂校

本年年初至约五六月间，国专桂校仍在广西北流县山围村办学。

农历戊寅年底，无锡国专第十八届学生毕业，毕业生计有文平泉、朱为济、林貽楷、袁克栋、奚干城和杨燕廷等六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审，并向广西省教育厅申请对毕业学生的工作安排，都先后顺利解决。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山围确实是块宝地。先说它的环境幽美，老画家黄宾虹的山围八景如‘丹岭俯青畴，村烟远树浮’、‘众壑水争喧，分流绕果园’完全是写实。在冯先生住家‘沙梨园’的西侧，就有一条不小的水流，汨汨的清泉终年不断，流向果园、农田，夏日累累压枝的荔枝，冬日一片红熟的橘林，显然是个土地肥沃盛产名果之乡。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个半月，包括阳历新年和旧历春节。搬来后在冯先生的‘沙梨园’和随来的学生先是上了一个多月课，在旧历年底把学完课程应届毕业的（第十八届）杨燕

廷、奚干城等六位同学送走。学校向教育部报审，向广西省教育厅申请对毕业学生的工作安排，都先后顺利解决。当时我和钱仲联、蒋石渠两教授住在冯先生家的藏书楼里，楼前宽约三米的走廊，权充教室。在长廊南侧空地上盖了两间简屋做厨房，修缮了一个厕所，腾出两间屋作为学生宿舍。花费不大，但都是冯校长自己掏的钱。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过渡的第一阶段。师生们在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高高兴兴地过了个愉快和安宁的春节。”

杨燕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校回忆》（见《冯振纪念文集》）：“……即将毕业的有流亡学生奚干城、广西籍学生文平泉、朱为济和我四人。当时冯师将毕业生情况报告教育厅，请为分配工作，教育厅很快将我分配至省立田西师范学校任教，并被任为班主任，授语文和教育概论课程。奚干城也被分配担任教师工作。我在田西师范教了三年才转贵阳国立铜仁中学任教。”

旧历新年后，经商量，借用冯振族侄冯建侯的庄园作为校舍。二月，就近在北流县和容县招生，收男女新生三十余名，一律初中毕业学历，读五年毕业。加上从桂林来的旧生，同时正式通知在桂林疏散返家的学生来校复学，开学注册的人数达到六十人左右。在上课后的一个月连续不断返校的人数，远超过预计的七十人。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过了旧历年，先生就和他的族侄‘绿竹居’主人冯建侯商量，借用他暂时空置的积谷和贮存农具的庄园。贤主人一口答应，并且不要租金。我还记得一厅两室前后三进，还有侧屋，农具间、柴房、厨房、浴房大小约有廿间房屋。先生带领我去勘察后十分

满意，估计容纳七十名学生不成问题。大家感到很高兴，特别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好，孤零零的庄园坐落在山围的东北角，离居民点容村约一里多路，正南向，屋左和屋后都紧紧傍山，丛林茂密。屋右四五十步，是条溪流。汇集山泉，终年不断，绕着山围中的良田美地一大圈，再流出山外，真是‘山环水绕绝尘喧’。屋的西南角有一座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小小鱼塘。屋前的晒谷场，用三合土夯制得十分平整，和水泥浇注的一般，足有两个篮球场大小，是再好不过的运动场。生活用水，就从后山把一股悬泉用竹管连接起来，引进厨房和浴室，既清洁又方便。在大山村寨中能找到这样理想而又不花钱的校舍，真是难得。一九三九年二月，就近在北流、容县招生，收男女新生三十余名，一律初中毕业学历，读五年毕业，加上从桂林来的旧生，同时正式通知在桂林疏散返家的学生来校复学，开学注册的人数就达到六十人左右。上课的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返校的人数竟远超预计的七十人。女同学除家在容村的外，其他几位就住在先生沙梨院家里。考虑到下学期招收新生，增加新的班级，校舍无法容纳，不得不作迁往萝村的打算。这段时间，可说是迁校过渡的第二阶段。”

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在“私立各校”中，截至制表时为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带来的财产损失按呈报数为二万六千元（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转引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编报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

约在六月之前，因学生人数增加，校舍无法安排，学校由山围迁往原无锡国专教授陈柱的家乡萝村。萝村距山围约二十里，学校借用陈氏宗祠作校舍，比山围校舍宽敞一倍以上，另

外租用三座二廊房民屋和部分居民房作为教工学生宿舍。

严庆添《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校舍不敷应用，九月，又迁至××，赁陈姓宅为校舍，幽静宏敞，修完补葺，略具规模。”

按：《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载录于《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一书。此书出版于抗战时期，出于保密的考虑，书中的一些地名，多用“××”代替。上段引文中，前一“××”为山围，后一“××”为萝村。

又按：上段引文和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文都记国专桂校迁到萝村的时间是在本年九月，但教育部参事孟寿椿于本年六月九日抵达国专桂校视察，在他后来写的《视察报告》中记“六月九日，抵达该校所在地之萝村”，说明国专桂校迁往萝村的时间应在六月九日之前。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由于桂省各地学生接到通知后来校复学，加上招收的新生，人数骤增了一倍多，校舍无法安排，因此在维持上课的同时，又作迁移萝村的准备。一九三九年秋季，学校迁到萝村开学。萝村在山围西约二十里，也是大山中的一个居民点，村前岗峦起伏，后倚六万大山，绿树葱茏，盛植荔枝。借用宗祠作校舍，比山围校舍宽敞一倍以上，另外租用三座二廊房民屋和部分居民房作为教工学生宿舍。”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

“萝村西距山围约二十里，先生和我前去勘察萝村的陈氏宗祠，宗祠气派不小，我们在荔枝丛里穿过居民点，向村西走数百步就到了。

占地不下四五亩的大祠堂，坐北朝南，前后三进，高大宽



敞的厅堂和左右厢房，若逢盛会，可供二三百人食宿。祠堂左侧有一大鱼塘，屋前屋后茂盛的荔枝树环抱着。远看就像一片荔枝园，房舍掩映于浓阴中……有此充当校舍读书，满目青山，鸟语花香，琅琅的读书声，和不远处一条大河的流水潺潺及古老的水车唧呀声相呼应，可以想像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读书好去处。

以上是出生于萝村的陈三百学长给我信中所描述的一小段。我特别欣赏祠堂前那个池塘（陈函说在祠左），真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实际上池子大约有一亩多大）。用朱熹这首诗来描述，再贴切不过的了。山泉缓缓流入池塘，再从另一头缓缓流入渠道，通向农田。清澈的池水，映出天光云影山色，令人的心情也同样清澈。进入宗祠大门，迎面是一个铺着石板的大院子，大到尽可容纳上百学生做早操。院子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月亮门，进门就见南北对称的三间花厅，厅前各有一块相称的天井（空地）种植花木。中间有道隔墙，使互不干扰。厅前有回廊，连接两厅。这设计很有特色。其后我和冯先生各占南北向花厅的东西二间，中间一间作会议室，北向花厅就由教授和他们的家属居住。院子另一侧的六间花厅就作为女同学宿舍。正对大门和院子的是三间大厅，用作礼堂。两侧各有三间侧屋，用作教室。第二进就是百余人住的男同学宿舍。第三进是食堂、厨房、储藏室、工人住房等（仅厨房和热水房作了些改造）。所以第一次来勘察就非常满意，当时即使增加一倍学生，也足够安排。其后，学校在萝村办学二年，人数达到二百多人，才又租用了一些民房，安顿教师和学生。在万山丛中，能有这样条件好的房屋作为校舍，确实出于意外！非但屋宇完好，不须修理，不要租金，还能借用祠内的部分椅桌等设备。

对所有陈氏族入如此的支持国专迁校，如此重视中华文化事业，实在令人敬佩！当然，另一个缘因是由于萝村的陈柱尊先生是早期国专教授；还有一批出生于萝村，后来成为国专早期校友的，他们在广西甚至国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影响所及也是起作用的。萝村两年办学，使迁校站定脚跟，为以后的建校桂林穿山，奠定了基础。”

冯振《国专自山围迁萝村上课寄柱尊上海》（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行行廿里向萝村，千树荔枝绿到门。闻道主人仍远客，可容无佛暂称尊。招邀硕彦同都讲，罗列英才细讨论。惜取君家好风月，归来何日共清樽。”

六月九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派参事孟寿椿（字滋荣，一九九五～一九五四）抵达萝村，对国专桂校进行视察，计在该校工作三日。其间，性喜作诗的孟寿椿与国专桂校国风诗社的成员们时相酬唱赠答。孟寿椿在后来写成的视察报告中，称“该校精神方面，足称苦干，但物资方面太觉贫乏。一切设备，均属因陋就简，假若所研究者非为国学，决难成一学校局面。而全校师生尚能互相维系，求精神上之满足，孳孳讲学，惟日弗足者，未始非寝馈国学，究易服膺前哲遗训，有以致之。中国文化之伟大，于此又可获一显证”。同时针对国专桂林办学经费上的极度困难，报告中呼吁应对其加以救济，增加补助费用。

孟寿椿《视察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报告》（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见《教育部派员视察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报告及有关文件》）：

“视察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既毕，六月二日，乃由柳州首途赴北流，视察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六月九日，抵达该校所在地之萝村。计工作三日。除视察该校一般情形外，并于纪

念周对该校全体学生训话一次，召集该校教职员谈话一次，又出席该校最富于研究兴趣之国风诗社讲演一次。兹将视察情形依次报告如左：

（一）校舍及环境

该校现分沪、桂两校，沪校由校长唐文治主持，桂校则由教务长冯振负责办理。校址位于北流县城东廿余里之萝村，山明水秀，清幽宜人。校舍系租赁民房，虽非宽广，但以学生人数不多，差可敷用。其旁有祠堂数所，足资扩充，且以地处山隙，无空袭之扰，讲学环境，殊觉佳良。

（二）学校行政及经费

1. 学校组织及会议 详该校组织大纲及组织系统表。惟现因经费极度支绌，未能设置完备。教务主任之下，只设图书室主任一人，教务员一人。总务主任之下，只设事务员一人。训导主任之下，则由各导师共负训导之责。会议有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导会议等。

2. 经费之支配与支给 该校自迁桂后，原有江苏教育厅补助费、经济校董常年捐款、校产租金，均已全数断绝。即国库补助费，亦由每月二千元折至一千二百六十元，与沪校各取半数，桂校每月只得六百三十元。学生学杂费，每学期每人收三十六元。除战区学生免缴外，每学期以五十人计算，应得一千八百元。连国库半年半数补助费三千七百八十元，共得五千五百八十元。以六个月平均，每月只得九百三十元。教职员俸给已占七百元。此外增置校具、印刷讲义、火油消耗、战区学生救济费、校役工膳等项，所费甚多。连月亏空，不特无力增进设备，即维持现状，已感万分困难。

3. 事务之管理 该校仓卒迁桂，由长沙而桂林，由桂林而北流。流离转徙，校具直等于零。年来虽逐渐添置，终属简

陋异常。职员既少，而又远隔城市，日用所需，均难取具，故事务管理上，呈现琐碎而复杂之现象。虽各主任亦不得不自行办理一切杂务，殊为遗憾。

(三) 课程及教学

1. 部颁科目表之施行 该校所开各级科目均经呈部核定。

2. 战时教程之实现 民族文学、抗战史料两科，已遵照部令增加，并添开国防地理。

3. 各科课程纲要之拟订 三年制各科课程纲要早经拟具。五年制新增各科课程纲要，现已拟订就绪。

4. 各科学业考试情形 每学期举行定期小考两次，期考一次。其不定期个别口试，或全体习练，视各科性质酌量参用。

5. 学术研究情形 学术研究空气尚浓。已成立研究会者，计有国风诗社、书法研究会、史地研究会等。由学生各就性之所近，自由参加。由专任教师负责指导。

(四) 关于训导者

1. 导师制之实施 将全体学生用抽签法分配于各导师(如学生甲乙二人双方同意，亦得于分配时互易导师)，大致尚能依照导师制施行细则推行。

2. 实行新生活运动及精神总动员情形 学生生活情形，堪称朴实无华。除早操、朝会、纪念周外，并按期举行月会。

3. 推行社会服务、劳动服务情形 成立民众教育馆一所，平民教育班三级。利用假期作抗建宣传，并发动征求伤兵之友，成绩颇佳。

4. 体育卫生设施 该校以经费不充，体育设施至感缺陷。惟尚能切实注重早操，鼓励学生常作远足、单车、骑马、爬山、射猎、游泳等练习，以替代田径运动。饮食尚属清洁。扑

灭蚊蝇运动虽间亦举行，则以环境关系，殊难见效。

（五）结论

该校精神方面，足称苦干，但物资方面太觉贫乏。一切设备，均属因陋就简，假若所研究者非为国学，决难成一学校局面。而全校师生尚能互相维系，求精神上之满足，孳孳讲学，惟日弗足者，未始非寝馈国学，究易服膺前哲遗训，有以致之。中国文化之伟大，于此又可获一显证。惟该校现状，既若是其困难，若不加以救济，增加其补助费，殊难继续发展。该校当局尚有扩充计划，下期拟增招两班学生（三年班三十人、五年班五十人），除现缺之外史外地教员亟待增聘外，其校舍之扩充，教员待遇之须略为提高，图书及体育设备之须改进，均为当务之急……”

按：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文说孟寿椿到国专桂校视察的时间是在“该年年底”，误。孟寿椿在视察报告中对视察时间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六月二日，乃由柳州首途赴北流，视察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六月九日，抵达该校所在地之萝村。计工作三日。”而“该年年底”是他向教育部递交视察报告的时间。在孟寿椿递交视察报告后，教育部给国专桂校下达训令云：“该校前经本部派员视察，据报该校校址环境尚佳，学生生活朴实无华，学术研究空气亦尚浓厚，虽体育设备缺乏，尚能切实注重早操，鼓励学生常作远足、单车、骑马、爬山、射猎、游泳等练习，以替代田径运动。全校师生具有苦干精神，洵堪嘉慰。惟该校经费过于支绌，应即设法增筹。对于图书及体育等设备，应谋充实。教员有尚未聘齐者，应设法延聘，并酌予提高教员待遇。过去对于事物管理欠有条理，应再注意改善……”

严庆添《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校除学生会

外，一共成立了三个团体：国风诗社、史地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最走运的是国风诗社，开成立大会那天，导师吕方子先生备办茶点，假座樟山园（村中最雅致的私人别墅）招待社会，名曰雅集。不到几天，适逢教育部参事孟寿椿先生到校，恰巧他也是一位诗人，曾即席赋诗勸勉诸同学，国风诗社社员都依韵和了起来。翌日，假座校内大礼堂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酷暑之下，孟先生挥汗讲了两个钟头的诗学问题，讲毕又是茶点，茶点毕孟先生又即席作了两首谢诗，同学们也有即席奉和着，情况之热烈，可说一时无两。”

七八月间，国专桂校就已在本年春季招的五年一贯制的班级向教育部申请核准，教育部不久即正式批复核准。

严庆添《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民国）二十八年七月，根据全国教育会议议决案，呈准教育部，除原有三年制外，添招初中毕业生，试办五年制，分南宁、容县及本校三处招生，投考者颇为踊跃，共录取新生五十余名。”

按：一九三九年三月，教育部为讨论抗战时期教育实施方案，在重庆川东师范大礼堂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会上提出“高等教育阶段内，除原有二年制及三年制专科学校外，另设五年制专科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及具有初中毕业同等学力之学生”一案，经会议审查后，通过了“对于现行专科学校制与五年新制并行的原则，认为可以成立，惟对于艺术及音乐两科，今后必须一律改为新制，其余各科，何者愿采新制，何者仍可适用旧制，应请教育部约请专家，详细审议后决定”的决议。这是国专桂校向教育部申请开办五年制专科班得以核准的基本背景。又，前引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文中提到本年二月，“就近在北流、容县招生，收男女新生三十余名，一律初

中毕业学历，读五年毕业”，而严庆添文给人的印象是本年七月又曾“添招初中毕业生，试办五年制”。实际上是在本年二月份先添招五年制生，到七八月间再向教育部申请核准。对这种“先招生后申请”的做法，王桐荪文中有较为详尽的说明：“学校迁到山围容村后，不久就面临招生问题。按当时教育部招收高中毕业生的规定，要招收足额，事实上有很大困难，但因战事影响，失学青年不少。他们一般都具有初中毕业水平。因此国专除原有的三年制外，就决定在一九三九年春季开始招收初中毕业生，试行五年一贯制的方案。先在北流、容县两地试招新生。投考学生很踊跃，一次就录取了约三十名一个班级的学生。这就是一九四四年春在桂林毕业的五年制第一届学生。招生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向教育部申请核准，以后才把不得已开设新班的缘由呈报，陈述的理由大致是：①过去国专面向全国招生，学生籍贯包括十八个省区，目前僻处桂省一隅，生源有限，至于黔、滇、川、湘省学生，在这战争年代，不可能千里负笈来学，生源受到限制。②桂省南部地区，初中毕业后，无法升学、无法就业的学生极多，招收后就读五年，以二年充实其国学基础，三年读本科课程，既较招收高中生省去一年时间，而二年基础训练可免读数理化课程，专心文史一科，肯定会比高中毕业生的国学基础打得扎实。能收到加速培养国学人才的实效。③我校素重德育，又是以专门研究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值国难严重，培养年轻人爱国思想，发扬民族气节，为抗战胜利后预储建国的文科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与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对抗战期间，因战争原因而半途废学、停学、转学、借读、停学后续学等学生应予照顾的精神亦相符合（按：教育会议的具体内容，现无法查考）。开办五年一贯制，当时还无先例，但教育部对本校克服种种困难，

在抗战时期坚持办学，申请开办五年一贯制的方案不能不予以考虑，理由也符合实情，对先招生后申请，也没有挑剔和指责。很快，就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正式批复核准。这件事是国专探索培养人才学制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应该大书特书，予以历史的肯定。可惜的是国专在抗战胜利复员回无锡后，五年制仅毕业了两届。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国专与他校合并，国专独特培养专业人才的方式就随之消失了。”但两文中所记招生人数，一为三十余名，一为五十余名，尚待进一步核查。

暑假后开学，已有学生百数十人。在此前后，增聘无锡国专第三届毕业生陈千钧（原名起予，一九〇四~？）和封鹤君（名祝祈，字鹤君，以字行，一八七六~一九五九）、吕集义（字方子，一九〇九~一九七九）等人为国专桂校教师。其中陈千钧讲授散文，封鹤君讲授唐诗，吕集义讲授诗词。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学时有学生百数十人，教师增聘陈千钧、封鹤君、吕集义等人。”

庞心逸《抗日期间无锡国专迁桂回忆》（见《无锡国专在广西》）：“陈千钧老师，是我班的导师，一直教散文。男低音，朗诵课文时，南方的音调，高、低、抑、扬，和课文的思想感情揉和在一起。如读《陈情表》、《浣岗 [冈] 阡表》，他会引发同学对母爱的怀念，从而征发出内心的孝思。”

冯振《封鹤君前辈来国专校任教得尽读其诗集敬题一律》（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邕州一别五寒暑，回首前游真可怜。百里肯来寻旧约，孤灯相对许忘年。谁知江汉栖栖客，曾镇胡沙莽莽边。留得篋中关塞集，将军白发句同传。”

庞心逸《抗日期间无锡国专迁桂回忆》（见《无锡国专在广西》）：“吕方子（集义）老师，教诗词不拘一格，他才情横溢，在萝村时旧教育部派来一‘视察员’……吕老师接待他，

两人策马而行，酬唱和吟，吕老师才思敏捷，马上得诗……”

按：上引王桐荪文中叙及陈千钧、封鹤君和吕集义为本年暑假后开学时所增聘，实际上，这三人受聘在国专桂校任教的时间应该是有先有后。上引严庆添《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庞心逸《抗日期间无锡国专迁桂回忆》两文都述及孟寿椿于本年六月来国专桂校视察时，吕集义暨桂校国风诗社学生与之吟诗唱和，则吕集义应于本年上学期时已在桂校任教；而冯振《封鹤君前辈来国专校任教得尽读其诗集敬题一律》一诗在《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中，系于一九四〇年中，故封鹤君在桂校任教，当亦是在一九四〇年。

国专沪校

上年六月底，因年事已高且水土不服，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向教育部请假回上海治疗并获批准。经一路辗转，唐文治于七月十日回到上海。因避难奔波，困顿过甚，兼发劳伤，唐文治于上年近冬至时节患病在床，至年底方始渐渐痊愈。得悉唐文治校长回沪的消息，江浙一带的一些没有随迁桂校的国专学生纷纷表达了希望在上海复校的愿望。在唐文治生病期间，无锡国专第十四届毕业生卢景纯（字伯雅，生卒年不详）常至其家，与陆修祐商议复校事宜。至本年二月，议定借康脑脱路（今上海康定路）通州中学作为校址，通州中学上午上课，国专下午二时后上课。学校确定聘请王遽常为教务主任，卢景纯为事务主任，陆修祐任秘书兼助教，沈苏儒（一九一九～）为教务助理，姜谋生（生卒年不详）为缮务；教师有唐文治、王遽常、陆修祐、张世禄（字福崇，一九〇二～一九九一）、郝昺衡（又名秉衡，字立权，一八九五～一九七九）等人。卢景纯等人在康脑脱路的旦华学校内租了办公室着手筹备工

作，包括复学学生的登记和招收新生等。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戊寅七十四岁》：“（六月）二十八日早六钟，四儿妇挈孙孝威等先启程，临别怅然。十时半，余夫妇动身，景周同行，振心因回北流，亦偕伴送，舟行六塘，每塘十里……（七月）十日午刻抵上海，拥挤不堪，人声喧闹，高福扶余走软梯而下，尚不困难，即乘小轮至新关码头，陈柱尊、陆揖文、崔云潜等均在码头迎接，余偕内子赴沧州旅馆暂住……（八月）廿日飭高福回锡。高福返沪，报告家中房屋书籍无恙，衣物损失约十之六七；茹经堂附近宝界桥被轰断，宝界饭店等均炸毁，茹经堂幸无恙，器物损失约十之三；黄宾虹名画、瓷器为日人窃去，寄存许生岱云家各物幸无恙。不胜沧桑之感……十一月近冬至节，余患病，热度一百零三度，请表侄朱继莘诊治。打针后，热势渐退，惟因避难奔波，困顿过甚，兼发劳伤，疲惫不能起床，至年底渐就痊。”又《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己卯七十五岁》：“去冬通州旧同学卢生景纯，议兴复国学专修学校。方余病时，常来与陆君景周商酌。至二月间议定，借康脑脱路通州中学作为校址。通校午前上课，吾校下午二钟后上课，乃聘嘉兴旧同学王生瑗仲为教务主任，景纯充事务主任，景周仍充秘书兼助教，并请嘉兴沈君苏儒助理教务，昆山姜君谋生仍来充缮务。”

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家[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

黄汉文《〈无锡国专杂忆〉补正》：“一九三九年，唐校长



徇江浙学生之请在上海设立分校，仍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旧名（对外称上海分校）招收新生。《杂忆》提到的‘遂改名“私立国家[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略军侵入旧租界以后的事。”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唐先生在上海南阳路定居，身体也逐渐恢复……校友和因战乱失学的国专学生，到南阳路寓所探望校长。学生希望国专复校，继续求学。当时苏浙一带的大、中学，在旧租界赁屋上课的，已经很多。也有新办的院校，以文科而言，就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等办的太炎文学院。唐先生与校友们研究，教授的问题容易解决，专任教授虽然聘不到，各种课程的兼任教授是可以聘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校舍。校友卢景纯（南通人）说，自己在教育界熟人多，同乡多，租几个教室还是可以的，文科性质的学校，大多数课可以在下午或星期日上。现在不但大学如此，中学也有半天上课、半天各人回家自学的。只要校长同意变通一些，借一、二间基本教室，大多数课可放在别校学生放学以后上。学生们认为在抗战期间，只要能读书，条件艰苦些也要坚持。唐校长同意了卢景纯的建议，并指定他负责租屋及一切准备工作。卢景纯等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的旦华学校内租了办公室着手筹备，复学学生的登记就是在那里办的；一面与通州中学联系，暂借教室，那怕只借一学期也好。唐校长囑陆景周备文呈报远在重庆的教育部，在沪复校，以便学生复学。教育部同意设立‘上海补习部’。在筹备复课时，感到即使只有少数复学学生，行政各部门还是要配备一定数量的职员，不如招一班一年级新生。这时，唐校长已聘请王蘧常教授担任教务主任；将招收新生的打算，呈报教育部，也得到批准。国专沪校就在二月中旬招考新生，定期在通州中学上课。这时各校都已开学，而且

是春季招生，所以报考者并不多。教师有唐校长、王蘧常、陆景周、张世禄、夏承焘、郝立权等八人，学生有五十九人。”

按：夏承焘并非是在国专沪校刚开校时就受邀任教于该校，而是要到本年四月间，详后文。

三月三日，国专沪校正式上课，从此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桂校”与“沪校”并立的时期。其时共有学生五十多人，唐文治讲授《诗经》、《论语》两门课程，王蘧常讲授诸子概论等课程，张世禄讲授音韵学等课程，郝昺衡讲授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己卯七十五岁》和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陆修祜除任唐文治秘书兼助教外，还给学生讲授《孟子》研究、《左传》研究、《公羊传》研究等课程。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陆景周先生是我一年级时的导师，他对我特别关心。因为我刚住进校外宿舍时，他就住在隔壁房间，晚上常常随便谈谈。唐校长和他私底下的谈话，他从来不轻易外传。只有在喝了一点酒，微醺时才偶然谈些。他相信我，也就把我作为谈话的对象。他也像校长一样，欢喜‘隐恶扬善’，偶而讲别人的缺点或丑行，从来不讲姓名。你如果追问，他就什么也不讲了。我熟知他的为人，在这种场合，从来不追问，所以他认为‘孺子可教’。我曾听过陆先生讲的《孟子》研究、《左传》研究、《公羊传》研究。有一次他和我边饮边谈（这时我已毕业，留校工作），要我议论他的课。我带了些酒意，谈起来也就不拘师生之礼了。我说：‘陆先生，你教的《孟子》，没有超出校长所著书的范围；《左传》研究课上，你讲了不少自己的体会，但别的老先生也能这样讲；至于《公羊传》，本来就不容易讲，你不但能和《左传》、《谷梁传》比较研究，引用了古注和清代的讲说，还参

用了近代的新说，对我很有启发。’他很满意自己对《左传》的研究，听我这样讲，有点不太高兴，也就谈别的事了。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细细想想，你昨天的话是对的。对于《左传》，我花过不少功夫，但对近人的研究心得，没有重视。至于《公羊传》，是当了校长的秘书后开始接触的。唐校长教导我，《公羊传》是今文家言，不同于他书，要特别注意。后来蒙文通到无锡来讲学，讲佛学，也讲今文学。唐校长对我说，蒙先生虽比你年轻些，他对今文学颇有研究，对你的《公羊传》研究，可能有“他山之助”。我领会老师的意思，与蒙先生作了深谈。一个人只要能虚心，即使年纪老了，学问方面也可以有进展。’”

三月二十日，唐文治就国专沪校复课事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请求核准。教育部不久批复，以上海国专作为“补习部”，而国专桂校作为其本部的地位不变。

唐文治《呈为救济青年失学在沪复课请赐予备案由》（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窃本校长自上年七月间在桂林暑期结束，因请假回沪，呈蒙钧部核准在案。兹据教务主任冯振函称：自桂林局势紧张，业经迁避北流山围，呈报钧部备案。而本校南中各地旧生失学、旅居沪上者为数不少。屡经环请在沪复课，以资救济。爰再三审度情形，北流方面，情势至为严重，所有旧生无法前往，而沪上如光华、复旦、大夏等学校，内地及上海两地同时上课。因商同校董议定，租借上海公共租界小沙渡路八五〇号为临时校址，业经于三月三日正式复课。现有新旧学生四十八人，另有通函在途续来者。一面并知照北流迁校照常维持。一俟时局救平，再行合并办理。除学生履历名册续行呈报外，谨将在沪复课缘

由，先行呈报钧部，赐予备案……”

按：教育部批示云：“拟准仿复旦、大夏例，以上海分部为补习部分。”无锡国专在上海复校后所用的校名，上引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文中说是“私立国学专修馆”，对此黄汉文《〈无锡国专杂忆〉补正》文中已予以辨正。教育部的批复中规定以无锡国专的上海部分为“补习部”，但在唐文治《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及国专师生后来的文章中，极少见到使用这个称呼，一般都称其为“无锡国专沪校”、“无锡国专上海分校”，或仍径称为“无锡国专”。

四月，夏承焘（字瞿髯，一九〇〇～一九八六）应邀到国专沪校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韵文选等课程。

按：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之记载，本年三月间及四月初，作者曾三次去国专沪校听唐文治讲《论语》，三月六日的日记中并记：唐文治时“已七十五岁，双目尽盲，犹扶持来讲学，诚所谓以身教者。五时归，辄觉即事多欣。久不闻义理之言，沉涵于琐碎考证中，得此激醒，无殊天国乐土也。”三月三十一日日记中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邀予演讲，今日以讲题交瓊仲，曰《唐宋词演变之背景》。”四月七日，接到王遽常邀其任课的来信；四月九日，“排定授课时间，星期三文学史三小时，星期五韵文选二小时”；从四月十日起，即正式开始到国专沪校授课。本年上学期的课务结束后，夏承焘因自己的研究工作繁忙，曾想“下期当摆脱太炎文学院及无锡国专功课，期稍有成就”，但在八月十四日送还国专沪校下学期聘约后，王遽常再次竭诚相邀，于是在本年下学期继续任教于国专沪校。又《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条下记：“接冯振心桂林穿山无锡国学专校函，邀余下期往教，月薪七百元，白米百市斤，路费一千五百元，现有校

址三百余亩，校舍十余座，学生二百余人，分八班云云。”则一九四三年冯振又曾邀请夏承焘到国专沪校任教，但夏承焘没有受邀前往。

四月九日，胡朴安（学名榘玉，字仲民，又字颂民，号朴安，一八七八~一九四七）应唐文治邀请至国专沪校演讲，讲题为《儒家学说之缘起及其完成与变迁》。

胡朴安《病废闭门记》：“我在脑溢血前十余日前，尚有一事足记者：四月九日，唐蔚芝先生所办的国学专修馆，请我演讲是也。我的讲题，是《儒家学说之缘起及其完成与变迁》，即今年所印的儒道墨学说中儒家学说之缩影，本拟讲二小时，讲一小时半，觉胃内不宁，渐渐如欲呕吐，匆匆结束，途中即忍耐不住，呕吐狼藉，到家寒热交作，延医诊视，寒热愈而神气极疲倦，十余日脑溢血而病废矣。所以演讲稿由国学专修馆送来时，竟不能修改也。

按：上文中说“《儒家学说之缘起及其完成与变迁》，即今年所印的儒道墨学说中儒家学说之缩影”，作者的《儒道墨学说》一书，开首的三篇即为《儒家学说之缘起》、《儒家学说之完成》、《儒家之变迁》。

又按：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条下记“早，往小沙渡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晤王瑗仲、胡朴安翁”，则正是胡朴安来国专沪校演讲之日。又据《病废闭门记》的自序，作者患脑溢血的时间为“（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十六日，吕思勉在国专沪校讲“大同”（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五月二十五日，唐文治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呈文，言明当遵照部令刊刻“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补习部”

图记，并随呈文附报《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沪复课教职员履历表》和《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沪复课学生名册》。据该《履历表》和《名册》，当时国专沪校教职员计有唐文治、王遽常、陆修祐、卢景纯、李续川（生卒年不详）、王绍唐（一八九七～一九七八）、郝昺衡、张世禄、杨鸿烈（又名炳堃，别名宪武，一九〇三～一九七七）、张任政（字惠衣，一八九八～一九六〇）、沈切、崔龙、沈苏儒、黄鍾岳（生卒年不详）、姜谋孙等人，在读学生有钱咏秋、龚其华等五十八人。

唐文治《呈为遵令刊刻图记呈报备查并呈送教职员履历表暨新旧学生名册请赐督察案由》（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行政计划、工作报告和在沪复课员生名册》）：“为呈报事：案钧部吴司长于四月二十五日自香港寄来第九四〇五号函，开：本校一部分在上海复课，部中已姑准备案，惟上海部分应称为补习部，另刻补习部图记报部备查。等因奉此，即当遵照刊刻，文曰：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补习部。图记合行呈报备案，再本校在沪复课教职员履历及新旧学生名册呈报钧部督察……”

按：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沪复课教职员履历表》（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行政计划、工作报告和在沪复课员生名册》），当时国专沪校教职员计有唐文治、王遽常、陆修祐、卢景纯、李续川、王绍唐、郝立权、张世禄、杨鸿烈、张惠衣、沈切、崔龙、沈苏儒、黄鍾岳、姜谋孙等人。又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沪复课学生名册》，当时国专沪校的在读学生有钱咏秋、龚其华、钱韵兰、朱毅、胡一德、郭文衡、闵世基、杨向时、吴文殊、唐志轩、张怀民、黄惟恭、李德峻、夏寿铭（以上为三年级）、周宇澄、王璧、邓蕙、孟



同、缪杰、金悉经、何祖述、柳义南、谢伯康、周企任、秦履直（以上为二年级）、陆心国、徐韞珍、赵承甲、胡希文、匡汉拯、袁鉴清、孔庆延、钱继祖、宗元、严古津、陈树奇、李兆熙、林殷、叶彩祺、袁炳坤、张庆、彭家杰、李承之、陈三百、卢晓德、秦翔、倪南龙、曾松年、石乐山、管毓德、吴润仙、何祚忻、吴雯、朱人琰、于秀芳、张惠民、顾菀若、陈倓（以上为一年级）等人。

五月二十九日，无锡国专第十五届毕业生、时在国专沪校任职的崔龙（字云潜，生卒年不详）与第十六届毕业生、无锡国专前教授陈柱的侄女陈荔英（字励行，生卒年不详）结为夫妻，崔龙出文五十篇，陈荔英出诗五十首，由同学史渭南、钱君白、韩宝荣、戴传安、洪长佳将其合刊为《潜励斋初稿》，以为“嘉礼告成之纪念”。

唐文治《潜励斋初稿题辞》（见该书卷首）：“岁躔己卯，孟夏吉日，武进崔生云潜与北流陈生励行行合卺礼于沪之滨。崔生出文五十篇，陈生出诗五十首，合印作纪念，来征弁言。二生均受经于余，爰说葩经以为贺：《关雎》人伦之始，寤寐求之，云潜既赋之矣。而《关雎》之三为《卷耳》篇，励行之自桂来沪也，间关数千里，跋涉艰难，‘嗟我怀人’之什，不为励行赋，转为云潜赋；‘酌彼金罍，惟以不永伤’，非《关雎》之不伤乎？励行文学通雅，采蘋采蕪，用昭忠信，有斋寄女，当为励行赋矣。《既醉》之五章曰：‘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云潜足以当之。其八章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郑君谓女而有士行者，当生贤智子孙以随之；励行无愧士行，他年子孙其逢，寢炽寢昌，未可量也。‘凤皇于飞，和鸣锵锵’，‘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敬摘吉语，用作贺辞。茹经唐文治谨题。”

按：《潜励斋初稿》，一九三九年排印本，正文前分别有崔龙自记、沈恩孚及唐文治题词及史渭南序。全书收崔龙文五十篇和陈荔英诗五十首。在崔龙的五十篇文章中，像《常熟徐先生墓志铭》、《唐茹经先生政治学自序》、《先师太仓朱先生诗评手迹跋》、《太仓唐先生万言疏稿手迹跋》、《陈柱尊先生藏太仓唐先生试卷手迹跋》和《太仓唐先生万言疏稿手迹重跋》等都是和无锡国专研究及唐文治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

六月下旬放暑假。国专沪校设立暑期班，唐文治为学生教授读文法（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己卯七十五岁》）。

本年秋，国专沪校迁到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三百三十六号，借用稽山中学上课。除原有教师外，又聘请周予同（原名毓懋，学名豫桐，字予同，以字行，一八九八～一九八一）、葛绥成（又名康林，字毅甫，一八九七～一九七八）等为兼课教授，周予同讲授经学概论，葛绥成讲授中国地理。

黄汉文《〈无锡国专杂忆〉补正》：“……一九三九年秋又迁到戈登路（今江宁路）三百三十六号，借用稽山中学上课。”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三九年秋沪校迁在戈登路（今江宁路）三百六十号上课，这时又聘了几位兼课教授。教我们一年级的，除了唐校长自己教《论语》研究外，周予同先生教经学概论，张世禄先生教文字学，葛绥成先生教中国地理，郝立权先生教中国文学史，几位都是我慕名已久的名教授……周予同先生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教授，高年级同学常到我们班上来旁听。周先生要我们买四本参考书，其中一本他自己写的《经学概论》。但他并没有照书本讲课，而是先讲两个导言：一、经学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二、经学与其他学科。

他讲现代中国的社会属性时，列举了‘次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四种说法，然后下结论：‘最后一种说法最恰当。’他评介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时非常风趣地说：孔子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但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业绩。作为一个政治家太老实了，所以所遇不合。但他却是不老实的历史家，他的《春秋》（假如传下来的《春秋》真是他的原本），是一本政书，不是一个信史。他又说：‘章学成[诚]说“六经皆史”，我不能完全赞同，还是作一些修改的好，就说“六经皆史料”吧。’他分析了当代的汉宋今古文学派，又讲了这几派对现代学术界的影响。有一同学问周先生自己属哪一派，他说自己是‘非汉、非宋、非古、非今的“超经典派”，属于新史学范畴’。我进入国专，第一堂课没有听到‘中国传统文明’，而是打开了眼界。以后对新事物比较容易接受，应该归功于周先生这一年中的教导。我相信很多听过他课的同学，都有此同感。后来听陆景周先生谈起，当时曾两位学生家长写信给唐校长，认为像国专那样的学校，不能容忍周某在课堂上‘大放厥词’。他奉校长之命，有意无意地向同学们了解几位新教授的讲课情况，对于周先生的情况问得特别仔细。唐校长听了他的汇报，毅然表示：‘我们学校正需要周予同先生这样的教授。’”

按：上引黄汉文两文中一云戈登路三百三十六号，一云戈登路三百六十号，待考。

唐文治《送周予同先生赴台湾序》（见《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三）：“予同先生博学多闻，敦善不怠，恂恂乎君子人也。曩岁在国学专修学校教授诸生，宗旨壹出于纯正，与余心心相印。而其识见之卓越群伦，广博无津涯，远出余上。”

九月，唐庆诒应聘在国专沪校任课，讲授中西文学批评、

诗词学等课程。

唐庆诒《忆往录》：“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应国学专修学校之聘，讲授中西文学批评，学生凡二十余人。”

按：除上引文字外，《忆往录》中尚有数条，记录唐庆诒抗战期间在国专沪校任教或兼课的情况：“民国二十九年……九月间，交通大学、国学专修学校开学，余仍往来两校间授课。”“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初旬，南京伪政府中央会议议决，改私立南洋大学为国立交通大学，每月经费二十万元，余因经济压迫，不得已仍蝉联教职，同时在大夏大学及国学专修学校兼课。”“民国三十二年……本年内，余在国学专修学校担任诗词学课程，于诗赋词曲源流，略事研究。”

奚兆炎《唐庆诒：学贯中西的英语大师》：“交大电信工程系校友陈以鸿，一九四二年因学校被日伪接管而辍学，转入当时已迁沪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读。第二年唐庆诒教授诗词学，陈以鸿回忆说：‘先生（按：指唐庆诒）自失明后，上课全凭记忆，只需陪同者搀扶上台，先生抚摸课桌，认定方位，便态度自若，举措从容……讲课时头部的转动和两手的姿势，以及抑扬疾徐，庄谐杂陈，依然显示出演说家的风度。’‘在诗词学课上，先生除了讲授古人作品外，有时要我们交习作。’唐庆诒常将习作优秀者戏称为‘四大金刚’或‘哼哈二将’，以鼓舞学生。”

约在本年中，李长傅（又名李震明，一八九九～一九六六）、蒋伯潜（名起龙，字伯潜，以字行，一八九二～一九五六）到国专沪校任课，李长傅讲授地理课，蒋伯潜讲授十三经概论和基本文选。

陈代光、李萍《李长傅传略》：“抗战初期，为了避免日寇的骚扰，暨南大学及沦陷区的一些学校相继迁进上海租界。

一九三八年以后先生执教于暨南大学，任该校南洋研究馆馆员兼史地系讲师（一九四一年提为教授）……还兼任私立致用大学、立达学园、省立扬州中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史地课。”

黄汉文《甘当绿叶衬红花——记陆景周先生》：“学生匡汉极参加抗日，被敌伪所捕，陆先生知道后，连夜赶到唐家，报告校长。后来唐校长委托王蕴常主任，转托曾经留日的地理教授李长傅，把匡保了出来。”

蒋祖怡《先严蒋伯潜传略》：“一九三八年春，先严应老友蔡巧因、董任坚、周予同等先生之邀，赴沪到大夏大学及迁沪的无锡国专等校中文系任教授，另兼任世界书局特约馆外编审……先严在大夏大学、无锡国专任教期间，讲授‘十三经概论’一课，为配合讲课而开始撰写《十三经概论》。这部书稿，一九四四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汤志钧《我的自传》：“国专的课程除外语外，都是国学，基本文选是蒋伯潜教授教的。”

按：上引《李长傅传略》和《先严蒋伯潜传略》两文，一云“一九三八年以后”，一云“一九三八年春”，但该年中国专沪校尚未开校，所以姑将李长傅、蒋伯潜在国专沪校兼课之事，系于本年。

本年中，徐昂（字益修，一八七七～一九五三）应邀在国专沪校任课，讲授文法、音韵等课。

周远富、王芳《徐昂的汉语语法研究》：“（徐昂）……一九三八年六十一岁起，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史记》课……据《自订年谱》：‘一九四〇年度辰六十四岁，任之江大学《易经》、《诗经》、《周秦诸子》、《声韵学》、《经学通论》、《国文义法》等课；兼无锡国专《文法》、《音韵》等

课。暑假后辞国专课……”

按：上云徐昂“一九三八年六十二岁起，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史记》课”，而徐天倪、张慕慈《徐益修小传》中则说徐昂于“一九三九年兼任无锡国专教授”。一九三八年时国专沪校尚未开校，故当以后一说为是。又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下记“明过明思德家同事会宴，并与心叔诸君过瑗仲，再辞国专功课，为徐益修先生介绍……”，则徐昂到国专沪校任教，应为夏承焘从中推荐介绍，当时徐昂和夏承焘是之江大学的同事。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国专桂校

本年全年，国专桂校仍在广西北流县萝村办学。

本年夏，郑师许辞去国专桂校教职，转赴中山大学任教，国专桂校师生殷勤挽留，未果。郑师许在国专桂校任教期间，又曾推荐谭之良（生卒年不详）来国专执教，讲授地理和历史课程。

冯振《郑师许兄任教国专将及两载突应中山大学之聘苦留不住诗以送之》（见《自然室诗稿及诗词杂话》）：“浮沉沪海多年共，患难南邦两载同。颇信交情非泛泛，如何别话说匆匆。龙蛇合有腾天日，荆棘犹伤满路中。愧我披肝沥胆语，留君不抵石尤风。”

郑永用、郑永芳、郑永乐《勤奋治学 教书育人——纪念先父郑师许先生诞辰一百〇一周年》：“……我们曾亲自见到学生挽留父亲的动人情景。在一九四〇年夏，当时父亲在广西北流萝村担任迁收〔徙〕于此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解放后并入苏州大学）教授。这年夏天，接到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先生聘书，要他到广东坪石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兼研究院教授，及其后担任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父亲当然很愿

意返回广东（中山大学在一九三八年迁云南澄江，一九四〇年迁回粤北）。消息传出后，国专的同事、学生纷纷到家里来挽留，谈到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流露出非常真挚的感情，那些天常有谈到深夜不散的。父亲对迁北流的无锡国专，除认真授课外，的确协助冯振校长做了不少好事。除了教课本身以外，学校迁来之前的寻觅校舍，设法帮助学校延揽教授，出主意度过困难等等，几乎可以说只要能想到的都尽了自己全力。记得国专聘请谭之良教授来教地理就是父亲的推荐。谭之良先生和父亲（是）同期考入南京高师的同学，他几乎能把世界地图背出来。永用当时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有时下午没课就跑到国专去玩，只见谭先生上了课堂拿颜色粉笔，完全不用看地图飞快地在黑板上一个连笔就将一幅当天要讲的国家（或大洲）的轮廓画了出来，而且海岸线或国界线的弯拐、角度也都能按比例画在黑板上，然后添上河流、城市。讲到地理特征、风土人情、战争形势等等如数家珍。谭先生脑子里就是一本活的地图，他的板画（做老师的都讲究板书——黑板上写的字，这里套用，指在黑板上画地图）真是一绝。凡此种种，国专师生都对父亲的去留十分关切。虽然最后父亲仍然决意东行，但这种难舍难分的师生感情，使我们深受教育。”

庞心逸《抗日期间无锡国专迁桂回忆》（见《无锡国专在广西》）：“谭之良老师教地理、历史，他讲课形象生动，他画地图，即席板书，清楚明了，讲自然地理，使我们觉得祖国万水千山总是情；讲历史，文史结合，古典诗词成语的引用使同学增加了不少的文学知识。他慈祥而又严肃，在讲课时有人思想开小差，他会点出你的名字，使同学感到有些腴脸，但他最后却对你报以一个慈蔼宽恕的微笑，使你恢复心态的平静，思想集中听课。”



十二月八日，国专桂校代校长冯振致亲笔信给时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钱基博。鉴于教育部所拨经费，经七折九扣，又与沪校平分，桂校每月实际所得，只有六百三十元；故信中请求钱基博代向教育部申请，每月实足补助经常费二千元，另一次性补助设备费七千元。钱基博接信后，即汇寄法币一百元与冯振，嘱其酌赠无锡籍学生以购衣履。又于十二月十六日亲笔致函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同乡顾毓琇，希望教育部能增加对国专桂校的补助经费。

冯振致钱基博函（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子泉先生道鉴：十月四日、十一月廿四日两次寄书，谅达左右。久未得示，未审兴居何似。伏维万福。兹有陈者，本校自播迁以来，经费收入除少数学费外，只赖国库每月补助。而七折之后，再加九扣，又与沪校平分，实得不过六百三十元。当此物价上涨不已之时，以之支撑一员生数逾百人之专科学校，其竭蹶情形，不言可喻。暑假前教部参事孟寿椿先生到校视察，目睹师生刻苦耐劳状况，曾面允向教部陈说增加补助。并嘱拟定预算，呈文申请。早经遵办，但数月迄今，尚未确实核复。而物价愈高，处境愈困。今会计年度将告结束，拟再向教部申请每月实足补助经常费二千元，另一次补助设备费七千元。仍依原日预算，不敢增加，然物价上涨，较之三数月前已一倍已上矣。素仰先生名高当代，交游众广。敬乞于陪都及教部方面贵亲友中，分别致函，疏通嘘植，则一言九鼎，补助之请，定能早邀核准。本校前途，实深利赖。以先生平日爱护本校之殷，且当校董之主，断不以在远而见遗。故敢沥胆奉陈，乞赐眷纳，无任感禱！前奉寄拙诗，第七句‘漓江远接湘江水’，‘远’拟易‘水’。未审尊见以为何如？乞与默存世兄鉴定为感……”

按：上引信中所说的“前奉寄拙诗”，即后来收入《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中的《寄钱子泉先生暨默存世兄湖南蓝田师范学院》，诗曰：“浪迹江南岁月深，君家父子托苔岑。文章早许追洵轼，学术何惭继向歆。每忆旧游如隔世，再难一面到而今。漓江水接湘江水，直到湘西寄此心。”

钱基博致顾毓琇函（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一樵先生左右：前奉赐书，曾以尺素相复……昨得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主任冯君振心快函，详述经济之支绌、维持之不易，大部参事孟寿椿先生目睹，向大部陈说增加补助经费，已经拟定预算呈部申请，而望为左右进一言，以责于博，其辞甚哀，原函尘察。现在抗战建设，通商惠工助农教战，斯诚当务之急，而国学专修学校似迂阔而远于事情，然民族复兴与心里建设亦或以无用为有用。我公诚阅识渊览，明当世之故，亦僥垂念国专学生不才之才，而宏其乐育之意耶？其中有学生十余人，系乡人子弟随校转徙以入桂者，生活尤苦。博即汇法币乙伯元寄冯君，每人酌赠以购衣履。博诚哀冯君来书辞意之悲，而进出位之言，惟公鉴其不得已之忧而矜怜之。博明知国家经费有定，而私校补助预算扩张之不易。然不忍不为一言，以重有望于君子之乐育也……”

按：顾毓琇接信后，嘱高等司查案代复，复函云：“……上年曾由本部据发临时补助费一万元。本年俟支配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时，当为注意。”

本年中，无锡国专第十九届学生毕业，毕业生计有陈纲、曾志弘、杨德崇等三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

国专沪校

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农历十一月一日），钱仲联应唐文治



之招，从萝村出发，一路辗转，至本年元旦抵达上海，随身携来教育部补助学校经费两千元。钱仲联自此改在国专沪校任职，讲授基本文选和历代诗选等课程。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己卯七十五岁》：“钱生仲联自桂林回沪，并携来教部补助校费二千元，欢然道故，即请其担任教课。”

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学术年表》：“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三十二岁……唐校长至上海后，在租界赁校舍，办国专分校，专任教师乏人，来信命我回上海任教。农历十一月一日，我全家自萝村出发，课务由吕方子先生代理，时经陆川、廉江，至广州湾，由海道至香港，过圣诞节，乘海轮北上，值新历元旦抵达上海。夏承焘时亦在国专分校任教，特至旅馆访候。同乡张鸿、杨无恙、庞树阶亦都在上海，相晤面。腊月，回常熟，见母兄度旧岁。”“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三十三岁 农历元月六日一身至上海。住入国专分校校舍，从事教课。陈柱师、陆景周教务主任、王蕴常等重聚首。新在分校任课的郝立权、周予同、胡宛春、姚鹏图、吴丕绩等缔新交。”

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一九三九年底，唐文治校长自上海来函，因国专分校缺乏专任教授（当时周予同、夏承焘、张世禄诸教授均系兼任，主持教务的王蕴常教授亦在他校兼课），召我赴沪。我遂将课务交由吕方子先生代理，于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举家北归。历经陆丰、廉江，渡广州湾至香港过圣诞节，复乘海轮北上，于一九四〇年元旦抵达上海……彼时彼地，我没有一般游子归来的喜悦欣慰，有的只是忧国哀时的沉痛愤懑。唯有一事差可称幸，那就是和阔别的师友唐文治、金天翮、张鸿、夏敬观、李宣龚、陆景周、陈柱、

王遽常、杨无恙、庞树阶、瞿凤起诸先生重逢聚首，与神交多年的夏承焘、周予同、郝立权、胡宛春、姚鹏图、吴丕绩、邓散木诸先生缔结新交，诗酒酬唱，稍纾胸怀。”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钱仲联教授全家从桂林回常熟了，他来教我们的基本文选和历代诗选。他并不要求学生读熟，但学生能自觉地朗读。他要求很严，历代诗选的学期考试，在将近两小时内，既要做二道问答题，又要完成律诗一首或绝句二首。第一学期的诗题为《海西谣》。”

农历正月，国专沪校开学，共有学生九十余人；加上旁听生，计为一百零四人。唐文治为学生讲授《宋元哲学》及《读文法》二门课程（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庚辰七十六岁》）。

国专沪校民国二十八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唐志轩、吴文殊、朱毅、李德峻、黄惟恭、缪杰等六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二十八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六月下旬，放暑假。

国专沪校民国二十八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孟同、柳义南、夏咸恭、吴方圻、沈澄、张珍怀、顾士朴等七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二十八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历届毕业同学名录》）。

约八九月间，原无锡国专教授陈柱出任汪伪政权治下的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

黎其强《古典文学专家陈柱》：“（陈柱）一九四〇年被汪

伪特务挟持到南京，南京汪伪政府委他为文物委员兼博物委员会（博物馆）主任委员等职，其不到任，只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担任教授、中文系主任。”

按：一九四〇年汪伪政府成立后，接受其“教育部长”赵正平的建议，“恢复”中央大学。新成立的南京中央大学于本年八月底开学，陈柱受聘担任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据《南大百年实录》引《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二届（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载，一九四一年秋，陈柱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一九四三年十月，陈柱被委任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次年一月辞职。

又按：陈柱前往南京中央大学任职时，唐文治、冯振等都曾去函阻止而未果。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一文记：“北流陈柱尊研究诸子百家，著述甚富，辞去国专教学，投奔敌伪。先生曾口授汝挺写促返函而杳无回信。后闻陈柱尊悔不当初，长歌当哭，泣下沾襟。先生悲其处境，慨然叹曰：‘斯人也，有才而无德，惜哉！’”又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条下亦记：“早，冯振心来……留振心午饭，谈陈柱尊往事。谓柱尊未往宁时，振心屡以函电止之，竟不听。入宁以后，遂不通讯。”

陈柱到南京中央大学任职后，曾致函邀请王遽常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职，王遽常作复拒绝之。

王运天《王遽常教授学谱》：“一九四〇年……是岁，老师致陈柱尊函，表示他不愿接受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函日：‘遽常敬启萝村先生阁下：辱手教，奖饰过职，既感既愧。遽惟鲁不解世情，尤不谙酬酢，忆二十五六时，以世谊谒某公，某公宾客盈门，坐而求见者二十余人，皆屏息待，日昃午，某公犹未出，予不耐，即拂衣去。他日某公召见，曰：奈

何不少待？曰：野性难驯。某公大笑。今阁下必欲磨以好爵，见爱不可谓不深，奈野性之不薪富樊中何？此不敢承命者一。遽性拙直，见不可意，即悻悻显于颜色，今人世尚诈伪，往往外鹤美名，而阴行其恶，植党以营私，排异以自固，欲默尔而息，则胸腹间轮囷垒块，必上塞而闷死，欲快然一吐，则言未终而险衅随之，言不言，皆有死之机焉。奈何奉父母遗体，而自尝于死乎？爱我者当不忍见其如此，此不敢承命者二。遽学文，惟古是好，诘屈聱牙，黔黑臃肿，不合于世久矣，士大夫且相笑以为怪，矧欲下喻于流俗浅俚之人？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也，则虽欲助阁下，亦何益于事，如欲其改容易饰，为时世妆，则能者众矣，又何假（于）仆？此不敢承命者三。幸鉴下衷，不胜大愿。”（引自拙编《王遽常书法集》，一九八九年浙江人民版）”

按：王遽常此信又见《抗兵集》，题作《答某先生书》，文字略有不同。

九月初旬，招考开学，新旧学生共有一百二十五人。又嘉定人高介人（介一作价，生卒年不详）在其六十岁生日时，招免费生一班，共三十人，作为生日纪念；同时也借以周济贫寒子弟。暑期时，来与唐文治商议，归入国专沪校，所有一切费用仍由高介人担任。但因所招学生是初中程度，不能与国专沪校衔接；故允其附于沪校，另设课堂，请无锡国专第二届毕业生何葆恩（字芸孙，生卒年不详）主持其事（据唐文治著、唐庆治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庚辰七十六岁》）。

黄汉文《唐文治办学文理并重》（见《三吴风采》）：“抗战期间，无锡国专受嘉定高介人的委托，附设高氏初级中学，招收清寒的小学毕业生免费上学，唐先生兼任校长，他宣布办学的原则是：国文课必须加强，数、理、化和英语等课程也应

同样重视。所聘教师必须学识丰富，教导有方，尤足为学生表率者。”

唐文治《高氏中学成绩录序》（见《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五）：“同乡高价人先生花甲初度，特捐貲设立高氏中学，培植孤寒，免收学费，寓寿考作人之意，德至厚也。先聘太仓郁君梅阁为教授兼管理；郁君辞退，后复聘常熟何君芸孙继之。郁、何二君俱殫精教务，训迪修身立品大要，作文务期理法清真。故诸生皆能循循规矩，斐然成章。人咸曰：美哉，高君之教，思功德为无量也。高先生与余有同气相求之雅，嘱何君率诸生来附属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按：一九四一年印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附设高氏初中免费班毕业纪念刊》，未见。

本年秋，朱大可（名奇，字大可，以字行，一八九八～一九七八）应邀到国专沪校兼课。朱大可在国专沪校先后讲授过经今古文研究、经学通论、书法学和诗词学等课程。

黄汉文《缅怀朱大可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二十一）：“朱先生是一九四〇年秋季到无锡国专沪校兼课的，开的是经今古文研究。”

陈以鸿《师门琐忆——纪念朱大可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四二年秋考入母校沪校，学习三年至毕业。本一经学通论课的任课老师是朱大可先生。朱先生当时四十几岁，已留着很长的须髯，一袭长袍，一双布鞋，行止从容，言谈风趣，一手板书写得端正挺秀，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二、三时，朱先生教我们书法学和诗词学。在书法学课上，朱先生不仅讲书法理论，还把家中珍藏的碑帖每次带一批来让学生们观摩，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从诗词学课得到的收获最大。朱先生教我们做诗，着重基础训练，我

当时正处在初学阶段，因此得益匪浅。”

按：据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文记，朱大可年轻时曾应考无锡国学专修馆，限于名额没有被录取。“后来朱大可先生在国专教基本国文等课，在一次座谈会上讲起往事。唐先生祝贺他学有所成，并致歉意，还风趣地说：‘昔人谓“试官无目”，何况本人本属瞽叟，幸先生谅之。考试虽能选拔一般人才，而未必能得真才。入选者究属少数，向隅者多。采用考试，不得已也。然而，自学很不容易。’当他知道了朱先生是名书法家刘玉介（别号天台山农）的外甥，诗文书法皆曾得到舅父的指导，又曾从闽人郑某学习诗文后，就面对在座的学生说：‘为学须有师承，更需勤奋，食古而不泥古，有师承而不囿于师说。诸生闻朱先生之言，可以悟为学之途，应知自勉。’”

九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唐文治、陆修祐二人二等服务奖状，又授予冯振三等服务奖状。

《教育部训令（奖拾肆第 33273 号，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发）》（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关于教员服务奖状、奖助金、久任教员奖金的呈件》）：“……查各级学校教员连续在同一学校长期服务，不特于教学效能之促进有至大之贡献，即其服务精神之坚卓，亦至堪嘉尚。本部为激励此项长期服务之学校教员起见，特于本年四月，颁发教员服务奖励规则，并分令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将服务满规定年资之专任教员名单报部核奖。兹第一批报部核奖之十三院校，业经分别核定，并由部于八月二十七日教师节公布。该校唐文治、陆修祐二员已连续服务十五年以上，应授予二等服务奖状，冯振一员已连续服务满十年以上，应授予三等服务奖状……”

本年秋，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的周谷城（一

八九八~一九九六）受聘在国专沪校兼课，讲授中国通史。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四〇年秋，周谷城教授来校兼课，讲的是《中国通史》。”

周谷城《缅怀唐文治先生》（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我对唐先生仰慕已久，曾于一九四〇年，受聘在沪校任课，到校后始深知国专学风笃实，读书写作无不认真。唐先生数十年重视学术，讲求实效，蔚为风气，良非偶然。我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到此任课，一方面是对唐校长的敬重，愿效微劳；一方面深爱诸同学学习态度认真，是我所曾任教的许多学校中少见的。希望诸同学不负唐校长的期望，勉图上进，各有所成。’”

本年中，胡士莹（字宛春，一九〇一~一九七九）应邀至国专沪校兼课，讲授词学研究。

陈翔华、陆坚、萧欣桥《胡士莹先生事略》：“……当时由于避难生活的窘迫，胡士莹先生经常同时到几所大学兼课。一九四〇年应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邀请，到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又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长王瑗仲之请，为迁沪‘国专’学生开课。”

按：据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记，胡士莹在国专沪校所开课程为词学研究。

本年起，国专沪校特设文学讲座与史学讲座，聘请时在光华大学任教的吕思勉前来担任史学讲座。

陈祥耀《吕诚之先生在无锡国专（沪校）讲课简记》：

“一九四〇年，校内开设两门特殊的高级选修课——文学讲座与史学讲座。任课的是学术界的著名老教授，选修的是高年级学生。担任史学讲座的老师是吕诚之（思勉）先生。吕先生那时在光华大学任教，到无锡国专（沪校）主持史学讲

座是兼职。

我是一九四一年春季进入无锡国专（沪校）念书的，那时校舍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是年秋季以后，学校迁址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我去旁听吕先生的史学讲座，是在爱文义路。时间当是一九四一年秋季；否则，就是一九四二年春季，因为四二年秋季以后，吕先生大概就不在国专兼课了。我当时是低年级学生，又不是念史地组的，兼之自己所修学分都满，对于史学讲座，只能旁听，不能选修。所以我的受业于吕先生，严格说来，只是旁听生，不是正式生。听高年级的同学讲，吕先生有时因事不能来讲课，也曾由他的学生杨宽先生代课，这是我旁听前的事，没有碰到，所以我不认识杨先生。

吕先生讲授史学讲座课，每周上课二学时。开始时多讲治史方法及史家修养。以后就多在下课前布置学生提出下次课要求讲授的内容。上课时学生把要求讲授的问题，写成纸条交班长汇转吕先生审阅。每次提的问题大概都有四、五个，吕先生选择其中的一、二个，进行答问式的讲授。这种讲座的方法很特别，问题由学生提，讲解适应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迫切需要和重点疑难。内容牵涉广泛，自先秦史到近代史无不涉及。当时学生所提、吕先生所讲的，以涉及政制史、文化史的系统发展及前代政治治乱的关键原因和得失的居多。记得有一次同学提出马列主义的史学观点和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先生会拒绝回答的，不料他也扼要地作了讲述，可见其治旧史而不拒新知，用心之虚与眼界之广。这种讲课的方法和内容，非胸罗全史，熟精掌故，对每种重要史学问题的因果、得失都了解分明，且有自己的卓见如吕先生者，是不易担当的。吕先生的讲课，条理清晰，要言不烦，句句有分量，引证充分，见解精辟，且联系时局，多语重心长之言。惟语调较慢较低，浮躁者或以为生动

性不够，沉潜者会觉得深刻性很高，所以学生都是很注意听讲和笔记的。吕先生是位老先生，毛笔字写得很好，他课堂上板书可是左起横行的。他的板书写得很整齐秀美，有肥瘦的锋捺，和他的毛笔字一样，且又写得快，不用心讲究而自然浑成，可见其书法功力之深。先生为了怕学生听不清他的口音和笔记遗漏，又常把讲课要点，写在黑板上，不费思索，而随手写去，成文简雅，不枝不蔓，文白相兼，又可见其文章的功力之深。我读吕先生的著作，每感不但他的史学的渊博为不可及，而且他的文章（特别是文言文）的明畅醇厚相兼之美也不可及。看吕先生史学讲座的板书要点，也有此感。”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吕思勉教授的课是特约讲座性质，不计学分，但必须出席，并呈缴听讲笔记（要用墨笔誊清）。开始时我听不惯，等到听惯了，觉到他所讲的很多是治学心得，有些还没有发表过。”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国专桂校

本年初至八月，国专桂校仍在广西北流县萝村办学。至此，国专桂校在北流萝村办学将近两年。国专桂校学生严庆添的《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署名“无锡国专”的《抗战以来的无锡国专》两文，对国专桂校萝村办学期间的环境面貌和办学状况有较为生动而详尽的描述。

严庆添《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四、环境 ××，位于广西北流县北万山之中。论其风景，当然远逊那江南山水的柔媚和太湖烟波的壮丽。不过，这里也有它的美点，不容我们否认。今夏教育部派参事孟寿椿先生来校视察，甫抵校，即对本校环境的优美，赞不绝口……水从高崖泻下，遇着巨石的阻挡，便激成许多大小的瀑布，奇怪伟丽的投向人们的眼睛，把你胸中的尘俗洗涤得干净。还有那深潭浅濑，游鱼上下，沙明水清，白石凿凿，真是一座天然的游泳场。环拥学校前后左右的都是那千株万株婆娑的荔枝树，荔枝树为热带产物，绿叶红果，味美而香，邱逢甲誉为果中之王，东坡为了要‘日啖荔枝三百颗’，便发了‘不妨[辞]长做岭南人’的愿头。杨太真为了要吃荔枝，便不恤人力的辛



苦，置驿骑老远地从四川运来，所以，杜牧之诗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是咏这一回事。不过，照白居易荔枝图序云：‘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日之外，不可食矣。’则太真虽贵为妃子，却食的是南方老百姓所唾弃之物。我们违难以来，一切都不如前，唯有两年来的夏天，大嚼其荔枝，享受的美满，要驾杨妃东坡而之上，差足引为自慰和自豪。孟寿椿先生在校时，曾即席赋荔枝诗，有句云：‘此间合借太真住，免得登楼望驿骑。’与我们大有同感。××约莫有三四十人家，可以说没有那一家不种荔枝树。就在校门，池塘的堤边也环列二三十株，倒影波心，一片碧绿不时摇曳着，炎夏从浓阴中吐出一阵阵的清凉，禽声蝉声在深树中悠然地鸣唱着，令人忘记了疲倦，忘记了尘世，好像逃到了世外的桃源一样。但是，敌人就在卧榻之侧咆哮，日夕闹着风声鹤唳，敌机且不时从我们头上掠过，我们占得这样一个幽美的环境，除了藏修游息获得身心的愉快外，我们从来未把‘它’当作世外桃源。我们牢牢地记着当前的责任，时刻磨砺以须，那种山林泉石、□□隐逸的高士生活，已被敌人摧毁无遗，再用不着我们去留恋了。

五、设备 本校和其他专科以上学校一样，自避难以来，时时感觉到物资的异常缺乏，以致因陋就简，谈不上设备。可是，在极端艰苦中，学校当局还是不断的努力，务求逐步去改进。我们现在所赁得的校舍是一所大宅，三座两廊，宏敞深邃，教室、宿舍、图书室、办公处、民众教育馆、厨房、厕所，应有尽有，可容学生百人以上，我们还在去校半里之森林中，辟篮球、排球场，又在河滨辟游泳场。本校图书在无锡时原有四五万册，自逃难后，全部随之沦陷。中更转徙，到达北流时，携与俱来的图书很是有限，幸得××不少藏书之家

(如陈柱尊先生的十万卷楼便是其中之一)。经学校多方商借，为数颇觉可观，凡参考阅读之书，算是略备了。此外，民众教育馆之挂图及书籍，亦极力求其完备。终以格于经费之无着，不能如理想实行的事还是很多。我们虽引为遗憾，但我们都明白到，大敌当前的今日，亦只好因陋就简，徐图改善而已。

六、校风 本校校长唐蔚芝先生，□□□□□□，生平致力□□□□□□，□□□□，□□‘正人心，救民命’六字相勸励，期导诸生于圣贤之域。故本校所标宗旨在敦品励学、实事求是。二十年来，本此宗旨全力以赴，故校风之纯良，久为社会人士所称赞，绝非我们的自我宣传。搬迁后，学生人数较前减少，学校的环境亦由城市而至乡村，学校之管理愈见容易，师生之生活愈见密切；凡同学之思想行动，各先生及导师随时随地加以指导，故本校校风之纯良比前有加无已。目今所能指出的，计有下列数端：（一）全校同学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绝无思想上的分歧，也无党派的斗争。（二）尊师重道，服从纪律。（三）大部分同学于功课上颇用苦工，所授诗文多能琅琅上口；校中成立各种研究团体都踊跃参加，造成一种读书研究很浓厚的风气。（四）同学的行动多数□诚实厚□，浮嚣浪漫的少。

七、课程 本校的课程和其他大学文史系的无甚差别，举其重要者，（一）历史方面有：《尚书》、《左传》、《史记》、《汉书》、《通鉴》、本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等；（二）文学方面有：《毛诗》、《楚辞》、《昭明文选》、历代诗选专□诗、历代名家散文选等；（三）哲学方面有：《周易》、《老子》、《墨子》、《韩非子》、《荀子》、中国哲学史、哲学概论等；（四）小学方面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五）科学方面有：自然科学概论、



社会科学概论等。此外，尚有两种应该特别提出的：一是我们学校为使同学德行日进起见，特别注意‘语、孟、学、庸’之授受，务求达到身体力行的工夫；一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学校特别开了民族文学、抗战史料、国防地理三科，所以鼓起同学们抗战的情绪不小。

八、实习和抗战工作 我们虽躲在高山深处，好像和外间隔绝了一般，但我们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责任。学习和工作不断在进行着，学校的图□标语漫画都□出同学们之手；图书室也由同学们去轮值负责。甚至学校工作繁忙时，同学往往被□充书记。我们在校内办了一个民众教育馆，一切都由同学们去负责，校内本来早已设立了平民教育班，后来和乡村长商量，再把这个运动扩展到全村去，现在已有了三班，人数将及一百，其中□班每晚在村公所上课，村民踊跃参加，以妇女为尤甚，同学的精神也异常兴奋，差不多每个同学都负有他所能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全体动员了。

此外，我们很注重宣传的工作。常常把握住重要的纪念日，全□出发乡村宣传。村民目我们为大学生，说话当较中小学生可信，故收效亦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学校当局还利用寒暑假，规定宣传纲要，指定我们回家工作，假满回校，举行检讨会议，厉行自我批判。今年三月奉部令征求伤兵之友，在全体动员之下，居然能够在二日之内捐集到法币一千一百多元，在荒僻寒苦的村落，以外地收获到这个成绩，我们受了很深的感动。

我们是研究国学的人，外人难免□□我们只是一个文绉绉的书生，换一句话说，即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我们坚决不承认□是事实。我们已是民族战斗的一员，不论在过去和将来，我们都已经尽了或准备尽我们抗战建国的责任。

九、日常生活和趣事 我们在学校，就同一个大家庭一样，先生是家长，同学是兄弟姐妹，大家都是很亲密的。我们清晨起来，做过早操，便各回自己房里去读书，书声传送到村外，往往惹起过客的注听。白天照例上课，空暇的时候，或跑到图书室去阅报看书，或找各先生谈论各种问题；晚饭后，打球的打球，骑马的骑马，游泳的游泳，散步的散步，生活是那么悠闲而有规律，绝对没有外物的纷扰，这个环境太适宜于读书了。虽然去冬邕宁的失陷，今春敌人的进扰灵山，与时时谣传敌人从电白登陆，给我们不少的威胁和恐吓，但我们已是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了。我们早已决定：假如敌人真的到来，我们便打游击战去，学校后面的大容山便是我们的根据地。同学卢君曾在徐州会战时以队长的资格和敌人作过好几次的殊死战，现在他为着再求深造，折节读书，便无形中成了我们游击队的头目，他指导我们如何运用游击战术，我们真是跃跃欲试，恨日本鬼子为什么老是不来，如果别人长把我们看作手无缚鸡之力文弱书生，那种错误必须加以修正了。

北流接近法租借地广州湾，自广州失陷后，内地货物的转运，胥由这条路吐纳，因之变成畸形的繁华。每天万余苦力络绎道中，一切货物的供求相差过远，于是价目一天天飞涨，尤其是粮食方面，这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米价几天内涨了二三倍，其他物价也是一样。我们的膳食，尽管快要到了二十元一个月，而每日两餐只是首蓿堆盘，营养不够，这样一来，精神也受了影响，好像气力消乏似的撑不起来；但一想到盈千累万的战区灾民和前方战士，他们冒生死、耐饥寒去为国家努力，我们便不由不深深地惭愧，把精神振奋起来。

学校除学生会外，一共成立了三个团体：国风社的、史地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最走运的是国风诗社，开成立大会那



天，导师吕方子先生备办茶点，假座樟山园（村中最雅致的私人别墅）招待社会，名曰雅集。不到几天，适逢教育部参事孟寿椿先生到校，恰巧他也是一位诗人，曾即席赋诗勸勉诸同学，国风社的社员都依韵和了起来。翌日，假座校内大礼堂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酷暑之下，孟先生挥汗讲了两个钟头的诗学问题，讲毕又是茶点，茶点毕孟先生又即席作了两首谢诗，同学们也有即席奉和着，情况之热烈，可说一时无两。不过，史地研究会也不示弱，六三禁烟纪念日那天晚上，大礼堂悬了汽灯，照耀得如同白昼，满村的男女，老的，少的，丑的，妍的，都涌进校来听该会导师郑师许先生讲林则徐禁烟问题，直到了深夜，才由满村的犬吠声送了他们归去。书法研究会却别开生面，导师蒋石渠先生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那许多碑帖，一一加以解释和批评，把他们展览起来，真是洋洋大观，令人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慨！学校自成立了这三个团体，耳目为之一新，大家都争自磨濯砥砺了。

休假日，导师常常导□们□野外或山中去旅行。途次我们谈着许多进德修业问题，或随便说说笑笑，别有乐趣。记得一次，还是仲春之月，久雨初晴，冯、蒋、陈、吕诸先生率我们往游斗口，穿过了许多阡陌，渐渐地步入深山，一溪由岩壑中间吐出，盘旋在我们底脚下，□□地流着，遇曲折处即成飞瀑，煞是奇观。后来，我们在山腰一块大石坐下，冯先生首先说了生公说法的故事，逗得同学们的哄笑，笑声和水声溶了一片。次由各先生再说了孔子浴乎舞雩的故事，好像我们已经回到了数千年前一样。吕方子先生归途作了一首五古，中有‘舞雩吾敢拟，即此已足乐。好事冯夫子，谈玄逞锋锷。妙语如贯珠，一笑颜□落’之句，便是当时的纪实。可是，当我们刚刚到达校门，敌机三架，又在我们的鬓边飞略而过。

最近，一位女同学钟君，因为她的哥哥在随枣作战牺牲了，哭了几夭，很是悲伤。后来读了《大公报》，才知她的哥哥便是这次在随枣壮烈成仁的某师师长钟毅将军。将军为了矢志要做‘军神’，便把最后剩下的两连人和敌人同归于尽，没有一个生还，这种丰功遗烈，永远照耀中华民族的史册，有了这样一个哥哥，是值得骄傲和安慰的。所以，同学们纷纷填词作诗去安慰她，好像我们也与有荣宠一样……”

按：上文中提到的钟毅，字天任，广西扶南县人。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时任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一七三师师长的钟毅在随县、枣阳一带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牺牲。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人物志》第八集《钟毅》一文记“(钟毅)妹二，长丽坤肄业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次薇坤，肄业无锡国专”，可知上文提到的“一位女同学钟君”为钟薇坤。钟薇坤是国专桂校五年制班学生，于一九四四年夏毕业。

《抗战以来的无锡国专》：

“**大容山麓的校舍** 萝村，这不过是蜿蜒的大容山麓下一个村庄。然而它在广西却是有名的村落，同时也就是负有盛名的国学教授陈柱尊先生的家乡啊。这里有外国的留学生，有大学的毕业生，在高初中毕业的青年男女，更不计其数，怪不得人家称它叫‘文化村’了。国专在国内具有悠久的历史，特殊的声望，却从千万里外奔跑到它底怀抱里，于是这萝村，更涂写上一页光荣的史迹了。倘若是外来的人士，无论是远方或近邑，想要到萝村来参观这战时的国专，一点也没有感到困难的。虽则是萝村距离北流县城有二十五华里，离容县县城有六十多华里，但是沿途的人家，无论是老太婆或小孩子，他们都会指点给行客到萝村无锡国专来的路径。真的，国专这两个



字，在附近人的口中，实在是个太熟悉的名词了。当你从那湾湾曲曲的乡村大路，踏进了萝村的村境时候，须要再向左转，行未许久，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国专第二宿舍那幢巨厦，那里住有总务主任蒋石渠先生的家眷，和谭之良先生，还住有四十多个新来的同学，这一来师生间的感情格外地融洽了。从第二宿舍前行数十步，在那丹荔苍松交相掩映下的庄肃的校本部，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那高悬在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透出绿油油的荔枝梢上随风飘扬着，远望之更显出是一片血也似的鲜红，充分地象征着中国的前途是光明、自由和独立，使人不得不对之肃立起敬。走进校门的前进，那就是国专举办的民众阅览室，那里挂有民族英雄的领袖肖像，有抗战的地图、漫画和标语，也有日寇侵华三年来种种暴行的实录画报。国专虽是在逃难中一个很穷的学校，但是这简单的陈设，也足够吸引不少附近的男女老幼了。他们每天都是络绎不绝地跑来观看呢！老妈子一看到侵略者那些奸淫掳掠的惨酷行为，便皱起眉尖说着：‘可恶的，日本兵真是该杀啦！’画报的确是感人最深的读物啊！那里陈列着三百多本的通俗读物和抗战常识小册子，也是附近青年和孩子们所最难得底读物。有时候，我们在摇铃吃饭去了，他们还是恋恋地不忍离开呢。由民众阅览室的侧门前进，是一片四方的天井，去年上期学生人数较少时候，是作为早操的场所。当你走到了天井，迎面的是个宽敞的二进大厅，也就是这战时的国专底大礼堂……这礼堂虽然没有别的陈设，两边墙壁也只是粘贴着青年守则十二条，但是因为这样，就显得它在庄严中夹带着朴实的气象。同时，更足表征着这战时的国专底朴实学风的精神了。这里是够容纳下百多个座位的，所以它也变成校中人数最多的合班上课的教室。礼堂前右侧那一幢房屋，是女生宿舍，有水

池，有花盆，到夏初池里的荷花，还盛开着令人可爱的鲜艳的花朵，那里却只居住着十几个女生，是够舒服的。女生宿舍对面的那一座屋，是国专的灵魂——行政总枢纽所在地，在进门的两对房，是会计室和庶务室，内进是校长室、总务主任室、训练主任室，以及导师的住室，还有学生们渴求着精神食粮的图书馆。国专在逃难时带出的图书虽不多，但是在这里有两位大藏书家，一是冯代校长山围精舍的自然室藏书楼，一是陈柱尊先生的十万卷藏书楼，还有其他的藏书家，学校都向他们借了来，陈列起来，真可算是坐拥百城了，加以两年来陆续添置，也已有二三千册。在战时各地大学对于参考书的贫乏，虽是一般通病，但在国专是暂时可以勉强地解决这困难了。图书馆前有一小厅，那是陈列新书报和杂志的阅览室，而阅览室对面的小厅，是国专教职员的办公处，那里仅张挂着几页抗战建国和学校行政的系统表，以及几幅师生合影的照片，但在这简洁整齐的环境中，却表露着国专底一种穷干实干的精神呢。而且在办公厅前面的短墙，摆着几盆青兰和一盆四季常开的木樨花，不时喷发出扑鼻的清香，更给教职员们在工作疲劳的时候，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舒畅啊。校本部的男生宿舍则在礼堂的后进，那里是两列房子，共有寝室十余间，教室二间，每间寝室是够宽敞的，却仅住着七个或六个五个的学生，这样的住所，恐怕是战时的学校所不易得的。宿舍的左侧，是厨房和饭厅，从饭厅走出右转向甬道前进，就是我们日常游憩的校园，园里虽然只有稀少的屋主人所栽植的拉杂花树，但经过了我们的芟刈，已不像往时那样荒芜的景象了。每当春到人间，杂花生树，红白相映，蜂蝶乱飞，却另有一番景致呢！尤其是在炎夏之日，那些安置在荔枝树下的石条，更是常见到学生们坐在那里读书的。运动场距离学校约有百步，它是建筑在陈柱尊先

生底荔枝园的一角，那些打得疲倦了的球员，或者是到运动场游玩的人们，就常在这荔枝树荫下坐卧着，如果遇到荔枝成熟时节，在打过球后，买几斤香甜可口的荔枝，一壁走一壁吃，那是多么地愉快啊，所以国专的学生们，都常咏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萝村人’的语句呢。这学校，虽则是经过四次的迁移，历遍了千辛万苦，然而竟能得到这样幽静的环境，学生们是多么地幸福啊。但是，我们并不在此间乐不思蜀，我们仍是天天在期待着那抗战最后胜利早日来临，好给我们这流浪的一群重回到那隔别多年的老家——无锡的母校，再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去建筑我们计划中的新校舍。

生活的剪影 这学校的宗旨，在实事求是，敦品励学，二十年来都养成了一种勤俭朴实的学风，所以学生的日常生活，只就是刻苦和简朴，学校虽然没有军事教官来施行军事管理，但他们都能遵规蹈矩的过着有纪律的生活。每天在晨光熹微、勾漏山上刚露着鱼肚白的时候，起床的铃声便沿向宿舍的房门摇响了，于是学生们就一骨碌地爬下床来，急急忙忙地在整理铺盖和洗脸，十分钟后，早操的铃声又丁零丁零地响着，大家便用急速的步伐，跑到校门那片空地来，各人站着自己固定的岗位。升过旗后，柔软的运动状〔操〕开始了，经过二十分钟，才告散操。接着就是早读时间了，虽然学校没有特别规定，但是在校的学生，他们都能知道宝贵时光，在读着自己自己的书，很少有人是一无所事的闲荡着。整天的时间，都是消磨在课内听讲与课外研究的工作，直到下午四点半钟的时候，全体师生又集拢来把国旗慢慢地拉下，晚膳也就跟着到了。

饭后那两个钟头，是一天辛苦中所感觉到最快乐的，这时候，只有极少数的学生，继续着在教室里研究他们的功课。其余的不是到运动场去打篮球、排球，便是三三两两的把臂谈

心，徜徉于清静的原野，或者是遨游于苍松翠柏的丛林中，有些人还夹带着自己爱读的诗歌，跑到松林里，在那嫩绿如茵的草地上躺着，让春风吹散着他们的头发，松子敲打到他们的衣襟，但他们却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朗诵着古人的诗句，忘怀着一切身外的功名了。倘若是炎热的夏天，那些好游泳的学生，也三五成群的跑到斗口山前那一湾澄净的清溪去游泳，他们还向人家借着鱼网顺便在抛鱼，准备拿回来做餐时的加菜呢。那儿的确是个天然的游泳池啊。

星期日来了，那些居住在都市里的学生，这真是他们找爱人谈心的绝好机会啦。然而国专的学生，他们的工作依旧是像往常一样地紧张着，什么的文艺座谈、史地学会、国风诗社，和书法研究会等，都在这一天检讨着他们这一周来工作的内容。有时候，导师们也乘着这假日，各人率领着组内的学生，到附近的郊野去漫游，顺便施行训导，常常是到牛羊下山时始归。

也许是国专学生，是这样地不分昼夜与假日的永在紧张地工作着，所以有些头脑偏向的人，就说国专的学生，是不能迎合时代的落伍者，是读死书的书蠹，但是我们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惟读案头书’的书呆子吗？不，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是本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意旨，尽着我们微薄的力量，去干些我们所能够做得到的抗战建国工作，故此在校外，我们也努力去为社会服务。好像去年三月，我们为响应重庆伤兵之友总社征求社员运动，除全体师生加入外，另向地方人士进行征求工作，只短短的两天时间，加进的有四百多名社员，捐收到国币千余元，像这样偏僻的地区，而能有如此出乎意料的成绩，可见得国专学生，其平时对于深入民间去



干救亡工作，是如何的努力啊。每在寒暑假中，无论是返乡或留校的学生，也都是深入农村去作兵役运动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办得最有成绩的，还是民众阅览室和民众学校呢。民众阅览室是整天开放给民众到来阅读的；民众学校，在我们吃过晚饭后，便是那里上课的时间了，班址是借用萝村国基校的教室，有高级和中级两班，学生共七十余名，完全是萝村的妇女，有年逾四十的老太，有年轻的少女，有十龄的女孩，他们都很高兴的学习着，每晚上两堂课，等在民众学校下课归来，也就是我们快到上自修课的时候了。

因为没办法买到光力强大的汽灯，所以自修课只好是三四个学生共着一盏煤油灯，在寝室里自习了，这寥落的山村，在夜里是多么的恬静啊！然而却被唧唔的读书声冲破着这凄寂的空气了。

学生们是这样努力地在学习着工作着，然而他们的营养是怎么样的呢，这里真奇怪，在南宁沦陷后，市面的物价，就像洪水一样地高涨，每月的膳食，由国币十五元跳到三十五元，但送饭的菜，却只是三碟缺乏油水的蔬菜，每餐吃到第二碗饭时，连青菜汤水都一扫而空了，第三碗也只好吃着白饭而已。上期到墟日的早餐，还有几小片猪肉吃，现在因为米价涨到五十元一百斤市称，猪肉是没有再尝的缘分了。于是乎国专的学生，都变成了尼姑和尚，天天吃着长斋。那些沦陷区的学生，好在教育部有贷金以资救济，不然他们连吃长斋也没有福分呢。

国专在全国最高学府中是顶穷的学校，国专的学生，也是过着最刻苦的生活，然而因为这学校底全体师生是具有坚强的刻苦耐劳的合作精神，终能克服着当前底一切困难了。几经摧残的国专，它在抗战底磨难中，将换着个蓬勃的新姿态，出现

于国人的面前，国专的学生，在饱尝艰苦的生活中，也更充实起他们做人的技能来了……”

从本年七月起，开始在桂林东南、离市区约十余里的穿山建造国专桂校的新校舍。由于此前国专桂校的所在地北流萝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给聘请教员、购置图书、招收新生、增加设备等事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故从本年起，国专桂校在桂林附近谋建新校舍。当时国专桂校向广西省府申请在桂林建校，得到赞同，并拨款一万元支持；同时又得到广西银行和广西合作金库贷款，于本年六月购地于桂林东南、离市区约十余里的穿山，七月起开始建新校舍。桂林穿山新校舍的建筑是分期进行的，经过前后三年多时间的努力，才全部建成。有礼堂、图书馆、教室、办公室、男女生宿舍、教工宿舍、运动场等设施，占地约三百亩，可容纳学生五百余人。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本校简史》：“三十年六月，购地于桂林穿山；七月，建新校舍。”

《教育文化消息·补助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经费以资扩充及改进》（见《广西教育通讯》第三卷五、六期合刊，民国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函送该校组织大纲、学则、课程表及教职员学生名册等。请由三十年起按月发给补助费国币一千元一案，省政府以该校在苏办理历史甚久，成绩颇优，抗战后辗转搬迁，而弦诵不辍，自迁至北流，极度艰窘中，仍继续努力不懈，便利本省求学青年之处亦多，爰经电复准予三十年度特别拨助经费国币一万元，以资从事扩充及改进，并将此项经费一次拨送该校云。”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学校迁桂后，因战事关系，与过去校董都中断了联系。一九四一年七



月，国专重新迁回桂林，是经冯先生的努力，取得梁漱溟先生的协助，成立了校董会，由梁先生出面请李济深担任董事长，李任仁、黄绍竑、刘侯武、黄星垣、盘珠祁、雷沛鸿、梁漱溟等任校董。其中一部分人是梁的关系，一部分人是冯先生的关系，如黄绍竑、盘珠祁、雷沛鸿等……由于校董会的号召，向社会上募得了几笔款项，又向省府申请在桂林建校，得到赞同，并拨款一万元支持，又得到广西银行和广西合作金库贷款，穿山的校舍，陆续建造起来。校址有地三百亩。计划建设能容纳五百人的一所学校……在战争时期，所有内迁的学校，像这样有一定规模自建校舍的是很少有的。”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因战局的稳定和学校的不断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新问题，如师资、交通、校舍、供应、医药等等，矛盾愈来愈突出，于是决定重返桂林。为了把学校重新迁回桂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首先得到广西省府的同意和拨款补助，又聘请了地方上有影响的和当时旅桂林有声望的人士担任校董，如李济深、黄绍竑、刘侯武、李任仁、黄星垣、梁漱溟等。在董事长李济深的发起下，向社会上热心教育的人士募捐筹款，以后在校舍建筑时又得到广西银行和广西合作金库的帮助，临时贷借建筑费。一九四一年春在穿山自建校舍，建筑是分期进行的，经前后三年多努力，才全部建成。有礼堂、图书馆、教室、办公室、男女生宿舍、教工宿舍等十六座，一律瓦顶平房，另有运动场等设施，占地约二百亩，可容纳学生五百余人。穿山在桂林东南，离市区约十余里，漓江的一段分支小东江流经其旁，附近林木茂盛，风景也很秀丽。学校迁去后，开阔道路，种植花树。为怀念在沪上坚持办学的茹经老人——唐校长，特地在穿山山顶建了一座‘茹经亭’。”

按：上引王桐荪两篇文章中的记载，给人的印象是国专桂校校董会成立于在桂林穿山建设新校舍之前。但据苏州大学档案馆所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会议纪录》，其中记录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商聘校董第一次谈话会议”的时间为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这次会议的性质类似于成立校董会的筹备会。“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桂第一次校董会会议”的时间为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又《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本校简史》中亦记：“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开迁桂第一次校董会议，推定李任潮（济深）先生为董事长。”据此可以判定，国专桂校董事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应该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其时，桂林穿山校舍的后期建设仍在进行中，仍需要大量资金，所以王文中所说的“在董事长李济深的发起下，向社会上热心教育的人士募捐筹款”，也应该是在此以后的事情。另外，虽然国专桂校校董会要到一九四三年二月才正式成立，但此前国专桂校与后来担任校董会成员的李济深、刘侯武、黄绍竑等人已有联系，请求他们出面向教育部吁请增拨资金，缓解国专桂校办学经费极度困难的问题，详后文。

李立德《无锡国专迁桂回忆录》（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九四〇年暑假后，国专就派人到桂林筹备建校工作，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建校于穿山并于是年秋季在桂林招生。学校很宽广，教室十间，学生宿舍三大间，教师宿舍两座，还有办公室、图书馆、茹经亭、运动场等。规模很大，面积共三百多亩，若从前门行至后门，一般都要二十分钟。学校周围都用篱笆围起来。国专的房屋的建筑是一个木框为廓，四面墙壁是用竹片糊以泥浆，再粉饰石灰。窗门有个框架，没有玻璃，川纱纸涂生桐油以代之。枫庐是教授住宅区，周围的枫树参



天，夏日清风习习。住枫庐的老师，都在树下宿舍前面吃饭、聊天、谈学问。校内广阔的空地，普遍种上桉树，每株约两米高。桉树还未长大，学校布置学生间种蔬菜，每人种一畦，有三、四平方米宽。同学多数种豆类、瓜类等作物。”

七月六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字任潮，一八八五～一九五九）亲笔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此前，国专桂校曾备文呈请教育部，因抗战后无锡国专原有的经济来源“四去其三”，而物价腾涨，经费极度支绌；又兼学校将由北流萝村迁至桂林穿山，故向教育部申请速拨建筑费数万元，并增加每月经常费二三千元。李济深在此信中，敦促陈立夫能遂其所请，以济国专桂校的燃眉之急。

李济深致陈立夫函（民国三十年七月六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立夫部长勋鉴：顷据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函称：该校创办迄今已廿余年，素以阐扬固有文化、提倡民族道德为职志。前在江苏，甚得政府之赞许与社会之信仰，财政部及江苏教育厅均予补助，并有常年经济校董。后因抗战，迁来北流，经济校董既难援手，江苏教育厅亦停补助，而财政部又作六折发给，经济来源四去其三。在此万分困难之中，该校努力支撑，将及四载。今春虽蒙贵部核准该校补助费全年八千二百元，然合财政部所给，月不过一千数百元，较抗战前收入又不及十之三四，而生活增高奚翅十倍。相差如是之巨，终难维持；尤以北流近来米价涨至每百市斤法币二百元，延师招生，益感困难，不得不谋迁地为良之计，遂决议于下学期迁来桂林。广西省政府已拨有迁移费一万元，但建筑校舍，纸窗木壁，堪避风雨，亦需六万余元。现虽已在穿山动工，而建筑费尚未筹得。迫不得已，业经备文呈请贵部速拨建筑费数万元，并增加每月经常费二三千元。以常有地主之

谊，愿为一言于吾兄，俾遂所请，以济眉急，而维承允。查该校所称困难，自属实情，艰苦奋斗，良堪嘉许。今国学人才急宜培养，尤以广西国文师资殊感缺乏，国内专研国学之专科学校，仅有该校，又有悠久历史，于国于乡于该校，均以为有维护或扩充之必要。且贵部既予补助，则亦已重视之矣，似宜予维持到底。处在今日，涓滴之水，决不足以苏吞舟之鱼。事实如是，无容讳言也。望兄始终其事，俾遂所愿，不特延国学于一脉，且光民族文化于无穷，是岂仅该校之幸而已哉。用敢不揣冒昧，敬致一言，请亮察是荷。即颂 勋绥 弟李济深。”

按：由教育部属员代拟的陈立夫复李济深函中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经费困难自系实情，惟以国库支绌，无法多言补助。本年补助费已分配无余，下年度自当酌予增加，私立学校例不发给移建费，非薄于私立学校，实经费有限，力有未逮也。”

九月，国专桂校由北流萝村迁至桂林穿山。

冯振《呈报本校已在桂林穿山建筑校舍，自本学期起即迁桂林上课请赐察核备案由》（民国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本校自二十七年冬，因桂林疏散人口，迁来北流，租赁民房赓续上课，迄今将及三年。虽正常发展，惟力是视。但以僻处一隅，交通不便，聘请教员、购置图籍、招收新生、增加设备种种俱极困难。不得不在桂林附近谋建校舍，以作永久基础。于七月十日以山字第零一一四号公文呈报钧部在案。兹桂林校舍将告完成，亟须迁往开学上课。现拟日内即自北流开始向桂林迁移。以后钧部训令、指令、明密电报均请迳寄桂林穿山本校……”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本校简

史》：“（三十年）九月，重迁桂林穿山新校舍。”

秋季开学，有学生二百余人。国专桂校在桂林穿山办学约有三年时间；在此期间，除原有教师外，先后聘请吴世昌（一九〇八～一九八六）、向培良（一九〇五～一九六一）、李一真（名克诚，字一真，以字行，一八九二～一九七三）、张世禄、万仲文（原名蔚程，一九一一～一九八八）、吕逸卿（一九〇五～一九八二）、黄景柏（生卒年不详）、卜绍周（生卒年不详）、徐焕（生卒年不详）、王震（字子威，又作子畏，生卒年不详）、陈竺同（原名陈经，字啸秋，一八九三～一九五五）、蒋庭荣（字毅庵，庵又作厂，生卒年不详）等人来校授课，其中一部分人是广西大学、广西师院、广西医学院的教授，应邀在国专桂校兼课。又上述诸人中，向培良讲授散文、诗、词等课程，并曾由其邀请田汉（原名寿昌，一八九八～一九六八）来校作演讲，宣传戏剧对抗日救国的重要；李一真讲授中国文化史。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四一年暑假，利用漓江水道把学校迁到桂林穿山。秋季开学，有学生二百余人，除原有教师外，先后聘请梁漱溟（特别讲座）、吴世昌、向培良、李一真、巨赞法师、张世禄、阎宗临、饶宗颐、万仲文、吕逸卿、黄景柏、卜绍周、徐焕、王子畏、陈竺同、蒋庭荣等人来校授课（部分系广西大学、广西师院、广西医学院教授来校兼课）。”

按：以上诸人，并不都是本年秋季一开学即受聘前来国专桂校任教的，有一部分如梁漱溟、饶宗颐、阎宗临、巨赞法师等人是以后陆续接受了国专桂校邀其任教的聘请，详后文。

又按：本书一九三九年事中已叙及，张世禄于该年中在国专沪校任教。据周忠谋《痛怀恩师张世禄先生》（见《无锡国

专在广西》)一文记,张世禄于“一九四〇—一九四七年间到西南各省”,任教于西南各省的多所大学,故本年中又转而应邀至国专桂校授课。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文中亦提及张世禄由国专沪校转而至国学桂校任教之事:“张世禄先生在学期中途到桂林去了,他仍在国专桂校兼课。虽在两地,两校在感情上是相通的。”

庞心逸《抗日期间无锡国专迁桂回忆》(《见无锡国专在广西》):“向培良老师,教散文、诗、词,他是戏剧名家,对宋词元曲深有研究。田汉先生与向培良老师是深交,曾来学校作过演讲,宣传戏剧对抗日救国的重要。同学深被感动,桂南的同学拟以抗日内容编演粤剧,向老师予以嘉许与鼓励。”

林起文《我对李一真教授的一些回忆》(见《无锡国专在广西》):“李老师担任我们班的《中国文化史》。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课本,是教授自己编写的讲义,他对教学很认真,上课前先写好教学提纲。上课时候在黑板上写出提纲,接着口头讲授课文内容。他能开口成章,直如流水,分章分节地让学生一句一句笔记,对我们讲授了一年的《中国文化史》,同学所笔记的就成为一本有次序、有章节、内容丰富的《中国文化史》。同学们也增加不少的知识,大家都交口称赞李老师教得好!同学都尊敬他,钦佩他。”

十二月五日,教育部派督学王风喈(名雍,字珂生,又字风喈,以字行,一八九六~一九六五)到国专桂校视察。王风喈在后来向教育部递交的视察报告中称国专桂校“办理尚为认真,学生风纪尚佳”,惟“该校经费极为困难,如不新辟来源,上述各项,不特不能改进,即维持现状,亦属难能”。

王风喈《视察报告》(见《教育部派员视察私立无锡国学

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报告及有关文件》：“（一）概况：该校自北流迁桂林，选定穿山为校址，购地四十余亩，建筑新校舍大小十二座，约可容学生二百人。该校现有学生一九〇人，分三年制五年制两种。三年制系旧制，招收高中毕业生，各年级共有学生四十二人；新制招收初中毕业生，五年毕业。现有一年级七十八人，二年级四十五人，三年级二十五人。（二）视察意见：该校办理尚为认真，学生风纪尚佳；唯图书设备应陆续增加，课程亦应更加充实，教员待遇应酌予提高。据报该校经费极为困难，如不新辟来源，上述各项，不特不能改进，即维持现状，亦属难能。”

按：王凤喈视察结束后向教育部递交的，除上引《视察报告》外，还有一份油印的、由视察者逐项填写的《专科以上学校视察项目简表》。该表共分四大类：甲、关于学校行政及经费者；乙、关于课程及教学者；丙、关于训导者；丁、其他应行视察事项。每类设若干大项，每大项下又设若干小项。王凤喈在甲类第四项“经费之支配与支给”第一小项“经费之来源如何”栏下填写“该校现无基金，除政府津贴及学生学费外，无固定收入”；在丙类第五项“体育卫生设施”第一小项“学生营养如何”栏下填写“营养似不甚佳”；在丙类第五项第二小项“学校各部分（如教室宿舍厨房厕所浴室等）卫生设备及设施情形如何”栏下填写“卫生医药设备极感缺乏”；在丙类第五项第五小项“体育设备足敷应用否”栏下填写“体育场尚可，其他关于体育之设备，甚感缺乏”；在丁类第一项“上次视察后遵令改进情形”第一小项“遵办情形如何”栏下填写“关于增筹经费、增加图书及体育设备以及提高教员待遇等项，均未做到”；在丁类第一项第三小项“如未改进，未能改进之原因何在”栏下填写“未能改进之原因，

大部分囿于经费之困难”。实际上，“经费之困难”，是上面列举的各项问题的共同根源。在王凤喈递交视察报告后，教育部给国专桂校下达训令云：“该校前经本部派员视察，据送视察报告，该校办理尚属认真，学生风纪尚佳。惟图书及体育卫生等设备，均感缺乏，应分别添置；课程应更加充实；教员人数太少，应设法增聘，并将待遇酌予提高。校长下设秘书处，与规定不合，应改于校长室设秘书一人。又该校经费困难，应设法增辟财源，以资改进……”

十二月五日，到国专桂校视察的王凤喈为学生作演讲，讲题为《中国文化之特点》（据《桂林文化大事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十一月二十一日，国专桂校备文呈请教育部，因该校建筑及设备费所需浩繁，亏欠颇巨，除请于本年度续拨补助费三万元外，并请于下年度起，每月赐拨经常费一万元，以资维持。十二月三十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致函教育部，敦请其对于国专桂校增拨补助费的请求能予以照准。

黄旭初致教育部函（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案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函，以‘本年度自北流迁至桂林，曾蒙拨助经费及迁移费共国币二万元。现因建筑及设备费浩繁，亏欠颇巨，除请由贵部核发经临费外，请于本年续拨补助费国币三万元，并请于三十一年度起，每月赐拨经常费一万元，以资维持’等由。查核该校自抗战军兴，辗转迁移，迄今四载，以学校负责人员坚苦维持，尚能弦诵不绝。迁桂以来，对于各省青年学生收容培养，尤切需要。现因新建校舍及从事扩充与改建，经费维持困难，确属实情。惟本年度已届终结，且省库支绌，未获拨款补助；三十一年度省库支出经已划



归国库统筹。素仰贵部为国育才，不遗余力。对该校经费之困难，拟请特予补助，以资维持……

按，教育部复函称：“查本部业于上年十二月底汇拨二万元救济该校，至本年度之补助费，俟分配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时，当酌量拨给。”

本年中，无锡国专第二十届学生毕业，毕业生计有蔡德存、蔡安漩等二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

国专沪校

元旦，国专沪校学生请赵景深（曾名旭初，一九〇二～一九八五）来校讲昆曲。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四一年元旦，同学们请赵景深先生来讲昆曲。赵先生唱了几阙曲子，由吴鹤望同学（曲学名家吴梅的本家）揆笛。吴鹤望、吴鹤年兄弟也唱了几阙。晚上，同学们与陆景周先生闲谈，有人说不妨请钱名山先生也来做一次报告，陆先生没有作声。同学慢慢地散了，只剩下少数几个。他看了一眼，都不是名山先生的学生，就说：‘这件事不要再提，唐校长不会同意的。因为钱老还留着辫子，请他来演讲，未免惊世骇俗。几年前有人提出，校长没有同意。’我问过好几位老校友，他们也说没有请过留辫子的遗老到校演讲。”

国专沪校民国二十九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邓蕙、金悉经等二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二十九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农历正月开学，共到新旧同学一百三十六人（据唐文治

著、唐文治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辛巳七十七岁》)。

一月八日，唐文治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无锡国专原由财政部每月拨发补助费二千元，因战事发生，随减发为每月一千二百六十元，且由沪、桂两校平分此数，沪校每月仅得数百元，致使国专沪校经济支绌，教职员生活困难。唐文治信中要求能照原规定之每月二千元按月十足发出。后教育部批示“碍难照准”。

唐文治《呈为本校各教职员生活艰辛恳请俯准转咨财政部赐照原案规定补助费金额二千元按月十足发给由》(民国三十年一月八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窃按查本校前因经费支绌，呈蒙钧部转咨财政部准予拨给补助费，按月具领在案，阖校感戴。惟是目下物价飞涨，生活增高，各教职员等环请，谓照目前待遇，对于家庭事畜，实苦无法维持，应请校方急于救济，庶得安心服务等语。文治详加考虑，窃谓各教职员沥诚请愿，委系实情，仰屋而嗟，计无所出，焦灼万分。谨按查财政部给予补助费，本规定每月金额二千元，因战事发生，随减发每月一千二百六十元。际兹生活程度如是艰难，为始计所不料，而沪、桂两校平分此数，沪校每月仅得数百元之谱。除各教职员不敷补助外，其余各项开支，亦均无法筹垫。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部俯念艰辛，转咨财政部，请自本年一月起，按照原定金额二千元十足发给，俾各教职员赖以生活，免致本校前途有停滞之虞。窃念此事不过原案请免折扣，并非额外请求，敬恳钧部洞烛苦情，赐予照准。”

按：教育部指令“碍难照准”。

三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授唐文治、陆修祜一等服务奖状。

《教育部指令》(高字第〇八三九七号，中华民国三十年三

月五日发)》(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关于教员服务奖状、奖助金、久任教员奖金的呈件》):“三十年一月十日呈一件《呈请照章授予教员晋等服务奖状由》呈悉。查该校校长唐文治、教员陆修祐均已连续服务满二十年以上,准各加给一等服务奖状……”

按: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发布了《教员服务奖励规则》,其中的“给与标准”是:“一、在同一学校连续服务十年以上十五年未滿者,授予三等服务奖状。二、在同一学校连续服务十五年以上二十年未滿者,授予二等服务奖状。三、在同一学校连续服务二十年以上,授予一等服务奖状。”前已述及,一九四〇年九月,无锡国专有三人得到了服务奖状,其中唐文治、陆修祐因在国专任教未滿二十年,故被授予二等服务奖状;冯振因在国专任教未滿十五年,故被授予三等服务奖状。至一九四一年,三人因已符合规定的相关服务年限,故各加授一等。

本年暑假前,上海《正言报》借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升学指导,在报上称“无锡国专在上海只有补习部,没有什么分校”。唐文治指示由王蘧常起草,致函该报,历叙沪校筹办经过及招收新生的合法。《正言报》后以“来函照登”的方式登载。暑假中,报考国专沪校的生源大增,共招新生两个班。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四一年暑假以前,沪校已发展至二百多学生,三青团在旧租界办的报纸《正言报》,发现沪校有的教授在课上指责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揭露三青团的本质,就在报上和国专捣蛋。《正言报》假借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升学指导,在答复他们的问题中公然说:‘无锡国专在上海只有补习部,没有什么分校。’《正言报》诬指国专为补习

性质，激起了同学们的公愤，想向各报社投稿加以驳斥。校长传话：‘现值抗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是日寇，是汉奸，何必与报社打笔墨官司。学校当致函该报，促其更正。’遂由王蕴常教授起草，校长审定，致函该报，历叙沪校筹办经过及招收新生的合法。《正言报》自知理亏，只好用‘来函照登’的方式登载。这年暑假，考生大增。秋季开学，一年级分两班上课。《正言报》的捣蛋，反而替沪校作了‘义务宣传’。”

国专沪校民国二十九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徐韞珍、严古津、胡希文、匡汉拯、张善同、张能涵、吴鹤望、吴鹤年、秦履直、尤锺伟、王馥孙、夏维梓等十二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二十九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历届毕业同学名录·沪校毕业同学名录》）。

本年秋，国专沪校第一次开设英语选修课，先后请许国璋（一九一五～一九九四）和张仲礼（一九二〇～）担任授课教师。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四一年秋，沪校第一次开英语选修课。唐校长认为既然开设英语，就应聘请学识和教法很好的老师。当时是请的许国璋先生，后来由会计主任张仲礼担任。”

九月间，本年下学期开学后，因年老体衰且地址较远，唐文治为交通大学开设的国学讲座，改在国专沪校所在地——上海爱文义路乐群中学（今北京西路九四七号）内进行，时间在每星期日上午。交通大学及其他学校学生均可入坐听讲，同时国专沪校师生亦可得其面授。因国专沪校礼堂较狭窄，用扩音机传播，附近教室及廊檐下亦可传达，每次听众常有三百余

人（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辛巳七十七岁》）。

按：唐文治为上海交通大学开设国学“特别讲座”，开始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据《茹经先生年谱续编》记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胡生粹士携黎照寰校长信来，谓交大拟设特别讲座，请余每星期讲授一小时，以道德文学大纲为主，许之。”“（一九三九年）六月……余在交通大学逢星期日演讲，已二学期……”“（一九四〇年）正月……逢星期日上午仍赴交通大学演讲经学、文学。经学讲孟子分类，文学讲余自作文数篇，以救民命为宗旨，内以《说雪哀民》、《慈幼保种》二篇最为诚挚感人。”至本年九月开始改在国专沪校内进行。一九四二年八月，汪伪“教育部”强行接管交通大学并改为“国立”，校长黎照寰率领大多数师生愤而离校。不久唐文治因摄护腺手术而行动不便，持续了数年之久的国学讲座才告结束。交通大学后将唐文治所讲授内容整理编印成《唐蔚芝先生演讲录》一至六集。

十二月八日，日军侵入上海旧租界。十日，唐文治就学生对日军可能会强迫学校登记的忧虑表示：“唐某决不妥协！”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侵入旧租界。第二天，我们宿舍旁的暨南大学就被日军查抄，整整一天门口有日军站岗。十日上午，我和祁文才到校长家，请示进止。唐校长说：‘学校继续上课，我观日军不可能干预上海这许多学校。’我问了一句：‘日军会不会强迫学校登记？’唐校长说：‘唐某决不妥协！’”

国专沪校的学生于上课之暇，在教师的指导下，先后发起成立了史学研究会、变风诗社等社团组织。本年中，变风诗社成员的诗词选集《变风社诗录》印行。

胡子远《无锡国专漫忆》：“四十余年前，我赴上海无锡国专读书……无锡国专学生学术研究空气较浓厚，要求进步者亦很多。就笔者所知，介绍两个学生组织的进步社团。

一、史学研究会。以研讨历史，发扬爱国主义为宗旨。参加者，有黎民、章品镇、吴闻、王馥荪、陆心国、汤志钧、顾小岚（已故）等同学。学会敦请王蕴常先生为顾问，王先生亲为题字。后制成‘史学研究会’图章。敦请吕思勉、周予同、周谷城等先生为导师，轮流作讲座。当时物价暴涨，孤岛生活水平尤其高，教授们收入不多，生活清苦，常要几个学校兼课。但是，老师们不仅挤出休息时间为我们义务作讲座，而且还自己出车钱，远程赶来上课。老师们的高尚风格，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我们还‘予取予求’，有时出了论题（一般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知识），请先生作专题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章品镇拟了《三十年来的文艺思潮》，请周予同先生主讲。事后，周予同先生笑着对我说：‘你们出的“试卷”好厉害，使我准备了两天！’由于周予同先生亲身参与了‘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斗争，故讲来深刻生动，精采纷呈，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后来，这篇讲稿，由进步刊物作为压卷刊载。

二、变风诗社。诗社筹组阶段，还有一段小故事。严古津和我请王蕴常先生取个社名。王先生针对当时孤岛上抗战悲观论的逆流，教育我们说，作诗不是单纯的言志咏景，而是要移风易俗。故据‘变风变雅’之义，取名为‘变风诗社’。王先生并亲自挥毫，为《变风社诗集》题签。诗社主要参加者有严古津、江辛眉、吴闻、沈幼征、顾小岚等同学。诗社敦请钱仲联先生担任诗导师；夏瞿禅（承焘）先生担任词导师。仿‘南社’例，为旧体诗词形式。很多诗词作品，能‘为时而作’，具有时代气息，歌颂了爱国主义

精神，谴责敌寇侵略罪行。周予同先生风趣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旧瓶装新酒。’我和亡友严古津，还有一重渊源，即同拜常州钱名山（振煌）先生（时先生避日寇住旧辣斐德路桃源村三十号）为师。钱老先生年已古稀，是‘阳湖派’传人，书法驰誉海内，诗文（有《名山集》多集）刻集行世。‘变风诗社’请名山先生为‘会外导师’。钱老先生亦极喜奖掖后进，记得吴闻同学《饥乌行》刻划为虎作倖、欺压平民之‘印度巡捕’形象，有句道：‘朱帛绕题面漆黑。’钱师对此很赏识，赞为‘有新意’。”

王遽常《变风社诗录序》（见该书卷首）：“民国二十九年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诸生将结诗社，请名于予。予曰：变风可，慨乎时而名之者也。既结社之数月，又请曰：为诗无新意，所循者皆前人之旧法，所言者又前人之陈言，将何所从？予曰：诗之上者通乎政，三百篇是已。政治之变无所极，则诗亦缘之而无所极，且不仅政治而已。凡天地之间，动者皆有变，无有陈旧而不可入诗者；即静者，以吾人之心遭之，即历千万年而不变更者，亦无时而不变矣。故善为诗者，其境常新，安有所穷？且今世世界之变，为前人所未尝闻未尝见，则所为当远胜古人，安能为古人所囿？是在我人之自为而已，当与诸生共勉。其年冬，社中有诗集之刊，乞予言，遂书其问答之辞以弁其首。嘉兴王遽常。”

按：王遽常《抗兵集》中亦收此序，文字与上录有所不同。

《变风社诗录》严古津跋：“予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之明年，钱师仲联自桂林归，授以诗学。同学柳君子依、林君子渊、金君悉经谓予曰：校中不乏吟侣，吾侪盍组织诗社以相观摩可乎？涉秋开学，子依毕业去，子渊道阻不得来，乃由金君

悉经、吴君予闻、江君文忠、王君之雄、皇甫君权、何君祖述、张君庆及余发起同学，参加者四十四人。于是请名于王师瑗仲。师曰：不亦善乎，此世道陵夷、海水群飞之日，名之曰变风可，并指示组织之方法而促成之。社既立，群议敦请王师瑗仲为顾问，郝师曷衡、钱师仲联、朱师大可为导师，干事则张君庆、皇甫君权、王君之雄、周君企任、江君文忠、秦君翔，而余亦与焉。社事之推进，秦君翔、江君文忠之力最多。凡征诗四次，分呈诸导师评改，得二百余首，又请瑗师审定，行将付梓。瑗师命予书其经过，敢述其大略如此。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日无锡严古津跋于沧浪吟馆。”

按：《变风社诗录》，无版权页，据严古津跋，此书当刊于一九四一年。集中共收录变风诗社成员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词共一百五十八题，正文前有王遽常序和唐文治、夏敬观、夏承焘、姚德凤、钱任远、钱萼孙、朱大可题辞及鲍鼎弁言，书后有严古津和秦翔的跋语。

本年中，任铭善（字心叔，一九一三～一九六七）应邀在国专沪校授课，讲授《礼记》。后来他以在之江大学和国专沪校先后讲授《礼记》的内容，撰成《礼记目录后案》一书。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序》（见该书卷首，又见作者《无受室文存》）：“庚辰春，以《礼记》教于之江大学。明年，复教于无锡国学馆，朋友讲习之际，既叹其难，思有以祛之。乃以平日所取以折衷权衡者记于篇，既而取郑君《目录》分系之，曰《礼记目录后案》。其志尚欲治全书以赞儒先之成功而补其阙佚，盖有待焉耳。”

按：陈祥耀《对唐茹经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的几点体会》一文中谈到在国专沪校的任教者时记：“任铭善先生担礼制研究课。”《礼记目录后案》后于一九八二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国专桂校

本年中，国专桂校仍在广西桂林穿山办学。

一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授冯振二等服务奖状。

《教育部指令（高字第四五三二六号，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发）》（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关于教员服务奖状、奖助金、久任教员奖金的呈件》）：“三十年八月一日呈一件《呈请照章授予教员晋等服务奖状由》呈悉。该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冯振在校连续服务满十五年以上，应予加授二等服务奖状，以昭激励……”

一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两广监察使刘侯武（一八九二~一九七五）亲笔致信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此前，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曾于上年十一月以航快代电，请求教育部赐拨临时补助费八万元；自民国三十一年度起，每月补助二万元作为经常费。刘侯武在此信中提出：“贵部如对于所请临时补助费已不便增加，则对于每月经常补助费必须力求绰裕。”

刘侯武致陈立夫函（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立夫部长吾兄勳

鉴：年底因汉民中学经费支绌，函请吾兄酌予补助。荷蒙本月十二日惠书，告以业由贵部补助三万元，备见吾兄关切，至所感纫，惟不知该三万元已全数拨发否？为念。桂林穿山村汉民中学附近，尚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盛誉不减汉民中学，而经费支绌过之。该校以保存国粹、复兴绝学为职志。自民国九年在无锡创办，惨淡经营，十余年间，已具规模。民国廿六年无锡沦陷，唐校长率员生数十人，转徙湘桂，备历艰辛而讲诵不辍。几番经播迁之后，至去年乃建板屋于桂林穿山村，圈地四十余亩，学生一百九十五人，寢寢乎不让无锡当年矣。不意桂林物价突然飞涨，一年之间，十倍于前，于是该校顿感经费支绌，殊难维持。查该校在无锡时，除国库补助外，尚有江苏教育厅及校董之补助。现江苏教厅及校董之补助久已断绝，所仰惟国库补助而已。虽无物价飞涨影响，国库补助尚需增加，况现有物价飞涨之严重影响乎？据该校代理校长冯振先生来言，尝于去年十一月养日以航快代电，请求贵部赐拨临时补助费八万元，以救眉急；自三十一年度起，每月补助二万元作为经常费。近奉贵部复电，三十年临时补助费已核发二万元，于原请八万元之数相去尚远；三十一年经常费则尚未核定等语。窃以吾国固有文化必须保持，民族精神尤须振发。该校专修国学，于保持固有文化、振发民族精神不为无功。当兹国族存亡之际，该校不憚万里播迁，多年辛苦，用以统绪不坠，规模渐宏，实属难能，弥足珍惜。吾兄司教邦家，对该校之爱护，必更在一般人之上，当无疑也。今该校实困于经费，至于将不能维持，非有大力援助不可。贵部如对于所请临时补助费已不便增加，则对于每月经常补助费必须力求绰裕，恳请吾兄从速核定，俾该校有恃无恐，安心讲诵，至所盼切。如何之处，并希惠示为荷。专此，祇颂 勋绥 弟刘侯武 谨上。”



按：由教育部属员代拟的陈立夫复刘侯武函中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经费困难，历经本部拨款补助有案。本届当俟支配三十一年度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时酌量拨给。”

约从本年二月起，梁漱溟（名焕鼎，字漱溟，以字行，一八九三～一九八八）应冯振之邀，为国专桂校学生开设《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门课程。

梁漱溟《我和冯振先生》（见《无锡国专在广西》）：“我几经受难，辗转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初又回到桂林。当时，全国文化界名人大多聚集桂林。冯先生也从北流迁回桂林穿山办学。他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闻说我已回到桂林，就多次致函邀我去讲学。盛情难却。我欣然从七星岩教育研究所搬到穿山去住，为国专开设了《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门课程。他知道我好静，特意安排我住在半山腰的房子里。我不食荤腥，他又嘱咐其夫人每餐另设素食，并亲自送来，日日如此，从未间断……”

李渊庭、阎秉华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一九四二年》：“（二月）……再又移住穿山‘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冯振）。受冯校长招待……先生住穿山‘国学专修学校’时，曾被邀为该校学生作《中国文化要义》为内容的讲演。”

萧德浩《漱溟先师在无锡国专讲学的情况》（见《无锡国专在广西》）：“我是四十年代初考入桂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梁老师在香港沦陷前夕，得到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帮助，化装逃离香港，经过几番周折，来到桂林。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梁老师应冯振代校长的邀请，住进无锡国专校园内（校址在桂林市东郊穿山村，与汉民中学隔壁），并开设《中国文化要义》专题课。每周讲一次（每次上午三个小时），全校学生不分年级，都来听课。当时，冯振代校长经常来听

课。三、四百人，将一个木板结构的礼堂（也是饭厅）挤得满满的。梁老师讲课时，礼堂里鸦雀无声，大家为丰富的内容、精湛的哲理、精辟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所吸引，它似一块具有强大磁力场（的磁铁），吸引着数百颗年青的求知若渴的心，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按：上文中说梁漱溟在国专桂校开课始于“一九四三年”，当是误记，应为一九四二年。

周忠谋《追忆梁溟漱先生》（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之间，我就读南迁桂林的江苏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抗日前夕该校南迁长沙、桂林，后迁广西北流山围）。有一段时间，梁先生住在我们学校，校领导敦请梁先生主讲哲学，梁先生慨然允诺，每星期给我们举行一次哲学讲座，主要是讲授《中国文化要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生讲课不用讲稿，也不带课本，分析问题，例证充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语尽精微。课室内座无虚席，课室外也站满了人，讲课时间长达五六小时，听者肃然起敬，毫无倦容，膳厅内饭香菜香，听讲学生没有一个去进餐的。梁先生亲切和蔼的目光，不断地扫射全场，课室内外，鸦雀无声。”

三月十三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字季宽，一八九五~一九六六）致电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敦请对国专桂校“大力维持，优予补助”。

黄绍竑致陈立夫电（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陈部长立夫兄：前过桂林，晤无锡国专代理校长冯振心兄，谈及经费困难，拟请补助。该校深造国学，久膺时誉；间关艰苦，自系实情。务恳大力维持，优予补助。”

按：由教育部属员代拟的陈立夫复黄绍竑电中称：“本年补助无锡国专校经核定总数八万五千一百二十元，可请释念。”又此件后粘有一纸，上书：“无锡国专校卅一年度补助费：一、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项下拨助三万元。二、国库专款项下拨助一万五千一百廿元。三、另补助该校文书专修科四万元。以上总计八五一二〇元。”

四月十五日，一九四〇年度专科以上学校学业、操行、体育成绩特优学生，经教育部核定，颁发奖状，国专桂校学生卢绍绪得奖（据《桂林文化大事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本年夏，奉教育部令，国专桂校开办二年制文书专修班，此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造就文书专门人才之始。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卅七年度毕业纪念刊·无锡国专校史》：“三十一年夏，奉部令拨款指办二年制文书专修科，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造就文书专门人才之始。”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四二年夏，教育部指示办二年制文书专修班，在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中首先造就文书专门人才。那时学校有本科三年制和五年制，兼办文书专修班，学生增至二百八十余人，为国专在广西的极盛时期。”

吴淞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另外，由于国专的国学教育有了一定的成绩，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赞扬，也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青睐。在国专迁往穿山不久，教育部于一九四二年委托其为国家培养专业文秘人才，此举可以说是对国专的信任和肯定。两年制文秘专业的开办，使得国专获得了教育部一笔宝贵的开办费，另外每年还有一笔经常费。这对国专渡过经济难关，有很大的作用，而且通过为教育部委托培养文秘专业的人才，扩大了国专的影响。国专桂校的这一创举，

也在国专沪校实行。此后，两年制的文秘科、五年制的国学专修科也均在沪校开办。”

九月四日，李济深亲笔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请求增拨国专桂校民国三十一年度特别补助费八万元，并拨发民国三十二年特别补助费每月三万元。

李济深致陈立夫函（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四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立夫部长吾兄勋鉴：久不奉教，比维勋祺日懋、道履绥和为诵。兹有恳者：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重迁桂林，历时一载，凡百设施，不遗余力，规模已具，发展可期。而闾校员生之刻苦淬砺精神，尤属难能可贵。惟近以物价腾涨，经费拮据万分，举债累累，筹措无门。顷已呈请贵部增拨卅一年度特别补助费八万元，卅二年度月助三万元，以资维持发展。该校既往成绩及目前困难，谅早在洞鉴之中，无待缕述，敬希俯念私立学校缔造之艰辛、维持之急不容缓，于文到之日，惠予核准，俾垂绝国学，得庆重光，教育前途，实深利赖。专此奉达 并颂 勋绥 李济深。”

按：由教育部属员代拟的陈立夫复李济深函中云：“查私立无锡国学专校本年专款补助计一万五千余元，又在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项下拨给三万元，另补助该校文书专修科五万元，合计补助九万五千余元，均经陆续发给。本年年终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特别补助费一节，应候汇案呈院核拨，俟奉准后，再行酌拨。至该校三十二年度补助费数额，俟支配时，当予注意。”

九月二十四日，国专桂校在桂林市乐群社召开商聘校董第一次谈话会议，出席者有刘侯武、雷宾南、李济深、黄鍾岳（字子敬，约一八八五~一九五三）、李任仁（字重毅，一八



八六~一九六八）、徐启明（又名成，字光华，一八九三~一九八九）、冯振等人，会上的议决事项有：一、呈请教育部增拨特别补助费及经常费；二、函请广西省政府拨发特别补助费及经常费；三、向外募捐（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会议纪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商聘校董第一次谈话会议纪录》）。

十一月一日，国专桂校邀请广西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剑脩作题为《防空心理之分析》的报告（据《桂林文化大事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十一月二十三日，李济深应邀在国专桂校演讲，讲题为《阐明“国学”二字之真义及一般人之误解》（据《桂林文化大事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十二月，广西省政府再次拨助国专桂校经费一万元（据《桂林文化大事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本年中，国专桂校学生吕苏民在全国大专论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据谢天球《无锡国专迁来蒙山办学及黄花学院简况》）。

本年中，卢冀野（原名正坤，字冀野，以字行，后改名卢前，一九〇五~一九五一）应邀到国专桂校演讲，演讲内容不详。

卢冀野《南行剩句》之十四（见《卢前诗词曲选》）：“丹枫翠柏森森地，纵有流莺那忍听。多少故人今陌路，南来还上茹经亭。”

按：本诗在《卢前诗词曲选·旧体诗选》中系于“壬午”年中，诗后有作者自注云：“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邀往演讲，赋赠冯校长振心。”又谢庭芳、陈国定、萧德浩、唐树人《桂林穿山无锡国专散记》一文中提到国专桂校曾“迎聘一批卓然

成家的学者教授来校任教”，其中就提到卢冀野。但卢冀野只是在国专桂校作了一次演讲，而非“任教”。

本年中，无锡国专第二十一届学生毕业，毕业生计有梁天一、农干五、卢绍绪、严庆添等四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

本年中，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的《自然室诗续集》排印出版。

冯振《〈自然室诗续集〉自叙》：“余自甲寅以迄癸酉之诗，曾厘为三卷，付之剞劂，以就正于海内君子。自甲戌迄今，忽又八年。此八年间，游踪所及，若京口、金陵、西湖、桂林，皆昔所曾至，若扬州、海虞、泰山、历下、北平、南口、汉口、武昌、长沙、邕宁，皆今所始至。而家国之变，离乱之苦，战士捐躯之壮烈，民众赴难之奋勇，不特生平所未经，抑亦亘古所稀有。其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固足以播之诗章、传诸天下后世而不朽，而余非其人也。忽忽八年，其所成诗不及二百首，较之前集仅三分之一。古人云：‘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又云：‘催租人至，遂败人意。’余虽未尝作吏，而学校值艰危之秋；虽未被催租，而家室多疾病之累。余事作诗则诚有之，诗外犹有事在，抑又何敢其存而不弃？亦犹前集自叙所谓‘可以为今吾知故吾之藉’云尔。”

按：冯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所作之诗，曾编为《自然室诗稿》，有无锡锡成印刷公司一九三三年排印本。《自然室诗续集》中收录的，为作者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所作之诗。其后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七四年所作之诗，编为《自然室诗第三集》，有油印本。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此三集与作者所著《诗词杂话》合编为《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中



所收录的作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尤其是抗战期间的许多诗作，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无锡国专迁徙流离、艰苦办学的情状。

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袁炳坤、顾菀若、吴润仙、管毓德、张庆、秦翔、顾小岚、陆心国、周厚堦、卢晓德、张惠民、王之雄等十二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历届毕业同学名录·沪校毕业同学名录》）。

农历正月开学，新旧同学共一百十余人。唐文治在校中任《诗经》、《论语》课各一节，用自编《诗经大义》、《论语大义》作教材（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壬午七十八岁》）。

六月十九日，徐治（生卒年不详）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请求对国专沪校予以经费接济。

徐治致陈立夫函（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部长钧鉴：本年二月间，职在沪时晤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据称：‘该校三十年度每月只由财政部迳拨补助费六百元，已深感竭蹶。太平洋战起，经费中断，而该校犹继续开办，以符部长作育人才之盛意。本学期学生因环境关系提先到校者只四十余人，函称已在途者百五十余人，教职员仍为十余人。而经费枯竭，来日大难，恳代呈部长乞于汇拨上海各校经费时惠予巨款接济，不胜感幸’云云。以职所知，唐校长耄年讲学，不憚艰辛，风

雨鸡鸣，扶持正气。所请一节，敬乞钧裁。”

按：教育部训令云“查该校本年经常补助费已由部拨叁万元，应在此款内酌量匀拨若干，汇该校上海补习部”，又此件上方注“此件寄桂林”。

秋间，国专沪校事务主任卢景纯辞职，聘请教务主任王遽常兼任。聘请陈养浩（生卒年不详）为训育员。又会计员王友乾（生卒年不详）辞职，聘请张仲礼继任（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壬午七十八岁》）。

张仲礼口述、施扣柱整理《张仲礼先生回忆录》：“有的时候，我中午还要到无锡国专去，就是我院历史所汤志钧读过的学校。我帮他们管账，管会计。那个时候，后来复旦的胡曲园啦，蔡尚思啦，都在那边教书，他们的工资都是我开的。我一般都是中午到那边去，一边吃饭，一边做账，做得很快，那个时候做账简单。他们学校另外一个事务员。如果我不在校的时候教职员工要领工资，我就托他把钱发给他们。”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任琪、宋瑛、陈荣卿、张菊生、叶理旦、皇甫权、徐永清、李兆熙、吴雯、闵世基、陆汝挺等十一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上述诸人中的陆汝挺（一九二二～），毕业后担任国专沪校的秘书工作。

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先生（按：指唐文治）因秘书陆景周先生年迈，需培养接班人，汝挺国专毕业后，先生命留在秘书处工作。想当年，汝挺侍坐先生，深感先生年事虽高，但富有民主作风。常言：‘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办事遇问题，提出个人意见后，经常征询景

周师和汝挺意见，最后作出决定。景周师谓先生从善如流，汝挺亦有同感。汝挺在先生培养和教育下，逐步能明辨是非，增长胆识。先生日常工作，常按事件缓急，开纪事单，办了一件，在事件上打一个圈。已办未了的加一点。先生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曾传授给汝挺，汝挺奉为圭臬，终身受用无穷。来往公文、信件、文章，慈善事业，均分门别类，立簿本、留底稿，标年、月、日，以便查考。”

八月，宝山金巨山介绍纱号孙寿熙（字煜峰，生卒年不详）、孙寿徵（字邦瑞，生卒年不详），采办事物所顾丽江（生卒年不详）、缪振堇（字天行，生卒年不详）、高垣（字君藩，生卒年不详），电影界费穆（字敬庐，一九〇六～一九五一）来从唐文治受业，每星期课以《论语大义》及《诗经大义》各一节，《先朝掌故》一节（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壬午七十八岁》）。

费明仪《怀念父亲》（见《大公报》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十三日）：“父亲（按：指费穆）对于中国的诗词、古典文学作品特别喜爱，并且深有研究，虽然他的丰富学识大部分是由自学、自修而得来，但是有两位曾由父亲正式跪拜并执弟子礼的前辈对他影响极大。一位老先生原籍福州，可惜姓名已不可考，只知他根据自己同窗挚友林畏庐（即中国翻译名家林语堂的号）为父亲取名‘敬庐’，一位是原籍无锡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唐文治先生。据说父亲自幼就爱看书，每天晚上读到深夜，等床头的油灯烧干为止。”

按：“林畏庐”非为林语堂，而是林纾。

八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强行接管上海交通大学，改名为“国立交通大学”，时在交通大学兼任教授的国专沪校教务长王蘧常与同事五人辞去交大教职，人称“反伪六教

授”。王蘧常并作《节妇吟》以自明其志。

《交通大学校史（一八九六—一九四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一九四二年八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本校，校名又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和青年会被解散，不少师生员工愤而辞职离校。”

王蘧常《自传》：“一九四〇—一九五二，上海，国立交通大学中文科教授（中因汪伪接收，与同事五人同离校，当时所谓反伪六教授也）……”

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王蘧常先生不就伪交大职，专任国专教务长，有《节妇吟》，先生（按：指唐文治）大为赞赏，常称‘璠仲已成王寡妇了’。”

王蘧常《节妇吟（某君书来以此代简）》（见《抗兵集》）：“有女十六余，皎皎冰雪姿。一朝嫁夫子，夫子出不归。三年沈消息，六年泪涟洏。邻媪前置辞，夫归不可期；藜藿且不继，苦守空尔为？不如嫁富儿，富儿真光辉：居有连云栋，衣有明月玑；食有五侯鲭，出有四牡骅。邻媪语未毕，女已泪双垂：自我嫁夫子，生死誓不携。生作山头石，死作江头泥。泥入江头水，犹得载夫归。悠悠生与死，区区寒与饥。富贵有时尽，此情无尽时。江山有时改，此心不可移（作者自注：命意似胜张文昌自记）。”

按：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新民晚报》有潘伯棠《怀念王蘧常先生》一文，中云：“在八年抗战期间，交大为汪伪接管后，王先生即毅然辞职，以示与汪伪决不同流合污，其后汪伪政府屡次邀请他出任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亦断然拒绝，并作《节妇吟》以明志。当时他家口众多，生活困窘，但他宁愿忍饥挨饿而保持民族气节，威武不屈的冰雪风操，使

我益加崇敬。”这段文字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据潘文，似乎是王蘧常辞去交大教授之职在前，拒绝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在后，实际上王蘧常拒绝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是在一九四〇年，见本书该年事中；而他辞去交大教授之职，则是本年中的事情。二是潘文说“其后汪伪政府屡次邀请他出任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亦断然拒绝，并作《节妇吟》以明志”，又王运天《王蘧常教授学谱》一书于“一九四〇年”中记：“是年某君书来，老师作《节妇吟》代简”，似乎也将《节妇吟》与拒任南京中央大学之职联系在一起，但王蘧常《抗兵集》中，是将《节妇吟》系于“壬午”年（一九四二年）下，故此诗之作，所为何事，当以陆汝挺的“王蘧常先生不就伪交大职，专任国专教务长，有《节妇吟》”的说法为可信。

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派人劝说唐文治出任伪交大董事长（一说是就任校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抗战期间曾在国专沪校任教的夏承焘于一九七五年闻知此事后，为赋《南乡子》一阕，以颂赞唐文治的节行。

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当时敌伪曾派人劝说先生（按：指唐文治）长伪交大，先生坚持民族气节，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严词拒绝。”

鲍正鹤致王桐荪书（见《国学之声》总第十二期）：“……然而先生（按：指唐文治）之政治表现更有不可及者……上海沦陷，交大迁渝，逆伪谋树沪校为幌子，请先生出任董事长，初先生并不悉其内幕，及来运动者一发言，先生即洞悉其狡计，不待高福扶持，起而离席，并以峻语斥之。建国以后，周予同先生以此见告，且描模其状。一九五四年万国

殡仪馆开吊，弟与朱东润先生同献花圈致敬，乃环视挽章，无有及其事者，朱翁深为诧异。一九七五年夏承焘先生见访于北图，夏在四十年代中期兼任国专教席，夫人似即为当时弟子，弟复以此事语之，夏乃为赋《南乡子》一阕……”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交通大学被敌伪接管后，少数院长、系主任没有离开，还是当他的原职，有的还升了‘官’。他们想请唐先生出来当董事长，一个当某院院长的唐门弟子，来看老师。讲了一番日、伪接管后交大的情况，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怕，还说自己是为了保护校产才留在校里的，最后说明了来意。唐校长说：‘我老了，名利之心淡了，也不想有什么作为，你也年纪不小了，立身处世自己应该好好考虑。君子不强人所难，各行其是则可也。’这段话颇有深意。此人后来对他的同学说，这是他第一次在老师跟前碰到的软钉子，感到羞愧不已。”

许岱云《唐文治先生轶事几则》：“……敌伪知道先生当时生活极为困难，企图利用他的资望，以威逼利诱的方法，要他出任上海伪交通大学校长；并故意散播空气，促他就范。当时，我风闻这种传说，曾约了在锡的几位同学徐友三、周达泉等具禀询问，先生接到我们的信，立即复书说：‘确有人来诱说，余已婉言拒绝之。余虽贫困，岂求升斗之水，以效涸辙之鲋乎？望汝等持吾书以告无锡诸生。’”

夏承焘《南乡子》（见《夏承焘词集》）：“乙卯秋，遇鲍正鹤君于北京，承告唐茹经翁节行：抗战时日军占上海，欲激翁出任交通大学伪董事长，胁翁签字。翁生计方窘，顾从容答曰：‘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拂袖不顾。余因忆希腊西塞罗语：凯撒欲杀一老人，老人不屈，问其何倚何恃，曰：倚我年老。余因名此阕曰倚老吟。”



龙血战玄黄，初见江楼鬓已苍（原注：龙血玄黄：《易经》：‘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江楼句：茹经翁在上海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聘作者为兼任教师）。摸索能知人几许，仓皇，别语匆匆未敢忘（原注：摸索句：茹经翁久失明）。晚节挺风霜，饘粥生涯歌慨慷。惊倒胡儿三两语，光芒！合向坟头篆数行。”

八月，国专沪校教授钱仲联应陈柱之召，任汪伪政权治下的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词林近讯》（见《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钱仲联先生（萼孙），近来南京，任教中央大学。”

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年表》：“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国专分校处境更趋困难，部分师生离沪返乡。应师陈柱之召，兼南京中央大学课务，不久聘为专任教授，与龙榆生等同事。”

按：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中记：“潘先生（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秀州书局……说：我看了王蕴常的儿子王平孙写的《念双亲》。其中提到：‘一九四〇年南京伪中央大学校长陈柱尊几次邀请王蕴常出任文学院院长，遭到王蕴常断然拒绝。’文章说：这个职务后来给了陈柱尊的另一个学生，此人是王蕴常的后两届同学。这个人是不是钱仲联？”同书中又记：“钱仲联九月十一日在苏州梦茗庵说：……王平孙在《念双亲》中写的，不真实，我当文学院院长与师兄王蕴常没关系。王蕴常拒绝后，请龙榆生当文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校长后来叫陈璧君的侄子陈柱尊当，他是龙榆生的学生。龙榆生除了管文学院之外，还要越权管其他。有一次与陈柱尊闹翻。龙说要辞职。陈柱尊叫他递辞职信。龙榆生说早就写好

了。龙说他离开，文学院一定搞不好，也没有人会去接替。当夜，校长找我。我是一个普通教授，吃他们的饭，就答应了。那是一九四五年。王遽常的事是一九四〇年……”按据《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二届（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等文献记载，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的前两任院长为杨宇氏、陈柱；一九四三年夏秋，由龙榆生任文学院院长；一九四五年六月，龙榆生辞去南京中央大学一切职务，文学院院长职务乃由钱仲联接任，所以钱仲联说“我当文学院院长与师兄王遽常没关系”是对的。

本年起，蔡尚思（一九〇五～二〇〇八）应邀至国专沪校兼课，讲授《中国思想史》等课程。

王武子《蔡尚思学述·附录·蔡尚思年表》：“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抗战期间，由于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同时兼任沪江、光华、复旦、东吴四个大学及无锡国专（后二校迁沪）教授，还兼两家的家庭教师，长年疲于奔命。”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国专桂校

本年中，国专桂校仍在广西桂林穿山办学。

一月，教育部颁发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奖金，国专桂校冯振、蒋庭曜各获奖金一千五百元。

《教育部训令（高字第〇二五一二号，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廿二日发）》（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关于教员服务奖状、奖助金、久任教员奖金的呈件》）：“本部为奖励久任教员起见，前经颁行教员服务奖励规则，对各校连续服务满十年、十五年及二十年以上之教员分别授予服务奖状。兹复蒙蒋兼院长眷念贤劳，特拨发专款，发给专科以上久任教员奖金，以资激励。凡在专科以上学校服务二十年以上者，每人发给三千元，服务十年以上者，每人发给一千五百元，均以现在在职教员为限。现查该校久任教员奖状案内服务十年以上者，有冯振一人，应发给一千五百元……”

按：本年一月廿五日又有教育部训令〔〇八八五〇号〕，发给蒋庭曜久任教员奖金一千五百元。

二月十四日，国专桂校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召开第一次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李济深、李任仁、刘侯武

(郑毅代)、黄维(字星垣,一八八九~一九五四)、黄鍾岳、蒋庭曜、雷宾南(冯振代)、冯振、高阳(蒋庭曜代)、黎民任、徐启明等人,会上推定李济深为国专桂校校董会董事长,国专桂校校董会于此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本校简史》：“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开迁桂第一次校董会议，推定李任潮（济深）先生为董事长。”

梁漱溟《我和冯振先生》（见《无锡国专在广西》）：“冯先生为了提高数[教]学质量，邀请了许多旅桂学者讲学，如巨赞法师、吴世昌、陈竺同等。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他与我商量成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由我出面请李济深担任董事长，并由我出面请白崇禧的老师、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担任校董。担任校董的还有政界知名人士黄绍竑、刘侯武、黄星垣和我。通过这些人的广泛向社会募捐，为国专筹集了一大笔经费，兴建校舍，扩大招生，当时在桂林是搞得轰轰烈烈的。”

按：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桂第一次校董会会议纪录》（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会议纪录》），此次会上的讨论事项有：一、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暨财政部、教育部、广西政府增拨补助；二、由董事长并学校函请财政部长孔祥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国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及盐务局、广西银行捐助，董事长及各校董以私人名义函请捐助；三、由学校钞备捐册、收据，交由各校董，随时向外界募捐。此外，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校董会章程的修改问题，并推定李济深为校董会董事长。

又按：国专桂校校董会要到这时才算是正式成立并开始工

作。苏州大学档案馆藏《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关于印信、经费的请示、批复、训令、指令和校董名单》中有一份《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名单》，此件未署日期，中记国专桂校校董会成员名单为“李任潮先生、刘侯武先生、黄季宽先生、黄子敬先生、李重毅先生、雷宾南先生、盘斗寅先生、徐启明先生、黄星垣先生、黎民任先生、蒋石渠先生、傅志章先生、钱子泉先生、高践四先生、冯振心先生、梁漱溟先生”，其中“高践四”三字加了圈，据《本校迁桂第二次校董会会议纪录》（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中记：“校董高践四先生逝世，公请梁漱溟先生为本校校董。”由此可知，梁漱溟虽然在与冯振商量成立校董会并请李济深担任董事长等事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他本人却是在原校董高阳（字践四）去世后（高阳卒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才被增补为校董的。

三月六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备文呈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因该校文书专修科需要扩充，请求增拨扩充经费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元，后教育部指令云“本年该专修科无庸扩充招生”。

冯振《呈为恳予增拨文书专修科经费壹拾肆万肆仟陆佰壹拾元以资扩充由》（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六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教育部部长陈：按查本校于三十一年四月奉钧部高字第一四五一号训令，设置二年制文书专修科，以养成应用人才。业经遵令，拟具计划书及课程纲要，呈准于三十一年秋季招收新生一班在案。创办以来，各界人士或致函称誉，或莅校嘉许，咸认部令本校培养此项人才，最切合当前社会需要，应急谋扩充，以供需求。爰经校务会议议决，呈请钧部，准予继续招收新生，衔接班次。惟本校现有校舍，仅敷目前应用；续招新生，

自需添建校舍，购置用具，增聘教职员。计除钧部原已核定文书专修科一班每年补助费伍万伍仟元，已因物价腾涨，超出预算甚巨外，盖以扩充之需，总计全年不足之数壹拾肆万肆仟陆伯壹拾元。以目前本校经费之奇绌，实无余力负担。然既不愿违钧部培养应用人才之旨，又不欲负各界人氏期许之意，用特拟具扩充文书专修科计划书一份，呈送钧部，敬祈察核，赐予增拨扩充文书科经费壹拾肆万肆仟陆伯壹拾元，以利进行，实为公便……”

按：此件后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文书专修科扩充计划书（三十一年三月）》一份，后教育部指令云：“本年该专修科无庸扩充招生”。

五月十二日，国专桂校校董会董事长李济深致函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请求能于粤西盐务管理局文化救济金项下，拨款补助国专桂校办学经费。七月十日，孔祥熙回函李济深，云该局并无文化救济金名目，所嘱之事“歉难照办”。

《孔祥熙致李济深信》（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十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关于印信、经费的请示、批复、训令、指令和校董名单》）：“桂林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李董事长任潮先生勋鉴：五月十二日函奉悉，经飭据粤西盐务管理局电复，该局并无文化救济金名称等语，承嘱该局文化救济金项下拨款补助贵校经费一节，歉难照办……”

五月二十四日，在接到国专桂校校董会董事长李济深请求拨款资助国专桂校建筑新校舍的呈件后，蒋介石以待秘字第一七六二五号代电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指示教育部“特予设法维持”；后陈立夫复电称“拟俟该校将建筑计划及图样呈送到部后，再作核办”。

《代电》（待秘字第一七六二五号，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



月二十四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教育部陈部长：据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校董会董事长李济深呈，略称‘本校现于桂林附郭建筑校舍，拟请本发扬国学、恢宏儒术之旨，赐予提倡，赐以巨款，俾资扩充。则垂绝国学得庆重光，教育前途至深利赖’等语。查该校自唐蔚芝先生创办以来，已往尚有相当成绩，希即由部特予设法维持为要……”

陈立夫复电（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钧鉴：案奉钧会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侍秘字第一七六二五号代电，以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董事长李济深呈请，拨款补助该校，设法维持。等因奉此。查本部在三十二年度教育文化费项下专款补助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计一五一二〇元，又在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项下拨助该校四〇〇〇〇元，并另补助该校文书专修科经费四五〇〇〇元，合计一〇〇一二〇元。至该校建筑校舍，请再拨款补助一节，拟俟该校将建筑计划及图样呈送到部后，再作核办。”

八月十六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向教育部呈报《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二年度文书专修科预算书》，并在呈文中说明，因近来物价激增，根据本年度文书专修科预算，除教育部所拨的文书专修科一班全年经费四万五千元外，尚亏缺八万九千四百元，请求教育部将亏缺部分如数拨发。八月二十九日，冯振再向教育部备文，呈请增拨本年度经常补助费二十万元。后教育部指令云“未便照准”。

冯振《呈报文书专修科预算书敬恳体恤艰困续拨不足之数捌万玖仟肆佰元以资维持由》（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私立无锡国学

专修学校呈教育部部长陈：按奉本年三月十日高字一一三三四号代电，内开：‘兹支配该校附设文书专修科一班全年经费四万伍千元，除函请财政部飭库运行拨款外，合行电仰知照，并应编造预算七份呈报核转。’嗣奉钧部高字三〇二二五号指令，内开：‘三十二年四月七日桂字第二一五号呈一件《为呈请准予俟钧部核定扩充文书专修科计划增拨经费后始行编造预算由》呈悉，查此案前据该校来呈，业于本年五月八日以高字第二二八三六号指令，飭本年无庸续招文书专修科新生在案，仍仰遵照前令办理，并编造预算呈核，此令。’等因奉此。兹谨编造本年度文书专修科预算书七份呈核。惟近来物价激增，一二月中竟涨至数倍，所造预算，均属最低数额，省无可省。但除已准拨四万五千元外，尚不足捌万玖仟肆佰元，仍恳钧部体恤艰困，将不足之数捌万玖仟肆佰元如数赐拨，以资维持而利教育，无任感禱……”

冯振《呈为物价腾涨恳请赐予增拨本校本年度补助费俾资维持由》（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教育部部长陈：按查钧部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高字第一四五〇号训令，本校三十一年度经常补助费经行政院核定为三万元；又钧部于同年月日高字第一四五一号训令，本校文书专修科全年经费核定为四万元，后又增加壹万五仟元，全校共八万五仟元。又查钧部三十二年四月高字第一六二八四号训令，本校本年度经常补助费经行政院核定为四万元，又钧部于同月十日高字第一一三三四号训令，本校文书专修科全年经费核定为四万五千元，合计仍为八万五仟元。自去春迄今物价已激增至五倍以上，目下各物仍呈继涨之势，而钧部补助一如去年，出入相衡，不足甚巨。倘不赐予救济，今后计划之实施、教职员之生



活，俱将无法维持。除文书专修科经费已另电呈请增拨外，经常补助费一项，敬恳增拨二十万元，俾资维持而利教育，不胜感祷……”

按：教育部就前两项呈文一并指令云：“查本年度经费及补助费已分配无余，所请增拨文书专修科经费及本年度补助费一节，未便照准。”

本年秋，张世禄不再任教于国专桂校，转任西南联大教授。

周忠谋《痛怀恩师张世禄先生》（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九四二年，我就读无锡国专，曾沾化雨。一九四三年秋，先生（按：指张世禄）离桂林赴渝州，就任西南联大教授，先生曾有一诗别穿山诸子：‘万里征程去一帆，数行别泪湿青衫。茹经亭畔伊人在，回首烟云绕叠岩。’师生难舍难分，泪湿青衫。”

十一月二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分别致函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及国专桂校校董、国民政府两广监察使刘侯武，请求两人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代为言说，增拨本年度特别补助费八万元。

冯振致白崇禧函（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关于印信、经费的请示、批复、训令、指令和校董名单》）：“健公总长勋鉴：旌驾旋桂，曾专程趋谒，适值公出，未获承训，至深向往。敝校无锡国专本期已遵照部令于九月三日上课，新旧学生九班共二百八十余人，一切进行尚称顺利。惟物价高涨，较之去年，何止倍蓰。而教育部经常补助，一仍旧贯；出入相衡，不敷甚巨，维持艰难，达于极点。顷已呈请教育部，恳于本年度特别补助费，赐予增加，共拨八万元，以救眉急。敬恳我公在陈部长前鼎言嘘拂，俾获实现。以我公平

日爱护敝校之殷，谅必邀垂允也……”

按：同日冯振又有致刘侯武信，内容与致白崇禧信基本相同。

本年中，饶宗颐（字固庵，一九一七～）受聘至国专桂校任教，讲授古文字学和古典诗词。

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学术年表》：“一九四三年，赴广西任无锡国专教授。成《瑶山诗草》。”又《饶宗颐学述·动荡岁月》：“那时中山大学有朋友很关心我，郑师许推荐我到无锡国专去任教。郑与冯振心是朋友，冯是当时国专在广西期间的校长，周振甫、冯其庸是他的学生。我在国专教古文字学，后来才教一点诗词。我在国专有一个好处，就是回到文学。在桂林的时候，我的书还没有出，大家不太认识我。当时梁漱溟也在那里，后来他去重庆了。他住国专，不上课，一个礼拜作一次讲学，讲他的思想，我去听过几次。那时候梁已不搞佛学了，讲乡村建设，讲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中国文化要义》就是在那里写的。梁先生这个人很有正气，人很好。他讲东西文化，他对印度思想的了解比较一般，不过他很会抓问题。他有一本著作叫《朝话》，因为他曾在广州办一所中学，是国立中学，书中收集了一些他的讲话，很有意理。他有一句话说得好：‘我根本没有什么学问，我会抓问题，我就是从问题中读书、论学。’这完全是夫子自道，他的长处就在这里。他后来主持《光明报》，贡献很大，没有他，不可能把很多人从国民党那边争取过来，这一点他贡献很大。”又：“冯振心先生与陈柱（柱尊）是同乡。冯在北流恢复国专，就把我请去了。这个时期，蒋石渠也来了。巨赞和尚也在那里，他后来做佛教学会副会长。巨赞是江阴人，可能是地下党。我跟巨赞能讨论一些东西。校长冯振心，我也偶尔和

他谈谈学问，他是很得中庸之道的，人非常好。冯其庸曾有文章《无锡国专在广西》，记听他的课的情况。冯振心先生可以讲诸子、文字学、《说文》，可以讲诗，这几门课他都能讲……在北流时期只有一位先生，叫阎宗临，他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搞西洋史、欧洲宗教的，我们有一些交谈。他现在可能不在了，是山西人。还有一位叫向培良，在无锡国专讲《楚辞》，湖南人。他是新文学家、写小说的，但却在国专教《楚辞》，人很有意思，有思想，有个性，手拿一根文明棍。他不大欣赏胡适之。胡适之说没有屈原这个人，向公说：‘我也认为没有胡适之这个人，胡适之？到哪里去了？’他并不是对《楚辞》有深度了解的人，但是他能用新文学理论来讲，所以在国专颇受学生欢迎。蒋石渠先生字写得好，因为他受过沈寐老（沈曾植）的熏陶，他与王遽常都是及沈老之门的，完全写沈老那种字体，几乎可以乱真。他的话非常不好懂。他后来随国专搬回江南去了。他们都希望我能去，但我没有去。假如去了，就很平凡了。国专的人际关系很简单，我在国专时期也没有写书，那是一个流离失所的时代，不过增加了许多诗料，《瑶山集》就是这段生活的记录。这段生活值得留念，可以令人知道天宝之乱是怎么一回事，可以知道杜甫是怎么生活的。我那时用老杜的方法，用老杜的语言写了些诗，把老杜诗多读了几遍，也可从中看见那个时代的面影，个人在那个乱世中的感受。生命中有这样一段经历也好，很值得宝贵的。所以钱老给我写序，还特别提到《瑶山集》（原整理者按：钱仲联先生《选堂诗词集》序中说：“《瑶山》一集，尤其独出冠者也。时先生方都讲粤西，甲申夏桂林告警，西奔蒙山，蒙山踵陷，窜身荒谷，两入大瑶山，与峒氓野父相濡响……长吟短咏，出自肺肠，入人肝脾。”），他也尝过流离漂泊之苦，不过

他那时已离开了，他晚一点走，就要同样受日本人的侵辱之苦，正式地做难民了。所以我这一段经历很艰苦，香港沦陷了，后来辗转来到广西，以为可以避开日本人，可是还要受这样的苦。但是生活虽苦对诗很有帮助，人生经验也增加了很多，可以说一辈子吃的最大的苦就是在这一时期了。”

按：上文中“冯其庸曾有文章《无锡国专在广西》，记听他的课的情况”，当是指收录在《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书中的冯其庸《怀念我的老师冯振心先生》，但冯其庸并不是国专桂校时期的学生，他是在国专于抗战胜利、复员回无锡后才入校就读的，详后文。

本年中，阎宗临（字琮琳，一九〇四～一九七八）、梁佩云（一九〇九～一九八九）夫妇同时受聘至国专桂校任教，阎宗临讲授二、三年级的外国史及西洋文化史，梁佩云教授教育学及为女同学讲授家政学。

萧德浩《缅怀恩师阎宗临教授》：“一九四三年先师（按：指阎宗临）及师母梁佩云受聘于无锡国专，举家住进无锡国专，阎师讲授二、三年级的外国史及西洋文化史，梁师母则教授教育学及女同学的家政课。那时，我正在二年级，亲聆阎师的教诲。当时使用的是普通高中的外国史课本，阎师上课时，并不是照本宣科，以他的博学多才和在国外多年研究的成果，结合课本内容，先举一例历史事件来讲述，然后才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论述，使学生对陌生的外国史先有一个感性认识，而后才提升到理性认识，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学生获得丰富的外国史的知识。过去，我们对外国历史文化是一无所知的，经阎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洞开脑中知识大门，对巴比伦、埃及、古罗马、拜占庭等历史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冲破孤陋寡闻的黑圈，懂得人类社会历史文化



的发展是多元性的。同学们每听完阎师的一堂课，就如同享受了一顿丰盛的营养大餐。同学们十分欢迎阎师的讲课，阎师已成为同学们非常敬佩的老师。”

本年中，无锡国专第二十二届学生毕业，毕业生计有王厚传、张其昌、黄映昭、黄方石、黎德怀、罗日采等六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历届毕业同学录》）。

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一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张翰明、赵康允等二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一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农历正月开学，学生实到者百余人，唐文治为学生讲授《论语》与读文、作文法（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癸未七十九岁》）。

二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以待秘字第一六一一八号代电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因唐文治“毕生办学，晚节清高”，“已去电慰问、并致救济费叁万元交该部转汇”；同时指示教育部，“所请资送该沪分校师生内移一节，即希核办”。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待秘字第一六一一八号，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职员任免、资格审查等有关人事文件》）：“教育部陈部长：据转呈国立编译馆编审侯璩等签呈悉，唐蔚芝先生毕生办学，晚节清高，良堪矜式。除已去电慰问、并致救济费叁万元交该部转汇外，所请资送该沪分校师生内移一节，即希核办为要……”

五月十三日，国专桂校代校长冯振呈文教育部，“呈复本校上海补习部师生情形并拟恳拨十万元由校派员赴沪资助内迁”，并拟派人到国专沪校商议具体内迁办法。教育部接呈文后指令，支持上海“补习部”内迁并“拟准拨该校沪分校员生内迁费五万元”。但此事后来因形格势禁而未能实行。

冯振《呈复本校上海补习部师生情形并拟恳拨款十万元由校派员赴沪资助内迁由》（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查本校上海补习部据三十年十月函告，有教职员三十人，学生百八十人。自太平洋事变后，消息时断时续，员生多少，因敌伪检查邮电甚严，致未能于函件中获知明确数字。惟据可靠方面消息，现有教职员约二十人，学生约八十人。虽生活清苦，仍能坚持清操，弦诵不辍。至内移办法，（一）本校拟于最短期内派员间道赴沪调查实况，办理内迁事宜；（二）内迁费用，教职员每人暂以三千元计，学生以千五百元计，估计实能内迁之教职员为十人，学生为四十人计，需款九万元之谱；加以派员一人赴沪，往还旅费及临时特别费用约一万元，拟恳钧部暂时赐拨国币十万元，以资应用。待办理竣事后，据实报销。如有不足，仍请钧部酌量补发。”

按：教育部指令云“准拨伍万元，为该校上海补习部师生内迁补助费，即此款为限，酌定内迁人数，款到仰补据报复。”

吴涪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入租界后，国专沪校直接面对汪伪的纠缠，唐文治自己甚至受到日伪的威逼利诱，要他出任伪交通大学董事长，唐文治坚决予以拒绝。为了更好地保护学校和教职员工，唐文治曾有过将沪校迁移出上海的打算，为此特向重庆教育部报告并请



求经费等支持。由于沪校处于汪伪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来往文书都由桂校代递，冯振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呈文教育部，‘呈复本校补习部师生情形并拟恳拨十万元由校派员赴沪资助内迁’，并拟派人到国专沪校商议具体内迁办法。而教育部指令，支持上海‘补习部’内迁并准予‘拟准拨该校沪分校员生内迁费五万元’。估计后来由于战争形势较为复杂、交通不畅之因，沪校内迁遂作罢。”

计划内迁既未果，不久，为不向敌伪当局登记立案，避免使国专沪校纳入殖民奴化教育体制之中，国专沪校决定将校名恢复为最初的“国学专修馆”的名称，仍然请王遽常担任教务主任，陈养浩为训育员，张仲礼为会计员。当时办学经费拮据，幸有金城银行吴在章（字蕴斋，一八八六~？）补助一万元，得以使困难稍有缓解。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癸未七十九岁》：“本校仍复名为国学专修馆，仍请王生璠仲为教务主任，陈君养浩为训育员，张君仲礼为会计员。惟经费拮据，幸金城银行吴蕴斋先生为补助一万元，可感之至。”

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汪伪时期，先生和王遽常教务长在上海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为私塾，用旧国学专修馆名义，避免向敌伪登记，拒不接受伪教育部经费。靠学费收入，支撑十分艰巨，但先生撙节开支，使学校始终弦歌不辍。”

按：据吴淞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载：“从有关档案看，在日军尚未侵入租界前，汪伪政府教育部已开始着手调查租界内的所有学校数目了。一九三九年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汪伪当局一直在为如何能够让租界内的学校，尤其是专科以上学校备案而头痛。”如前所述，国专沪校复名为“国学专

修馆”，就是为了避免向敌伪登记。至“一九四四年三月，经过几年周折，汪伪政府教育部的学校立案登记工作总算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关档案显示，上海租界的私立大专院校向其登记立案的有‘震旦大学等十三校，未填报者尚有十一校’”，而在这十一所未登记立案的学校中就有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一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周衡生、陈瑞熙、林似春、李成蹊、胡惟德等五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一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

八月开学，唐文治为学生授课二节，一为《孝经大义》，一为《国文大义》（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癸未七十九岁》）。

本年仲秋，唐文治为国专沪校学生黄汉文家藏明代名臣杨继盛五绝诗手迹作《明杨椒山先生手迹跋》，“用以自励，并勗汉文与后来学者养浩然正气，以擎天柱而张地维”。

唐文治《明杨椒山先生手迹跋》（见《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五）：“呜呼！正气之在天下，曷尝一日息哉！自孔子作《易·坤卦·文言传》揭正直之训，孟子发明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于是气节之士，史不绝书。宋文文山先生作《正气歌》，立万世纲常名教大防，千载下为之歌泣。明杨椒山先生遥承信国，气壮山河，开左忠毅、史忠正诸公之先。读《乾坤正气集》廉顽立懦，岂非圣贤所谓‘成仁’、‘取义’者哉！余少时应春明试赴京师，住球芝巷太仓会馆，恭谒椒山先生祠，与郡馆密迹，仅隔一街，登谏草堂，瞻仰石刻疏稿，劾严嵩二十四大罪，字迹勃勃有生气。又见先生撰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石刻对联，肃然起敬。张夫人栗主衬

祠于后，救夫疏稿石刻，亦嵌壁间。闻吾师浙江黄漱兰先生与南皮张香涛制军、宗室宝竹坡学士、名儒何来寿太守居北京时，逢每月朔望，必肃衣冠拜先生祠，以崇正克邪相誓勉。迄今六七十年，殆无有能道之者矣。既读先生集，载先生当廷杖时，有人赠蚺蛇丹以壮之。先生曰：‘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呜呼！汤文正有言：‘天下抑邪与〔兴〕正之心，虽当昏乱之世，不容尽泯。’盖见正气不绝于人心，惟赖气节之士，相与维持于无形之中。明代当万历时，摧残正气，动辄廷杖大臣，窃怪其待士大夫愈酷，而正人义士转接踵而起者，何哉？正气弥纶，而人心不死也。然自是厥后，宦焰日炽，明社遂屋。痛乎哉！君子小人之进退，而国脉兴替随之，可不慎哉！癸未仲秋，及门黄生汉文，将家藏先生手迹五绝诗属为跋。读其诗，有潇洒出尘之概。文治何幸，得附名简末。谨跋数语，用以自励，并勖汉文与后来学者养浩然之气，以擎天柱而张地维云。”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我家藏有一轴杨继盛（椒山）的书法，一九四三年初夏，偶与唐先生谈起，唐先生说：‘杨椒山先生我所崇敬，在无锡时，曾翻刻他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对联挂在膳堂，欲诸生每饭不忘。你藏有他的墨宝，我当为之撰文。’我当时认为大概只是写篇短文，他对同学们家藏的名贤手迹，大都如是。想不到他老人家竟撰了一篇《题杨椒山先生手迹跋》的长文章，以‘养浩然正气自勉，兼勖汉文与诸弟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深感唐先生对炎黄子孙的期望。他的秘书陆景周先生是我读一年级时的老师，也曾教过我《孟子研究》、《左传研究》等，他诚挚地对我说：‘这篇文章，唐校长撰作的特别认真，你不但应该读熟，更应身体力行。’我从唐家出来，到鸿英图书馆看

书。馆长沈恩孚先生（字信卿，比唐先生大一岁）看到这篇文章，赞不绝口，说道：‘令师为你撰此鸿文，我亦当题诗一首。’约三天后，沈老已把诗题好，是一首五言绝句：‘椒山自有胆，朱明一代雄。浩然刚正气，何人能与同！’”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国专桂校

本年初至九月，国专桂校仍在广西桂林穿山办学。至此，国专桂校在穿山办学有三年时间。

一月二日，国专桂校在本校会客室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李济深、梁漱溟、李任仁、雷宾南、黄维、黎民任、蒋庭曜、冯振等。会上主要讨论本校基金及备设〔设备〕费如何筹集的问题。议决：一、拟具办法，用本会名义函请省政府通飭各县捐助；二、请教育厅以造就各县中等学校国文师资理由予以补助（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会议纪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桂第二次校董会会议纪录》）。

二月二十九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再向教育部备文，呈请教育部按照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补助费办法，拨发国专桂校教员研究补助费。后教育部指令云“未便照准”。

冯振《呈请教育部迅予赐发本校教员研究补助费，以资激励由》（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职员任免、资格审查等有关人事文件》）：“案查，钧部自三十二年度起定有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补助费，各国立学校闻早已按月颁发。钧部于已立案各私立以上学校各项补

助，如战区学生膳贷金、故林主席中正奖学金以及久任教员奖励金等，向与各国立学校同等待遇；即教员资格之核定，亦与各国立学校同受审查。惟于本校教员研究补助费一项，独异于国立各院校，迟迟未蒙赐发，似非钧部对于服务教育人员一视同仁之意。当此米珠薪桂之时，教员生活尤感困难，敬恳钧部案照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补助费办法，迅速赐予核发本校教员补助费，俾资激劝，教育幸甚，本校幸甚……”

按：教育部指令云“查本部发给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学术研究补助费，规定以国立各院校专任教员、其资格已经核定者为限。省、私立各校教员暂不在发给之列。所请发给该校教员研究补助费一节，未便照准。”

三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发无锡国专临时补助费四万元。

《教育部代电》（高字一〇八四八号，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发，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关于印信、经费的请示、批复、训令、指令和校董名单》）：“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查各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近因物价高涨，均感经费不敷，业经呈奉行政院，准拨三十二年度各省私立以上学校临时补助费到部。兹支配该校（院）临时补助费四〇〇〇元，款即汇发……”

三月十一日，国专桂校校董会董事长李济深、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联名呈文教育部；三月十五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呈文财政部。两件呈文的内容基本一致。呈文中指出：据统计，现时的平均物价，是抗战前的二百五十倍。照此物价上涨的倍数，无锡国专在抗战前全年所得补助为二万四千元，现在则应为六百万元，而上年实际所得的经费仅为全年十万零九千元，尚不及应得的百分之二。基于以上情况，又考虑到国家财政之困难，两件呈文请求教育部及财政部“俯念迫切之情、



厚垂爱护之意，赐增补助至二十倍，即每月四万元，全年四十八万元”。此后曾由财政部致函教育部，“拟请贵部在主管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原预算内再予酌量增加”，教育部则在给财政部的复函中称“现在该项补助专款已分配无余，无法再予增拨”。

李济深、冯振《呈为物价腾涨恳请增拨本校三十三年度补助费四十八万元俾资维持而利教育由》（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教育部部长陈：按查本校于二十六年以前，财政部每月经常补助二千元，全年二万四千元。按上月桂林《大公报》之物价统计，现时与战前相较，平均为二百五十倍。若依此数计之，是本校补助费每月应为五十万元，全年应为六百万元。而本校去年蒙钧部赐拨补助费为四万元，另文书专修科四万五千元，财政部补助二万四千元（尚欠八千八百元），全年共得壹拾万零九千元。以去年物价较战前增加一百倍计之，所得补助尚不及百分之五；若以目前物价计之，更不及百分之二。再以征收学生学费言，在战前每学期每名为四十元，现在每学期每名收米一石，以抗战前每一石米八元计之，仅为五分之一。以收入如此之短少，加以七八年来，初则播迁不定，后于三十年迁桂，复筹建校舍，增添各种设备。现已有校址三百余亩，礼堂、图书馆、办公厅各一座，教室五座，男女学生宿舍三座，教职员宿舍二座，厨房、盥洗室、厕所、门房均备且已装置电灯，又凿井一口，开池植林，图书增购至壹万余册，各种台凳用品暨体育设置均已粗具规模，学生人数亦已增至二百八十余人。在此艰难困苦中，所以能有此建设，一方面赖社会人士热心帮助，一方面则为在校同人艰苦努力、节衣缩食之所致。今抗战胜利日益接近，而生活之指数亦

与日俱增，所望于社会人士之资助实难继续持久。本校同人为培养国家元气、作育有用人才尽其天职，在此抗战期间，固多甘愿艰苦度日；然时至今日，早已约之又约、节无可节，且均有营养不足或操劳过度、转趋衰颓之势。今后更将因物价之高涨而日益加甚。似此作育人才，固难望其继续维持；即已成之才，亦恐先遭受损失。人才为建国之骨干，未成之才急需培养，已成之才尤须保存。盖未成之才，必待已成之才为之培养。今扶植教育，就学生言，则为培养未成之才；就教员言，则为保存已成之才。若教员而至于饥寒交迫，颠连无告，或不得已而改业，舍长而用短，恐非所以保存人才之道。若学校无以维持，青年至于失学，更非所以培养人才之道。且似本校千辛万苦、历尽艰困、辗转播迁之学校，若卒致无以维持，员生至于离散，恐亦非国家奖励艰贞不移之至意。今国家财政困难，谁不深知？即本校同人，亦非敢过存奢望，希冀依照二百五十倍或一百倍之指数，增加补助至数百万元。然今低至不及抗战前五倍之数，实属无法维持。敬祈钧部俯念迫切之情、厚垂爱护之意，赐增补助至二十倍，即每月四万元，全年四十八万元。在钧部似非力不能及，在本校则勉可支持。钧部素以培养人才、扶植教育为宗旨，而于本校亦甚加爱护。如各项奖助金之颁发，几与各国立院校一视同仁。惟杯水车薪，沾益有限，伏乞本过去爱护本校、扶植教育之旨，曲加垂察，赐予救济，则本校幸甚，教育幸甚……”

按：冯振致财政部呈文，亦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因内容与李济深、冯振致教育部呈文基本相同，故不再引录。此件呈文后有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致教育部公函，公函中云国专桂校“据称不敷支应，自属实情。该校为国育才，尚著成绩。惟本年度预算力从紧缩，严格限制



追加，国库增拨，实感困难。事关教育文化，拟请贵部在主管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原预算内再予酌量增加，补助俾资维持，而宏作育”。又有教育部复财政部函，称“查该校本年度经常补助费，业经本部在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项下分配六万元，又文书专修科分配十二万元，并饬知在案。现在该项补助专款已分配无余，无法再予增拨”。

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发国专桂校文书专修科本年度经费十二万元（据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教育部代电》，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关于印信、经费的请示、批复、训令、指令和校董名单》）。

五月六日，国专桂校在桂林市社会服务处召开校董会会议，出席者有李济深、黄绍竑、刘侯武、黄维、李任仁、梁漱溟、冯振、蒋庭曜、雷宾南（冯振代）等（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会议纪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桂第二次校董会会议纪录》）。

按：本次会议主要由代理校长冯振报告学校近况。在人员数方面，本学期学生人数二百四十人，上学期二百八十四人；教职员人数共三十三人；毕业生人数，三年制二十一人，五年制九人，文书科十三人。在经费方面，本学期发到去年特别补助费四万元，前年二万元；核定本年文书科补助费一万二千元，去年四万五千元。在建筑方面，计有教职员宿舍一座，共十二间；学生活动室一座，共四间。

五月十九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呈文教育部，请求至少增拨该校文书专修科全年补助费十万元；“倘因预算已定，无法增拨，则请准予下学期招收文书科新生时，照三年制及五年制国学专修科，各生一律征收学费”。后教育部指令称准予建设费六万元内移用二万元作文书专修科经常补助费，但

“所请准予征求学费一节，应毋庸议”。

冯振《呈请增拨本校三十三年度文书专修科目补助费或准予征收学费敬祈察核示遵由》（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教育部部长陈：按奉钧部五月初四日高字21084号训令，内开：‘案查本部前令该校自三十一学年起，附设文书专修科一班，至本年暑假修业期满，下学期仍应续招设一班。兹核拨本年度全年补助费六万元，另补助该校建设费六万元，共十二万元。除呈请行政院转令财政部，飭国库署于五月及十月分两次逐拨外，合行令仰知照。’等因奉此。查全年补助费六万元，平均每月不过五千元，按照目前生活，仅可聘请教授一人，实属万难维持。敬恳赐予至少增拨补助费十万元。倘因预算已定，无法增拨，则请准予下学期招收文书科新生时，照三年制及五年制国学专修科，各生一律征收学费，俾资维持，而利进行。”

按：教育部指令云：“该校文书专修科经常补助费陆万元，如确系不敷，姑准予建设费陆万元内移用贰万元，所请准予征求学费一节，应毋庸议。”

本年夏，国专桂校本科第二十三届、五年制第一届和文书专修科第一届同时毕业。其中本科第二十三届（三年制一九四四年夏届）毕业生计有李汉龙、徐占馨、陈汝周、秦重仁、梁庾影、张公衍、廖泽深、潘岳龄、卢烘兴等九人，五年制第一届（五年制一九四四年夏届）有何抱生、吕汉翱、林起文、林清霜、封尚礼、陈二百、陈起翔、陈业芳、唐典昭、容懋深、黄林芳、冯集芙、冯静娟、覃宝峰、蒙启信、叶正华、叶肇芳、黎国基、钟薇坤、罗豫乐、欧阳天权等二十一人，二年制文书专修科第一届（二年制一九四四年夏届）有卜贞元、

江滨、唐皇、高培柏、唐智义、陈宪章、梁支寰、张启恭、劳功甫、黄代成、黄汝纲、贾竹修、廖世祥等十三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本届毕业同学录》）。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桂林穿山的三年时间里，由于环境的相对安定，师资较为充实，教学得到了提高，学生安心读书，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同时学生在课余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办理义务教育和文化补习工作。一九四四年夏，本科第二十三届、五年制第一届和文书专修科第一届同时毕业，为国专迁桂以来未有的盛事。”

按：《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中尚有《在校同学录》，其中“三年制二年级”有丘大森、吴桎树、周启光、周冰、周昌仁、郭湘、张中文、曾长卿、杨向实、潘以义、潘湛甜、邓式山、刘经邦、谭植毅等十四人，“三年制一年级”有甘京林、吕杰仁、李锦光、徐祖椿、韦绍仪、马焕章、陆金熙、黄世信、叶大勋、漆同汝、谢彰、萧珉等十二人，“五年制四年级”有伍纶瀚、吴琼、李任瑞、李伯龄、李春树、李桂秋、李应平、李应霜、吕阳材、林垂英、邱家福、袁家华、陈孙兴、陈道尧、梁书诒、区乃忠、黄柱谟、黄海琨、黄逊源、黄耀德、覃恒福、赵慎祥、廖世祺、刘久飞、刘开基、邓上达、黎德雄、黎耀光、谢祺椿、罗人玘、庞先传等三十一人；“五年制三年级”有王名孚、王盛生、王锦祥、江宗禄、伍晖祥、吕午炎、宋纪勋、吴焕祥、李家贵、何维敏、林欣平、林显晃、马丕俊、唐皓暹、陈尚琰、陈维康、陈创基、陈学成、张连昌、黄夫盛、黄水新、黄俊、黄伟、黄春雷、黄焕宣、黄福杏、覃业德、黎月宾、潘克昭、潘汝滨、

郑维瀚、刘斐然、刘继靄、钟世权、钟盛童、谢松茂、谢福英、谭可贵、庞永祥、庞炼斌、顾柏英、顾振渭、龚立言等四十三人，“五年制二年级”有石汝勋、吕寿昌、李隆枝、韦日高、陈伟全、陈国定、陈震德、唐树人、陆广田、张元行、张名威、凌超荣、莫道隆、莫让富、曾宪柏、章必达、章汉雄、黄瑞熙、项锡福、黄梓魁、叶大笙、杨展勤、杨挺昌、杨振斌、蒙国旺、邓汉、刘选怡、刘善巡、刘贞藩、卢铁山、龙沛霖、谢公权、萧德浩、庞祖宏等三十四人，“五年制一年级”有王达世、伍锡钰、伍启芝、池纯才、李立德、李经普、李汉、李美材、李绍莲、李树义、吴光国、吴朝学、吴韶华、何瑞礼、吕漪娜、周纲复、林传方、凌武、凌云吉、韦肇东、韦子萌、梁家光、梁肇灵、梁泮祥、陈德文、陈宗实、陈德忠、张家从、张凌汉、张世禄、莫显昌、黄登明、黄锦秀、黄益隆、黄振武、覃朝文、覃建德、黄维胜、杨厚业、邹子松、廖祥麒、赵志伟、蔡安汉、剧仕俊、潘崇枢、邓基元、蒋盛峰、卢国琳、磨以友、卢绵开、卢玉玠、谢肇文、蓝善瑚、蓝国鹄、苏乃馨等五十五人。这些学生未及毕业，适值抗战胜利，国专桂校复员回无锡，其中一部分人随迁到无锡，并在国专无锡本部毕业，另外一部分学生后来是否取得无锡国专的毕业资格，不详。

本科第二十三届毕业生中的徐占馨和张公衍，原在国专沪校读书，日军侵入上海旧租界后，两人历尽艰辛来到广西，最后在国专桂校毕业。

黄汉文《缅怀朱大可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一、二十一期）：“国专对每学期的全校作文竞赛非常重视。一九四〇秋季的冠军是江西来的一年级新生徐占馨同学。钱仲联先生曾以此激励二、三年级同学，并在办公室说，应归功一年级

的教师。朱先生（按：指朱大可）表示，这位同学到校仅二月，我看还是应归功于他的中学老师，应为本校‘后起有人’贺。我因校对《变风社诗录》，在办公室一隅，亲闻此言。日军侵入旧租界后，徐占馨与张公衍历尽艰辛到广西，在桂校毕业。”

六月二十二日，桂林宣布疏散，各校提前放暑假。国专桂校开始作再一次迁校的准备。七月二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两次紧急致电教育部，请求迅予电汇迁移费五十万元和本年度补助、设备各费，以资抢救。

冯振《电请迅予电汇迁移费伍拾万元俾资抢救由》（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十万火急！重庆教育部陈部长钧鉴：桂林紧急疏散，求迅电汇迁移费伍拾万元，俾资抢救。阖校员生，同深感禱……”又《电请迅赐电拨本年度补助设备各费俾资抢救由》（同前）：“十万火急！重庆教育部陈部长钧鉴：谏电计达，本年度补助、设备各费迄未拨到，乞迅赐电拨，俾资救济……”

按：教育部指令云：“所请补助迁移费一节，业经另案两次共汇发拾万元，至本年度应发该校之补助费，系由财政部国库迳拨，亦经核示在案。”

七月二十八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呈文教育部，再次请求增拨补助费，后教育部指令云“所请一节，碍难照准”。

冯振《呈为重行呈请文书专修科经常补助费无法维持敬祈赐予增拨以资继续开办由》（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教育部部长陈：按奉钧部七月十一日高字第33472号指令，内开：‘该校文书专修科经常补助费陆万元，如确系不敷，姑准予建设费陆万元内移用贰万元。所请准予征收学费

一节，应毋庸议。仰即知照。’等因奉此。关于不准征收学费一节，足见钧部提倡文书之意，本校自当遵从。惟查前年奉令开办文书专修科时，核定经费为四万五千元，以物价增加十倍计，便需要四十五万元。以现时物价与前年相较，实早已超过十倍。乃钧部欲令本校以十二万元继续开办，即令此十二万元全部作为聘请教员之用，平均每月不过壹万元。照目前最低薪津，仅敷聘一教授、一助教之费；若以八万元计，则平均每月不过六千余元，仅可聘一教授。本校经费原已支绌万分，实无其它款项可以移用弥补。钧部既不准征收学费，又不允增加补助，本校欲仰遵钧令，则无米之炊，巧妇不能。欲停止招生，则既违钧令，亦非本校为社会服务之意，进退两难，实为狼狈。敬恳钧部俯察下情，赐予增拨补助，俾获勉强维持，继续开办。教育幸甚，本校幸甚……”

按：教育部指令云“所请一节，碍难照准”。

八月，日本侵略军攻陷湖南衡阳。至九月十日，桂林紧急疏散。大部分桂籍学生各返本籍；冯振与留校师生员工十二日离开桂林穿山，乘民船至阳朔留公塘，再至平乐，转赴蒙山。十月，国专桂校在蒙山文尔塘钟家开课。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二日桂林宣布疏散，各校提前放暑假。兰言携蕨、芹二女及仲儿回北流本乡。我仍留穿山本校。八月，局势渐定，仍在桂林招生。九月十日，局势突变。桂林紧急疏散。我与留校员工十二日离桂，乘民船至阳朔留公塘，再至平乐，转赴蒙山。十月，国专在蒙山文尔塘钟家开课。”

蒋庭曜《石渠诗存·劫中草·别桂林（三首）》（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湘桂风云急，日蹙国百里。桂林如弹丸，岂能独守是。



疏散令未下，权贵室尽徙。哀哉久流离，此情曷能已。老妻与弱儿，先令异县止。长女与长男，随校托生死。中心深自惭，不能覆妻子。更有同舟者，有子逾廿纪。学军不从戎，强之使随己。默念娇小儿，双泪盈如水。

踟躅穿山道，惆怅难为别。树木如人长，栋宇连云列。三载苦经营，沥尽心与血。一朝舍之去，中心如百结。柔条拂我衣，飞鸟号悲切。苍崖立我旁，忍与山灵诀。行行复回顾，肝肠欲断绝。念兹丁阳九，世事那堪说。金汤百万重，顷刻付夷灭。胡为独恋山，热泪徒哽咽。

舟行百余里，雳霹震天际。火光烛四野，忧惶不能寐。敌距闻尚远，岂是从天至。那知烧市廛，并自毁机地。抗战先焦土，国策谁能议。哀哉百万民，仓卒难为避。舟车相争夺，哭声如鼎沸。或遭覆溺死，或饥饿路毙。惨状难毕述，闻之为酸鼻。深惭得天幸，一苇任所系。”

党玉敏《冯振传略》（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先生为了使几百名师生员工及家属能安全撤离，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各方联系，先安排老弱的职工眷属撤离。对广西籍的一些体质文弱的学生也尽量动员他们撤离回乡。有一个家在梧州名叫李桂秋的女学生，身无分文，当时先生身上亦分文无存，仅有三打新袜子。先生就送给她一打，希望她在路上变换成盘缠回梧州去。而学校则决定转迁到蒙山。这位女学生谢绝了先生的好意，决心跟随学校到蒙山去。”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四四年八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衡阳，桂林紧急疏散，强迫撤离。冯先生和师生们不得不忍痛丢下为之呕心沥血创建的学校，作又一次更为艰辛的搬迁……学校被迫撤出桂林，大部分桂籍学生各返本籍，一部分师生和眷属雇船至平乐，再步行至蒙山。在

蒙山的文尔村得到钟姓兄弟的协助，借出房屋作临时校舍。安顿下来后，又在蒙山招收了少数新生，正式开课。当时老师有冯振、蒋石渠、俞瑞微、冯静居、向培良、阎宗临、蒋庭荣等七八人，同学有潘君博、李春树、李桂秋等三十余人。先生有蒙山开课示诸生诗纪其事。”

冯振《避寇蒙山寄居文尔村钟府，仲纯丈暨文海、文会诸昆季殷勤接待，慰藉备至，感谢不足，赋此以志》（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蓬飘念我无根蒂，慰藉殷勤比弟兄。寇至入山同草屋，食慳与我共藜羹。语言所露皆肝胆，患难真堪托死生。归告妻孥应感激，乱离犹得酒频倾。”又《蒙山开课示诸生》：“播迁忽已七年余，又向蒙山强托居。危难久更心转壮，苦甘可共意先舒。力如未尽休安命，事尚能为早读书。竖起脊梁坚定志，澄清大业看登车。”又《蒙山文尔村诒国专同人》：“避寇翻成避世人，桃源四面隔通津。山中有酒何妨醉，手里无钱未算贫。敢拟郑公安处鲁，休方孔子厄于陈。相从狂简二三子，辛苦磨磨养性真。”

萧德浩《一九四四年无锡国专在蒙山的艰苦岁月》（见《无锡国专在广西》）：“八月间，桂林第二次大疏散，许多人从桂林逃难来蒙山。一天下午，我怀着探望的心情，沿着西街走向汽车站时，就见阎宗临教授、梁佩云师母，携带四个小孩，手里提着几个包袱，我赶忙跑上前接拿他们的行李，迎接他们的到来。过了两天，向培良教授一家也来了，不久，冯振代校长和吕逸卿、蒋石渠等教授和李春树、潘君博、李桂秋、吕伊娜等几位同学也来到蒙山，学校的珍贵图书也运来了。他们都住文尔村钟文会、钟文典（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的家里，钟文会还举行一次宴会，招待国专的校长、教授和同学。国专的师生们非常感激钟家兄弟的盛情厚谊。蒙山的局势

稍为平静，八月下旬，学校在文尔村复课，我和同学们打扫房子，将借来的黑板安置好，扫抹干净借来的桌椅，将钟家一间横厅上的小楼，布置为教室，并发出复课通知书。当时，参加学习的有从桂林随校来蒙山的同学，蒙山籍的几位同学，文尔村钟家在外地读书的几位学生，大约有三十多人，人数虽然不多，而学习生活，均和桂林的一样，早上早操，日间上课，晚上自修，课程设置均照旧日的规定。教授们生活非常清苦，授课却很认真。同学们在这四周沦陷、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仍是勤奋读书，早操后书声琅琅，晚上小楼的教室里灯火荧荧，同学们勤奋读书不辍，保持和发扬国专的艰苦勤奋的学风。文尔村是离县城约有十里的小山村，钟家的房子有三大座，一间间栉连，青砖瓦屋，我们二十多人住在那里较为宽敞，但是购买日用品、油盐、蔬菜，就是寄一封信，也要走十里路到县城去。冯振代校长为了复课，四出奔走，得到蒙山县地方人士的支持。为了学校经费，为了获得战事消息，经常不避溽暑，来往于县城至文尔村之间。每次进县城，都要走路，冯代校长不辞辛苦，师生们都忍受物质条件差之苦。重阳节，学校组织一次登高活动。我充当向导，大家游览蒙山的著名风景区——怡梦冲。这里怪石嶙峋，古木参天，有一条澄碧的九曲十八湾的山溪，师生们在冲口的霹雳庙前溪边的石岩上休息，流水淙淙，山风习习，曲水流觞，老师们赋诗联唱，游兴甚浓，日影西斜，我们才尽兴而归。”

阎守诚《逃难寻踪》：“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蒙山局势稍微平静。国专在文尔村复课。我们家也就从龙虎村迁到文尔村。国专师生借住在文尔村钟府，受到钟文会、钟文典兄弟的热情接待。钟家是以挖石灰石、烧石灰致富的。石灰可做建筑材料，用于盖房，也可以撒在稻田里，促使稻子长得更好，用

途广泛，销路很好。钟家由此致富，盖起三座大院，青砖瓦房，鳞次栉比。挖石灰石的地方，下雨积水，天长日久，成为水塘，可以养鱼。所以，从小听父母讲这个地方，叫文尔塘，而不叫文尔村。国专的教师、学生都住在钟府，把钟府一间横厅上的小楼布置成教室，在开课时有三十多个学生（包括钟家在外地读书的几位学生）。开课的时候，钟府还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国专全体师生。宴会的菜里，就有从水塘捞起的鱼，切成生鱼片。钟家富实，据说可以同时宴请五百人而所用餐具都相同……据萧先生（按：指萧德浩）说，国专在文尔村上课两个多月，学生人数虽不多，但学习热情很高，早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自修，课程设置都照旧的规定。教授们生活非常清苦，讲课都很认真，同学们在四周沦陷、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依然勤奋读书，保持和发扬着国专艰苦勤奋的学风。”

谢天球《无锡国专迁来蒙山办学及黄花学院简况》：“七月，桂林紧急疏散，因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无锡人，翰林出身）没来广州，由冯振（广西北流人）代校长率领，总务长蒋石渠及教授阎宗临（山西人，精文化史，通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英国文字，法国授予他历史博士学位）、向培良（研究戏剧有名，曾任当时剧宣四队队长）、吕逸卿和冯静居一批讲师、助教相继迁来蒙山。迁来蒙山的还有一批在校学生，其中蒙山县籍的有萧德浩、吕苏氏、谭可贵、张连昌、凌超荣、黄伟、黄水新等。初到蒙山，阎宗临教授一家人住在学生萧德浩家。此时，敌机不时侵扰，萧德浩等劝阎教授防空，但他镇定自若，不肯离开，萧德浩只好带着阎教授的四个儿子到文奎楼一带躲避。向培良教授住在孔瑞球家。为安全计，无锡国专迁到离县城十五华里的文尔村钟文典（现广西师大历

史系教授）家上课。钟氏兄弟的青砖瓦房很宽绰，家境富裕，在国难当头之时能慷慨解囊，热心资助，使无锡国专在困境中师生食宿问题得以解决。他们（用）比较宽的房屋做教室，用木板楼做临时藏书处，在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教学。”

在文尔塘，阎宗临完成了著作《罗马史》的写作。

阎守诚《逃难寻踪》：“……也是在文尔塘，父亲（按：指阎宗临）写完了他的《罗马史》。在自序里，他写道：‘长衡战起，如货物疏散至荔浦，以家累不能移动，继而湘战波及桂林，形至仓皇，荔浦又在疏散，不得已退蒙山。经此变更，使我了解许多事实，较读数万卷书，更为有益，所谓历史亦不过此种事实之积累，不断的演变而已。一个读书人，在那离乱之时，外面秩序破坏，如度沙漠中迷路的生活，所可求者，只有设法安定内心的纪律，埋头工作。我运用这种愚蠢的认识，试将所授罗马史整理成书。这并不是如何新奇的著述，这只是一个清苦的中国教授，苦守他战时的岗位，养着五个孩子（他们合起尚不到二十岁），对他职责的一种解脱，诚如罗马民族的精神，永远在奋斗着。’”

国专桂校迁徙至蒙山后，蒙山当地利用该校的师资力量，创办了“黄花学院”。

谢天球《无锡国专迁来蒙山办学及黄花学院简况》：“由于一些名家学者的到来，蒙山也‘借东风’，由何觉夫、孔宪铨（蒙山初级中学校长）发起创办‘黄花学院’，孔宪铨、陈文奇、吕仲麓、钟文会等人为校董。‘黄花学院’亦有文专班及附中班。新生是经考试录取的。文专班招收三年制、五年制各一班，三年制班学生五十多人，五年制班学生三十多人。在县城‘武功书院’隔壁的韩家祠堂上课。学生每学期交学费稻谷三百市斤。附中有学生一百人，分甲、乙两班。学生每人

每期交学费大米一百市斤，马富初考取第一名，免费入学。附中班在县城陈家祠堂上课。‘黄花学院’的校务由教务长何觉夫负责，担任教学的有当时疏散来蒙山的著名史学家简又文，无锡国专的饶宗颐、赵文炳、周培克、向培良教授。他们均义务任教。何觉夫教授英语，简又文讲授史学通论，饶宗颐讲授文选、诗选、文字学等课程，他到堂最多；赵文炳讲授历史，周培克讲授新闻通讯，向培良讲授法律通论（六法全书），孔宪铨讲授词选……是年十一月，日寇入侵蒙山杜莫乡，无锡国专和黄花学院被迫停课疏散。”

十月四日，冯振致电教育部，因此次迁校，公私损失甚重，故电请教育部“迅以非常救济办法，赐予特殊救济”，后教育部指令云“本部经费困难，应毋庸议”。

冯振《电请以非常救济办法赐予特殊救济由》（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四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万急！教育部陈部长钧鉴：本校迁校来蒙山，经于九月二十一日以总字第〇〇三号电呈钧部。查此次迁校，公私损失均属不赀，原定本月九日开始注册，十六日正式上课。而目前情势日益恶化，交通多阻，学生到校不易，收入势必大减。今后各教职员及战区生活更将难以维持，敬祈迅以非常救济办法，赐予特殊救济。无任感祷……”

按：教育部指令云“本部经费困难，应毋庸议”。

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日军攻陷新圩，逼近蒙山。当时学校师生大部分主张西去贵州贵阳，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西行不可能。意见不能一致，于是分成两支：一支由蒋庭曜率领向培良、俞瑞徵（字鍾彦，生卒年不详）、冯静居（生卒年不详）、蒋庭荣、饶宗颐等教师和若干学生步行至蒙山西面百余里之外的瑶山金秀瑶族自治县。不久桂林、柳州相

继陷敌，西去之路断绝，于是这一支便逗留在金秀瑶山，继续定时上课。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荔浦沦陷，部分国专员生赴金秀瑶山。”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课月余，夏历十月二十五日日军陷新圩，逼近蒙山，当时学校师生大部分主张西去贵阳，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西行不可能。意见不能一致，只好分道扬镳，由蒋石渠率领向培良、俞瑞微、冯静居、蒋庭荣等几位老师和若干同学步行至瑶山金秀瑶族自治县（在蒙山迤西百余里）。不久桂林、柳州相继陷敌，西去之路断绝。至金秀地区师生就逗留在那里，恰巧有位早期毕业的校友，当时在金秀设治局任职，得到他的帮助，在当地小学拨出部分房屋安置师生，并介绍部分同学在当地任小学教师和乡公所、和平村任职，来维持膳食。学校在早晚空隙时间定时继续上课。瑶山地势较高，时值冬令，天气严寒，室外沿途一带，多结冰霜。当地瑶胞多在室内烧火取暖。师生们虽处困境，仍诵读不辍。”

励述《记爱国学者蒋石渠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当时，蒋先生把家属安顿之后，便全力以赴地为迁校广西蒙山而奔忙。不久桂林失守，蒙山告急，一日数惊。在此危难关头，为维护学校和全体师生安全，他以大义为重，自告奋勇率领部分师生取道瑶山金秀，往贵阳方向转移。不料蒙山沦陷，敌寇进攻贵州诸县，他们被迫滞留于瑶山数月。瑶山人烟稀少，山高势险，行动困难。但他们这一群具有民族气节的学子，不畏艰难，穿行在曲折崎岖的漫漫小道之间，登险峰，越山谷，涉溪水，深入瑶山腹地。行装甫卸，立即上课。瑶山高寒，白天砍柴，夜晚教学，躬耕山野，

弦歌不辍，为无锡国专历史写下了艰难卓绝而又熠熠生辉的一页。”

李立德《无锡国专迁桂回忆录》（见《无锡国专在广西》）：“冯校长率领国专师生避难蒙山，当桂林沦陷之时，一部分师生强欲西往贵阳，冯校长不同意，仍留蒙山。苦留不住，他们便往金秀。冯校长和西去的师生意见分歧，双方都坚持己见，但大家都是维护学校的，是从学校前途、师生安危着想的。欲西去者，认为深入内地，远离敌寇，所以走向贵阳。冯校长考虑到，往贵阳路途遥远，年老教师及家眷儿童体弱难行。又认为广西‘民情淳厚’，冯校长是广西北流县人，对家乡情况熟悉又有声望，到处有人支持。去留都有道理，各人看法不同，但不是各执成见，冯校长苦留不住，心里难过，作诗送别。”

冯振《蒙山送石渠暨诸同仁同学西征（时桂林已危，大部分同仁同学仍强欲西往贵阳，苦留不住，情见乎词）》（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频年忧患饱同更，病弱难堪共死生。临别凄凉无一语，只将双泪送君行。”

前往金秀瑶山的这一支国专桂校师生，因该地高寒食艰，几个月中艰苦备尝，当时及事后师生多有诗文记之。

蒋庭曜《石渠诗存·劫中草·离蒙山》（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从下漓水，烽烟逼四隅。蒙山弱小地，瓯脱或无虞。难寻安乐窝，姑复此淹居。诗书足忘忧，讲习一余月。谁知无人境，胡骑忽飞逾。一夕惊数起，集议问所趋。群念走八载，岂忍见倭奴。宁死不愿留，冒雨上征途。履险若平地，徒步胜舟车。百折入瑶岭，蕨蕨尚可茹。”又《自忠良入大藤瑶山夜宿定浦》：“十一月十一日，相将入瑶山。古称大藤峡，险绝不可攀。自小生江南，履夷尚畏难。况今更负戴，蹶足上

危峦。又闻瘴厉地，贫瘠食尤艰。或劝慎勿往，鬼域非人寰。万劫来蛮荒，一意避凶残。苟得干净土，虽死心亦安。径往不复顾，穷途作壮观。仰天攒万峰，俯[俯]地无尺宽。羊肠与鸟道，曲折几千盘。势危难驻足，前后失相看。才入幽谷底，又上浮云端。怪险不可状，顷刻异悲观。昏黑至定浦，气倦力已殚。豁然开田陇，板屋八九间。扣户求上宿，牛鸡同一栏。瑶民走相视，俨然古衣冠。终日不得食，豆粥殊可餐。诸子终夜语，蕪木相御寒。”又《瑶山高寒食艰有人自昭平来劝往从之赋赠》：“握手相望泪暗弹，入山容易出山难。自甘藜藿岂言苦，已惯冰霜未觉寒。离乱如今谁处好，是非无定只心安。感公跋涉深山道，豹虎纵横子细看。”又《瑶山示诸生》：“万里尘劫到荒遐，师弟相从似一家。昼出樵苏夜弦诵，米无半石书五车。敢将忧乐关天下，漫为风霜惜鬓华。各世英贤安有种，丈夫志节自堪夸。”

按：上引《自忠良入大藤瑶山夜宿定浦》首句“十一月十一日”，疑当作“十一月十一”。

饶宗颐《瑶山诗草·卅四年元旦，值无锡国专二十四周年校庆。石渠置醴瑶山精舍，予适与会，酒后赋呈座上诸公》（见《清晖集——饶宗颐韵文、骈文诗词创作合集·瑶山集》，又见《无锡国专在广西》）：“我似羸牛鞭不动，尚欲与公偕入瓮。薄酒浇胸如泻水，一饮百杯嫌未痛。江海相逢值元旦，觥筹手挥兼目送。穷山华筵岂易得，此乐要当天下共。太湖三万六千顷，伊昔曾开白鹿洞。崔巍瑶岭播迁来，最高寒处能呵冻。师友呻吟各一方，二十四年真一梦。我行叠嶂叹观止，如吞八九于云翥。群公坚苦餐藜藿，要为国家树梁栋。平时蟠胸有万卷，可与山灵一披讽。潢潦终当归巨浸，蛮荆自昔生屈宋。西溪一脉此传薪，南荒万象足搏控。汀洲鸿雁渐安集，风

雪纸窗余半缝。倾壶但愿长周旋，破眼梅苗春欲纵。”

潘君博《国专播迁瑶山忆旧》（见《无锡国专在广西》）：“回忆当年由桂林播迁金秀瑶山的老校友有：邓式山、郭湘、李桂秋、曾长卿、农盛田、梁建元（以上均为同学），等等。尚有蒋石渠老师、蒋庭荣老师、饶宗颐老师、俞瑞徵老师、职员陈奇芬……当年蒋石渠老师率领我们几位同学原拟取道金秀瑶山步行前往贵阳，结果没有实现。在金秀住了两三个月，生活由当时金秀地方行政领导欧阳革辛老师（欧阳革辛于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在桂林任国专讲师）照顾。当时俞瑞徵老师曾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示各同学为纪念。对云：‘一溪明月留人住，满树梅花映雪开。’因瑶山高寒食艰，故云。我和李春树同学在金秀约三十华里的和平村任小学教师，在村里的一家公所寄住，每星期回金秀探访老师同学，并在夜间听蒋石渠老师讲授《孟子》。蒋老师赠我一首诗，诗云：‘卅里原能朝夕亲，愿君此去莫悲辛。即今环境多艰厄，自古英雄有屈伸。悦使瑶童皆率教，可令山野尽同仁。荒村漠漠红千树，且为风光慰此身。’……又，当时饶宗颐老师写一首诗赠给同学，诗云：‘同是无家别，难为故国心。南风惜不劲，荒谷为穷阴。食蕨颜愈美，生鱼陆可沉。寄言分手者，相守在东林。’”

另一支有师生员工共二十人，由冯振率领，在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日军陷新圩后由文尔塘转移到古苏冲。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由冯先生率领的另一部分师生员工共二十人，在日军陷新圩后即转移到古苏冲，以后又移居大塘。”

冯振《蒙山古苏冲作（甲申夏历十月廿五日寇陷新圩，自文尔村移居古苏冲）》（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偶然茹苦只平平，忧患如山久惯更。一夕山林遭露宿，全村

男妇尽魂惊。故知此地民情厚，便遇途人意态诚。岂但让庐分米感，和言善气已心倾。”

十二月十六日（农历十一月二日）又由古苏冲移居大塘乡，住在岑拔萃、岑佩奇兄弟家中。

冯振《赠岑拔萃佩奇昆季（甲申夏历十一月初二日自古苏冲移居大塘岑家）》（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岑家兄弟气和柔，耕读传家进退优。生计稻田兼柚圃，分居东屋更西头。感君子美万间意，卧我元龙百尺楼。更许朋许安稳住，满天风雨不须愁（时国专同仁眷属暨同学工友共廿人同住一大楼）。”

阎守诚《逃难寻踪》：“在文尔塘住到十一月月初，日本侵略军攻占蒙山北境的杜莫乡，县城紧张，国专部分师生由冯校长率领，由文尔塘转移至大塘乡，住在岑氏兄弟（拔萃、佩奇）家里。岑拔萃民国初年毕业于陆军测绘学堂，后来任柳州测绘局局长。家道殷实，宅地宽阔，分东西两院，国专师生住在岑拔萃家，师生及眷属二十余人同住一个大楼，在岑氏兄弟的殷勤招待下，才得以安身。”

国专沪校

农历正月开学，学生及旁听生百余人。唐文治每逢星期二到校，为学生讲授《读文法》一节（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甲申八十岁》）。

二月二十三日，无锡国专第一届毕业生吴其昌去世，后王遽常为作《海宁吴子馨教授传》。

王遽常《海宁吴子馨教授传》（见《抗兵集》）：“甲申闰四月某日，余姚丁梦悟书来。曰：子馨死矣。余惊恸失声，既为位而哭，乃为之传曰：君姓吴氏，讳其昌，子馨其字，别字

正厂，浙之海宁人也。少失父母，依姊居桐乡，自幼知刻厉。八岁日记数百言，长好辩论，卓诡出人意，然必以正；矜气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僵仆无所辟。十七受业太仓唐尚书师之门，与余及唐立厂兰善。初至，夸布衣，负巨筐，踉跄行大雨中，直入横舍上坐，即发书读。与人不款曲，舍中人皆目笑，君自若也。十余日，始狎语，博闻强识，喜为通俗文。论必称时贤，余与立厂大诤之。立厂刺刺举先儒治学法，君低首不复言。自此遂治经及小学，既又好读有宋诸子书，考其史事至勤，作程明道李延平谢显道诸年谱、《朱子著述考》、《两宋学术史》，各若干卷。予谓理学而尚考据，自君始，立厂笑为外道，不顾也。常以闲道自诡，与人论经，一宗朱子，不合辄上气。予与立厂著《淫诗辨》，破朱子集传之说，君终不服。尝作《朱子理学讲义》，累数十万言，立厂举班孟坚刺傅武仲语，君立刊削，一夕定。辛酉壬戌之际，边事渐亟，君拟上当路书，緜緜数千言，不终朝而具草。尚书激赏，改杜语谓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时君年最少，同舍生皆大惊，有林某嚅喏宿儒，恃才欲诋君，终莫能难……其歿为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也……”

按：上文中说唐文治的“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是对吴其昌“上当路书”的批语，但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在《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一文中记：我亲见唐先生对父亲两篇作业的批语。一篇评《屈原论》，戏改杜诗赠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郁塞磊落之奇才”……”，王遽常后来在《自述》中提及此事，也说这是唐文治对吴其昌“于天中节作《吊屈原均文》”的批语，且“吴为呜咽流涕”。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二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



业生计有姚国芳、王衍波、陈左高、许生奇、沈翔云、林碧琰、李升平、李寿生、李戎珍、姜烈、黄政芳、杭佛生、于善和、梅竹髻、徐锺辉、林文赫、赵廷钰（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黄殿鳌、沈幼徵（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十九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二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年夏，无锡国专第一届毕业生毕寿颐坐飞机遇警暴卒，后王遽常为作《毕君贞甫传》。

王遽常《毕君贞甫传》（见《抗兵集》）：“毕君讳寿颐，字贞甫，籍太仓，秋帆尚书五世孙也。自其曾大父居吴县，遂为吴县人。少孤，育于大父，蚤慧有深思，年十二，遍五经，通毛诗小学。民国九年，吾师唐尚书创国学馆于无锡，余与君同试，首经义，时士不说学，经训尤荒落，与试者凡余千〔千余〕人，多瞠目腐豪莫能下，君独绵绵若不可穷，同坐者皆惊视。君惧为所袭，改作古籀文，尚书得卷，大异之。余初谒，称之不容口，一见遂〔遂〕如平生欢。自后月试岁试，余与君相角逐为后先。余乡人唐立厂兰，文怪丽似龚璦人，隐然成鼎峙，同舍生指目号三杰焉。三人者，食息行动必俱，俱必上下其议论。君庄谐间作，有匡鼎之风，闻者忘券，往往漏尽不止。余与立厂治学，言经喜先秦二十一博士之说，小学则旁及甲骨鼎彝石室队简之文，务奇以哗众；君则一本鄆郑，兢兢守先儒故训，不敢失星黍。尝私语余曰：学不必奇，惟其是。余大魁之，自是交益密。一夕乘月循西溪，登九龙山，坐危石，望太湖，余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君和之，声激楚振林莽，宿鸟皆惊飞。君忽愀然顾余曰：学必薪其用，而用不必学，将与人为徒乎？抑与古为徒乎？余大言曰：宁与古为徒。君默然……竟于三十三年

夏以飞行遇警暴卒，年五十有三……”

十月一日，原无锡国专教授陈柱因中风病逝于上海。

唐文治《广西北流陈君柱尊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六）：“君讳柱，字柱尊，晚年别号守玄……余于国学专修学校设特别讲座，月必讲演二次，间出新义，听者多倾倒悦服。好饮酒，能引数巨觥，与余同席，辄歌诗诵文，余戏以陈惊座呼之……甲申岁四月得中风证……遂以十月一日卒……”

冯振《吊柱尊墓》（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一尊满意复同倾，岂料沧桑隔死生。万劫不磨知己在，百端难语寸心明。重泉应抱千秋恨，早世翻教后累轻。宿草荒坟吾敢哭，迸攒酸泪只吞声。”

按：此诗作于一九四六年。冯振与陈柱为广西北流籍的同乡，又曾同在无锡国专任教，两人交谊极深。陈柱在《自然室诗稿叙》中说：“……然（余）目高于顶，桀傲不群之气，犹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独于振心，则一见如旧，相与为忘年交。振心每值节假日，必来相见。夜则同榻，议论处世、治学之道，往往达旦，不倦于时。余好治诗、古文辞，而振心亦好之。久之，振心亦同受业于唐先生。于是，每日课后必相见。见则必论诗、古文辞。浸假而治小学、治经、治诸子，莫不同之。而吾以数年之长，凡所议说，振心尤私心好之。”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所记，自一九四〇年陈柱“入宁后，（冯振）遂不（与之）通讯”。查冯振《自然室诗稿》，自一九一五年自一九四〇年陈柱“入宁”之前，冯振与陈柱的唱酬之作或与陈柱相关的诗，多达六十二首，“入宁”后则一首也没有，至一九四六年方有此《吊柱尊墓》之作。无锡国专第五届毕业生王绍曾在《从冯振心



先生与陈柱尊的交往中想到的》（见《冯振纪念文集》）一文中说：“《吊柱尊墓》这首七律，凝聚着冯先生的满怀创痛……‘重泉应抱千秋恨，早世翻教后累轻’，这里有许多该说又不该说的话。冯先生不是以春秋大义责备贤者，而是设想故人也必然悔恨自己，深见用笔之妙。”文中又说，这首诗一出来，“便受到国专校友的普遍传诵”。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国专桂校

一月十五日（农历甲申年十二月二日），日本侵略军攻陷蒙山。冯振率领国专桂校留蒙员生转移，十六日至古苏冲；再翻越龙寮岭，于十七日到达昭平县仙回乡鹿鸣村，住在陆省吾家中。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五年）一月，蒙山沦陷。我与国专留蒙员生迁昭平仙回乡鹿鸣村。”

冯振《龙寮道中（自蒙山大塘至昭平仙回所经）》（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直穷山木杪，听到水声干。赖有天然美，能忘行路难。藤蛇盘涧底，石兽怒云端。不是前途远，真宜细细看。”又《寇陷蒙山自大塘移居昭平仙回乡鹿鸣村（夏历腊月初二晚寇陷蒙山，初三晨进古苏冲，初四至仙回）》：“一径穿云越窈冥，万山层叠矗天青。望门投止悲张俭（鹿鸣村陆省吾先生乃初识面，招待甚周），到处依归愧管宁（同行廿余人，除国专同仁同学外，广西大学教授杜肃、桂林市政府科长黄权均挈眷同住）。只好韩康时卖药，何须刘向更传经。齑盐粥饭非容易，拟向松根采茯苓。”

阎守诚《逃难寻踪》：“当年在大塘住了约一个月，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夏历腊月初二）蒙山县城沦陷，国专师生从大塘向昭平仙回转移。十六日至古苏冲，十七日至仙回鹿鸣村，翻越龙察岭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古苏冲是两山之间一块东西向狭长的平地，长约一公里，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冲的尽头是有‘天下铁打第一闸’之称的玉龙关，从玉龙关往东是龙察岭，越过龙察岭有平、旱、崩三冲，过了三冲就到仙回，从玉龙关到仙回有二十公里山路……听母亲（按：指梁佩云）说，翻越龙察岭时，父亲（按：指阎宗临）把小时候背煤的看家本事拿出来，背着我，手里提着那只装着几本书和讲义的小箱子，母亲背着不满一岁的妹妹，五六岁的哥哥、姐姐自己步行。我久久地眺望着在云雾笼罩下的龙察岭，默想着当年父母亲翻越龙察岭的艰辛。父母亲带着我们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既要小心翼翼地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又要瞻前顾后，关照着我们的安危，在这样心力交瘁的行程中，哪里顾得上欣赏风景。大约这就是母亲常说的龙察岭的风景真好，就是没有心情观赏的理由。”又：“当年国专师生住在陆省吾家，陆省吾曾给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当过秘书，算是个官僚，国专师生投宿他家时，受到很好的接待……在仙回住的时候，曾受到日本侵略军的骚扰，父母亲带我们躲到村后的山里，听母亲说，上山之后，我不懂事，总要说话，父亲口袋里装着几片红糖，我一说话，就塞一块糖。中午就在山上烧了些米饭，没有筷子，就折几枝树枝充当。饭好以后哥哥姐姐总让我先吃，他们当时也不过五六岁。父亲问大哥守胜：‘苦不苦？’守胜说：‘什么是苦？’父亲说：‘不知道苦就好。’这真是‘小’不更事，成人和儿童对于苦难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从山上回到村里时，逃难时带出来的一点衣物已全被抢光了。全家七口

人，只有一条棉被，而当时正是隆冬，真是饥寒交迫，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生活陷入最为困苦的境地。”

二月，冯振率领部分国专桂校师生转移至昭平县北陀乡。因为生活困难，经当时任昭平县县长的韦瑞霖（字焕熙，一九一二～一九九八）介绍，冯振、阎宗临、吕竹园（生卒年不详）、梁佩云四人在昭平国民中学兼任教员。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五年）二月，日寇至仙回搜劫。逃避山上露宿两夜。寇退，仍回鹿鸣村。书籍行李多损失。旋住昭平县城，转住北陀乡。”

韦瑞霖《无锡国专部份老师在昭平》（见《无锡国专在广西》）：“……我完成了任务后冒寒风冷雨回到乡公所，夜已深，我问乡长有何重要事商量，乡长说，有几位教授从蒙山逃难来生活很困难。我说，你立即打灯笼打伞去接他们来面谈。不一会，冯振、阎宗临、吕竹园等来到，围火盆叙谈。首先我对各人从蒙山来很辛苦表示慰问，接着我问各人有不〔没〕有困难需要我帮助。冯振乃介绍各人情况，并说阎教授最辛苦，他夫妇带四个年幼子女，匆忙逃难，书籍文件笨重行李都丢了，一家六口人只带得一张棉被。各人都说，兵荒马乱，人地生疏，举目无亲，饥寒交迫，请我想办法。我安慰各人不必忧心，我考虑，我在国民中学增加几个编制，他们愿意的话，我介绍你们去国中任教员，国中为避免日本飞机轰炸，已迁去北陀乡上课，北陀是产粮区，地方安静，教师每人每月薪金是稻谷二百斤和为数不多的纸币，住房由学校供应。他们都表示愿意去。冯振说，等到阎、吕两家生活安定便回北流家乡去。我如是亲笔写增加国中四个教师编制，介绍冯振、阎宗临、吕竹园、梁佩云四人为国中教师，交给在我身边的县府民政科陆英武科长办理。我说，因为军情紧急，明晨我要赶到前线去，



你们从现在起到北陀乡的生活费和佚力费由县府开支，你们放心去……”

阎守诚《逃难寻踪》：“……‘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家在仙回的生活陷入困境时，昭平县长韦瑞霖来到仙回。韦瑞霖是通过文官考试当上县长的，其人能诗善画、为官清廉、积极抗日，也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在他任县长时，何香凝、梁漱溟、欧阳予倩、千家驹等都曾在昭平居住，使昭平一时成为文化人聚集的地方。”

三月，冯振率国专桂校部分师生重回北流县山围村。而留驻在金秀瑶山的另一部分师生，至本年二月，因粮食缺乏，无法久住，在得知冯振已回山围时，就由金秀步行至平南，在平南开课小驻；后又偷渡西江，由小道经容县等地，到达山围。两处师生汇齐后，于四月借山围磐石高级小学重新开学上课。当时共有新旧学生百余人，教师有陈一百（别号百一，一九〇九～一九九三）、蒋庭曜、蒋庭荣、俞瑞徽、冯静居、吕逸卿、王震、龙纯如（一八九五～一九八二）、冯介（字介民，一八九一～一九七九）、冯赞廷（生卒年不详）等人。其中陈一百讲授统计学，冯介讲授世界地理，冯赞廷任文书班的课务。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五年）三月，将国专员生眷属安置在北陀国民中学。我与少数员工间道赴苍梧戎墟，越过日寇沦陷区。沿容苍公路步行八日至容县，再回山围乡间。四月，无锡国专在山围复课。”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金秀，师生们停留了三个多月，至次年二月，因粮食缺乏感到无法久住，在得知冯代校长已回山围时，就由金秀步行至平南，在平南开课小驻。时日军尚据平南县治，乃偷渡西江，由小道经容

县等地，到达山围……一九四五年三月，两处师生会齐后，借山围石山磐石小学重新开学上课。当时广西各地仍处在战火之中，国专虽然复课，但教育部的补助却断绝了。这时（大约有几个个月），冯先生就自己筹款维持。当时新旧同学共有百余人，教师有陈一百（训导主任）、蒋石渠、蒋庭荣、俞瑞微、冯静居、吕逸卿、王子畏等人。”

蒋庭曜《石渠诗存·劫中草·自金秀迁平南大王开课第二日晚枕上作时三月十四日也》（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家分五处，偶忆即成痴。挥泪却无泪，相思岂忍思。敢凭诗酒意，遣此乱离时。亦有人家子，将持莫失宜。”

李立德《无锡国专迁桂回忆录》（见《无锡国专在广西》）：“这次国专迁来山围上课，是第二次。是借用山围磐石高级小学的一部分校舍上课。该校后倚磐石山，校门前是广阔的田野。该校校舍宽广，小学的领导愿意将小学里空余的校舍借给国专上课。课桌、课凳、黑板、床架也是很简陋的，和前次来山围上课用的一样，一台坐四人。在山村，购买木材容易，几天内就准备好了。当时，国专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管辖，那时的政府没有拨给经费。学校随处流浪，没有固定的校址。而国民党教育部远在重庆，纵使有钱，也难于拨到沦陷区的广西来。逃难来的师生，经过半年多的流浪生活，身无分文，现在来到山围，那就依靠冯校长家里人，依靠他家乡的群众和小学老师的支持帮助！学校紧接着安排上课。除原有从蒙山、金秀来的老师外，还增加了许多新教师。巨赞法师由桂林经桂平西山来了，他教授古文选。陈一百教授由他家乡萝村来了，教授统计学。广西电力厂的经理龙纯如先生在数月前逃难来到山围，住铁炉村的一个农户家中。他和冯校长、冯介教授等都是老朋友，所以他一家来山围避难。他是留学英国的，



也到国专任課。馮校長的叔父馮介，在數月前已回家來了。他留美三年，在美任總工程師十六年，又去過歐洲九個國家游歷，回國後任膠濟路工程師，抗戰後任湘桂黔鐵路總辦事處主任，兼廣西大學理工學院院長。馮校長邀請他上《地理》。他說：‘我不是學這門功課的，怎能勝任？’馮校長說：‘把你歐美游歷的所見所聞講給學生知道，已經足之有餘了。’他上《世界地理》。馮校長又邀請其族兄馮贊廷任文書班的課，馮老滿口答應，又不容辭笑咪咪地說：‘應征。’他年逾古稀，身體精神很好。他是清代舉人，民國時在南寧任職，與李濟深是老朋友。教師的任課安排好了，增添了許多新教師。校長高興地說：‘有許多人發了國難財，我們也發了國難（人）才。’……一九四五年三月，馮校長率領師生自蒙山來到山圍已超過原定的上課時間了，學校就在暑假補課，上足一學期的功課。在如此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如此緊張的局勢下國專的教學也不馬虎了事，按學校的規定，既要讀夠期限，又要修夠學分。”

李立德《紀念馮振教授誕辰一百周年》（見《馮振紀念文集》）：“陳一百先生是學教育心理的，留學美國。他說：‘國學我是門外漢。’學校請他上《統計學》，他講統計的方法是把許多複雜的數字，經過安排整理，很快就統計出來。”

龐心逸《抗日期間無錫國專遷桂回憶》（見《無錫國專在廣西》）：“陳一百老師，學校在山圍時，他教《統計學》，教學嚴肅，講課簡要，說話文雅慈藹，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有一次陳一百老師曾贊語過我的作業整潔認真，曾給最高分，給我以鼓勵。”

按：陳一百是曾在無錫國專任教的陳柱的長子，曾先後就讀於金陵大學哲學教育系、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攻讀教

育统计与心理测量学科)、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上引李立德文中转述陈一百的话说“国学我是门外汉”，实际上，他在父亲的影响下，对国学也有相当的爱好和造诣；就读于金陵大学期间，在国学家陈中凡、胡小石、叶长青等人的熏陶鼓励下，曾先后写成并出版了《陶渊明诗研究》、《曹子建诗研究》等专著。

国专重回北流山围开课后，冯振邀请住持桂平西山龙华寺的巨赞法师（原名潘楚桐，字琴朴，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字定慧，一九〇八～一九八四）来校任课，讲授古文选和诗词选。

巨赞《我的回忆》：“这时，无锡国专从桂林移到北流开课，校长冯震〔振〕是北流人，打听到我在桂平乡下避难，就请我去无锡国专教书，一直到日本投降，无锡国专搬回无锡，我就从无锡回到杭州。”

冯邗仲《“故人谊重追先哲，始信生应多读书”——记家父与巨赞法师攀交的二三事》：“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无锡国专第二次迁至北流山围办学时，便向住持桂平西山龙华寺的巨赞法师发去了聘书，请他到北流山围来给无锡国专讲学，教的是古文选和诗词选。巨赞法师到山围时，正是无锡国专经过蒙山逃难，分期分批到山围集中重新复课之后。当时国专的师生主要借用磐石山脚下的磐石高小的校舍落脚，校务议事主要在我家的花厅进行。我家所住的‘沙梨园’，是我的祖父兄弟俩的后代一起居住的院落，我家的藏书楼是村里少有的几栋楼房之一……一九四五年巨赞法师到山围后即寓居藏书楼的二楼上。讲课时，法师便步行到磐石学校去，所以村里都知道我家住了一位高僧。法师的素餐由我母亲亲自烹饪，专人送到法师的卧室供他用餐。记得每次午饭后，法师都要下楼到花厅的帆



布躺椅上休息片刻，与我父母作些交谈。有时看见我们姐弟三人，便把我们叫过去，用浓重的江浙口音给我们讲佛教的故事。”

按：据上引冯邗仲文中记，一九七九年，冯振作有《得巨赞昭雪来诗喜赋报之》一诗，中有“违难曾逃山邑住”之句，作者自注云：“抗日战争期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桂，曾因桂林紧急疏散，仓卒间全校师生迁至北流吾乡山围容村避难，巨赞也从桂平西山到无锡国专任课，即寓我家楼上。”

三月十六日，无锡国专第三届毕业生、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秘书的张寿贤（别号绩熙，一九〇五～一九八八）致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敦请拨发国专桂校特别救济费三十万元。

张寿贤致朱家骅函（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骝公部长钧鉴：敬肃者，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系唐蔚芝先生手创，廿六年寇难猝发时，唐先生率全校师生辗转迁桂，历尽艰苦，弦歌未辍。其后唐先生因目疾加剧，返沪疗养，八十衰翁，屡受困厄，身滞沪滨，贫病交加。前年曾蒙总裁特电慰问，并致送生活费叁万元，笃念耆宿，令人感奋。桂林经七年来之悉心擘画，虽经费艰窘，而规模粗具。去年桂柳失陷，消息中断，旅渝校友极为焦念。近由广西银行转来一电，悉现迁金秀复校，交通隔绝，炊烟屡断。曾电请钧部及教授补助金委员会即汇卅三年度下期经补费及教补金，并恳发特别救济费三十万元等语。情词迫急，殊难坐观……请发卅三年度下期经补费及教补金，似系应发之款，因战事及一再播迁关系，而未能收到者。拟请钧座俯烦详查，如已汇发，请示知汇往地点、汇出年月及承汇银行，以便分别查询转汇。如尚未汇出，则请速予汇发，以资维持。

至所请拨发特别救济费一节，去年湘桂之战，受损各校，均有巨款救济，该校主持人员，均未脱书生本色，与各方素无往还，校友间亦鲜通音问，只知埋头苦干，不敢率请呼吁，各校均有分润，该校独未沾溉。拟恳钧座体念实情，准予特拨卅万元，以资救济。再唐先生为当代经学大师，灵光巍存，屡受敌伪诱胁，屹未稍动，大节芬芳，凛然正气。拟恳钧座致电嘉慰，存问近况，以示关怀宗匠，礼尊河汾，海内闻风，知所趋向……”

按：由教育部属员代拟的朱家骅复张寿贤函中称：“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请拨特别救济费，已由部一次补助贰拾万元，并电知该校款汇广西省政府。唐蔚芝先生处另电致慰。”

本年暑假，国专桂校至容县招生。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结束。国专桂校一面继续上课，一面准备复员工作（据冯振《自传年表》）。

八月二十二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呈文教育部，请求拨发迁移费八百四十万元，并请教育部“转飭容县、梧州、广州、上海各地方当局，指派车辆，俾便随时准备出发”。

冯振《电请迅拨迁移费俾便迁回无锡由》（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重庆教育部钧鉴：查最近日寇投降，战事业已结束，本校亟宜迁回无锡。现有教职员眷属及学生二百八十人，所有旅途费用，以每人三万元计，需费约八百四十万元，敬祈迅予赐发上项迁移费暨迁移护照，并转飭容县、梧州、广州、上海各地方当局，指派车辆，俾便随时准备出发为禱……”

按：教育部指令云：“该校迁移费，应由校董会自行筹措。本部俟汇案呈请行政院拨发后，应再行酌予补助。”



十月六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再次致电教育部，说明本校校董因受战事影响，蒙受重大损失，实在无力筹措复员迁校费用；敦请依照国立各院校复员办法，拨发迁校费用。

冯振《电请钧部俯察本校困难依照国立各院校复员办法赐予救济俾得迁回无锡由》（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重庆教育部朱部长钧鉴：案据最近报纸载，钧部召开教育复员会议，关于专科以上学校复员办法，有私立学校复员经费由校董会筹措一项，在原则上自属正当办法。惟查去岁战事，桂省受灾特重。本校辗转播迁，损失尤巨。而本校各校董亦同因战事影响，蒙受重大损失，自身尚望政府予以救济，更无余力补助学校。且本校自民国二十六年内迁，留桂数年，尽力经营，粗具规模。去岁湘桂战起，校舍尽付焚如。本校虽历尽艰辛，始终率领学生继续上课。今国家大定，本校迁回无锡势不容缓；而迁移费用，校董既无力筹措；在此困难环境中，只有仰仗政府予以补助。敬祈钧部俯察实情，体恤艰困，依照国立各院校复员办法赐予救济，俾得于本学期结束后，即行迁回无锡……”

按：教育部指令云“应俟汇案请行政院核拨后再行酌予补助”。

十月七日，国专桂校校务会议决定，于本学期结束后，如港沪交通恢复，国专即行迁回无锡。十七日，冯振以此事函告校董会董事长李济深。

冯振致李济深函（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报民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毕业生名册、成绩、考试委员会名单、学籍表，教育部有关验印的指令和桂校迁回无锡的信函》）：“任公董事长钧鉴：敬肃者，溯自去岁湘北战起，祸延桂省，本校辗转南迁。今夏五月在北流山围继续开

学，迄今已半载。曾于六月七日奉上乙函，略陈经过。八月在容，得与公子沛金兄相晤，藉稔兴居万福，至慰下怀。尝以一片托代呈候，谅邀察及。前以迁北流开课伊始，倍感困难，曾以董事长、代理校长名义先后分别致函朱宏汉（朝森）、陈著英（锡珖）、罗清涛（活）三先生，敦请为本校名誉校董，负责劝募，以资救济，虽成绩如何，现尚未得确实答复；而经过如此，理应奉陈。自日寇投降，一切俱已改观，全国正在进行复员。本校迁桂校舍已尽毁于火，为本校前途计，只有迁回无锡，重复旧观。经于本月七日校务会议决定，于本学期结束后，如港沪交通恢复，即行迁回无锡。惟兹体事大，原应先行禀承我公，再作决定。只因交通不便，未克走谒，敬祈随时赐予训示，俾有所遵循，无任感禱……”

十一月六日，国专桂校代理校长冯振致函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询问粤沪交通航运将于何时恢复。同日，又致函交通部广东区特派员办事处和招商局广州分局，询问粤沪航运何时恢复、学校团体优待办法及舱位票价等问题。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代电（国总字第〇〇六号，卅四年十一月六日）》（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报民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毕业生名册、成绩、考试委员会名单、学籍表，教育部有关验印的指令和桂校迁回无锡的信函》）：“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勋鉴：敝校自抗战以来，由无锡辗转播迁，经长沙而桂林而北流。在桂林自建校舍，去岁桂省战事已尽毁于火。今春在北流山围，借都龙乡中心校为临时校址，继续开学，学生二百余人。现日寇投降，敝校亟拟迁回无锡，决定于寒假期内启程。惟粤沪交通航运究不知于何时恢复。敬请贵府将详情赐示，并恳惠予协助，无任感荷……”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公函（国总字第〇〇七号，卅四

年十一月六日)》(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报民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毕业生名册、成绩、考试委员会名单、学籍表,教育部有关验印的指令和桂校迁回无锡的信函》):“交通部广东区特派员办公处、招商局广州分局:敬启者,敝校自抗战以来,由无锡辗转播迁,经长沙而桂林而北流。在桂林自建校舍,去岁桂省战事已尽毁于火。今春在北流山围,借都龙乡中心校为临时校址,继续开学,学生二百余人。现日寇投降,敝校亟拟迁回无锡,决定于寒假期内启程。惟交通问题颇感焦虑:一、粤沪航运在年底能否完全恢复?二、学校团体是否另有优待办法?三、各舱位票价若干?上述三点,敬请贵处分别赐示,俾有所准备,并希惠予协助,无任感荷……”

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三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何仙、陈警予(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祁文才、王大方、缪洪淮、冒溥、何述祖(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九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三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蔡月莹、杨家桐、陈以鸿、梅有图、程明娜、杨康年、沈孝缘、陈钦源、徐寿臻等九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届毕业生中,陈以鸿(字景龙,一九二三~)原先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一九四二年暑假后交大被敌伪政权强行接管,乃停学并考入国专沪校。本年从国专沪校毕业,适值抗战

胜利，交通大学复员，陈以鸿又回交大复学，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在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这样陈以鸿就“在连续七年内完成了与唐校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两所不同学校的学业”，而且读的是学科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专业。

陈以鸿《大哉夫子——纪念唐校长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国学之声》一九九五年第四期）：“一九四二年暑假后，交大终于被敌伪强行接管，由‘私立南洋大学’变成伪‘国立交通大学’。同学们都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但各有各的打算。面前有四条路可走：去内地进重庆交大，进伪交大，转学私立大学相同系科，停学。我一没有能力去内地，二认为进伪交大是失节，三又不愿改入私立大学，决心停学自修。父亲觉得光在家自修不妥当，考虑到我平素喜欢国文，而且从高中起就在学作诗词，建议进国专学习。经过交大国文教授、国专教务长王瑗仲师介绍，考进了国专。本来可以插班本科二年级，因为我只是利用交大停学期间有个地方读书，并没有想读到毕业。所以决定从一年级读起。不料随着战事的拖延，年复一年地继续读下去，终于读到三年毕业。正好抗战胜利，国土重光，交大复员，我得以回交大复学，在时间上完全衔接，至一九四八年从交大电机系毕业为止。我在连续七年内完成了与唐校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两所不同学校的学业，并以此自豪。在此后的就业生涯中，我始终没有忽视把两所学校的专业结合起来，以期不辜负老校长办学的苦心孤诣。我长期以来从事科技翻译，就是两者结合的体现。”

陈以鸿《师门琐忆之四——纪念唐尧夫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唐先生（按：指唐景升）知道我在交大读过一年电机系，因受太平洋战争影响而改进国专，对我非常器重。在第一篇作文《自序》的评语中写道：



‘立志坚卓，文亦精力弥满，始终不懈，望好自为之。’后来还有这样一些评语：‘望而知为好学深思之士’，‘是学人才人兼而一之者也’，‘如珠走盘，如水银之泻地，极行文之乐事矣’。在唐先生的勉励下，我对作文全力以赴，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有一次竟得九十八分。唐先生允许当堂不能交卷的带回家下次交，我为此经常熬夜，以期充分发挥，不过迟交是要扣分的。作文题总是二选一，一个论说题，一个描叙题，我总是选前者，同学谢一飞总是选后者，我们两人相互争胜，卷子发下来，不是我第一，就是他第一。毕业时我请老师们在纪念册上题词，唐先生写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鸿仁棣夙有志于科学，嗣以形下之学须得形上之道以为之本，爰来无锡国学专校讲求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三载卒業，成绩斐然。兹复入交通大学专攻声光光电之术，是能学通中外，体用兼赅者已。为书南皮张文襄公语以贻之。南沙唐景升。’”

本年下学期开学后，仍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添聘国专第一届毕业生唐景升为总务主任，并为学生讲授基本文选。唐文治仍为学生讲授《读文法》一节（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乙酉八十一岁》）。

陈以鸿《师门琐忆之四——怀念唐尧夫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唐尧夫先生名景升，南江人，与王教务长同为母校首届毕业生。我在母校时，他一直教我们基本文选。唐先生为人质朴，讲课时全神贯注，精力充沛。唐校长具有特色的读文法，他是忠实继承人和积极推行者。”

抗战胜利后，以前因战事而辍学的一些国专学生又回到国专沪校复学。

黄汉文《缅怀朱大可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

二十一期)：“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普天同庆，我也回沪校复学。时隔三年半，认识的同学大都已毕业，而辍学的季位东、汤志钧、俞履端等诸兄也次第来复学，有一位敬业中学三七年土木科毕业的王经纬兄，年将三十岁也来考入本科一年级。”

抗战胜利后，国专沪校原先的一些兼职教授离校，又先后聘请了黄云眉（字子亭，一八九八~一九七七）、胡曲园（一九〇五~一九九三）、王佩诤（名睿，字佩诤，以字行，一八八八~一九六九）、刘文兴（字诗孙，孙一作荪，一九一〇~？）等人来校任教。黄云眉讲授中古史等课程，胡曲园讲授伦理学等课程，王佩诤讲授中国学术史等课程，刘文兴讲授元明清戏剧、小说等课程。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我于抗战胜利后复学，老的兼课教授离校了，又来了好多位新的。我选读过黄云眉教授的中古史，胡曲园教授的伦理学，王佩诤教授的中国学术史。胡曲园先生教同学们作定义的方法，举的是作‘人’的定义的例子，他用‘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来说明。解放后才知道他是老共产党员。唐先生常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他选教师注重师德，重于业务。刘文兴从北方来了，唐校长叫他兼任元明清戏剧、小说课。刘文兴一上课堂就对每个学生作个短揖（心与口之间），然后说：‘《窦娥冤》里的楚州太守桃杌向告状人下跪，说是他的“衣食父母”，各位选我的课，使我有收入，赏我饭吃，就向各位作个揖吧！’事为唐校长所知，又发生在校友身上，又不便立即发作，很生气。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上海的戏剧界很活跃。我在欣赏梅兰芳、程砚秋、小彩舞（骆玉笙的艺名）等的戏曲时，都曾发现刘文兴（那时还互不相识）在剧场里高谈阔论。我那时在无锡母校工作



过一段时间，已离校他去。有一次刘文兴在母校见到了我，彼此觉得‘似曾相识’，就在办公室谈起戏来了。唐校长正在礼堂（借用乐群中学的）对全体同学讲学，他讲完课约我明天到他家里去。我如约而往，他问我怎么会认识刘文兴的，昨天谈些什么。我如实对他讲。他说：‘我正要找个人带口信给他。你们是忘年交了，请你转告他，课堂上不能模仿小丑，不要认为我们这里少不了他。再这样胡闹，我可以学期中途将他解聘。’我因刘是老学长（比我大十余岁），不便答应，老校长有些怒意了，又说：‘还不止这些，他住在河滨大楼，每月要多少开支？请你转告他，应注意俭朴两字。孔子说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你们初交，谈得这样投机，应该做一个“直谅”之友，何况这是我的意见，你只是转告。’我在剧场里找到了刘文兴，他有些讪讪，强笑道：‘老夫子就是喜欢教训人，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后来听说他在课上再也不这样轻浮了。”

按：刘文兴，江苏宝应人，他是清代学者、《论语正义》的著者刘宝楠的族人，他的父亲刘启瑞（字翰臣）也是唐门弟子。据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一文记，刘兴文是无锡国专的早期学生，“幼而慧，有些恃才而傲”，有一次听一位教师讲课，“他提出不同的看法，相持不下。唐先生找他谈话，说他态度不好。因为是对‘小门生’，态度也不像对别的学生那样注意，说了一句你不向教师认错，只有叫你走。刘文兴说：‘走就走吧！’其实唐校长是很欣赏刘文兴的才学的，只是想纠正他的骄气。”刘兴文后来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抗战胜利后由北方到上海，在国专沪校兼课。

九月十九日，无锡国专创办人之一施肇曾病逝，后唐文治为作《钱塘施公省之墓志铭》。

唐文治《钱塘施公省之墓志铭》（见《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六）：“公讳肇曾，字省之，浙江钱塘人……辛酉、壬戌之交，公在锡山创设国学专修馆，延余主讲，培植髦士，并商讨余藏《十三经》评点善本，寿诸梨枣，饷遗来学；名山事业，永足千秋……公以清同治某年某月某日生，民国三十五年某月某日卒……”

按：上引文中说施肇曾“民国三十五年某月某日卒”，但施嘉远、周毅平《施肇曾事略》一文中说“施肇曾在上海觉国家内安度晚年，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病逝，终年八十一岁”，此从后者。

九月二十七日，唐文治呈文重庆教育部，称国专沪校将“召集旧时生徒，并招新生若干名，恢复旧时校名”，呈请教育部核准，先行备案。后教育部复函云：“现抗战胜利，该校应即筹画复员事宜，所请在沪招生复校一节，俟该校复员后再行报核。”

唐文治《为呈报在沪复校上课请赐备案由》（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呈为呈报复校上课事：窃属校于民国十七年成立，曾经呈奉钧部准予立案。自民国二十七年，日人犯境以后，文治将属校由长沙辗转迁至桂林。当时有一部分教职员及学生随往。越一年，文治因水土不服患病，请假回沪。适有一部分学生勤学自修，流落南中，未能回籍，纷纷请求在沪开课。文治为维持该生等学业起见，爰设立补习部，养晦读书，与外界隔绝。曾呈奉钧部高等教育局，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九四零五号函核准在案。兹幸值大难戡平，普天同庆，属校召集旧时生徒，并招新生若干名，恢复旧时校名，先在上海爱文义路九七〇号开学上课，

俟日后斟酌情形，或迁回无锡旧址，再行呈报外，谨先备文呈报复校情形，敬祈钧部鉴核，先行备案，实为德便。再，前在桂林设立之国学专修学校，文治回沪时，饬教员北流冯振主持办理，迩来音问梗阻，合并呈明……”

按：上文中说“窃属校于民国十七年成立”，此应是从无锡国专于一九二八被批准立案时算起。

又按：教育部复函中云：“查该校现已迁至广西北流，由冯代校长振主持办理。本部历年并予补助经费有案。现抗战胜利，该校应即筹画复员事宜，所请在沪招生复校一节，俟该校复员后再行报核。”

吴淞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一九四五年八月，国专沪校向重庆教育部发函，告知仍恢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之称……这又是唐文治‘先斩后奏’的老方法，不管教育部是否同意，国专已经以此招生开学了。但是从档案看来，教育部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上，颇费了一番周折。档案中起草的电文就有两份，而且涂改得都很厉害……从上面两份颇费思量的代电看来，教育部对于唐文治‘先斩后奏’的行为着实没有办法。电文涂改多次，可以反映出教育部的真实主张：一是要求维持原先备案，仍认定桂校为其本部，而不赞成国专沪校直接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名义招生；一是希望沪校国专能切实进行复员无锡的工作，积极做返回无锡的准备。按照以后教育部的态度看，其更希望沪校与桂校都能尽快复员无锡最好。”

本年冬，唐文治嘱王遽常赴无锡，筹备国专在无锡复校事宜。在无锡组织了复校委员会，聘请无锡校友许岱云（字畏云，生卒年不详）、李尧春（名耀春，生卒年不详）、陈其昌（字寄物，生卒年不详）等为复校委员会委员。王遽常和在无

锡的校友一起，向停办了的正风中学收回无锡国专的原有校舍，将多年没有大修的房屋予以修葺，并招收本部及附中新生三百余人，聘定教职人员二十余人。

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乙酉八十一岁》：“冬，嘱王生瑗仲赴锡，筹备复校事宜，并筹设附属中学。共取本部及附中新生三百余人，聘定教职人员二十余人。”

陈其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史》：“……同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因桂林校舍已全部焚毁，于是决定翌年初春复校回锡，并先在无锡组织复校委员会，聘请在锡校友许岱云、李尧春、陈寄畅等为复校委员会委员，积极筹备复校工作。”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国专在学前街复校时，无锡的校友们是作出贡献的。他们向停办了的正风中学收回原有校舍，将多年没有大修的房屋予以修葺，招了一班本科一年级生，两班五年制专修科（初中毕业入学）学生，附属高中一、二年级学生各两班。等到一九四九年阴历元旦以后，我随王蕴常主任到无锡，复校工作已安排就绪，就等着开学了。其中许岱云校友尤为尽力。”

大约是在本次招收的学生中，有吴文治（一九二五～）。但他未及在无锡国专毕业，便中途转入苏州东吴大学国文系学习。

杜庆华《愿为家乡教育事业出力献智——访吴文治副教授》：“吴副教授（按：指吴文治）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曾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在惠泉山下度过了难忘的两年。谈到这些，吴副教授若有所思地说：‘我家祖传医道，父亲一直要我学医继业。而当我进入无锡国专读书后，弃医从文

的志向便不可逆转了。国学大师唐文治老先生的殷切教诲，国专严谨邃密学风的熏陶，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可以说，我后来走上文学之路是大大得益于无锡国专的两年学习的。”

朱崇才、肖今《吴文治教授的文学活动与学术成就》：“吴文治先生，笔名石牧、天平，江苏江阴人。一九二五年九月生。父亲是著名中医，有较好的旧文学修养，吴先生从小受到熏陶，后又师事前清秀才王彦门，专学古代文学。一九四六年初，他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本科；翌年，转入苏州东吴大学国文系。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学科的学习中，得到了朱东润、冯振心、凌景埏等名师的指点，为日后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年末，唐文治为《王蘧常文集》作序，在序中表彰了王蘧常抗战时期的“志节激昂”，并在文中揭橥了“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士大夫所负之责任，激励气节而已矣”的旨意。

唐文治《嘉兴王君瑗仲文集序》（见《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四）：“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士大夫所负之责任，激励气节而已矣。气节者，气骨也。骨强则能撑撑负重，而坚立于天地之间；否则骨抱体柔，遇事如烟之销，如火之灭，轻浮飘荡，社会随之浮沉，国家亦因以杌隉。《论语》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天地间亦何贵乎有此等人哉！何以矫之？惟有气节。嘉兴王君瑗仲，于庚申年承先师沈子培先生之教，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察其貌，温温然；聆其言，蔼蔼然；挹其度，渊渊然；知其为君子人也。丁丑之岁，日人入寇，东南一隅，不幸沦陷，王君志节激昂，不平之鸣，时露于楮墨间。顾其时日寇检查密，王君则以诗文稿藏于地板之下。乙酉岁，日寇降。河山复故，宇宙重光，而君

诗文乃显于世。本年秋季冬，殷勤来请序于余，余喜甚。爰为之序曰：天地正大之气，虽当昏乱之时，不容稍有泯灭。昔孟子论养浩然之气曰：‘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又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宋文山先生宗之，作《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后之人读其歌，觉其浩气充满于乾坤，穷天地，亘万世，成仁取义者，皆奉为矜式。今王君始虽险遭不测，而即值升平，俯仰身世，亦云幸矣。然其际遇虽较古人为幸，而其责任则非较古人为轻。宋张横渠先生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立心立命，惟主持气节者足以任之。吾知王君自兹以往，必能以气节倡率天下，不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温蠖。俾顽者廉，懦者立，举近世贪鄙庸劣、卑污龌龊之习，一扫而空之。如拨云雾，如涤尘埃。此实国家之庆，岂第吾门之光哉！昔姚姬传先生《答鲁絮非书》，谓‘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盖文行合一，先儒所重。王君之行，清矫拔俗，慄然如不可犯，读其文者，当知其为君子人也。余常勉人为君子，世皆笑以为迂，而余不顾。盖君子教育始于周文，而大昌于孔孟。读《论》、《孟》二经，即可知其宗旨所在。今时惟有奉君子为法，提倡君子教育，吾国其有彘乎！世有同志者，读王君之文，自当钦其为人，而勉入于君子之林。《鹿鸣》之诗曰：‘视民不怵，君子是则是效。’《卷阿》之诗曰：‘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吾知王君必益勉之，而为当世君子之楷模也。”

按：《王蘧常文集》后来未能刊行。王运天编著的《王蘧常教授学谱·王蘧常教授主要著作目录》在“成书未付印”一类中记有“王蘧常文集十二卷，尽毁于十年浩劫中。”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国专无锡本部

本年春，已复校的无锡国专开学上课。国专桂校的蒋庭荣先期抵达无锡，代理训育主任，暂时主持工作。同时，担任国专沪校教务长的王邃常及无锡国专第四届毕业生许岱云也经常往来于沪锡之间，处理国专无锡本部的一些事务。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老校友蒋庭荣先生是广西教师中最早到无锡的，暂代训育主任。在开学典礼上，向例有恭读孙总理遗嘱这一项。王、蒋两位主任都不太熟练，耽心在会上背不下去，就由事务员张可久校友代读。国专的教师、校友的书生气，只此一事也就可想而知了。王邃常主任回上海后，蒋庭荣先生和附属高中教导副主任薛思明校友肩负重任，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办好学校。”

无锡国专南京校友会《怀念冯振心先生》（见《冯振纪念文集》）：“抗战胜利了。唐校长在沪授权王瑗仲教授就近规划在无锡复校。冯先生也准备率桂校师生复员。一九四六年春，无锡已招生上课，桂校广大师生因交通阻滞尚在途中。桂校的蒋庭荣先生先期抵无锡，暂时主持工作。”

许岱云《唐文治先生轶事几则》：“抗战胜利后，国专从

广西回锡复校，唐先生曾要我协助他处理无锡国专校务。我再三辞让，不敢接受，卒以师命难却，虽不担任名义，而实从旁全力襄助，并经常赴沪向唐先生请示、汇报工作。”

冯其庸《读王遽常先生的书法随想》：“我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的春天考入无锡国专的。那时，瑗仲师任教务长，在上海，学校也刚复校，冯振心先生等在桂林的部分也还未迁回。因此，瑗师就经常要往来于沪锡之间。”

开学后不久，学生们就两件事向学校提意见：一件是对个别教师的讲课不满意，要求更换教师；二是对学生的伙食质量有意见。教务长王遽常乃由上海至无锡处理此事，使事情得到了解决。

冯其庸《读王遽常先生的书法随想》：“就是在这个春天，瑗师到无锡来处理学校事务，我是学生的代表，大家推举我面见瑗师，陈述学生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我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见瑗师的，哪知见面陈说以后，瑗师非但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相反却很体谅学生的心情，觉得学生提出改善提高教学的要求是合理的，并且答应作出安排。这就是四十一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瑗师的情景。”

冯其庸《王遽常先生书信录》：“我是一九四六年春考入无锡国专的，当时抗战时迁到广西去的无锡国专本部还没有来得及迁回来，开学时的学生都是当年新招的。那时上海还有一个无锡国专的分部，唐文治校长委派王遽常老师任教务长，同时也兼管新复课的无锡国专。当时在无锡的部分，记得临时负责人可能是蒋石渠先生。遇到重要的事情，就请教务长王遽常先生来处理。

一九四六年开学的第一年，学校就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

学生们对个别教师的讲课不满意，要求更换教师；二是对学生的伙食质量有意见，大家交的伙食费很高而伙食太差。为这两件事情，闹得很厉害，贴出了讽刺性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后来说的‘大字报’。同时还记得对某一位老师的课大家都不去听，那时还不是有组织的罢课，只是自己不愿意去听课，但也有少数非常循规蹈矩的学生还是去听课的。

学校有了这两件事，终日惶惶不安，校方就请王蕴常先生到无锡来处理，王蕴常先生就到无锡来了。王蕴常先生声望很高，大家听到他来了，都十分高兴，立即推代表去见王老师，陈述学生的要求。哪知我被大家推为了学生代表，我无法推辞，只好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王老师。王老师在办公室里倾听了我陈述的上述二条意见，我对王老师是否能接受我们的要求，实在没有把握。不料，王老师听完我的意见后，立即就作出决定：一是同意换老师。但王老师反复说明，每一个年轻教师初上讲台，总会有不熟练不适应的情况，不能因此而对这位老师存偏见，等他锻炼一段时间再上课。二是伙食要改善，伙食的经费要清楚。学生对王老师的这两条决定无不欢呼雀跃，而且立竿见影，两件事都立刻解决了。”

国专在无锡复校后，经向培良推荐，周贻白（原名夷白，一九〇〇～一九七七）到该校任教，讲授修辞学、目录学等课程。在无锡国专任教期间，周贻白撰写发表了数十篇明清杂剧、传奇的剧本评论等方面的论文，并于一九四七年完成了六七十万字的《中国戏剧史》的全稿。

董旸《戏剧家周贻白在动荡的年代》：“（一九四五年）九月，周贻白到上海与世界书局算清出版剧本的版税，两个月后仍回到无锡。这时正值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由广西迁回无锡，旧相识向培良在那里讲课，便介绍周贻白到该校讲修辞学和目录

学。在这个时期，周贻白曾用笔名云谷写了一些关于考证的文章，如《南京方言考》和《青帮起源考》，并刊登在当时的《东南日报》副刊‘文史’上面。除此之外，并写了一些关于明清杂剧、传奇的剧本评论，共计三十余篇，解放后将其收为《曲海燃藜》，此外还撰写了《蒲松龄的聊斋俚曲》、《聊斋志异来源及其影响》、《武王伐纣平话》、《红拂记与红拂三传》、《顺治出家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等论文。一九四六年，向培良兼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讲编剧法，也将周贻白介绍到该院戏剧系讲中国戏剧史。周贻白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了一年多的书。一九四七年，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若干年的冷板凳的攻关，经三易其稿，周贻白终于完成了六七十万字的《中国戏剧史》全稿。同行学者赵景深读过以后兴奋地写文章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周贻白也感慨万分，他在自序中写道：‘寒斋书本不多，旁征博采，不免借助他山。一甌往来，无间雨雪，历经虽艰，不以为苦。中经敌伪搜查，几被抄没……’他想到了这么多年无怨无悔为家人操劳的妻子杨钰，于是，他郑重地将‘献给我的爱妻杨钰 贻白’的字样写在他拿到的第一本书上，恭恭敬敬地交与妻子。一九四八年一月，卜万仓从香港归来，约周贻白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任编导。永华公司让周贻白有了一种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奋起再战的渴望，于是，他接受了聘请，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和欧阳予倩、顾仲彝，由沪乘轮一同入港。”

冯其庸《怀念我的老师周贻白先生》：“我最初知道周贻白先生的名字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大约是一九四四年末或一九四五年春。那时我在无锡当小学教师，平时喜欢跑旧书店看

书，有一次买到的几本线装书上都有‘贻白藏书’的图章。经了解，这时周先生生活很困难，经常卖书度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我考入无锡国专，不久，周先生来任教，我才第一次见到周先生，也就成了他的学生。他当时开一门目录学课，我选修了这门课，但他讲的目录学，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我一直没有忘记的是他待人坦率诚恳的态度以及他当时正在认真地为中华书局写《中国戏剧史》稿子的情况。那时我与另外几位同学经常到他家去玩。他常常放下写作，与我们谈做学问的事。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当时的演剧九队到无锡来，住在秦淮海祠堂里，田汉和洪深也来了。演剧队在无锡演出了《丽人行》等剧，周先生曾同我们去看田汉和洪深。这以后不久，我因为学生运动的事，离开了无锡国专，到了上海，与周先生分别了。而周先生也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与欧阳予倩一起到香港去了。”

沈燮元《〈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编后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不久，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由广西迁回。经人推荐，（周贻白先生）入校讲授修辞学、目录学等课程。课余并撰写了有关中国戏曲、小说、历史、语言等方面的考据文字……我与先生相识在一九四五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复校之时。先生住的地方和我家相距很近，只隔了一条河，来去非常方便。那时学校里并不是天天有课，我只要有空，时常去先生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当时正读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曲录》，同时又找到了姚燮《今乐考证》和黄文暘《曲海总目提要》，真可谓左右逢源，遇到有看不懂或者自己觉得有些模糊的地方，就向先生质疑问难，先生总是不厌其详，谆谆教导，使我受益匪浅，直到今天，还深深怀念先生对我的教诲。”

二月，国专桂校师生离开广西北流山围，开始复员回无锡。至此，长达八年的国专桂校的历史遂告结束。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六年）二月，国专学生开始复员。”

冯振《电呈复员无锡原址上课由》（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八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重庆教育部朱部长钧鉴：本校定寒假中由广西北流复员至江苏无锡原址，于丑月佳日全部启程就道。以后所有训示请径寄无锡学前街原址……”

在这八年中，国专桂校先后聘请过许多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兼课或讲学，除本书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各年事中已叙及者外，尚有贺子和（名润，字子和，以字行，一八八〇~一九四五）、冯拔得（生卒年不详）、欧阳革辛（生卒年不详）、何觉（生卒年不详）、黄照熹（生卒年不详）、苏芑雨（名维霖，字芑雨，以字行，一九〇二~一九八六）、钟震吾（生卒年不详）、曾志弘（生卒年不详）、周名辉（生卒年不详）、梁亘（生卒年不详）、黄庭柱（生卒年不详）、王桐荪、黄际遇（字任初，一八八五~一九四五）等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补助费教职员生活津贴清册》、《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

按：八年中曾应邀在国专桂校任教兼课或讲学的专家、学者，其任教、兼课或讲学年月可以考知者，如冯振、钱仲联、蒋庭曜、郑师许、陈千钧、封鹤君、吕集义、梁漱溟、吴世昌、向培良、李一真、巨赞法师、张世禄、阎宗临、饶宗颐、万仲文、吕逸卿、黄景柏、卜绍周、徐焕、陈竺同、蒋庭荣、梁佩云、俞瑞微、冯静居、吕竹园、陈一百、龙纯如、冯介、

冯赞廷、卢冀野、谭之良等，已分别见于本书各年事中；任教、兼课或讲学年月尚未能考知者，则姑系于本年。

有论者称，无锡国专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这一段经历，“在广西开一代学风”，“影响了广西的人文”。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迁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国专是一所以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它的西迁到广西，如上所述，处处得到广西上层人物和地方人士的欢迎，它也以卓越的办学成绩，影响了广西的人文……陈千钧教授在生前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这样说：‘国专在广西开一代学风。’我也同意他的观点。不妨举几方面的事实来证明：首先，从国专在培养人才方面来说，仅根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国专迁桂后历年招收的学生人数约五百到五百五十名，毕业人数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名（包括复员无锡毕业和借读生），以一九四四年春，在桂林穿山毕业的一届五年制和文书班的三十人为最多。从一九三八年迁到桂林至一九四三年的六年间，共六届毕业生才二十五人，一九四四年后，复员无锡和借读他校毕业生共八十二人，总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占肄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左右。辍学人数以桂林沦陷和复员返锡时最多。尽管如此，凡是在国专肄业过的学生，都不同程度受到学校的熏陶。其次，从学生的来源看，广西有四十三个县、市有入学的人。根据二百一十一名学生籍贯的调查，北流人数最多，有三十八名，占被调查数的百分之十八，容县、平南次之，各十八名，占百分之八点五，再次博白、宾阳各十三名，占百分之六点一，分布较为集中。这和国专在北流山围、萝村开课三年有关。但还应该注意的是：在抗战前的一九二五年，国专第二届毕业生就有北流萝村的陈拔章、陈学裘，第三届有陈千钧、陈起绍，第四届有容

县的周昶旦、崔履辰〔宸〕，二十年代国专招生人数少，入学要求高，能跋涉千山万水来到无锡读书，确实为北流容县地区开风气之先。以后各届也不断有桂南一带的学生。这无疑和陈柱尊、冯振心两先生先后在国专任教有关。再从国专毕业生就业情况看，绝大部分从事教育，少数担任研究和党政工作。国专求实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学生尊师重道，教师爱生如子弟，在感情上的融洽，以及在抗战流徙中所表现的爱国家爱民族、敌忾同仇的浩然正气，无疑也深深感染着学生，薪火相传，达到继承和传播文化遗产的目的。毛主席曾指出长征是播种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国专迁桂当然不能与长征相比拟，但是流亡在广西的国专，它已播下了弘扬传统文化的种子。当年遍及全省大部分县市的教师队伍中，也绝不同程颐送杨时南归所说的“吾道南矣”的势孤形单状况。所以国专迁桂九年，应该说是在抗日文化战线上斗争的九年，是国专精神在广西扩大传播的九年。说它影响一代学风，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国专桂校的师生们于本年二月离开山围后，由容县乘汽车至梧州，再搭拖渡赴广州。因海轮缺少，在广州停留两个多月，借中山大学遭轰炸后的残破旧宿舍住宿和上课。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由容县乘汽车至梧州，再搭拖渡赴广州，因海轮缺少，在广州停留两月余。借中山大学文明路为临时校舍上课。”

刘开基《五载寒窗四搬迁》（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九四六年春，学校迁回无锡，至广州，闻南海搜雷未净，无船来往，冯代校长又借中大师院教室上课三个多月。时值华南特大旱灾，旧历四月底尚无雨插早稻，米珠薪桂，带去一学期的费用，三个月已用罄。”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四六

年春节过后，师生由各路集中到梧州，再转广州。因交通问题不能解决，教职工和学生滞留广州达三个月之久，借中山大学遭轰炸后的残破旧宿舍住宿和上课。”

五六月间，国专桂校师生共一百多人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搭乘招商局轮船，分两批取海路到达上海，晋谒校长唐文治，代理校长冯振并将原校校铃奉缴唐文治接收。六月初，国专桂校师生全部返归无锡，并开始上课。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五、六两月，始分批赴沪，复员无锡。”

谢庭芳、萧德浩、陈国定、唐树人《桂林穿山无锡国专散记》（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九四六年夏，冯振代校长率领师生一百多人从广州乘轮船去上海转赴无锡原校复课。”

冯振《胜利后重来沪锡遇诸亲旧感赋并呈唐蔚老、夏剑老两师》（见《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九年桑海饱曾更，旧地重来似隔生。涕泪亲朋悲喜集，艰危道义古今明。最难二老加强健，共祝余年享太平。从此执经勤问道，故山田且不归耕。”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其后经教育部指定搭招商局轮船分两批到沪。六月全部复员返锡。”

《无锡国专校史》（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毕业纪念刊》）：“……于六月初始由海道全部抵锡，冯振心先生即将代理职务交还唐校长。唐校长坚贞不拔，矍铄有加，阖校员生靡不欢忭。”

刘开基《五载寒窗四搬迁》（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五月间才能从香港搭船启程北上。正当端午节那天进入

上海虹口，看龙舟竞渡，不胜欣喜！曾吟《船泊上海喜赋》一首云：‘蒲节泊船虹口湾，龙舟竞艳色斑斓。八年抗战凯旋日，洋寇尽驱租界还。’在上海逗留一星期，游览我国第一大城市，以饱眼福，随即回无锡原校址复课。”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丙戌八十二岁》：“夏，嘱王生瑗仲赴锡视察锡校，并欢迎桂校复员，三处生徒合计达五百余人。”

无锡国专南京校友会《怀念冯振心先生》（见《冯振纪念文集》）：“……六月初，桂校师生先后到沪，晋谒唐校长。冯先生将校印呈缴唐校长，率学生赴无锡开课。在无锡的师生热烈欢迎远道回归的同行。遵照校长的指示，无锡的教职工对桂校师生安排得很恰当，把伙食送到桂校教师的宿舍。数天后，有家眷的教师自办伙食，有的仍在宿舍进膳。冯先生的妻儿留在广西，他坚持和教职员同桌进食，而且不准添菜。他治学很勤，只有在晚饭后较短的时间内与教师们在宿舍聊天，或到别人的宿舍访问，年轻教师向他请教，他总是予以解答。学生的夜自修开始了，他也开始阅读、著述了。”

其时，原在国专桂校任教的俞瑞徵、向培良等人也跟着迁回无锡，继续在该校任教。

黄汉文《〈无锡国专杂忆〉补正》：“……当时，梁漱溟（兼课）、广西名流俞端〔瑞〕徵、‘狂飙’社作家向培良等诸先生在国专任教多年。抗战胜利后，国专迁回无锡复校，俞、向两先生继续在无锡任教。（作者原注：俞、向两位到无锡时，笔者正在国专工作，同事二月，向培良还带着两个儿子，据校友回忆：向培良当时还兼国民党的万岁剧团职务，在国专教文学史等课程）。”

冯其庸《怀念我的老师冯振心先生》（见冯振著《自然室



诗稿与诗词杂话》附录，观《无锡国专在广西》：“无锡国专于一九四六年春由广西迁回无锡招生，我就是这年初春考入本校的。大约是在这年的初夏，冯先生同俞钟彦先生等一起从广西来到无锡……冯先生开的第三门课，就是《诗选》。当时俞钟彦先生也开《诗选》课……俞钟彦讲《诗选》，是重在讲解法意，阐发诗的内容和艺术成就，往往一堂课只讲了几首诗（绝句）。”

赵景深《记向培良》：“他（按：指向培良）谈起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教了几年书，跟着学校到处迁移，从桂林搬到各处去逃难。有一次曾经逃到瑶民的窑洞里。他们除了瑶话以外，也能够说桂林官话，所以语言毫不隔阂，跳月的风俗也没有了。我希望他把各地的风土人情记录下来、一定很有兴趣，能够增广我们的见闻。国专搬回无锡时，他常与周贻白晤面。国专与周寓相距甚近，无锡又没有多少朋友，所以他们俩的来往很密，贻白也常向他谈起我。”

忠国《剧运功臣向培良在国专》（见《江苏民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胜利后，（向培良）应本邑国学专修学校之请，来锡执教，任‘文学史’一课。向培良之演说，最令人动听，其语气之诚恳和清晰，冠于全校。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着制服，照常认真的工作写剧稿，然而已不复当年之豪迈矣！”

六月二十四日，冯振以前代理校长的名义呈文教育部，谓“今奉令复员，所有迁桂本校员生，现经抵达无锡原校。校铃一颗，并经奉缴唐校长接收”。七月五日，唐文治也有内容相似的呈文致达教育部。

冯振《呈报本校复员员生业经抵达无锡，并将校铃奉缴唐校长接收由》（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见《私立无锡

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为呈报事,案查:属校于民国二十七年暑假,唐校长因病请假,离桂回沪,委托振以教务主任代理校长职务,呈报钧部在案,八年以来,兢兢惟恐陨越。去岁抗战胜利,今奉令复员,所有迁桂本校员生,现经抵达无锡原校。校铃一颗,并经奉缴唐校长接收……”

唐文治《呈报本校复员员生业经抵达无锡,并将校铃缴还由》(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五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为呈报事,案查:属校自民国廿七年暑假,属校长因病请假,离桂回沪,委托教务主任冯振代理校长职务,呈报钧部在案。去年抗战胜利,今春奉令复员,所有迁桂本校员生,因航行梗阻,淹滞广州,达三月之久。现在该员生等业经全部抵达无锡原校,校铃一颗已由前冯代校长交还……”

六月二十九日,《江苏民报》第三版刊载钱基博文章《唐文治先生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之宗旨》,对唐文治、冯振等人在抗战八年中率无锡国专师生迁徙流离、苦难备尝而坚韧卓绝、弦诵不废的精神作了高度评价,称“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

钱基博《唐文治先生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之宗旨》(见《江苏民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天相中国,抗战胜利,然多难古有兴邦,殷忧今未启圣,放僻邪侈,人将相食,不惟人心日坏,而抚寸衷亦茫无所措!因思明之亡也,顾亭林先生太息而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而在今日,博则以为民族不能自卫,降志辱身,而失

其抵抗以受异族之统治者，谓之亡国；人心不能自主，反道败德，而无所操持以成民族之堕落者，谓之亡民族。有民族之训育有素，而国虽暂亡，必能藉其民族以维系不亡者，吾之敌人日本及德国是也。有民族之风纪尽荡，而国幸不亡，无不随其民族以沦胥俱尽者，吾中国是也。顾亭林言：‘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而在今日，则知保民族，然后能保其国。唐先生则以保国之大任，国之元首，责无旁贷；而保天下、保民族，则奋以自任，而欲以转任之诸生，教泽所沛，引一世而偕之大道。此国学专门学校之所以创设也。然则诸生谭何容易以无忝为国学专门学校之一学生！

唐先生之学，以孔孟为教，而以‘仁义’二字提撕人心。博追随唐先生以主任校务者亦且五年，而谓诸生负笈以来，必先明何谓‘国学’。‘学’之为言觉也；夫‘国学’所以牖启国性之自觉；而‘学生’必以表现自觉之生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争民施夺，其何能国！生乎今之世，由今之道，必先自觉人生之异于物竞，而后能居仁由义以相维于不敝！‘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宜也。由消极而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而见世之所谓民族英雄，则行尽天下不义，杀尽天下不辜，而得擅政当国，则为之；此革命之所以常为中国病，而不应天顺人也！以积极言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由己’之言责无旁贷，而不必如注家之作‘犹’字解；几见天下无不死溺，而禹获免于鱼鳖；天下无不死于饥，而稷独饜其口腹者！顾目论者皮傅欧化，而以争民施夺为天演之自然，其大弊在以人生为物竞！英国哲学家达尔文氏昌言天演，征见物竞，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顾致瞽于人生之不可蔑弃道

德，其持论以谓：‘道德之原，实起于亲子之有爱；扩而充之，则为同族同类之兼相爱，斯称为动物之群性，而于动物之自利性，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双翼，并偕有生以俱来。天演物竞，自然淘汰，此群性之于人类，乃日继长增高以有緝熙于光明者，此何以故，盖坏国丧家，必由营私；专欲难成，多助得顺，故群性之发展，亦为适者资格之一。就一国家一社会之个人而言，忠信笃敬，仁人良士之子孙，角智争雄，较之贪夫败类，诈伪桀黠者之子孙，孰为胜利，虽未可必；而以团体竞争言，则多数忠敬笃信，仁人良士之个人所构成之国家之社会，必较诸多数贪夫败类，诈伪桀黠之个人所构成之国家之社会，为繁荣而坚固。何者？盖营私自利，坏国丧家，人道或几乎息，宁我之能独存？’此孟子之所以言‘仁人心也’！则人生之不动物竞，达尔文固明著之，而赫胥黎之论天演，则谓：‘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之用，固无时或休，而所以与万物并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得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择亦以此！何者？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云，而人种灭矣。’此孟子所以言‘仁义充塞，而率兽食人，人且相食’。而顾亭林以致惧于天下之亡也！观于今日之吾人，乘机射利；胜利未临，则居奇走私以发国难财；胜利既临，则巧取豪夺以发胜利财；幸灾乐祸，上下交征利，莫不利国家之多难以为一己之乐利，自营之甚而仁义充塞，争民施夺，几何其不为之相食！如人而不嫌于相食，充类至尽，吾国四万万人，自相吞噬以至于无子遗！亡国灭种，何必待敌国



外患之至！然吾国人之未受教于唐先生，而负笈以来国学专门学校者，宜其不知仁义充塞之必人将相食；倘国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不自觉居仁由义之为人生，则唐先生之志荒矣！

独念二十六年十月，唐先生以寇之涉吾地，青年心理纯洁之如一片白纸，未可以染；自忘其老，而以七十高龄，跋涉山川，护送诸生以移汉口，转湘入桂，遂以委重于冯振心先生而责以代理校长。冯振心先生受命危难，当仁不让，始则辟北流之家园以开讲舍；继则得广西省政府协助以移桂林；建校舍于穿山，罗名师于四方！然而私立之校，不同国立学院专校经费之资国币挹注；诸生无公费，学校无经费，冯先生困心衡虑以力拄艰危，诸生忍饥耐寒以相从危难！及三十三年十二月，寇深国危而桂林亦陷，穿山新建之校舍，付之一炬；冯先生则率诸生以入瑶山；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出怨言；此其坚贞蒙难，咸有一德，仁之至，义之尽，岂惟延唐先生之斯文一脉于西南，而实以续如缕不绝之国命！及穷寇纳命，河山重光，而冯先生率诸生以归命于唐先生；然而复员之经费未发，道涂之跋涉倍艰，在广州则候船三月，及上船则忍饥数日。然则险阻艰难之备尝，诸生倍甚于他校。然而吾不为诸生慰，而为诸生幸者，幸得与全国四万万人共其苦难也！倘全国四万万人无不水深火热，而我一人焉独席丰履厚以恣情享乐，则是我幸灾乐祸以负众生之债！苟全国四万万人无不池肉林；而我一人焉，独啼饥号寒以不得生活，则是众生般乐怠教以负债于我！孰为心安理得，可不待辨而自明，此中得失，博校之已熟！独念天未厌乱，人不悔祸，丧乱未平，而灾害并至，此后之祸患或且甚于今日；凡我共学，体念时艰，发心与四万万人共忧患，此仁之所以为人心也！设法与四万万人共忧患，此义之所以为人路也！操心虑危，弗震弗恚！犹忆

民国五年，英使朱尔典回国，而侯官严又陵先生往送行，与谈中国之无望，不觉老泪如绠！朱尔典慰之曰：‘君毋然！余观中国四千余年抵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天之待国殆犹人，眼前颠沛流离，即复甚苦；然放开眼光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旁观者清，而吾中国四千余年抵固根深之教化，舍仁义何求！苟非我国学专修学校之问学思辨以牖启国性之自觉，必不能以维持民族以不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之亡，国以何保！而必自来学诸生居仁由义以无负唐先生之教，而表现自觉之生活，然后有以树人纪，而吾中国四千余年根深抵固之教化，乃不终归于无效！张子不云乎，‘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此则唐先生之所以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也！百尔来学，共勉之矣！”

按：钱基博原曾任无锡国专教授、教务主任，抗战期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写此文时，他正在无锡休假，即将出任私立华中大学国文系教授。

本年下学期，因专修科学生增加，校舍不敷，经济窘迫，无锡国专附属高中停办。

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这学期我们和桂校的师生相处得很好，附中部分的教职员之间、师生之间却产生了不少矛盾。下学期因专修科部分学生数增加，有几处房屋又难修复，校舍不敷，附属高中就停办了。”

关云驥《国专访问记》（见《江苏民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十八日第四版）：“……去年复校的时候，曾设附属中学招收新生，而上学期突告解散，各同学皆感惶恐，对学校发生恶感。而据冯振先生表示：办学校是唐校长的职责。在失学问题严重的状况下，决不忍心使各学生陷于彷徨歧途，徘徊于学校门口。实因为学校狭窄，经济窘迫，不能顾全周到。假

若不能健全，徒使学生糜烂，负有教育的罪责，宁可解散以免误人子弟。这也可表示唐氏对教育的重视了。”

九月二十四日，无锡国专校友会代表张寿贤、唐兰、侯堃、王蘧常、蒋天枢、金仞千（名凤鸣，字仞千，以字行，生卒年不详）、蒋庭曜、王震、陈千钧、严济宽（字伯侨，生卒年不详）、张敦品（名联芬，生卒年不详）等十一人，联名呈文教育部，请求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为国立国学院，内设中国文学系、史学系、哲学系，附设专修各科，以“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树植学术特立之风声”。后教育部批示云“所请应毋庸议”。

张寿贤等《呈请准改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国立国学院以便发扬中国文化由》（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

“谨呈者：案查，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海内耆宿、前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先生所创办，迄今已二十六年，人才辈出，成绩卓著。抗战军兴，曾迁至广西，在桂林自建校舍，广招学生，对于开发西南文化，发扬国学精粹，苦心孤诣，厥功尤伟。我国历史悠久，先哲所讲修身致治之本，体国经野之道，不特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实亦世界人类命脉之所系。此固非一人之私言，乃为各国学者所公认。惜因提倡不力，研究乏人，遂使国丧其故步，以致道德沦胥，人心陷溺。有识之士，所为殷忧。本校自三十三年日寇入桂时，桂林校舍全部被毁。胜利之后，复员返锡，原有校舍，多所残破，但力加修葺，尚堪应用。惟是迭遭变乱，经费奇绌，改进有志，扩展无力。唐先生耆年硕德，矜式群伦，一生讲学，老而弥笃。其平日主张重道德，崇礼仪，维人心于不死；贯古今，通中外，跻

世界于大同，所以振绝学而救时弊者，用意至切。当兹国土重光、声威揆张之时，本会同入以为建国伊始，大本须昭，用敢不揣冒昧，敬恳准予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设国立国学院，内设中国文学系、史学系、哲学系，附设专修各科，本唐先生一贯之主张，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树植学术特立之风声，民族光荣、人类幸福，实利赖之。谨呈

教育部部长朱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会代表：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秘书 张寿贤

国立西南联大史学系主任 唐兰

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侯罅

国立交通大学教授 王蕴常

国立复旦大学教授 蒋天枢

中国国民党江苏党部执行委员 金仞千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总务主任 蒋庭曜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王震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陈千钧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专任委员 严济宽

委员长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 张敦品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按：教育部批示云“所请应毋庸议”。

本年中，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朱东润（原名朱世溱，一八九六～一九八八）应冯振之邀，兼任无锡国专课程。第二年，因受中央大学派系斗争牵连，朱东润遭解聘，遂于秋后赴无锡专任国专教职。朱东润在无锡国专任教期间，先后开设过《史记》、《史通》、《杜甫诗》、《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传叙文学》等课程。



朱东润《朱东润自传·朱东润年表》：“（一九四六年）于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又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课程。”“（一九四七年）秋，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又《朱东润自传·六年流转》：“……秀若考学校时，曾经投考无锡教育学院。那时冯振心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担任校务主任，我托他照料。虽然没有考取，但是振心的照料是异常周到的。事后他来了一封信，希望我去无锡兼课，又说这所学校是唐蔚芝老师办的，应当共同维持，不能让它中途停顿。道理是正确的，作为学生，我受老师知遇比振心更早，当然谈不到推却，但是不能兼课，必须征求伍叔饒的同意。伍叔饒很坦率地说：‘大学教授按原则是不能兼课的，但是现在工资是固定的，物价却在不断上涨，要不兼课也办不到。我自己是在外地兼课的，只要不在南京，我一切不过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接受了振心的提议，每两星期去无锡一次，虽然忙一些，问题不大，好在这时的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都已经不像教授了。每星期除教课以外，没有研究任务，一般人也不搞，所考虑的只是在物价飞涨中维持自己一家一种艰苦的存在。从南京到无锡，每天火车是准点的，票价也便宜，因为一般物价尽管不断飞腾，但是车、船、邮电要涨价必须由局到部，逐步申请，手续很不简单，因此显然远远落在一般物价之后。我从南京到无锡，一般都是坐二等车，——现在称为软席——主要是借坐车的三小时，作为备课之用。”

按：一九〇七年秋，朱东润得族人资助，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一九〇九年秋，朱东润参加南洋公学国文大会，经校长唐文治亲自评定，获小学组第一名，得奖金四元，购《经史百家杂钞》一部。一九一〇年夏，朱东润小学毕业，因家贫及族人的资助中断，准备辍学，后得唐文治资助，升入南

洋公学中学部，所以上文说“作为学生，我受老师知遇比振心更早”。

又按：上引《朱东润自传》后文又叙及，朱东润到无锡国专兼课后不久，其次子朱君遂也考进了无锡国专，“我本来是约定每两周去无锡一次的，因为君遂去了，我不放心，改为每周一次。这样就成为每周三天在宁，三天在锡。准备功课的时间多半在车厢里”。一九四七年，因受中央大学派系斗争牵连，朱东润遭解聘，遂于秋后赴无锡专任国专教职。一九四九年秋，朱东润脱离无锡国专，到同样也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陆振岳《缅怀朱东润师》（见《朱东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东润先生，是我生平最为崇敬的师长之一。先生最早的名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传记文学更是一代大师。先生又精擅书法，篆隶行草，卓然大家。我在没有见到先生之前，已略知他的名声。一九四六年九月考入无锡国专，先后听过先生讲授《史记》、《史通》、《杜甫诗》、《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传叙文学》（即习称的传记文学）等课程，系统地领受过他对于研究文学和史学的教诲，自感颇受启迪，并由此摸索到一点门径……”

陈征《忆润师》（见《朱东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朱东润教授是我印象深刻毕生难忘的名师。我作为他的学生，不仅听了他讲的许多课程，学习了许多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是乡谊（作者原注：润师原籍泰兴，我原籍泰县，系邻县），特别是我与其长子朱君遂，又是同班同学，经常得以面聆雅教，受到更多的教育。我之所以能在学术海洋里取得一点成绩，在教育事业上做了一些工作，是与润师的循循教诲分不开的。润师讲课，从不念讲稿，只写个简要提纲，抓住重



点，深入分析。如考证某一问题时，往往运用丰富而准确的材料，进行层层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在阐述某一理论精义时，则提出鲜明的观点，进行有根有据的解释；用语明确简练，深入浅出，谈笑风生。听众往往被所讲内容吸引，感到时间太短，好像才上课就马上下课似的。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许多别班的同学还跨班来听。因而每逢润师讲课，教室里都挤得满满的。我听过润师的史记、汉书、诗经、杜诗、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诗选等课程，深刻体会的一点是：讲课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往往课前预习，体会不深，听他讲后再看书，就大不一样了。润师讲课的另一特色是：每节课讲的内容，都是他自己研究的成果。他在写了《史记考索》的基础上讲史记，在写了《读诗四论》的基础上讲诗经，在开创性地著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基础上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深入钻研国内外传记文学理论、写了《八代传记文学论集》，并创作了著名的《张居正大传》的基础上讲传记文学课程，所以每门课有新意、有特色。他是把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加上他渊博的知识，风趣而生动的语言，深得同学们的爱戴和敬仰。”

至本年底，国专无锡本部共有十八个班级，学生二百余人。五年制（初中毕业资格投考）有五级，三年制（高中毕业资格投考）有三级；文书科一级，该科因春、秋时都招收新生，故每级有春、秋二班。

关云骧《国专访问记》（见《江苏民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十八日第四版）：“……该校校舍因过去并未遭到残酷的摧毁，一切复员工作，也并未遭到任何的挫折。当一般（班）原来的老师们踏入那阔别八年的校园，也发生了今昔之感，喟然暗叹。学生们仅感到新奇，在内地简陋的设备下生活

了如许时候，另走入这仍旧完整的园地，倒反感到满足。现在国专共有学生二百余人，分十八班，虽然学科不分。五年制（初中毕业资格投考）有五级，三年制（高中毕业资格投考）有三级。教育部并委设立文书科一级，因春秋时都招收新生，故每级有春秋二班。因为该校由广西复员而返，故广西籍学生颇占相当数目。本省学生悉系去年以及今年所招之新生。同学虽然是陌生而且乡地不同，而感情却相当融洽。对于学术的研究，亦很认真，只要看壁报的繁多，就可明了了。”

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四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顾荫北、钱育晖、郭晋才、黄汉文、张长风、秦和鸣、何以聪、徐皎、黄屹浩、蒋希文等十人，皆为三年制国学科（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四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届毕业生中的秦和鸣，是国专沪校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一面读书，一面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毕业后，曾由唐文治介绍到上海圣芳济中学任教。秦和鸣在国专沪校毕业后，又要刘元勋等五位共产党员考入国专沪校，继续开展党的活动。

刘元勋《回忆唐文治先生》（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秦和鸣同志一九四三年去无锡国专上海分校读书，他肩负着党的地下活动的重要任务。他在读国专的三年时间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党在国专的力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毕业后，为使党在国专的工作不致中断并不断得到加强，便决定要我和秦兴华、秦谷明、陈瑾等五位共产党员考入该校读书，开展党的工作，并决定成立党支部，积极领导党在



国专的地下活动。我过去曾读过四书五经，对国学有一定的兴趣，就愉快的和其他四个同志一同进入无锡国专上海分校，担负起革命和读书的双重任务……我们在无锡国专上海分校肩负学习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双重任务。当时由于学校不收寄宿生，我们的经济条件又不好，就借昌平路二二二号一个低矮阴暗的二层阁楼作为生活和商讨工作的场所。虽然当时条件如此艰苦，情况如此复杂，我们党支部在上级党秦和鸣同志领导下，还是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我们以较多力量在同学中组织各种研究会，利用进行活动的有利时机，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建设工作。”

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无锡国专上海分校校友秦和鸣同志，一面就读于国专，一面又在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大夏毕业后留校。秦和鸣同志很早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大夏时即从事地下工作。客观形势逼人，在大夏不能立足，嘱汝挺转请先生介绍至中学任教，先生一诺无辞。随命汝挺代笔，致函上海圣劳济中学，介绍秦和鸣同志前往任教。过一时期，秦和鸣同志在圣劳济又引人注目，要求先生介绍门馆。先生不避风险，正在考虑推荐时，秦和鸣同志来国专和汝挺话别，言将赴常州，嘱汝挺代禀先生。先生当时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除掩护地下工作者外，对进步学生也尽力掩护。”

按：刘元勋又有组诗《忆在无锡国专沪校开展地下斗争片段》（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二十一期），共十首，每首诗都有详注，记叙共产党国专沪校支部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已毕业离校的“老板”秦和鸣的领导下，开展地下活动的经过。

本届毕业生中的黄汉文，一九三九年秋即考入国专沪校，一九四一年冬，因日军侵入上海旧租界而辍学返乡，抗战胜利

后复学。

按：黄汉文在《记唐文治先生》一文中记：“……教育部对同等学历的限制放宽了（全国范围内如此），我当时是职业学校高级二年级学生，如果不是学校早已开学，学费已经缴好，沪校开课时，我早已报考了。但是我还是每周一次赶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海防路以北去听唐老先生的读文法。学校很客气，没有收旁听费，我顺便也听了其他老师的课。一九三九年秋，我正式进入国专求学了，许多同学往往把我当作沪校最早的新生，就因我曾旁听过。”另作者在《钱仲联先生的诗学、诗作、诗教》（见《学海图南录》）一文中记：“一九四一年冬，日军侵入租界，我辍学返乡”；在《记唐文治先生》一文中又记：“我于抗战胜利后复学。”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陈逸秋（三年制国学科）、郁慕娟、施钟麟、谢一飞、熊思儒、马昌荣、郑桂英、陈文荃（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八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年秋，顾佛影（名宪融，字佛影，以字行，一八九八～一九五五）应邀至国专沪校任教，讲授词曲等课程，其间一度由陈小翠（又名玉翠、翠娜，一九〇七～一九六八）代课。

黄汉文《缅怀朱大可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二十一期）：“顾佛影先生名宪融，南汇人，与我同隶旧松江府属，抗战胜利后见面的机会较多。钱仲联师所撰《梦苕庵诗话》曾论及朱、顾两先生的诗。佛影先生曾学词于陈栩园先生（栩、天虚我生），一九四六年秋来沪校教词曲，一度由

陈栩园之女翠娜女士（小翠）代课。”

本年下学期，无锡国专第七届毕业生魏守谟（又名建猷）到国专沪校任教，讲授中国通史。

周有民《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大学复员‘回京’，魏建猷举家随国文系教师一起坐船顺江东下。他还不知道国文系已内定解聘他。同船的好友罗根泽偷偷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希望他早作打算，这样魏建猷临时决定来上海……上海不愧为上海，机会实在太多。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一部分避乱上海的师生，办起了国专沪校。沪校的规模很小，没有固定教师，教务长便是王蘧常。魏建猷找到了他，王老师答应下学期可以安排每周三小时的课，上中国通史。”

按：魏守谟曾于一九三六年至无锡国专任教，见本书该年事中。抗战爆发后，魏守谟未在国内继续任教，开始了在湖南长沙、四川西昌等地长达数年的流离生涯。一九四二年夏，魏守谟至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九四六年夏，魏守谟遭中央大学解聘，嗣后乃转至国专沪校任教。

十月二十六日，国专沪校全体教职员及学生赠送校长唐文治一根红木手杖，手杖上镌有“天寿平格”四字。上午十时，举行献杖仪式，王蘧常致辞，唐文治致答谢辞，并以“作中流砥柱”勸勉同人（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丙戌八十二岁》）。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国专无锡本部

一月二日，无锡国专与省立教育学院等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美军在北平强奸女大学生（据《无锡市教育志》）。

本年春，国专沪校五年制班先行合并至无锡本部，三年制班及二年制班仍然留在上海。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卅七年度毕业纪念刊·无锡国专校史》：“……惟在沪补习部因种种关系，于三十六年春，先将五年制合并至锡，三、二年制仍留一部在沪。”

春季，无锡国专校友会举行大会，校长唐文治因在上海，未能出席，作《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文中强调“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惟在精神而已”，以此来勉励学生。

唐文治《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本《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一）：“今日欣逢本校校友会春季大会，鄙人未能到会出席，歉仄之余，弥深神往。诸君均系吾门杰出人才，以后建功立业，未可限量。须知传嬗鄙人学说，实系传嬗鄙人精神。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



惟在精神而已……若吾一身一心，精神不能振作，一家一国，精神亦不能振作，或用之匪正，立见危亡矣。故今日诸君，欲传擅鄙人之精神，请将鄙人所撰《孝经》、《论语》、《孟子》‘大义’及《孝经》、《孟子》‘救世编’，详细为学者讲授，则精神充周本校，且远及于一乡一邑一国矣。更有进者，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近时诸同学为鄙人读文灌音，本月杪可出版问世。诸同学注意读文，则精神教育即在于是。他日家弦户诵，扩充文化，为文明教育最盛之邦，其责任实在于我诸同学。鄙人窃昕夕望之，馨香祝之。又闻诸同学开会后即赴茹经堂观察，益征厚谊，具见师弟契合之精神，沆瀣无间……”

三月，由国专桂校随迁回锡的国专学生、地下党员甘京林，在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书记周克的领导下，在无锡国专中开展发展党员、向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介绍阅读进步书刊、组织成立历史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等党的工作。

陈肯《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国专学生运动简况》（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九六四〔四六〕年三月无锡国专桂校从广西迁返无锡，随校来锡的地下党员甘京林，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在周克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陈肯（志道）、邹瑛、戴庆熊、顾昌巳（寅）入党。在国专另外几条线的地下党员有冯励青、何刚、蒋琳、马辉德（王澄）、周铭等。无锡复校以后，甘京林向同学中的积极分子介绍阅读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中国通史简编》、《西行漫记》、《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等，并介绍订阅《文萃》、《时代》、《民主》等刊物，还秘密传阅《新华日报》，收听延安广播。与‘人报之友’合作，在校内成立歌咏队，邀请吉联抗、张养生、陈家松、郑桦等来校教唱进步歌曲。在甘京林主持下，成

立了历史研究会，出版油印刊物《铁轮》，由陈肯任会长兼主编。参加历史研研〔究〕会的有冯励青、戴庆熊、顾昌已、高涤云、朱为中、陆振岳、张家从、张仁迪、叶强、冯寿耆、赵志岚（林祥）、呆〔吴〕超等三十余人。还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墙报《彻札》。”

按：据《无锡革命斗争大事记（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一书所载，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周克任书记，而甘京林是在周克的领导下工作。到本年夏，中共无锡工委为加强对大中学校和社会青年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城区青年、学生支部（区级），甘京林任支部书记。

五月二十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分别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国民党政府同时在南京、天津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殴伤和逮捕学生百余人，是为“五二〇”惨案。第二天，无锡国专“南京惨案后援会”向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慰问电，并宣布罢课三天，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

《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慰问电》（见《五二〇运动资料》〔第一辑〕）：“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鉴：五二〇惨案消息传来，群情愤慨。除组织后援会，罢课三天以示抗议外，并对被殴伤同学致敬并慰问。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南京惨案后援会五月二十一日。

陈肯《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国专学生运动简况》（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京沪苏杭地区五千多名学生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的游行时，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严重血案。消息传来，无锡国专的地下党发动同学，召开学生大会，推举了高涤云、刘



传正等成立了血案后援会，决定从二十二日起罢课三天，在校内贴出了《罢课通告》。训导长王子畏企图阻止罢课，揭了通告，引起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愤慨，与他进行了辩论，迫使他承认错误，并重新将通告贴回原处，达到了罢课三天的胜利目的。与此同时，出版了墙报，还向南京受害学生发了电报，表示慰问，参加了示威游行，使斗争推向了高潮。”

蒋庭铨《追忆冯振夫子二三事》（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七年五月国专同学声援南京‘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举行罢课。一次冯老师命工友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我忐忑不安，认为参加罢课要挨骂了，但一进办公室，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冯老夫子命我坐下，仍是如往常一样，和气地问我为什么要罢课，我如实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并没有批评我。时隔半个多世纪，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李立德《纪念冯振教授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一天，东方刚发白，我像往常一样，赶上早操，便往学校去了。冯校长大约迟了几分钟。我一踏入校门，看见情况都不同平时了，同学们出出入入，行来走去，有的拿着标语纸，有的拿着旗杆。进入教室，见有许多同学正在写标语，同学们见我进来，就拉着我的手，推我快点进去，给我一支毛笔，叫我写标语。我平日喜欢写字，所以写得很快，让别的同学贴到竹竿上，每一位同学拿着一面旗，准备游行示威。正在这时，冯校长到教室来了，又和蔼又严肃地说：‘你们做什么？’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反内战，反饥饿游行！’语音还未停，冯校长就向校外猛挥手，说：‘快！快！快出去！’冯校长接着到别的教室、礼堂、办公厅各处看看。同学们有的在用油印机印传单、印标语，忙得很，冯校长总是说：‘快！快！快出去！’示威游行队伍很快出发了。同学们每人拿着三

角彩旗，高呼口号：‘我们反对内战！我们不是杨妹（作者原注：当时报纸登载一个荒谬的消息，说四川某地有个杨妹，长久不吃一点东西，不感到饥饿，也没有病）！我们要吃饭！’同学们还一面发传单。队伍浩浩荡荡，到了无锡公园，便与江苏教育学院的示威游行队伍会师，行遍了整个无锡的大街小巷。”

暑假期间，无锡当地一资本家占据国专的篮球场，私自兴建一栋楼屋。开学后，国专学生合力将已建到三层高的楼屋拆毁。

李立德《纪念冯振教授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

“一九四七年，放了暑假，冯校长返家乡，接师母及儿女来锡。学校的老师同学大多数也回家了，在校的人很少。有一个资本家恃其有钱，找个律师替他作案，占据了学校的篮球场，要兴建一座大厦。大批工人搬运建筑材料，掘墙沟，大搞起来。蒋石渠先生见了，便出去对那些工人说理，不许他们搞，无效。后来，我和蒋先生说：现在是假期，老师同学大都回家了，现在资本家占我们的球场起屋，等到开学师生来校后，我们学生就倒了它，不要和工人伤和气。蒋先生听了，觉得有道理，便忍着气，让他们建。工程的确进展得快，一个暑假就起到了第三层楼了。

开学了，师生回校上课了，冯校长一家也都来到了学校。学生们交费、注册、上课，秩序井然。同学回校后，看见球场被占，个个都很气愤，议论纷纷，也有些同学去请示学校。一个晚上，冯校长召集几位骨干老师和几位同学代表开会，说道：‘学校开学上课了，很快上了轨道，但是一个资本家仗着他有钱有势，雇佣一个律师为他撑腰，霸占我校的球场建房

屋。球场一直是学校的运动场。对土地买卖，使用土地者有优先权，他没有道理。学生要锻炼，要打球。现在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谁扰乱学校秩序谁就要负责，学生是会反的。学校要保护学生利益，体育运动不能停止，谁都不能影响学校上课的正常秩序，谁都不能妨碍学生的正常活动。学习时间，大家认真学习；休息时间也要适当休息、游览、访友，等等。’会上学生代表也说：摧毁了它，有事让他来找我们几百学生……

到了星期天，开了早餐之后，老师们三个两个先先后后都到校外去了，有的到惠山饮天下第二泉的茶；有的到太湖，在茹经堂、鼋头渚、梅园的绿阴下散步。星期天过得真舒适，逍遥自在，很有点庄子那种清静无为的风味。同学们有的在教室看书、写作，有的在校园里下棋、聊天。突然间，有人喊道：‘我们要回我们的球场，把那些楼房通通倒掉！大家出来！’接着人声鼎沸，你一句，他一句，大声叫道：‘干！干！干！捣毁它！’同学们紧紧围着球场，有的冲到场内。因为人多，有的同学从校园、走廊望出去。也有的在校门附近走出走入，嘴里叫着：‘干！’走在前头的同学，望了一眼场地，见地上堆着很多圆木材，又大又长，便三个五个同学抬一根，向新建的房墙撞去。楼房是用红砖砌的，已有三层高了。为了安全，负责撞毁砖墙的同学先叫大家离开球场，便开始抬木冲撞。青年学生力大气壮，撞了几下，墙就穿了一个大窟窿，一连撞了几个大窟窿后，高高的楼房便摇摇欲坠了。同学很小心，见状便匆匆离开场地，远远望着。不一会，这一座‘危楼’好似大型炸弹一般，一声巨响，全部倒下来了。这时正是天高云淡，滚滚烟尘使那里的空间变得雾蒙蒙的。不知不觉的，无锡的上空来了一架飞机，盘旋了两三圈，就走了，好似特地来看学生的威势。”

本年下半年，学生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一九二四～）因去年至本年以来连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受人注意，党的地下组织要其立即离开学校。在王遽常的帮助下，冯其庸和同学张仁迪、沈燮元等三人由国专无锡本部转入国专沪校。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冯其庸等人再回到国专无锡本部。

冯其庸《王遽常先生书信录》：“一九四七年由于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原先已经被推为学生代表了，运动一起，我更被推为学生会的带头人，于是我自然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反饥饿运动，特别是美军强暴大学生沈崇事件，掀起了全国性的大学潮，无锡国专的学生会与无锡的社教学院学生会联合起来，共同举办全市大游行，影响很大，于是学校开校务会议要开除我和高涤云同学两个为首的人。据当时与会的几位老师后来告诉我，为了要开除我，教师与教师之间几乎打起来。一位教文化史的王教授，是国民党的死硬派，坚持要开除我，一位教唐诗的老教授，叫俞钟彦，别号‘白门老兵’，他是国民党资历很深的人，还是李济琛[深]的老朋友，他竟然在座位上站起来，举起茶杯，向那位王教授掷过去，而且大骂王教授不爱惜青年，不爱惜人才。由于这一闹，实际上是地下党员（当时大家不知道）的冯励青教授就起来说话，力主不能开除。主持会议的冯振心教授是从广西迁回来的，他任无锡国专的教务长，他讲诗学、《说文解字》和《老子》。他的三门课我都听了，而且《说文解字》的成绩我是全班最高的，其他两门课学得也很好，所以冯先生从心底里不愿意开除我，经冯励青先生一说，其他教师也没有附和教授的，所以他立即就决定，同意冯励青教授的意见不开除。事后两位冯老师都给我讲了会上的情况，冯振心先生还勉励我认真读书。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地下组织的通知，要我立即离开无锡。所以我马上就到了上海，找了王蘧常老师，说明情况，要求转到上海无锡国专来。王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马上就决定让我和同去的几位同学转到上海来，这样我又在上海听课，我得以认真听王蘧常先生讲《庄子》和《诸子概论》，同时还听到童书业、王佩诤、顾廷龙、葛綏成、顾佛影、刘诗荪诸先生的课。我拜识龙榆生、陈小翠、白蕉、陈定山诸先生也是在此时。”

按：除上引《王蘧常先生书信录》外，冯其庸在另外几篇文章中也曾叙及此事，可与上文互相参看。在《读王蘧常先生的书法随想》一文记：“我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的春天考入无锡国专的……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因参加学生运动而受人注意，党的地下组织要我立即离开学校，当时的苍茫大地，到处都是反国民党的斗争和国民党的到处抓人，我究竟能到哪里去呢？我于急难中向瑗师求援，瑗师立即复信叫我到上海去，改入无锡国专的上海分校。”在《才如江海命如丝——怀沈茹松学兄》一文中记：“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我因为连续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有关组织通知我迅速离开无锡。所以我才转学到上海，与我同到上海分校的，有张仁迪、沈燮元两学兄。”又在《怀念我的老师冯振心先生》（见《无锡国专在广西》）一文中记：“我在无锡国专的三年，正是解放战争从开始到临近结束的三年。那时学校学生运动也起来了，而且我也成为了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到一九四七年底，我接到地下组织的通知，要我离开无锡，因此，我在王瑗仲老师的关怀下，从无锡转到了上海……到了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又回到了无锡国专……”

又按：上引《王蘧常先生书信录》中说“学校开校务会议要开除我和高滌云同学两个为首的人”，在冯振、冯励青等

教授的保护下，冯其庸最终未被开除。但据梅鹤徵《三河口延陵中学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记：“高（涤云）是镇江人，是我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他过去在校，因参加学运而被校方无理开除。”由此可知，高涤云还是被学校除名了。

本年冬，上海、苏州等地相继发动劝募寒衣运动，无锡国专学生积极响应（据陈肯《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国专学生运动简况》，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俞履端、吴永康、陈祥耀、汤毓夔（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姚烈文、郁慕云、郁慕莲（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七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届毕业生中的汤毓夔（即汤志钧，一九二一～），一九三九年即考入国专沪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抗战胜利后，汤毓夔读完了国专未修课程，乃于本年一月毕业。

按：据汤志钧《我的自传》，一九三九年“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已在上海租界内复校”，汤志钧考入该校。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国专教授有的远徙内地，有的销声匿迹，也有个别教授误入歧途。我在上海，吃住都在姑母家中，姑母待我甚厚，视同亲出，但她经济也不宽裕，不能再增加她的负担了。这样，我便辍学返乡，经友人介绍，到离城三十多里的



农村中学教书，那里是游击区，经常有新四军驻扎，也能呼吸新鲜空气，唱些爱国歌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始终在中学任教，虽然也换了几个学校。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先进复旦大学，又读完了国专未修课程，于一九四七年一月毕业。在复学期间，和同学郁慕云相识，她佩我治学勤奋，我感她纯朴无华，彼此相恋。但她家饶有资产，而我则贫无立锥，我的父母既担心‘齐大非耦’，她的父亲也担心女嫁黔娄，幸岳母垂怜，终成眷属。”又郁慕贞、郁慕洁、郁慕娟、郁慕云、郁慕莲姐妹五人是上海著名中药店“郁良心堂”主人郁元英的女儿，其中郁慕娟、郁慕云、郁慕莲等都毕业于国专沪校。据郁慕贞、郁慕洁、郁慕娟、郁慕莲《缅怀先师 回首当年》一文记，一九四五年秋末，郁氏五姐妹一起拜张大千为师，此后都成为上海著名的女画家。

本届毕业生中的陈祥耀（一九二二~），一九四一年即考入国专沪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辍学业，一九四六年又重返上海续完学业。在国专沪校就读期间，陈祥耀写成了他最早的一部著作《清诗评论》。

郭培明《为学问的人生——记福建师大教授陈祥耀》：“一九四一年，陈祥耀考入无锡国专，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回到泉州，受聘于刚创办的晋江县中等校，一九四六年重返上海续完学业。这短短的六七年，却关系到陈祥耀的生命轨迹的走向。参加强社，与长辈文朋诗友结谊，被张琴评点为‘翰苑才’，林骚评点为‘龙小毕竟是龙’正是其时。而无锡国专名师荟萃，英才云集，当时来校授课的教授有王蘧常、钱仲联、吕思勉、周谷城、夏承焘、周予同、胡曲园等名家，解放后在外语教学方面成就卓越的许国璋当时任唐谋伯教授的助理讲师，授英语课程。自古名师出高徒，这一难逢良机，使他接受

了系统的扎实的国学基础训练。他最早的一部著作《清诗评论》就完成于就读无锡国专时。他的稿子模仿勃兰克斯评点欧洲文艺思潮的写法，由周予同先生介绍给上海的开明书店，编辑认为‘有新意’，但‘文字较繁冗’，书稿没有出版，后来陈先生自己觉得不满意，一直放在家中，直到‘文革’中销毁。”

农历正月开课，唐文治仍为学生开设《读文法》课（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亥八十三岁》）。

二月十八日，唐文治致函教育部，根据教育部要求，呈报无锡国专的英译名为“The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唐文治《快邮代电》，（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奉高字第〇〇一四九号代电，开：‘兹为规定本部所属专科以上学校英译名称，仰将该校沿用英译名迅予具报为要。’等因奉此，遵将属校英译名谨另纸缮呈，请赐备案。”

按：随此信有“附呈英译校名一纸”，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英译名为“The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吴湛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一九四七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报教育部的英译名为‘the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译成汉语便是‘中国文化学院’。应当说，这正是唐文治办学所要达到的心愿：对外代表中国文化，对内以振兴国学、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以达‘正人心、救民命’之宗旨。”

三月一日，唐文治致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呈报国专沪校五年制学生已于本年寒假中悉数迁回无锡，三年制学生之迁锡，也在积极准备中。但因上海为人文荟萃之区，选聘文书科

师资较便利，故请求“将本校二年制文书科借地上海，切实办理”。三月十六日，唐文治又以“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名义，向教育部发公函，内容和他写给朱家骅的个人信件基本相同。后教育部指令云“本关通案，未便照准”。

唐文治致朱家骅函（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一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弟自前年患膀胱炎后，至今未能脱离医师，不克即时回锡。而上海部分复员方面，本年寒假已将五年制学生悉数迁回无锡，与北流迁锡学生合并上课。至三年制学生，亦继续在积极准备中，俟暑假告一段落，即可一并迁回。特据实陈明，敬祈垂察为感。抑弟窃有请者，上海为人文荟萃之区，文书科师资在沪选聘，实为便利，可否将本校二年制文书科借地上海，切实办理，以广裁成。倘荷俯准，弟一面可在沪讲学，一面遥领锡校校务，仰副钧部广植人才之意……”

按：由教育部属员代拟的朱家骅复唐文治函中称：“惟囑准将二年制文书科借地上海办理一节，以限于规定，且恐他校援例，歉难遵办。”

唐文治《呈报本校五年制业经复员无锡，三年制继续整备迁回，所有文书科因事实需要拟请借地上海办理，敬祈赐准备案由》（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为遵令呈报事：案奉钧部高字第〇八五四六号代电，开：‘据报，该校现在上海开课等情。查该校前呈员生已到无锡，业经令准备在案，何以仍在上海上课？仰迅申复即迁无锡，具报为要。’等因奉此。窃文治贱体自前年患膀胱炎后，至今尚未能脱离医师，前荷钧部长枉驾敝寓慰劳，已将此意面陈，未能即时到锡。职是之故，查上年七月间呈报员生已到无

锡，系指北流迁回无锡而言；至上海部分复员方面，本年寒假已将五年制学生迁回无锡，与北流迁锡学生合并上课，正拟呈报。所有三年制学生，亦继续在积极整备中，俟暑假告一段落，即可一并迁回。谨据实陈明，呈报钧部赐答。再目下文书人才缺乏，于事实极为需要，前年奉令委托办理二年级文书科，实为应时之急。查上海为人文荟萃之区，文书科师资在沪选聘，实为便利，可否将本校二年制文书科借地上海，切实办理，以副钧部广植人才之意……”

按：教育部指令云：“本关通案，未便照准”。

吴淞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但唐文治似乎并未理会国民党教育部的指令，国专沪校仍在上海开课。一向知礼守礼的唐文治为何会在这种时候置教育部的指令于不顾？而且，朱家骅及教育部的理由，不可谓不充足。究其原因，我以为‘上海为人文荟萃之区，文书科师资在沪选聘实为方便’，它对于国专的招生、选聘师资以及经费流转等办学条件都会比较有利些，这固然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唐文治个人当时的境况和心情有关。唐文治一向爱校爱教育甚于生命，此时已八十三岁，年老体衰，疾病缠身，自膀胱炎手术后，小便改道于尿管中，更加重了其出行的困难。事实上，其身体状况已无法离开上海，更无法在上海无锡之间来回奔波。但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支撑着给学生授课，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沪校迁回无锡止。他深知，国专沪校一旦全部迁回无锡，便意味着他教学生命的结束，他深爱学校、深爱学生、深爱他的国学教育事业……明乎此，我们才能对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拖着重病仍然不愿离开讲台的行为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敬意！”

六月三日（农历四月十五日），唐文治与张元济（字筱

斋，号菊生，一八六七～一九五九）、陈叔通（名敬第，一八七六～一九六六）、叶景葵（字揆初，一八七四～一九四九）、陈汉第（字仲恕，一八七五～一九四九）、李拔可（名宣葵，一八七六～一九五二）、张国淦（字乾若，一字仲嘉，一八八〇～一九五九）、胡藻青（名煥，一八七二～一九五七）、钱崇威（字自严，一八七〇～一九六八）、项藻馨（字兰生，一八七三～一九五七）等十人联名致函上海市长吴国楨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呼吁释放在“五二〇”运动中被捕的学生。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丁亥八十三岁》：“今岁，上海学潮蜂起，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高呼反内战口号，学生集会常被军警拘捕，群情愤慨。四月十五日，余与张君菊生、陈君叔通等十人，联名致函当局，大意谓学潮近因，不过学校内部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至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政府派兵调警，殴打、逮捕甚至有公开将逮捕之学生送往中共区域之言，似非政府爱民之旨，应请将被捕学生释放，由学校自行开导。其呼吁并不悖于理者，亦宜虚衷采纳，则教育前途幸甚。书上不报。”

唐文治《与张元济等联名致吴市长宣司令公开信》（见《唐文治教育文选》）：“吴市长、宣司令同鉴：某某等蛰居本市，不问外事。顾学潮汹涌，愈演愈惨。谁非父母？谁无子弟？心所不忍，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置不论。近因则不过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至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杂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甚至有公开将逮捕之学生，送往中共区域之言，此诚为某等所未解。学生亦人民也，人民犯罪，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似非政府爱民之旨。况中共区域，

已入战争状态，不知派何人以何种交通工具送往？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送往中共区域之说，某等未敢轻信。然办法离奇，令人骇悸。伏望恺惻慈祥，处以镇静，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学校自行开导。其呼吁无悖于理者，亦宜虚衷采纳，则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

按：据方行《十位爱国老人营救被捕学生》一文记，十位老人致函上海当局的举动，系陈叔通、张元济发起。函稿由陈叔通起草、张元济缮正，事先商得唐文治同意领衔，并请唐修改函稿，然后分致其他七位征求意见。在十位老人和各界的营救活动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本年八月初，当局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五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黄翠君、陈明熹（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杨廷福（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三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五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届毕业生中的杨廷福（字士则，一九二四～一九八三），一九四〇年即考入国专沪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辍学业。复又至重庆考入复旦大学。至本年七月，无锡国专授予其毕业生资格。

《杨廷福自传》：“抗日战争的炮火纷飞年代，我由宁波中学而浙东中学，到一九四〇年在初中二年时就辍学了。我来到上海，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从太仓唐文治（蔚芝）师、永嘉周予同师读经书，嘉兴王遽常（瑗仲）师治诸子，武进吕思勉（诚之）师学历史，并向如皋冒广生（鹤亭）、新建夏敬观（剑丞）老前辈问学，开始有了治学基础和门径……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沦陷。我流亡到重庆。这时，复

旦大学刚刚改为‘国立’，我以同等学力报考中文系。全国统考规定，凡国文、英文、数学中有一科零分的，不予录取，我的国文成绩连同口试均为一百分，而数学则为零分，按章不能录取，系主任陈子展教授和鲁实先教授认为：‘中文系不录取这个学生，我们辞职。’他俩以去就力争，我就破格地入了学，一时传为佳话。”

按：上引的《杨廷福自传》中，没有言明他在抗战胜利后，是否像汤毓夔、陈祥耀那样重返上海读完国专未修课程，但无锡国专是在本年七月中授予其毕业生资格。

本年暑假后，时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童书业（字丕绳，一九〇八～一九六八）兼任国专沪校教授，先后开设春秋战国史、秦汉史、史学通论、世界通史等课程。

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父亲一九四五年返回上海，不久即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但博物馆微薄的工资无法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为生计所迫，在一九四七年初为丁山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代课，讲历史地理。暑假后由魏建猷介绍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讲春秋战国史。”

曹道衡《困学纪程》：“……在这个时期里，我除了受顾先生和潘先生的教海外，在无锡国专受童丕绳（书业）先生的影响最大。童先生先后给我们开了‘春秋战国史’、‘秦汉史’和‘史学通论’、‘世界通史’等课。在讲授‘春秋战国史’时，童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即《左传·僖公十五年》记晋惠公以‘河外列城五’贿赂秦穆公和《僖公二十年》烛之武对秦穆公说的‘许君焦瑕’究竟是不是一件事？他还叫同学于廉兄做我的对立面，各写文章一篇。于兄的文章主张‘许君焦瑕’就是‘河外列城五’的一部分，是晋惠公割让秦国的。我的文章主张《左传》中这两段话指两件事，‘许君焦瑕’是晋文公割让给秦国的。我们两人都

去查阅了《左传》、《史记》等等史籍，还翻遍了正续《清经解》中各家关于《左传》的注释，写出了各自的习作。这是我第一次试作学术性的研究。文章写出来以后，童先生认为于兄和我的文章都不错，在课堂上作了表扬，还想介绍到当时魏建猷先生在《东南日报》上编的《文史周刊》发表。但也许由于那篇文章还很幼稚，所以未被采用。在上‘秦汉史’的课堂上，童先生又给我们出了题目，要研究战国秦汉间的社会生产方式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问题。他要我们各自找一部战国秦汉间的典籍去读，把有关奴隶问题的史料摘出来进行分析。我记得自己选的是《吕氏春秋》一书，确实找到了一些材料，也作过一些论述。具体论点已记不起来。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水平是根本没有可能去解决这类问题的。但这样做，对我帮助很大。第一是我过去读子书不多，只限于《庄子》、《荀子》等书，还没有读过《吕氏春秋》，这次却通读了此书，还附带通读了《战国策》和翻阅了《韩非子》。本来，我应当通读《韩非子》的，但大约是受了郭沫若先生的影响，很讨厌韩非，所以有点读不下去。其次是为了要了解奴隶制的问题，我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论著，初步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

因教育部仍在下指令要求唐文治将国专沪校尽快复员回无锡，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文治向教育部回电，称“寒假后迁回无锡”。

唐文治《呈复本校并无非法勒索学费等情，并呈明于寒假后迁回无锡由》（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再本校迁回无锡一节，前奉钧部指令，亟应遵办，旋因在沪学生环求俟寒假后迁锡，当经决定，寒假后迁回无锡，以符部令。”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国专无锡本部

一月一日至三日，因去年底有皖、苏北地区大批难民逃亡江南，衣食无着，在中共无锡县委的组织发动下，包括无锡国专在内的无锡十八所大中学校共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劝募寒衣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城区人民革命史》（见《迎接黎明：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城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教院、国专、辅仁、圣德、锡光、县中、县女中、锡中、道南、青年、江南、省锡师、建华、城中、自强、竞志、忠勤等十八所学校和团体共三千多名学生走向街头，按照划定路线，分区宣传劝募。劝募会总部也成立了劝募队，进行集团劝募。街头上到处是漫画、标语，‘救救穷人’的呼声，传遍大街小巷……这次劝募运动，共计募得现款（法币）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万元，购得大米三百三十二石，衣服六千余件。”

无锡国专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萧珉、甘京林、曹漳才、丘大森、沈乃仁、党祖沛（以上为三年制国学专修科）和杨展勳、潘汝滨、黄梓魁、覃业

德、卢铁山、刘贞藩（以上为五年制国学专修科）等十二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报卅六年度第二学期、三七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单、成绩、统计表，上级关于验印的指令和补发学生毕业证明书·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年下半年，无锡国专部分学生如洪飞、赵志岚（林祥）、连环、雷穆岚等，到扬州解放区华中公学学习（据陈肯《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国专学生运动简况》，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本年夏，僧人无相（俗名陈文银，法名了瀚，号无相，一九二七～）进入无锡国专学习，成为当时班上唯一的“和尚学生”。

陶洁、陶天成《大爱无语的慈悲仁者》：“无相法师俗名陈文银，籍贯江苏东台，一九三八年出家，一九四五年在宝华山受具足戒始，就以严持净戒要求自己。一九四八年，无相来无锡崇安寺会朋友，遇到宁绍中学周文华校长，由他介绍进入无锡国专读书……一九四八年夏，无相进入无锡国专专攻国学，每天往返于国专和居住地崇安寺庙里，‘我是当年班上唯一一个和尚学生’。……进入无锡国专读书没两年，国专就并入东吴大学，走读生往来有诸多不便，中途便退学了。”

本年中，因通货膨胀、粮价暴涨，无锡国专学生面临断炊之虞。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连续两天，学校备函并派员至无锡县政府，请求予以协助，解决困难。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致无锡县政府函》（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见《各地来锡采购米粮卷》）：“敬启者：敝校食粮业将断炊，日前奉教育部王专员面谕‘学校食粮，教育部已函请省府责成地方政府协助办理，省府业于十月十九日以



（卅七）府介田五字444号代电，飭知贵府在案’等语。敝校经于昨日备函，派员前来洽办，未获成效。兹再备函，派员前来，敬请惠予协助，以济眉急，而利教育……”

按：此次无锡国专派员向无锡县政府接洽商量，似未有结果，故紧接着于下月初，有再度商请借米之举。

十一月四日，分别由无锡国专学生代表刘则文等人致函首都卫戍司令部无锡指挥所指挥官、唐文治致函无锡县县长周明馨、无锡国专致函无锡县政府，向无锡县政府等商借食米。在唐文治致无锡县县长周明馨函及无锡国专致无锡县政府函中，并称学生“决议请愿，劝止无效”、“经决议罢课请愿，虽历加劝导，惟饥火中烧，势难遏止”。后由无锡县政府协调，于“总检查封存米内”借出五十石，才使国专学生暂时渡过了眼前的难关。

刘则文等《为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请求救济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见《县经济检查委员会各种档案》）：“窃生丁致中等九十六名……只身负笈无锡，经济来源断绝。值此米珠薪桂之际，欲归不得，欲住不能；断炊之虞，已迫眉睫。业经据情呈请教育部，按照收容流亡学生办法，予以公费待遇。惟公文来往，须费时日。迫不得已，拟恳乞钧部，当教育局救济款项未能实领之前，暂拨食米，以济眉急。涸辙之鱼，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 首都卫戍司令部无锡指挥所指挥官刘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陷区同学代表 刘则文 徐半农 刘传曾 连环 宋厚训。”

按：此呈文后有批语：“无锡县府酌办。”

唐文治《致无锡县县长周明馨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见《无锡县经济方面来往公文》）：“急！无锡县政府周县长勋鉴：粮价陡涨，无法购买。学生三百余人，嗷嗷待哺，群

情惶恐；决议请愿，劝止无效。请迅予救济，并示办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戌支铃。”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致无锡县政府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见《无锡县经济方面来往公文》）：“敬启者：自限价开放以后，市场粮价陡涨。敝校学生三百余人……即照政府原日限价，尚无法维持膳食之需。今粮价突涨数倍，倘不加救济，势必断炊。复查敝校战时内迁湘桂复员，所有湘桂川粤等地学生随校来锡者，亦占现有人数三分之一以上，此辈学生以家乡远隔，汇兑苦难。原预定一月之膳费，今已不足供旬日之需。前承贵府转饬粮食公会按限价售予之红米三十市担，仅能维持至本月五日。自六日起，即无以为炊，群情惶恐，待哺嗷嗷。经决议罢课请愿，虽历加劝导，惟饥火中烧，势难遏止。深恐因此而引起不良后果，致影响社会秩序。惟此实社会之严重问题，自非敝校所能单独解决。经急电教育部，请求救济。但当局统筹办理，难济目前之急。敬请贵府于总检查平售米项下，先行指拨五十石，以救济战区学生外；并准由敝校按照限价购备壹百石，以救济学生膳食，俾阖校员生能安心教学……”

按：此呈文后有批示：“……请指挥所在总检查封存米内先借五十石济急，俟该校向教部请求有解决办法再行偿还。”

李立德《纪念冯振教授诞辰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时候，通货膨胀。街市上店铺半开门，没有商品。买米呢？困难得很，到头一间米店问价，每石一亿元，嫌贵不要。到第二间米店问，每石价一点二亿元，于是转回到头一间米店去买，啊！一石变成了一点三亿元了！买米确实困难。特别是家远的同学，家乡谷米比较便宜，将卖谷的钱寄往无锡需要数天，甚至十天，从家乡寄一二



十石米的钱，到无锡买米只得一石，生活发生了问题。有一部分同学已回家去了，在校上课的还有一部分，同学们十分焦急，学校领导也天天考虑如何解决师生伙食的问题。冯振校长和几位老师商量，由训育员谢老师（记不得他的名了）带领学生代表，向政府要米。去交涉要米一般都是谢老师和学生会出面，必要时多去三四位同学。他们与接见的人说，全校师生人数多，几百人不能饿着肚子，如果问题不解决，学生闹起来，就不好办了。接见的人不敢说不给米，但要滑头，左推右推，说要等分配好再给，或以未曾碾成米作借口，等等。我们说：‘有谷就容易了。’我们到粮行，叫粮行马上碾米，同学们在那里等候着，经过几次交涉，第一次得米五十石。这五十石米全校师生吃不了多久。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交涉要米，和他们说理，又经过几次辩论，仅得米三十石。这些米由学校掌管，集体开饭，保证大家有饭吃。”

本年初冬淮海战役以后，本来应于下年毕业的一些国专学生向学校提出，希望能提前半年发放毕业证书。主持锡校工作的冯振坚持原则，不同意提前毕业，故此事未果。

王翌群《终身受用的教益——忆冯振心老师》（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八年初冬淮海战役以后，苏南一些人有点浮动，影响所及，国专即将毕业的学长们中有人希望能提前半年发放毕业证书。由于唐校长居住上海，无锡的工作一向由老师（按：指冯振）主持，这一希望自然就向老师提出。我入学较迟，还不够格抱这样的希望，所以‘谈判’如何进行全无所知，只听说老师坚持原则，不同意提前毕业；而同学的念头又不愿轻易打消，于是三三五五地去‘蘑菇’。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老师在自己宿舍门外贴出一副长长的‘自挽’的挽联。学长们看了，也就不好意思再去敲门，于是这一‘事

件’就这样结束了。”

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戴笔、徐家震、牛雪峰、刘九一、程天佑、季位东（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沈培元、徐生湫（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八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

农历正月，由唐文治弟子薛桂轮（字志伊，生卒年不详）、谢绍祖（字仲显，生卒年不详）、周树慈（字志仁，生卒年不详）、陆修祐、陆汝挺、冯振及唐文治长子唐庆诒等发起为唐文治读文灌制唱片，由薛桂轮总其成。灌音唱片为上海大中华唱片厂所制，正集凡十张，每张收录唐文治所读文两篇；又发行通用集五张，每张亦两篇。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戊子八十四岁》：“正月沪校开学。余任课如前。是月，有及门诸弟子薛志伊名桂轮、谢仲显名绍祖、周志仁名树慈、陆景周名修祐、陆汝挺女士、冯振心名振及长子庆诒等发起余读文灌音片之举，由薛生志伊总其成。灌音片正集凡十张，每张二篇，预约出售，颇风行一时。薛生志伊等为宣扬吾国文化起见，复议定发行通用集五张，每张亦二篇，内有中英文对照，英文译文为庆诒所撰，冀可流传海外。灌音片为大中华唱片厂所制，主其事者，范君式正也。”

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先生及门弟子锡山薛桂轮先生发起唐蔚芝先生读文传播会。先生应上海大中华唱片厂范式正之请，得陈其均、唐星海两先生赞

助，前往灌音片第一集十张，第二集五张，选录先生所读的文章、诗词以及昆曲《长生殿·小宴》等。每篇各冠以英语，便于友邦人士领会，以广流传……回忆汝挺曾先后随薛桂轮先生奉陪先生去大中华唱片厂灌音，当时先生黄钟大吕之声，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三日……先生居恒正襟危坐，昂首望天，始终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常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自励。人但知先生读文特别宏亮，岂知先生平时养气，远非一日之功。”

陈以鸿《茹经先生读文法管窥》（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

“……读文法随文体而不同。按先生所读，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诗经》、《楚辞》和五七言诗歌。这类文体句法整齐，结构前后重复，读法主要在表达出韵味来。第二类是长短句，在诗歌读法的基础上，随词体不同而变化。第三类是上古散文，以经书为主，因写法古朴，读法也比较庄重而拘谨。第四类是先秦诸子以次的历代散文和骈文，以及一部分韵文，随着文体的蓬勃发展，不仅句法变化多，文章结构变化亦多，相应地读法也错综复杂起来。先生读文法的博大精深，特别体现在这一类文章中。

先生读文法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音乐性。这是往日所学习的以及后来所听到的其他读法都无与伦比的。四十年代中，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曾请先生录制读文灌音片一套，共十片，内容包括《诗经·鸛羽》、《卷阿》、《常棣》、《谷风》、《伐木》，《楚辞·云中君》、《湘夫人》，《左传·吕相绝秦》，《史记·屈原列传》，诸葛亮《前出师表》，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李华《吊古战场文》，欧阳修《秋声赋》、《丰乐亭记》、《五代史伶官传序》、《泷冈阡表》，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

《水调歌头》，岳飞《满江红》，昆曲《长生殿·小宴》，其中除昆曲有现成曲谱外，《诗经》、《楚辞》和两首诗属上述第一类，《水调歌头》、《满江红》属第二类，《吕相绝秦》属第三类，余皆属第四类。这一套灌音片，保存了先生所读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古典文学作品，弥足珍贵。惜为当时录音和制片技术所限，唱片又不耐久藏，今日听来，已有模糊和失真之处，较之昔日亲炙时的感受，逊色多了。

茹经先生读文法，除随文体不同而异其调外，并随文章性质而改变音调及节奏。所谓文章性质，首分阴阳，即柔性与刚性。进一步分为太阳气势、太阴识度、少阳趣味、少阴情韵四种。先生之言曰：‘读法有急读、缓读、极急读、极缓读、平读五种。大低[抵]气势文急读极急读，而其音高。识度文缓读极缓读，而其音低。趣味情韵文平读，而其音平。然情韵文亦有愈读愈高者，未可拘泥。’谨就粗浅的实际体会来说：太阳气势文汪洋恣肆，雄劲奔放，读时要求高亢急骤，酣畅淋漓，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反之，少阴情韵文宛转缠绵，感人肺腑，读时要求曼声柔气，一唱三叹，达曲曲传情之旨。少阳趣味文从容闲适，读时须舒展自如，不慢不急。最难读的是太阴识度文，因其大都重在说理，潜气内转，锋芒收敛，读时既不宜图快，又不可使力量减弱，必须掌握高下疾徐的分寸，将文章的深刻内容通过优美的声腔表达出来。

先生读文法传自桐城吴挚甫先生。但桐城与先生原籍太仓方言相去甚远，读法肯定不会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茹经先生读文法是具有创造性的。可惜的是，吴先生如何读文，已不可得而闻知。茹经先生读文时，神完气足，感情充沛。虽届耄耋之年，仍旧声若洪钟，苍劲有力。先生传人之中，哲嗣谋伯先生神情酷肖，但醇厚有余，而老练不足；陆景周师温文尔雅，



宜于读上古经文，得古朴庄重之意，其他则有未逮；唐尧夫师嗓音得天独厚，高亢洪亮，尤其在读太阳气势文时，响遏行云，铿锵悦耳，或如鹰隼盘空，忽又飞流直下，教学效果甚佳。”

农历二月十六日，无锡国专创办人之一陆起病逝，唐文治为作《太仓陆勤之先生家传》。

唐文治《太仓陆勤之先生家传》（见《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五）：“岁次戊子，二月十六日，太仓姻世执友陆勤之先生以舌癌证卒于里第。先生性仁慈乐善，施与不倦，乡人被其泽者，相与奔走巷哭。余闻噩耗，亦不禁恫心……惟时余与省之先生创办国学专修学校，延先生为总干事，缔造艰辛，倚畀益重……”

国专沪校民国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鲍元骏、蒋祖勋、李良干、顾为善、虞兆敏、谢皓东、董仕豪、于廉、陈志道、李庆城（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马敬澄、方余香、周汝琼、庄述章（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十四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补报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届毕业生中的于廉（一九二五～二〇〇一）在国专沪校就读时，已是地下党员，且是国专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范敬宜《听于丹，忆于廉》：“一九四五年，我十五岁，考进了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当时的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有的长我十多岁，视我为小弟弟。其中出类拔萃的就有于廉、冯其庸、沈茹菘、曹道衡等。于廉不但才学出众，而且少年老成，谦恭沉稳，温厚可亲，是同学公认的楷模，对他敬如兄长。我当时还是个顽童，上课时经常做

些小动作，不是给老师画个漫画，就是给同学传个字条，写首打油诗。有一次于廉给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劝我要收心读书，不要虚度光阴，有一句话令人至今不忘：‘流光容易把人抛，聪明易被聪明误。’我母亲看后非常赞赏，对我说：‘交朋友就应该交于廉这样的朋友——这叫“诤友”。’一九四八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于廉和冯其庸都突然悄悄‘失踪’，不知去向，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听说他俩都是地下党员，于廉还是无锡国专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当时是奉组织之命转移了。”

按：上文中说于廉和冯其庸都是地下党员，本年秋“奉组织之命转移了”，其中冯其庸是在一九四七年由国专无锡本部转入国专沪校，后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毕业于无锡国专本部，见本书一九四九年事中；而于廉则仍在本年七月毕业于国专沪校。

本年中，国专沪校因政府停发经费，陷入极度困难。乃由唐文治出面，请求上海著名书画家帮助，举行一次书画义卖，筹款以解燃眉之急。后义展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成功举行。

范敬宜《校长的人格魅力》：“记得一九四八年，学校因政府停发经费，陷入极度困难。学生们建议由唐校长出面，请求上海著名书画家帮助，办一书画义卖，筹款以解燃眉之急。我和同学拿着唐校长盖章的信函，登门拜访了当时第一流的书画家，有张大千、吴湖帆、冯超然、吴子深、贺天健、樊少云、马公愚、沈尹默、王福庵、王季迁、朱梅邨、陆抑非、唐云、白蕉、石伽、樊伯炎、庞左玉、吴青霞、应野平等八十余人，无一拒绝，有的还当场挥毫交卷。义展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举行，非常成功。事隔二十多年，当年的教务长王蘧常教授还对我说：‘这就是唐老夫子的人格力量！’接着又问：‘你



还记得那封征求书画的信是怎么写的吗?’我答:‘记不清了,只记得唐老夫子口授了一句:俾膏火之资得继,束修之奉无缺。这是点睛之笔。’王先生闻言恍然。”

本年中,国专沪校部分学生组织“东南文史研究会”,并编有会刊《希声》。

祁虎文《报国情殷友谊深》(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二、二十一期):“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海爱国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之游行,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向爱国师生频发质问,多加威胁,甚欲令警局传讯。唐校长闻之,拍案而起,与张元济先生等联名公开具函致吴,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正气凛然。虎文与许兄(按:指许威汉)恭聆校长教言,又亲受身教,兼有进步同学导引,更益注重国事,锐意投身革命,是年国专部分同学组织‘东南文史研究会’,虎文主编会刊,取庄[老]子‘大音希声’之意,标名《希声》。中有许兄感时诗篇,赢得国专多位教授赞赏。”

一九四九年（己丑）

国专无锡本部

无锡国专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沈绍祖、殷国风、翟锺秀、李如钧、冯国梁、张仁迪、冯其庸、秦允明、朱延玺、施毓霖、朱为中、谭植毅、赵志岚、丁致中、谢启文、谢启舜、徐国强（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沈静园、沈琮华、杨自成、徐维镛、张宗望、彭会文、温致中、林声宇、温伯儒（以上为二年制文书科）、庞祖宏、何瑞礼、卢绵开、凌武（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和沈燮元、陈志刚、蒋庭铨等三十三人。

按：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应届毕业生名册》（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第一、第二学期应届毕业生名册、毕业生统计表、毕业考试科目表、毕业考试委员会名单、应届毕业生历年各科成绩表》），本届毕业生为上列名单中沈绍祖至凌武，共三十人；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毕业纪念册》中所录的本届毕业生名单，除上述三十人外，尚有沈燮元、陈志刚、蒋庭铨等三人。

本届毕业生中的冯其庸，在就学期间，写成了“第一篇



学术文章”《澄江八日记》，并撰成了《蒋鹿潭年谱初稿》。

张公者《冯其庸：读书·实践·真知——张公者对话冯其庸》：“我第一篇学术文章写的是《澄江八日记》，那是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事，我二十三岁，我去调查江阴人民抗清斗争的史实，清兵占领江阴，死了三王十八将，江阴全城的老百姓只剩下八十人，其余的全都战死或不屈而死了，其中一部分是被清兵屠城屠杀的，一部分是不做亡国奴自杀的。有一个大的四眼井，这井圆周很大，上面一个大石板，开四个井口。据记载，老百姓不愿做亡国奴，死不投降，都挤到四眼井里去自杀，到后来井都满满的了，还有人将脑袋硬挤进去淹死。这个‘四眼井’我去时还在。还有玉带河、明伦堂、花山，这些地方我全部调查过了。所以回来后即写了这篇文章……《澄江八日记》那篇文章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在《大锡报》上的。”

冯其庸《〈蒋鹿潭年谱考略〉自序》：“三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读书，除上课以外，剩下的时间，绝大部分是在顾起潜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有时我整天在图书馆，有时是半天在图书馆，当时我就是在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我前后大约花费了二年多的时间，撰成了《蒋鹿潭年谱初稿》，由吴白匋老师给我审定。吴先生对这部稿子给予了特别的鼓励，还给我题了签。”

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毕业纪念册》中所收录的教职工名录，到本届学生毕业时止，除校长唐文治外，国专无锡本部的教职人员为：教务主任冯振，总务主任蒋庭曜，教授：朱东润、俞瑞徵、丁儒侯、王震、冯励青（字勛纯，生卒年不详）、王庸（字以中，一九〇〇～一九五六）、李笠（字雁晴，一八九四～一九六二）、吴白匋（原名微铸，一九〇六～一



九九二)、周葆儒(生卒年不详)、季锡五(生卒年不详)、杨泽中(生卒年不详),副教授:欧阳革辛(生卒年不详)、蒋庭荣,讲师兼生活主任谢随知(字寿康,一九一四~一九九一),讲师郑学韬(字公略,韬一作攷,生卒年不详),会计童舜琴(字咏南,生卒年不详),教务员蒋子敬(生卒年不详)、陈亚南(生卒年不详),书记陈竹香(生卒年不详)。

一月放寒假,冯振辞去无锡国专教职回广西北流。本年暑假后改任南宁师范学院教职。冯振辞职后,校长唐文治任命蒋庭曜担任无锡国专教务主任,冯励青担任总务主任。

冯振《自传年表》(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由无锡携眷至杭州……二月四日,回北流山围……暑假,应南宁师范学院之聘……”

王翌群《终身受用的教益——忆冯振老师》(见《冯振纪念文集》):“一九四九年一月放寒假,老师照例回到广西老家过农历年,但开学后就没再回无锡,听说是改去南宁师范学院任教了。”

蒋庭铨、蒋劭《蒋庭曜生平事略》:“一九四九年,冯振因病返广西。唐校长命他(按:指蒋庭曜)接任教务,总务主任由冯励青担任(冯已参加中国共产党)。”

三月,中共华中工委调研室编印《无锡概况》,以为解放军接管无锡城作准备,该手册中记载了无锡国专当时的基本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城区人民革命史》(见《迎接黎明: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城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无锡工委于一九四八年冬派邱宝瑞、胡斌、余铭青三人组成工作小组,由邱宝瑞担任组长。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包括利用报纸、书刊、电话簿等,进行社会调查,广泛收集情

况，摸清了国民党无锡党、政、军、警、特机关各部门，以及重要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医院、学校、电台、航运公司等分布情况；社会上层人士包括国民党党、政、军的重要人物和工商界人士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政治态度、经常言论、与各阶级的关系及现实表现等，整理了约二百人的情况，送往苏北解放区。中共华中工委调研室根据这些材料以及无锡地下党其他系统收集去的情况，汇编成一本手册《无锡概况》，为后来解放军接管无锡城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无锡概况》编印于一九四九年三月，该手册在“私立学校”的“大学之部”记无锡国专的情况云：“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该校创设于民国十年，原名国学专修馆，十五年改名国文大学，十六年改名国学专门学校，十七年改今名。校址学前街，校长唐文治。教职员二十人，名单如下：冯振、王震、蒋庭耀[曜]、朱世溱、俞瑞徵、丁儒侯、冯励青、蒋庭荣、欧阳革辛、沈武、梁崇辅、李雁晴、陈雪尘、吴白甸、杨泽中、左季明、徐万里、陈奇馥、蒋子敬。共设三科十级：三年制国学专修科、五年制国学专修科、二年制文书专修科；学生男一百七十六人、女十六人，共计一百九十二人。”名单中的朱世溱即朱东润。

四月二十三日，无锡解放。二十四日，无锡国专的师生在总务主任冯励青带领下，与无锡其他学校的师生一起，欢迎入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姚方勉《护校斗争、迎接解放军入城和接管工作的回忆》：“……当时指定我以原教育局的名义（我原任伪教育局学校教育课长）通知和指挥可以通知到的学校，组织师生，集队上街游行，热烈欢迎解放军解放无锡人民。好多公私立学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带领学生手执红旗，整队出发，经城

中心崇安寺，出老北门，过露华弄，进光复门回学校。队伍比较分散，但人数不少（据《无锡解放十年大事记》载，那天各界欢迎队伍，共一万人）。学校师生队伍所经之处，沿途群众，笑逐颜开，掌声彼落此起，表示了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烈欢迎。有几个学校的队伍还到崇安寺小学来（我住在这所小学里）。记得当时私立中国文学院（原国学专修学校）的欢迎队伍是冯励青同志带领的，与我会过面，未交谈。”

按：上文中“私立中国文学院（原国学专修学校）的欢迎队伍”云云，误，此时无锡国专尚未改名为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

无锡国专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段永昭、沙金寿、许增祺、陈厂梅、王如切、俞豫成、周濯清、刘达江、陆振岳、王冠、陈元康、朱君遂、荣炜昌、刘则文、李有能、吴超、吴志远、夏云璧、钱瑞霞、漆同汝、戴啸涛（以上为三年制国学科）、王语参、朱国勤、孔令猷、吴志清、齐鸿源、程燮昌、蒋芟生、孙鹏、沈俊华、周志钧、梁志成、费珣（以上为二年制文书科）、王盛生、龚立言、吴朝学、李立德、李美材（以上为五年制国学科）等三十八人（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学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毕业考试委员会名单、毕业考试科目、毕业生成绩表·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

本届毕业生中的陈厂梅（厂同庵，后改名陈征，一九二八~），在无锡国专读书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他后来长期从事《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的一个开端。

陈征《我与〈资本论〉的不解之缘》：“一九四七年，我在中国文学院读书时，出于好奇从同学处借到一本《资本论》，感觉很有兴趣。有同学见到后问：‘你想当资本家吗？’



我哈哈大笑说：‘要当资本家就不能读《资本论》，读《资本论》就要反对资本家。’其实，当时对《资本论》并没有读懂，只是从薛暮桥《大众经济学》的小册子中略知大概。一九四九年在苏南公学工作时，由于企业财务管理系的政治经济学课没有人教，领导要我边学习、边备课、边教课。当时，我的教材只有狄超白的《政治经济学通俗讲话》，只好死啃《资本论》。谁料想，我由此对《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便成为我终生教学与科研的方向。”

按：陈征原名陈厂梅，后曾长期致力于《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以及马克思经济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专题研究。

本届毕业生中的朱君遂，是时在无锡国专任教的朱东润的次子。朱君遂毕业前夕，朱东润把自己的旧作《木芙蓉歌》写成四幅屏条送给他，并给他的同班毕业的同学每人写了一幅立轴。毕业后不久，朱君遂与同在本年毕业的无锡国专学生秦允明结婚。

《朱东润自传·六年流转》：“……国专也在变动中挣扎，四月里，无锡解放了，大家准备迎接这个新的时代。不管时代是怎样的动荡，君遂这孩子毕竟读完了专科学校。我的子女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少，但都没有像君遂这次毕业给莲舫和我的喜悦大。我为他写了四幅屏条，写的是《木芙蓉歌》，篆书，可惜是写在蜡笺纸上，不能经久。同时我为他同班毕业的同学，每人都写了一幅立轴，或篆或隶。我总感到一个人能够好好读完高等学校的课程，不但需要自己努力，还需要同学的帮助。这一年暑假前，君遂结婚了，娶的是秦允明，无锡人，国专同班同学，也是这一年毕业。子女婚姻，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秦允明《朱东润先生和他的“木芙蓉屏”》（见《朱东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九四九年暮春，父亲（按：指朱东润）在国专执教快三年了，我与君遂准备毕业后结婚，父亲处处关怀和赞助我们，两个青年人似乎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一天，君遂忽然兴冲冲地来告诉我，爸爸要为他写四幅屏。看到他受宠若惊的表情，我也高兴起来，并笑着说：‘笺纸用我家的好吗？’不等他回答，就把我父亲留下的一大卷洒金腊笺纸取出、摊开。其中有许多颜色，我们挑了红、黄两张。他就在这里小心翼翼地用小刀裁开，卷着回宿舍。事后他又为父亲细细的刻了两方印章，虽然父亲有好多印章，这一次却用儿子的。因为君遂跟无锡朱松厂先生学治印，初见成效，我们懂得父亲的心意。过了两天，君遂又来了，一进门就说：‘真了不起，我为父亲磨足了墨，他老人家提着笔一写到底。’一面还摹仿父亲写字的姿势，这下我也吃惊了：‘他不累吗？’‘也许有点，可是不一气呵成，墨色、字样、笔力就不会那么匀称呀！’写完后，他坐了一会，才洗手喝茶呢。’我急着问：‘那么，字呢？’‘字嘛，我父子俩把它送进裱糊店去啦！急什么，反正要拿来的。’过了些时，四幅条屏挂上墙了。这里爱好书画的人都有一个逛裱糊店的习惯，或是欣赏自己上墙的作品，或者是参观、评论别人的。这一次可轰动了无锡书法界：有参观的、赞赏的、摹拟的、评论的……甚至还有人愿以米和金子来换的……”

陈征《忆润师》：“我毕业前，润师兼任江南大学教授，他特地用篆书写了一个条幅送给我作纪念，内容是厉鹗的一首七绝，我把它作为珍贵文物加以收藏。”

七月八日，经苏南行政公署准予备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改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无锡中国文学院计划中将分设文



学、史地、哲学三系，由唐文治任院长，王遽常为副院长，严济宽为秘书长，钱海岳（一九〇一～一九六八）为教务长。

浦耀煌《锡市中国文学院前日补行开学典礼》（见《苏南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无锡中国文学院的前身，原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解放后，全体师生，一致认为应改革教学内容和教育法及种种的制度，才能赶上新的时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培养建国人才。于是师生自动组织了革新委员会，经师生共同努力下，经本年七月八日苏南行署准予备案，始正式改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改革后，师生们都热烈参加了锡市的各项社会活动，并组织各种学习小组，参加了暑期研究会，得到了新的知识与锻炼。开学后，全校空气有很大转变，师生团结甚为融洽，为国专有史以来所未有。”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己丑八十五岁》：“八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准苏南行署，改为中国文学院，分文学、史地、哲学三系。余任院长。聘王生瑗仲为副院长，严生济宽为秘书长，钱君海岳为教务长，蒋生庭曜、朱生东润、冯生励青等为教授。”

按：据《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委员会（三十八年度）第一次会议纪录》（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该次会议上决议追认改制前最后一次校务会议议决的原有班级归并办法，原有的三年制国学科的班级都归并入文学系，经归并后的班次为：预科甲组、预科乙组、文学系一年级甲组、文学系一年级乙组、文学系二年级甲组、文学系二年级乙组、文学系三年级甲组、文学系三年级乙组。可见无锡国专改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后，虽计划将设文学、史地、哲学三系，但当时的已有班级皆属文学系，史地系和哲学系尚未及招收学生，还只是一个“空名”。又，该次会议上还讨论到

原有的二年制文书科学生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会议决议：一、自愿转入本院文学系者，准予按照班次插入，并补读必修科目；二、如有请求保留原科者，应俟报请苏南行署核定后办理。

从七月二十七日起，无锡中国文学院在《苏南日报》上连续登载广告，招考本科一年级各科新生五十名及二年级插班生二十名，预科五十名。

《私立中国文学院招男女生》（见《苏南日报》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本院原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准苏南行署改院。科别：一、本科文学系、史地系、哲学系。二、预科。学额：本科一年级各科新生五十名及文学院二年级插班生二十名，预科五十名。报名日期：自八月八日起、考试前一日止。考期：八月十四日。校址：无锡学前街。中国文学院院长唐文治。”

按：可能是八月十四日的那次考试没有招满预定的名额，中国文学院后又继续在《苏南日报》刊登广告，于八月二十七日 and 九月十二日两度进行考试，续招新生。

九月十日，苏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复函无锡中国文学院秘书长严济宽。此前，严济宽曾致函苏南行署教育处，建议将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三校合并为苏南文学院。苏南行署教育处在复函中称“意见甚是，惟以各级私立学校尚需长期存在与发展，所请三校改为公立，尚非其时”。

九月二十二日，无锡中国文学院正式上课。本学期开始的新增课程，有俄文、辩证唯物论等，其中俄文为第一外国语课程（英文为第二外国语课程），约请龚中白（生卒年不详）担任，辩证唯物论课程约请王士菁（一九一八～）担任。原有

课程中，词曲研究及中国通史两课约请吴白匋担任，地理及社会科学概论两课，约请孙建中（生卒年不详）担任。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三十八年度）第一次会议纪录》（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四、教务处提：请确定本院正式上课日期案。决议：（一）定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四）起正式上课，在未正式上课以前先上临时课。……五、教务处提：本院文学系外语课程如何确定案。决议：（一）定俄文为第一外国语，英文为第二外国语。（二）俄文课：文学系一年级为必修，二、三年级选修。（三）英文课：各年级及预科均得选修。”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二、教务处报告：本院新设课程俄文课已约请龚中白先生兼任，辩证唯物论一课已约请王士菁先生兼任，原有课程词曲研究及中国通史两课已约请吴白匋先生兼任，地理及社会科学概论两课已约请孙建中先生兼任，以上约请已得其本人同意，待报请行署核定。”

《复严济宽建议将无锡私立中国文学院、苏州美专、正则艺专三校合并为苏南文学院的信》（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见《中国文学院关于更改校名、校长训词、聘请校董、接管附中机构、四九年度毕业生名册、统计表、学生处分、苏南行政公署有关文件》）：“严济宽先生：前接先生来函，建议将无锡私立中国文学院、苏州美专、正则艺专三校合并为苏南文学院，意见甚是。惟以各级私立学校尚需长期存在与发展，所请三校改为公立，尚非其时。关于公费补助，在未有统一办法及准备以前亦未便先行单独办理。愿能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下加以

改善，力求符合人民之需要为盼……”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时，无锡中国文学院补行开学典礼，并庆祝改院成功及附中成立。院长唐文治因年迈体衰，未能赴锡参加，嘱托王蘧常赴锡，代为主持典礼，并代诵唐文治所作演讲辞一篇。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管文蔚等人，都亲临道贺并作发言。同日晚上六时，中国文学院举行庆祝会。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录》（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秘书处提：本院开学典礼及庆祝会决定日期及时间案。决议：决定本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时举行开学典礼，下午六时举行庆祝会……”

浦耀煌《锡市中国文学院前日补行开学典礼》（见《苏南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锡市学前街中国文学院于十五日补行开学典礼，并庆祝改院成功及附中成立，到各界来宾、校友及全体同学五百余人。仪式于上午九时举行，王璠仲副院长特自沪赶来代表唐院长主持大会，并特请锡市军管会管主任、苏南行署教育处陶副处长、市委宣传部长陈野苹及市教育局长陈枕白等莅院指示。会上管主任指出：要确定学习方向，学习现实，为大众服务，做一个新型的文学家。陶处长也说：学校革新，要有计划、有步骤，师生合作，和衷共济，把形式的变更，进行到内容的变更。其他各首长也都希望同学，紧紧跟着时代前进，不做时代的落伍者。同学们也表示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教育方针及各首长的指示，作为学习的准绳，做到理论与实践一致，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在师生连日积极筹备下的盛大的迎新晚会，亦于下午六时进行，来宾



师生济济一堂，节目精彩非凡。当晚会正在进行时，广州解放消息喜讯传来，会场台上台下的人，都欢呼起来，更替大家增添了兴奋的情绪……”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己丑八十五岁》：“十一日，嘱王生瑗仲赴锡，代余主持中国文学院改院成立庆祝典礼及补行开学典礼大会。余作演讲辞一篇，由瑗仲在会宣读。当时，自苏南军管会主任管文蔚以次，皆来道贺。极一时之盛云。”

《校长唐文治在中国文学院开学典礼并庆祝会上的训辞》（见《中国文学院关于更改校名、校长训词、聘请校董、接管附中机构、四九年度毕业生名册、统计表、学生处分、苏南行政公署有关文件》）：

“今日为本院举行开学典礼并庆祝会，严君伯侨及诸同人函招到锡演讲。鄙人因道远，未克亲诣，特属副院长王君瑗仲代表致辞。诸生均系英年好学之士，前途未可限量。前鄙人有赠同学诗句云：孟坚人表昭然揭，我辈相期第一流。按古人有三不朽事业，曰立德、立功、立言，即圣门四科之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端之义。往者湘乡曾涤笙先生谓立功须乘时会，而立德、立言则修之在我；立德在品行，立言在著作。诸生能熟读鄙人所著《孝经救世编》、《孟子救世书》及《紫阳阳明学术发微》，自有会悟。兹特将立品要旨指示如左：

立品之要，旨在清廉。近时多有才气过人之彦而不免堕入贪鄙者，实属可惜。须知《论语》言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孟子》言舜跖之分，在利与善之间，善即义也。《周易》乾卦言以美利，利天下。盖溥其利于天下，是为美利；敛其利于一己，即为私利。义者宜也，利物足以和义。利字刃列于旁，若如《大学》所言，以身发则，则必至于自杀，且杀其子孙

矣。孟子言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吾尝窃补之曰：杀人之子孙，人亦杀其子孙。吁！可畏哉。往日讲学，必首揭义利之辨，若一涉贪污，譬诸退入淤泥，终身无自拔之日矣。故余律己教人，务在廉洁。未有操守不廉而能办大事者也。

次之宜敦谦和之行。《易传》言保合太和，《尚书》言同寅协恭，和衷哉。《诗》言既和且平，礼之用和为贵。大乐与天地同和，和者天地之中气，人受天地之中和以生，凡食五谷之伦，未有不得中气者。和气之反为戾气，和气盛，则致太平；戾气盛，则酿劫运。世未有不能谦和，而能与人共事者也。

又进而言之，惟有为善一事。孟子以孳孳为善称舜徒，乐善不倦为天爵。居今之世，强为善而已矣。何以谓之强？凡力量有不足，则强勉以图维之；凡环境困难，则尽力以排除。善机善缘善因善果，随地皆是。余平素最爱《论语》‘两如不及’，一曰‘学如不及’，学问无止境也；一曰‘善如不及’，善几往而不可复返也。或曰为善须有实力，曰不然。善字从羊从口，羊跪乳，观其情状，而知孝为万善之源也。约之于口者，若无实力，则苦口提倡亦功德也。且居今之世，戈铤满地，正为善大好机会。孟子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吾辈而不为善，谁与救人哉。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清初汤潜庵先生（讳斌）常言能以此二语，常存于心，即可上达天德。纵观近世百姓困苦，奚啻孺子入井，安得不动怵惕惻隐之心乎。《礼记》言人者，天地之心。深望好善之士，切实共勉之。

更进而言之，则自新以新民是矣。《大学》引《汤盘》‘日新又新’，《康诰》‘作新民’。朱注云：‘振其自新之民’。

《论语》、《中庸》均言‘温故而知新’。知新有在温故中者，有在温故外者。余尝谓学问事业，不论新旧，惟在实事求是，适用于今世而已。《易传》言‘进德修业’，而扩充之则造于盛德大业，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富有者德行无不周备也，而盛德必归于日新。故又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圣人以此洗心，洗之俾日新又新也。世界一日不新，则晦蒙而否塞；人心一日不新，则含垢而纳污。人心与世界，相为维系，世界皆人心所造成，此经传中新民主义，幸诸生熟习之……”

十月二十日，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议决，原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太湖之滨、宝界桥畔购置的新校基地，暂拨附中开办农场；在使用期间，所有税捐及地上收益均由附中负担与支用（据《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纪录》）。

十一月四日，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会议召开临时会议。据学生会报告，有学生汪积镛、陆健二人“有意捣乱学生会，破坏同学团结，阻碍学校进步”，院务会议决定开除两人学籍。第二天，学校将此决定报告苏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呈请批准。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临时召开院务会议纪录》（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临时决议：一、根据学生会报告，汪积镛、陆健二同学有意捣乱学生会，破坏同学团结，阻碍学校进步，经全体同学召开检讨大会，一致决定撤消二同学学生会会籍，并提请取消学籍，以肃校风案。决议：汪积镛、陆健开除学籍，检同学生会报告暨附件呈请教育处核示后公布……”

《呈苏南行署教育处》（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发文稿簿》）：“……案据本院学生会十一月四日报告，略以‘汪积镛、陆健二同学，有意捣乱学生会，破坏同学团结，挑拨师生感情，破坏校誉，假借党团名义，招摇诬蔑等行动。经全体同学召开检讨大会，一致决定取消该二同学学生会会籍，并提请院务委员会取消学籍，以肃校风’等语，当即召开临时院务会议，决议汪积镛、陆健二生破坏同学团结，阻碍学校进步，应予休学，是否有当，为特检学生会报告暨附件四件，备文呈请钧署鉴核示遵……”

按：后苏南行署指令“准予备案”。

十一月下旬，根据原有的文书专修科全体同学的联名呈请，经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拟将文书专修科改为国文专修科，学制仍为二年。会后，即将此讨论结果备文呈请苏南行署核示批准。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纪录》（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六、教务处提：据文书科全体同学要求，改称为本院国文专修科，是否可行，付公决案。决议：呈请苏南行署教育处核示办理。”

《呈苏南行署教育处（呈请本院前设文书专修科拟改名为国文专修科敬祈核示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发文稿簿》）：“案据本院文书科姚弘道、张华铮等全体同学联名呈称：‘自解放以来，政府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关于教育一项，尤能适合新时代之需要，做到理论与实践一致，以期培植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有用人才。窃本院文书一科，原系伪教育部指令，欲造就文书人才，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于今新时代变易，不合理之旧教育制度，均须逐步

改革。今虽无文书科之课程，而有文书科之旧名，揆诸情理，殊不确定，亟宜正名，以符实际。又生等考入文书科之动机，原为家庭经济困难，只能作二年之准备。今虽有转系肄业之心，奈力有所不逮。务恳体察实情，转呈苏南行署教育处，予以正名，并仍旧保存原有该科学制，准予生等二年结业，庶名实相符，事理无悖’等情。据此，查文书一科，系一九四二年秋，伪教育部拨款指办，所有课程，全系供旧时政府机关处理公文及旧社会应酬作品之用，实不合于今日。迨江南解放后，本院有鉴于此，故将文书科之原有课程，全部更易，主要课程，大部归入文学系内合并上课，以符实际。但欲使该科原有肄业学生转入文学系，则该生等迫于家庭经济情况，无力负担，势必中途辍学，不能按照原有年限，告一段落。此亦系本院在改院以后所以不能将该科合并之主要原因。兹据所称各节，俱属实情，当经提交本院第七次院务会议讨论，拟定名为国文专修科，学制仍为二年，庶能切合实际，而又使该生等得按照原有年限予以结业。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敬祈鉴核示遵……”

按：无锡国专更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并设文学等系后，原有的文书专修科便无从归属；而且这一专业的设置，在当时被看成是“不合理之旧教育制度”的产物，所以在更名之初，院务委员会即议决文书专修科的学生有“自愿转入本院文学系者，准予按照班次插入，并补读必修科目”。但这样一来，二年制变成了三年制，许多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力负担，故有将文书专修科改为国文专修科、学制不变的请求。苏南行署在接到呈文后，指令该校“将实施方针、内容、方法报审再夺”，此事之最后结果不详。

十一月至十二月间，无锡中国文学院分别致函苏南行署教

育处、无锡县人民政府和开原区及湖山乡人民政府，因学校经费困难，请求免除其宝界桥畔新校基地应缴的累进税暨全部公粮。

《呈苏南行署教育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发文稿簿》）：“查本院于一九三六年购置校基四十余亩（现暂根据旧地籍整理之通知单登记五十二亩一分五厘），坐落扬名乡（即今湖山乡）之宝界桥附近。嗣因抗日军兴，本院内迁，未及建造。今秋由本院附中建造校舍，办理农科暨农场，芟刈芦苇，垦辟草莱，渐著成效。惟本院暨附中经费均感十分困难；而所有地基，一面濒湖，多系芦塘，实际可耕者仅占二十余亩。现正在整理开辟中，尚未全部生产。兹根据苏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凡学校与慈善团体及公私学校之土地，得免征累进税；如办有成绩，经费确系困难者，可得请求减免一部或全部公粮。’为特备文，呈请鉴核，可否俯念本院经费实际困难情形，准予转函无锡县人民政府，免征上项土地之累进税暨全部公粮，以利教育。现值开征在即，尚乞迅赐办理……”

按：此后又有分致无锡县人民政府和开原区及湖山乡人民政府的呈函，内容与上文略同。

国专沪校

国专沪校一九四八年冬届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庞左同、沈茹松、徐家安、王馥清、萧善芴、孙渊、冯忠俊、崔阜年、张耐安、郭本桥、赵承甲、俞萃效、林反校、陈士标、沈应芬、周惠钧等十六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历届毕业同学名录》）。

农历正月，沪校开课（据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

生年谱续编·己丑八十五岁》)。

四月八日，唐文治致函教育部，要求增拨本年度补助费。

唐文治《呈请增加本年度补助费俾资维持由》(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八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教育部部长杭：查本校去年受战事影响，一部分陷区暨远道学生，因救济断绝，交通阻隔，校方当不能坐视断炊。除向地方当局借拨一部分食米外，余均由校方筹措。本校既受市面金圆贬值影响，又须筹陷区暨远道学生膳食，致本校经济陷入万分困境；加以本学期开学，因局势关系，学生减少三分之二，而一切支出仍须照常，实属无法维持。敬祈钧部赐予增拨补助费，俾资救济而利教育……”

按：此件上有批语云：“该校近况不明，此件拟存查。”

四月十八日，唐文治再次致电教育部，要求拨发本年度文书专修科特别补助费三亿元，国学专修科特别补助费二亿元。

唐文治《电请赐拨文书专修科特别补助费三亿元国学专修科二亿元由》(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教育部杭部长钧鉴：查本校学生大都来自远方，尤以皖北徐属为众。去年限价突破，金圆券贬值，员生不能维持，曾向当地粮商借米五十余石，以济眉急。今岁又受时局影响，学生人数锐减，经常开支尚难筹措，而所借之米又不能不如数清偿，经济枯竭，已陷绝境。窃念文书专修科为钧部所指办，向拨有专款，用特电请钧座赐拨文书专修科特别补助费三亿元，国学专修科二亿元，以救危急。员生幸甚，教育幸甚……”

按：此件上有批语：“该校近况不明，此件拟存查。”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

国专沪校一九四九年夏届毕业生于七月毕业，毕业生计有

徐汝京、林鹤年、杨光泽、费宝殿、程彰鹤、李来荣、毛德乾、桑履贞、曹道衡、刘光宇、范敬宜、顾浩、周承彬、李慧云、周传璞、陆鼎铭、金甲、朱诵文、许威汉、沈志明、林迪礼、徐叔九等二十二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历届毕业同学名录》）。

本届毕业生中的范敬宜（一九三一～二〇一〇）在考进国专沪校时，只有十五岁；而他在考进国专沪校之前，只读过一年小学，其余时间都是在家中跟随母亲读书长大。在国专沪校毕业后，范敬宜又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在两年后于该校毕业。

沈宁《与大师谈大师》：“……范伯伯（按：指范敬宜）吸一口烟，悠悠地道来：他刚考进无锡国专的时候，不知怎地，唐文治先生听说新生里面有个范敬宜，是北宋文豪范仲淹先生的嫡传后代，便命人将范敬宜叫来，要看一看他。范伯伯听说被唐文治先生传唤，心里又喜又怕，进了唐先生房间。唐先生是双目失明的老者，听见人呼范少爷到，便马上从座位上站起，弯腰打拱道：文正先生的后人来了。见唐先生这一大礼，慌得范伯伯不知如何是好。唐先生又叫范伯伯到跟前，伸出双手，说是要摸摸范伯伯的眉骨，揣摩文正先生当是如何的容貌。讲到这里，范伯伯声音有些发抖，熄灭了手里的香烟，叹道：唐先生那样，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我那时不过是个十五岁的新学生。唐先生那么做，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古人前辈的崇拜，是对文化学问的恭敬，真是震撼我的心……范伯伯考进无锡国专之前，在所谓正规学校里只读过一年书，而且是小学。他自幼多病，几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家里度过，跟随母亲读书长大。同时也在家里，随美国留学的姑母学习英文。又由母亲安排，从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习画，还经吴

湖帆大师指点。做诗则曾受南社诗人顾佛影先生亲授……在这样诗书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成为学问家。范伯伯十五岁时，跟随母亲在上海荡马路，偶然看到无锡国专招生，起了上学的念头，获得母亲支持，随即报名入考，竟然一举得中……”

熊光宗、高健《中华百家姓·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凭借深厚的文化功底，范敬宜考入了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四年之后，范敬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鉴于他的实际水平，学校特准其直入三年级。这一年，范敬宜刚满十八岁。一九五一年，范敬宜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本届毕业生中的许威汉，一九四六年报考国专沪校，以第二名被录取。本年毕业后不久，许威汉又考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许威汉《缅怀追忆恩师——一代文化巨人唐文治校长》：“一九四六年我报考无锡国专这一届，在数百名考生中，最后录取的也只有四十来名。考试科目，除数理化外语外，文言文是重点，作文题目常是与爱国、治国、为民、躬行等内容联系在一起……发榜排名次序以考分高低而定，前三名得由恩师亲自审定（当时眼病重，由近身助手诵读）。恩师出的题目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源自《老子·六十章》，碰巧我少年时熟读《孙子》，《孙子》有个别地方与《老子》提法有相关，参阅过《老子》，记得‘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有点‘幸运’感。不过仔细一想，脑海转而浮现另一直感：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此有如科举取士的试题，未免不合时宜。虽不是语出‘四书’，要求写八股文（按：少年闲趣，学写八股，视非行文正轨）毕竟有乖时势，

心境不自在。然念及无锡国专久有盛名，仰慕有时，求学心切，还是一时性起，把题目出处在文章开头就点出来，然后大模大样的发起议论来。交卷之时，仍觉得有点幸遇。过后却又不自信，当晚深味一翻，转觉多有不妥之处，更有惶恐不安之心。再往坏处想，自度会被视为纸上谈兵的蠢才，不能自己。然终受恩师错爱，榜上有名，忝列第二（第一名是祁虎文，现为福建公安厅离休干部；第三名是金甲（他入学前就发表优秀小说散文，毕业后耕耘不懈，在重点中学校长任上退休）。说实在的，较之其他二位（第一、第三名），我的语言文学驾驭能力远有所不及，大概在内容的阐发方面有可取。”

按：上文中提及在一九四六年国专沪校录取的四十多名考生中，第一名为祁虎文，第二名为许威汉，第三名为金甲。而在上录的“一九四九年夏届”毕业生名单中，有许威汉、金甲却无祁虎文之名。据祁虎文《报国情殷友谊深》（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二十一期）一文中记，一九四九年七月“我（按：指祁虎文）等九名国专学生参加华东随军服务团，酷暑行军，翻山涉水，南下福建……虎文南下后，长期工作于福建省公安厅，任务繁重……”，则祁虎文似是未及在国专沪校毕业，便已参加华东随军服务团而南下福建。

许威汉《语文教研历程片段》：“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出路来了，同学们再也没有‘毕业即失业’的后顾之忧，纷纷踏上革命征途：有的参加南下工作团，有的参加革命大学学习，我也在这年八月报考华东军政大学（陈毅任校长）。华东军政大学前几批的学员不论学历，入学后即随军南下。最后一批规定大专毕业或大学三年级肄业的学历才能报考，以准备留学苏联，我是属于这最后一批的学员。在这个时期，我学到新知识，懂得许多革命道理，思想由封闭转向



开放，生活也有如由沙漠进入清流之境。从上海解放到参加军政大学学习，前后时间虽然仅有两个多月，而我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却在这段短时期里确定下来了，为我后来的生活、学习与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义十分重大。”

本届学生毕业前后，筹印毕业纪念刊，唐文治为作《训辞》，又一次以自作“孟坚人品昭然揭，我辈相期第一流”的诗句和“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骨气〔气骨〕撑”的联语勉励毕业同学。

许威汉、金甲《缅怀先师唐文治老校长》（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集》）：“……记得一九四九年筹印乙丑级毕业纪念刊时，师（按：指唐文治）应生徒之请作《训辞》，述校史，在《训辞》中又一次以自作‘孟坚人品昭〔昭〕然揭，我辈相期第一流’的诗句和‘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骨气撑’的楹联勉励毕业同学。校史结尾又写道：‘《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剥极而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师关心祖国命运，相信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已经在望，并以此激励同学。”

按：乙丑级毕业纪念刊未见。

一九五〇年（庚寅）

国专沪校一九四九年冬届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龚薇卿、陈龙海、袁振鹏、周秉弦、邱锦铭、辛品莲、张源洁等七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历届毕业同学名录》）。

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于一月毕业，毕业生计有王翌群、宋潜深、邓志恭、冯寿耆、谢乐文、林群婵、冯俊森、吴学舜、吴家厚等九人（据《中国文学院关于更改校名、校长训词、聘请校董、接管附中机构、四九年度毕业生名册、统计表、学生处分、苏南行政公署有关文件·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一九四九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这是无锡中国文学院唯一的一届毕业生。

冯俊森《全面继承师德 弘扬中华文化——纪念冯振先生降诞一百周年》（见《冯振纪念文集》）：“我一九五〇年毕业于无锡国专，那时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批准，已更名为中国文学院。我们八位同学是中国文学院空前绝后的一届毕业生。之后，中国文学院即因院系调整而结束。”

按：冯俊森文中记本届毕业生有八人，而据上引《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一九四九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册》则实有

九人。

又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中，有《锡校一九四八年冬届上学期在校同学名录》，其中“旧三乙”有段永照、周濯清、刘达江、陆振岳、朱君遂、王如切、刘则文、李有能、荣炜昌、吴超、漆同汝、俞豫成、陆元康、吴志远、戴啸涛、许增祥、沙金寿、王冠、夏云璧、钱瑞霞等二十人，“旧二乙”有蒋柏生、宋厚训、张志刚、朱叔如、赵志善、黄长年、张连仪、符东明、胡秉忠、匡一峰、卞祥椿、匡毕庚、李永藩、赵永玲、金景懿、王子方、张增元、徐半农、王钦锡、蒋衡康、唐世燃、黄旭暹等二十二入，“旧二甲”有宋潜深、冯寿耆、谢乐文、顾昌寅（本名顾昌已，入学时用“顾昌寅”之名注册）、王翌群、邹俊等六人，“旧一甲”有王其铮、张鸣皋等二人，“旧一乙”有何昌杰、王冠伦、黄世承、吴锦培、张继德、胡焕章、安定、陈淙、李同芳、戴家英、张维世、肖元培、任其怡、潘年、史逸文、唐子琦、余春光、卞祖芳、洪飞、吕侠、余铭、庄俊、张德伦、陈则程、史君奎、谷天祺、郭广伟、冬庆生、袁丕基、杜庆禄、朱国勤、张希贤、严潜、吕兴华、李一萍、王焕英、刘乾、王正贤、郭景熙、颜克源、郭宗泽、张荆、郑嘉真、查元泽、吴荫北、李颖生、徐首钧、王实行、赵文炯、郭有斌、胡鹏飞、纵凌封、王佩之、曾宪扬、朱应容、睦馥桂、连环、曹伯范、辛嗣大、吴志清、李筠、刘传曾、魏承麟、邓重光、王明炆、姚弘道、徐文道、章廷棵、蒋元达、张满堂、杨海麟、章寿眉、李学颜、诸福梅、晋开盛、曹鸿兴、胡虜平、林自成、宋恩宽、江曾铭、曾伟志、刘朝善、罗国材等八十三人，“文一乙”有冯正行、胡儒保、康年、汤蔚深、杨志成、肖梓梧、王笃本、夏时雨、曾瑞麟、吴大声、黄素坤、杨义元、吴新源、周鑫生、陈辰生、

张立鼎、田惠民、滕世孝、吴建堂、张荃、周骏、黄文蔚、贾若愚、潘清芑、裘忱耀、朱永福、张成治、周聪智、梁文达、吴厚绪、李国佐、王鳌志、童水生、黄济平、张华铮、宋启圣、姚在烈、黄健生、韦郁新、梁道敬、范家驯等四十一人，“新五甲”有吴朝学等一人，“新四甲”有尤步云、黄益隆、吴家厚、冯俊森、吴学舜、李省芸等六人，“新四乙”有梁枝等一人，“新二乙”有李祝鹏、陈醒亚、戴风仪、丁秀岳等四人，“新三甲”有杨厚业、浦耀煌等二人，“新三乙”有金广闾、吴家谦、周建华、吴丽琛等四人，“新一乙”有史年椿、陈明道、殷肇华、王文涣、俞璞成、钱耀道、张建彬、许忠义、黄儒文、张德芳、华望年、孙国宏、魏希贤、薛亚土、牛宗英、孙洪生、孙洪章、郑玉质、闵晓英、张冬修、陈林才、郭家顺、许鹤鑫、雷穆岚、廖潮、朱景范、潘立清、祖明德、卢楨先、吴柏年、江云、耿一介、严云仙、杨汉玉、冯浩然、戴玉璋、丛耀祖、刘体鸿、高猷忠、梁煌陞、吴传钧等四十一人，“新二甲”有朱仪、浦培玉、羊绿萍、吴浩源、陈云翔、杨同蔺、糜新祥、韦尚宽、秦昌宣、秦士滋等十人，“新二乙”又有张海平、巫岫云、陈震之、钱农生、徐宇成、许顺熙、孙敦民、胡孝伊、杨绍基、冯春华、费秉琛、张其安、洪卧麟等十三人。这些学生一九四八年上学期在读，因受时局变化（新中国成立、无锡国专改名并被合并等）因素的影响，除了一部分高年级学生作为“无锡国专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和“中国文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外，其余大部分学生后来毕业于何校，不详。

年初，奉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令，国专沪校并入无锡中国文学院本部。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纪



录》（见《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讨论事项：1. 上海国专请迁本院应如何处理案。决议：由上海国专自行办理结束，学生可转入本院……”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庚寅八十六岁》：“正月……本月沪校奉华东教育部令与锡院合并。”

在国专沪校十二年的办学历程中，先后聘请过许多位知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或兼课，除本书各年事中已叙及者外，尚有徐震（生卒年不详）、鲍鼎（字扶九，一八九八～一九七三）、赵泉澄（一九〇五～？）、蒋祖诒（字谷孙，约一八九〇～一九七五）、吴丕绩（原名丕悌，一九一〇～一九七二）、金德建（一九〇九～？）、陆颂襄（生卒年不详）、方诗铭（一九一九～二〇〇〇）、傅统先（一九一〇～一九八五）、黄胜白（原名鸣鹤，一八八九～一九八二）、高铮（字铁中，生卒年不详）、王绍唐（一八九七～一九七八）、陈懋恒（字樾常，一九〇一～一九六九）、章颐年（生卒年不详）等人。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庚寅八十六岁》：“自侨沪以来，凡十有二年，先后所聘教授如陆颂襄、吕思勉、郝昺衡、周予同、周谷城、胡曲园、蔡尚志〔思〕、张世禄、夏承焘、童书业、王佩诤、葛綏成、李长傅、朱大可、鲍扶九诸先生，皆一时之选，毕业达三百余人云。”

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届〕耄耄，实际上的校务是由王蕴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对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是殚精竭虑地考虑如何办好学校。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谷城（中国通史）、王蕴常（诸子概论）、周予同（经学通论）、蔡尚思（中国思想史）、钱萼孙（诗学研究）、胡士莹（词学研究）、王佩诤〔诤〕（曲学研究和版本目录）、朱东润

(历代文选)、唐庆诒(中西文艺批评)、郝昺衡(中国文学史)、胡曲园(中国通史、逻辑学)、徐震(三礼研究)、鲍鼎(甲金文研究)、张世禄(音韵学)、朱大可(基本文选,经学概论)以及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等在学术上均有成就。”

黄汉文《〈无锡国专杂忆〉补正》：“在沪复课后，王蕴常教授主持教务，更开设哲学、心理学、世界史、亚洲史、外国地理、自然地理等课程，聘请黄胜白、傅统先、王绍唐、李长傅、黄云眉等教授（《杂忆》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来校兼课。”

陈祥耀《对唐茹经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的几点体会》（见《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在唐先生领导、王瑗仲先生具体主持下，聘请专任和兼任的教师，真是极知人善任、名师济济的盛况。除唐先生自己担任《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尚书大义》、《周易消息大义》等课外，还有吕思勉先生担任史学讲座，王瑗仲先生担任《庄子》课，钱仲联先生担任诸子概论、诗选、文选、作诗、作文课，郝昺衡先生担任文学史课，陆修祐先生担任《左传》课，周予同、朱大可先生担任经学概论课，周谷城先生（休假时由黄颖先先生代）担任通史课，胡曲园先生担任哲学、历史课，傅统先先生、王绍唐先生担任哲学史课，鲍鼎先生担任文学课，任铭善先生担任礼制研究课，蒋伯潜先生担任文学课，唐庆诒先生担任西洋文学、英语课，王佩诤先生担任考古学、目录学课，葛绥成、李长傅先生担任地理课，赵泉澄、陈懋恒、魏建猷先生担任历史、地理，章颐年先生担任心理学课，胡宛春先生、陈小翠先生担任词曲课，等等。这是我在三年中的情况。在我进校前不久，还有夏承焘先生担任词学



课，在我休学及初离校时，还有童书业先生、蔡尚思先生担任历史课，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担任文学课。这些教师都是学术上造诣很深的知名学者，他们都是受到唐先生的精神感召，受到王瑗仲先生的隆情邀请，不计待遇菲薄，不计工作繁忙而来校执教的……”

范敬宜《校长的人格魅力》：“……当时，校址借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乐群中学二楼，总共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条件之简陋，恐怕还不如今天最差的短期补习班。可是，这里却集中了当时上海文、史、哲方面最著名的教授、专家，如：周谷城、周予同、王遽常、朱东润、黄云眉、王佩诤、朱大可、童书业、魏建猷、唐尧夫、金德建、吴丕绩、鲍鼎、方诗铭、陈小翠、顾佛影、刘诗荪等等，可谓名流荟萃。即使在当年上海第一流的大学里，这种情况也是绝无仅有的。”

按：将以上五文综合起来看，基本可以了解在国专沪校十二年的历程中，先后有哪些人曾在该校任教或兼课的情况。惟《无锡国专杂忆》、《对唐茹经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的几点体会》和《校长的人格魅力》三文中提到的朱东润，所任教的学校并非是国专沪校，而是国专无锡本部。在国专沪校任教或兼课年月可以考知者，如唐文治、王遽常、陆修祐、张世禄、郝昺衡、夏承焘、胡朴安、胡士莹、吕思勉、周予同、葛綏成、唐庆诒、李长傅、蒋伯潜、徐昂、钱仲联（萼孙）、朱大可、周谷城、许国璋、张仲礼、任铭善、蔡尚思、唐景升（尧夫）、黄云眉、胡曲园、王佩诤、刘文兴（诗荪）、顾佛影、陈小翠、魏建猷、童书业等，已分别见于本书各年事中；任教或兼课年月尚未能考知者，则姑系于本年。

陈以鸿《师门琐忆之二——纪念鲍扶九先生》（见《国学

之声》总第二十二、二十三期)：“鲍扶九先生名鼎，镇江人。精研文字学，于甲骨文尤多创见，有声于时。抗战期间受聘母校沪校。我就读时，鲍先生教本科一年级的文字学，以《说文解字诂林》为课本，并参以己义……除文字学课外，鲍先生还教过我们甲金文研究和公文程式，前者是文字学课的继续，后者则是以应用文为名的一学年课程的第二学期课。”

曹道衡《困学纪程》：“诸子概论是由金德建先生教的，他着重叫我们精读《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等书。结合《庄子》、《荀子》对先秦各家学说的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介绍那些学派的主要观点。这样，就使我对各家学说有个大致的了解。为了理解他授课的内容，我也曾读了《老子》全书、《墨子》中一些篇章，也读过《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少数篇目。金先生早年是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的国学讲习所的，很注意训诂和考订，有时关于某一词汇的解释，往往要介绍多种意见，这对我日后注意对史料的正确理解有很大帮助。”

陈以鸿《师门琐忆之三——怀念高铮先生》(见《国学之声》总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在国专沪校的任教老师中，高铮先生大概要算最年轻的了。他是金山人，南社社员高吹万老人(燮)之孙。当年刚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学系，正留校担任助教，王教务长知其才，特地请他来教我们骈文学一课程。”

五月，无锡中国文学院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庚寅八十六岁》：“五月，锡院同人鉴于一般私校学生锐减，经费支绌，来沪会商，请求政府并入无锡社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语文系，旋奉令允准。教职员工及学生共一百余人，全部转往，而余任



名誉教授，薪水并未裁撤。虚糜廩粟，至为惭恧。”

陆汝挺《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解放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更名为中国文学院，先生任院长。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国文学院将并入苏南文教学院，当时中国文学院的教授、讲师意见不一致。先生闻讯谓汝挺曰：‘今天都在共产党领导下，应服从命令，随潮流办事，岂能再有门户之见！’当时汝挺曾奉先生之命，去无锡深入了解中国文学院的具体情况，可见先生之重视调查研究。”

按：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苏南行政公署决定原在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和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改设公立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院址在无锡社桥原省教育学院。至本年五月，中国文学院亦并入其中。一九五二年九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苏南文教学院为主组成苏南师范学院（后改称江苏师范学院，即今苏州大学），院址在苏州。

又按：据上引《茹经先生年谱续编》中的记载，无锡中国文学院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语文系，唐文治任名誉教授。一九五四年春，唐文治于病情日趋沉重之时，曾对门生王蕴常等人嘱咐：“现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他校合并，是由于百废待举，政府集中人力财力从事建设之需要，将来条件允许，此校仍应力求恢复，这是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望转告诸同门勿忘此旨。”（见《齐心协力恢复母校》，《国专校友之声》创刊号）。又据黄茂如《无锡绿化概述》一文中记，一九五五年，无锡国专于抗战前在太湖之滨、宝界桥东所购置的准备用于建设新校区的三十八亩地被无锡市建设局所接收，辟作苗圃。

附录

本书征引文献

B

《毕业七十载 报国六十年》，钱伟长，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盟讯》二〇〇五年第五期。

《变风社诗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一九四一年印行。

《病废闭门记》，胡朴安，见《胡朴安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版。

《八十自述》，钱伟长，见《钱伟长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

C

《陈中凡年谱》，姚柯夫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陈石遗集》（上、中、下），陈衍撰、陈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六月版。

《陈石遗先生与无锡国专》，宁友，见《文教资料》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陈石遗先生二三事·流风余韵》，陈松英，见《文教资

料》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陈天倪挽朱叔子》，彭鹤濂，见顾国华编《文坛杂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陈旭麓先生传略》，熊月之，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版。

《蔡元培全集》第十四卷（书信卷），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第一版。

《蔡尚思学述》，王武子著，鹭江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版。

《才如江海命如丝——怀沈茹松学兄》，冯其庸，见《文化月刊》二〇〇八年第三期。

《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国学研究所——〈国专校友会集刊〉》，谢泳，见谢泳著《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第一版。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九一一——一九二九）》，苏云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四月版。

《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童教英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月版。

D

《读王遽常先生的书法随想》，冯其庸，见冯其庸著《落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版。

《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龚鹏程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七月版。

《大学组织法》，见《教育法令汇编》第一编，教育部参事室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一月版。



《大学规程》，见《教育法令汇编》第一编，教育部参事室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一月版。

《大爱无语的慈悲仁者》，陶洁、陶天成，见《江南晚报》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四版。

E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版。

F

《冯振纪念文集》，党玉敏、王杰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版。

《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王桐荪，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又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冯其庸：读书·实践·真知——张公者对话冯其庸》，张公者，见雅昌艺术网。

《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周有民，见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四月版。

《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吴令华，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九年七月版。

G

《高子别集》，高攀龙著，唐文治校勘整理，一九二六年印行。

《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唐文治著，一九二五年印本。

《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会编辑，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华东印刷厂印刷，一九三一年六月出版。

《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一号至第五卷第五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出版，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

《国学年刊》，王蓬常编辑，无锡五大印务局印刷，无锡国学专修馆同学会发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国光》第一册，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编辑兼发行，无锡锡成公司印刷，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

《国专校友之声》（自第六期起改名为《国学之声》）第一期至第三十一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校友会编。

《国魂集》，叶长青著，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五年二月出版。

《“国专”散忆》，姚奠中，见《文史月刊》二〇〇二年第八期。

《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余子侠著，山东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版。

《桂林文化大事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桂林市图书馆编，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月版。

《桂阴居自订年谱》，单镇撰，见《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各地来锡采购米粮卷》，全宗号 ML7，案卷号 56，无锡市档案馆。

《甘当绿叶衬红花——记陆景周先生》，黄汉文，见《太仓文史资料辑存》第六辑。

《古典文学专家陈柱》，黎其强，见《玉林文史》第三辑。

《“故人谊重追先哲，始信生应多读书”——记家父与巨

赞法师挚交的二三事》，冯郅仲，未刊稿。

《广西教育通讯》第三卷五、六期合刊，广西省政府教育厅，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

H

《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陆汝挺，见《无锡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怀念钱穆先叔——钱穆宾四先叔逝世十周年忆养育之恩》，钱伟长，见《钱伟长文选》第五卷，上海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版。

《怀念我的老师周贻白先生》，冯其庸，见傅晓航、周华斌编著《场上案头一大家——中国戏剧史家周贻白百年诞辰祭》，知识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八月版。

《怀念邹云翔教授——一位好学不倦的老学长》，黄汉文，见《邹云翔学术思想研究选集》，邹燕勤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

《惠麓同声集》，王先猷等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七年出版。

《护校斗争、迎接解放军入城和接管工作的回忆》，姚方勉著，见《无锡文史资料》第八辑。

《黄侃日记》，黄侃著，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八月版。

《胡士莹先生事略》，陈翔华、陆坚、萧欣桥，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版。



J

《记唐文治先生》，黄汉文，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又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记向培良》，赵景深，见赵景深著《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记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吴溉亭，无锡市史志办公室资料室。

《教育部改进专科以上学校训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版。

《教育部编报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教育部派员视察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有关文件（1941—1943）》，全宗号五，案卷号 20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交通大学校史（一八九六—一九四九）》，《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版。

《精读章太炎》，刘琅编，鹭江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八月版。

《蒋庭曜生平事略》，蒋庭铨、蒋劭，见《武进文史资料》第四辑。

《〈蒋鹿潭年谱考略〉自序》，冯其庸，见冯其庸著《蒋鹿潭年谱考略 水云楼诗词辑校》，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版。

《江苏民报》，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

《近代学者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王川，见《历史教学》二〇〇八年第二十二期。



《经学家陈天倪先生传略》，肖艾，见《益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酒国诗人陈柱尊》，郑逸梅，见《郑逸梅选集》第六卷《名人掌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版。

K

《抗兵集》，王蘧常著，新纪元出版社一九四八年五月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侯德础著，四川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版。

《抗战中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严庆添，见《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独立出版社一九四一年三月版。

《抗战以来的无锡国专》，见《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黄觉民编，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一年七月版。

《困学纪程》，曹道衡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版。

L

《礼记大义》，唐文治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二，无锡锡成印刷公司印刷，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

《礼记目录后案》，任铭善著，齐鲁书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

《老子通证》，冯振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八，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吕诚之先生在无锡国专（沪校）讲课简记》，陈祥耀，见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六月版。

《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七月版。

《李长傅传略》，陈代光、李萍，见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附录，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版。

《卢前诗词曲选》，卢前著，中华书局二〇〇六年九月版。

《鲁迅和周木斋——四十多年前文坛上的一桩公案》，唐弢，见《思想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M

《孟子概要》，陈鼎忠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三，无锡民生印书馆，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名家五种校读记》，钱基博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一年出版。

《缅怀恩师阎宗临教授》，萧德浩，见任茂棠、行龙、李书吉编《阎宗临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版。

《缅怀追忆恩师——一代文化巨人唐文治校长》，许威汉，见《许威汉语文教育文存》，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八月版。

《梦茗庵诗存》，钱仲联著，无锡文新印刷所印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排印出版。

《梦茗庵诗文集》，钱仲联著，周秦、刘梦芙编校，黄山书社二〇〇八年九月版。

《梦茗庵诗话》，钱仲联著，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

《马茂元传略》，吴孟复，见陈所巨、杨怀志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一九九三年八月版。

《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民族卫生的路径》，潘光旦，见《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九七年四月版。

N

《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五月版。

P

《潘汉年传》，尹骐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

《潘汉年传略》，傅绍昌，见《宜兴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

《潘汉年诗文选》，本书编辑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

Q

《钱仲联学述》，钱仲联著，周秦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版。

《钱基博年谱》，傅宏星编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二月版。

《钱基博先生传略》，陈其昌，见《无锡文史资料》第九辑。

《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王绍曾，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一九八七年出版，又见王绍曾《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版。

《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吴新雷等编纂，江苏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月版。



《清晖集——饶宗颐韵文骈文创作合集》，饶宗颐著，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潜励斋初稿》，崔龙、陈荔英著，一九三九年排印本。

《勤奋治学 教书育人——纪念先父郑师许先生诞辰一百〇一周年》，郑永用、郑永芳、郑永乐，见《东莞文史》第二十九辑（东莞近百年文化名人专辑）。

《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刘景山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

R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唐文治撰，无锡民生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唐文治著、唐庆诒补，油印本。

《茹经堂文集》（全六编），唐文治撰，见《民国丛书》第五编（94~95），上海书店一九九六年版；又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辑（31~34），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四年版。

《儒道墨学说》，胡朴安著，安吴胡氏朴学斋一九四三年六月铅印本。

《饶宗颐学述》，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九月版。

《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唐孝纯著，《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发行。

S

《十三经读本》，唐文治辑，一九二四年吴江施肇曾醒园刊本。

《十三经提纲》，唐文治撰，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刊·学生丛刊之一》，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辑，无锡华东印刷厂印刷，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刊·学生丛刊之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辑，无锡华东印刷厂印刷，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1937—1947）》，全宗号五，案卷号545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行政计划、工作报告和在沪复课员生名册（1939—1944）》，全宗号五，案卷号56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科〔修〕学校教职员任免、资格审查等人事文件（1938—1944）》，全宗号五，案卷号290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经费文表（1937—1949）》，全宗号五，案卷号52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生历年成绩表、名册（1944—1948）》，全宗号五，案卷号65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关于中央大学视察员报告书、毕业生状况调查表、毕业生任职情况》，全宗号七，案卷号长期



7, 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呈请立案的报表、公函和上级准予立案的训令、公函》，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 2，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议决事项、聘请教育、经济董事、校董台衔和有关信函》，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 11，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奉部令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对私立学校调查的公函、报表和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训令、指令、公函、批文》，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 3，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院长务委员会会议纪录》，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 19，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发文稿簿》，全宗号七，案卷号长期 6，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关于教员服务奖状、奖助金、久任教员奖金的呈件》，全宗号七，案卷号长期 37，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关于印信、经费的请示、批复、训令、指令和校董名单》，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 14，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报卅六年度第二学期、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名单、成绩、统计表，上级关于验印的指令和补发学生毕业证书》，全宗号七，案卷号长期 55，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第一、第二学期应届毕业生名册、毕业生统计表、毕业考试科目表、毕业考试委员

会名单、应届毕业生历年各科成绩表》，全宗号七，案卷号长期 56，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学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毕业考试委员会名单、毕业考试科目、毕业生成绩表》，全宗号七，案卷号长期 60，苏州大学档案馆。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一九四四年夏排印本。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图书馆目录（旧书之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图书馆编，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

《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张尊五，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十九辑，又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三年来之中国文化教育》，柳诒徵，见《江苏教育》第四卷第一、二期（一九三五年二月），后收入《革命文献》第五十五辑《抗战前教育概况与检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一九七三年九月。

《三河口延陵中学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梅鹤徵，见《武进文史资料》第四辑。

《石遗室诗话》，陈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版。

《石遗室论文》，陈衍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四，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

《史汉文学研究法》，陈衍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四，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宋诗选》，钱仲联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



《尚书大义》，唐文治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六年排印本。

《苏南日报》，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一九五〇年。

《苏州大学校友录（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部分）》，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一九八四年一月。

《施肇曾事略》，施嘉远、周毅平，见《吴江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守玄阁文稿选》，陈柱著，中国学术讨论社一九三八年八月版。

《师门五记》，雨窗，见《太仓文史资料辑存》第三辑。

《孙先生鹤卿纪念碑文》，钱基博，见《南通报》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文艺附刊》。

《孙伯亮先生事略》，邹绵绵，见《无锡文史资料》第三十辑。

《孙庵私乘》，钱孙卿撰，铅印本。

《诗学霸才钱仲联》，赵杏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九月版。

T

《唐文治教育文选》，刘露茜、王桐荪编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版。

《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苏州大学一九八五年排印本。

《唐文治办国专与章太炎讲小学》，黄汉文，见倪明主编《三吴风采》，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

《唐文治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陈其昌，见倪明主



编《三吴风采》，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

《唐文治办学文理并重》，黄汉文，见倪明主编《三吴风采》，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

《唐文治和陆氏三兄弟》，鼎龄，见《太仓文史》第十九辑。

《唐文治生平事略》，朱鉴岷，见《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六辑。

《唐文治先生轶事几则》，许岱云，见《无锡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唐文治老先生的办学精神》，叶劲秋，见《无锡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唐蔚芝先生访问记》，吴德明，见《旅行杂志》一九三六年第八号。

《唐茹经先生政治学》，崔龙著，上海大东书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版。

《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唐庆增著，上海社会科学书店一九三三年四月版。

《唐庆诒：学贯中西的英语大师》，奚兆炎，见王宗光主编《老交大名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三月版。

《唐兰传略》，曾礼，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版。

《通鉴纪事本末书后》，陈衍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一，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



《天风阁学词日记（二）》，夏承焘著，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版。

《逃难寻踪》，阎守诚，见任茂棠、行龙、李书吉编《阎宗临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版。

《陶存煦殉学记》，曼玲，见《越国春秋》一九三三年三十三期。

《太炎讲学记》，钱基博，见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版。

《听于丹，忆于廉》，范敬宜，见范敬宜著《敬宜笔记》，文汇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十月版。

W

《无锡国专在广西》，苏州大学（原无锡国专）广西校友会主编，一九九三年排印本。

《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钱仲联，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又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一九三三年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排印本。

《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初编》，无锡国学专修馆发行，湘鄂印刷公司印刷，一九二三年出版。

《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二编》，无锡国学专修馆发行，无锡五大印务馆印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

《无锡国学专修馆演讲集初编》，无锡美文印刷公司印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无锡国专校友会校友录编写组，一九九一年八月。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陆振岳，见《苏州大学学报》二〇〇〇年第二期。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史》，陈其昌，见《无锡文史资料》第五辑。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吴湑南著，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五月版。

《无锡“国专”与唐文治》，金易占，见《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六辑，又《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七、八期合刊有此文之节录。

《无锡国专杂忆》，杨廷福、陈左高，见《学林漫录》（四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十月版，又见《无锡国专在广西》。

《〈无锡国专杂忆〉补正》，黄汉文，见《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

《无锡国专漫忆》，胡子远，见《文史资料辑存》（常熟）第十一辑。

《无锡国专迁来蒙山办学及黄花学院简况》，谢天球，见《蒙山文史》总第三辑。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慰问电》，见《五二〇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版。

《无锡国专季刊》第一期，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一九三五年五月出版，无锡协成印刷公司印刷。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七年度毕业纪念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卅七年度毕业纪念刊编纂委员会编纂，无锡大成印务局印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出版。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会议纪录》，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8，苏州大学档案馆。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桂校）校董会会议纪录》，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13，苏州大学档案馆。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报民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毕业生名册、成绩、考试委员会名单、学籍表，教育部有关验印的指令和桂校迁回无锡的信函》，全宗号七，案卷号长期47，苏州大学档案馆。

《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刘桂秋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版。

《无锡县经济方面来往公文》，全宗号ML1，案卷号496，无锡市档案馆。

《无锡市教育志》，《无锡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三月版。

《无锡市志》（一至四册），无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

《无锡概况》，中共华中工委调研室编，一九四九年三月印行，后收入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二〇〇九年八月版。

《无锡革命斗争大事记（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无锡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版。

《无锡绿化概述》，黄茂如，见《无锡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

《无受室文存》，任铭善著，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七月版。

《王遽常教授学谱》，王运天编著，二〇〇〇排印本。

《王遽常与沈乾熙》，张仲蔚，见顾国华编《文坛杂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王遽常先生书信录》，冯其庸，见《中国文化》二〇〇九年第一期。

《文心雕龙校读记》，钱基博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无锡民生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文史通义注》，叶长青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一，无锡民生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

《往事漫忆》，郭影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版。

《往事杂忆》，胡子远，见《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七、八期合刊。

《皖风》创刊号，无锡国专安徽同学学术研究社《皖风》编辑会编辑，无锡文新印刷所印刷，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出版。

《我的回忆》，巨赞，见刁紫梦、罗标元、陆汉卿、左超英编《桂林旧事》，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版。

《我的自传》，汤志钧，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版。

《我的父亲张元济》，张树年著，上海出版中心一九九七年四月版。

《我与〈资本论〉的不解之缘》，陈征，见李向阳编《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九月版。

《吴孟复心目中的钱氏夫子》，纪健生，见范旭仑、李洪岩编《钱锺书评论（卷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版。

《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纪健生，见纪健生主编《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卷），黄山书社二〇〇六年五月版。

《吴宓日记第三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五月版。

《吴天石年表》，欣文，见《文海星光——南通文化名人（一）》，《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发行。

《吴文治教授的文学活动与学术成就》，朱崇才、肖今，见《古典文学知识》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吴则虞传略》，吴受璩，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

《为学问的人生——记福建师大教授陈祥耀》，郭培明，见郭培明著《访在世纪边上》，远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X

《新无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十月。

《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马亚中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六月版。

《雪龕自订年谱》，诸祖耿，见《文教资料》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学术世界》一卷一期至二卷四期（一九三五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陈柱尊主编，上海世界书局印行。

《性理学大义》（上、下），唐文治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三，无锡民生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五月出版。

《夏承焘词集》，吴无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版。

《校长的人格魅力》，范敬宜，见范敬宜著《敬宜笔记》，文汇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版。

《县经济检查委员会各种档案》，全宗号 ML5，案卷号 257，无锡市档案馆。

《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钱基博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集资排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

《笑我贩书续编》，范笑我著，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版。

《先严蒋伯潜传略》，蒋祖怡，见《富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许符实同志谈无锡国专》，见《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七、八期合刊。

《徐昂的汉语语法研究》，周远富、王芳，见《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四年五月版。

《徐益修小传》，徐天倪、张慕慈，见《文海星光——南通文化名人（一）》，《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发行。

《徐兴业》，见《中国作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

《献身文化教育事业的吴天石》，许含章、朱瑞兮，见《文海星光——南通文化名人（一）》，《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发行。

《戏剧家周贻白在动荡的年代》，董旻，见《人物》二〇〇三年第四期。

Y

《忆无锡》，陈柱，见《风雨谈》第七期，一九四三年十月。

《忆往录》，唐庆治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印行。

《忆无锡国专和唐文治先生的资料、文章、专刊，修葺恢复“茹经堂”、设立唐文治纪念馆的报告、通知》，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25，苏州大学档案馆。

《忆姚仲实先生》，吴孟复，见杨怀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版。

《杨廷福自传》，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版。

《迎接黎明：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城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一九九一年七月排印本。

《愿为家乡教育事业出力献智——访吴文治副教授》，杜庆华，见杜庆华著《潮涌暨阳》，文汇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月版。

《与大师谈大师》，沈宁，见《随笔》二〇〇六年第六期。

《语文教研历程片段》，许威汉，见《许威汉语文教育文存》，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八月版。

Z

《自传》，王蘧常，见杨扬、陈引弛、傅杰选编《二十世纪名人自述·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月版。

《自述》，王蘧常，见《学术集林》第三卷，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月版。

《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冯振著，党玉敏、冯采苹编校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版。

《中国现代史大事记》，梁寒冰、魏宏运主编，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版。

《中国教育之改进》，国联教育考察团撰，国立编译馆一九三二年一月版。

《中国文学院关于更改校名、校长训词、聘请校董、接管附中机构、四九年度毕业生名册、统计表、学生处分、苏南行政公署有关文件》，全宗号七，案卷号永久 20，苏州大学档案馆。

《中国经济学社第七次年会纪录》，朱彬元、许师慎，见《经济学学刊》第二卷第二期。

《中书君诗初刊》，钱锺书著，一九三四年排印本。

《中华百家姓·范》，熊光宗、高健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版。

《章太炎学术年谱》，姚莫中、董国炎著，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版。

《章太炎年谱长编》（全二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十月版。

《章太炎演讲集》，马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版。

《章氏国学讲习会纪事》，诸祖耿，见《文教资料》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张仲礼先生回忆录》，张仲礼口述、施扣柱整理，见王冷一、钱铮、李莹编著《智库之宝：张仲礼》，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九月版。

《庄子新义》，朱文熊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九三四年排印本。

《朱东润自传》（《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朱东润著，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一月版，此书又有人民文学出

版社二〇〇九年一月刊本。

《朱东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版。

《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周振甫年谱》，徐名翠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四月版。

《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周贻白著、沈燮元编，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版。

《致刘桂秋信》，王绍曾，原件，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众中形影只成孤》，沈达夫，见沈达夫著《风人梦忆》，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版。

《专科学校组织法》，见《教育法令汇编》第一编，教育部参事室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一月版。

《专科学校规程》，见《教育法令汇编》第一编，教育部参事室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一月版。

《重要活动纪事》，孔祥瑛、刘晓明协助整理，见《钱伟长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版。

《治学杂语》，蒙文通，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版。

《杂文家周木斋》，万叶树，见万叶树主编《阳湖流韵》，中国工人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版。

《尊闻室臆稿》，陈天倪（鼎忠）著，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六月版。

后 记

说起来，从开始起意要编撰《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到现在，已经有不少年头了。进入新千年后的头几年，我在写作《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时，就开始留意搜求有关无锡国专的资料。二〇〇四年《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出版后，更是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的编撰工作上。先是辗转各处，通过各种方式途径，继续着意寻访文献资料。其间曾经一次次地到无锡市图书馆，把从一九二〇年一九五〇年的《新无锡》等老报纸，一页一页地翻查了一遍；又曾经两次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两次去苏州大学档案馆。第二次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时，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周；在档案馆附近找了一个小旅舍住下，早上开馆后进去，下午闭馆前出来；在馆中按规定不能提供资料复制的情况下，只能用最原始的手抄的方法埋头摘录资料。记得最后一天一早起来退了旅舍的房，便进馆抄录资料；中午闭馆后，因下午还要继续工作，在一个小店吃了一点东西后，便躺在街边的石凳上小憩了一会儿。接着是进行资料长编的编制。再接着，从二〇〇七年开始，正式进行本书的写作。这里特别想提到的是，当我这些年中，慢慢地不再愿意去为职称晋升等事费神劳思、熙攘奔竞时，反而可以有一种比较宁



静、淡定、自由的心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几年中，从一稿到八稿，慢慢增改，细细打磨，才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种面貌。

当此书脱稿之际，心中铭感不忘的，依然是许多师友对我的无私帮助。我在《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的后记中曾提到：“我国著名的目录学专家、山东大学的王绍曾先生是无锡国专的早期学生，我曾很冒昧地去信向他请教几个相关的问题，没想到小叩即发大鸣，年已九旬的绍曾先生不久就回了一封洋洋三四千言的复信，对我所提的问题一一详细作答，让我深为感动。”绍曾先生这封信中所述的内容，于我写《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一书，仍然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样使我深为感动的，还有冯其庸先生和沈绍组先生。两位先生当年是无锡国专的同班同学，现在都已经是寿登耄耋的老人了。绍组先生很关心本书的出版，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某日，专门打长途电话给其庸先生，请其为本书作序，当时即蒙其庸先生慨然应允。此后不久，我和其庸先生通话，表示要到北京去拜访他，并把书稿送给他审阅。其庸先生说，在这天寒地冻之时，不必专门跑到北京，只要把书稿寄来就可以了。听了这样的话，于“天寒地冻”之时，我的心里却生了融融的暖意。其庸先生收到书稿后，不顾年高体弱，很快写出了七千多言的长序，其间数次和我通长长的电话，回忆在国专读书的往事，讨论序中的有关内容，并嘱我将此序送给绍组先生阅看，以防一个人的记忆有误。在绍组先生家，他和我相对而坐，让我一句句地通读其庸先生的序，边读边进行讨论。从这些事情上面，让我这个后学对“国专精神”有了一次最直接最深切的体会感受。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还曾写信向冯振先生的哲嗣冯郅仲教授请益，蒙其热情作答；之后两人之间便时相以电

子邮件往还。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九日，邳仲先生来无锡，我和他在鼋头渚公园中见面畅谈（当时在座的还有冯振先生之女冯采芹女士、蒋庭曜先生之子蒋劭先生和冯励青先生之女冯亚男女士）；离锡后不久，邳仲先生又给我寄来了冯振《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冯振文选》和《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三年夏毕业纪念册》等珍贵文献，殷拳雅意，使我感念不已。

从本书体例的设定、内容的修改，到最后印行出版，业师胡治华先生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社长郭银星女士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大力的支持帮助，乃使本书得以及时同读者见面；无锡市教育界老前辈姚邦豪先生对本书的撰作出版也一直予以热情的关心鼓励。此外，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李定兄，在繁忙的公务中抽暇为我复制寄来了一册稀见的资料；新疆傅宏星兄和北京张静君，当时他们一个在撰写《钱基博年谱》，一个在做有关无锡国专的硕士论文，都曾给我提供了不少关于无锡国专的文献资料。江苏太仓沙溪中学张庆老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博士生涂耀威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陆远君，苏州大学图书馆李峰先生，无锡市图书馆古籍部王进雄、孟明峰、朱刚诸兄和章虹女士，无锡市史志办公室资料室杨荫萍女士，江南大学法政学院汪春劭兄，江南大学文学院黄明明、苏旸、杨晖、尹楚兵诸兄，我读大学时的同班学长钮伟国徐忠宪二兄，也都给过我不少帮助。本书的责任编辑陈光先生和编审林建敏女士，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指出和纠正了书稿中的许多错误。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在这几年中，为此书的撰写，耗费了我的许多心血。但是，以一人之力来编写一本编年的无锡国专校史，工作面广量




大，难免会有不少遗漏和讹误之处。例如，书中载录了无锡国专各期学生的名单，我所依据的，主要是几种不同时期的无锡国专的校友录，其中有的明显能看出有不少印刷上的错误。对这些错误，有的已根据其他文献加以订正，有的却一时难以判别其正误。在我已出的几本书中，内心很希望这本《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有修订再版之日；而且接下来我还有继续进行无锡国专研究的下一步计划，所以竭诚欢迎此书的读者能有以教我、有以惠我，帮助我把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刘桂秋

二〇一一年五月于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策划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陈光

装帧设计：海馨书装
030-67048988



WUXI GUOZHUAN BIANNIAN SHIJI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

ISBN 978-7-5000-8592-8



9 787500 085928 >

定价：59.00元